中国军事通史 第七卷

三国军事史

目　录

第七卷　三国军事史

书末附图：

绪　论

《三国军事史》是一部断代军事史，叙述从初平元年（190年）东汉帝国分裂到景元四年（264年）魏灭蜀战争即三国开始走向统一的75年间军事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内容包括这期间的军制、军事技术、战术、战略、战争、军事思想等项内容，而以战争为重点。试图通过描述三国军事历史的真实面貌，揭示三国军事的根本规律和特点。

三国军事植根于所处的时期。要理解三国军事，必须深刻理解这个时期。三国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呢？它是在中国历史上继秦、汉四百年大一统之后出现的转变时期，是分裂和统一斗争的时期，是竞争激烈人才辈出的时期，也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更大分裂时代的开端，具有如下特征：

一、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转变。举凡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其转变都是秦汉以来最大的。从社会方面说，豪强大族成长为社会上最强大的势力，在动荡时期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台前出演，幕后操纵，极为活跃。一些高官显贵家族，在魏晋之际通过拥立新朝迅速发展起来，享有世代做官、免除徭役的政治、经济特权，发展为新的特殊阶层——士族。从经济方面说，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大批土地无主，主要经济资源不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主要的经济问题不再是两汉以来的土地兼并，而是各政权之间、国家与豪强大族之间对于人口的争夺。经济格局也变了，中原和关中经济遭战争打击后崩溃，不再独踞经济中心地位，新兴的南方经济奋起与北方争雄。从政治方面说，在格局上经历了汉末群雄混战，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经过魏灭蜀再逐步过渡到中国统一。在制度上，摧毁了腐朽的宦官、外戚专政，由魏、蜀、吴重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但又不时出现权臣专政。从思想

文化方面说，由于儒学在战乱中无所作为，其独尊地位被打破，道、法诸家活跃，最终玄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在上述全面转变中，三国成为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大变化的时期。

二、分裂和统一成了时代的主题。三国时期最大问题、各种斗争的中心，是分裂和统一。整个三国时期都在解决这一对矛盾，并在解决中形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群雄混战。由于东汉末年中央集权瓦解和豪强大族割据倾向的恶性发展，帝国迅速分裂，地方割据势力乘势而起，出现了全面割据。割据州一级的有冀、幽、兖、徐、扬、荆、益7州，割据郡一级的更多，割据乡里的数不胜数。各割据势力之间不断展开兼并战争，出现全面混战。群雄全面混战的结果，是曹操统一了北方。第二阶段，是三国形成。统一北方的曹操挥军南下时，遇到孙权、刘备的顽强抵抗，形成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局面。过去自周秦汉以来，得中原者以发达的北方经济为基础，通常都能够得天下；但现在北方从全国经济重心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南方由于社会相对安定，有大批北方避难人口携带先进耕作技术南下，经济得到空前开发，较快地走向繁荣。北方的破坏，南方的开发，造成南北方经济实力趋向平衡的新格局。占领中原的曹操未能统一全国，直接原因是其赤壁之战中战略指导失策，深层原因是经济上不再是北强南弱了。因此群雄混战后，不是像秦和西汉那样出现全国统一，而是形成魏、蜀、吴三国。第三阶段，三国鼎立。由于战略均势，三国进入相持阶段，但相持是暂时的。这是由于豪强大族具有两面性：除了有割据的一面以外，还有拥护统一的一面。由于一批豪强大族为躲避战乱举族迁徙、流落他乡而败落，他们深切感受到，只有恢复统一和稳定，才可以使地位稳固。广大的人民，也都渴望早日结束战乱，恢复安定。在秦汉以来四百年统一的传统影响下，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三国都企图由自己实现中国的统一，但是北方已获安定，经济逐渐复苏，魏国政治较吴、蜀进步，军事实力和指挥能力占据优势，因此北方魏国灭亡蜀国，开始了中国的统一。

三、竞争激烈，人才辈出。在社会大转变及分裂和统一的较量中，各方在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展开全面竞争，带来了历史上少有的生机勃勃的局面。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各方实力、政策、人才之争。由于群雄并起，人口流动，人们有了双向选择的自由，不仅君择臣，臣亦有条件择君，名士和将领们在投靠政治军事集团时拥有很大自由。这一自由，促使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袁绍、袁术尽管名望很高，实力雄厚，但是才能有限，不到十年，败在名微众寡的曹操手下。这是汰力求才、汰名求实机制无情筛选的结果。在这样的机制下，比较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因此各种优秀人才获得较充分的施展天地，争相脱颖而出，出现“人才莫盛于三国”① 的景象。在这样的机制下，不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是能者脱颖而出。就个人而言，在大族主宰的社会中，不是大族出身的曹操、刘备和次等大族出身的孙权，都由于杰出的才干一跃成为领袖。就国家而言，魏国以其政治、经济政策合宜，最终在三国竞争中击败蜀、吴，但其领导曹氏集团却由于对内政策和处置失当，败在司马氏手中。

这些特征，给予三国军事以深刻影响，规定了三国军事的地位和规律。由于统一和分裂是时代的主题，因此军事斗争在三国形成前处于中心地位；在三国形成后仍处于重要地位。三国军事是为时代主题服务的，它既为割据、分裂的倾向服务，又为克服分裂、走向统一服务。这是三国军事的两面性，也是三国军事的根本规律。三国军事是沿着这一根本规律向前发展的，因而它所包含的战争、三角斗争、军事战略、军制、军事技术和战术五个方面，具有与秦汉判然不同的新时期的特点。以下就三国军事这五个特点，作一概略的论述。

---

① 清代史家赵翼语，见其《二十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不同》。

一、频繁和大烈度的战争

三国军事的第一个特点，是其战争频繁，烈度大。三国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封建割据战争和封建统一战争。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从190年起到魏灭蜀的75年内，除了魏甘露四年（260年）以外，无一年无战事，战争频率如此之高，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战争的烈度也相当大。战火燃遍原东汉13部州的每一州。尤其在北方，许多割据者几万、十几万地屠杀百姓和降卒，战争暴行不绝于书，时常出现屠城和筑京观的残酷事件。割据者乘战争之机进行疯狂的掠夺，造成名都空而不居、昔日繁荣之地几百里仅余白骨而渺无人烟的惨象。大批人口死于兵乱，由战争引发和加剧的灾荒、疾疫造成人口更大量地死亡。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的人们举族离开祖居出走，四处流移，托身他方。流民从北方向江东、巴蜀和东北转移，出现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迁徙。人口死亡和迁徙，成了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史称汉时人口，至此十存其一。直到魏明帝时，人们还认为，全国民数不过相当汉时一个大郡而已。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北方人少地多，土地荒而不耕，粮食总产量急剧下降，粮价高涨，北方经济一度陷于崩溃。由秦汉到三国五百年间，伴随战争出现的三次经济大波动中，以汉末到三国初年这一次最为严重，战争破坏的烈度也以这一次为最大。

三国的战争，特别是群雄混战，造成时代的浩劫，使东汉末年以来的社会经济遭到比西汉末年还要惨重的破坏。但是，战争也以雷霆万钧之力，粉碎了桓、灵以来根深蒂固的黑暗政治，促成割据势力逐个灭亡和三国初期政治的清明，出现诸葛亮治蜀那样历史上受称道的业绩，创造出生动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历史以付出暂时的黑暗、倒退作为代价，赢得了光明和进步。

二、三角斗争的指导

三国军事的第二个特点，是有外交斗争密切配合，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战略三角斗争。三国处在相互争夺全中国统治权的同一个斗争中，彼此利害关系密切，相互间形成魏较强、蜀吴较弱的战略三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方的重大行动，都对其他两方具有战略意义，一方对另一方的政策，既受制于又影响到第三方。每一方都企图利用三角关系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为自身利益服务。在这一形势下，三角斗争的指导显得纵横捭阖，异常精彩，其具体内容是：

第一，吴、蜀两个弱者，以结为联盟共同对抗强敌曹魏作为处理三角关系的基本方针。建安十三年（208 年）秋曹操击败刘备后企图东下灭吴。南方孙权、刘备如果不联合，将可能被各个击破。孙权迅速实行战略转变，放弃攻占荆州的企图，转向联合以刘备为首的荆州抗曹派。在孙、刘联合下，一战而胜，迫使曹操退回北方。战后孙权夺到交州，刘备跨有荆、益，双方获取了重大战略利益。这次联合，到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夏关羽北攻襄樊为止，达 11 年。此后虽然反目成仇，不久又恢复了联合，原因依然是为了共同对付魏国的威胁。蜀国在江陵、夷陵惨败，刘备去世的危急关头，只有联吴一条路可走。东吴在魏国以武力胁迫其放弃独立的压力下，也只有联蜀才能解脱。吴、蜀的第二度联合，从魏黄初四年（223 年）秋邓芝出使吴国，到蜀国灭亡，达 40 年，对两国抗衡魏国起到相互支持的作用。在两度联合中，两弱之间结盟长达 51 年，其联盟破裂不过 4 年。显而易见，结盟共抗强敌，是两弱基本利益所在，是他们指导三角关系的基本考虑。

第二，吴、蜀能否实现联合，关键在于有无战略眼光。赤壁之战后，孙权听从鲁肃建议，把苦战和鲜血换来的江陵借给刘备寄寓，扶植他壮大抗曹，是一个有眼力的大胆让步。从实践效果看，显示了保持联盟的决心，迫使曹操不敢轻举妄动，使东吴获

得安全，但是也有利于刘备在东吴上游崛起。于是孙权后悔不迭，向陆逊说，鲁肃劝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其实让步为形势所需，副作用也是可以消除的。此后，蜀国丞相诸葛亮坚持把战略利益摆在首位，为了恢复联盟，把东吴偷袭荆州、斩杀关羽、战败刘备等等老账一笔勾销，咽下苦果。蜀国以汉统继承者自居，任何人称帝，都对其正统地位构成道义上的挑战；但是孙权称帝时，诸葛亮反对同吴国断绝盟好，又一次作出不计较的让步，从而促使联盟延续到蜀亡。蜀国从让步中获得重大利益。东吴和蜀国作出上述大胆让步，都是基于长远的历史眼光，把战略利益摆在第一位，造成并延续了有利于他们的三国鼎立局面。

第三，两个弱者的矛盾激化后，它们的联盟有可能破裂，背盟一方将向强者寻求支持。事实证明，两弱联盟对敌斗争越有成效，敌之压力越小，内部冲突越发展，越为联盟破裂创造条件。在孙、刘联盟迫使曹操陷入困境时，东吴对于刘备借荆州不还，夺取益州后实力略大于东吴，对于关羽以据上游之势屡屡开衅，积忿不能忍耐，不惜背盟以维护自己利益，于是袭杀关羽，强夺荆州。为了在与刘备集团作战时，避免曹魏攻击，孙权大胆地化敌为友，由联刘抗曹，一变而为联曹抗刘，从而在三角中左右逢源，永不孤立。从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东吴偷袭荆州，到蜀国邓芝出使吴国前的 4 年中，吴、蜀的冲突压倒共同利益，出现蜀孤吴弱魏收实利的后果。

吴国联合魏国，是弱者联合强者。这一联合，必然采取弱者蒙受屈辱的不平等形式。魏国要求东吴称藩，接受封拜和任子，企图利用联合控制东吴。孙权的态度是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以政治上降到屈辱地位之轻，换取在三角中始终不受孤立的战略利益之重。他先向曹操效忠，再向魏文帝称臣，接受其吴王的封号，表现出勾践屈身忍辱之奇。二是坚持独立高于联合，受辱以不丧失独立为限度。鉴于任子是把太子送到魏国作人质，事关东吴独立，因此下决心不任子。三是尽可能维持联合，以便赢得同刘备作战需要的时间。其策略是假意答应任子，百般拖延，直到战争结束，

魏文帝三道伐吴，外交上已无回旋余地，才展开自卫还击。

第四，强者在两弱结盟时，处于不利地位。它的战略利益，是削弱、拆散它们的联盟，通过分化，使其鹬蚌相争，以便坐收渔利。分化的方法，通常是减轻军事压力。因为压力越大，两弱联合越紧，而减轻压力，则有可能使两弱矛盾发展，引起联合瓦解。在减轻压力时，有时是全部减轻，如曹操以退兵诱使袁谭、袁尚不再外御其侮，而转向内讧。果然不久袁谭要求联合曹操，攻击袁尚，曹操实现了各个击破。有时是部分减轻，如对孙、刘。如果全部减轻压力，孙、刘必然乘势坐大；因此仅减轻对孙、刘接合部荆州的压力，对于淮南和汉中方向则决不减轻，因为对相距遥远的一东一西两地施压，不像在荆州那样容易促成孙、刘的紧密联合。

强者的斗争指导，还应该善于发现两个弱者结成的联盟中的裂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方针。当一个弱者前来谋求共同对付另一个弱者时，困难是分不清求助者是否出于真心。这时径直论形势就行了。如果两个弱者都比较困穷、疲敝，就取乱侮亡，联一打一，各个击破，就像对待二袁兄弟那样。否则弱者渡过危急关头，亡形消失，就不易消灭，丧失用兵要义了。如果两个弱者力量都较强，如孙、刘，那么在他们内讧时采取联一打一，有可能使被联者坐大。这时最有利的策略，莫过于促使两弱自相争斗，而不帮助任何一方，以便像卞庄刺虎那样坐待两疲。因此当孙权密告将偷袭关羽时，曹操却向围攻自己的敌人关羽泄露这一秘密，制止众将追击退军的关羽，企图把这股祸水引向东吴，使关羽与孙权自相残杀，作到像董昭建议的那样，让孙、刘像两匹马那样由自己控制着相对踢咬，那时关羽存则孙、刘两疲，关羽亡则孙、刘将交兵不懈。曹操明白，如果不在军事上保持中立，而去追击并消灭关羽，孙权就会改变防关羽的心，转而对付自己，战略上是极为不利的。

三国军事提供的上述三角斗争指导的经验，是丰富而特殊的。

三、军事战略的指导

（一）三个阶段的战略决策

三国军事的第三个特点，是拥有富于谋略的军事战略指导。由于这个时期的战争竞争极为激烈，众多的逐鹿者在云集的智囊帮助下，为战胜对方不断施展计谋，经常出现以智斗智的高水平的谋略对抗。军事战略指导因此具有丰富而精彩的内容。三国时期的战略决策，是对当时重大军事战略问题作出的决定，是指导战争的纲领，它在三个阶段中有不凡的表现：

1、群雄混战阶段的战略决策

从初平元年（190 年）东汉帝国分裂到建安十三年（208 年）赤壁之战前夕，这 19 年是群雄混战阶段。这个阶段群雄初起，兼并战争激烈，最后由曹操统一了北方。这个阶段群雄和曹操战略决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四个：

（1）确定战略方向。这关系到群雄在兼并战争中以谁为敌、向何处发展，是初起割据时必须正确解决的大问题。袁绍实力强大，确定以夺取最有利的河北为方向；曹操实力中等，随机应变，继袁绍之后确定以夺取河南为方向；孙坚和刘备初起时实力较弱，也企图在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中原夺取根据地。实践证明，这对于孙、刘是行不通的。确定战略方向要从实力出发。孙、刘只有避实击虚，远离争夺激烈的地区去开拓，才能生存、发展。后来孙策转向割据势力较弱和分散的江东，前后四年，据有江东六郡，获得成功。刘备则在下个阶段才作到这一点。

（2）建立强大的军队。这是群雄强大起来的必经途径。建军问题的重点在于解决兵源和御将。曹操等人鉴于征兵制衰落，解决兵源时广辟来源，以多种方式集兵。曹操在战胜青州黄巾后进行收降，其军队迅速壮大。孙策以宽大的政策招募降兵，十日之内，得现兵 2 万，威震江东。而不明此义的公孙瓒，屠杀青、徐黄巾数万人，虽胜而兵力并未扩大。曹操又以严格要求和善用赏

罚进行御将。他毫不吝惜地重赏有功将领，并忍耐到自己比较强大后，才实施真正的惩罚。

（3）根据地、作战形式和内外线关系等若干问题。这些是在决策中极大地影响着兼并战争胜负的问题。根据地问题，主要是正确处理巩固老区和夺取新区的关系。曹操在兖州根据地尚未巩固时，急于进攻徐州，导致兖州被吕布侵入，曹操几乎无家可归。后来把驱逐吕布摆在第一位，放弃急于出兵占领新的割据区徐州，才站稳了脚跟。作战形式问题，是根据新的作战任务进行形式的转换。如袁绍在防御公孙瓒进攻、保卫冀州时，以运动战为主；转入进攻公孙瓒易京后，作战形式转变为以攻坚战为主。内外线关系问题，主要是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曹操处在四战之地，由于坚持战略内线中的外线作战，逐步统一了河南。

（4）经济崩溃下的军粮保障。这个问题日益成为割据者的生命线。解决它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只顾眼前，不事生产，靠抢掠为生，甚至在自己根据地上烧、杀、抢、掠，竭泽而渔，如李傕、郭汜、袁术的所作所为。这样作显然很省力，暂时很见效，但好景不长，因为摧残了自己根据地，实际上是短视的自杀行为。群雄凡这么作的都失败了。另一条是立足于生产，增加军粮，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曹操把大量流民、无主荒田和大批农具三者结合起来，实行屯田。这样作虽然较吃力，但是抓住了根本，奠定了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此后曹操征战四方，减少了军粮之忧，才平定了北方。

2、三国形成阶段的战略决策

从赤壁之战到黄初三年（222年）夷陵之战的14年间，是三国形成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南北分立或者全国统一。有影响的势力首推北方曹操，此外南方的孙权和刘备，也是两股有经验、有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势力。形势究竟朝哪个前途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方的战略决策。这时各方战略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曹操的问题，是不战而降荆州后，要不要挟新平江汉之威，立

即灭吴。曹操对形势比较乐观，自以为大军所到，天下指日可定；实际上其决策中没有解决以狐疑之众、鞍马之军，如何在长江上战胜有水战之长的吴军问题。结果赤壁一战，铩羽而归，从此不能战胜南方。但是为什么赤壁机会一失，直到280年晋灭吴时候中国才实现统一，这一推迟，竟达73年之久呢？因为败后曹操内部问题尖锐起来，在南方乘机坐大并联合起来的形势下，北方要重新取得优势地位，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积蓄力量。几十年风云过后，不但曹操等不及，连他的子孙也丧失了权力。这个使命，历史交给司马氏来完成了。这是曹操赤壁之战中战略决策犯错误必须付出的代价。

孙权的问题，是要解除先是曹操后是刘备构成的威胁。他的决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保住了江东。在曹操东下灭吴的绝对优势兵力面前，和东吴内部一片主降声中，他敢于进行战略决战，并赢得胜利，创造了战争奇迹。至于刘备，尽管在赤壁战后强大起来并占据着东吴上游，却没有企图进攻东吴，然而东吴不问此时的动机，只着眼于客观的“势”。只要有人在它的上游荆州强大，就认为对它构成了威胁。它偷袭关羽荆州，是预除后患，进行预防性打击。

刘备的问题，是抓住机遇，壮大自己。他采纳诸葛亮隆中战略，暂时不同曹操争雄，在联合东吴将曹操遏制在北方并借到荆州后，又抓住刘璋邀请进入益州的机遇，向曹、孙之外的中间地带发展。由于对手比他软弱，因此游刃有余。结果从赤壁之战算起，短短六年，就跨有荆、益，鼎足西南，也创造了奇迹，成了赤壁战后时局的最大受益者。正当刘备“汉事将成”之际，围绕荆州归属，同东吴出现尖锐对立，而其决策却一再失误。一方面荆州是东吴全力来争、刘备只能以一部力量来守的形势，一方面刘备、关羽对东吴争荆州的决心估计不足，丧失警惕，因此关羽北攻襄樊时后方荆州留守部队不足被吕蒙偷袭，关羽被杀后刘备又置主要敌人曹魏于不顾，发动东征。东征中在夷陵地区坐守不进，师老兵疲，造成大败。由于对东吴决策失误，出现“吴更违

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①。经过上述一连串重大挫折的打击，国力大损。

3、三国鼎立阶段的战略决策

夷陵战后到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的42年，是三国鼎立阶段。这个阶段，魏国人口约占三国总人口的60%，州数占原东汉13部州的8州，经济潜力较大，但是在短时间内发挥不出来。吴、蜀两国在人口、州数等最基本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但是经济创造了当地历史上最高的水平。吴国有长江之险和最强大的水军，蜀国有重关之固和善于山地战的步兵。双方恢复联盟后，形成有利的两弱抗一强的格局。南北方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战略均势，但北方经济重振雄风后，最终打破了这一均势。

这个阶段战略决策的基本问题，是确定战争的目的和攻守类型。魏国没有放弃最终统一中国的企图，但在战略上采取攻还是守问题上意见颇不一致。魏文帝企图以战略进攻统一中国，三次伐吴，无功而返，说明马上消灭孙、刘是不现实的，也说明统一问题虽然是军事问题，但不能单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是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即武的问题是同文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于是魏国君臣探讨了文武两者的关系，认为当前突出的问题，不是马上进攻吴、蜀，而是国内百姓疲敝。只要增强了国力，吴、蜀的灭亡，指日可待。应该把发展生产，节约支出，作为当务之急。魏国地大人多，时间拖长，是有利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从魏明帝开始，确立了先文后武的守势方针，不急于进攻吴、蜀，而重在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使其优势从潜在状态逐渐转化为现实。到了三国鼎立的后期，魏国综合国力对南方占了优势，兵力估计至少在60万以上，占了三国总兵力的60%。灭蜀前夕，南北方战略均势，实际上被打破了。事实证明，先文后武守势战略的决策

---

①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7月第2版，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载《后出师表》。此表不是诸葛亮所作，但作者是三国人。

是有远见的、成功的。

这个阶段，吴国孙氏政权完成同江东大族的结合，实现了本土化。江东大族成为这一政权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对吴国的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孙权虽然有统一中国的企图，但是不能不听取江东大族的意见。江东大族从开发东南、发展地主经济出发，渴望获得安定的环境，减轻战争负担，只求保住江东，不愿意劳师縻饷去同魏国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吴国实力不足，骑兵弱小，也限制了它这样作。因此，它的战略方针，是以长江为依托进行防御，保卫江东的安全，即所谓“限江自保”①。这一方针，适合吴国国情，为吴国保存了实力，如果不是它后期政治腐败、丧失人心，凭它的力量，是有可能继续自保东南的。

蜀国以兴复汉室相标榜，不能不以消灭魏国为战争目的。在战争类型上，交替采取攻势和守势。蜀国国力不如魏国，蒋琬、费祎当政，都采取守势，以缓解经济紧张，休息国力。诸葛亮、姜维当政，采取攻势。诸葛亮五次北伐，耀兵上国，直至病逝前线，赍志而殁；后来姜维又多次北伐。他们企图在长期北伐中，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最终实现强弱转化。但是蜀国经过江陵、夷陵之战后，力量严重削弱，“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② 因此这一攻势方针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疲敝了民力、国力，特别是姜维，其北伐一直延续到蜀亡前一年，后果严重。但是诸葛亮的攻势，有积极的一面，不仅对外显示了自强的决心，而且由于蜀国处小攻大而有忧，产生了治国治军的强大动力。在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的形势下，终诸葛亮之世，蜀国蜀军的治理，在三国中是最好的，历史上一直被人称道。

以上是三个阶段的战略决策。在这方面，曹、孙、刘比群雄高出一头。他们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立足长远，在决策时能够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读〈古文辞类纂·苏明允‘权书’十项籍〉批语》，第1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从困境中找出办法，显示出高度的智慧，虽然初起时实力并不强大，但是都据此脱颖而出，为造成三国鼎立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后在三国之间的竞争中，魏国战略决策深谋远虑，符合实际情况，也为灭亡蜀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战略指导艺术的特点

三国时期丰富而精彩的战略指导，除了表现在上述战略决策上以外，还表现在把这些决策付诸实施的战略指导艺术上。如果说战略决策是创作乐谱的话，那么这个乐谱的旋律还需要通过演奏，即通过战略指导艺术体现出来。

1、善于驾驭战争的发展

这在三国战略指导的实践中，有鲜明体现。例如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实践中，初期往往急于求成，遭受挫折，后来他把从事的战争依据要达到的目标，区分为夺取和保卫兖州根据地、兼并河南、兼并河北三个阶段。每阶段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以后，再转入下一阶段，并注意在上一个阶段为下一个阶段作准备，通过把握战争的阶段性，成功地驾驭了统一北方的战争。又如官渡、赤壁、夷陵三大决战，都是优势一方发起，而劣势一方在战前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看到敌之弱点和己之强项，建立起必胜信心，敢于以劣势兵力进行决战，歼敌重兵，驾驭了战争。又如曹操在官渡相持时，只剩一个月粮食，在久攻下邳吕布不下时，部队十分疲劳，决心都发生动摇。但后来认识到这时也是袁绍、吕布力量由量变到质变的时节，袁绍的进攻达到顶点，吕布的防御也失去稳定性，战争正处于转折关头。通过把握战争的转折，作出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很快捕捉到反攻时机，夺取到胜利，驾驭了战争。为了实施守势战略，魏国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使吴、蜀军来辄破于三城之下。吴国坚持夷陵要害为国之关限，在不能两全时甚至宁弃江陵而争西陵（夷陵后改此名）。他们守住上述对战争全局起重大作用的必争之地，通过掌握这些关节，驾驭了战争。

2、善于灵活地用兵

三国的战略指导，善于根据时间、地点、敌情、己情的变化，采取常法之外的巧妙处置办法实现战略企图，使人感到用兵上变化莫测。例如一般来说舍弃辎重，委军而争利，将冒较大的风险，为兵家所忌，但曹操北征乌桓时，中途放弃辎重，轻兵间道以掩敌不意，使乌桓军猝不及防，达成了战略突然性。又如关羽骁雄，硬攻其镇守的江陵，是难以如愿的。东吴利用关羽到前方北攻襄樊、后方空虚之际，白衣渡江，招降其守城将领，巧妙地占领了江陵。又如在大规模战争中出奇兵是较难的，但在魏灭蜀之战魏军受阻于剑阁不能前进被迫企图退兵时，邓艾偷渡阴平小路，行于无人烟处700余里，直冲蜀国的腹心，仍然达成出敌不意，迫使蜀国投降。在进行上述种种袭击时候，其共同处是发现敌人麻痹后，一反常规，隐真示假，荫蔽意图，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用意想不到的方法，出其不意地发起奇袭，从而取得攻敌无备的大利。

3、善于把心理和政治瓦解同军事打击结合起来

三国时期的战略指导，善于利用战争中的有利形势，展开心理的或政治的攻势，促使敌人精神动摇和崩溃，以减弱或者放弃抵抗。官渡、赤壁、夷陵三次决战，都是通过火攻，打乱敌之部署，使敌来不及组织应战，造成敌人精神动摇和崩溃，促使平时掩盖着的种种矛盾，突然间一齐爆发，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吕蒙通过优待俘虏的驻在江陵的关羽军将士家属，使企图回军江陵同其作战的关羽军将士丧失斗志，在回军途中不战而溃。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向其显示不可战胜的军威和团结他的政治愿望后，孟获既自感反抗无望，又对诸葛亮的宽大心悦诚服，从而甘心放弃抵抗。

上述情况反映出，三国时期战略指导总体水平比较突出。其所以如此，客观上是斗争复杂，竞争激烈，有利于产生高明的战略指导。主观上是冲破经学禁锢，思想比较解放，法家思潮大行其道，敢于提出乱世是权变之时，权谋位置应该在“仁义”之前，实行赏功能，而不像治平时期那样只是尚德行，因此仗怎样有利

就怎样打，而不必有所顾忌，也没有更多的束缚。同时有大批曹操、诸葛亮那样的名士参与，这些人擅长王霸之略，既熟悉历史成败经验，又关心现实，深通兵书战策，把战略指导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四、全面变革中的军制

三国军事的第四个特点，是其军制发生了全面变革。这时社会环境和战略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不仅由秦汉时代以自耕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转变为以豪强地主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而且由帝国的大一统，转变为群雄割据和三国鼎立，战争从以对外战争为主，转变为以连绵不断的内战为主。上述经济基础和战争对象的变化，要求军制适应强大起来的豪强大族的利益，适应新的割据和统一战争的内战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革新，其结果是三国时期的军制发生了秦汉以来最大最全面的变革。

第一，在军队体制方面，建立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三结合体制。组建了强大的中央军，并划分为中军和外军，以中军充任宿卫和战略机动兵力，以外军派驻在外地，充任各战略方向的战区兵力。同时，重建了维护地方秩序的州郡兵。

第二，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建立最高统帅、辖区都督、州郡领兵官三级体制。兵权经常从皇帝处分离出来，被相权或开府之将军权瓜分，或者被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强臣所控制。外军兵权则往往落入辖区都督手中。

第三，在兵种构成方面，形成了各具优势的结构。魏国在北方，步骑兵战斗力较强，其骑兵独步天下，擅长平原、高原的步骑兵联合作战。蜀国在西南，战场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其步兵特别是弩兵战斗力较强，擅长山地步战。吴国地处东南，据有长江中下游，其水军具有空前规模，占据战略地位。

第四，在兵役制度方面，由多种集兵方式并存，过渡到世兵制。在豪强大族抵制征兵的条件下，汉末以募兵、收降、征兵、使

少数民族当兵等多种方式征集兵员。建安后期，社会趋向安定，继续使用上述几种方式已经不可能征集到大量兵员，世兵制应运而生。在这种制度下，兵士终身当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兵士之家另立户籍，专项管理；入了士籍，不允许改为民籍；兵士的家属，集中居住，集中管理。

三国军制对于三国时期的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依靠强大的中央军，重建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威，从体制上堵塞了汉末地方割据的乱源。借助各有所长的兵种结构，促进了三国鼎立的实现。它创建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世兵制，保证国家在困难情况下，获得固定的兵源，并且在把兵士变为职业兵后，提高了他们的作战技能，恢复了较强战斗力。它又是两晋南北朝军制的开山之作，后者是对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也有一些弊端，例如军事领导体制有利于强臣拥兵，导致政治接连不稳，上演汉魏、魏晋一出出禅代的史剧。

五、取得新进步的军事技术和战术

三国军事的第五个特点，是其军事技术和战术取得新的进步。军事技术的进步是多方面的。在防护装具方面，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等新型铠研制成功；便于骑士骑乘的马具技术成熟，马鞍普及；成建制的铁骑出现，说明用于保护乘马的马甲已大量生产。在军用车方面，曹操制成发飞石击破敌军楼橹的发石车。它不仅恢复了见于春秋末期《范蠡兵法》的失传的发飞石的古法，而且由于安装在战车上，成为可以机动的最早的炮车。诸葛亮通过改革运输车，制成木牛流马，以适应艰难的蜀道，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北伐粮食运输。在军事工程方面，东吴在战略要地依水构筑濡须坞，把规模比城小的永备筑城坞同水战结合起来，多次起到阻止曹军沿濡须水进入长江的重大作用。曹操取道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北征乌桓时，探寻旧径，掘山填谷，在短时间内修成急造军路 500 余里，技术上堪称辉煌成就。魏蜀边境上的褒斜

栈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设的有梁有柱的木质悬空通道。魏、蜀军在边境交战时，经常有一方烧毁栈道阻止对方，大军每次通过该栈道时，大多数伴有繁重的修道任务。上述军事技术的进步，保障了各国对于军事技术的需要，有一些还发展成后世军队的主要装备。例如在铠甲方面，筒袖铠成了西晋的主要铠甲，两当铠成了南北朝最重要铠甲，明光铠成了南北朝又一个重要铠甲，也列为唐代13种铠甲之一。取得上述进步，是由于频繁激烈的战争提出了较大的需求，以及有远见、有魄力的统帅曹操、诸葛亮的亲自领导和直接参与，发挥了巧思。当时，发展军事技术所需的生产力非但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还遭到大破坏，社会上轻视技术的思想也根深蒂固。军事技术的进步，也是克服了上述种种困难取得的。

战术进步的重点是发展野战战术。因为这个时期武器装备的攻击能力弱于军事筑城的防御能力，城战战术发展余地小，所以重点发展野战战术。野战战术的进步表现在：

1、提高了军队机动能力。一是急疾行军增多，行军速度较高。夏侯渊以急疾行军闻名，“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①。司马懿奔袭孟达时，八日到新城城下，速度也很快。二是增强了军队机动时的安全保障。曹魏对行军进行严密的组织：认真组织侦察，察明行军沿途情况；礼请向导带路；建立运动保障，在前面“治道”“通路”；设立行军警戒，保障行军安全。诸葛亮对转移到新的宿营地的移营，规定了严格要求：移营前，作好准备；移营行军中，作好侦察和情况通报，遇到特殊地形，加强侦察和警戒；行军中各部遵循一定的次序、进行一定的队形变化；下营时按要求确定并标志营区的范围、方位、方向。

2、提高了阵战能力。一是在一段时间内普及了阵战，使之达到士民素习的程度。先后出现了下述阵：公孙瓒方阵，任峻复阵，乘之阵，诸葛亮八阵、连衡阵、三面圜阵，田豫圜阵，曹操十重

---

① 《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注引《魏书》。

阵，及阵名失载的袁绍之阵和张悌之阵。阵内一般以步、骑兵为主，有的配置了弩兵、车兵。阵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模，有翼、中坚、先登、殿后等部署。曹操还部署有战骑、陷骑、游骑。有列阵法，交战法，骑兵、车兵、战船运用法等基本阵法。规定了临阵必须执行金鼓旌旗命令，保持阵形整齐，奋勇杀敌。特设监督人员，由督战的部曲将执行监战。二是对阵法进行了革新。最突出的是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他针对魏军骑兵优势，以最先进的速射武器元戎为支撑，综合发挥步、弩、骑、车协同作战的威力，编成八阵。他的八阵，是五阵的变体，是四正四奇八阵合成的集团方阵，阵形可离，可合，可变。编成上是包容和对称的，具有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的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以上是三国军事的五个特点。显然，三国军事是在频繁和大烈度战争中，具有纵横捭阖三角斗争的军事，具有出色战略指导的军事，具有全面变革军制的军事，也是具有军事技术和战术新进步的军事。

三国军事由于创造性地发展前代军事，而成为一个经验宝库，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一些发明创造，如诸葛亮筒袖铠、两当铠、明光铠和八阵图都流传下来。《通典》卷一五七《卫公兵法》关于护卫辎重行军时的阵法变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关于唐太宗、李靖君臣对诸葛亮、曹操战术的探讨，都反映出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十分热衷于继承三国战术遗产。宋、元、明、清以来，这些战术、技术逐渐不适用，人们转而普及三国的讲史、演义、戏剧，在三国军事中重点寻求军事智慧。三国军事成了生动的军事历史教科书的题材，成了中国人民汲取军事历史智慧的重要源泉。同时，它在国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日本而言，天平宝字四年（760 年，唐代宗上元元年），留唐学者吉备真备在太宰府讲授八阵图。① 到了今天，日本对三国军事的兴趣，并

---

① 日本古史《续日本纪》卷二十二。

未减退，反而升温了。一些政界、军界、商界、企业界的人士，纷纷从中汲取所需要的智慧。今天，尽管作战方式不同了，但是在三角斗争、战略指导、军队建设等问题上，三国军事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军事建设仍然有借鉴作用。毛泽东等许多老一代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经常把三国军事的战例、典故、语言信手拈来，从中借鉴有益经验。三国军事也已经进入我国文化之中，对于当今激烈的商战和经营管理，同样具有开拓视野、启发思路的作用，它也将在这方面得到应用，开出灿烂之花。



第一章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发生

第一节　地方割据势力强大

在东汉近200年中，各地豪强地主通过土地兼并发展壮大了自己，到了东汉末年，已经十分强大，发展成与中央集权分庭抗礼的带有割据倾向的势力。这股地方势力的强大，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上实力雄厚

各地豪强地主拥有大量自给自足的田庄。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萎缩，田庄向自给自足方向发展。这种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生活，在东汉晚期崔寔作的《四民月令》中有生动的反映。书中说，地主田庄里种植着很多种谷物、蔬菜、竹木、药材，饲养着各种牲畜，有养蚕、缫丝、织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药、酿酒醋、作酱等手工业，能打造兵器。田庄内部进行交换，形成闭门成市的壮观景象。田庄成了典型的自然经济。田庄的经济规模有时很大。东汉后期，一些“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① 由于田庄经济上基本无求于人，豪强地主就有了不受制于人的经济实力，拥有了割据一方的物质基础。

以田庄为依托，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僮客、宾客等依附人口，使后者脱离国家户口，附籍于自己，把土地租佃给他们，使他们在

---

①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5月版，下同。

免于向国家缴纳赋税的同时，向自己缴纳粮谷。豪强地主占有的这种人口，往往为数众多，成为私人势力的来源。如曹纯“僮仆人客以百数”①，甘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②，吕范“将私客百人归策”③，李乾“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④。

豪强地主还拥有大量宗族人口。东汉末年，宗族保持着聚居之风，往往成百家、上千家有血缘关系的全族的同姓家庭，住在一地，彼此照顾，在乡里间形成了强大的一姓一族的宗法势力。在宗族中，豪强地主往往是族长或族中最有权势的人，代表着祖先的权威。他们一方面通过雇佣，占有大量族内贫苦人口，另一方面对族中的人心进行笼络。每到秋天，存问九族，逢到青黄不接，赈济贫苦，用血缘的纽带，在封建剥削关系上蒙上一层温情。他们从上述两方面控制了宗族，培育起私人雄厚的势力。地方上一批人多势众的宗族，挟经济发展之势，具有更强的实力。

豪强经济在社会经济成份中占主导地位。在社会经济成份中，除了豪强地主经济成份以外，还有自耕农经济成份。自耕农则是国家编户的基础，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徭役，是国家力量的源泉。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以吞噬自耕农经济为代价。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做了豪强地主的宾客、徒附，脱离国家的户籍，不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徭役。于是东汉经济的发展，表现为地方豪强地主经济实力日益雄厚，国家越来越贫弱。

二、政治上称霸一方

豪强的上层，是所谓的大族、大姓、甲族、冠族。许多地方程度不同地形成了若干大姓，如冯翊郡有“甲族桓、田、吉、

---

① 《三国志》卷九《曹纯传》裴松之注引王粲《英雄记》。

② 《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注引韦曜《吴书》。

③ 《三国志》卷五十六《吕范传》。

④ 《三国志》卷十八《李典传》。

郭”①，天水郡有姜、阎、任、赵②，吴郡有顾、陆、朱、张等等。大姓通过所控制的宗族，确立了对于乡里的领导地位；不仅如此，还使其势力到达州郡。他们极力使其代表人物进入州郡行政机构，充当主要僚属。在东汉后期，当地人充当州郡僚属成了惯例，朝廷只任命各地的刺史、太守、县令，本地重要僚属任命的优先权则属于大姓。由于每郡大姓为数有限，因此州郡大吏，总是由当地几家大姓盘根错节地把持着，形成世袭。他们根据这一不成文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把持并同朝廷分享了地方政权。这与刺史、太守由于任满即离任，权力不能生根，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歌谣形容地方大姓的政治势力说：“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③ 这反映出，大姓操纵的州郡文书在地方超过了皇帝诏书的权威。

地方大姓还通过名士操纵朝廷选举，影响国家政治。名士是东汉后期重要的社会势力，以某种道德方面的表现超人一等而出名，大多出身于大姓，或者有可能发展为大姓。名士主持乡里清议，品评乡里人物。当时朝廷选拔官吏，以乡里品评为根据，名士由此对朝廷用人拥有影响力。东汉后期，名士对于选举几乎起了决定性作用。大姓由于拥有名士，其政治影响力经常超出所在地方。某些大姓由此上升为地方显贵，成为冠族；而那些没有名士的豪强，即使较有力量，如李乾、李通、许褚等宗族，只能算是强宗，不能列入冠族。由于作名士是仕进和取得政治权力的捷径，冠族都努力保持其较高的文化修养。其中有些家族，几世专攻一经，通过经学入仕，猎取高官，造成累世公卿的局面。如汝南袁氏，累世专攻孟氏《易》学。从袁安开始，家族中四世作三公的达五人。他们招收弟子、门生，征辟掾属。这些门生、故吏

---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三《裴潜传》注引鱼豢《魏略·严干、李义传》。

② 《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注引《魏略·薛夏传》。

③ 崔寔《政论》。《初学记》卷二十四，《意林》卷十三，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十三、四九六、五九三。又，《御览》卷十三作“州县符”。

同他们构成终身关系。几代以后，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天下。他们成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的士大夫领袖，成长为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特重的门阀大族。在割据兴起时，拥有了超出本地方的号召力。

大姓、冠族、门阀大族通过把持地方政权和操纵朝廷选举，掌握了国家机器中的地方部分，并具备全国性的影响能力，为地方割据作好了政治准备。一旦割据的条件具备，他们就有可能把所控制的地方政权，现成地转化为割据力量。

三、军事上拥兵自强

各地豪强地主在军事上也逐渐强大起来。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防备春饥草窃和穷厄寒冻的饥民，在田庄内建立了武装体系：一是修筑坞壁，二是建立私人武装。汉末，豪强修建坞壁进入高峰期。其所建坞壁，从出土的东汉陶制楼阁、宅院模型看，带有围墙、角楼、望楼、飞桥等设施。坞壁同田庄结合起来后，田庄既是生产单位，又是防御单位。一些田庄里还能打造兵器，做到兵器自给。豪强大姓在田庄里把宗族、宾客、佃客、门生、故吏组织起来，建成自己的私兵，称为部曲。部曲成员来自宗族的，又称为家兵。部曲是且耕且战的武装耕种者，除了由租佃关系发展而来的对主人的政治依附关系外，被追加上兵法部勒的军事上的上下级关系，其依附关系更强，凝聚力、战斗力更高。如果田庄主人某豪强病危，则遗嘱其子侄统带部曲，使部曲带有世袭的特点。部曲在经济、宗法、指挥、兵器各方面完全依从于豪强，成为独立于国家武装力量之外的由豪强掌握的私兵。这种私兵，在东汉末年已很普遍。他们既有维持本地封建秩序、发挥国家镇压职能的补充作用，又对朝廷构成威胁，朝廷被迫采取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容忍的态度，同时又予以严格限制。豪强私兵也相应采取了隐蔽的形式，不搞常设的，只是季节性地开展训练和警卫，以亦兵亦农的方式存在。据《四民月令》的记

载，他们每年二月，练习射技；三月，警设守备；八月，修缮弓弩器械，进行射技训练；九月，修缮各种兵器，进行战斗和射技训练。黄巾起义期间，许多苦于战乱的农民要求当地武装起来的豪强大姓给予保护，豪强大姓为了聚众自保或者出兵作战，纷纷把他们组织起来，扩大私兵，修筑坞壁。私兵在镇压黄巾起义期间，由隐蔽走向公开，获得极大的发展。镇压黄巾起义以后，豪强大姓看到汉朝必乱，保持了这股大大膨胀的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机的到来。私家武装进一步朝着统一国家对立物的方向转化。

私兵是豪强大姓割据乡里村社的武力，也是州郡割据者控制乡里的基础力量。没有乡里武装豪强的支持，大的割据者不能割据方面，割据了也不稳定；但是拥有私兵的乡里豪强，并无割据方面的力量。有能力割据方面的，还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即州郡牧守，特别是刺史、州牧。镇压黄巾起义以来，不仅乡里豪强拥兵，州郡也迅速确立了拥兵体制。东汉地方设郡（国）、县两级，全国设立 13 部州，作为监察区，分别派出刺史对郡守、国相等墨绶以上二千石长吏进行监察。州既不是行政区，刺史也不能领兵。黄巾失败后，各地起义和守相叛乱不断。为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平息，汉灵帝采纳太常刘焉建议，不惜在州一级设置行政长官州牧，选朝廷重臣出任。为了令其镇压当地叛乱，赋予拥兵重权。这就从体制上造成州郡拥兵，“州任之重，自此而始”①。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央集权体制部分解体。首先，改变刺史以卑治尊的成法；其次，刺史本不能领兵，现在由于领兵是定制，成为内亲民事、外领兵马的大权在握者；再次，州由监察区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后，地方行政机构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地方最高权力机构，由桓、灵之间的 112 个郡国，发展到郡、国之上的 13 个州，为在更大范围内造成割据力量大开方便之门。

郡太守领掌兵权的加强和募兵私属化倾向的发展，促成了州郡拥兵。东汉初年，在郡一级撤消主管军事的都尉，并职太守，太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列传》。

守实现军政合一，其兵权在郡内不受制约，为日后造成过大权力提供了可能。在汉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郡太守加重了领兵作战任务，乘机把这种可能变为培植割据势力的现实。加之汉末社会动荡，各地为加强兵力需要大量募兵。朝廷往往把募兵的权力交给刺史、太守便宜行事。一些刺史、太守为了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加强自己的实力，往往令宗族和乡耆出面号召其本宗族、本乡里的人出来应募。这就把汉末盛行的依附关系带到军队中来。许多募来的兵甚至成了募兵者的部曲、义从，出现兵归将有、地方军队私属化的倾向。许多刺史、太守原来领兵不多，现在迅速拥有一支较强大的听命于私人的军队。上述体制上的变化，酿成了东汉末年州郡拥兵、外重中轻、尾大不掉的局面。

豪强和州郡拥兵的局面虽然形成，但一些拥兵者往往是儒生或武夫，由于缺乏胆力或者智谋，不具备充当割据者的素质。在天下将乱的形势下，具备这种素质的人物英雄和游侠活跃起来。汉末产生了“英雄”这一称谓。王粲作《英雄记》，把董卓等割据者和审配、周瑜等谋士、将领都收入，视为英雄。曹操的标准更高一些，说天下的英雄唯有自己和刘备。魏国刘劭在《人物志》中说，聪明秀出是英，可以为相；胆力过人是雄，可以为将。实际上，是指那些有勇有谋、有胆有识、兼资文武的人。与此同时，以轻生重义、救人急难为标榜的游侠，也十分引人注目。曹操、袁绍、袁术、张邈，甚至董卓等等，在割据前，几乎都喜欢作出侠义的举动，很早就以侠气闻名于世。充当游侠，既能使自己锻炼得敢作敢为，又能够博取名声，团结同党，增强号召力。英雄和游侠中，也有吕布那样出自下层的州里壮士，但大部分都是豪强大姓、门阀大族中的人物。在割据一开始，那些俗生儒士，即使身居高位，也很快败下阵来，而众多大姓、冠族、门阀大族中的英雄游侠，则掌握了割据的主导权，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开拓出割据混战的局面。

东汉末年，地方割据势力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只是时机未到，暂时躲在中央集权的体制内，暗

中窥测方向。对他们来说，实行地方武装割据的万事已经俱备，所欠的只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和瓦解这一东风。这个条件一旦到来，地方割据势力必将由地下转入公开，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割据混战。

第二节　东汉王朝权力崩溃

一、宦官外戚当政官僚士大夫集团崛起

东汉王朝从第四代和帝以后，皇帝大都短命早死。皇权落入接近皇帝、太后的宦官、外戚手中，二者轮番挟主专政。外戚利用皇帝幼弱、太后临朝的形势，以大将军名义掌握朝政；宦官又因缘时会，借皇帝长大后夺回权力的欲望，取外戚而代之。随着每个幼皇登基和长大，双方势力便消长一次，互相排斥异己，大规模地清洗对方，交替操纵朝政。在上述两大势力之外，又有官僚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结成私人性的团体，形成第三种政治力量。在东汉王朝由这三股力量构成的权力结构中，宦官、外戚是当政的力量，特别是宦官，先后六次打倒外戚，在桓、灵二帝时，几乎独霸政局，造成东汉最黑暗的统治。官僚士大夫集团在权力结构中暂时处于从属地位，其实力却越来越雄厚，宦官、外戚都从中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由于宦官及其党徒霸占朝官和地方官的位置，堵塞士人仕进道路，因此官僚士大夫集团特别不满，对宦官展开攻击。集团里的名士通过评论朝政、褒贬得失，形成清议，同太学生互相呼应，制造舆论，反对当权宦官的黑暗政治，形成巨大舆论压力。宦官举行反击，两次制造党锢事件，前后延续十几年，把反对他们的名士称为党人，加以免官，重的处死，牵连到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和五服以内亲属。大批党人被捕、被杀、被禁锢终身不准作官。

这时，统治集团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也趋向激化。灵帝公开卖官，把所得聚为私藏，实际上是鼓励买官的人向百姓贪婪地搜刮。朝廷由于西羌和边郡战争消耗大量军费，向全国拼命征收赋税和徭役。水利失修，灾害频生，其中水灾占东汉一半，旱灾占三分之一。人祸天灾，民不聊生，引发全国性的黄巾起义，严厉打击了东汉政权。灵帝怕党人同起义军结合，出现西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同农民起义联合反对新莽那样的局面，便赦免所有党人。从此，官僚士大夫集团从受打击排斥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迅速东山再起，力量很快超过处于权力顶端的宦官。

二、宦官外戚同归于尽

黄巾起义失败后，一方面是官僚士大夫的壮大，另一方面是外戚、宦官的矛盾重新激化，双方尖锐到兵戎相见。过去，灵帝为控制军权，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帅，组织新军，外戚何进尽管贵为大将军，也受其节制。宦官内典禁兵，出纳号令，凌驾于外戚之上。中平六年（189 年）四月，灵帝死，蹇硕企图杀何进，按照灵帝意向立刘协为帝。但皇子刘辩即位，是为少帝，其母何太后临朝，太后兄何进辅政，外戚势力重新抬头。外戚何进与太傅袁隗的侄儿袁绍合作，辟召智谋之士 20 余人。何进所依靠的，大都是名士、党人或其亲族。何进与宦官的斗争，实质上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同宦官的斗争。何进在党人的支持下，利用灵帝以来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腐败、引起天下公愤的有利形势，杀蹇硕，夺其禁兵。袁绍等人建议，进一步诛杀宦官以谢天下，同时借此集中权力；但宦官受何太后庇护。为了胁迫太后同意铲除宦官，何进采纳袁绍建议，私自调动董卓、王匡、桥瑁、丁原等四方猛将带兵进洛阳，造成逼宫的形势。许多有识之士都不以此举为然。何进主簿陈琳认为，大兵合聚，强者为雄，引外兵入京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只会成为祸乱之源。典军校尉曹操说，应当诛杀宦官中的首恶，用一名狱吏足够了。预言何进召董卓必败。

这时何进密谋泄露，宦官张让等谋杀了何进，外戚垮台。袁绍、袁术获悉突变，带兵关闭宫门，不分少长贤恶，杀尽宦官 2000 人，劫帝出逃的宦官张让等也被迫投河而死。至此，在东汉统治阶级内部，左右政局一百年的两大政治力量，在火并中同归于尽，宦官与外戚的矛盾从此结束了。东汉王朝中两股长期处于核心政治地位的力量同时消失，朝廷权力结构完全崩溃，中央集权陷于极度的削弱之中。

外戚、宦官同归于尽，为官僚士大夫集团掌握全国大权扫清了道路。这个集团来不及在内部形成核心，便匆匆忙忙登上政治舞台出演主角。由于其势力基础在地方州郡，有着浓厚的地域性和分散性，他们立即发现自己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各地势力都企图排斥别人，独占政权。于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内部的矛盾上升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这时州郡已经拥兵，自然要通过诉诸武力决定由哪股势力主宰天下，割据混战便不可避免了。

三、官僚士大夫集团反对董卓窃权

正当官僚士大夫集团摆脱从属地位、磨拳擦掌准备接管朝廷大权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朝廷大权落入应召来洛阳的军阀董卓之手。前将军董卓，是陇西（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南）豪强，粗猛有谋，弓马娴熟，带兵十年，在与西羌连年作战中养成自己的军事力量，发展成为凉州军阀。灵帝卧病时，他拒绝交出兵权，以并州牧拥兵河东（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在朝廷卧榻之侧静观时变。董卓率领 3000 精兵来到洛阳时，外戚何进、何苗兄弟和全部宦官都已被杀，洛阳城火光冲天。袁绍、袁术虽然带大将军兵杀了宦官，但是不能统领其兵。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的部曲无所隶属，都投奔董卓。董卓又诱使吕布杀了先于他应诏来到洛阳的丁原，兼并其并州军。京城兵权全部落入董卓之手。董卓以武力为后盾，在朝中野蛮专权。为了夺权，他设法打击外戚势力。少帝是何进外甥，董卓以少帝痴呆为由，胁迫朝臣同意废

掉他，扶立董太后之孙刘协为献帝，随后毒杀少帝之母何太后，斩断外戚何家势力的总根。董卓率领精兵前来，适逢帝室大乱，得以专擅皇帝废立，据有洛阳武库铠甲、兵器、国家珍宝，威震天下。

董卓处在洛阳官僚士大夫集团汪洋大海的包围中。为了摆脱孤立，他拉拢和依靠官僚士大夫集团，晋升和起用党人、名士。党人、名士由此布列朝廷，出宰州郡。但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由自己主宰天下，决不允许由下层豪强董卓来专权，几乎全部朝官内心都在抗议董卓擅行废立。司隶校尉袁绍在废立问题上不肯顺从董卓，逃亡到关东①。

官僚士大夫集团中，在洛阳的朝廷大员受制于董卓，不能有所作为，其年轻成员纷纷转入地方，联合地方原有势力跃升为反董主力。董卓为保无事，授予袁绍勃海郡（治南皮，今属河北）太守，又任命袁绍从弟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术、曹操都辞京官不做，秘密出奔到关东。关东牧守暗中串连反对董卓。广陵郡功曹臧洪劝郡太守张超起兵，张超陪他到酸枣（今河南延津西）会见其兄陈留太守张邈。张邈又约见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共同设立坛场，歃血为盟。还有东郡太守桥瑁，也都声讨董卓的酷虐，发誓纠合义兵，共赴国难。

有一些牧守在拥董和反董势力之间，首鼠两端。冀州牧韩馥为了防止勃海郡袁绍起兵，派多名部从事前去监视。反董势力为了师出有名，争取中立派同情，其东郡太守桥瑁诈造京师三公移书给各州郡，历数董卓罪恶，说被董卓逼迫，无力解救自己，企望义兵，以解国难。动摇的牧守，开始转变态度。韩馥致书袁绍，列举董卓罪恶，听凭他起兵。于是官僚士大夫集团中，一个以关东州郡部分刺史、太守为骨干的反董战线形成了。

---

① 秦和西汉定都关中后，称函谷关以东广大地区为关东。自从东汉末年设立潼关，有时也把潼关以东称作关东。

第三节 关东州郡讨伐董卓

一、战争爆发时的形势和双方企图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军队各有数万，公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行奋武将军。他们打出“诛除国贼”、“并赴国难”① 的旗帜，讨伐董卓。一时间，各地豪强地主“家家思乱”，“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②。还在继续观望的州郡，也往往同幽州牧刘虞那样，同联军暗通声气。整个官僚集团都动员起来，反对董卓攫取朝廷大权。

战争爆发时的形势是：以董卓为首的据有关西地区的并、凉军事集团挟持朝廷同以部分关东牧守组成的联军形成两大营垒，彼此对峙。联军方面，由于基本脱离董卓控制的朝廷，财赋不再上交，大量用于招募兵士，扩大部队，因而兵力据说达到几十万，远远超过董卓，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也存在很大弱点，由于是临时集合，各支军队间彼此争权夺利，暗藏着严重矛盾，缺乏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缺乏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兵士大都未经过训练，战斗力较弱。董卓方面，其并、凉兵久经战斗，富有作战经验，战斗力强；但是陷入不利境地：董卓控制的朝廷，其政令不能畅行于关东；为了缓解由于主要财赋来源断绝而造成的经济极度困难，在洛阳和关中地区野蛮抢掠，加剧同当地豪强和人民的对立；洛阳四周缺少险要，三面受到联军包围；洛阳以西攻陷河

① 《三国志》卷七《臧洪传》。

②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

东的 10 万白波起义军如果南下，即可切断董卓的后路，使董卓陷入进不可攻、后退无路的困境。

依据上述战争形势，联军企图依仗其数量优势，组织北、东、南三线包围洛阳，逼垮董卓。其部署是：北线以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进驻洛阳以北之河内郡（辖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韩馥留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向袁绍等供应军粮；东线以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与曹操等统率十数万兵进驻洛阳以东之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孔伷进驻颍川（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南线以袁术进驻洛阳以南的鲁阳（今河南鲁山）。

董卓处在联军三面包围中。他召集公卿商议大规模征兵，企图在扩军后讨伐关东。尚书郑泰顾虑董卓兵多后，更加凶狠难制，力持异议。他以联军有弱点安慰董卓，指出关东不足以加大兵，那里承平日久，兵员大都是临时招募的，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牧守不精通军事。袁绍是公卿子弟，生长在京师，张邈是个长者（富人），坐不妄视，孔伷清谈高论，能把枯萎的说活，都没有军旅之才。何况朝廷未授予那些牧守新的官爵，他们领导关系混乱，上下尊卑无序，仅凭人多势众，彼此相持，观望成败，不能同心共胆，共进共退。天下再没有比并、凉兵和羌胡义从更善战的了，拥有这些爪牙，犹如驱虎豹捕犬羊，谁敢抵御？无事征兵惊扰天下，使厌恶兵役的人民相聚反抗，是放弃德政，损害威信。董卓也顾虑人民起来反抗兵役，同各地黄巾余部相呼应，放弃了征兵计划。

董卓确信不能以征兵改变兵力数量劣势以后，确立了积极防御方针，决心以关中的富庶和崤函的险要为后盾，以洛阳为临时依托，以外线出击挫折联军锐气，通过扰乱并削弱联军后，退守长安，以便置联军包围于无用之地。其部署是：组织朝廷及洛阳百姓迁都长安，自己坐镇洛阳指挥对联军的作战。董卓召集公卿会议，以关东到处起兵，很不安宁，关中崤函坚固，可作为防御后盾，加之土地肥沃，所以秦国得以平定六国为理由，要求立即迁都。举座沉默对抗，太尉黄琬、司徒杨彪以怕百姓闹事为由加以反对，董卓即罢免二人，强行下令迁都。二月十七日，献帝离

开洛阳西迁。董卓为了解决被围后的经济困难，西迁中捕杀洛阳豪富，安上罪名予以诛杀，没收其财物，死的人不可计算，又驱逐洛阳人数百万口随迁，步骑兵驱逼，迁徙人口互相践踏，饥饿抢劫，积尸满路。三月初四，献帝辗转千里，到达长安。

董卓把朝政委任给在长安的司徒王允，自己在洛阳作应战准备：1、部署洛阳外围的防御。以一部兵力北守黄河岸边孟津、小平津一线，东守成皋、荥阳、轘辕关、太谷关一线，南守广成关、伊阙关一线，构成三面环形防线，企图依托上述险要，阻止联军进攻。2、作好一旦洛阳不守后放弃的准备，企图在洛阳大规模清野，抢掠财富，把一片白地留给联军。他屯兵洛阳毕圭苑中，下令焚烧洛阳方圆百里地方，率兵疯狂地烧南、北宫和宗庙、官府、民房。令吕布大肆发掘两汉皇陵，及公卿以下的冢墓，盗取宝物。3、制造恐怖，打击联军在朝廷内的势力。二月初三，毒杀废帝刘辩。初十，杀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周、伍曾劝董卓擢用天下名士，荐举韩馥等任关东牧守，这些牧守到任后都起兵反董。董卓杀周、伍时说，这是你俩人出卖我。三月十八日，为了打击联军中的袁绍、袁术，杀留在洛阳的袁家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家中婴儿以上50多口。

二、洛阳的包围和反包围作战

讨董战争第一阶段，双方在洛阳北线、东线、南线，进行包围反包围的作战。北线，河内太守王匡率其泰山兵进驻小平津（古黄河渡口，今河南巩县西北），企图渡过黄河，进攻洛阳。董卓决定寻歼王匡，以威慑联军，令疑兵佯渡平阴（古黄河渡口，今河南孟津东北黄河南岸），精兵秘密从小平津北渡，绕击王匡侧后，在渡口北岸大破王匡，王匡几乎全军覆没。

东线联军众将畏惧董卓强悍，各怀异心，在王匡失利后无人发起进攻。南北线的袁绍、袁术害怕董卓，也不愿别的牧守成功。唯有曹操主张立即进攻，对东线群雄说，我们举义兵，是为了诛

除暴乱，大军已经集结，诸位还迟疑什么？如果当初董卓仗着朝廷威望，依托洛阳险要，向东出兵号令天下，虽然他是根据无道行事的，仍然足以造成麻烦。现在他焚烧宫殿房屋，劫持天子迁都，海内震动，无所归依，这是天亡董卓的时候，一战天下可以安定，不可丧失时机。于是曹操孤军独进，企图西据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待机进攻洛阳。曹操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汴水间，同董卓中郎将徐荣遭遇，交战不利，身中流箭，利用夜暗逃走。徐荣原企图进攻酸枣，见曹操兵少，还能激战一整天，预料酸枣不容易进攻，也率兵退去。

曹操回到酸枣，见联军10余万，每天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批评他们畏缩不进，并给众军画策，企图令联军收紧对洛阳的包围圈，并出兵威胁关中，向全国显示董卓即将垮台的态势，使董卓早日授首。他说，诸位请采纳我的计策：令北路袁绍率河内部队进逼孟津，令东路酸枣诸将进军，守成皋、据敖仓（今郑州西北），扼守轘辕、太谷关，全部控制洛阳险要，令南路袁术率南阳部队西进丹水县（今河南淅川以西）和析县（今河南西峡），进入武关（战国秦置，在今陕西商南以南丹江上），以震动长安一带。各路都高垒深壁不战，增设疑兵，向天下显示围攻的形势，以顺诛逆，马上可以平定董卓之乱。现在为正义起兵，却迟疑不进兵，失去天下期望，是诸位的耻辱。东线张邈等不能采纳。众军军粮吃完，各自解散，东路瓦解。六月，董卓企图进一步从政治上瓦解联军，派朝臣韩融、阴修、胡母班等带着诏书，分头安抚二袁等众将，劝说道，自古以来，没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进犯的。袁绍、袁术杀阴修、胡母班等。董卓招抚不成。

联军在北线大败、东线不战而瓦解的不利形势下，唯有南线孙坚在同董卓军接触中保持不败。孙坚是长沙太守，率兵北上讨董，到南阳时，部队发展到数万。南阳太守张咨，也参加了讨董，由于孙坚所部是邻郡部队，没有向其调发军粮。孙坚以道路不修、军粮不备、拖延义兵前进的罪名，把张咨牵到军门斩首，郡中震栗，所求无不获满足。孙坚进抵鲁阳（今河南鲁山），同袁术合兵，

袁术表奏孙坚代行破虏将军，兼豫州刺史，以其进攻董卓军，自己供应其军粮。孙坚得到豫州各郡兵的补充后，决定进攻董卓。董卓派出步骑数万攻击鲁阳。这时，孙坚在鲁阳城东阅兵完毕，正在行酒谈笑，董卓部数十名轻骑先到。孙坚令部曲整顿军阵行列，不得妄动。董卓部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慢慢地撤座，进入城中。对左右说，刚才我所以不马上起身，是怕部队自相践踏，诸位无法进城罢了。董卓兵见孙坚部队整齐，不敢攻城，也撤走了。

至年底，为期一年的第一阶段作战结束。联军在北线惨遭失利，东线畏缩不前而瓦解，南线仅有接触而无交战。董卓内线作战中外线出击较为成功，部分打破联军包围，但是强迫朝廷和百姓向长安退却，烧杀抢掠，倒行逆施，在官僚集团和人民中更加孤立。

三、孙坚攻入洛阳董卓退守长安

初平二年（191年）正月到十月，战事进入第二阶段。正月，联军盟主袁绍等在军事失利后，企图从政治上夺取主动，与原东线关东众将商议，以献帝年幼，受制于董卓，远隔函谷关、桃林塞，不知还在不在人世为由，企图推举宗室、幽州牧刘虞为帝，与董卓相抗衡。此举企图把关东众将团结在袁绍周围，如果实施，政治上将很被动。而且以反对董卓废立为由，发动了讨董战争，如今自己也擅自废立，并且废亲立疏，走得比董卓还要远，是自毁其政治旗帜。此议理所当然地遭到曹操、袁术、刘虞的抵制。曹操说，你们向北面刘虞称臣，我独自尊奉西面的献帝。袁术怕拥立长君，不利于实现自己的野心，答复说拳拳赤心，志在消灭董卓，不知其他。刘虞斥责这是个“逆谋”①，拒不接受拥立。韩馥等又请刘虞兼尚书事，以天子名义授官封爵，刘虞也不从，打算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列传》。

逃到匈奴，断绝同内地的联系。袁绍等才停止劝进。

在南线，孙坚决心向董卓洛阳发起进攻。当时，董卓派遣部将徐荣、李蒙四处抢劫。孙坚在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同徐荣遭遇，交战中大败，同数十名骑兵突围，走小路逃脱。而颍川太守李旻遭生俘，被放进锅里，活活煮死。孙坚收拢散兵，继续前出，驻屯阳人（河南汝阳东北）。二月，董卓部中郎将胡轸率步骑5000，来攻击孙坚。卓部的骑督吕布，却与胡轸不和，散布假情报，故意误导并惊吓胡轸的凉州军。孙坚率荆、豫军出击，在阳人大破胡轸，斩其都督华雄①，取得联军首次胜利。

阳人大捷，引起交战双方的强烈反响。在联军内部，大捷招来了嫉妒。有人向袁术进谗说，孙坚得了洛阳，你就无法控制了，这是除掉狼得到虎。袁术起了疑，停止向孙坚供应军粮。孙坚连夜驰回百里外的鲁阳见袁术，以大义进行责备，说我所以豁出来不顾安危，是上为国家讨贼，下报将军家门私仇，我同董卓并没有杀骨肉的私怨。现在大功眼看告成，而军粮供应不上，"此吴起所以叹泣于西河，乐毅所以遗恨于垂成也"②，袁术局促不安，才调发军粮。在董卓方面，董卓与孙坚过去一起参加过对羌作战，对孙坚深为了解，畏惧他的军事才能。孙坚阳人大捷后，董卓派将军李傕来求和亲，答应给孙坚子弟刺史、太守的职位。孙坚严辞拒绝，进军太谷（灵帝所置洛阳八关之一，在洛阳以南35公里），随后同董卓在诸皇陵间战斗。董卓战败，孙坚进至洛阳，攻击吕布，把吕布打退，占领了洛阳，取得联军第二次大捷。孙坚见到旧京空虚，数百里无烟火，惆怅流涕，修复了董卓盗发的诸皇陵，表示了对汉室的忠贞。

董卓为了吓退联军，以酷刑残害联军俘虏，用猪油涂了十多匹布，缠裹联军兵士的身体，从脚上向上焚烧。董卓判断退出洛

---

① 据清人潘眉考证，都督华雄应为都尉叶雄。见〔民国〕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四十六《吴书·孙坚传》卢注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版。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传》注引虞溥《江表传》。

阳后的形势，是联军畏惧自己，劲敌惟有孙坚等，只要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然服从，从联军大势看，终归不会继续发动进攻①，决定退守长安，以结束战争，集中精力巩固政权。其部署变更为：以董越屯兵潼关外的渑池（今河南渑池以西），段煨屯兵潼关内的华阴（今属陕西），牛辅屯兵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在关中以东构成三角防御，其余众将驻守各县，防御联军。在孙坚撤出洛阳后，又令河南尹朱儁占领之。四月，董卓回到长安。董卓将牛辅曾派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掠夺关东陈留、颍川所属各县。此外两军实际脱离接触，讨董战争无形中结束。

讨董战争从初平元年正月开始，次年四月结束，历时1年零3个月。联军取得把董卓逼入长安、双方隔关而治的战果。这次战争，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制止董卓夺取全国大权的战争。在战争中，各地牧守纷纷公开武装自己，为瓜分全国的权力进行割据作准备，进行了一次实兵演习。从这次战争以后，开始出现了群雄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在联军方面，总兵力超过董卓，又有像孙坚那样善战的将领。孙坚仅凭孤军独进，即把董卓打出洛阳；如果联军齐心协力，是有希望获得战争进一步的胜利的。但是联军牧守们不愿冒王匡那样的风险，去同董卓真正作战。他们把董卓和朝廷逼进关中一角，已经很满足。他们各怀异心，不能同心共胆。实际上，对联军中的大多数牧守来说，讨董不过是块敲门砖，不追击，不冒损失兵力的风险，才是自始至终的作战指导方针。他们真正的兴趣是在彼此兼并。因此，当战后袁绍派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取孙坚的阳城时，孙坚慨然叹道，一起举义兵，挽救社稷，逆贼眼看失败，一个个都这样，我该跟谁齐心奋斗呢！因此，尽管讨董初期参加者风起云涌，起兵后便不战不和，打了一场半真半假的战争，终于虎头蛇尾，功败垂成。但是联军众将的目的达到了：他们这些割据势力，由原来的潜伏状态，找到合法的借口，转

---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传》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引董卓语曰："但当论山东大势，终无所至耳。"山东即关东。

入公开武装自己，进入了战时体制，并在讨董战争中各自保存了实力，使得关东广大地区成了他们的天下。剩下来的只是通过一场混战，在他们中如何分配关东地盘的问题了。只有曹操和孙坚，在北方没有地盘，在讨董战争中以恢复中国的统一为目标，积极主战，崭露了头角，显示了出众的胆略和勇气，在政治和军事上获得较多的得分。

第二章　北方群雄割据混战

（参见附图 1）

第一节　北方群雄割据混战的形成

一、北方牧守割据兼并的企图

北方是江淮、秦岭以北广大地区，含司、凉、冀、青、幽、并、兖、豫、徐九州。当时习惯，以函谷关为界，把北方划分为关西（关中和凉州）和关东。关东以黄河为界，划分为河南（黄河以南）、河北（黄河以北）。北方是秦汉以来的主要统治地区，境内人口蕃盛，经济发达，滋生出数量众多的豪强大族和实力雄厚的割据势力。但同时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克服分裂倾向，维护统一的经济区。初平二年（191 年）四月讨董战争结束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朝廷进一步丧失权威。董卓退回长安，实际上降低为地方性的割据势力。关东各种势力积极酝酿割据。不久，黄巾余部乘虚活跃在大河南北，略地并集结兵力。河北西山山谷中的黑山军、于毒、白绕、眭固等 10 余万略地东郡，青州黄巾也进入勃海郡，企图与黑山军会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南匈奴，卷入内地的战争。其南单于于夫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屯兵于漳水。于夫罗又叛变袁绍，劫持张杨，屯兵在黄河北岸的黎阳。北方总的形势，是各种势力积极兴起，山雨欲来风满楼，呈现大乱初起的征兆。

在这一形势下，北方众多牧守和将领，认为割据兼并时机已到，以献帝被董卓控制为由，纷纷扩充武装，据地一方，展开割据兼并战争，并确定割据兼并的具体企图。实力最大的二袁企图

在群雄并起时争霸，袁绍联合曹操、刘表、刘备，袁术联合孙坚、公孙瓒、陶谦，互相打击对方势力。二袁等有实力的割据者，进一步企图统一河北、河南，直至北方，二袁甚至企图自立为帝。“是时年号初平，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①在献帝所在的关西地区，李傕、郭汜等董卓残部众将和白波诸帅，各自企图控制献帝，号令别人。在关东地区，没有地盘的众将，如公孙瓒、曹操、吕布、刘备等按照“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②一类的思想，企图从别的割据者处夺到至少一州，作为根据地。已经据有一州一郡的一般割据者，则企图保住地盘，如公孙渊企图保住辽东，陶谦企图保住徐州。

二、北方群雄混战的形成

初平二年七月，袁绍从河内移兵，以武力为后盾，逼迫盟友韩馥让出冀州。针对袁术上表让孙坚任豫州刺史，十月，以盟主身分派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取孙坚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17公里的告成镇），打击盟友袁术，同其争雄。在袁绍的带头下，从十月开始，在北方的大地上，展开空前的兼并战争，演成激烈的混战局面。不论是在董卓的残部内，还是在联军内，昔日的盟友，转眼间成了彼此进行兼并的仇敌。关东割据者“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③。他们之间，到处相互吞灭，兼并战争此起彼伏，中国境内形成关西（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河北（黄河以北）、河南（黄河以南）和南方（长江以南）等割据混战地区。

联军牧守的大多数，缺乏军旅之才，平时养名钓誉，清谈入云，战时遇敌，腹无韬略，临锋决难，畏缩不前，相互间又结怨较深，很快暴露出不适应兼并战争的弱点。韩馥被袁绍夺走冀州

---

①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②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逢纪语。

③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

后，恐惧自杀。东郡太守桥瑁，被州刺史刘岱所杀；河内太守王匡，被执金吾胡母班的遗属联合曹操所杀；山阳太守袁遗，由于受到袁绍任用，被袁术所败。在讨董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都在同青州黄巾作战中战死了。这样，除了二袁、曹操、孙坚等人以外，关东联军众将中的第一批割据者，差不多都丧生了。

继起的新军阀，又加入角逐的舞台。他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没有参加起兵讨董的牧守，由于避免了在联军的倾轧中丧生而生存下来，如刘虞、公孙瓒、陶谦、公孙度、韩遂、马腾等；二是董卓死后，并、凉军事集团分裂出来的众将，如李傕、郭汜、吕布、张杨；三是转化为割据者的农民起义军，如张燕、白波诸帅。新军阀同二袁、曹操等一起，成了北方割据混战的新主角。他们之间，到处相互吞灭，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在关西，董卓余部李傕、郭汜等凉州军事集团众将，割据关中，另一个凉州军事集团韩遂、马腾在当地割据，白波军诸帅割据河东。在河北，袁绍割据冀州，刘虞、公孙瓒割据幽州，公孙度割据辽东，张杨割据河内，张燕割据河北西山山谷间。在河南，曹操割据兖州，袁术先后割据南阳、九江，张绣割据南阳，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割据徐州。混战大体上在这三个地区进行，然后跨地区，在整个北方进行。从此以后，北方哀鸿遍野，再无宁日。

第二节　李郭韩马等割据关西

一、李傕郭汜等割据关中

董卓回到长安后，作好防御准备，筑郿坞，高与长安城相等，储备 30 年的粮食，自称“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①。他

---

①《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进一步控制朝廷大权，舆车和服饰比拟天子，令其弟董旻为左将军、侄董璜为中军校尉，分掌兵权，使宗族内外布满朝廷，同时以残忍的诛杀立威，众将言语有失，当场杀戮。然而董卓遭到司徒王允众朝臣不露声色的反抗，又与并州军事集团产生裂痕，处境日益孤立。并州军首脑、中郎将吕布，蒙董卓信任留在身边护卫董卓；由于小失董卓意愿，几乎被董卓掷过来的手戟所杀。暗藏的反对派王允，利用同州的乡亲关系，结交吕布，同并州军秘密建立了反董联盟。初平四年（193年）四月，在董卓入宫庆贺献帝病愈时，王允、吕布发动兵变。吕布令同郡人李肃率10余名勇士扮卫士守左掖门。董卓进门，李肃用戟击董卓，董卓跌下车，惊呼吕布。吕布大叫："有诏讨贼！"斩杀了董卓。这一行动获得广泛支持，在场吏士无人帮助董卓，并称万岁；长安百姓闻讯，在路上歌舞，买酒肉欢庆，人群填满街肆。

董卓死后，其凉州军在突然事变的打击下，一时濒临崩溃。董卓高级将领惶惶不安。徐荣、段煨、胡轸投降朝廷。董越、牛辅不降。牛辅是董卓女婿，屯驻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郊附近），因疑心，杀董越；又疑心兵士叛变，出逃，被随从所杀。牛辅校尉李傕等群龙无首，听说长安城中要杀尽凉州人，忧愁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派人到长安请求赦免。主持朝政的王允不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分化瓦解凉州军，以一年中不可两次下赦为由，拒绝赦免。李傕等更加恐慌不安，打算各自解散，走小道潜逃回凉州家乡。讨虏校尉、凉州人贾诩献策说，离队单行，一个亭长就能把各位制服。不如结帮西进，进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成，奉天子；不成，逃走也不晚。凉州军走投无路，在校尉李傕、郭汜等人号召下，铤而走险，相率西进，沿途收集散兵，到达长安时，部队从数千猛增到10余万。李、郭与董卓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仅用10天时间，于六月初一攻陷长安，上距董卓之死不过一个多月。长安城内，王允军事上依靠吕布并州军，但吕布军辜负了厚望，内部叟兵叛变，引导李傕军攻入城中，吕布出逃，王允做了俘虏被杀。李傕、郭汜进城后，军纪既坏，又野蛮

报复，“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①，剩下来的“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②。

凉州军众将在生死关头中，齐心协力攻陷了长安，但在瓜分胜利果实时，却形不成统一领导。牛辅的部曲李傕、郭汜、张济、董承，董卓的部曲樊稠、李蒙、王方、杨定，以及段煨，各成一派，争权夺利，相互猜忌。李傕、郭汜、樊稠以武力野蛮地垄断朝政，把长安城划分为三个辖区，各自建立军营，筑坞而居。李、郭势力最强，带头火并。兴平二年（195年）二月，李傕怀疑樊稠同凉州军阀马腾勾结，在会议座上杀樊稠。三月，同郭汜发生“一栖不二雄”③（一处地方不能歇息两只雄鸡）的矛盾，把献帝劫到军营，其乘舆、衣物搜罗到自己家中，烧毁宫殿、城门，抢劫官府，派公卿到郭汜处讲和，郭汜则把公卿扣留为人质。双方在长安城中战斗。李傕以事成后用宫女、妇女报答为诱饵，召来数千名羌胡兵攻郭汜，郭汜则暗中联络李的部将张苞、张龙，约定在郭汜兵夜间攻击李傕坞门时，放火烧屋，开坞门做内应。但是至期火不燃烧，郭汜便下令弓弩向李傕坞中齐发，流矢飞入天子所在坞楼帷帘中，贯穿李傕的耳朵④。李傕赖部将杨奉增援，击退郭汜，当天把献帝乘舆转移到北坞。李傕、郭汜在城中连月相攻，不分胜负，死者以万计。内讧前，三辅人民尚有数十万户，经李、郭内讧后，长安城空40多天，身体强的四散逃荒，走不动的彼此相食。二三年间，关中不再有人迹。

李、郭在火并中相互削弱后，又联合起来同后起的势力火并。六月，李的部将杨奉与李的军吏宋果等谋杀李，在密谋泄露后率部离去，羌、胡兵也退了兵。李傕兵力大损，与郭汜彼此都需要喘息，双方同意接受凉州将张济的调解，进行休战。按照调解的协议，出身白波帅的杨奉，与杨定、董承等共同簇拥献帝东行去

①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②④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③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鱼豢《典略》。

张济所在的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黄河南岸）。李、郭交出献帝后又反悔，联兵东出潼关，企图劫回献帝，在弘农东涧大战。董承、杨奉战败，百官、兵士死者不可计数。献帝露宿于弘农之曹阳（今河南三门峡以西黄河南岸）。董承、杨奉派人就近从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秘密召来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匈奴右贤王去卑数千骑，联兵大破李傕等，斩首数千级，献帝才能继续前进。在行军途中，董承、李乐为本队，胡才、杨奉、韩暹、去卑为后卫。李傕、郭汜等再次来曹阳大战，纵兵大杀公卿百官。杨奉等大败，死者比东涧还多。从东涧兵相连缀40里，才到达陕县。夜间，献帝与公卿步行出营，秘密北渡黄河。在渡河时，由于河岸高，用10匹绢连接起来系住帝辇，大力士背着献帝，才得下船。渡河后派船接载未渡者，众人争渡，船上用刀断攀船者手指，船中手指可掬。

献帝北渡黄河后，最终摆脱了李傕、郭汜。李、郭众将失去朝廷的象征后，政治地位迅速跌落，成为无足轻重的力量。建安二年（197年），郭汜部将伍习杀了郭。谒者仆射裴茂率关西众将杀了李傕，夷灭李的三族。李、郭死后，凉州众将继续割据关中，但力量更加分散，不能形成重要的独立势力。

董卓及李傕、郭汜众将，拥有精锐的凉州军，曾获得并州军合作，据有经济最发达和易守难攻的关中，军事上足以同关东相抗衡，政治上独占挟天子的优势，本来可以大有作为。但他们遭到整个官僚集团反对，自身不擅长挟天子以令诸侯，李、郭于此道更是一窍不通，对献帝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又如何让别人听命于献帝。解决内部矛盾时，动辄用武，相互厮杀，造成凉、并失和，李、郭内讧，把自己迅速削弱了。解决经济困难时，又不知爱惜民力，而是竭泽而渔，杀、抢、烧，把关中化为一片白地，大量财富化为乌有，自己破坏了自己的根据地，因此起事五年，便迅速衰落。王允胜利后头脑不清醒。他的不给出路、不赦胁从的政策，诱发出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以长安城的高厚，竟在10天内即被乌合的凉州军攻陷，也显示王允、吕布守城的无能。在

李、郭的内讧中，依托所筑的坞进行连月的城市战斗，在中国军事史上还是首次。

二、白波诸帅割据河东

黄巾起义失败后，余部郭泰领导并州农民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汾城东南 20 公里）起兵，割据了河东，称为白波军，并发展为由诸帅领导的多支部队。不久，白波诸帅之一的杨奉投靠了李傕。但是杨奉对李、郭相争不满，联合凉州军将领董承等出面调解，并根据调解协议，护送献帝东行。献帝东行后，李、郭反悔，联兵进行追击。杨奉便从河东招来故白波帅韩暹、李乐、胡才，形成较强的白波军势力，摆脱李、郭追击，把献帝挟持到白波军控制区河东郡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这时，凉州军董承，并州军张杨和白波军诸帅杨奉、韩暹、李乐、胡才等三股势力共同挟持献帝，而以白波诸帅的兵马最强，并占据着地利。从此，东汉政府的控制权由凉州军事集团转移到白波诸帅的手中。

白波诸帅同样没有统一的领导。建安元年（196 年），就献帝返回洛阳问题，白波帅杨奉、李乐、韩暹与并凉将领董承、张杨之间，白波诸帅胡才、韩暹之间，意见分歧，彼此猜疑，相互火并。六月，在献帝请求下，白波帅杨奉不再反对献帝离开河东白波势力区，与韩暹等护送献帝回到洛阳。到洛阳后，白波帅与并凉众将继续挟持着献帝，但面临着曹操企图劫持献帝的阴谋。众将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党援最少。曹操从拉拢杨奉入手，用洛阳所缺的粮食为诱饵，引诱洛阳众将同意献帝离开洛阳就食。众将幻想仰赖曹操解决粮食困难，因而中计。董承又与韩暹发生矛盾，秘密召曹操来洛阳。曹操到洛阳后，阴谋从洛阳迁走了献帝。白波帅杨奉省悟到失计，但为时已迟。由于献帝不在手中，他们都失势了，出奔到徐、淮间。杨奉被刘备诱杀；韩暹恐惧，逃回并州，中途被人所杀；留在河东的胡才被仇家杀害；李乐病死。白波诸帅割据失败。

白波诸帅利用凉、并军的分裂和困难，成功地挟持到献帝，但未能利用献帝巩固和扩大自己，反而很快丢失献帝，造成失败。这主要是内部没有形成统一领导，轻易地同献帝一道离开根据地河东，而且由于政治经验不足，误中曹操之计。

三、韩遂马腾割据凉州

凉州是东汉 13 刺史部之一，辖境约相当今甘肃、宁夏，及青海、陕西的一部，是关中与西域间的唯一通道，防御西北少数民族侵入内地的屏障，被称为天下要冲、国家藩卫；又是羌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凉州先零羌等继黄巾起义之后也举行起义，反对官府残虐。义军共立湟中义从胡人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诱劫在凉州颇有名气的边章、韩遂，令其专任义军军政。这支部队，至少有数万① 羌胡兵。由于羌胡兵能吃大苦，耐大劳，勇敢强悍，因此义军的战斗力很强。义军在黄巾失败后，继续攻烧州郡，使朝廷陷入困境。朝廷轮番派遣善战的皇甫嵩、张温，以及董卓等前往镇压，并向各地无休止地征发赋役。张温等兵多至 10 余万，都无功而还。

中平四年（187 年）三月，韩遂杀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接管了这支队伍，拥兵 10 余万，杀刺史、郡守，割据凉州，“天下骚动”②。东汉政府严重不安。同年，凉州司马马腾起兵对抗朝廷，同韩遂联合。马腾是司隶校尉扶风（治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名将马援后代，汉、羌的混血儿，从应募当兵起家。韩遂、马腾推举狄道人王国为主；由于王国进围陈仓 80 多天攻不下，损兵折将，又废掉王国，推举县令阎忠为主。阎忠死后，韩、马逐渐争权，相互残杀，趋于衰落。韩遂所在部队，当还是反压迫

①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董卓“西拒遂。于望垣硖北，为（韩遂等）羌、胡数万人所围”。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的义军时，作战勇敢，令东汉政府束手无策；自从被韩遂夺权后，逐渐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丧失了当年的巨大影响和锐气。

董卓在遭到各地郡守声讨后退入关中，与韩、马联合对抗关东。韩、马也企图借机东进，谋求发展。董卓被杀，李傕命马腾驻兵关中郿县（今陕西眉县东）为犄角之援，命韩遂返回凉州金城。兴平元年（194年）二月，马腾私求不遂，企图袭击长安，联合朝臣种邵、马宇、刘范等里应外合，诛杀李傕，由于密谋泄露而没有成功，与前来支援的韩遂退还凉州。李傕等力不能制，赦免韩、马，双方分据关中和凉州，形成共处局面。韩、马回到凉州后，自相攻击，造成了相互削弱。凉州由于地处偏远，虽然割据时间最早，在北方被统一的时间却较晚。他们的割据，在全国尚未展开割据时具有全国性影响；在全国普遍割据混战后，影响迅速跌落，不能再领风骚。此后李傕、郭汜衰落，韩遂、马腾利用曹操在河北争战、无力西顾的时机，乘虚入据关中。从此，关西地区形成以韩、马为主的众将分散割据的局面。

第三节　刘虞二公孙割据幽州辽东

一、刘虞割据幽州

幽州是东汉13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北京、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天津海河以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是东北的边州，北界鲜卑，东邻夫余、高句丽、沃沮、涉貊，境内则有乌桓①，是毗邻和居住众多少数民族的州，又是战马主要产地，关系着边境的安危和军队的强大，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东汉末年，幽州先后被刘虞、公孙瓒割据。刘虞是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人，汉光武帝儿子东海恭王后裔，祖父任光禄卿，父亲任太守。本人初举孝

---

① 东胡族之一，以所居住的乌桓山命名。

廉，任幽州刺史。在任上，推行德政，深受汉、夷人民欢迎。在他的和睦相处政策的治理下，鲜卑、乌桓、夫余、涉貊等，都随时朝贡，不敢扰乱汉族居住的边地。刘虞后拜甘陵相、宗正。灵帝中平四年（187年），东汉政府为了增兵镇压凉州先零羌起义，向幽州乌桓征调3000突骑，但军粮不继，突骑无食，都叛逃回乌桓。仕途失意的前中山相张纯，利用乌桓对此事的不满，联合辽西乌桓丘力居，在幽州起兵，杀一校尉，二太守，队伍扩充到10多万，兵锋遍及青、徐、幽、冀四州，并推张举作天子。东汉政府震惊，派刘虞以宗正重臣再次出牧幽州，企图利用他在少数民族中的威望，“不劳众而定”①。刘虞到任后，裁撤屯兵，广树恩德信用，派使者向乌桓晓以利害，悬赏张纯首级。乌桓丘力居等都来归附。张纯部队瓦解，本人被其客所杀，首级送给了刘虞。刘虞通过调整对少数民族政策，用政治方法平息了乌桓的不满和张纯之乱。

刘虞的威望从此更高了。他是知名宗室，民望所归，并且拥兵10万以上，骑兵至少上万②，因此，各方面都极力争取他的合作。董卓专权时，派使者授刘虞大司马，初平元年，又征他为太傅。袁绍企图拥立他为帝。刘虞对此严辞拒绝，但仍同袁绍等联合。由于战乱中道路不通，他同献帝的联系中断，实际上割据了幽州。

刘虞保境安民、同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政策，遭到幽州屯军抵制。东汉政府为了防范边患，派出奋武将军公孙瓒领导的屯军部队驻在幽州，归刘虞节制。公孙瓒在征乌桓作战中立战功升官，一心企图扫灭乌桓，又屡屡违反刘虞的节制，侵扰百姓。在群雄混战开始后，继续黩武，企图进攻袁绍。刘虞怕他得志后不可控制，禁止他南下攻袁绍，并削减他的军粮。公孙瓒以无粮为借口，劫持刘虞给少数民族的赏赐，在刘虞州治蓟城（今北京旧城西

---

① 《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

② 刘虞曾派数千骑前往关中奉迎献帝东归。据此推知，他的骑兵至少上万。

南）东南部筑小城，城中筑京①，以防备刘虞。僚属劝刘虞容忍公孙瓒的小恶，收其作为谋臣爪牙，认为如果进攻他，难操必胜之券，不如只以武力威慑他，以不战服人；但刘虞积忿不能忍耐。初平四年（193年）十月，刘虞自率诸屯兵10万人，密令偷袭公孙瓒，告诫兵士不得伤及别人，只杀公孙瓒一人。

州从事公孙纪，与公孙瓒同姓，平时深受公孙瓒厚待，连夜把刘虞密谋泄露出来。公孙瓒得报大惊，部曲分散在外，仓促间难以集中兵力，企图掘开东城撤走。刘虞部队在作战中，要求烧毁妨碍攻击的民屋，被刘虞严令禁止，紧急间攻不下小城。于是公孙瓒挑选勇士数百人，因风纵火，径直冲击。刘虞大败，同官属向北逃到居庸县（今北京昌平西北）。公孙瓒追击，三天后攻陷该城，俘虏刘虞。这时，献帝使者段训奉命前来加拜两人的官职。公孙瓒诬陷刘虞勾结袁绍企图称尊号，胁迫段训斩了刘虞。

刘虞在关东牧守中，德高望重，在鲜卑、乌桓、夫余、涉貊中威信素著，又放宽政策，使得农业丰收，盐铁、商业兴旺，促进了社会安定繁荣。他坚持用安抚政策解决境内矛盾，反对黩武是对的，拥兵10万，力量是强大的，但是平时忽视军队建设，战时不善于指挥作战，以致以优势之众，偷袭兵力分散和无备之兵，竟遭大败。这说明，在天下大乱的年代中，不懂军事，失败是必然的。

二、公孙瓒割据幽州

继刘虞之后割据幽州的，是公孙瓒。他是幽州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西北）人，跟随大儒卢植读书，是文武全才的名士，家中世代作高官，但生母出身低贱，初入仕时只能做郡中小吏。后来追击张纯、乌桓丘力居，统领边境骑兵同胡人互相攻战五六年，

① 京，是土筑高台，军事上的制高点。

以战功迁升中郎将。在群雄割据前夕，通过同乌桓的作战，建设起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擅长机动作战。喜欢乘白马，挑选白马数十匹和善射的骑士，组成“白马义从”。他主张以武力消灭乌桓，同州牧刘虞用恩信招降的政策尖锐对立。

群雄割据开始后，他野心勃勃，多方树敌。在同乌桓和刘虞的矛盾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企图南下夺取今华北平原。初平二年十月，青、徐黄巾 30 万进入冀州勃海郡，公孙瓒率步骑 2 万南下迎击，斩首数万，俘虏 7 万，缴获车甲财物无数。这一大捷使他头脑膨胀，自认为天下事可以凭自己指麾而定，决意与袁绍为敌。他的从弟公孙越，被袁术派去协助孙坚攻击袁绍所署的豫州刺史周昂，中流箭而死。公孙瓒借端发难说，我从弟战死，祸根起于袁绍。首先向献帝上疏，历数袁绍招引董卓、不恤国难、夺冀州、抢豫州等十大罪状。初平三年，举兵进攻袁绍。冀州各县都叛变袁绍，望风归降。公孙瓒自行署置青、冀、兖三州刺史及郡县守令，深入到界桥（今河北威县东约 10 公里处的古清河上）同袁绍大战。但战败，退回蓟城。袁将崔巨业率步骑兵 3 万人乘胜追击，围攻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攻不下，退兵。公孙瓒率 3 万兵反击，在巨马水大破其军，乘胜再度南下，进入青州平原郡，留田楷占据青州。田楷同袁绍所派数万兵争青州，连战二年，战到粮食吃尽，野无青草。初平四年，又同袁绍长子、青州刺史袁谭交战，战败。公孙瓒势力退出青州。

公孙瓒前方同袁绍作战的同时，后方同刘虞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初平四年，他杀害刘虞，据有幽州，但遭到刘虞余部联合反对。刘虞幽州从事鲜于辅召集州兵，乌桓司马阎柔率胡、汉兵数万，乌桓峭王率种人及鲜卑 7000 余骑兵，共同迎接刘虞儿子刘和，加上袁绍部将麹义等，南北各方反公孙瓒势力共 10 万人联兵，在鲍丘水（今北京密云潮河）大破公孙瓒，斩首 2 万余级。兴平二年（195 年），公孙瓒撤出蓟城，退到南北敌人夹缝间的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 8 公里）固守。这时闹旱灾、蝗灾，谷贵，百姓相食，公孙瓒经济陷入困难。他打击衣冠大族，重用商贩等下层

人。由于打击面过大，在有权势的大族中也陷入了孤立。幽州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等郡都乘势杀公孙瓒委任的长吏，再度同鲜于辅、刘和联合。

公孙瓒在此困难时刻，军事思想发生根本转变，从盲动冒进转变为消极防御。他说，今天看来，天下事非我所能解决，不如休整军队，致力于农田，积蓄粮谷。于是在易京修围堑10重，堑里筑京，京台高五六丈，台上建楼。自己住的中京，高10丈。兴办屯田，储谷300万斛，自称：兵法上说百重楼不可进攻。现在我楼橹千重，吃光这些储备的粮谷，足以看清天下大势的眉目。企图依托坚固工事疲敝来犯的袁绍军。他不信任部下，在自己住的楼上修铸铁门，屏退左右，只留婢妾，送来的文书从下面汲取而上，让妇女练习大嗓门，传达命令。他不肯援救受攻的部将，理由是：今天救一个，后来的就依赖救兵不肯力战；今天不救，是鼓励被围的自勉。被围部队盼救无望，往往杀将帅投降，或者力战不支被攻破。

建安三年，袁绍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公孙瓒不增援部将，袁军径直攻到易京，进行围困。公孙瓒危急，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军求救，并企图亲率突骑突围，打到外线去，依托西山，扰乱袁军的后方冀州，因听信长史关靖劝说而放弃。关靖顾虑突围后丧失易京根据地，担心部队一出去就土崩瓦解，不能像现在保卫家乡那样尚能作战。袁军步步为营，公孙瓒步步退却，筑三重营固守。建安四年春，黑山军张燕与公孙续率10万援军三路前来增援。公孙瓒企图以城内外兵力反击袁军，秘密派人出城送信，令公孙续率5000铁骑兵部署于北郊，以起火为号，城内外对进突击。书信被截获，袁绍按期举火诱公孙瓒出城，公孙瓒出战，中伏兵，退回保城。于是易京很快陷落，公孙瓒自焚。关靖自感陷人于危，义不独生，策马奔入袁军战死。

公孙瓒有文武才能，任骑兵将领，作战勇敢，连乌桓也畏惧他，取得过对黄巾作战的大胜，由此头脑膨胀，狂妄地以为天下事可指麾而定，军纪败坏，不团结少数民族，企图凭黩武解决一

切问题。他同乌桓、刘虞的矛盾并未解决，尚无可靠的后方，即轻率南下，以袁绍为敌，四面出击，树敌过多，终于南惨败于袁绍，北受困于刘虞身后的势力。后期在困难的形势下，不知改变政策，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而使作战思想陷入另一个极端，放弃擅长的以骑兵为主的运动战，转变为单纯依托筑城工事的消极防御战。被动挨打，坐以待毙，最终导致灭亡。

三、公孙度割据辽东

辽东郡在幽州的东方，辖境约相当今天辽东半岛，东邻高句丽和幽州乐浪郡，汉末被公孙度所割据。公孙度，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历任郡吏、尚书郎、冀州刺史，因被谣言中伤免官。正值董卓用人之际，经同郡徐荣推荐，被任为辽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太守。辽东地处偏远，同中原隔着乌桓，内地群雄鞭长莫及，因此没有卷入混战，经济未遭破坏，社会较为安定。公孙度从容地割据辽东。

他割据的方针，是消除辽东周边的威胁，控制渤海海峡，固守辽东，坐观中原成败。他建立了步、骑、水兵。骑兵至少上万①，水兵有渡海作战的能力。依靠这支军队，他东伐高句丽②，西击乌桓。初平元年，他知道中原混乱，对亲信说，汉朝气数将尽，当与诸位一起图谋王业。于是渡海收取渤海海峡对面的青州东莱（治黄县，今山东龙口东15公里）各县。在东莱设立营州，任命刺史，把辽东郡升格为平州，自立为平州牧，在城郊祭祀天地。建安九年，曹操表奏他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侯。公孙度不满地说，我称王辽东，何止永宁侯！三传而至公孙渊。景初二年（238年），公

---

① 《三国志》卷十一《凉茂传》引公孙度言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可见其骑兵数量较多。

②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部夫余别种建立的王国，内属于东汉朝廷，汉末时屡犯辽东。

孙渊被魏将司马懿所灭，是北方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割据势力。

第四节 袁绍二张割据河北

一、袁绍割据河北

河北是黄河以北地区，包括冀、青、幽、并四州，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东汉末年割据河北的是袁绍。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其高祖父袁安，和帝时为司徒。自袁安以下，直到袁逢、袁隗，四世居三公高位，门生故吏遍天下，袁家形成全国最大的私人团体。袁绍母亲是“婢使”①，袁绍为了改变因微贱的庶出地位造成的不利影响，少年时代刻意养名，倾心折节接待宾客，广泛结交游侠和豪杰，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援救和掩护一大批党人脱难。由此声誉鹊起，赢得豪杰的倾心效力。他同堂兄弟袁术从洛阳护送嫡母灵柩返回老家汝南归葬时，前来相会的知名人士等竟达3万人。曹操秘密预言：“天下将乱，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②

袁绍历任大将军何进掾、虎贲中郎将、西园中军校尉③（新军副统帅）及司隶校尉。外戚何进依赖他为心腹。何进被宦官所杀后，袁绍率兵捕杀所有宦官，成为官僚士大夫集团中年青有为的领袖。当董卓专权时，袁绍在废立皇帝问题上顶撞董卓，但手中无兵，只好弃官出逃。董卓害怕袁绍在外利用其巨大的影响聚众反抗，赦免他，拜为勃海（治南皮，今属河北）太守。

袁绍在勃海暗中挑选战马，联络关东州郡，起兵讨董，自号

---

① 《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载公孙瓒上袁绍罪状表。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③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列传》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资治通鉴》卷五十九灵帝中平五年八月条，均作中军校尉。《后汉书》本传作佐军校尉。今取中军说。

车骑将军，凭其家世的巨大影响和本人名气，被推为讨董联军的盟主。由于董卓兵战斗力较强，袁绍尽可能地保全实力，企图在讨董不成功时，夺取南起黄河，北至燕、代旧地的冀、青、幽、并等河北四州，然后吸收乌桓、鲜卑、南匈奴等少数民族军队，南下夺取全国。

袁绍决心以兼并冀州为夺取河北的突破口。他作为勃海郡太守，是冀州牧韩馥的下级，在讨董战争中依赖韩馥供应军粮，但在联军中又是韩馥的盟主。袁绍同韩馥的关系不融洽。韩馥忌妒袁绍得众，讨董前，不许他发兵，讨董期间，压减其军粮，企图迫使其军队解散。董卓退回长安后，袁绍认为兼并时机已经到来。初平二年七月，密约公孙瓒南下，自己从河内回军延津，以两支大军逼近冀州，迫使韩馥惶恐不安；又派出韩馥倚重的荀谌等颍川人士游说韩馥让出冀州。荀谌在游说中问韩馥：你估计在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临危吐决，智勇超人，世代施恩德，泽及天下这三个方面，与袁绍谁强？韩馥答，不如袁绍。荀谌说，将军以三不如之势，久居袁绍之上，袁绍一时豪杰，必不肯处在将军之下。冀州是天下重要的军资供应地，如果公孙瓒和袁绍合力，冀州马上就会危亡。袁氏是将军的故旧，又是同盟，不如举州出让给袁氏，公孙瓒必不能再争。则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自身安如泰山。韩馥素性怯懦，于是以故吏身份，拱手让出了冀州。韩馥僚属和部下耿武、闵纯、沮授等谏止说，冀州带甲百万，粮谷储备了十年，袁绍是孤立穷困的客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上，断绝他的哺乳，立即可以饿杀。韩馥不听。

袁绍领冀州牧后，谋主沮授为他制定了数年统一全国的计划。沮授说，将军如果全军东下，则青州黄巾可以扫除；回军讨伐黑山军，则张燕可以消灭；回军向北，则公孙瓒必然溃丧；威胁戎狄，则匈奴一定服从。横扫黄河以北，合聚冀、青、幽、并四州之地，收罗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献帝，回洛阳，号令天下。几年以后，建立大功不难。沮授这个计划，第一步是统一河北，第二步是迎接献帝重返洛阳，号令天下。袁绍大喜，任命沮授为奋

武将军，监护众将，并以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许攸、逢纪、荀谌作谋主，大体按照沮授这一计划，展开了兼并河北的战争：

1、与袁术争霸。在讨董时，袁绍与袁术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号召力最大；但袁绍认为，实现其野心的最大威胁，必来自袁术，决心一开始就打击他。初平二年七月，针对袁术上表其部将孙坚为豫州刺史，袁绍以盟主身份署周昂为豫州刺史，令袭夺孙坚豫州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17公里告成镇），又先后委署盟友曹操、臧洪为东郡太守，在河南发展，以牵制袁术。于是兄弟交恶，袁术支持公孙瓒攻袁绍，袁绍支持刘表排挤袁术。

2、保卫冀州。袁绍独占冀州后，公孙瓒不平，初平二年（191年），他乘袁绍立足未稳，率兵深入冀州，屯驻在广宗（今河北广宗东），各县望风响应。袁绍恐惧，把勃海让给公孙瓒的从弟公孙范，但是公孙范仍然率郡兵帮助公孙瓒，冀州更加危急。三年正月，袁绍率主力进驻广宗以东之界桥，与公孙瓒决战。袁绍以富有经验的部将麴义为先登。麴义临阵斩公孙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等甲首千余级，拔公孙瓒牙门旗，大胜。年底，袁绍在龙凑（今山东德州东北）又大败公孙瓒，迫使其退回到所在的幽州。

正当大捷时，袁绍获悉黑山军在他的后方策动魏郡袁军叛变，兵力数万人，占领邺城，杀太守。众将家在邺城的，忧惧失色，甚至起而哭泣。袁绍面不改色，六月，率军南下，驻军于斥丘（今河北魏县西北10公里），引兵进入朝歌（今河南淇县）鹿肠山苍岩谷，进行五天的围攻，杀害于毒及朝廷所署冀州牧壶寿。又沿西山北行，进击农民军诸部左髭丈八等，又攻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羝根等，所到之处疯狂地屠戮义军屯壁，斩首数万级，义军元气大伤。袁绍又北上常山国（治元氏，今属河北），攻击黑山军张燕、匈奴屠各、雁门乌桓联军。张燕有精兵数万，骑兵数千。袁绍联合吕布共同攻击张燕，连战10余天。张燕兵伤亡较重，袁军也很疲劳，双方退兵。袁绍通过上述作战，保卫了冀州。

3、兼并青、并。初平元年联军成员青州刺史焦和死后，袁绍

委任臧洪署理该州。初平四年，私署长子袁谭为刺史，令以武力夺取了公孙瓒所署刺史田楷控制的青州。在董卓死后并州牧出缺时，袁绍又私署外甥高干为刺史。这样，袁绍以盟主身份，通过委任官员，控制了青、并二州。

4、兼并幽州。袁绍控制冀、青、并三州后，决心集中兵力消灭北方最大的敌人公孙瓒，占有幽州，统一河北。兴平二年（195年），袁绍令部将麴义北上，联合刘虞旧部，及乌桓、涉貊、东西鲜卑，在幽州鲍丘水等地作战。联军连败公孙瓒。袁绍又制造童谣，广为传播说："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①，引诱公孙瓒退至幽、冀交界处"可避世"的易京固守，使其"终始保易，无事远略"②。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再度率军北上远征易京，对其众多的楼台展开激烈的攻坚战。袁军以冲车和云梯从地面和空中进攻，开挖地道从地下进攻。地道随挖随支上木柱支撑，挖到楼台的下方，挖一半，烧毁木柱，楼便倾倒，严重破坏了公孙瓒的防御。建安四年春，袁军逼近公孙瓒所住的中京。公孙瓒自知必败，杀尽其妻和子，然后自杀。袁绍消灭了大河以北最有威胁的竞争者，成为全国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兴平二年（195年）十月，献帝从长安东归。沮授为了创造政治优势，劝袁绍迎天子，定都邺城。他说，诸州郡外托义兵，内相吞灭，没有人肯保存主上。而且现在冀州境内大体安定下来，应当迎接天子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如不早作迎接的打算，必定有人捷足先登。③淳于琼等人反对，认为汉室难以复兴，现在是"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如果迎来天子，动辄上表奏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④，不是善计。袁绍自恃强大，当初拥立献帝本不符合他的心意，拒绝迎接。

---

① 《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

② 《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裴松之语。

③ 按：《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记载，献策迎天子者是郭图。

④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从起兵讨董开始，袁绍用 9 年时间统一了河北。这是由于他实力强大，拥有全国最大的私人关系网，也是由于战略指导颇有成功之处，主要是：1、割据前作好充分的准备。一是平时极力养成豪侠爱士的名声，赢得众人倾心，二是讨董期间，又预先规划了称雄河北的战略。2、在割据初期，坚持保卫冀州的战略防御，坚持在内线歼敌，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从而很快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3、在冀州基本巩固后，适时转入战略进攻。先争夺青州，最后进攻公孙瓒根据地易京，并在攻击中实施了有效的攻坚战。4、团结盟友，支持曹操割据河南，以解除后顾之忧。袁绍成功的同时，也有重大失策：1、割据一开始，就同袁术自相残杀，多树立了敌人，以致人们认为，自家兄弟尚不能容，如何容得下别人。2、兼并四州之地，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势力后，头脑膨胀，过高估计自己，不再听从有识见的规劝，丧失了取得天子名义号令四方的良机。

二、张杨割据河内

河内是司隶校尉的属郡，辖境相当今河南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地区，是洛阳北部的屏障，洛阳通向河北的必经之地，也是天下的要冲。汉末割据河内的是张杨。张杨是并州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人，由于武勇，在并州供职，任刺史丁原的武猛从事。灵帝末年，朝廷征调天下豪杰任西园新军的偏裨将领，丁原派他率兵去洛阳，任新军统帅蹇硕假司马。蹇硕被杀后，张杨受大将军何进派遣，回到本州募兵，得千余人。留在上党，进击山中起兵者。何进死，董卓杀害丁原兼并并州军，张杨便自行其是，率领募来的兵攻上党太守，攻不下，攻取各县，军队扩充到数千人，崛起为一支并州新军。此后挥师南下，参加讨董战争，与盟主袁绍一起进驻河内郡。河内郡原为丁原驻地，是并州军的老地盘。张杨很快在此站稳脚跟，董卓不得不以朝廷名义拜他为河内太守。献帝从长安出奔到河东后，张杨也来到河东，参与对

献帝的挟持。他为了使献帝靠近河内，建议迎接献帝返回洛阳，遭到杨奉等白波诸帅的拒绝。建安元年（196年），献帝终于返回洛阳，途中缺粮，张杨带着粮食在道路上迎接，与献帝一起回到洛阳。在洛阳，被拜为大司马，但再次受到白波诸帅排挤，未能实现控制东汉政府的企图，被迫返回河内。

张杨依靠丁原、蹇硕、何进谋求发展，三人死后，他把所率官部曲变成私部曲，形成割据势力。但他治军，只讲仁爱和顺，不讲威刑。发现部属谋反，总是哭泣感化一番，赦免不问。官渡战前，内部在联曹还是联袁问题上意见对立，部将杨丑杀反曹的张杨响应曹操，杨丑部将眭固又杀杨丑，企图率部北联袁绍。曹操派史涣击杀眭固，收编其军。张杨的并州军终因内部不和而失败。

三、张燕割据冀州西山山谷

冀州的中山、常山、赵郡，并州的上党，司隶校尉的河内、河东各郡，约相当今太行山东麓地区。此地山谷相连，汉末被张燕黑山军等所割据。张燕是常山真定（今石家庄东）人，剽悍轻捷过人，军中号称“飞燕”。他直接掌握的部队，精兵至少数万、骑兵至少数千①。这支黑山军，兴起于张角起义之后。那时在黄河以北，农民军继黄巾而起的有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首领是大胡子）、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首领是大嗓门）、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张白骑（首领姓张，骑白马）、李大目（首领姓李，大眼睛）等部，大的二三万，小的六七千，活动在上述地区，依托山谷，相互联合，声势壮大。张燕是其中一支，他联合张牛角部，推举牛角为帅。张牛角中飞矢战死，临终令张燕继领队伍。张燕原来姓褚，从此改姓张。所在的各山谷都是彼此连通的，山谷小帅孙轻、

①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列传》称，“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

王当等都率部依附张燕，部众联合以后达到百万，号称“黑山（在今河南淇县山区中）军”。灵帝无力征讨，黑山军活动在黄河以北。

黄巾失败后，张燕派人到京师投降，拜为平难中郎将，从起义转为割据。此后，董卓把献帝迁往长安，天下多次爆发战争，张燕率部结交群雄。在袁绍公孙瓒之战中，袁绍代表世家大族，公孙瓒压制衣冠子弟，张燕站在公孙瓒一边，派部将杜长与袁军连战十余日。后来听说曹操即将平定冀州袁氏，表示愿意协助曹操王师，拜为平北将军，率所部开赴邺城。本人封侯，子孙继嗣。

第五节　袁术张绣割据南阳和九江

一、袁术割据南阳和九江

南阳是荆州北部的一个郡，处于南北方交通要道上，户口数百万，十分富裕。汉末割据南阳的是袁术。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西南）人，司空袁逢儿子、袁绍堂弟，少年时候以侠气闻名，被推举为孝廉，官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董卓废少帝前夕，提升他为后将军，他畏惧董卓之祸，出逃到南阳。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及群雄混战开始后，袁绍成为北面群雄的领袖，通过其盟友，控制着河内、冀州、兖州、青州等要地。袁术也广结同党，以自己割据荆州南阳，孙坚割据豫州，陈瑀割据扬州，成为南面领袖，通过其盟友，控制荆州、豫州、扬州等地，同袁绍分庭抗礼。

袁术根据上述意图，展开割据战争。他抛弃堂兄袁绍，结交疏远。依靠长沙太守孙坚的武力，割据南阳。初平二年（191年）二月，他支持孙坚北上攻陷洛阳，以讨董卓的战功同袁绍争霸。袁绍署周昂为豫州刺史。十月，袁术支持孙坚从洛阳回军驱逐周昂。次年十二月，袁术发兵击破袁绍所署领扬州刺史袁遗，令陈瑀为

刺史。初平二年，又令孙坚南下，围攻袁绍盟友、襄阳（今湖北襄樊）刘表，企图夺取荆州（今湖北湖南）。但是孙坚在作战中身亡，袁术从此不能战胜刘表。

南阳户口数百万，袁术骄奢淫逸，无限度地搜括，百姓深以为苦。初平四年正月，袁术粮道被刘表切断，在南阳存身不住，企图北上夺取曹操的兖州。曹操同袁绍联合反击，大破袁术，袁术一败再败，率余部逃向扬州九江（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刺史陈瑀拒绝其进入，袁术集结兵力于淮北，攻击陈瑀。陈瑀逃离，袁术从此转移到扬州，在九江割据。

九江是扬州江北一个郡，地处淮南，位于由淮入江的水路要道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袁术企图以九江为依托，联合李傕等为外援，北夺徐州，南控江东。兴平二年（195 年）十二月，袁术以孙坚子孙策渡江攻击江东；建安元年（196 年）六月，自己进攻刘备徐州（辖今鲁南及苏北），并以资助吕布军粮为诱饵，诱使其袭击刘备后方。吕布偷袭刘备成功后，袁术食言不送，吕布转而联合刘备，合兵进攻。次年，袁术派大将张勋以步骑数万七道攻击徐州吕布。在吕布的反击下，张勋军几乎被全歼。袁术始终争不到徐州。

袁术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把汉末形势比做“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①。献帝在曹阳大败后，威信一落千丈，袁术认为称帝的时机到了，说我家是四世公辅，百姓归附的对象，最有资格取刘氏而代之。建安二年正月，他不顾部下劝阻，在寿春称帝，使自己陷入孤立。他的主簿阎象等不满他分裂国家，他的故友陈珪同他离心，他的部下孙策宣布独立。袁术不仅不觉悟，反而更加荒淫奢侈。他后宫侍妾数百名，无不身著罗纨，口厌粱肉；兵士和人民则由于天旱年成不收，冻饿无粮，甚至到了人吃人的程度。袁术经济困难，向近邻陈国（今河南淮阳等六县地）求粮，遭到拒绝。五月，率兵击败陈国，诱杀陈王及陈相，陈国由此破

---

① 《三国志》卷六《袁术传》。

败。陈国在曹操豫州的治下，九月，曹操率兵前来，袁术大惊逃走，留大将桥蕤等抵抗。曹操到，击破桥蕤，袁术渡过淮河，投奔部曲雷薄、陈兰。雷、陈拒绝接纳。袁术又愁又怕，企图北上青州，实现二袁联合，再图发展。途中遭到曹操派去的刘备的阻击，退回九江，粮食断绝，要喝蜜水，又没有蜜，大叫：袁术到了这一步吗？吐血一斗多而死。余部辗转归入江东孙策。

袁术出身最大的世家大族，是嫡出，依靠袁家巨大的影响和个人的侠气，很快成了汉、淮流域最有威望的割据者，但随后立即暴露出豪强子弟的严重缺点，小有成就，即骄奢。他对根据地南阳、九江大肆掠夺，使得兵士和人民不再支持他，所以每战常败，同时引起经济严重困难。他不以大局为重，割据局面一起，与袁绍即视若仇敌，二虎相争。他没有远略，同所有的近邻为敌。攻刘表不胜，转攻曹操；攻曹操不胜，转攻刘备、吕布；攻刘、吕不胜，再度侵犯曹操。树敌太多，结怨多家，而不能消灭一家。虽然远联公孙瓒，但是公孙瓒地处遥远，对他的作战不能起到实际的帮助。他又同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在人们迫切希望结束战乱、恢复统一的形势下，急于称帝，把自己孤立起来，不顺应历史潮流，招致迅速的失败。

二、张绣割据南阳

汉末割据南阳，最早的是袁术。刘表把袁术排挤出去后，收复了南阳。接着割据南阳的，是凉州军别部张绣。张绣是武威祖厉（今甘肃靖远南）人。祖厉县长被人袭击杀害。张绣作为县吏，伺机杀了杀县长的仇人，郡内都认为他有义气。于是张绣招聚少年，成为邑中的豪杰。后来参加了族内父辈骠骑将军张济的部队，以军功迁官至建忠将军。张济所部，是董卓凉州军的一部，驻在陕县（今河南三门峡）。由于当地无粮，军队饥饿，建安元年十月，进入荆州就食。在攻穰县（今河南邓县）作战中，张济中流矢战死。荆州官属都来祝贺刘表，刘表则企图借助这支客军充当防御曹操的盾牌，说，张济无路可走才来。我这个主人，待客无礼，以

至于交锋。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

张济死后，张绣统率这支部队依附刘表。刘表令其驻在荆州北部的宛县（今河南南阳）。宛县是南阳郡治，距曹操许都较近，介于曹操和刘表之间。张绣部成了曹操肘腋之患。建安二年正月，曹操进军南阳，企图进攻张绣，张绣自知不敌，率部归降。投降后，听说曹操对他不满，企图收买和利用其亲信杀他。张诱采取主动，发动兵变，再次率部依附刘表，多次成功地抵御了曹操的进攻，但是刘表无力长期供应他军粮。官渡战前，张绣用贾诩之计，又归顺了曹操。

第六节　陶谦吕布割据徐州

一、陶谦割据徐州

徐州是东汉13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苏北和山东东南，汉末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最早割据徐州的是陶谦。陶谦，字恭祖，扬州丹阳（治宛陵，今安徽宣城）人，太学生，茂才，历任卢县县令、幽州刺史，西征韩遂时与孙坚同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黄巾起义后，被任命为徐州刺史，击退当地黄巾，割据了徐州。陶谦来徐州时，徐州百姓殷实，谷米丰盛，流民大多投奔到这里。但是陶谦刑法政教失调。他培植和依靠外来的家乡人统治徐州，不仅组建了丹阳兵，而且任人唯亲。笮融、许耽等是丹阳人，不问良莠，都予重用；广陵太守赵昱是徐州名士，即使忠心耿耿，也遭到排斥。于是，徐州形成了正直疏远、亲信谄谀的不良风气，而陶谦所重用的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粮运，又扣住粮食自用，南下广陵，杀太守，割裂徐州。从此徐州渐乱。

在军阀混战中，陶谦企图充当一方的领袖人物。当各地同朝廷的往来断绝时，陶谦常派使者走小路，到长安进贡，被提升为

徐州牧。后来用治中王朗的建议，奉行“求诸侯莫如勤王”① (要诸侯拥护，没有比为王事尽力更有效) 的策略。在关东州郡讨董联军解散后，他响应车骑将军、河南尹朱儁向各州郡发出继续讨董的呼吁，派去精兵3000，在各州郡中派兵最多。李傕、郭汜作乱时，他领衔会同一些郡守和国相，公推朱儁领导讨伐李傕。李傕以诏书征调朱儁入朝，朱儁不肯违背君命，应召进京而辞陶谦，陶谦勤王策略遭到失败。

陶谦站在袁术方面，企图蚕食与徐州相邻的曹操的兖州。他联合在徐州下邳自称天子的阙宣，攻取兖州泰山华、费地区，掠夺兖州任城(治今山东济宁以南)。部下的轻骑又在华、费地区杀害曹操父亲曹嵩一家，夺去财宝，造成徐、兖矛盾极度激化。初平四年和兴平元年，曹操两次进击陶谦。陶谦联合公孙瓒、袁术，与曹操交战，一再大败，企图逃离徐州，到扬州家乡丹阳郡避难。正好曹操兖州发生叛变，曹操为了回军击退袭夺兖州的吕布，从徐州退兵。陶谦在这个偶然的机会中，度过了险关；但就在这一年病死了。

陶谦未能团结徐州豪强大姓，造成他的社会基础不牢，内政混乱，又企图在群雄割据混战时，以过时的勤王策略求发展，必然不能成功。兼并的对象也选择不当，其邻区扬州弱而兖州强，陶谦不取扬州而一再触怒兖州，招致曹操的疯狂报复，从此一蹶不振。

二、吕布割据徐州

继陶谦、刘备割据徐州的，是吕布。吕布字奉先，并州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20公里) 人，出身于游侠中低层次的轻侠，以骁武得到并州刺史丁原的信任和重用。吕布弓马娴熟，膂力过人，号称“飞将”，赢得“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② 的美

---

① 《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

② 《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吴人所撰《曹瞒传》。

誉。吕布的前期活动在关西，围绕夺取并州军展开。当时灵帝死，丁原奉大将军何进命令，率吕布及并州兵进入洛阳。正值何进被宦官所杀，董卓诱使吕布杀丁原。吕布见董卓势强，带着丁原首级投靠董卓。董卓任命吕布为骑都尉，发誓将像父子那样同他相处，出入以吕布为护卫。后来吕布由于小事失欢，董卓掷手戟刺吕布。吕布怨恨，与司徒王允合谋，刺杀了董卓，使并州军重新获得独立，并与王允同掌朝政。凉州军李傕、郭汜等杀进长安后，吕布不敌，逃离关西。吕布在关西这段斗争中，通过依附丁原，在并州军中站住了脚；又通过杀丁原、依附董卓，夺到丁原的并州军，但是未能独立；通过杀董卓，获得独立，但是没有自己的地盘。

吕布这时拥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并州步骑兵。他的骑兵在撤离长安时，有“数百骑”①，被杀的前一年，有“马四百匹”②，吕布以统率骑兵作战的才能自诩，被俘后死到临头，还向曹操建议：“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③吕布的步兵也不弱。部将高顺所统率的700余兵，号称千人，每次攻击，无有不破，称为“陷陈营”（陈，通阵）。军中还有张辽等勇将。

吕布把董卓首级挂在马鞍上，从关西来到关东，投奔了南阳袁术。他自恃杀董卓为袁家报仇有功，放纵部队抢劫，袁术深以为忧。吕布不安，到河内投靠并州军阀张杨。由于李傕、郭汜悬赏缉杀吕布很急，张杨部下都想杀吕布。吕布对张杨说，你我同州，是乡里人，你杀我，两军火并，你必然削弱。于是张杨表面答应李、郭，暗中保护吕布。不久，吕布投奔袁绍，自恃配合袁绍在常山击败黑山军有功，向袁绍要求增兵，部下将士又横行不法，袁绍又怕又恨，派壮士掩杀、追击吕布。吕布再去依靠张杨。

吕布在逃离袁绍途中，同曹操部将、陈留太守张邈深相结纳，临别握手盟誓。张邈本是联军成员，由于袁绍曾经指使曹操杀他，而对袁绍十分不满，也害怕曹操最终加害自己，因此结交吕布。在

---

①③ 《三国志》卷七《吕布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五《吕布列传》。

曹操率兵外出时，他招引吕布。吕布袭夺兖州，接着同回军兖州的曹操在兖州苦战两年，战败后退至徐州投靠刘备。在徐州，又利用该州内部矛盾，联合陶谦丹阳旧部，乘着刘备外出淮水同袁术相持、后方空虚之际，袭占了刘备州治下邳（今江苏睢宁北 30 公里），自号徐州刺史。

吕布占领下邳后，同刘备、袁术展开了争夺徐州的三角斗争。吕布企图在这个斗争中居中操纵，令袁术、刘备互相牵制。他收容刘备，令其屯兵小沛，企图挟刘备自重；又答应嫁女给袁术儿子，企图挟袁术以防刘备。同时，防止刘备、袁术任何一方兼并另一方，以形成不利于他的强大力量。建安元年（196 年）九月，袁术派大将纪灵进攻刘备。众将对吕布说，将军常想杀刘备，现在可以借助于袁术之手。吕布说，不对。袁术如果战胜刘备，则北连泰山众将，我会落入包围，我不得不救刘备。于是请刘备、纪灵会面，令人在营门中，举戟一支，说我性情喜欢解斗，如果射中戟小支，你们就罢兵。说罢一箭正中小支。纪灵担心不从命会使吕布、刘备联合，不得不罢兵。刘备得救后，合兵万人，军势重振，不利于吕布。吕布又进攻刘备，制止其壮大，刘备被迫投奔曹操，于是出现了曹操、吕布、袁术争夺徐州的新三角。吕布继续在新三角中反复无常。建安二年五月，袁术称帝，企图建立徐、扬合纵，派人来吕布处迎娶儿媳，吕布高兴地送女上路。在吕布处为曹操卧底的沛相陈珪，企图阻止这一趋势，劝吕布联合曹操。吕布向来对袁术不满意，临时变卦，追回女儿，逮捕袁术的迎亲使者，把他们械送给了曹操。袁术派大将张勋等七道攻吕布，吕布大破张勋。建安三年，吕布为了平衡三角中曹操强袁术弱的力量对比，又叛变曹操，联合袁术，令高顺大破刘备，战胜来援的曹将夏侯惇。于是曹操亲自率兵进攻吕布。吕布战败，被俘杀。

吕布不是豪强大姓出身，割据本钱不多，走了一条不断依附于人以乘机取利的特殊道路。他善战无前，威名传播，远近畏惧，被曹操比做一只老虎。他以此为资本，寄寓二袁处，不为寄主所容；袭夺到兖州，未能守住；依附刘备夺取其徐州，又被俘失败。

他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战争指导能力较低。偷袭到兖州，不知道封锁沂蒙山险，使曹操无家可归，却被曹操返回兖州，反击得手。他反复无常，不断投靠别人，又反过来杀害或攻击收容他的人，名声很臭，在三角斗争中，策略变化过快过繁，丧失信誉。袁术“恶其反复”，曹操嫌他“狼子野心，诚难久养”①。生缚吕布后，是杀是用拿不定主意时，经刘备提醒吕布对待丁原和董卓的前车之鉴，决意杀他以除后患。此外，吕布由于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又不事生产，部队经常缺乏军粮，常靠抢劫为生，军纪很坏。又不善于用将，明知部将高顺忠心，不能听从高的进谏；不能发觉部属陈珪、陈登父子里通曹操；同诸将妻子关系暧昧，造成危急时刻上下离心；虽有好计，由于不信任部下，不敢采用；有时不问缘由就责备部将，使得部将又愤怒又害怕，终于在危急关头叛变投敌，吕布因此也做了阶下囚。吕布的失败，说明在群雄混战中，仅凭一勇之夫，是难以成就大业的。

到建安四年，以上刘虞、公孙瓒、袁术、吕布、陶谦五大割据势力，都已陆续灭亡。

第七节　刘备割据徐州

一、刘备的兴起和割据徐州

刘备继陶谦之后割据了徐州。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属于远支宗室。他的祖父和父亲世代在州郡作官，祖父官至县令。刘备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同母亲贩鞋织席为业，15 岁外出游学，与公孙瓒一起受业于海内大儒卢植。但是他的志向不在读书，而喜爱狗马、音乐和华丽的衣服。他为人寡言少语，善于降低身份处人之下，喜

① 《三国志》卷七《吕布传》。

怒不形于色，又爱结交豪杰，年轻人争相归附他。

黄巾起义后，刘备率领私人招募的部曲乘时而起。他跟随校尉邹靖镇压黄巾，又跟随都尉毌丘毅到丹阳募兵，在下邳遇"贼"力战有功，后任高唐县令，在任内，"为贼所破"①。文献中所谓的"贼"，大约是黄巾军或者其他小股农民军。刘备因战功仅升至县令，不能满足所欲，因此在高唐县被攻破后，弃官投奔了同窗、中郎将公孙瓒，任别部司马，并参加联军对董卓作战。此后受公孙瓒派遣，跟随刺史田楷到青州防御袁绍，以战功领平原（治所今属山东）相。袁绍进攻公孙瓒时，刘备同田楷东屯齐地。徐州牧陶谦由于曹操的进攻而告急时，田楷借刘备南下增援徐州。陶谦见刘备拥有自己所缺乏的关、张等勇将，希望同刘备合作。刘备有此机遇，便脱离公孙瓒、田楷，归附了陶谦。在徐州，刘备同两派都保持友好，不但结交陶谦，也结交同陶谦关系紧张的赵昱、麋竺、陈登等土著豪强。兴平元年（194 年）陶谦病死后，徐州别驾麋竺等立即拥刘，宣称陶谦留下了非刘备不能安此州的遗嘱，率领州吏迎接刘备接管徐州。麋竺此举，获得袁绍支持，说明刘备已经站在了陶谦对立派一方。当时徐州深受袁术威胁，别驾陈群劝刘备不要接管徐州，说袁术还强大，现在接管，必定同袁术冲突。加上吕布如果袭击将军后方，将军虽得徐州，必定无成。但是广陵太守陈登和北海相孔融都支持刘备，说袁术骄豪，不是治理乱世的人选，"冢中枯骨，何足介意"②，刘备才放弃迟迟不敢接手的态度，领了徐州，以下邳（今江苏睢宁北 30 公里）为治所。刘备从此由一名普通的县令发展为屈指可数的州一级的大军阀。在兴起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他反复难养、善于反噬的枭雄面目。

二、建立有凝聚力的军队

刘备在兴起和割据过程中，扩充兵员，团结武将，建立了一

①②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支有凝聚力的军队。刘备家道中落，不具备群雄的优越条件，并无宾客、徒附、义从可供转化为家兵，又一无官职，二无地盘，三无财力，也无力进行招募。他凭着为人的魅力和在乡里少年中的威望，吸引和结交大商人得到赞助。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家有千金，来往于涿郡贩马，认为刘备是奇才，多出金财资助他。刘备以此招募部曲，随后部队便越来越壮大。在救陶谦时，有兵千余人，还有幽州乌桓各部的胡骑和抓来的几千饥民。在徐州接受了陶谦赠予的4000丹阳兵；领徐州后，兵力愈加大增。

刘备团结武将方面，也有重要的收获。他比较接近下层，在乡里招募时，发现应募的关羽、张飞是将才，加以提拔重用。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亡命逃到涿郡，正值刘备募兵，同张飞一起应募。张飞字益德，涿郡人，比关羽年幼数岁，兄事关羽。刘备对关、张以恩相结，同他们睡则同床，恩如兄弟，结为金兰。关、张人身依附观念又很深，怀有对主人的忠心，在大庭广众之下，整天侍立刘备身旁，随刘备周旋，不避艰险，特别是关羽更为突出。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时俘虏了关羽，拜他为偏将军，封汉寿亭侯，礼遇优厚。关羽使人传话，我非常懂得曹公待我优厚，然而我受刘将军厚恩，发誓共死。关羽终于伺机离开曹操，重归故主刘备。关、张在战斗中成长为勇将，以勇敢闻名于世。后来，程昱承认："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①，周瑜承认："关羽、张飞熊虎之将"②，自曹操及东吴，无不慑服关、张的威名。刘备既有自己的部曲，又有关、张这样勇敢而忠心的武将，他的基本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打不垮、拖不烂的较强的凝聚力，往往能够作到散而复聚，败而复振。

---

① 《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三、争夺徐州的作战

建安元年，袁术利用刘备立足未稳，来争徐州。刘备决心确保徐州，以张飞、曹豹共守州治下邳，自己率兵南下迎战。刘备同袁术互有胜负，在淮水相持一个月以上。这时曹操为了牵制袁术，表荐刘备为镇东将军，但是刘备的后方却不稳。他站到陶谦对立面以来，同陶谦旧部发生矛盾并在这时爆发。曹豹是陶谦丹阳旧部，张飞同曹豹发生激烈的争吵，杀了曹豹。曹豹部坚营自守。城中由于两支部队火并，陷入一片混乱。恰好吕布在袁术的利诱下率部也来到下邳。于是陶谦旧部、中郎将丹阳人许耽，乘乱开西门，招引驻在城以西的吕布进城。吕布袭夺了下邳，俘虏刘备妻儿。刘备听说下邳失陷，回军援救，及到下邳，所率领的陶谦部不愿打城中反叛的陶谦部，军队不战而溃。刘备收集散兵，东取广陵，同袁术交战，又战败，军资极端匮乏，被迫向吕布求和。吕布交还了下邳及刘备妻儿，令刘备同他共同反击食言而肥的袁术。刘备以关羽驻军小沛（今江苏沛县），自己回到下邳，收集残兵，集合到万余人，兵势重振。吕布不愿刘备再起，率兵来攻。刘备不敌，丢失了徐州。

刘备败后依附曹操，曹操上表授给刘备豫州牧的虚职，拨给军粮和兵士，支持他回小沛收集散兵，攻击吕布。建安三年，吕布同袁术联合，形成了以曹、刘为一方，吕、袁为另一方争夺徐州的态势。九月，吕布部将高顺、张辽攻下小沛，刘备单身逃走，妻儿再次被俘。于是曹操亲自东征，擒杀吕布，徐州及吕布余部都归了曹操。刘备未能领有徐州。

刘备是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跻身割据者的行列的。从中平元年（194 年）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开始，靠军功从基层县尉作起，奋斗出一个局面。他成功的原因是：1、建立了自己的部曲，锻炼出一支武将强、打不垮、拖不烂的骨干队伍。2、走了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崛起道路，依附、受惠于别的割据势力，然后反噬。他

依附公孙瓒，又背叛他；投靠陶谦，陶谦死后，又站在陶谦对立派一边取得徐州；每反噬一次，势力即得到一次扩张。3、善于团结人和不怕失败。士人中地位低下者，刘备一定与他们同席而坐，同簋而食，不加挑拣，成为众望所归。他怀有深结众人之术，能使人深深倾倒。在长期的割据作战中，败而不垮，意志坚强。刘备最终失去徐州，主要是由于未能处理好同陶谦旧部的关系，使吕布有机可乘。在同吕布、袁术作战时，未能分化瓦解吕、袁，自己两面受敌；作战中不善于指挥，败多胜少。然而刘备的失败是暂时的，凭借其苦心奠定的基础，仍然足以东山再起。

第三章　曹操统一河南

第一节　向河南发展的方针

河南是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兖、豫、徐州，是天下要冲，也是群雄混战最激烈的地区。汉末统一河南的是曹操。曹操字孟德，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他祖父曹腾是大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具有在乱世争雄的有利条件。他家族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宗族势力，为他提供了一定的依托。本人身为名士、英雄、游侠。青少年时代机警，有权术，行为放荡，又博览群书。割据前积累了政治、军事经验。20岁作郎官，直到任西园新军典军校尉。在官僚士大夫集团中建立了较多关系。他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宦官得势时，上书为党人窦武、陈蕃翻案，赢得众人另眼相看。袁绍等密谋杀宦官，不回避他。太尉桥玄认为，天下将乱，曹操有济世安邦大才，对他寄予厚望。人物品评家许劭也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①。

曹操在汉灵帝时努力匡救汉室之失，维护国家统一，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他拒绝参与冀州刺史王芬等废灵帝的密谋。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他起兵讨伐董卓，劝说关东牧守“以顺诛逆”②，消灭董卓，反对袁绍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

曹操在讨董战争中建立了一个军事集团。其骨干是他的同祖堂兄弟曹仁、曹洪、夏侯惇和同族兄弟夏侯渊、同族子弟曹休、曹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真①。他们大都是豪强，有些又是游侠。曹洪家中十分富有，家兵至少上千，夏侯惇以烈气闻名，夏侯渊见县官要拘捕曹操，把罪名揽在自己身上，代为受过。他们同曹操有血缘关系，忠于曹操，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但是曹操的宦官出身，为一些人所不齿。同最大的割据者袁绍相比，曹操家族实力不强，名气较小，影响力、号召力不够大，社会关系不够广，兵力相对较弱；在地方也没有地盘。这些都是他的不利之处。然而总的来说，曹操基本方面较好，很多弱点在割据中是可以逐步克服的。

讨董战争结束后，形势迫使曹操进行割据。初平二年（191年）七月以来，黄河南北割据兼并浪潮汹涌而来。这时汉道陵迟，献帝沦为董卓工具，众多关东牧守割据、主宰了关东大地。曹操虽然企图维护汉室正统地位和国家统一，但是无力回天。他不参加割据，就没有立身之地；参加割据，反而有可能走一条割据、兼并、统一的新道路。在这一形势下，曹操改变态度，卷入割据浪潮，在充满威胁和机遇的形势下，开始他的割据事业。

曹操根据全国形势和自身情况，确立了向河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袁绍曾向曹操表示，如果讨董不成功，他将夺取河北。曹操当即承诺，自己在割据时将避开河北，“无所不可”②。在袁绍兼并冀州、撕掉“兴义兵”面具因而在联军中引起震动后，行破虏将军鲍信私下向曹操指出，袁绍身为盟主，以权谋私，联军将自生变乱，是又出了一个董卓。我们如果反对他，则力量不足，只能招来祸难，又怎能成功呢？可暂时规取大河之南，以等待形势变化。曹操同意，决心以河南为割据方向，“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③，而夺取之。虽然河南是平原区，基本无险可守，但是曹操认为，地势险要，不是决定因素。重要的是根据形势发展，“应机

① 据吴人《曹瞒传》及郭颁《世语》，曹操父亲曹嵩本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是曹操从兄弟，夏侯渊是惇的族弟。

②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而变化”①。他与袁绍是青年密友，西园新军中的同僚，在反对宦官、董卓的斗争中，基本保持合作，鉴于河南割据势力众多，自己实力较弱，曹操决定在向河南发展时，还要同袁绍结盟。

从初平二年七月开始，曹操在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导下，进入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先后进行了夺取并保卫兖州和攻袁术、击张绣、灭吕布的一系列作战，从没有地盘一直到主宰河南大地。

第二节　夺取兖州根据地

一、兖州的归曹和叛变

在曹操确定割据河南后，初平二年（191 年）七月，黑山农民军于毒、白绕、眭固部 10 余万人攻入魏郡、东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东郡位于黄河下游南岸，其太守王肱不能抵御黑山军。曹操决心在袁绍支持下夺取东郡，便率部进入，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击破白绕部。在袁绍表荐下，曹操任该郡太守，把郡治迁向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背靠袁绍作战，并于次年春天驻军顿丘（今河南浚县北）。于毒等不甘心失败，进攻空虚的东武阳，曹操不回救东武阳，反而进兵西山，攻击于毒本屯。他说，孙膑为救赵而攻魏，耿弇企图往西安而攻临淄。假如敌人听说我西进而退兵，东武阳自然解围；不退兵，我能战败其本屯，敌人肯定攻不下东武阳。眭固果然回救本屯。曹操截击其归路，大破眭固，又北上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 20 公里），进击叛变袁绍的南匈奴于夫罗，大胜。至此，初步在东郡站稳脚根。

曹操乘势又夺到东郡隶属的兖州。兖州是东汉 13 刺史部之一，辖今山东西南和河南东部，处在农业发达的古黄河、济水流域间，人口众多，是河南战略要地。四月，青州黄巾进入兖州，杀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傅玄《傅子》。

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刺史刘岱急于反击。济北相鲍信劝谏说，现在黄巾百万，百姓都震惊恐慌，士卒无斗志，不可匹敌。察其部队，有几代人相随，军无辎重，唯以掠夺解决给养。不如养精蓄锐，先行固守。对方欲战不得，欲攻不能，势必疲劳离散，然后挑选精锐，占据对方要害攻击之，定可战败它。刘岱不听，交战被杀。东郡人陈宫劝曹操乘州中无主作州牧，凭借兖州夺取天下，并自告奋勇游说州中。兖州大族同意拥戴曹操击退黄巾。曹操领了兖州牧，然后到寿张以东寻求战机，企图将青州黄巾收降，同其边打边谈。冬天，青州黄巾严重缺粮，鉴于曹操劝降条件可以接受，于是投降。曹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①，收编精锐，组建为青州兵。当时，破敌文书，以一为十，曹操收编的青州军估计为2万。曹操兵力为之一振。从初平二年七月到次年冬，不到一年半，曹操夺到东郡和兖州，组建自己武装，走上独立割据道路，成为河南群雄中的重要一员。

曹操占据兖州后，先后击退了周边群雄南阳袁术、徐州陶谦、河内吕布的蚕食和占领。初平四年春，袁术令黑山残部和南匈奴于夫罗部自北方逼向曹操，自己从南方以主力攻入兖州境内，驻扎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以部将刘详驻扎匡亭，企图夺取兖州。曹操先打刘详，引袁术出援，半路伏击，大败袁术，一路追击，迫使袁术向西南一直逃到九江，挫败了袁术的入侵。

徐州牧陶谦也对兖州展开蚕食，他联合下邳阙宣数千兵，攻取兖州华县和费县，夺取任城，其部下劫财时截杀搬家途中的曹操父亲。曹操旧恨加新仇，于当年秋天，忿然东征徐州，攻下10余县，一路屠城，杀人数万，泗水被尸体堵塞得不能流动。曹操粮尽退兵。次年兴平元年（194年）四月，曹操留荀彧、程昱驻守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再次出兵攻陷徐州5城，略地到东海、琅邪郡，一路上鸡犬不留，墟邑不再有行人走路。曹操迁怒、残害无辜军民，徐州人民同他结下了深怨。

---

①《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曹操东征期间，兖州发生叛变。叛变由于曹操杀名士引起。原九江太守边让，兖州陈留人，与孔融齐名，是后辈士人领袖，在言论中冒犯曹操，曹操杀边让全家，引起士林愤恨。部将张邈、陈宫支持过边让，疑心将对自己不利，乘曹操率州兵东征，招引河内吕布袭占兖州。本州督将、大吏等士大夫，被边让事件搞得人人自危，也奉迎吕布，郡县纷纷响应，兖州只有鄄城和范、东阿3城未降。主持兖州的荀彧决心坚守3城，迎接曹操回军平叛，急召东郡太守夏侯惇带兵保卫鄄城，派程昱去范、东阿，坚定守城决心。夏侯惇到，连夜杀鄄城内谋叛者数十人，安定了人心。这时，豫州刺史郭贡兴师数万，逼向鄄城，有人怀疑与叛军同谋。荀彧认为，郭贡同张邈等素无深交，可利用双方计策未定，劝其退兵。他不顾危险，应邀出城面见郭贡。郭贡见没有惧怕之意，料鄄城不易攻下，退了兵。程昱也说服范县、东阿，都坚守不降。

二、驱逐吕布保卫兖州

曹操决心暂停东征，回军驱逐吕布。吕布不到兖州东部截击曹操，反而企图在曹操不在时攻陷3城。攻不下，西屯濮阳，准备再战。同年秋，曹操回到鄄城，高兴地说，吕布一旦得到一州，不能占据东平（辖境相当今山东梁山、东平、汶上、宁阳等县地），切断亢父（今山东济宁南30公里南阳湖西中部）、泰山间的通道，凭险要截击我，反而驻守濮阳，我知道他是无所作为的。

于是曹操展开保卫兖州的作战。第一阶段，进击吕布。曹操兵力不下万人，与吕布相当。他依托3城，争取大族支持，收割熟麦，压低供粮标准，储备粮食，认真备战。八月，联络濮阳大姓田氏作反间，进击吕布驻地濮阳，从东门攻入，烧东门，显示有进无退。吕布以骑兵攻击青州兵，青州兵奔逃，曹军阵乱。曹操几乎被捉，脱险后，冒火冲出东门，下令赶制攻城器械，再次发起攻击，同吕布对峙一百多天。由于发生蝗灾，双方罢兵。九

月，吕布粮尽，退出东郡、济阴，驻在山阳。曹操既失去兖州大部，军粮又将用尽，几乎坚持不下去。袁绍劝他把家迁到邺城，实际是令其归降。曹操动摇，程昱劝说道，袁绍有统一天下的企图，而智谋不足以成功。将军估量自己能甘居袁绍之下吗？现在兖州虽然残缺，还有3城，万把兵，以你的神武，把荀彧和我这样的人收罗重用起来，霸王大业是可以成功的。曹操才谢绝袁绍。

作战第二阶段，是曹操休整后再战。兴平元年（194年）谷1斛50余万钱，人吃人。十月，曹操退到东阿就粮，遣散新招募的兵士和力役。军队精简，逐渐恢复生气。经过近4个月休整，曹操在恢复战斗力上胜过吕布。二年正月，再度发起攻势，袭击济阴定陶，击败来增援的吕布。闰四月，在山阳巨野大败吕布，斩其将薛兰、李封，进驻济阴乘氏。

正当吕布军日益疲劳时，徐州牧陶谦去世，其子不能继承父业，曹操企图抓住机遇，首先夺取徐州，然后平定吕布。荀彧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危险，指出必须首先击败吕布做到深根固本，才能夺取天下。他说：从前高祖保有关中，光武帝占据河内，都依靠深根固本制服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所以尽管有困难，有失败，终归成就大业。将军本来以兖州首倡义事，况且黄河、济水间是天下要地，虽然残破，仍然容易自保，是将军的关中和河内，不可不先平定。现在分兵东击陈宫，陈宫必不敢向西顾及吕布。利用空闲时间率兵收割熟麦，减食储粮，吕布可以一举击破。战败吕布后，下一步不是夺取徐州，而是南结扬州刘繇，共同讨伐袁术，进兵淮、泗。目前如果东征徐州，有可能造成兖州、徐州两头落空的危险。在兖州多留兵，前方不够用；少留兵，民众都去守城，柴也打不成。吕布乘虚侵犯，民心就愈加危险，只有鄄城、范、卫（濮阳）三城或可保全，这就连兖州也丢失了。如果徐州不能平定，将军该回到何处去呢？陶谦虽死，徐州也不容易亡的。徐州子弟记着父兄耻辱，必然人自为守，没有投降之心。即使取胜，还是不能占领徐州。占领了徐州，弃兖取徐，也是不可取的。曹操被说服，维持原定决心不变。

曹操再接再厉，把吕布驱逐出兖州。吕布、陈宫又率万余兵来战，曹兵外出割麦，守兵不到千人。吕布见树木幽深，怀疑有伏兵，退兵。第二天又来战，曹操伏兵一半在堤里，出兵一半在堤外，以轻兵挑战。合战以后，伏兵全出，步骑兵并进，大败吕布。曹操攻陷定陶，分兵收复兖州各县，将叛军分割为东西两部。东部吕布、张邈投奔徐州刘备；西部张邈弟张超率家属留守雍丘(河南杞县)。八月，曹操围雍丘。十月，朝廷以曹操为兖州牧。十二月，曹操攻克雍丘，杀张邈三族。从兴平元年（194 年）四月至此，经过 1 年零 9 个月苦战，曹操收复兖州，为尔后统一河南奠定初步基础。

曹操乘胜攻击州南的豫州。豫州是东汉 13 刺史部之一，辖地相当今豫东和皖北，为依附袁术的较小割据势力占据。建安元年(196 年)，曹操攻取陈国，迫降袁嗣。二月，占领汝南、颍川，击破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占领豫州大部，将治所迁到豫州颍川郡许县（今河南许昌东)。

曹操在夺取根据地斗争中，通过辟召接纳，以其才干和政策吸引、网罗了荀彧、程昱、毛玠、满宠、李典、于禁等谋士和武将，由此建立了文武班子。

从初平二年(191 年)七月，到建安元年(196 年)二月，曹操在兵力不多、没有地盘的条件下起步，不到 5 年，便割据兖州和豫州大部，他兴起的原因主要是：1、制定向南发展的正确方针。以立足未稳、缺乏辎重的黑山、青州黄巾为对手，以东郡为突破口，争取袁绍支持，又不丧失独立。2、夺取根据地同建军紧密结合。对青州农民军采取收编方针，吸收优秀的谋士和武将。3、正确处理保卫根据地同夺取天下的关系，在立足未稳时，基本上坚持战略内线作战。但曹操兴起时还不太成熟，未能团结住兖州大族，离兖攻徐导致兖州叛变，在根据地问题上走过弯路。此外，他以镇压并消灭黑山和青州黄巾起家，进攻徐州时滥杀无辜，是一生中严重的污点。

第三节　加强根据地建设

一、兴办屯田开辟粮源

曹操集团较早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的根本问题，奠定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基础。初平三年（192年），曹操领兖州后，州从事毛玠向他指出，现今天下分崩离析，天子迁移在外，百姓生业荒废，饥馑流亡。公家没有全年的储备，百姓没有安定的心理，这样下去是难以持久的。现在袁绍、刘表，虽然人民众多，士兵强盛，但是都没有长远打算，没有打基础和治本的政策。用兵正义一方具有政治优势，保持这一优势则依靠财力。"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①。曹操深以为然，但当时作战频繁，实施这两大方针的条件还不成熟。兴平二年（195年）七月，曹操驱逐吕布后，逐渐把它们提上日程。建安元年（196年），两项方针的实施获得重大进展。

建安以前，曹操遇到极端缺乏粮食的严重经济困难。他军粮没有保证，军队规模不能扩大，百姓无粮，人心不稳。兴平元年兖州发生蝗灾，百姓饥饿，谷1斛50万钱，曹军食物中掺杂着人肉干。曹操忍痛遣散新招募的士兵和力役，甚至一度打算投靠袁绍，都由此而来。缺粮问题带有普遍性，特别是在北方，群雄军队经常无粮可食。袁绍军队有桑椹就吃桑椹，袁术军队吃一种叫做蒲蠃的蚌类。群雄由于缺粮，瓦解流离，无敌自破的，数不胜数。缺粮原因是战乱摧毁了正常的经济生活。伴随着战乱，灾荒、疾疫一齐到来，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生产的粮食越来越少，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

在解决缺粮问题时，群雄大都只顾眼前，采取省事省力的办法，在自己割据地上大肆搜括和抢掠。他们饥饿了就抢，吃饱了

---

①《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

就扔，根本不顾及长远，因而遭到惩罚，最突出的是董卓系的凉州军阀和袁术。董卓、李傕、郭汜在洛阳和关中进行疯狂的抢劫，使得原来最富庶的地区，变成白骨累累、无复人迹的荒凉地域；袁术在南阳和九江，穷奢极欲，两地原来都很富裕，很快也都衰败了。由于摧残了割据地，他们的割据事业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盛极一时，迅速变得无足轻重。

曹操深知粮食关系到他事业的生死存亡，企图通过治本的方法，从根本上找到"足食"的道路。当时，农业生产惨遭破坏，战乱造成土地大量荒芜，人口大量流亡；当务之急是使劳动力和土地二者结合起来。曹操存在着结合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有兖州、豫州的大量无主荒田变成了公田，一方面接受青州黄巾投降以后，得到尚未同土地结合的百余万口男女，在大破颍川黄巾以后，还获得耕具、耕牛和耕作技术。只需要找到适合的方式，把土地和劳力结合起来即可。建安元年，曹操发动部下讨论经济问题。羽林监枣祗和韩浩提议兴办屯田，由公家出面把土地劳力二者结合起来。曹操同意，认为安定国家的方法，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农业为急务，兼并了天下，汉武帝依靠屯田，平定了西域，这些是前代的优良榜样。于是任命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当年招募流民，在许都一带公田上耕作屯田。

屯田初期，在强迫招募的政策下，招募来的屯田农民很多人逃亡了，以后为了提高他们屯田的积极性，改为自愿应募。这些屯田农民，称为屯田客，耕种国有土地，采取军事编制，在典农官的监督下劳动。打的粮食分配时，租用官牛的，官六民四；自用私牛的，官民对分。屯田客不服兵役，有时秋冬搞一点战阵训练，以应付紧急情况。许都一带的屯田，当年丰收，获谷百万斛（约折合500市石）。①以后随着曹操领地的发展，屯田逐步推广到

---

① 据郑祈《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蠡测》，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规模，大概是"约拥六十万亩土地，八千多屯田户，四万多人"。见《许昌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北方曹占区各地，州郡照例设置田官，所在之处储备起军粮，仓库都是满的。

曹操屯田的规模和作用越来越大，一直发展到超过了前代和后代。曹操通过屯田，开辟了稳定的粮源，支持了战争，稳定了人心。由于屯田，逐步缓解了紧张的军粮供应，免遭群雄遇到的瓦解流离之苦，给曹操的战争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成为曹操由弱变强的重要因素。后来大司农司马芝在向魏明帝的奏言中，进一步肯定了屯田的历史作用："武皇帝（曹操）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① 曹操军队和国家的富饶，开始于枣祗，完成于任峻。很多地方，实现就地补给，征战四方，省掉运粮的烦劳，由此兼并群雄，统一北方。曹操也明确地评价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②

二、迎接献帝建都许县

曹操决定在战争中打出奉汉的旗帜。他认识到在战乱中人心思统一，而统一的象征是汉献帝，把献帝夺到手中作为争取人心的政治资本是有利的。建安元年（196 年）七月，献帝在白波众帅和部分凉州将领的挟持下，返回旧都洛阳，地望上靠近曹操。曹操策划迎接献帝，但是曹操集团内，多数人对此并不热心，以为关东局势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韩暹、杨奉控制着献帝，无法立即制服他们。荀彧认为，迎接献帝有利于争取人心、收服豪强和网罗人才，坚决主张马上奉迎献帝。他指出，晋文公奉行"求诸侯莫如勤王"的策略，率兵平乱，迎接周襄王复位，使天下服从。义帝被项羽杀害，汉高祖为他服丧，赢得天下归心。现在天子刚

① 《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② 《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返回旧都，洛阳荒芜，如果能利用这个时机，奉迎主上以听从民望，是大顺；秉持至公以感服豪杰，是大略；维护大义以罗致英俊，是大德。韩暹、杨奉怎敢为害！如果不及时定下决心，让四方群雄萌生觊觎之心，以后再想作这一步，也来不及了。曹操同意，决心从白波帅手中夺到献帝，利用献帝的名义，合法地号令四方。

由于献帝在白波诸帅等众将的掌握中，曹操不便像李傕、郭汜那样去兴兵抢劫。他企图利用众将间的矛盾和政治上的幼稚进行智取。他争取到朝廷议郎董昭作为内线提供情报，拉拢众将。董昭根据曹操意图，分析形势，认为白波帅杨奉兵马最强，党羽和外援较少，可作为争取对象，鉴于洛阳缺粮，以曹操的口吻写信结交杨奉，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①。杨奉高兴地对众将说，兖州众军近在许县，有兵有粮，正是应当仰仗的。于是与洛阳众将共同上表，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

曹操第一步，利用矛盾，率兵进入洛阳。在洛阳挟持献帝的众将间，存在众多复杂的矛盾。凉州军将董承，为了抑制跋扈的白波帅韩暹，密召曹操带兵进洛阳，保卫京城。曹操立即奉召，率兵赶赴洛阳。在曹操的兵威下，韩暹逃走，献帝授予曹操假节钺、录尚书事。曹操任兼内外，总揽百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因为根据汉制，假节，有权杀违犯军令者；假黄钺，总统内外诸军；录尚书事，一切总揽于己。

曹操第二步，以欺骗手段把献帝挟持到自己境内。由于曹操寄居在洛阳，他的大权是极不巩固的。曹操向董昭问计，董昭指出，洛阳众将，意见不一，你留在这里，势有不便，唯有把献帝迁往许县。但是如今朝廷安定下来，远近的人们也都盼望一朝获得平安。今天再令献帝迁徙，不会使众人满意。因此他提议通过欺骗进行智取，其方法是向杨奉厚赠礼物进行答谢，可假说京都无粮，让天子暂时巡幸鲁阳（今河南鲁山），鲁阳靠近许县，运输

① 《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

比较容易，没有缺粮之忧。教曹操不直说迁往许县，以消除白波诸帅的担心。九月，曹操在白波诸帅同意下，簇拥献帝离开洛阳就粮，但是并没有遵守协议去鲁阳，而去了许县，并宣布定都于该县，把洛阳置于无用之地。杨奉等发现上当，为时已晚。接着曹操秘密派兵去梁地，击溃杨奉部。白波军失去献帝后，又遭此打击便失败了。

曹操把献帝迁到许县以后，建立宗庙社稷，恢复礼仪制度，大权独揽，架空了献帝。在献帝的宿卫军中，曹操换上自己的党羽、亲戚，把持了天子卫队。献帝拱手以听，无从掣肘。曹操从此由一般的割据者，上升为东汉政府实际的首脑，政治地位凌驾于任何割据者之上。献帝来到许都以后，摆脱颠沛流离之苦，获得安定，而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也因此涂上合法的和正义的光环。从此在政治上，曹操能控制群雄，群雄不能控制曹操。

第四节　攻袁术击张绣灭吕布

一、进攻袁术打击其称帝

曹操占领兖、豫和挟持天子后，袁绍流露出很大的敌意，但忙于同公孙瓒作战，无暇顾及曹操。河南群雄地缘上包围着曹操，但不能联合对曹，曹操存在着各个击破他们的客观基础。在此有利形势下，建安二年（197 年）正月，颍川阳翟人郭嘉脱离袁绍，投奔曹操，献策在同袁绍较量前攻取吕布。认为可利用袁绍远征公孙瓒的有利时机，东取吕布。不攻取吕布，如果袁绍进攻，吕布作其援军，非常危险。荀彧也认为，不攻取吕布，袁绍不容易打败。于是曹操决心迅即转入战略进攻，在袁绍腾出手对付自己以前，以寻歼吕布为重点，各个击破河南诸敌，把战争推进到统一河南的新阶段，解除未来同袁绍作战的后顾之忧。

这时，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如果不立即打击，将丧失挟天

子优势，于是决心在打吕布前，以挟天子的优势，争取群雄，孤立袁术，假手群雄打击之，如果不成功，则亲自作战。从建安二年二月开始，进行战前准备：1、羁縻袁绍。把自己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自己改任次一等的司空、行车骑将军。并以天子诏命令袁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以示同袁绍讲和。2、笼络吕布。诏命吕布为左将军，并致手书慰问，以拆散吕布、袁术的联盟。厚结吕布答谢使者沛相陈珪的儿子陈登，授予徐州广陵太守，令他为下一步打吕布作内应。3、联络孙策。以诏书拜袁术部将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孙策嫌官轻，使者承制假孙策为明汉将军。到五月，各方都接受献帝任命，不承认袁术帝号。特别是吕布获得朝廷高官以后，改变对曹操不合作态度，向袁术毁婚。袁术令大将张勋攻击吕布，张勋大败。袁术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受挫。

于是曹操以天子诏书名义，令孙策会同吕布、吴郡太守陈瑀联合进攻袁术。陈瑀对其吴郡被孙策占领十分不满，派人渡江联络江东割据势力严白虎等为内应，企图伺孙策攻袁术时，攻取江东各郡。孙策发觉以后，令吕范等率兵北上海西，大破陈瑀。联军未攻袁术，内部先爆发战争。曹操假手于人的计划落空，九月，亲自进攻袁术。袁术未经交战即南逃，曹操斩杀其大将桥蕤等，率兵巡行，占领豫州淮、汝一带。当地豪强许褚，聚集少年及宗族数千家，称雄淮、汝、陈、梁之间，也率其部曲归顺。袁术退到淮南，从此衰落。曹操打击袁术称帝作战成功，维护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地位，消除了东南方威胁。

二、三击张绣缓解肘腋之患

曹操鉴于张绣屯兵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距许都仅 280 多里，构成肘腋之患，如果不打击他，则今后几乎无法离开许都东征吕布，企图乘张绣新到，打其立足未稳。建安二年正月，曹操率军进至宛县附近的淯水。张绣观察刘表缺乏决断，难有作为，未经交战投降曹操。曹操得意忘形，娶张绣族父张济的寡妻，赏给

张绣亲信骁将胡车儿黄金。张绣对此既痛恨，又怀疑曹操将加害自己，企图叛变。他请求率部穿越曹营调动，又称士兵需穿甲胄，减轻辎车负载，争取到曹操同意后，率全副武装合法进入曹营，发起突然袭击。曹操猝不及防，右臂受伤，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遇害，退至舞阴。张绣同刘表军再度联合。曹操总结教训说，我接受张绣投降，错在没有取得人质，才弄到这个地步。我知道战败的原因。诸位看着吧，从今以后不会再失败了。于是回到许都。南阳、章陵（今湖北枣阳南）等各县，重新倒向张绣。曹操令曹洪进击，不利。曹洪退守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屡遭张绣、刘表袭扰。

曹操战败袁术后，同年十一、十二月第二次进击张绣，到达宛县。刘表令邓济据守湖阳，支援张绣。曹操攻下湖阳，俘虏邓济，又攻下舞阴。

建安三年（198 年）三月，曹操三击张绣，围困穰县。荀攸认为张绣、刘表凭借相互支援才强大，张绣以游军求食于刘表，刘表一定不能长期供给其军粮，双方势必分离，建议暂缓出军，等到张绣、刘表矛盾尖锐后，利诱张绣再次投降；若急攻张绣，势必促使张绣同刘表相互支援。曹操没有耐心等待刘、张分离，便出兵。出兵后，获悉袁绍密议袭击许都。此前，袁绍企图把献帝迁到自己附近，派人劝说曹操道，许都低下潮湿，洛阳残破，不如迁都到鄄城，就近取得全部粮食，遭到拒绝。于是，冀州别驾田丰认为，应该及早袭击许都迎回献帝，使今后行动打着诏书旗号，才是上策；否则总要当俘虏。曹操从袁绍逃亡士兵处得到上述消息，担心后方有失，决定撤军。

五月，刘表援军到达安众（今河南邓县东北），在曹军退路上固守险要，张绣军也跟踪曹军而至。曹操腹背受敌，为防被割歼，令军营相连，兵力聚成一团，每天数里，缓缓后撤。他承认出兵过急，对荀攸说，不听你的话，以致有这个结果。又致书荀彧说，我到安众，一定能打败张绣。到达安众时，张绣、刘表合兵固守曹军必经险要。曹操利用夜暗，在险要处凿开一条地下通道，运走全部辎重，并埋伏奇兵。拂晓，张绣以为曹军逃走，全军来追。

曹操出奇兵，以步、骑兵夹攻，大破张绣。七月，回兵许都。

在总结经验时，荀彧问战前料定能战胜敌人，有何根据？曹操说，敌人阻遏我归师，逼我进入死地决战，据此料定必胜。《孙子略解》把这一经验概括为："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① 在曹操退却时，谋士贾诩告诫张绣，追击必败；张绣不听，战败。贾诩说，再追必胜，果如其言。事后贾诩解释说，曹操虽然刚吃了败仗，退兵时一定亲自断后，你不是他对手，所以追击必败。曹操攻你，并没有失策的地方，他退兵必是国内有变故，打退你第一次追击以后，一定轻军急进。即使留下众将断后，也一定不是你对手，所以知道再追必胜。

从建安二年正月到次年七月，曹操一年半内三击张绣，打得张绣不敢轻举妄动，缓解了肘腋之患。但是张绣得到刘表增援，指挥能力较好，策略灵活，曹操虽然多至三击，也未能消灭张绣。张绣的弱点在于刘表无力长期供给其军粮，解决张绣的问题不能只使用军事手段。

三、消灭吕布占领徐州

吕布感到，曹操一再胜利，分量过重，为了平衡曹、吕、袁三角，建安三年五月，公然由联曹转向联合袁术。九月，令高顺进攻刘备及来增援的曹将夏侯惇，大胜。这时是曹操第三次击张绣以后，袁术衰落，张绣受挫，吕布势孤，形势有利于曹操东征吕布；但是众将对刘表、张绣在后顾虑重重，以为远袭吕布，必有危险。荀攸认为，刘表、张绣战败不久，不敢轻举妄动，可以放心东征。不及时打吕布，吕布骁猛，又依仗有袁术，如果纵横于淮、泗之间，各地豪霸起而响应，就不容易打了。可利用吕布反叛不久、人心凝聚不到一起的时机东征，一定能够获胜。于是

①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九地篇》，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曹操东征吕布。吕布以主力重点防御徐州中部彭城（今江苏徐州)、下邳（今江苏睢宁北30公里），以陈登防御州南，以土著豪霸防御州北。曹操决定以攻城为主，打其中部，令内应、广陵太守陈登配合作战，对北部，待击破吕布、豪霸势孤以后，再招降。自己担任主攻，从西向东打，以陈登为助攻，从南向北打，双方夹击吕布。

曹军进至彭城，远来疲劳。陈宫主张出击，说以逸击劳，无有不克。吕布不听，企图等待曹军进攻时，把它逼落城西泗水中，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十月，曹操攻陷并屠彭城，吕布退至下邳。曹操、陈登合兵攻下邳，屡次打退吕布出战，封锁其求援通道。袁术只作声援。吕布为争取袁术出兵，半夜出城，企图护卫其女闯过封锁线，令其到袁术处完婚，在城外遇到曹兵阻击。曹军挖掘堑壕包围下邳，连续攻城，不下，极端疲劳，曹操企图退兵。荀攸、郭嘉不赞成，认为战事处在转折关头，吕布勇而无谋，三战失败，锐气已衰，三军以将为主，主将斗志衰退，则三军没有奋战意志，陈宫虽有智谋，然而出谋迟缓。说乘吕布士气未恢复，陈宫计谋未敲定，进军急攻，必可攻下。于是曹操引沂水、泗水灌城，吕布上城求降，被陈宫阻止。十二月，吕布为小事训斥部将，部将恐惧，上下离心。部分将领兵变，绑架陈宫，出城投降。吕布与麾下登城南白门楼，见围攻紧急，下城投降。曹操奋战两个多月，攻陷下邳，绞杀吕布。

曹操灭吕布之战，是统一河南中关键一战。此战消灭河南最主要敌人吕布，夺到徐州。徐州从陶谦去世以来，大小豪强纷纷染指，一再易手，盘根错节。至此，初获安定，成为曹操东方屏障。此战，是在吕布无外援情况下连续进行的城市攻坚战。曹操所以能够消灭吕布，是通过打袁术、击张绣以后，基本解除了后顾之忧，利用吕布反曹不久、内部尚不巩固的时机，及时、果断发起决战。作战中抓住吕布士气未恢复、三军缺乏斗志、陈宫计谋未出的关键时刻，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夺取了最后胜利。吕布在兵力对比不利和外无援兵情况下，既不能以逸击劳，胜而后

守，又不能实行运动战，只是消极地坐守二城，且不能团结众将，等于是坐以待毙。

从建安二年正月到三年十二月，曹操利用袁绍陷入同公孙瓒作战的有利时机，争取到两年时间，重击袁术，威慑张绣，消灭吕布，打破了东、西、南三面包围，据有兖、豫、徐州等中原广大土地，基本统一了黄河以南，发展成跨州的大势力，为未来对袁战争作了重要准备。

第四章　曹操统一河北

第一节　官渡之战（上）

（参见附图 2）

一、战前基本情况和袁绍决心

建安三年（198 年）年底，曹操消灭吕布，大体统一了河南。四年春，袁绍消灭公孙瓒，统一了河北。至此，在群雄混战 9 年多以后，北方众多群雄基本覆灭，通过兼并形成袁、曹两大集团，分据河北、河南。但是大河南北这两地都是平原，地形连为一片，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区，不可能长期分裂下去，袁、曹双方通过战争决一雌雄势在必行。建安五年（200 年）二月，袁、曹之间终于爆发了官渡决战。

战争爆发时，总的形势是袁绍势力大而比较落后，曹操势力较小而比较进步。袁绍军事力量占有很大优势。在兵力和装备方面，估计拥有十几万或二十几万兵力，其中精兵约 10 万，骑兵数量多而精锐，有铠万领，马铠 300 具①。在战争资源方面，奄有河北冀、青、幽、并四州，“民户百万”②，仅其中的冀州即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③，如果按户籍征兵，可得 30 万兵。人力、物力资源较为充足。同割据者的关系方面，袁绍与北方的乌桓、鲜卑，关系和睦，对南作战无后顾之忧。但是也存在许多致命弱点：

---

① 《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兵部·甲》引《魏武军策令》。

② 《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王沈《魏书》。

③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此系夸张之辞，但冀州确实是一个大州。

袁绍纵容豪强恣意横行，亲戚兼并土地，底层民众贫弱，代替豪强出租赋，即使卖尽了家财，也不能够应付赋敛。由于献帝被曹操挟持，袁绍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袁绍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袁绍为人外宽而内忌，治军宽缓，法令不立，作战指导上不懂兵要。经过同公孙瓒多年的战争，境内迫切需要休息。

曹操军事力量居于劣势，兵力估计约数万①，远远少于袁绍。装备落后，大铠仅 20 领，马铠不足 10 具，与袁绍不可相提并论。在战争资源方面，据有黄河以南兖、豫、徐三州和归附的关中。这些地方，大都是饱受战乱摧残的重灾区，往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③，户口只剩下十分之一，战争潜力比袁绍差得很远。同割据者关系方面，侧后刘表、孙策、张绣正在观风望色。曹操虽然实力居于劣势，但是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中，存在着许多优于袁绍的地方，主要是：通过挟天子，控制了东汉政府；兴办屯田，增加了军粮供应；“士卒精练”④；曹操机变多端，策得即行，赏罚必信，用兵如神，政治、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强过袁绍。

建安四年六月，袁绍集团讨论南下同曹操作战。监军、奋威将军沮授、冀州别驾田丰主张经过休整和准备好了再打。因为马上打，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指出同公孙瓒作战多年，百姓疲敝，仓库没有储备，仅仅依仗人多势强，是骄兵，一定会先灭亡。曹操迎天子，定都在许，莽撞地举兵向南，给人同天子作战的印象，在义上也站不住脚，何况战略的高低，不在众寡。因此应当用时间克服政治被动、战略落后这两个不利因素，在己方得到休整的

---

① 曹操兵力数量较少，主要是在频繁战乱的打击下，河南经济残破不堪，无法养较多数量的兵。

② 曹操：《蒿里行》，《宋书》卷二十一《乐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年 10 月版。

③ 〔魏〕王粲：《七哀诗》其一，《王粲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6 页。

④ 《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兵部・甲》引《魏武军策令》。

同时，疲劳、消耗曹操。具体计划是：先向献帝献捷，并务农息民。如果献捷受阻，就宣布曹操阻隔我尊王道路，夺取政治上的主动。然后进兵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浚县），逐步经营河南，多造舟船，修造兵器装备；分头派遣精锐骑兵，骚扰曹操边境，使其不得安宁，进一步造成我强敌弱的态势。三年之内，对曹操可以安坐而定。现在急于决战，是放弃万全之策去冒险。治中别驾审配、郭图则强调袁绍强大，忽视其不利的一面，认为凭着河朔强兵，讨伐曹操，易如反掌。"天与弗取，反受其咎"①，武王伐纣，也是臣下打天子，大家并不认为不义，何况只是加兵曹氏，怎能说师出无名？将士士气都很高，如不早定大业，是失策，主张马上以主力同曹操决战。郭、审迎合了袁绍急于消灭曹操的心意，袁绍采纳郭、审意见，决心以冀州为基地，幽州为后方，青、并为两翼，实现争夺天下的素志，尽快南下同曹操决战。

袁绍据此进行南征准备和部署：1、简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组建南下大军。2、改组军队领导，免去沮授监统全军的指挥权。因为郭图等人进谗说，沮授监护内外，威震三军，如果个人势力发展起来以后，无法控制；况且统兵在外，不应该参与核心机要。袁绍被说动，削弱沮授兵权，使其与郭图、淳于琼各统帅一军。3、以审配、逢纪留守邺城，主持后方事务，征送粮草，支援前线。4、安定北方边界。以天子旨意，授予曾帮助打公孙瓒的乌桓首领蹋顿、乌桓大人难楼等人单于印绶。5、派人联络刘表、张绣，争取造成南北夹击曹操之势。

袁绍的进攻布势，是由邺城南下，取最近路线，经黎阳、白马（今河南滑县东20公里）、延津（古黄河流经今河南延津西北至滑县以北的一段）、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夺取500里外的许都。

①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二、曹操的防御决心和战前准备

早在统一河南期间，曹操集团就料定，在北方最后同曹操争夺天下的，唯有袁绍。当时，袁绍令天下群雄畏惧，唯独对于曹操挟天子号令诸侯，却不得不虚与委蛇，内心深为不服。后来得知曹操在宛城战败，袁绍愈加骄横。

建安二年（197 年）正月，袁绍给曹操来信，言辞傲慢。曹操大怒，企图征讨袁绍，又感到实力不敌，出入行动失去常态。在袁强曹弱形势下能否取胜成了曹操心病。于是同荀彧、郭嘉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古今成败，探讨未来对袁作战的指导思想、前途和部署。

为了使曹操树立胜利信心，荀彧在讨论中着重分析双方统帅素质的差距，预言必胜。他认为，目前袁强曹弱，但强弱不是决定胜负唯一的因素，关键是统帅的“才”。有其才，虽弱必强，否则虽强易弱。高祖、项羽的存亡，足以说明问题。荀、郭认为，才略优势在曹操这一面。荀彧提出曹操有四胜，郭嘉提出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他们指出，袁绍外宽内忌，用人生疑；曹操不问远近，用人唯才，在度量上先胜了。袁绍迟疑顾虑，多谋少决，丧失时机；曹操能断大事，策得即行，应变灵活，在谋略上先胜了。袁绍治军宽缓，法令没有权威，虚张声势，不懂兵要；曹操赏罚必行，兵士效力，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在军事上先胜了。袁绍沽名钓誉，士人中缺乏真才实学喜好吹嘘的，大多归了他；曹操诚心对人，不追求形式好看，自己谨慎俭朴，赏有功时毫不吝惜，天下忠诚正直、有远见、有真才实学的士人都愿意效力，在德上先胜了。此外，曹操还有道胜、义胜、治胜、仁胜、明胜、文胜，实力虽然弱些，在政治上、作战指导上，胜过袁绍。曹操听了很高兴，树立起必胜的信念。

在分析双方优劣和战争前途的基础上，郭嘉提出，这次作战，指导思想是在以弱抗强总形势下，发挥作战指导优势，以智取胜。

他说，刘邦、项羽实力不相匹敌，是您所知道的。汉高祖唯有以智取胜。项羽虽然强，终于被擒。这就是说，曹操应该发挥统帅素质、作战指导上的优势，精心策划，精心指导，以谋略压倒袁绍。

曹操又设想了最坏的情况，说他所担忧的，是怕袁绍侵扰关中，惑乱羌胡①，南诱蜀汉，形成对自己的大包围，使自己单独以兖、豫二州，同天下六分之五的势力相对抗。荀彧认为，为了阻止出现这一最坏局面，必须在可能形成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可选在关中。关中将帅众多，不相统一，唯有韩遂、马腾最强，他们见关东正在争夺，一定各自拥兵自保。现在如果安抚他们，派使节去谈联合，虽然双方不能长期共处，等到我们安定好关东，足以保证让他们按兵不动。西方关中的事，可以托付给钟繇，他有智谋，托付给他，西方可以无忧。于是曹操表荐钟繇以侍中兼任司隶校尉，驻长安，持节都督关中众军，允许他不拘于法制条例，便宜行事。钟繇受命后，向韩遂、马腾等人递送文书，陈说祸福利害关系，马腾、韩遂被说动，各送儿子入朝为人质。曹操在官渡时，钟繇送马2000匹到军前。曹操给钟繇的信中说，收到送来的马，很应此处急需，朝廷无西顾之忧，是足下的功劳。过去萧何镇守关中，足食足兵，与你相比，也很相当。

两年后，即建安三年年底，曹操结束在河南的战争，腾出手来对付袁绍。次年四月至十一月，进行了紧张的对袁战争的准备：

1、消除内部恐袁情绪。许都众将听说袁绍要来进攻，大多表现出信心不足，认为袁绍强大，不可匹敌。曹操在揭示袁绍致命弱点时指出，我了解袁绍的为人，志向大，智慧少，外表严厉，内心胆小，妒忌刻薄，威信不高，兵力虽多，指挥部署不当，将领骄傲，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正好作为送我的礼物。孔融向荀彧道出他的疑问：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是智士，为他出谋，审配、逢纪是忠臣，为他办事，颜良、文丑是勇将，为他统兵，恐怕很难战胜袁绍吧！荀彧作了精辟和有预见性的答复，

---

① 当时位于今陕、蒙、宁、甘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

说袁绍兵力虽多，法令不严，田丰刚强好犯上，许攸贪婪不能自治，审配专断无谋，逢纪果断而刚愎自用。这几个人，势不相容，一定发生内变。颜良、文丑，不过一夫之勇罢了，一战可以擒获。

2、在前方和左、右翼创造有利态势。在曹占区前方，占领了河内。河内位于主要防御方向黄河北岸一侧。割据河内的张杨敌视曹操。建安四年（199年）二月，当曹操消灭吕布回军靠近河内时，张杨内部发生拥曹与拥袁斗争。张杨被拥曹将领杨丑所杀，拥袁将领眭固又杀杨丑。四月，曹操乘袁绍仍在幽州同公孙瓒酣战的良机，以帮助讨伐公孙瓒为名，北渡黄河，斩杀眭固，占领河内，铲除拥袁势力。曹操还企图以河内为跳板，偷袭袁绍邺城；但袁绍已战胜公孙瓒，察觉到曹操的企图。曹操图谋败露，大军才回到黄河南岸。①曹操抢占河内以后，有利于以河内阻止袁绍并州兵力南下，屏蔽关中，并可威胁袁绍进攻许都大军的侧后。在曹占区右翼，曹操制止了二袁经徐州合流，不断袭扰袁绍的青州。这时，二袁相互争夺天下的旧格局，已让位给袁、曹相争的新格局，二袁开始联合。袁术打算经徐州下邳北上，袁谭也从青州派人迎接袁术。建安四年四月，曹操派刘备及将军朱灵东出徐州，截击袁术，迫使袁术退回寿春，阻止了二袁合流。曹操又命臧霸率精兵袭扰袁谭青州，钳制袁绍兵力。臧霸从八月起，多次攻入青州之齐国、北海国，使曹方掌握了东方的主动。在曹占区左翼，曹操安定了西方关中。这时，关中众将名义上服从曹操控制的朝廷，实际上在袁、曹间保持中立，并乘机广招回到本土的流民为部曲，造成不利的郡县贫弱、兵家渐强的局面。十一月，曹操同意治书侍御史卫觊在关中统制盐政。卫凯用售盐所得的利钱，购买犁、牛，供给归民，发展耕种，充实关中。于是众将日益削弱，官民日渐兴盛，关中安定，人心逐渐归附。曹操又通过来许都观察形势的凉州从事杨阜，拉拢州牧韦端，争取到凉州的支持。曹操消除了

① 参看《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

前方的隐患，取得左、右翼的安定，创造了有利态势。

3、缓解南邻的威胁。战前，曹操的南邻孙策、刘表、张绣环伺、威胁着他的侧后。曹操积极同他们改善关系：表奏孙策为讨逆将军、吴侯，同其结为儿女亲家，征召其弟孙权、孙翊，企图通过软硬兼施，利诱、胁迫孙策就范；同袁绍展开争取张绣的竞争，以比袁绍更加重视张绣和不计其杀子之仇的宽阔胸襟，赢得张绣再次降曹；厚待刘表使者韩嵩，通过他积极争取刘表。通过上述紧张活动，改善了同南邻的关系。同时，以天子诏书，令渔阳太守鲜于辅都督幽州六郡，反过来牵制袁绍的侧后。

经过八个月的战前准备，曹操大大改善了防御态势。

在备战期间，曹操根据袁强己弱的形势，确立了以后发制人打退袁绍的进攻和以白马、官渡、许都为主要方向组织防御的决心。其部署是：以黄河南岸为第一道防线，令于禁率 2000 步、骑兵，防御黄河渡口延津、原武（今河南原阳）一线，东郡太守刘延防御白马，以迟滞和破坏袁绍大军渡河行动；振威将军程昱率 700 兵士防御白马右侧之鄄城，魏种为河内太守，牵制袁绍并州兵力；以官渡为第二道防线，亲率近万名精锐兵力驻守；以侍中、守尚书令荀彧留守许都，主持后方事务；以任峻管理军器和粮运，蔡阳、李通等分守后方要地，防备黄巾刘辟、龚都和孙策、刘表等。

曹操在设置防线时，考虑到边界上的黄河虽然是一道天然屏障，但是渡口较多，防御时分兵把口，势必分散兵力，只把它定为次要防线，主要防线则设置在官渡。官渡位于曹占区中部稍前，条件优良，地多沙丘，前有天然障碍官渡水；东有官渡水同阴沟水的汇合处，该处堤多，流缓河宽，积泥数尺，葭苇茂密，船行徒涉，诸多不便；西南有圃田泽（今已消失），该泽是水网地区，“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百许里”，内分“上下二十四浦”，浦水盛大时，溢流北注①。上述官渡

① 〔北魏〕郦道元注、近人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二十二《渠水》引皇武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14 页。

水同阴沟水会合处和圃田泽是官渡东西面的两大障碍地带。官渡位于两大障碍地带之间，成了袁军进攻途中东西数百里间唯一可以通过的宽约数十里的喇叭口。曹操企图将袁军诱至这个有利的喇叭口，进行阻击，以打破其进攻。

曹操选定官渡为主战场后，在官渡进行战场建设。建安四年八月，他北渡黄河，视察白马对岸黎阳（今河南浚县）一带地形。九月，回到许都，分兵驻守官渡。十二月和次年一月，率主力两次进驻官渡。鉴于官渡是平原，无险可守，曹操在官渡水南岸构筑阵地，修建城垒① 等各项防御设施。

三、东征刘备解除后患

正当备战顺利进行的时候，发生了刘备叛变的意外事件，使曹操又落入危险的处境中。刘备叛变是处心积虑的。他失去徐州以后，被曹操留在身边，表为左将军、豫州牧，受到厚重礼遇；然而在曹操控制下，他不能真正作豫州牧，更不要说称雄一方了。为了扫除障碍，刘备开始同反曹势力合作。反曹势力车骑将军董承，自称领受献帝写在衣带中的诛曹操密诏，串连刘备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诛曹操。未及实施，建安四年四月，刘备被曹操派往徐州阻击袁术北上。十二月，刘备击退袁术以后，估计曹操大敌当前，无力东顾，决心叛曹。他杀曹操徐州刺史车胄，抢在袁绍前面树起反曹旗帜。由于刘备在徐州本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徐州东海郡屯帅② 昌豨及郡县大都跟着叛变曹

---

① 《水经注校》卷二十二《渠水》：“（渠）又径曹太祖垒北，有高台，谓之官渡台，渡在中牟，故世又谓中牟台。建安五年，……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垒，公亦起高台以捍之，即中牟台也。今台北土山犹在，山之东，悉绍旧营，遗台并存。”又〔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河南二·官渡城》，称中牟台为官渡城。

② 驻守地方的军事首领。

操。刘备兵力猛增到数万。他北联袁绍，分兵略地，抢占徐州。在这次事件中，刘备凭着受诏讨贼的政治资本，首事反曹，政治上独树一帜，企图等到袁、曹酣战时，以徐州为基地，伺机偷袭曹操后方，奉迎献帝，取曹操而代之。

刘备叛变，造成曹操侧后的绝大隐患，曹操深知不可轻视。他承认刘备对士人的号召力比自己大，曾从容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算不上数）"①。在袁、曹交战期间，刘备如果袭取空虚的许都，以宗室迎天子，必将从根本上动摇曹操。曹操决心在同袁绍作战前，平定刘备。他令刘岱、王忠东击刘备。刘、王不能取胜。建安五年正月，董承密谋泄露，同谋者都被夷灭三族，唯有刘备漏网。曹操决计亲征刘备。众将顾虑重重说，与你争天下的是袁绍，袁绍将要来进攻，你却弃之不顾，如果袁绍偷袭后方呢？曹操指出，刘备不可小看，今天不打他，必成后患。袁绍虽有大志，但见事迟，一定按兵不动。郭嘉也认为，袁绍性子慢，多疑，来进攻也快不了。刘备新起，众心未附，迅速出击，一定能把他战败。

建安五年正月，曹操在袁绍虎视眈眈之下，远离许都，东征刘备。曹操占领沛县，攻陷下邳，乘胜击破昌豨。刘备不意曹操竟置袁绍于不顾，亲自东征，兵力都分散在徐、沛各城，到了这一紧急时刻，来不及集中，导致全军溃散，妻儿、关羽被俘，张飞落草。刘备只身北投袁绍，第二次也是最终丢失了徐州。

当曹操东征时，侧后暴露，田丰建议袁绍全军偷袭许都，认为可以一战而定。但是袁绍可能担心偷袭许都时，曹操必回军相救，在同自己交战中，被刘备抢先进入许都奉迎天子，于己反而不利，企图先使曹、刘交斗，相互削弱以后再行动，因此推说儿子有病，不肯兴兵。袁绍此举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田丰用手杖击地说，遇到难逢的机遇，由于孩子缘故而丧失掉，惜哉！曹操凯旋以后，袁绍商议进攻许都。田丰说，许都已不空虚，不如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持久作战。袁绍不听，田丰犯颜强谏，袁绍认为他瓦解军心，用镣铐把他拘禁起来。

第二节　官渡之战（下）

（参见附图 2）

一、白马延津初战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袁绍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声讨曹操是“赘阉遗丑”，“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是“贪残虐烈无道之臣”①，悬赏缉拿他的首级。二月，率四州10万大军进军黄河北岸重镇黎阳，袁曹官渡之战爆发了。

官渡之战第一阶段，是曹军初战获胜，实行退却。袁绍企图渡河寻求曹军主力决战，令大将颜良为先头部队渡河，夺取黎阳对岸白马，以掩护主力渡河。沮授劝谏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虽然骁勇，不可独自担当这一重任。袁绍不听。颜良渡河，将东郡太守刘延围困于白马。这时曹军主力在官渡待机。为了求得初战胜利，四月，曹操率官渡曹军北上解救白马之围，用荀攸之计，先到延津，佯示渡河袭击袁绍侧后，调动袁军来援。袁绍听说曹兵在延津企图渡河，果然分兵西应，削弱了白马对面黎阳的兵势。曹操分散袁军兵力成功，然后轻军兼程奔袭白马，掩其不意。颜良发觉时，同曹军相距只有十来里，大惊，仓促迎战。曹操以张辽、关羽为先锋出战。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杀颜良于万众之中，斩首级而还，袁军众将无人能够抵挡，纷纷溃败。曹操解了白马之围，以获胜之兵，迁移百姓，沿河西撤。

白马之战后，袁绍率主力渡河。沮授说，初战胜负引起的变化，不可不详察。现在大军应该留在延津，暂不过河，分兵攻击

---

①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官渡；如果战胜，过河不晚。匆忙渡河，一旦失利，全军无法安全返回。袁绍不听，沮授临渡叹道：上面志得意满，下面务贪其功，悠悠黄河，我大概回不来了。于是称病辞职，袁绍深以为恨，再次削减沮授所部，把减下来的部队归郭图节制。

袁绍主力过河以后，一面在延津以南筑营垒，一面派出刘备、文丑挑战。曹操以逸待劳，决心再打运动之敌。他下令勒兵安营，在南山坡下待机，派哨兵登上壁垒，瞭望来犯的袁军。哨兵报告说，来了五六百骑兵。一会儿报告，骑兵逐渐增多，步兵多得数不清。曹操说，不要报了。令骑兵解下马鞍，把马放开，把从白马缴获来的辎重运往大路上。众将认为袁军骑兵多，不如撤回，保护营寨。荀攸急忙阻止说，这是诱饵，岂可撤走？曹操瞥了一眼荀攸，笑了笑。文丑、刘备率骑兵五六千先后追到，众将说，可以出击了，曹操下令，继续待机。不久，袁军骑兵越来越多，一部分离队，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阵势混乱。曹操见时机已到，下令出击。曹军骑兵不满600，全部上马，大破袁军，斩杀文丑。

白马、延津初战后，曹军振作了士气，退至官渡防御。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号称名将，两次战斗下来全部被斩，袁军大为震惊，放慢前进速度。沮授劝袁绍说，北兵数量众多，勇猛果敢比不上南兵，南兵粮少，财物比不上北兵，南兵利在速战，北兵利在持久，应当打持久战，拖延岁月。袁绍不听。

二、官渡相持

第二阶段，从七月到九月3个月，是相持阶段。七月，袁绍以优势兵力进军阳武（今河南原阳）。为避免被割歼，八月，令军营相连，齐头并进，依托沙丘安营，以数十里宽的作战正面逼近官渡。面对袁军稳步推进，曹操令分别立营对峙。九月一日，曹军试战，大败，退守城垒固守，企图阻止袁绍大军于官渡水前以

疲敝之。这时曹军兵不满万，受伤的十分之二三。①袁军受阻于官渡，无法前进。谋士许攸鉴于许都空弱，劝说袁绍不必同曹操攻战，可留部分军队在官渡相持，而紧急率军绕道袭击许都，奉迎天子，使曹操首尾奔命。认为如此大事马上可以成功。袁绍骄横，说我就是要通过围攻，战胜曹操。两军在官渡展开激烈攻防战。袁军起高橹，堆土山，俯射曹营，箭如雨下。袁绍下令军中人手一绳，准备捉曹操。曹营兵士蒙盾而行，极为恐慌。曹操令筑高台，制作发石车，发射飞石，击毁袁军所有楼橹，声震如雷，袁军称为霹雳车。袁军挖地道，从地下偷袭曹营，曹军在营内挖长堑壕，破坏其偷袭。

作战期间，曹操后方困难重重。为了支援前线，曹操制定新法令，紧急征收棉绢，郡县不敢不收，又不敢催得太紧。一些郡县倒向袁绍，不叛的郡县承受更加沉重的负担。曹操发觉以后，给情况严重的未叛的阳安郡下令，把征收的棉绢发还人民，上下高兴，郡内才安定下来。曹操又允许边远新附的广义郡暂时不实施新法令。后方困难也是袁绍打拉并举策略造成的。袁绍派人潜入，

---

① 关于曹操在官渡相持时的兵力，《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荀彧传》记载荀彧言“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张范传》“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三处一致肯定官渡曹军仅有万人，或不满万人。《后汉书》记载亦同。对此，自裴松之以来许多人提出疑问，以为曹操起兵以来，军队陆续扩充，不应如此之少；曹操指挥虽然高明，也无法以数千兵力抗击十万袁军，更无力在胜利后坑杀七万多袁军。这些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是史书记载凿凿，不只一处，无有力证据，难以推翻。笔者以为，曹操此时总兵力大约为数万，但曹操境内形势不稳，需在许都等各要地留兵，稳定整个局势，又需留出预备队，所以官渡才有“兵不满万”之说。“不满万”不是指曹军全部兵力，仅指留在官渡前线曹军精锐的战略机动作战部队而言。军事筑城在三国时期的防御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曹军是可以依托其官渡筑城工事，以劣势兵力阻击绝对优势兵力的袁军的。这样的战例，在三国时期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如郝昭守陈仓城，以数千兵力敌诸葛亮数万之兵昼夜攻战，也是以十分居一之众，坚守20天，成功地迫使诸葛亮退兵的。

以高官招诱豫州各郡，很多郡县接受任命。七月，汝南郡黄巾刘辟等倒向袁绍，一度略地到许都附近。袁绍又派刘备率兵前来袭扰，支援刘辟，郡县纷纷举兵响应。刘备略地汝、颍间，自许都以南，吏民惶惶不安。孙策也有偷袭许都的企图。

在危急形势下，曹仁分析后方形势，认为刘备兵临城下，许都以南各县认为我无法分兵相救，因而背叛，是合乎情理的。刘备才统率袁绍兵，还不能得其所用，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击败他。曹操令曹仁率骑兵回后方安定局面。在作战中，刘备统领袁绍兵时间不长，指挥不灵，被曹仁击败。曹仁收复叛变各县。刘备交回袁绍兵，并企图脱离袁绍，劝袁绍南连刘表，委派其率领本部兵再度袭扰汝南，袁绍同意。刘备迂回到汝南，联合当地民兵龚都等，共数千兵，杀了曹操派来进剿的蔡阳。刘备两度入豫，都达到袭扰曹操后方的目的，但实力不足，不能夺取豫州。袁绍又令偏将韩猛① 切断曹军官渡以西通道，曹仁在鸡洛山（今河南密县东北 50 里）进击，大破韩猛。从此，袁绍不敢分兵再出。

在官渡前线，曹操剩下一个月粮食，外无救兵，部队疲劳，有的将领同袁绍暗通消息。曹操几乎不能坚持下去，写信给荀彧，商议退守许都。荀彧认为，战局发展到了关键一步，不但曹军十分疲劳，袁军力量也接近用尽。在此关头，谁先退却，谁陷入被动。复信说，袁绍全部人马集中在官渡，企图与您决一胜负。您以极弱对抗极强，如果不能制服袁绍，一定被他所欺，这是天下局势发展的大关键。又引历史经验说，现在军粮虽少，没有楚、汉荥阳、成皋相持期间那样紧张。那时刘邦、项羽谁也不肯先退，先退态势必屈。您用十分之一兵力，画地而守，扼住袁绍咽喉，使他无法前进，已经半年。“情见势竭，必将有变”②（袁绍虚实暴露，兵势衰竭，局势必将发生变化），正是用奇时机，不可丧失。曹操

---

① 韩猛的名，写法不一。〔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作韩猛，《三国志》卷九《曹仁传》作韩荀，卷十《荀攸传》作韩奭。

②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

向参军贾诩问计，贾诩认为反攻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您聪明胜过袁绍，勇敢胜过袁绍，用人胜过袁绍，决断军机胜过袁绍。有这四胜，半年不能决胜，是顾到万无一失。如果决心在关键时刻决胜，短时间内大局即可决定。

三、乌巢烧粮举行反攻

第三阶段，是曹军举行反攻。曹操决定不退却，在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快捕捉战机，转入反攻。他安慰运粮官说，再过半个月为你们打败袁绍，不再辛苦你们了。这时荀攸报告说，袁军运粮车将到，运粮将韩猛勇锐而轻敌，如果袭击他的粮车，一定能够获胜。曹操令徐晃、史涣截击。二将在袁军右翼侧后的故市（今河南荥阳东北），烧毁韩猛粮车数千辆。十月，袁绍又派运车大规模运粮，令淳于琼等五将率领万人北上迎接，淳于琼等护送运车在袁绍大营以北 40 里的乌巢（今河南封丘以西 7 公里）宿营。沮授认为上次粮草遭到袭击，这次粮草更多，关系到全军安危，建议令蒋奇部赴乌巢外围掩护，袁绍不听。这时，袁绍谋主许攸叛逃。许攸贪财，得不到满足，后方家属犯法，又遭到审配扣押，一怒之下，投奔故人曹操。曹操深知通过许攸可以获得袁绍的内情，不及穿鞋，赤脚出迎，拍手大笑道，子远（许攸字），你来，我的事就成了！许攸密报说，袁绍辎重车万余乘在乌巢，屯军戒备不严。可以用轻兵前去偷袭，出其不意，烧掉粮草，不出三天，袁军自败。对许攸献计，曹操左右十分怀疑，荀攸、贾诩则劝曹操听从。

曹操相信和果断采纳许攸计策，并立即实行，企图偷袭乌巢焚烧袁军全部储备粮草，造成袁军信心动摇和混乱，得手后，作为反攻突破口，迅速在有利条件下决战。鉴于偷袭乌巢，是反攻关键，曹操留曹洪、荀攸坚守官渡营垒，亲自率 5000 精锐步、骑兵前往偷袭。沿途冒用袁军旗帜，人衔枚马缚口，每人带一束柴草，连夜抄小路行军，谎称袁公怕曹操抄略后军，派他们到后方

加强防备，骗过袁军盘查。到达目的地以后，包围淳于琼营，大肆放火，制造护粮袁军的惊慌混乱。拂晓，淳于琼望见曹军人少，企图邀功，出营迎战，不利，退回保营，曹操挥军殊死作战。左右报告说，袁绍增援骑兵逼近了，请分兵防御。曹操发怒道，敌人冲到我背后，再报告。于是集中兵力死战，大破淳于琼，烧毁了乌巢全部粮草，斩淳于琼等，割下袁军千余人的鼻子及牛马唇舌，送到袁军大营，进行恐吓。袁军果然都很恐慌害怕。

袁绍对乌巢防卫及曹营坚固估计不足，得悉曹操偷袭乌巢后，采纳郭图进攻曹操本营的建议。对袁谭说，就曹操外出，我攻下他的本营，使他无处可归。令高览、张郃等执行这一任务。张郃指出，曹操率领精兵前去，一定能攻破淳于琼，淳于琼战败，大事就完了，请先去增援，曹营坚固，一定攻不下。袁绍不听，仅以轻骑兵增援淳于琼，而以张郃率重兵攻击曹操本营，张郃力战不克。郭图发现自己献计错误，企图委过于张郃，向袁绍进谗说，张郃失败了还很高兴。张郃等又气又怕，烧了攻城器械，到曹操营中投降。留守的曹洪怀疑其诚意。荀攸说，张郃计策不被采用，一气之下前来，你有什么可疑的？曹洪才受降。

曹操乌巢得手回营后，根据张郃投降等征候，判断袁军陷入混乱，立即发起全面反攻。袁军听说乌巢粮草被烧，张郃投降，军心混乱，士无斗志，在曹军攻击下全线溃败。只有袁绍率领800名骑兵仓皇渡过黄河，其余在曹军包围下，前无进路，后有黄河，都投降了。曹操要收编降兵，无粮可供应；要放回，担心又回到袁绍处，竟指为伪降，全部坑杀。沮授不肯投降，也被杀了。

四、曹胜袁败的原因

官渡之战，从建安五年二月开始，到十一月结束，历时9个月。它是汉末群雄混战和三国形成两个阶段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争中的第一次大战，也是曹操统一北方之战中最重要一战。这次战争中，曹军取得据称前后歼灭7万袁军精锐部队的胜利，分

出袁、曹两大集团的高下，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从此，曹操结束了战略内线的作战，北方已经没有任何割据者能够与他匹敌。这次战争，又是在北方平原上进行的坚固阵地防御战，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在战争中，曹操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大获全胜，原因是多方面的。曹操政治上挟天子而令诸侯，具有以顺讨逆的优势；经济上扶植自耕农，发展农业生产，使包括关中在内的人民得到实惠，逐渐支持曹操；实行屯田，缓解了军粮供需矛盾，安定了社会生活。就战争指导而言，则是殚精竭虑，正确掌握和处理了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1、战前准备比较早比较充分。其中大胆冒险东征刘备，尤为关键，此举避免了在官渡之战中陷入两面作战。否则，刘备在袁、曹战争中，率其新得的数万兵力偷袭许都，将动摇曹操根本。曹操在袁绍、刘备夹击下必败无疑。

2、在绝对劣势情况下，夺取退却主动权。退却前主动出击，取得白马、延津初战大捷，尔后从容地完成退却。选择退却终点时，强调阵地因素，并在战前筑城，弥补阵地上障碍物的不足。

3、在战争转折关头，咬紧牙关坚持住。相持阶段后期，袁军由于疲劳、弱点暴露、不断犯错误，力量被大大削弱，战争进入转折关头，曹军也到了最难于坚持下去的时刻。这时稍有动摇后退，必被袁绍大军所乘，一败涂地；坚持下去，则抓住了反攻的绝好时机。曹操听从荀彧劝告，放弃退守许都的错误企图，咬紧牙关，绝不示弱，从而抓住了全战指导中最吃力的地方，抓住了胜败转折的关键。七年后，曹操仍然念念不忘，表奏献帝说，荀彧不同意我退守许都的想法，陈说宜于坚守之利，赞许反攻的谋划，启发了我，改变我愚笨的想法，终于取得歼灭性的胜利。荀彧深明胜败的关键，谋略之高，世所罕有。

4、以深入袁军后方烧毁其全部粮草，揭开反攻序幕。由此诱发袁绍的错误处置和张郃的投降，使得袁军军心动摇混乱，巧妙地收到瓦解袁绍全军的奇效，为决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乌巢烧粮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以孤注一掷的极大勇敢，置背后袁

绍援军于不顾，兵力使用上坚决集中不分散，保证了一鼓作气攻下乌巢。

5、指挥风格上，善于听取和吸收部属的正确意见。明智、虚怀地采纳荀攸佯攻延津、荀彧坚持危局等建议，深信许攸袭击乌巢的奇策，策得即行，应变无穷。后来吴国建武中郎将胡综对此深加赞扬说，从前许子远舍弃袁氏，投靠曹氏，他为曹氏出谋划策，分析利害关系，都被采纳接受，终于打败袁氏军队，从而奠定曹氏基业。假如曹氏不相信许子远，怀有疑心，犹豫不决，不能在心里拿定主意，那么现在的天下就归袁氏所有。

袁绍以绝对优势兵力，遭到惨败，主要是政治、经济政策失当，纵容豪强恣意横行，亲戚兼并土地，造成百姓贫弱，引起人民反对。在作战指导上，战前准备不如曹操充分。在战前曹操东征刘备、侧后暴露时，未能偷袭许都，陷曹操于两面作战，是极大失策。在官渡之战的部署上，未能出奇兵袭击许都，迎取献帝，反而使用10万大军于一个方向，一线平推，被阻遏在曹军预设的官渡战场上，使得大军在济水与官渡水之间的狭窄地域上无法展开，陷优势兵力于难以发挥作用的境地。在战局关键时刻，对军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事前否定派蒋奇防守乌巢翼侧的建议，事后又不以强大兵力去增援，关键时刻处置失当。对于沮授、田丰、许攸等正确建议，不知采纳，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如此拒谏饰非，刚愎自用，怎能不败?

第三节　曹操开始进攻河北

一、进攻河北决心的形成

官渡战后，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有利于曹操的重大变化。在北方，袁绍集团由于投入官渡战争中的战略机动部队大部被歼后得不到及时补充，受到重大打击，士气不振，处在失败情绪的笼

罩下。在南方，形势总的也有利于曹操。曹操开始控制了扬州。官渡之战期间，曹操派严象接任袁术扬州刺史遗缺。严象被孙策庐江太守李术所杀，庐江梅乾、雷绪、陈兰各自聚众数万，在江淮间割据，形势对曹操不利。但曹操令刘馥继任扬州刺史后，刘馥单马来到九江郡，在合肥（今属安徽）空城建立州治，招降梅乾、雷绪等，招回从江东回归的人民以万计，广开屯田，兴修水利，使官民都有了积蓄，又尽可能多地储备木石，作好战备。几年之间，巩固了政权。曹操面临的江东威胁也解除了。因为企图偷袭许都的孙策遭到暗杀，其弟孙权继业，江东正经历着政权交替的危机。荆州的形势似乎不利于曹操。割据荆州的刘表，一方面在袁、曹间保持中立，一方面乘袁、曹交战之机，平定该州响应曹操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叛变，地方扩大到千里，带甲兵士发展到10余万。刘表尽管得到大发展，但实际上在袁绍战败后，荆州的战略地位削弱了。

在此有利形势下，曹操探索向何处用兵。建安五年年底，他企图进兵江东。侍御史张纮劝阻说，乘人丧事发动进攻，是不符合古义的；如果不胜，反而结了仇，不如厚待江东。张纮原是孙策智囊，后来被曹操征调到许都作官。曹操鉴于战后河南的叛县还没有收复，过江进兵江东的准备也不充分，采纳张纮意见，对江东采取安抚政策，表奏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承认他占有江东。建安六年三月发生春荒，曹操到安民（今山东东平东南20公里）就谷。曹操又认为袁绍被打败不久，不敢轻举妄动，企图南下进攻刘表，但荀彧不赞成让袁氏获得喘息。他指出，现在袁绍战败，部下离心，应该利用其困境平定他们。这时反而企图背向兖、豫，去远征荆州江汉平原。如果袁绍收集残余力量，乘虚出现在我后方，则你的事业就完了。在荀彧的帮助下，曹操认识到对南作战的极大危险，放弃了这一计划，决心首先进攻河北，在战略外线作战中消灭袁绍集团，统一整个北方。

曹操据此进行了灭袁的准备。建安六年四月，曹操北上黄河，大破袁绍黄河南岸渡口仓亭（今山东阳谷北古黄河岸上）守军。九

月，回到许都，养威待衅，并南征在其后方骚扰的刘备，防止其伺机再起。刘备听说曹操亲自前来，南下投奔刘表；其余龚都等部自动溃散。曹操用半年时间，安定了曹占区。这时已无人再能牵制其后方，曹操获得专心一意统一河北的保障。

形势发展进一步有利于曹操。建安七年（202 年）五月，袁绍败后忧虑过度，病情恶化，吐血而死，袁氏集团出现分裂危机，分裂起因在于袁绍生前处置失当。在战胜公孙瓒后，袁绍让儿子各据一州：长子袁谭据青州，第二子袁熙据幽州，外甥高干据并州，最宠爱的幼子袁尚留在身边，以培养和观察各人才能。当时遭到沮授反对，认为这样作名分不定，将引发争位，酿成大祸之源，袁绍不听。死后，袁氏集团根据立长子的传统，属意于袁谭。谋臣审配、逢纪同辛评、郭图争权，害怕袁谭统事以后，接近袁谭的辛、郭成为自己的祸害，以袁绍喜爱幼子为根据，在邺城抢先拥立袁尚。袁谭从青州赶到邺城，只能接受既成事实，不能被拥立。他自称车骑将军，同袁尚产生严重隔阂。这时，内部不和削弱了袁氏集团实力，曹占区获得安定，粮食困难由于当年收成较好而缓解，对袁氏集团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黎阳之战

建安七年（202 年）九月，曹操率军渡过黄河，进攻黎阳（今河南浚县），开始了统一河北的作战。黎阳位于黄河北岸，东汉在此处驻军，称为黎阳营，是军事重镇，也是袁占区的锁钥。袁氏集团企图固守黎阳，挫败曹操的进攻，其部署是：以袁谭防御黎阳，以袁尚驻守邺城，为其后援。但是在战前准备中，袁氏余部却爆发了谭、尚争权的斗争。袁尚只给黎阳很少的军队，派逢纪前来助战，实为监视。袁谭请求增兵，审配等人商议不给，袁谭大怒，杀了逢纪。曹操进攻黎阳以后，袁谭告急，袁尚既想分兵增援，又担心袁谭得到增兵后实力增强，决定留审配守卫邺城，亲自前往增援。曹操在城南筑城，同袁军在黎阳城下大战，袁尚、袁

谭不敌，退入城中固守。

袁尚为了牵制曹操对黎阳的进攻，令他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干共数万兵力，联合匈奴南单于部，合攻曹操河东郡（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造成曹操的后顾之忧。郭援等联络关中马腾等众将共同反曹，马腾秘密答应。曹操在河东被攻、关中不稳的形势下，决心坚持攻黎阳城，并打破对河东郡的进攻，首先击破在河东孤立突出的匈奴南单于部，然后击退其余，同时安抚马腾等关中众将不叛。

曹操令司隶校尉钟繇率兵北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10公里）围攻匈奴军。钟繇尚未攻下平阳，郭援已经率兵进入河东，所过城邑无不攻克。钟繇众将见郭援兵势强盛，建议从平阳退兵。钟繇不肯，指出袁尚正强盛，郭援兵临河东，关中众将暗中同他勾结，所以没有全部叛变，只是顾及我的威名。我如果解围退却，向他们示弱，那连所在的民众在内，谁不是仇敌呢？即使想退，也退不回去，这是未战自己先败了。而且郭援刚愎好胜，一定轻视我军，如果他渡汾水宿营，我利用他半渡时出击，可以获得大胜。不久，形势开始好转。关中方面，马腾在参钟繇军事张既等人劝说下，重新站到曹操一边，派儿子马超率兵迎战郭援。河东方面，郭援进入后，果然贸然渡汾水，众人劝阻不住。郭军渡河还没有到达河心，钟繇等出击，大败郭援。校尉庞德斩郭援，钟繇见首级大哭。庞德致歉，钟繇说，郭援虽然是我外甥，乃是国贼，你有什么可道歉的呢？于是袁尚牵制曹操的行动失败。

建安八年三月，曹操再度对黎阳发起攻击，袁氏兄弟出城迎战，大败，无力守城。在曹操合围前，连夜向北逃去，曹操占领黎阳。

曹操攻黎阳之战，从建安七年九月到次年三月，历时半年，是曹操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战，也是与河东战场相互配合的一次攻坚战，首战告捷，振奋了士气，证明曹操整体实力上占据优势，打开了通往邺城的门户。

第四节　夺取冀青幽并

一、夺取邺城的决心

曹操攻占黎阳后，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决心夺取袁氏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邺城。建安八年（203年）四月，兵临邺城，首先收割城郊熟麦。袁尚、袁谭合力出城迎击，战败曹军。① 曹军虽败，士气不减，众将要求继续攻城，唯有郭嘉反对。他经过总结战败教训，认识到邺城之战促使袁尚、袁谭兄弟停止争夺、重新团结，对曹军不利，提议退兵。指出袁绍喜爱这两个儿子，生前没有确立由谁来继承。郭图和逢纪作谋臣，必定在袁氏兄弟间交相争斗，还要相互离间。"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②（急攻他们，将同我相持；缓攻他们，然后内部争斗的心就会萌生），我军不如南下，佯攻刘表，以等待二袁矛盾的变化。变化生成以后，进击他们，可以一举平定。五月，曹操以贾信留守黎阳，率大军回到许都。八月，进驻西平（今河南西平西50公里），佯击刘表。

曹军退兵后，二袁矛盾重新激化。袁谭对袁尚说，我铠甲不精，所以在黎阳战败。现在曹军退兵，人怀归志，乘其还没有渡过黄河，出兵掩击，可令其大败，此计不可失。袁尚怀疑他别有企图，既不增兵，也不给更换甲胄。袁谭大怒。郭图、辛评乘机挑拨，袁谭便率兵攻击袁尚，战于邺城外郭城门，大败，退回南

---

① 曹军战败的根据是：1、《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列传》"尚逆击破曹，曹军还许。"2、《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列传》刘表谏袁谭书："摧严敌于邺都"。3、此次战后，曹操发布《己酉令》"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应是针对此次战败，有所为而发。《三国志》的《武帝纪》和《袁绍传》不书败，是为魏人讳言。

② 《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

皮（今河北南皮北8公里）。青州别驾王修率吏人来救袁谭，建议他斩佞臣，兄弟相亲，说如此仍可横行天下，袁谭不听。袁尚来进攻，围城很急，袁谭又大败，奔逃到青州平原郡。郭图献策联合敌人消灭自家兄弟说，现在将军地小兵少、粮缺势弱，袁尚来攻，战事持久，必然不敌，可以呼叫曹操来击袁尚。曹操兵到，必先进攻邺城，袁尚回救。将军率兵西进，邺城以北都可以占领。如果袁尚战败，又可收集他的散兵抗击曹操。曹操侨军远来，粮饷不继，一定退走，赵国以北地区都可以归我所有，完全可以同曹操相抗衡。袁谭始则犹移，终于同意，派颍川人辛毗前往曹操处游说。刘表写信给袁谭、袁尚劝和，二袁都不听。

就二袁相争、辛毗请援、应否回兵北上灭袁问题，曹操征询僚属意见。多数认为，应该先平定强大的刘表，二袁不足忧。荀攸鉴于最大的危险来自袁氏余部，而现在的时机，对于消灭袁氏集团很有利，坚持北上的初衷。指出天下正有战事，刘表坐保长江、汉水之间，可知没有征服四方的志向。袁绍据有四州土地，带甲精兵10万，以宽厚赢得士众。如果两个儿子和睦守业，那么天下的灾难，还完不了。如今兄弟交恶，其势不能两全。如果发生兼并，则力量专一，就很难图谋。乘二袁内乱攻取他们，天下就平定了，这个时机不可丧失。曹操同意，但几天以后改变主意，仍然企图先平定荆州，使袁尚、袁谭继续自相削弱。辛毗在宴会上望见曹操的神色，情知有变，通过郭嘉询问曹操。曹操问辛毗，袁谭可信任吗，袁尚可打败吗？辛毗答道，明公不必问是可信还是狡诈，径直论形势就行了。袁氏本是兄弟相互征伐，认为别人不能离间他们，天下可定于袁家。现在向明公求救，其势穷可想而知。袁尚明知袁谭困穷而不能战胜他，说明力量已经用尽。兄弟相斗，国分为二，连年战争，饥荒接连而至，百姓不分愚智都知道袁氏将要土崩瓦解。老天把袁尚给了明公，明公不攻取，却要讨伐荆州。荆州富裕安乐，没有动乱。仲虺有句话叫作：取乱侮亡（攻取乱者，欺侮亡者）。现在二袁不作长远打算，内部相图，可以说是乱；居住的人没有食物，出行的人没有干粮，可以说是

亡。此时不去安抚，他年也许粮食丰收，二袁又觉悟到将亡而实行德政，那就丧失用兵的要义了。

二、邺城之战

曹操决定利用二袁粮食歉收、袁谭求救、袁尚势孤力竭的有利形势，再次进攻邺城。十月，北上黎阳，为儿子曹整娶袁谭女儿，两家确定联合抗击袁尚。袁尚听说曹操北上，撤出对袁谭的围困，回到邺城部署防御。曹操为了保障粮食运输畅通，在战前准备中，首先沟通粮道。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曹军渡过黄河，在淇水入黄河口下大枋木作堰，迫使原来流入黄河的淇水（在今河南北部），改道注入白沟①，形成一条从黄河北上通向邺城的水上粮道。

二月，正当曹操准备进攻邺城时，袁尚率兵北上攻击袁谭，仅留苏由、审配守邺城。于是邺城兵力削弱，曹操迅速进兵该城，形成与袁谭一南一北夹击袁尚势力的有利态势。曹操进攻邺城，作战第一阶段，是里应外合，速战强攻。邺城地大人多②，城坚防密，难于攻陷，曹操企图通过里应外合取胜，并争取到守将苏由归顺。曹军离城50里时，苏由密谋泄露，同审配在城中展开战斗，战败，出城会合曹操。曹操第一次里应外合计划落空以后，一边继续策反，一边堆筑土山，开挖地道，展开强攻，审配在城中挖堑破坏曹军坑道。曹操又争取到审配将领冯礼归顺，冯礼打开突门，放进曹军官兵300多人，被审配发觉，从城上用大石头砸突门的中栅门，中栅门封闭，冲进来的曹兵全部覆没。

---

① 在今河南浚县西，发源处接近淇水东岸，东北流下接内黄以下的古清河。

②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七《设官部·吏》引《魏武选举令》："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千户"。中国书店影印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重刊影宋本，1989年7月版。

第二阶段，扫清外围，长期困城。一个多月的强攻未能奏效后，曹操转而企图孤立邺城。四月，留曹洪攻城，自己分兵组成扫外围部队，进攻邺城以西的毛城，切断上党粮道，转攻袁尚将领沮鹄，占领邺城以北的邯郸。在曹军的兵威下，邺城西部涉县、北部易阳的县令、县长举县投降。为了争取未降的众城，曹操给他们赐爵奖赏。邺城以西的黑山军帅张燕主动要求助战，也封为平北将军。曹操扫清外围后，邺城粮道被切断，同外界的联系遭到破坏，成为一座孤城。曹操回到攻城前线。五月，毁掉强攻用的土山、地道，在城外四周开凿堑壕40里，准备长期困城。凿堑壕时，命令浅凿，显示可以越过。审配望见壕浅，发笑，不出兵破坏。曹操一夜间挖成深壕，广深二丈，引来城西北的漳水灌壕，严密封锁邺城。城中饿死的人过半。

第三阶段，打援破城。七月，邺城被攻达5个月，袁尚担心有失，中止攻击袁谭，率万人回援。曹方众将认为，袁尚是归师，人自为战。兵法有"归师勿遏"的原则，不如避其锋芒。曹操说，袁尚如果从大道来，应该避让他，如果从西山（指邺城以西今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太行山脉）来，就要作俘虏了。袁尚果然从西山来，曹操大喜，对众将说，我已经得到冀州了，诸位现在不明白，不久将会见到的。原来他判断，走大道表明袁尚回救心切，有必死斗志；从西山来表明依险自保，兵士不肯卖命，于是曹操定下以打援为主的决心。

袁尚进至距邺城17里处宿营，夜间举火同城中联系。城中举火呼应，审配从城北出兵，与袁尚兵力对进，企图突围。曹操分兵迎击，城中败回，袁尚也败走，依托曲漳设营。曹军企图包围袁尚军，尚未合围，袁尚求降，曹操不听。袁尚逃到滥口，曹军追击，包围袁尚，袁将马延等临阵投降，袁尚军大溃败，袁尚单骑向北逃到中山国（治卢奴，今河北定州）。曹操缴获袁尚全部辎重，兜鍪19620枚①，还有印绶、节钺及衣物，向城中出示，城内

---

① 《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兵部·兜鍪》引《魏武帝上事》。

顿时崩溃沮丧。审配下令坚守死战，说曹军目前已经很疲劳，袁尚虽然战败，幽州袁熙将会到来，我们何愁无主。但是守东门的审配兄子审荣，夜间打开城门，放进曹军。曹军同审配在城中大战，生俘审配，攻占邺城。审配神情壮烈，不肯屈服求饶，见到的无不叹息，曹操下令斩了审配。

攻邺城之战从二月开始，到八月结束，持续半年，歼灭了袁尚部，攻占了袁氏集团割据的中心邺城，是官渡战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曹军作战的特点，是争取内应、攻城、扫清外围和打援相结合。通过扫清外围，使邺城成为孤城，又确立以打援为主的方针，通过歼灭来援的袁尚军，使得城中绝望瓦解，从而保证了迅速攻陷该城。

九月，曹操下令免收当年河北租赋，改革袁氏弊政，“重豪强兼并之法”①，百姓都很喜悦。鉴于冀州比兖州富裕，曹操兼任了冀州牧，把治所迁往邺城，并辞去在兖州的职务。

三、夺取冀青幽

邺城陷落以后，袁氏集团遭到极大削弱，进一步分裂为三股势力。其中，袁谭据有冀州东部、北部和青州一部，在三股势力中最强，在曹操此次进攻邺城期间，叛变曹操，乘机攻占袁尚甘陵、安平二县和勃海、河间二国，在袁尚逃到中山以后，又进攻他，兼并了他的部队。袁尚被迫逃到幽州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投靠袁熙，但袁熙远据幽州，最弱。高干据有并州，在邺城陷落后投降了曹操，仍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在袁氏余党日益衰落的形势下，曹操决心先消灭袁谭，次及袁熙、袁尚，逐一扫荡袁氏余党，统一冀、青二州未占领地区和幽州。

曹操根据消灭袁谭决心，写信责其违约，把其女儿送回，断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绝婚姻关系，然后进兵。袁谭退守黄河渡口龙凑（今山东平原县东南）。十二月，曹操进军龙凑，在袁谭城门下安营。袁谭不战，退至南皮（今河北南皮以北 8 公里），固守城西清河边。曹操乘势向东进攻平原郡，夺取各县，统一青州。建安十年（205 年）正月，曹操回军围攻南皮袁谭，作战失利，伤亡较重，企图退兵缓攻。参司空军事曹纯说，现在我军来到千里以外同敌人作战，不能在前进中攻克敌人，反而后退，定会失掉军威；况且我孤军深入，难以持久。现在袁军由于胜利而骄傲，我军由于失败而戒惧，以戒惧之师敌骄傲之旅，一定可以攻克。曹操同意，挥军急攻。两军尚未合战，袁谭军已经败退。袁谭披发骑马狂奔，从马上掉下，回头对追兵说，你放过我，我能使你富贵，话未说完，头已落地。于是曹操杀郭图等，统一了冀州。

袁谭被消灭以后，袁氏集团只剩下割据幽州的袁熙，势力更加衰落，出现解体趋势。建安十年（205 年）正月，曹操平定袁谭的消息传到了幽州，人心动荡，袁熙部将焦触、张南反戈攻击袁熙、袁尚，陈兵数万，杀白马盟誓，胁迫各郡县太守、县令背叛袁氏，倒向曹操。焦触、张南被曹操封为列侯。四月，黑山军张燕率 10 余万归降，也封为列侯。袁熙、袁尚势穷出奔，投靠辽西乌桓。袁熙出逃后，幽州一片混乱，故安人赵犊、霍奴等杀幽州刺史和涿郡太守。三郡乌桓在犷平（今北京密云水库北）攻击汉左度辽将军鲜于辅。为了扫清割据势力、统一幽州，八月，曹操北上作战，杀赵犊等，远渡潞水（今北京通县以下白河），救出犷平鲜于辅。乌桓逃向塞外，曹操统一幽州大部。

四、平定并州河东叛乱

当曹操北上幽州作战时，后方发生或明或暗的叛变。并州刺史高干过去归降是为形势所迫，现在劫持上党太守，举兵拒守壶关口（今山西长治东南壶口山下）；河内人张晟率万余人占据崤、渑间（今河南西部），南联刘表，并得到弘农人张琰起兵响应；河

东郡望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暗中同高干通谋。这些叛乱势力不仅隔断了曹占区同关西的联系，有向关中蔓延的趋势，而且威胁着曹占区的稳定。

曹操在统一幽州以后，开始平叛。这时在分裂势力所占地区中，河东郡被山带河，地势险要，处在并州叛变者和关西众将之间，最为关键。曹操认为，该郡已成为“当今天下之要地”①。鉴于河东分裂势力表面上还承认曹操，决心首先以稳定河东为重点，以便切断高干与关中众将间的通道，同时平定并州叛乱。其部署是：以乐进、李典进攻高干，以杜畿任河东太守，寄以萧何之任，其任务是制止该郡分裂倾向。

河东分裂势力卫固暗中抵制杜畿，以数千兵力封锁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郊附近）黄河渡口，使得杜畿几个月来无法渡河赴任。曹操派夏侯惇前来征讨。杜畿企图先分化河东，再实施打击。他向当地只想依赖大军平叛的人指出，河东郡有 3 万户，不是都想叛变。大军威胁河东如果过急，想要从善的人，没有人为其作主，会由于害怕而听从卫固，卫固等人势力集中，一定会死战。卫固没有公开拒绝朝廷命令，对外只是以请回原来的太守为名，想必不会加害新任太守。我决定出其不意单车前往。卫固多计谋而无决断，一定假意接受我。我能在郡中以计束缚他，一个月足够了。因此大军尚未到达，他就绕道赴任，卫固等果然认为，杀杜畿对敌人无损，对自己则会落个不好的名声，企图控制杜畿，便接受了他。杜畿一面对范、卫声明说，你们是河东望族，我仰仗成功而已，但大事要同我商议；一面在暗中争取统一势力、孤立分裂势力。卫固企图大规模征兵。杜畿劝阻说，这将引起百姓混乱，不如慢慢用钱募兵。卫固接受意见。众将贪婪，招募中上报空名多，送来的新兵少。杜畿又劝卫固说，人情恋家，可以允许众将掾吏回家轮休，紧急有事，召集不难。卫固等不愿违背众人，又照办了。于是不愿分裂的人在外，暗中成为外援，支持卫固的恶人分散，都回到了家

① 《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

中。这时反曹声势较猛，张白骑、高干攻入河东郡，西邻上党郡各县杀县长、县吏，南邻弘农郡扣押太守。卫固也秘密调兵，企图乘机称兵反曹，但各县没有应召前来的。杜畿知道各县归附自己，率领数十名骑兵离开郡城，到张辟拒守。很多吏民以全城支持杜畿。几十天后，集结到4000余兵。卫固联合高干、张晟，攻击杜畿。由于杜畿兵少，曹操又征调关中马腾等众将前往会击，斩卫固、张晟等，赦免余党，把高干以外的叛乱都平定了。

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曹操以世子曹丕守邺城，亲自率兵进攻高干。三月，围降壶关（今山西长治以北）。高干亲自到匈奴求救，匈奴不救。高干与数骑逃亡，途中被捕杀，并州全部平定。至此，袁氏集团只有袁尚、袁熙率少数兵力逃往乌桓，其余全部被歼。曹操夺取了冀、青、幽、并四州，基本统一了北方。八月，在青、徐间海上割据的管承和新叛变的昌豨也被讨平。

曹操从建安七年九月进攻黎阳、进入外线作战开始，到十一年三月平定并州叛乱结束，历时3年零7个月，取得了歼灭袁尚、袁谭、高干军事力量，占领冀、并、青、幽，统一河北的重大胜利。他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之处，主要是：1、不给袁氏集团以喘息的时间，根据取乱侮亡的原则，坚定不移地以河北为作战方向。2、针对袁绍身后诸子争位的有利形势，对袁氏集团进行分化瓦解，创造了“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的经验。利用矛盾，欲擒故纵，耐心等待，坐收渔利，用力小而获大功。3、在第二次邺城之战的攻坚战中，根据各阶段不同的情况，灵活地采用里应外合、扫清外围、长期困城、打援攻心等多种方式，保证了最终攻陷该城。

第五节　北征乌桓

一、北征乌桓的决心和准备

乌桓是东胡族的一支，秦末迁往乌桓山（在今大兴安岭南

端），因以山得名。汉武帝以后，乌桓归附汉廷，一部分迁至幽州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地区，五郡乌桓各有首领。聚居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地的乌桓最多，是为三郡乌桓。汉末世道纷乱，内地处于多事之秋，乌桓乘机占领大漠以南，攻掠城市，困扰内地边缘地带。初平中，辽西乌桓王丘力居死，蹋顿继位，总摄三郡。蹋顿骁勇武威，被当地老人比作秦代匈奴单于冒顿。他凭借山川阻隔、路途遥远，敢于接纳亡命之徒，在众多少数族中称雄。当北方四州被袁绍统一时，蹋顿率三郡乌桓服从了他，其名王（诸王中的著名者）受到宠遇，精锐骑兵被收编。当袁尚、袁熙前来投靠时，蹋顿企图帮助袁尚等恢复故地，乘机攻破幽州，多次侵入塞内，骚扰破坏。乌桓有从幽、冀州迁去的吏民10余万户，袁尚企图将其收编为兵，以备反攻之需。

曹操决心北征乌桓，彻底消灭袁氏残部，安定北方边境，并进行认真的准备。乌桓所在地距邺城2000余里，粮食运输艰难。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开凿了两条人工渠：一条从呼沲河（今河北滹沱河）挖到泒水（上游是今沙河，下游循大清河入海），名为平虏渠（南起今河北青县，北至天津西郊）；另一条从泃河口挖到潞河，称为泉州渠（南起今天津市区的海河，北至北郊宝坻县）。从邺城沿水路北上，粮食可直达右北平郡的无终（今天津蓟县）。

曹操集团对于北征乌桓看法不尽一致。众将认为乌桓贪婪，不讲亲情，不会为袁尚所用，顾虑曹军深入北上作战时，后方许都由于空虚，在刘备鼓动下，可能遭到刘表袭击。郭嘉向曹操指出，众将顾虑是多余的，北征很有必要，而且可行。明公虽然威震天下，但是乌桓仗着地处偏远，一定不加防备。突然袭击它，可以平定。况且袁绍对汉、夷民众有恩，袁尚兄弟还在，今天四州人民，只是迫于兵威才归附你，你的恩德还没有泽及，便放弃四州去南征，如果袁尚利用乌桓资助，招回其效死之臣，胡人一动，汉、夷民众群起响应，蹋顿因此萌生野心，形成觊觎中原的计划，恐怕青州、冀州就不再归我们所有了。刘表是个坐谈之客，自知才

能不足以驾御刘备。重用刘备，怕不能控制；轻用刘备，则刘备不为所用。即使我们后方真的空虚，也不值得忧虑。于是曹操决心北上，远征乌桓。

二、作战经过和胜利原因

建安十二年（207年）三月，曹操从邺城出发，北征乌桓。途中经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8公里）、无终，向辽西郡之柳城（今辽宁朝阳南15公里）前进。大军到达易县时，行程将近过半。郭嘉建议改为轻行军，以达成战略突然性。他指出，兵贵神速。现在千里袭击别人，辎重过多，难以争利，而且对方发觉，必定预作准备。不如留下辎重，轻兵兼程出击，掩其不意。曹操鉴于这次作战是到千里以外进行远征，粮食补给困难，背后有刘表、刘备，不宜持久，决心掩敌不意，速战速决，于是轻兵前进。五月，到达无终。原计划走无终一带的濒海道路（约相当今天出山海关的道路）。七月，雨季大水，由于濒海地区地势低洼，道路泥泞不通，又有乌桓拦守小路要害路段，大军无法前进。曹操深为忧虑，询问随军向导田畴。田畴是无终豪强，在群雄混战的乱世中，率领族人迁移到徐无山中（今河北玉田北10公里）居住，躲避世乱。曹操征乌桓，以礼征召他。他由于怨恨乌桓，欣然从命。田畴说，无终这条道路，秋夏常积雨水，积水浅不能通车马，积水深又不能载舟船，难以通行由来已久了。北平郡旧治平冈（今河北平泉），有一条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之潘家口）的道路，通向柳城。自从光武帝建武年间以来，陷落崩坏，隔绝不通，将近二百年了，但是还有小径可寻。现在乌桓必定认为，大军本当取道无终，由于无法前进退了兵，所以松懈不加防备。如果悄悄回军，从卢龙口翻越白檀县（今河北滦平兴州河南岸）的险要，通过塞北空虚地带，路途又近便，又能掩其不备，蹋顿的首级可以不战而得。

曹操接受建议，决定秘密改道以达成突然袭击。于是从无终

公开退兵，在路旁水边竖立大木牌，题署道：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等秋冬，再度进军。乌桓通过其侦察骑兵侦察到上述迹象，真的以为曹军远去，放松了警惕。曹操在田畴率其本部的向导下，率领大军上徐无山，直出卢龙塞，向塞外进军。塞外道路不通，曹军凿山填谷，拓宽500多里路面，通过平冈，东指柳城。在秘密行军中，达成了战略突然性。

曹军进至距柳城200里时，乌桓才发现。袁尚、袁熙、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率数万骑兵迎战。八月，曹军登上白狼山（今白鹿山，在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境），同乌桓军遭遇。乌桓兵多，曹军由于处在行军状态下，穿铠甲的战士少。曹操登高，望见乌桓军阵不整齐，令张辽为先锋，挥兵出击。在善战的勇将张辽的冲击下，乌桓军大败崩溃，蹋顿及名王以下临阵被斩，尸横原野，胡、汉投降的20余万人。辽东单于速仆丸和辽西、右北平郡乌桓酋豪丢下本族人，同袁尚、袁熙，带几千兵逃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曹军攻破乌桓根据地柳城。战后，有人劝曹操就近进击公孙康，认为可以使得袁尚兄弟一战而擒。曹操说，我将使公孙康斩送袁尚、袁熙首级，不烦劳军队了。曹操把护乌桓校尉阎柔所属的幽、并州乌桓万余落①，全部迁入中国内地，率领乌桓侯、王、大人及族众参与征战，由此三郡乌桓成为天下名骑。

九月，曹操从柳城退兵。途中，公孙康派人送来袁尚、袁熙和速仆丸等人的首级。众将有的问，你一回军，公孙康就斩送袁尚、袁熙，是何原因？曹操指出，公孙康一向畏惧袁尚等人，我急攻他们会合力反抗，缓攻他们会自相残杀，这是势所必然。当时天寒，而且旱，200里无水，军队又缺粮，杀马数千匹充作粮食，凿地深30余丈才见水。回军后，曹操下令开列劝谏北征者的名单。大家不知道原故，提过意见的人人害怕。曹操按名单厚赏，说我

---

① 落，指若干帐户组成的帐落群，每落约20余口。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9页。

前次出征，是靠着侥幸，去冒风险，虽然取得胜利，是上天帮助，不可以作为常法。诸位的劝谏，是万安之计，所以给赏，以后不要难于进言。十一月，大军到达易水，代郡乌桓代理单于普富卢、上郡乌桓代理单于那楼，率领其所部名王前来朝贺。建安十三年（208年）正月，曹操回到邺城，结束了北征。

曹操北征乌桓从建安十二年三月开始，次年正月回军，历时10个月。这次作战，是统一河北战争进程中的重要一战，消灭了袁氏残部，粉碎了他们东山再起的可能。同时，战胜了三郡乌桓，特别是决策率领乌桓军队参加他所从事的战争，不仅壮大了精锐的骑兵，对于巩固北方统一，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在乌桓军队脱离幽州以后，内地消除了骚扰，获得了安宁。由于解除了北顾之忧，曹操还形成一支更加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

曹操北征乌桓，又是一次远距离的奔袭作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情况下进行的。从曹操作战指导方面来说，获胜的关键在于：1、由于形势判断正确，敢于大胆地置背后刘表、刘备于不顾，深入北方边境地区作战；2、行军将近过半以后，敢于放下辎重，轻军倍道长途行军，途中在当地豪强的支持下，又秘密改道前进，欺骗迷惑了敌人，从而达成战略突然性；3、与乌桓军遭遇时，乘敌人阵形不整，以勇将为先锋，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夺取到胜利。

第五章　南方群雄的割据

（参见附图 1）

第一节　南方割据的形成

一、割据开始时南方的形势

南方是指长江、秦岭以南广大地区，汉末有益、荆、扬、交4个刺史部。南方人口稀少，地域广大，东南部河湖密布，多水网地带，西南部有大盆地。南方虽有长江通航之利，但是交通仍然不便，东西之间来往仅靠狭长的长江三峡，未能形成统一的经济区，而是分散为益州、荆扬和交州三个经济区。南方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河川径流量大，特别有利于农业生产；但是开发晚。以东南地区为例，农业生产的工具和技术都很落后，丹阳、会稽、豫章三郡连一处铁官都没有，秦汉时期仍旧停留在火耕水耨的较低水平。南方也形成豪强经济，出现一些豪强大姓，但总体上说势力不如北方强大，益州的又不如江东的强大。汉末，南方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进入较快发展的时期，主要是得益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阳、三辅人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关西人民数万家从子午谷流入汉中，孙策在扬州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①。迁移的人口，给南方带来了在中原积累的财富、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提供最紧缺的劳动生力军。南方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上升到新的水平。

东汉末年，南方地区各种矛盾激化起来。首先，人民和统治

① 《三国志》卷十三《华歆传》注引胡冲《吴历》。

集团的矛盾激化了，特别是益州先后两任刺史刘隽、郤俭贪婪残忍，胡作非为，受贿中饱，声名狼藉，造成民不聊生，怨声遍野。益州人马相自称黄巾，在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号召在频繁劳役下疲竭的人民起义，一两天发展到数千人。义军杀县令李升，吸收受压迫的吏和百姓参加，达到万余人，攻陷雒县，攻入州治，杀郤俭，转攻蜀郡、犍为，一个月内，连陷三郡，马相自称天子。接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激化了。在荆州，刺史王睿以长沙太守孙坚是武官而轻视他，讨董时又扬言将杀掉与己不和的武陵太守曹寅。曹寅以伪造的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的檄文，下达孙坚令逮捕王睿，行刑后上报。孙坚即率兵袭击王睿。王睿走投无路，吞金而死。在扬州，二袁和朝廷各自培植代理人，相互间矛盾重重。初平三年（192 年），刺史陈温去世后，袁绍以袁遗领扬州。袁术击败袁遗，自署陈瑀为刺史。次年正月，袁术在曹操追击下退到九江，陈瑀拒不接纳。袁术又驱逐陈瑀，自领扬州。兴平元年（194 年），朝廷任命刘繇为刺史，而袁术也自用其故吏惠衢为刺史。扬州出现了多个刺史的怪现象。

二、南方割据的形成

在朝廷鞭长莫及的形势下，南方较大的割据势力企图在乱世中称雄一方，太常刘焉比北方群雄略早开始割据益州。灵帝中平五年（188 年），黄巾起义已被镇压，各地兵乱仍然不止，人民与统治集团的矛盾还很尖锐。除了益州刺史郤俭的苛政引起马相起义以外，凉州刺史耿鄙、并州刺史张懿先后又被兵乱所杀。这种种事态引起朝廷震惊，决心在这一非常时期，改革原有制度，选列卿、尚书各以本秩出任州牧，以便形成州一级行政区划，拥有更多的政权、兵权，对付各地叛乱。刘焉是改制的建议者，首批出任益州牧。初平元年（190 年），北军中侯刘表出任荆州刺史，也拥有州牧的权力。二刘都是宗室，各以王命在州内拥有重兵，由于同朝廷所在的关中道路不甚通畅，实际上分别割据了南方两个

大州，并暗暗滋生称帝企图。

继二刘之后，又有张鲁割据汉中，孙策割据江东。张鲁是五斗米教主，他的教义体现人民渴望过温饱与平等生活的愿望。他同刘焉合作，依靠人民支持，雄踞了汉巴。孙策是袁术部将，吴郡武力强宗，依靠勇敢善战，于兴平二年（195 年）离开袁术，转战江东，攻占六郡。南方割据局面就此形成。

但是南方没有形成混战局面。由于没有统一的经济区，各州地域广大，交通不便，割据力量相对平衡，割据者大都只在州内忙于统一，在割据开始后的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基本没有发生州际兼并战争。直到建安中，割据江东的孙权，才进攻荆州江夏郡；但是很快又被南北战争打断了。因此南方割据者割据时间比北方多数军阀长，立足稍稳，社会相对安定。这对于他们发展经济、积蓄力量、在未来的斗争中联合防御北方的进攻，十分有利。

第二节　刘焉刘璋和张鲁割据益州汉中

一、刘焉刘璋割据益州

益州是东汉 13 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四川、云南全部，缅甸、贵州、陕西、广西一部，与北方和南方其他地区之间，隔着众多大山脉，交通不便，地势有利于割据。以成都为中心的核心地区蜀地，物产丰富，农田水利发达，可提供割据的物质基础。汉末割据益州的，起初是刘焉、刘璋父子。刘焉是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以西）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的后裔，被推举为贤良方正，历任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成为朝廷重臣。刘焉目睹灵帝政治腐败，四方兵乱，预感乱世将到。中平五年（188 年），他建议朝廷设置州牧，选择有清廉名望的重臣出任，以镇压四方，私下谋求外出作交趾（辖今两广、越南北部、中部）牧，企图以偏远地区的外任，躲避乱世。后来听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积极活动去益州成功，受到灵帝当面重托，出为监军使者、益州牧。到任不久，发生董卓之乱。刘焉企图在乱世中独霸一方，对外断绝同朝廷的联系，对内摆脱土著大族的挟制。关东州郡讨董时，刘焉也起兵，但是不与天下一起讨董，而是保州自守，也不应董卓以朝廷名义发出的征召。他联合张鲁，令其为督义司马，出驻汉中，怂恿张鲁断绝朝廷通往益州的道路，杀害汉使，阻止朝廷对益州的管辖；另一方面上书朝廷，报告说米贼断绝道路，自己无法同朝廷联系。刘焉就任益州牧时，益州存在三股较强的力量，即本地大姓及其代表土著官僚集团，起义的黄巾马相万余人和张鲁五斗米道。州从事贾龙攻破马相起义，势力强大，迎接刘焉进入益州。刘焉深感受到贾龙等土著大族势力的挟持。为了避开并制服蜀中巨室豪门，拒绝去他们势力较强的成都上任，而把治所移到了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他招纳反叛，联络五斗米道徒，在南阳、三辅等地来益州避难的数万户流民中招募，组建东州兵。又招募少数民族，组成善战的叟兵（也叫青羌兵），设立前、后、左、右四部司马，建立起自己直接控制的军队。

刘焉造成自己势力以后，托辞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10余人，建立威刑。土著豪强大族决定称兵反抗，初平二年，支持犍为（治武阳，今四川彭山）太守任岐进攻刘焉。刘焉击杀任岐。贾龙又在董卓支持下，率部分州兵攻击刘焉。刘焉以青羌兵还击，杀贾龙。通过这一作战，刘焉对土著豪强大族占了上风。刘焉是宗室，想当皇帝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他私造天子乘舆，准备御用的车马衣服器械百物。荆州牧刘表向朝廷揭露刘焉有怀疑朝廷的不法言论。荆、益从此产生不和。刘焉企图把献帝从李傕、郭汜挟持下摆脱出来，建立大功，以便实现其最终意图，因此积极参与关中割据的作战。刘焉到益州赴任时，三个儿子被留在朝廷任职，长子刘范任左中郎将，刘诞任治书侍御史，刘璋任奉车都尉。鉴于刘焉不应征召，献帝令刘璋前往劝说，刘焉强留刘璋不返长安。兴平元年（194年），某些朝官与刘范秘密联络凉州军阀马腾，令马腾袭击长安。刘焉也派遣校尉孙肇率兵5000北上助战。但是刘

范等密谋泄露，马腾战败，刘范、刘诞被捕杀。这时天火烧了刘焉的治所绵竹，刘焉蒙受火灾的惨重损失，又痛失二子，兴平元年（194年），把治所迁到成都就死了。

州大吏赵韪等贪图刘璋温仁懦弱，拥立为刺史。当时州牧没有父死子代的先例，朝廷拜颍川扈瑁为益州刺史。扈瑁在荆州别驾刘阖率兵护卫下，策反刘璋将领沈弥、娄发、甘宁等巴东豪杰，企图从荆州取道巴东强行入蜀。刘璋展开强行继任的作战。土著豪强赵韪为刘璋反击扈瑁等得胜。扈瑁无力入蜀，朝廷被迫承认刘璋为监军使者、兼益州牧。甘宁等败后投奔荆州刘表。

刘璋继任后，东州兵利用刘璋宽柔的弱点，侵暴生患，侵犯土著豪强大姓的利益。益州巴西人赵韪，是随刘焉一道入蜀的土著人，任征东中郎将，一向得到本地豪强的拥护。建安五年（200年），赵韪秘密串联对刘璋不满的州中大姓起兵，攻击刘璋，蜀郡、广汉（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北）、犍为三郡响应。刘璋驰入成都防守，进行平定益州赵韪的作战。东州兵害怕本地势力得势以后遭到诛灭，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大败反叛者，进军江州攻赵韪，赵韪将领庞乐、李异反过来攻赵韪军，击斩赵韪。刘璋对益州大姓又占了上风。①

刘焉预见到时世艰难，及早谋求“后亡之所”②，可谓见机而作；到任以后组建东州兵，联络五斗米道，建立自己的武装和势力，在益州站住了脚。依靠这支力量，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益州23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刘焉同益州土著豪强大姓关系紧张，造成割据的基础不牢。在此不稳的基础上，却希冀称天子，太无自知之明。刘璋依靠土著豪强大姓的拥立，在益州统事，不能约束东州兵，协调同土著豪强大姓的关系，遭到他们的反抗，尽管

---

① 刘焉、刘璋的作战，参见《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列传》，《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华阳国志》卷五《刘二牧志》，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五《刘二牧志》注。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列传》。

一时占了上风，矛盾并未获得根本解决，削弱了自己，同样造成割据的基础不牢。在如此不稳的基础上，加之软弱无谋，却在乱世中割据着大片的土地，处境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遇到外敌入侵，很难自保。

二、张鲁割据汉中

汉中是益州北部的一个郡，辖境相当今陕西南部汉中，中心地区是一个狭长的平原，东西长约 300 里，南北宽约数里到数十里。汉中北隔秦岭与关中为邻，南隔大巴山脉与益州巴郡、广汉连接，是益州北部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汉中经常成为激烈争夺的地方。秦、巴、楚、蜀互相争夺此地，经过 300 年后，成为秦郡。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 41 县。刘邦很不高兴，萧何却认为汉中可以作为夺取天下的依托，指出愿大王王汉中，天下可图也。汉末割据汉中的是张鲁。张鲁是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祖父张道陵客居蜀郡，创“太清玄元”道，收取受道人五斗米，俗称五斗米道，或鬼道。张鲁继承家传，在巴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汉中两地行教，拥有很多部曲。

巴郡在中平元年（184 年）黄巾起义时，有五斗米道徒张修起义；张修起义失败后逃亡，但其五斗米教在巴郡已成势力。鉴于刘焉信教，因而张鲁与巴郡五斗米教支持他从容地由荆州穿过巴郡上任。汉中也是五斗米道盛行的地方，初平年间，张鲁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督率信教的义民），同别部司马张修一起被派遣进入汉中，在汉中继续行教。此后，张鲁令张修进攻汉中太守苏固，苏固翻墙而逃，无处躲藏，在逃亡中被捕杀死。张鲁占领了汉中。张鲁割据汉中后，不设长吏，以祭酒进行管理，教化人民不欺诈，有病自己检讨过错，大都同黄巾相似。又在路边设置义舍、义米、义肉，使行路人根据饭量自取。犯法者，赦免三次，然后行刑。这些措施，反映人民渴望过一种有衣穿、有饭吃的平等

的理想生活，受到汉、夷人民的拥护。为了割据和保卫汉中，张鲁建立了至少数万① 军队。依靠这支武力，雄据汉、巴地区近30年。

张鲁的故部曲多在巴西郡。由于刘璋杀害张鲁母亲和弟弟，张鲁率领信教的巴地杜濩、朴胡、袁约等三夷王叛变刘璋，与刘璋结为仇敌。刘璋多次派庞羲进攻张鲁，不能战胜。建安年间，东汉朝廷无力进攻张鲁，拜张鲁为镇民中郎将，兼汉宁（当时汉中郡一度改为此名称）太守。这时巴地夷民日益叛变刘璋。刘璋企图把张鲁势力遏制在北方和东方，其部署是：以杨怀、高沛驻守白水关，把张鲁势力遏制在汉中，以庞羲为巴西太守，驻在阆中（今属四川），把张鲁势力遏制在嘉陵江以东，并邀请刘备进入益州进讨张鲁。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汉中。张鲁主降，其弟张卫则主战，并率领数万部队，据汉中门户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白马河入汉水处）防守。曹操攻该关不下，粮尽，开始从汉中退兵。张卫军闻讯后产生松懈，当夜在偶然的遭遇战中失利，引起防线崩溃，阳平关失陷。张鲁再次企图投降，功曹阎圃说，现在因为处境不利，前往投降，功劳必轻；不如投奔巴中夷王，进行抵抗，然后归顺，功劳必多。于是封好仓库，奔南山（在南郑以南），走米仓道，进入巴中，依据巴中力量继续对抗。曹操进入南郑以后，见仓库完好，非常赞许，派人去慰问说服。于是张鲁在仍然拥有一定实力的基础上，主动向曹操投降了。汉末，黄巾诸路军先后失败。唯有张鲁，利用同刘焉的合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在财货丰富，土地肥沃，四面险要坚固的偏远地区实行了长达17年的割据。

---

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记曹操西征汉中时，张鲁弟张卫已“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则张鲁总兵力当超过张卫所率的数万人。

第三节　孙策开拓江东

一、江东形势和孙策的企图

江东是汉末对于长江中呈东北流向的今芜湖至南京段南岸苏、浙、皖地区的习惯称呼。江东在行政上划分为丹阳、吴、会稽、豫章四郡，与对岸江西（今皖北和淮河下游一带）的庐江、九江二郡合为扬州六郡。江东气候良好，河湖水网纵横，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战略位置十分优良。

汉末割据江东的是孙策。孙策（175～200），江东吴郡富春（今杭州西南）人，是长沙太守孙坚长子，孙武后裔，世代仕吴。孙坚战死时，孙策17岁，随母亲住在庐江舒县。他生逢纷乱扰攘之际，立志继承父业，从十几岁起，结交知名人士，声誉远播江淮之间。他多次向名士张纮咨询可否以父亲故兵为基础，首先夺取家乡江东，尔后进取荆州。计划是投奔扬州袁术，索还先父故兵，到丹阳依靠舅父、该郡太守吴景，募集流民，攻占吴（今苏南）、会（今浙、闽），然后报仇雪耻，作朝廷外藩。张纮认为可行，并进一步指出如此孙策将据有长江，振奋威德，诛除群匪，匡辅汉室，功业可比于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岂止是当个外藩而已。于是孙策决心从夺取吴、会入手，争霸乱世。

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按计划行动。投奔扬州袁术以讨回父亲数千故兵，并依靠袁术实现其计划。袁术虽然很欣赏他，却只归还千余故兵，并利用孙策攻城掠地，许诺他任九江太守，却任用丹阳人陈纪；令他进攻庐江，答应任为太守，却任用故吏刘勋，使孙策一再失望。

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鉴于该州江西各郡归了袁术，决心确保江东，其部署是：把袁术所署的丹阳太守吴景驱逐出江东（吴景在刘繇不敢到袁术所在的寿春上任时，根据孙策授意，把他

接到江东安置，对刘繇是有功的），令张英屯兵当利口，樊能、于麋屯兵横江津①，为一线，严守进入江东的长江渡口；令笮融、薛礼屯兵江东秣陵城（今江苏江宁南秣陵关）为二线，拱卫曲阿。袁术令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攻击张英等，吴景等作战不利，连年不能攻克。孙策任江西方面的太守已无希望，采纳原孙坚校尉朱治建议，企图返乡夺取江东，要求袁术同意他帮助舅父吴景进攻横江之敌，然后回到本土吴郡招募，他认为可以募到3万兵，辅佐袁术匡济汉室。袁术认为孙策未必能平定江东，为了平息其怨气，批准了他的要求。

二、占领东部丹阳吴会

这时，刘繇驻在曲阿拥有州兵数万，诸郡守许贡、王朗、朱皓等各拥郡兵②，控制着江东主要地区，严白虎、祖郎、焦已等宗族武装各有兵力万余或数千人，以及不在编户之列的山越族，控制着深险之地。江东兵力总计约10万上下，孙策出发时，仅有步兵千余，战骑数十匹，及至到达江边历阳（今安徽和县），沿途招募，兵力扩充到五六千，数量仍然大大劣于江东。孙策以袁术部将身份攻取江东，是非法的。特别是孙策攻克庐江时，杀戮江东大族、太守陆康宗族子弟多人，惹怒江东大族和汉官，被他们仇视。孙策虽然在总体上居于劣势，也有有利条件：刘繇和各郡兵力分散，不能集中使用和相互支援，刘繇、王朗、华歆是名士，儒雅风流，以及朱皓，都不擅长军事。孙策善于决机于两阵之间，在

---

① 当利口、横江津均在今安徽和县长江西岸。

② 各郡郡兵数量不详，每郡同孙策作战时，兵力比孙策少。证据是，孙策占领曲阿后，通过招募，兵力达数万（《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孙策“进入曲阿，刘繇奔走，而策之众已数万矣。”）。他攻会稽时，会稽功曹虞翻以为郡兵力不能拒；他攻豫章时，新任太守华歆承认其郡兵资粮、器仗等大大不如孙策。

江东留“有旧恩”①，丹阳郡新任太守周尚的从子周瑜和孙坚故吏、现任吴郡都尉朱治同孙策关系密切，可以充当呼应力量。

兴平二年（195年）十二月，21岁的孙策开始开拓江东，他的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攻占江东东部之丹阳、吴、会三郡。孙策鉴于家乡这三郡有三江五湖之利，自己家族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企图首先攻取之，方针是各个击破驻在三郡之汉官刘繇、许贡、王朗，再扫平宗族武装。根据这一决心，孙策攻破樊能、于麋、张英。为避开刘繇水军可能的截击，等不及征集到渡船，便在当利口伐芦苇做筏，迅速偷渡过江，进入丹阳郡，很快得到住在该郡的周瑜的率兵助战，和他资助的军资粮草，孙策大喜。于是击破刘繇设在江边的牛渚营（今安徽当涂西北10公里的长江东岸），缴获邸阁的全部粮谷、战具，迅即东进，攻击刘繇二线。二线之薛礼据守秣陵城，笮融屯守城南。孙策两次攻击笮融，斩首1500余级。笮融深沟高垒不战。孙策攻坚不克，置笮融于不顾，掉头南下，攻击刘繇别将于海陵（今安徽南陵），再折回北攻湖孰（今江苏江宁东南湖孰镇）、江乘（今江苏南京东北25公里），绕过二线，东入吴郡，直逼曲阿，与刘繇交战。刘繇兵败，弃军西逃到江东之豫章，企图争取曹操、刘表的支援。

孙策为了克服政治不利和兵力不足，努力加强军纪，以争取民心。他年少，士民呼为孙郎。那时割据者军纪恶劣，百姓听说孙郎要来，丧魂失魄；长吏委弃城郭，窜伏在山野草泽中。及至孙郎到，军士严守军纪，不敢虏掠，民间鸡犬蔬菜，一无所犯。百姓大喜，争相用牛酒犒军。孙策占领曲阿后，向各县发布募兵令，声明刘繇、笮融等的故乡部曲自动来投降的，一无所问。愿从军的，一人服兵役，免除全家徭役；不愿意从军的，不强迫。十日之内，四面云集，得现兵2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

孙策攻占吴郡北部后，袁术深为猜忌，令从弟袁胤代周瑜从父周尚为丹阳太守，等于从孙策处夺走丹阳。孙策暂时不顾，集

---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中兵力于吴郡，攻击太守许贡控制的郡南，令吴郡都尉朱治率兵从郡南钱唐（今杭州城西南）北上，配合自己在郡北，共同封闭许贡于郡内。许贡在由拳（今浙江嘉兴南）阻击朱治，大败，靠拢乌程（今浙江湖州南12公里）强宗严白虎。孙策进兵，击败许贡，占领吴郡南部。

孙策占领整个吴郡后，盘踞在郡内深险处的强宗严白虎等不服从。吴景主张先击破之，孙策以严无大志，弃之不顾，南下会稽郡。渡浙水，几次攻击太守王朗的郡治固陵（今浙江萧山西北西兴镇）不能取胜。孙策叔父孙静认为，王朗依托固陵城坚守，很难马上攻陷，不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策同意，诈向军中下令说，近来连雨，饮水浑浊，兵士饮后，大都腹痛，现在令人马上办齐几百口大缸，澄清饮水，企图造成兵士腹痛假象。又令罗列火堆，黄昏点燃，伪装兵力留在原处，欺骗王朗。一面秘密分兵迂回到固陵侧后，控制查渎水以南数十里要道，从该处向里袭击王朗高迁屯兵。王朗措手不及，急令故丹阳太守周昕迎战，并于周昕被斩后，从海路逃到东冶（今福建福州）。孙策跟踪而至，屠戮东冶，迫降王朗，自兼会稽太守。然后回军攻破严白虎，驱走袁胤，以舅父吴景重任丹阳郡太守。这时是建安元年（196年）八月。不到一年，孙策摧枯拉朽般击败刘繇、许贡、王朗及袁术代理人袁胤，据有吴、会、丹阳三郡，为割据江东奠定基础。在孙策的胜利面前，袁术已无力驾驭他。

孙策据有三郡后，努力平息三郡分散而深刻的反抗。这时，江东大族由于他驱逐州牧、太守，诛戮周昕、许贡等州郡英豪，加深了敌意，或者静观待变，或者聚众自保。一些割据势力和刘繇残部也不甘心束手就擒和失败。丹阳宗族大帅祖郎等接受原扬州牧陈瑀印绶，受命夺取各郡。刘繇旧部、东莱太史慈逃到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据有泾县（今安徽泾县西北3公里）以西六县负隅顽抗。为了平息反抗，孙策从淮、泗南渡大族人士中寻找依靠力量，以彭城张昭处理军务，舒县周瑜为将帅，广陵张纮、秦松、陈端为谋主，组成以淮、泗人士为主的领导集团，以加强政

权的社会基础。建安元年八月，又去书责备袁术称帝，声明同他断绝关系，并联络曹操，向献帝贡献，先后被朝廷拜为骑都尉兼会稽太守、讨逆将军，企图以这一合法身份化解江东大族的敌意。为了以招降方式削平境内割据，孙策进攻陵阳（今安徽太平西北）祖郎和泾县太史慈，生俘并收降了两人。他向祖郎指出，你从前袭击我，斫我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①。太史慈勇敢，乐于救人急难；只因为不容于清议，刺史刘繇不敢重用他。太史慈在交战中夺得孙策兜鍪，孙策俘获他以后，不畏清议舆论，握着他的手说，你过去托身不得其人，我是你的知己，不要担心不如意。立即授予门下督的官职。祖郎、太史慈归顺后，孙策初步巩固了三郡。

不久，刘繇在豫章去世，孙策令太史慈前往招抚刘繇万余部曲，并替他向刘繇部曲传话，进行辨解说，刘牧往年责备我为袁氏攻庐江，我先君兵数千人，都在袁术那里，我志在成就大事，哪能不屈从袁术以便求回故兵呢！后来袁术不遵守臣节，我劝谏不从，不得不同他分离。我同袁术交往的经过，就是这样，恨未同刘牧生前争辩。又告诉太史慈，刘繇部曲乐意前来的一同前来，不愿来的代为安抚他们。于是收编了刘繇部分部曲，部队进一步壮大。

三、占领西部庐江豫章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术在九江病死，余部企图投奔孙策，半路被袁术故吏、庐江太守刘勋截夺和收容。刘勋又得到淮南名士刘晔赠予的数千豪强部曲，兵势强盛。孙策不能容忍刘勋在西方坐大，决心攻取庐江、豫章。他企图把刘勋诱离郡治皖城（今安徽潜山），袭其空虚，派出使者曲意劝说刘勋道，上缭（今江西永修）宗民屡次侵犯我郡，我要攻击他们，但是道路不便，上

① 《三国志》卷五十一《孙辅传》注引《江表传》。

缭很富有，希望你进攻它，我作外援，并献上珠宝、葛布。刘勋大喜，各方面都来祝贺。唯有刘晔指出此行的危险说，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十天内攻不下来。这时兵疲于外，国虚于内，孙策乘虚袭击我，后方不能独自防守，则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刘勋急于筹粮，不听劝告。十一月，率兵经彭泽（今江西湖口东彭泽乡）袭击上缭，上缭宗帅抛下空壁逃走，刘勋了无所得。这时孙策佯称出击黄祖。在途中获悉刘勋离开皖城，便同周瑜率领轻兵2万，顺道乘虚攻陷皖城，占据庐江，夺回袁术余部3万人；又以孙贲等率8000人在彭泽堵击，将回军的刘勋击破。刘勋无奈，退向江夏（治西陵，今湖北新洲），向太守黄祖求援。黄祖令儿子黄射助战，孙策大破黄射、刘勋联军，收编刘勋兵2000人，船千只。刘勋窘迫，北投曹操。刘表从子刘虎、南阳韩晞，前来增援，任黄祖前锋。孙策又斩刘虎、韩晞，大破黄祖军，使得黄祖不敢妄动。

孙策占领庐江后，企图就势攻取相邻的豫章郡。豫章郡原太守被笮融所杀后，现太守是高唐大姓、江东士人领袖华歆。对于华歆，孙策曾经通过去豫章的太史慈观察了解到他不善运筹，没有方略，不过是自守之人，因此企图争取华歆归降，通过华歆团结更多的士人。孙策以优势兵力向郡治南昌（今属江西）进军，同时派功曹虞翻进城劝降。虞翻原是战败的会稽太守王朗的功曹，游说华歆道，孙策用兵如神。您自己估计资粮、器仗、士民勇敢比鄙郡如何？华歆说，大大不如。虞翻指出，既然知道不如，不早定计，将悔之无及。华歆深知孙策善于用兵，自己决非对手。于是不穿官服，葛巾（葛布帽，尊卑共用）出迎，交出豫章。孙策亲执弟子之礼，以上宾相待。当时四方贤士大夫避难住在江东的很多，都出于华歆之下，人人望风。每次孙策大会宾客，华歆说话以前，坐上没有人敢先发言，江东号称“华独坐”①。孙策从豫章分出庐陵郡。前后所得，计有吴、会、丹阳、豫章、庐陵和江

---

①《三国志》卷十三《华歆传》注引《吴历》。

西庐江六郡。这时是建安四年十一月。

建安五年，孙策企图利用曹操同袁绍大军相持于官渡、后方空虚时偷袭许都，迎取献帝，并秘密进行了部署。未及出师，在出猎中单骑遭到许贡宾客谋射，伤重不治而死，年仅 26 岁。

孙策从兴平二年十二月渡江，到建安四年十二月占领豫章，前后 4 年，据有江东六郡，为东吴三分天下奠定基础。其开国之迅速，后来而居上，迥非曹操、刘备所及。就战略和作战指导而言，胜利的关键在于：1、选择了有利的割据地点和时机。孙策眼光独特，在群雄混战北方之际，别辟蹊径，向割据势力分散、软弱的江东用兵，体现了避实击虚，并且这时袁术忙于同吕布、刘备争夺徐州，曹操忙于击张绣、灭吕布，准备同袁绍决战，都无暇顾及江东。对于孙策的崛起，曹操虽然深感不安，也无可奈何，不得不常喊道："猘儿难与争锋也"①。2、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战略上分步走：第一阶段，夺取东部三郡；第二阶段，夺取西部庐江、豫章；第三阶段，夺取豫州，迎接献帝。上阶段成果巩固后开始下阶段作战。作战中按照先打主要、后打次要原则，确立先攻击州牧、太守，后攻击宗族武装。3、边打边建军，以宽大的政策，从敌人处补充兵员，迅速扭转敌强己弱的兵力对比。4、战术运用灵活。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强攻、攻后纳降、不战而降等多种方式。在作战中，根据情况采用阵地战和机动作战相结合，攻坚和偷袭相结合。

第四节　孙权全据长江战略

一、保江东观成败

建安五年（200 年），孙策临终时深知死后江东政权将面临生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吴历》。

死存亡的挑战，遗言“保江东”，“观成败”，要求放弃原定的偷袭许都、北上争天下计划，转变为保卫江东政权，耐心等待时机。他给19岁之弟孙权佩上印绶，指出“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认为这是保江东的有利条件；向张昭指出观成败的有利条件，是“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嘱咐他“善相吾弟”①，为了保住江东，甚至说如果我弟不能胜任，君便取而代之。还对张昭估计了割据江东失败的可能性，说那时你就西渡长江回老家去。

孙权统事后，江东形势十分险恶。孙氏政权只拥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六郡，郡内深险地区的山越和强宗，不接受征调。政权中从北方来的流寓人士，以个人安危、去就为念，还在观望、徘徊，同孙权没有建立起牢固的君臣关系；有些郡守、将领甚至企图叛变。孙权从兄、驻屯乌程的定武中郎将孙暠，调集将士，企图攻取会稽，抢夺孙策遗位。另一位从兄、庐陵太守孙辅，担心孙权保不住江东，派人呼叫曹操。孙策表用的庐江太守李术，乘机招纳从江东逃亡的民丁，不肯归还。对孙权说，你有德，人家就归附你，无德，就叛离你。孙权母亲对形势深为担忧，召见张昭、董袭等，询问江东能否保全和安定。

孙权及其拥护者坚决执行孙策保江东的遗令。建威中郎将周瑜从巴丘带兵奔丧，与张昭等全力支持孙权。孙权加强了政权建设和军事平叛。1、“招延俊秀，聘求名士”②，继续任用孙策旧将周瑜、程普、吕范等人为将帅，新招纳北来的鲁肃、诸葛瑾等人为宾客。2、部署众将，镇抚山越。3、征讨不服从命令者。孙权将孙辅撤职，杀其亲信，分散其部曲。为了孤立李术，向曹操报告说，李术杀你举荐的严刺史，我为国除害，为严报仇，李术必来求救，希望不要理睬他。于是进攻李术，李术求救，曹操果然不救。孙权攻破皖城，杀李术，迁走他的3万部曲。4、在对曹关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系中，既争取支持，又抵制要挟，维护自身独立。建安七年（202年），曹操要求孙权任子①，企图挟此人质控制江东。东吴群臣不能决断，孙权带周瑜到母亲处决策。周瑜主张不受制于人。认为东吴形势较好，兵精粮多，将士愿意效力，铸山得铜，煮海得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压力，要送人质呢？送一人为质，便不得不同曹氏相应酬，召见时不得不前往。如此，便受制于人，充其量不过得到一枚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难道能与南面称孤相同吗？于是决策不任子，静观形势变化。孙权通过以上措施，既解决了内部叛乱，又顶住了外部压力，度过政权交替期间的危机，实现了孙策"保江东"的遗愿。

二、制定全据长江战略

在"观成败"方面，孙权统事不久，就思考未来如何发展。建安五年(200年)，向东城人鲁肃咨询。鲁肃是淮北大族，与周瑜结为好友。当中州扰乱、孙策已死时，听从好友刘晔鼓动，企图投奔巢湖豪强郑宝。周瑜劝阻他说，从前马援说过，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现在正是烈士攀龙附凤之秋。劝他投奔孙权，并向孙权推荐。孙权在同鲁肃合榻对饮中，表明自己的愿望是以共尊汉室为号召，充当各路诸侯的霸主。问他：现在汉室倾危，我想建立齐桓、晋文的霸业。您将如何佐我一臂之力呢？显然，孙权仍企图实现孙策偷袭许都未竟之志，以便挟天子而令诸侯。鲁肃考察了群雄混战的发生和发展，认为孙权的处境，同刘邦相似，挟天子而令诸侯是不可能的。答复道，从前汉高帝诚挚地奉事义帝，却未办到，是由于项羽为害。今天的曹操，犹如当年的项羽。将军如何能成为齐桓、晋文呢？我私下预测，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很快除掉。建

① 汉代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三年者，有权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

议孙权像刘邦那样，为帝业奋斗。第一阶段，全据长江，鼎足江东；第二阶段，进攻北方，占领全国。他说，替将军打算，唯有鼎足江东①，以观察天下有利形势。江东格局如此，不会招致嫌疑。为什么？因为北方确实处在多事之秋。利用它的多事，剿除黄祖，进伐刘表，一直到长江尽头，据而有之，然后建立帝王之号，以求统一天下，这就是汉高帝的事业。

鲁肃的建议是以夺取天下为最终目的，在曹操不可能迅速除掉的形势下，首先夺取西方荆州，以便转弱为强，为夺取全国作准备。这是一个全据长江的战略，体现了避实击虚，同张纮的建议，不谋而合，因此坚定了孙权的信念。早在孙策起兵前，张纮就提出，占领江东以后，要进一步实现“荆、扬可一”，“据长江，奋威德”②，得到孙策的认可。但是张纮仅是一般的设想，鲁肃则结合当时具体形势，给予严密的论证。鲁肃的建议，同后来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十分类似。鲁肃跨有荆、扬三分天下，同诸葛亮跨有荆、益三分天下，如出一辙。这说明，鲁肃、诸葛亮基本预见了历史发展趋势。鲁肃去世后，孙权高度评价说，鲁肃一到，我同他在宴席间谈话，“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③但是当谈话时，政权尚未巩固，孙权虽然有称帝之心，对内对外都不到表露的时机，他只是对鲁肃说，今日尽力经营于江东一方，希望能辅佐汉朝罢了，你这些话不是我能够达到的。果然，鲁肃的思想在东吴的文武中不能获得共识，张昭认为鲁肃年少粗疏，不可大用。直到建安八年（203年）东吴进攻黄祖，才标志着孙权把全据长江正式确立为自己的战略方针。

---

①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鲁肃提出“鼎足”的三方，除了曹操、江东，第三方所指，《资治通鉴》不知是谁，把鲁肃的话改为“保守江东”，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五汉献帝建安五年十月条。鲁肃主张据荆州而有之，其鼎足的第三方实际上指的是益州刘璋。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吴历》。

③ 《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

建安十三年，巴郡豪强甘宁率部曲脱离黄祖，向归降的孙权揭露刘表、黄祖无能、昏聩，也献策全据长江。他说，汉朝气数日益衰微，曹操更加骄横，迟早会篡夺帝位。南方荆州之地，山势便利，江川流通，确实是我西方的形胜之地。我观察刘表，计虑既不长远，儿子又比他更差，不是能继承基业的人。您要早作打算，不可落在曹操后面。图谋荆州的计策，宜于先取黄祖。黄祖年老，昏聩至极，财物粮食都缺乏，左右的人搞欺骗，贪图财利，侵犯吏士利益，吏士心中怨恨，舟船战具坏了不修，懒于农耕，军队没有法度和部伍。您今天去攻，可操胜券。甘宁作为益州人，还主张东吴夺取益州。他说，一旦攻破黄祖军，向西行军，西据楚关①，形势进一步发展，便可以逐步图谋巴、蜀。甘宁的建议，更加坚定了孙权全据长江的决心。

三、三 攻 江 夏

建安八年（203年），孙权在政权初步巩固后，开始实施全据长江的方针。他以为父报仇为名，对江夏郡（治西陵，今湖北新州）发起攻击，企图首先歼灭黄祖军，夺取江夏郡，尔后夺取荆州。十月，他率水、步军沿长江西上，大破黄祖水军。但攻城未克，而且山越再次动乱，被迫回兵进行镇压，以安定后方。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再次西攻黄祖，掠夺其人民而回。

建安十三年正月，孙权第三次进攻江夏。黄祖以两艘蒙冲挟守沔口（即夏口，今湖北汉口），以蒙冲上的千名弩手发射弩箭封锁水面，阻击吴军前进，以步兵在后，坚守沔口城。吴将董袭、凌统为了突破黄祖水军的封锁，各率百名敢死队，每人披两重铠，乘大舸船，冲入蒙冲阵中。董袭亲自拿刀砍断固定蒙冲的链绳，蒙冲横流，大军才得前进。于是吴将吕蒙大破黄祖水军，斩其都督

① 关隘，楚建，在今四川奉节东长江北岸赤甲山上。

陈就，水陆并进。吴军以全部精兵攻陷该城，屠城。骑士冯则在追击中斩了黄祖。沔口之战是东吴多次进攻江夏作战中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一次水、陆联合作战。取胜的关键，在于组织敢死队进行突击，打破水上封锁。孙权在庆功会上向董袭举酒说，今天的聚会，是祝贺砍断缆绳的功劳。经过此战，孙权占领了荆州江夏郡的东部。

第五节　刘表割据荆州

一、建立州兵平定荆州

荆州是东汉 13 刺史部之一，辖境略相当今两湖，以及河南南阳地区、贵州、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州境北部纵贯汉水，有南阳郡；中部横贯长江，有南郡、江夏郡；江南有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四郡。荆州是南北交通要道，也是南方益、扬来往必经之地。汉末，荆州逐渐成为各方矛盾焦点。汉末割据荆州的是刘表。刘表是山阳高平（今山东济宁南）人，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的后裔，党人“八顾”之一。灵帝缉捕党人时，刘表因逃亡而免祸。党禁解除以后，他身价大增，被辟为大将军何进掾，迁官北军中候，掌监五营。

初平元年（190 年）三月，荆州刺史王睿被杀，董卓以诏书委任刘表补缺。刘表赴任时，关东起兵，荆州境内大小割据势力蜂起。其江南宗族武装兴盛，长沙太守苏代、华容县长贝羽各自起兵作乱，袁术也占据了南阳。刘表既无法带兵通过南阳赴任，又必须尽快削平境内割据，恢复刺史权威和荆州秩序。

刘表企图依靠荆州大姓达此目的。他单马穿过南阳，进入荆州宜城（今湖北宜城南），延请襄阳（今属湖北襄樊）蔡氏、中庐（今湖北襄樊南）蒯氏等豪强大姓共同谋议。蔡瑁、蒯越都是刘表洛阳故旧，蒯越与他同任大将军何进掾。蔡、蒯两族为了维护宗

族利益，都愿意支持王命在身的刘表。刘表认为，荆州百姓不肯归附，大祸今天临头了。虽然平定荆州的关键在建立州兵，荆州人口也多，但是在籍可供征兵的户口少，如果征兵，极难成功。他向蒯氏兄弟请教其策安出。蒯良主张推行仁义，说，境内百姓不归顺，是仁不足；归顺了治理不了，是义不足。如果仁义之道施行，百姓归来，如同水向低处流，何愁不服从征兵的命令呢？刘表问蒯越，蒯越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解决宗族武装割据，建议用阴谋诱捕宗帅，收编其宗族武装。他说："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①，兵不在多，在于得人。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都是武人，不值得忧虑，最紧要的是削平宗贼。宗帅大多贪暴，受到部下敌视，可以派人利诱他们，宗帅一定会率兵前来。你诛杀其中的无道者，收编并任用其部下。一州的人，有乐存之心，听说你的盛德，一定会襁负而至。兵有了，百姓归顺了，然后南据江陵（今湖北荆州西北5公里），北守襄阳，荆州可以传檄而定。袁术等虽然到来，也无所作为了。刘表说，子柔（蒯良）的话，是雍季的见解（从长远利益考虑，反对用诈），异度（蒯越）的计策，是晋狐偃的谋略（从解决当前问题出发，主张用诈）。确定当前用蒯越之计。刘表令蒯越派人利诱宗帅，招来55人，一举杀掉，对其武装，或者收编，或者授予别人作部曲。只剩下江夏宗帅张虎、陈生还占据着襄阳。刘表令蒯越与庞季单骑去劝说，也投降了。江南全部平定。各太守、县令听说此事，纷纷辞官而去。刘表既迅速平定了荆州，又收编了强宗武装，使"奸猾宿贼更为效用"②，建立起强有力的州兵。

二、保江汉间观天下变

刘表平定荆州后，"欲保江汉间"③。鉴于威胁来自北方，州北

---

①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

②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列传》。

③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

江汉平原首当其冲，刘表决心用蒯越北守襄阳、南据江陵的方针，在江汉地区重点布防。他把州治由江南汉寿（今湖南常德以东）迁到州北襄阳。襄阳地近南阳，南负岘山，北带汉水，前有樊城护卫，是南北水陆之冲。刘表重点守卫这一战略要地的同时，以江陵为后方基地，储备军资，在江、汉间布成较强大的防御阵势。还在原来州兵的基础上，继续建成带甲十余万的荆州军，包括一支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上称雄的水军。

刘表先后把保卫江汉平原的重点，确定为防御袁术和曹操。讨董战争结束后，刘表受到袁术部将孙坚的进攻，以部将黄祖迎战。黄祖两战两败，窜入岘山中设伏，射杀了孙坚。初平三年（192年）十二月，刘表通过切断粮道把袁术逼出南阳。袁术走后，曹操又成了主要威胁。刘表在南阳建立缓冲地带。建安元年（196年）十月收容落魄的割据者张绣，供应其军粮，允许他寄寓在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充当防曹的北藩。张绣降曹以后，建安六年（201年）九月，又以刘备寄寓在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充当防曹的屏障。

刘表还在境内平叛。官渡之战期间，长沙太守张羡等响应曹操，率领零陵、桂阳三郡叛变，刘表派兵平定，捍卫了荆州的完整，并乘势广开州境，使根据地南接五岭、北据汉水，方圆达数千里，万里肃清，大小豪强都高兴而服从。刘表开始推行蒯良仁义之计。于是关西、兖、豫学士前来归附的大约上千，刘表安慰周济，使他们都得到资助，获得保全。又设立学官，广求儒术，让綦毋闿、宋忠等撰写《五经章句》，称为《后定》。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自身比较廉洁，在荆州多年，家无余积。

刘表在保卫荆州、实行仁义的基础上，企图“观天下变”，坐等群雄相互削弱，然后水到渠成，领袖诸侯。他远交袁绍、李傕、郭汜，牵制近邻袁术和曹操。李傕、郭汜攻陷长安以后，他遣使奉贡，受命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献帝迁到许都后，他一面向曹占区的献帝送贡献，一面声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这是天下的达义，继续联合袁绍。在袁、曹官渡相持

时，他中立以保存实力。袁绍求援，他口头答应，不派援兵，也不帮助曹操，坐等袁、曹两败俱伤。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劝他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①，将军如果要有所作为，可以起兵利用袁、曹的疲敝；不然也应该选择依附一方。将军拥兵十万，安坐观望。见贤而不相助，人家请求和好又得不到，袁、曹的怨恨必集中于将军，恐怕无法中立了。以曹公的明哲，天下俊贤都归向他，其势必胜袁绍，然后向我江、汉用兵，恐怕将军不能抵御。所以替你打算，不如举州依附曹公，曹公必看重和感激你，这是万全之策。大将蒯越也劝他归附曹操。刘表狐疑，派韩嵩赴曹操处观察虚实。韩嵩出使中，被曹操授予侍中、零陵太守，回来盛赞曹操威德，劝刘表送子为人质。刘表怀疑韩嵩背叛，大怒，囚禁了他。曹操北征乌桓、远离后方时，刘备劝他偷袭许县，刘表不从。曹操凯旋以后实力更加强大，他又痛失良机。

刘表不善于团结本州和外来的大姓名士。避乱荆州的士人，都是海内俊杰，刘表不知任用，特别是听不进从事、南阳名士刘望之的直言，反而信谗杀了他，造成士人人人自危。他又受制于合作的大姓。他娶蔡瑁小姊为后妻，在继承问题上，被蔡氏一族左右。他同后妻都爱小儿子刘琮，而蔡瑁、张允充当刘琮的羽翼。刘表想废长立幼，以刘琮继位，把大儿子刘琦派出去任江夏太守，埋伏下身后二子争位的隐患。由于刘表在兼并战争中无所作为，许多僚属内心倒向曹操，治中邓羲、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大将蒯越，实际转变为拥曹势力。刘表越来越孤立，危亡时无人辅佐。因此西晋傅玄指责刘表不能“容民畜众”，说他“据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②。

刘表乱世单马赴任，在荆襄豪强大姓支持下，运用权谋，迅速削平境内割据的宗族武装，大约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混乱的荆

①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一《刘廙传》注引《傅子》。

州基本平定了，继而广开州境，作到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颇为难能。牧荆州19年，天下虽乱，荆州独全，比较稳定，比较丰乐，而且造成了全国学术中心；这是刘表“保江汉间”的积极的贡献。其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就指导思想来说，是采用了蒯良、蒯越的计策，把他刺牧荆州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平定荆州割据势力阶段，使用蒯越的治乱尚权谋；在平定荆州以后的发展阶段，使用蒯良的治平尚德行。但是刘表的错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他在天下大乱之际，企图坐谈取胜，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坐观时变”，实际上是坐以待毙，所以被郭嘉讥为“坐谈客”①。原来支持他的蒯越等人态度也暗中发生了变化，外来名士裴潜等人则早就私下议论，刘牧不是霸王之才，却以西伯文王自比，他失败的日子不长了，纷纷离他而去。刘表在继承问题上处置失当，埋伏下荆州分裂的种子，本人一死，荆州马上丢失。刘表所以有此失误，就指导思想来说，主要是不理解二蒯计策应当有机地结合。他在平定荆州时使用权谋诈术是必要的，但是把宗帅55人不加区别，一概杀死，是杀降，是不祥的。荆州平定以后，一心实行蒯良推行仁义之计，因此在天下大乱年代，一味地消极防御。在以兼并为规律的内战中，这是难以长期存身的。与江东孙权比较，同样是“观成败”，孙权积极地“全据长江”，保住了江东；刘表无所作为，荆州终于不保。

第六节　诸葛亮隆中战略

一、《隆中对》的产生背景

自从曹操北征乌桓以来，刘备兴复汉室的可能虽然仍然存在，他虽然仍然企图积蓄力量，伺机进攻曹操，夺取全国政权；但是

---

①《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

整个形势对刘备越加不利。曹操挟天子之命，号令诸侯，越战越强，即将结束群雄混战，使北方获得基本统一。汉道则继续陵迟，献帝继续留在许都“蒙尘”。刘备奋斗多年，退出北方，剩下兵力数千，连地盘也没有，是越战实力越弱了。刘备在寄寓荆州的8年中，积极进行反曹准备。同刘表和睦相处，广泛结交荆州在野的豪强人士，争取荆州人心，但是引起刘表的疑心，得不到重用。建安七年，在刘表同意下，刘备对曹操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进至叶县（今河南叶县南）。曹操派夏侯惇率于禁、李典等反击。刘备退到博望（今河南方城西南），烧掉屯营撤退，诱夏侯惇率众军深入，在狭窄、草木较深的南下道路上预设伏击，一战取得胜利。刘备仅能打此种小仗，虽获小胜，不能影响大局。建安十二年，刘备劝说刘表利用曹操北征乌桓、后方暴露的时机，偷袭许都，迎接天子。刘表不能采纳。在蹉跎的岁月中，刘备深感日月如流，老之将至，功业未建，见到髀肉复生，不禁悲从中来。

刘备对事业无成进行了反思，找到自己“智术短浅”① 的重大弱点。由于“智短”，不能正确地认识战争形势、特点、规律；由于“术浅”，所提方针往往不符合实际。过去失败，当前束手无策，都是由于在战略上缺少良计。这既有刘备本人的原因，也由于班子谋士太弱。麋竺等人出谋划策，不能适应斗争需要。当务之急，是成功地引进谋士，这是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

正当刘备急于寻找谋士、探索适合自己的战略时，有人向刘备推荐人才。在襄阳一带，隐居着以庞德公为首的一批在野士人。他们认为刘表保不住荆州，拒绝作刘表的官。经过长期观察，选中刘备，准备向他推荐青年精英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家世二千石，少年时父母双亡，跟随叔父诸葛玄南下荆州。叔父死后，隐居在襄阳城西的隆中（属南阳郡邓县），躬耕陇亩。自己常比作管仲、乐毅。友人读书务求精熟，他独观其大略。他同刘表是世交、亲戚，同当权的蒯、蔡两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家也是亲戚；在未找到适宜托身的军事集团时，宁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①。

荆州在野派积极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当刘备向襄阳士人领袖司马徽询问当世事务时，司马徽说，儒生俗士，哪里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这里的俊杰，自有伏龙诸葛亮，凤雏庞统。诸葛亮的好友、士人徐庶投奔刘备，很受器重，也举荐诸葛亮。刘备请徐庶陪诸葛亮一起前来。徐庶说，这个人只可去拜访他，不能让他受委屈自己前来。将军应该枉驾光顾。在荆州人士一再的推荐下，刘备了解到，诸葛亮深通时务，富有韬略，同刘表长子刘琦关系密切，正是他要寻找的人。建安十二年（207 年），刘备纡尊降贵，三顾茅庐才见到诸葛亮。两人虽是初交，事前彼此有深入了解，有合作愿望，交浅言深。刘备屏退从人，在密谈中倾吐企图改变“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愿望，“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志向，请教他“计将安出？”② 刘备是海内敬畏的人物，不以诸葛亮身份低微和年仅 27 岁，三顾茅庐，胸有疑难，坦诚而虚心地求教。这一行动，感动了诸葛亮，觉得投靠刘备，可以充分施展才能，同意邀请，加入其集团。

二、《隆中对》的主要内容

诸葛亮在回答刘备的询问时，总结群雄混战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地预测了未来形势的发展，阐明了刘备统一战争的阶段和方针，提供了一个转弱为强的战略。后世把这个回答称为《隆中对》，或者《草庐对》。

诸葛亮回顾了群雄混战到北方基本统一的历史，考察了战争的基本经验，强调“人谋”在指导统一战争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所载《出师表》。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用。认为群雄混战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当初比较弱小的割据势力，依靠自身努力，变得强大起来，那些强大的割据势力最后却失败了。这个进程中最典型的事件，是袁、曹之争。曹操等人转弱为强的经验非常宝贵，值得从战争指导上给以总结。他回顾说，自从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的，数不胜数，曹操比起袁绍来，名望低微，实力弱小，然而终于能够击破袁绍，以弱为强，这不仅是天时，也是人谋。

诸葛亮认为刘备应该借鉴曹操经验，改进战争指导。他从实际出发，考察刘备的战略环境，提出对敌友的方针。隆中谈话时，在中国境内，除了刘备以外还存在六股势力：北方的曹操、韩遂、马超、公孙渊，南方的孙权、刘璋、张鲁。诸葛亮预料，曹操和孙权，将生存下来，其他都将消灭。刘备也有条件生存下来，同曹、孙三分天下，前提是改进战争指导。目前，在实力如此弱小的情况下，不应该伺机进攻曹操，及图谋孙权。固然，从夺取天下出发，需要消灭曹操，但这不是现阶段的任务。现阶段的任务，是使自己转弱为强，对曹操实行战略防御，对江东实行联合，把攻曹图吴改变为防曹联吴。他说，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确实不能同他争强斗胜。孙权据有江东，已经历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人民归附，贤能之士肯为其效力，这可以作为外援而不可去图谋。

根据对当前六股势力和刘备有利条件的分析，诸葛亮制定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认为根据任务和敌我力量对比，刘备兴复汉室的斗争，可以而且必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夺取曹、孙占领区之外的中间地带，依次占领荆州和益州，以壮大自己。他从分析荆、益地区的军事地理，政治、经济状况入手，指出夺取荆、益对于刘备转弱为强的重要意义。他说，荆州北据汉水、沔水，利益一直到达南海，东连吴郡、会稽郡，西通巴、蜀，这是用武之地。益州险要闭塞，肥沃的土地纵横千里，乃是天府之国。又从荆、益割据者软弱和刘备主观条件优越两方面，分析跨有荆、益的可行性。他说，荆州的主人不能守住荆州，这大概是老天资

助将军的，将军是否有这个意思呢？汉高祖靠益州成就了帝业。益州牧刘璋昏庸软弱，有张鲁威胁其北面。益州人民殷实，地方富庶；刘璋不知道去关怀爱惜，有智慧和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明君。将军是皇室后代，信义闻名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因此，结论是刘备可以夺到荆、益。在跨有荆、益以后，要从国防、民族、外交和政治诸方面，巩固荆、益。巩固的方针，他说，是保其岩阻（险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治理政务。根据这一计划，完成第一阶段任务以后，刘备将转弱为强，具备同曹操抗衡的实力。

诸葛亮认为，在第二阶段中，对曹操可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他同意刘备看法，刘、曹战争，是反对曹操篡汉的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战争，是得到反对分裂、赞成汉朝重新统一人们的支持和拥护的。他预料，在曹操遭到拥汉势力的反对下，形势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他说，天下有变，则命令一员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县（今河南南阳）、洛阳，将军亲率益州军攻入秦川（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带），百姓能不用篮子提着食物，用壶装着酒来迎接将军吗？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隆中对》的要点是：1、分析当前形势，制定夺取荆、益的方针，实现同曹、孙鼎足而立，三分天下。2、提出包括外结好孙权在内的巩固荆、益根据地的方针。3、提出未来在“天下有变”时，对北方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以上诸点中，夺取荆、益和对外结好孙权，是核心的内容，是整个战略的基础。

三、《隆中对》评价

《隆中对》是诸葛亮军事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观察和解决战争问题的典范。它从战略上提出了刘备转弱为强的方针，对刘备集团认识其发展道路、崛起于西南，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全国局势形成三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隆中谈话以后，刘备茅塞顿开，同诸葛亮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当老资

格的关、张对此十分不快时，刘备解释说，我得到诸葛亮，如同鱼得到水。此后，刘备集团大体按照《隆中对》的意图展开了斗争。在夺取荆州时，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策略上曾经有过不同，但总的意图都是符合隆中战略的。在夺取益州时，策划者主要是法正、庞统，总的意图也是符合隆中战略的。在《隆中对》的指引下，刘备仅用7年时间，就从寄人篱下，一跃而跨有荆、益，由很弱转变为较强，同曹、孙三分天下，比起早年中原逐鹿，一事无成，不可同日而语。《隆中对》在未知条件较多，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条件下，对形势的预测、对战略方向和步骤的规划，如此具体和明确，事后得到如此显著的应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成为中国战略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隆中对》能够发挥如此成功的指导作用，关键在于：1、正确地认识了群雄混战的形势、特点和规律。《隆中对》叙述了群雄混战的形势——自从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的，数不胜数；指明了战争特点——群雄中有强有弱，最后是曹操那样名望低微，实力弱小的，击破强大的袁绍；揭示了战争规律——弱者转弱为强，不仅需要天时这一客观条件，也需要人谋这一战争指导的主观条件。2、划分了刘备统一战争的阶段，特别是正确地规定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不是直接消灭曹操，而是转弱为强，并为此选择了以夺取荆、益作为主要的战略方向。由于提出阶段性任务的概念，把刘备实力手段有限和统一全国目标过大之间的矛盾化解开了。3、正确地规定了敌我，提出联吴抗曹的路线，以保障跨有荆、益和抗曹的成功。4、正确地提出后方建设的重要性，规定了巩固和建设荆、益的内容。

诸葛亮能够作出《隆中对》，主要是有很强的战略意识。诸葛亮观察形势、确定战略方针时，都能自觉地从全国总的局势和刘备发展各阶段的全过程出发，进行长远考虑，统筹规划，作到了高瞻远瞩。其次，对现状和历史有深入的了解。他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同荆州刘表等当权派和在野的大族和名士，都有过从。有兄长诸葛瑾，在江东受到孙权的重用。借助这些渠道，他的消息

灵通，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群雄混战以来的成败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时务十分精通。他除了熟悉现状以外，还借鉴历史经验。汉高祖刘邦自汉中出秦川，夺取到全国政权，西汉末公孙述割据益州，进窥荆州，并企图北上秦川的历史，可能都给了他启发。再次，同诸葛亮努力学习王佐之略分不开。他本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① 的精神，进行了艰苦的学习。目的是把自己锻炼培养成为管仲、乐毅那样的大才。他的学习方法，不用汉儒烦琐的考证和解经，而主要从中掌握治国治军的要点，集中精力接受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即“独观其大略”②。这种学习方法，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在躬耕的同时，就迅速成长为杰出的战略家。

《隆中对》也有失策和局限性。它为第二阶段的战略进攻，制定了两路攻魏的方针。这个方针有两个问题：1、在战略上分散了兵力。北伐以弱军进攻强军，兵力需要集中使用。两路出兵，原意一路主攻，一路钳制，但是对弱军来说，从汉中与荆州两路攻魏，彼此相距一二千里，过于遥远，呼吸不能相通，战役上不能配合，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兵力。所以毛泽东论诸葛亮之败时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③ 2、荆州之兵北上宛、洛，包含着极大的危险。这是因为，跨有荆州同东吴全据长江的企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将随着刘备的强大而激化，处理不当，可能引起联盟破裂。《隆中对》对于荆州是东吴必争之地缺少认识。因此确定钳形攻魏方针时，仅从曹、刘斗争出发来考虑，未能在更大的曹、孙、刘三角斗争的范围内作出估价。《隆中对》的局限是：1、对曹魏方面人心向背的变化，估计不足。隆中战略的远期计划，建立在人心思汉的基础上。但

① 《太平御览》卷四五九《人事部·鉴戒》下引诸葛亮《诫外生》。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③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读〈古文辞类纂·苏明允‘权书’十项籍〉批语》，第1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是人心思汉，是有时限的。在曹氏政权草创之际，其集团内部确实存在着拥汉派可作为同情者。在曹魏政权度过草创阶段，稳定下来以后，随着北方统一和社会趋向于安定，人们渴望统一的愿望大体得到实现，大族的特权得到满足，人心也就不再思汉。这时，诸葛亮北取中原，不再能得到原有思汉力量的支持，北定中原也就难以行通了。《隆中对》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2、刘备长期跨有荆、益十分困难。由于荆、益之间交通极为不便，经济上不能融为一体，刘备在与东吴的冲突中，很难长期作到以荆制益，或以益制荆，同时守住两地而不丢失。在隆中谈话时，除了战略上分散兵力不妥以外，上述种种矛盾大都尚未充分暴露，也很难给以充分的估计。《隆中对》的正确方面是主要的，特别是第一阶段计划是整个战略的基础，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第二阶段计划有问题，如果及时发现，还有充分的时间根据形势进行修正。

第六章　曹孙刘赤壁之战

（参见附图 3）

第一节　曹操占领荆州

一、曹操统一南方先取荆州的企图

曹操消灭袁氏集团后，北方已无人能够向他挑战，剩下的关西马腾、辽东公孙度等都是没有远略的割据势力，群雄混战阶段从而结束了，新的阶段开始了。新阶段的特点是北方曹操集团同南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各种势力间的主要矛盾，南北之争将成为新阶段的主要内容。

这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对曹操十分有利。他的兵力成倍增加，估计扩充到二十几万①，占领区扩大到兖、豫、徐、冀、青、幽、并、司 8 州。由于兴办屯田，抑制豪强，扶植自耕农，经济朝着恢复的方向发展，政治上拥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优势。过去由于袁氏集团在河北威胁着后方，每次企图远师江、汉，都顾虑重重而不能如愿，致使南方荆、扬、益州的割据势力逐渐坐大，现在曹操终于腾出了手，今后主要任务是征服南方，统一全国。曹操北征乌桓后 54 岁，进入“暮年”，时不我待，“壮心不已”②，也企图在有生之年实现统一的宏图。在决策征服南方时，曹

---

① 据周瑜估计，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所率领的北方军为十五六万，此外留守北方的部队估计大约为 10 万左右。二者相加，曹军总兵力约为二十几万。

② 曹操《神龟虽寿》，《宋书》卷二十一《乐志》三。

操估计到孙权通过三征江夏，觊觎荆州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荆州被夺去，东吴将发展为跨州的割据势力，增大征服南方的难度，因此必须同东吴抢时间，又估计到荆州路途最近，刘表军事上比较软弱，便于夺取，夺到荆州后，可顺流而下取东吴，然后回军夺取孤立的益州，于是决心以夺取荆州为征服南方的突破口。

曹操依据上述决心，迅速进行南征荆州的准备。建安十三年(208年)正月，他回军邺城后，在城中疏浚玄武池，训练舟师，以适应南方水战；撤消三公，改设丞相，并于六月自任丞相，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到手中；为了消除马腾对南下构成的后顾之忧，以允许其子马超留在关中统领其部曲作为交换，胁迫他带全家到许都作官，充当人质。

二、逼降荆州

七月，曹操集结步、骑兵准备南下。战争开始时，就作战方针问计于侍中、守尚书令荀彧。荀彧鉴于曹操多次出兵荆州，仅限于进攻南阳一郡，主张此次也不要暴露夺取整个荆州的意图。指出，现在华夏已经平定，南土刘表知道面临困境了；可以公开地出兵攻击南阳宛县（南阳郡治所，今河南南阳）、叶县（今河南叶县南），秘密从小道轻装急进，以达成对刘表的掩其不意。于是曹操佯称攻击南阳郡，以麻痹刘表，而秘密大举进军荆州。

刘表深感形势严重，决心从南阳退却，收缩兵力，依托樊城和汉水，重点防御以襄阳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待相持中将曹军削弱到疲惫后展开反攻，以确保荆州。其部署是：令刘备从新野撤到樊城（今属湖北襄樊）驻防，保卫一水之隔的襄阳，以江陵为后方基地，储备大量军用物资，支援前线。但是67岁的刘表，来不及指挥保卫荆州之战，就在八月病死了。刘表死后，二子争位，大臣分派，荆州陷入分裂，极大地削弱了防御能力。二子争位的祸根，起于刘表在继承人问题上处置失当。他生前流露过废长立幼的意思。与后妻蔡氏爱少子刘琮，使得刘琮有刘表的妻弟蔡瑁、

属吏张允充当支党。长子刘琦不断受到后母蔡氏、蔡瑁的诬陷，处境日危。刘琦企图通过诸葛亮，争取刘备站在他一边。经常向诸葛亮问自安之计，诸葛亮婉拒不答。刘琦陪诸葛亮登上后花园高楼，撤去梯子说，今日上不到天，下不至地。话出你口，进入我耳，可以说了吧。诸葛亮答道，君不见申生在宫内遇害，重耳在外获得安全吗？刘琦醒悟，争取到出任黄祖的遗缺江夏太守，在外拥兵自保。刘表死后，蔡瑁、张允拥立刘琮为荆州牧，刘琦不服，企图以吊丧为名兴问罪之师。

刘琮任荆州牧后，还幻想守住父业，据有整个楚地，静观天下变化。但是倾向曹操的豪强大姓和官吏，不愿支持刘琮抗曹，都公开主张投降。章陵太守蒯越、零陵太守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散布荆州必亡论调，劝刘琮归降曹操。傅巽说，以人臣对抗人主，以新辟的楚地对抗天子，以刘备抵抗曹操，三者都短，企图以此抵抗天子兵锋，是一条必然灭亡的道路。又问刘琮自己估计比刘备怎么样？刘琮说不如。傅巽说，如果凭刘备都不能抵抗，将军你就不能自存；如果刘备足以抵抗，他的地位不会在将军之下。九月，曹军进至新野。刘琮在主要官员不支持抵抗、自己懦弱无能的形势下，只好以整个荆州降曹。这时荆州相当部分的官员和将领，仍然企图坚持刘表的抗曹方针。将领王威建议说，曹操得知荆州已降，刘备已退，一定会松懈无备，轻装行军，孤立前进。如果给我几千奇兵，在险要地方进行狙击，曹操即可俘虏。俘虏曹操就可威震天下，坐而虎步，北方虽广，可以传檄而定，又不仅仅是保住荆州了。这是难遇的机会，不可失去。刘琮不听，连行动勇气也丧失了。

三、追击刘备

刘琮暗中议降，刘备发觉迹象可疑，派人质问刘琮，刘琮才令大儒宋忠通知刘备已经降曹。当时曹军进抵宛县，急行军一天可以到达刘备樊城。刘备大惊道，你们诸位如此作事，不早相告，

今天大祸到来才告我，不是太严重了吗！举刀向宋忠说，今天断你头，不足以解忿，也耻于大丈夫临别又杀你们之流。当此前有曹军逼近、后有刘琮迎降、处境孤立的危急时刻，刘备已成荆州抗曹力量的领袖。他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一是责备刘琮放弃先人基业，攻占其襄阳，号令荆州以抗曹；二是退守江陵（今湖北荆州）。刘备决心退守江陵，依托该地储备的大量军粮、军械、船只及控扼长江中游的有利地势，组织荆州抗曹力量进行防御。其退却部署是，亲自率步、骑兵沿着从襄阳到江陵的隘道退却，以关羽率数百艘船沿沔水入长江，水陆两军会师于江陵。在退却中，以不降曹为号召，沿途收集刘表旧部及民众，壮大实力。刘备路经襄阳时，驻马呼叫刘琮，刘琮不敢露面。刘备辞别刘表墓，哭泣而去。此举提醒荆州人士，他是刘表抗曹方针的继承人，应该取代刘表的政治地位。诸葛亮劝说刘备乘机攻击刘琮，据有荆州；刘备担心落下夺孤的名声，损害政治形象，没有采纳。刘琮属吏和不愿降曹的人，纷纷出襄阳城前来投奔刘备。刘备到达当阳（今湖北当阳东）时，沿途随行军民增至10万，辎重车数千辆。襄阳到江陵步道500里，刘备大队每天仅前进10余里。有人提醒刘备，目前虽然拥有大部队，但是披甲的步、骑兵少，如果曹军到来，靠什么作战呢？建议改为紧急行军，以确保进入江陵。刘备为了争取人力、物力，不听劝告，表示成大事以人为根本，现在百姓来归我，我怎么忍心抛弃呢！

这时，曹操率军占据了襄阳，听说刘备已过，鉴于江陵储备有大量物资，如果被刘备占据，就有能力组织荆州大部地区从投降转变为抵抗，击败刘备是占有荆州的关键，决心抛下辎重，轻军追击，阻止刘备占领江陵。他亲率精锐骑兵5000，追击刘备，一日一夜行300里。前锋曹纯和荆州降将文聘在当阳长坂（坂，一作阪。今湖北当阳东北35公里绿林山区的天柱山）首先追上。在交战中，刘备途中集结的庞大队伍，不堪一击，全线溃败。刘备令张飞断后。张飞据水断桥，怒目横矛喊道，我是张益德（张飞字益德），可来决一死战！张飞勇敢、从容，曹军无人敢于接近。

曹操俘获大批人马辎重。刘备丢下妻子，同诸葛亮及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逸，放弃去江陵的企图，斜走汉津（今湖北荆门东45公里汉水过境处的津渡），会合关羽船队以后，沿汉水而下。途中遇到江夏太守刘琦所率万余人，一起来到夏口（今湖北汉口）。曹操占领江陵，封刘琮为列侯，调任为青州刺史，重用主降和愿降的荆州官员，封蒯越等15人为侯，以蒯越为光禄卿，韩嵩为大鸿胪，邓羲为侍中，刘先为尚书，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

曹操进攻荆州之战，从建安十三年七月集结部队开始，到九月接受刘琮投降、击败刘备、占领江陵结束，历时3个月。曹操未遭受重大损失，即占领江汉平原襄阳、江陵两大要点，接受其他各郡的归降，收编刘表陆、水军，控制长江中游，并击溃刘备军，打开统一南方的突破口，取得超过当初想象的胜利，为下一步夺取扬、益二州奠定了基础。曹操所以在荆州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辉煌胜利，基本原因是曹操军事、政治上强大，同时荫蔽意图，突然袭击，震慑了荆州。其次，是由于刘表死后荆州分裂，刘琮的主要官员渴望降曹，刘琮无力组织防御。曹操承认胜利来得既突然，又有些意外，在表刘琮令中说，楚国有江、汉山川之险，历史上后服先强，同秦争胜，荆州是楚国故地。刘表久用其民，身死之后，诸子鼎峙，尽管到头来保不住荆州，但仍然可以拖延时间。只是刘琮不敢抵抗，才令他取得“敌举国来服为上”①的成功。再次，是由于曹操不给刘备以喘息时间，发挥骑兵快速机动和突击作战的优势，以大胆的远途奔袭，挫败了刘备占据江陵组织抵抗的企图。

刘备方面，在曹操逼降刘琮以后，夺占刘琮襄阳和占据江陵两个方案，都是可行的。两者相比，以诸葛亮夺占襄阳的方案较为有利，便于更多地保存刘表实力，集合荆州不愿降曹的力量，依托汉水、据守襄樊，即使最后不守，也便于赢得时间组织江陵的抵抗。刘备计不出此，而向江陵退却。在退却中，对曹操打破常

---

①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谋攻篇》曹注，中华书局影印本。

规、轻军急袭的意图和能力严重估计不足，注重政治上争取人力、人心，却严重影响了军事行动，行军速度过于迟缓，致使曹操追及，在江陵组织防御的企图失败。由于军事上犯错误，终于也保不住追随的人。

第二节　赤壁之战（上）

一、曹操进攻东吴的决心

曹操逼降荆州、击败刘备后，威震中国，军事、政治形势更加有利。其实力大大增强，新据有荆州战略要地襄阳、江陵和刘表军用物资，收编刘表部队，包括众多水军，控制了长江中游，具备在长江上进行大规模水战的能力；并且一举打开统一南方的突破口，处于东可以进攻江东，西可以进取益州的有利态势上，其声威达到用兵以来的顶点。面对强大的曹操出现在南方，南方割据势力发生分化。西方益州牧刘璋开始接受曹操征调兵役、力役的命令，派使者致敬，送来叟兵300人和杂御物。继荆州出现主降派后，东吴一部分人预料曹操最终将统一中国，也倾向于降曹。但是，曹操也存在着不利一面。他只占领了襄樊和江陵两个重镇，荆州其余地区兵力尚未达到。荆州是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投降的，除了主降派以外，人心并未归附，还有较多的反曹情绪，荆州许多降官降兵降将还怀着看一看的心理。曹操忙于占领和备战，也没有好处给荆州降兵和人民。荆州多数人的真实态度，还是个未知数。江夏郡与东吴相邻，民心躁动不安，曹军远来，未经休整，十分疲劳。在大胜后，曹操滋长了骄傲情绪。而东吴孙权的态度也不明朗。曹操上述不利一面，被胜利掩盖着，不易察觉，但是如不克服，将产生很大危害。

曹操集团讨论了目前形势和作战问题。关于孙权、刘备两股势力的动向，大多数人乐观地认为，刘备长坂战败后投奔孙权，孙

权一定会杀刘备取悦于曹操。唯有程昱预料孙权必定进行抵抗，必定联合刘备，必定难以消灭。指出孙权新近在位，还没有赢得海内敬畏，曹公无敌于天下，刚拿下荆州，威震大江两岸，孙权虽然有谋，不能独挡曹公。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都是万人敌，孙权必定资助刘备来防御我。危难解除，双方势将分离，刘备靠孙权的资助成功后，孙权又得不到机会杀刘备了。面对曹操大胜后在荆州立足未稳的形势，太中大夫贾诩建议养威持重，后图东吴。向曹操指出，明公昔日破了袁氏，今天又收服了汉南，威名远扬，军势已经大张。如果利用旧日楚地的富饶，供应吏士，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①。贾诩主张采取风险少、代价小、积极稳妥、花费时日的持久方针，先进行休整，争取荆州人民支持，待在荆州站稳脚跟以后，从容地逼降东吴。

但是曹操对形势相当乐观。认为目前震慑东吴的机会难得，乘此新平江、汉之威，借助东吴投降派的力量，一鼓而下，可以获得重大利益，决心立即进攻东吴，迫使孙权杀刘备，充当刘琮第二，如果孙权抵抗，即将其灭亡。为了保障在灭吴时无后顾之忧，曹操留部分兵力安定后方，对后方部署如下：1、以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部署于汝颍和淮水之间，负责保卫许都，安定翼侧合肥局势②。以章陵太守（治今湖北枣阳南）③赵俨，调任都督护军，监护上述七军。2、以曹洪、乐进镇守襄阳，徐晃镇守樊城，乐进、徐晃并负责歼灭和招降襄樊附近各县不服从的地方割据势力。3、以荆州降将文聘为江夏太守，率所典北方兵，驻在沔水入江处的石阳（今湖北应城东南40公里），

① 《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② 据《三国志》有关本传，赤壁之战前，曹操令张辽屯长社，乐进屯阳翟，于禁屯颍阴，朱灵屯许南，驻在许都周围，保卫许都。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淮南氏（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两县豪强陈兰、梅成叛变，曹操这时正在谯县，令于禁、臧霸等前往讨梅成，张辽、张郃等前往讨陈兰，至此方将张辽等调往加强合肥方向的防御。

③ 章陵本属南阳郡，建安初年一度立郡。

安定并保卫郡境，防御敌军可能沿沔水北上骚扰后方襄阳。曹操对前方部署如下：以北方军十五六万及荆州降兵七八万，共二十二三万水、步兵①，组建征吴军，以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为征吴水军正副都督，自己亲率征吴军主力从江陵出发，沿长江顺流，水陆俱下，以夏口、柴桑（今江西九江北6公里）等要地为目标，寻歼东吴水军。为了展开诱降，在征吴大军未到达之前，先声后实，向孙权发去约在吴地"会猎"的逼降书。曹操采取速决方针灭吴，既是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也是因为有后顾之忧。他要顾及后方割据者韩遂、马超，也要顾及许都、邺下的拥汉倾向，不便于长期在外，而听任这一倾向的发展。

二、孙权刘备的联合策略

曹操占据荆州后，孙权、刘备为建立抗曹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此以前，东吴已经认识到，曹操南下荆州，不仅是同其争夺荆州，而且得手后势将进攻东吴，东吴连生存都成为问题。南方地区的战略格局，已发生重大改变：曹操跃升为东吴第一位的敌人，东吴同荆州的矛盾退居次要位置，双方还产生抗曹的共同利益。东吴要采取主动，调整敌友关系，建立联合战线。东吴宾客鲁肃，最早察觉到这一调整的必要和急迫。在刘表死后，向孙权建议联荆抗曹。他考察荆州的战略地位和荆州各派力量的状况以后指出，荆州与我境邻接，水流顺北而下，外以长江、汉水为带，内以山陵为险阻，有坚固的城池，沃野万里，百姓富有。如果据有荆州，这是帝王的基业。现在刘表刚死，两个儿子一向不和睦，军中众将，对他们各有所依附。加上刘备是天下枭雄，同曹操有仇，寄寓于刘表，刘表嫉妒他的才能，不能重用。鲁肃认为，在上述形势下，应该根据

---

① 此战曹军兵力采用周瑜向孙权提供的数字，即"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周瑜是当事人，在这里既无夸张之意，也不宜缩小少说，是抱着实事求是态度的。他的说法较为可信。

荆州局势的发展，采取相应方针：1、如果刘备同荆州之主同心协力，上下一致，则应该对他们加以安抚，同他们结成盟好；2、如果他们离心离德，我就另打主意，图谋荆州，以成就大事。他请求奉命去向刘表二子表示吊唁，并慰劳荆州军中掌权者，及劝说刘备使他安抚刘表部队，同心一意，共同对付曹操。认为刘备一定高兴地从命。如能办成，天下是可以平定的。现在不迅速前往，恐怕被曹操抢了先。孙权即授权鲁肃前往荆州，展开吊唁外交，自己也拥兵前出柴桑，就近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鲁肃出使途中路经夏口（今湖北汉口）时，听说曹操正在向荆州进军，及至到达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沙市西北5公里）时，刘琮已经投降，刘备正在南撤，便迎上前去，在当阳长坂遇见刘备。刘备惨遭溃败，打算投奔有旧交的苍梧郡（治广信，今广西梧州）太守吴巨。苍梧郡远在南海，刘备此举，等于退出争雄的舞台。鲁肃鉴于曹军如此迅速地不战而胜取得荆州，是出乎意料的，原来设想的东吴在荆州各派分裂的情况下可图谋荆州之计，已不现实。在目前危急形势下，联合刘备不仅必要，而且更加迫切了，因此积极争取刘备。向刘备指出，吴巨平庸，行将被人吞并，不足以托身。转达了孙权结盟的意愿，陈述江东的强盛和形势的稳定，劝刘备同东吴联合。刘备绝处逢生，欣然从命。这时曹操即将沿江东下，东吴和、战大计未决。在诸葛亮请求下，刘备派诸葛亮随鲁肃前往柴桑，劝说孙权共同抗曹。

三、孙权抗曹决心的形成

在曹操大军威胁下，东吴是战，是和，成为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孙权内心有割据东南、废汉自立、建立帝王大业的志向，在建安七年已采纳周瑜之策，拒绝向曹操送质，此志的端倪已见。他与周瑜等的既定素志，是抵抗曹操，这时也不愿意降曹；但是对于弱军能否战胜强军及在一片主降声中依靠谁来抗曹，尚无把握和良策，决心难下，犹豫不决。诸葛亮到后，掌握了孙权

的顾虑和好胜性格，在双方谈判中，用以退为进的激将法，鼓励孙权定下抗曹决心。他向孙权建议，不管是降是战，需要尽早作出决策。如果能以吴、越军队同中原抗衡，不如早同曹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抵挡，何不放下武器，北面称臣！现在“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决断，祸事很快就会临头了。孙权提出，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刘豫州（刘备）何不事奉曹操呢？诸葛亮刺激孙权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壮士罢了，都守义不屈，何况刘豫州呢！抗曹如果失败，此乃天意，怎能再屈居曹操之下！孙权愤怒地表示：我不能拿整个东吴之地，十万将士，受制于人。我计已决。但是孙权顾虑刘备力量太弱。于是诸葛亮着重分析弱军战胜强军的可能性。首先指出，刘豫州军虽然在长坂战败，今天归队的战士及关羽水军还有精甲万人，刘琦集结江夏的战士，也不下万人。接着分析曹操虽强，但是必败，理由是：曹军远来疲劳，听说追刘豫州，轻骑一天一夜走300余里，这是所谓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所以兵法以此为忌，说“必蹶上将军”。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荆州人民归附曹操，是被兵势所逼，不是心服。诸葛亮认为，抵抗曹军对于扭转整个中国形势具有重大意义，今天将军真的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刘豫州同心协力，必能破曹军。曹军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①。孙权同意诸葛亮观点，双方商定协力抗曹，并同意战后荆州基本上归属刘琦和刘备②。诸葛亮料定曹操战败必定北还，是因为清楚地看到曹操的后顾之忧。

孙权内心定下抗曹决心后，非常高兴，同僚属统一思想，商议破曹。这时曹操来书说，近来奉天子之辞讨伐有罪，旌旗南指，刘琮束手而降。现在我治水军80万，准备与将军在吴地一同行猎。东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② 按，诸葛亮说的“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是指赤壁战后局势而言的，即在战后“荆”、“吴”实力强盛，将与曹操构成鼎足形势。构成这一分析的前提，是战后荆州基本归刘琦和刘备。

吴群臣莫不震惊失色，以元老重臣张昭为代表，大多数文武官员主降，理由是：政治上，曹公是豺虎，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不动以朝廷为借口，今日抗曹，事情不顺。战略态势上，将军论大势可以抗曹的，是长江。今日曹操得荆州，奄有该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以千计数，曹操全部沿江部署，兼有步兵，水、陆齐下，这是长江险要已和我共有了。兵力上，双方众寡，又不可相提并论。张昭的志向，本不在三分，认为曹操政治上仗顺而兴，天下一统，在于此会，因此力主迎曹。孙权在内部这一巨大阻力面前，深感失望和孤立。鲁肃私下对孙权说，降曹对于孙权和众臣利害关系是不同的：东吴像我这样的臣子迎曹，将来逐步升迁，不失作州郡一级长官；将军迎曹，就会无处安身。劝孙权把在鄱阳的周瑜召回共议大事。

中护军周瑜，是东吴的主要将领。他到来后，力排众议，坚决主战，认为曹操托名汉相，实际是汉贼；东吴有神武雄才的孙权，兵精够用，土地数千里，英雄乐于效力，本来就应该横行天下，何况曹操自己前来送死。指出曹操必败：1、曹操有后顾之忧。即使北方已经稳定，他没有内忧，也不能够旷日持久，来同我争夺边境；何况马超、韩遂等尚在关西，是曹操的后患。2、曹操是以短击长。他不能同我在舟楫之间较量胜负；舍弃鞍马，依靠战船，本来就不是中原的长处。3、现在天气又奇冷，曹军的战马无草料。4、曹军水土不服。曹操驱使中原兵士远涉江湖地带，水土不适，必生疾病。这四点，都是用兵之忌，而曹操置于不顾，都实行了。将军活捉曹操，该在今日。我请求率精兵3万人，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打败曹操。

孙权在诸葛亮、周瑜启发下，建立起胜利信心，又获得主战派支持，组织起强有力的抗曹力量。他向周瑜指出，曹操想废汉自立为帝很久了，只是担心二袁、吕布、刘表和我而已。今日数雄已灭，唯我尚存，我与曹操，势不两立。你说应当抵抗，很同我相合，这是上天把你授给我。孙权建立同曹操进行战略决战信心后，毅然当众拔刀砍面前的奏案道，众将吏敢有再说应该迎曹的，与此案相同！当夜周瑜又见孙权，消除其对兵力对比的担忧。

指出，众人只见曹操来书，吹嘘水、步兵80万，各怀恐惧，不再料其虚实。现在以实际情况核实一下，曹操所率领的中原兵士，不过十五六万，而且久已疲劳，所得刘表部队，极而言之，不过七八万罢了，而且还怀着狐疑。以疲劳带病之卒，驾御狐疑之部队，数量虽多，不值得害怕。孙权进一步坚定了以弱胜强的信心。

孙权决心组成孙、刘联军，把曹操驱逐出长江流域，其部署是，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令率精兵3万，在前进发，与刘备联合，共拒曹军，自己为其后援，陆续调发部队和民工，多载资粮支援前线。指示周瑜等能决胜即决胜，万一不如意，便回军靠近自己，自己将同曹操决战。当时孙、刘联军兵力为5万①，与曹军兵力对比为1∶4。孙权的抗曹决心，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形成的。这时南方兼并战争滞后。从初平二年开始，北方以18年完成基本统一，南方仅兼并为荆、扬、益集团和刘备寄寓集团，未能进一步统一，力量分散，处于劣势地位。刘琮以荆州投降后，南方处境更加不利。孙权在此不利形势下，敢于抓住曹操策略失当、准备不足、急躁轻进的弱点，定下迎战决心。这是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如果不下此决心，张昭迎曹之议获得通过，江东将成为第二个荆州，那时六合为一可望及早到来，兵连祸结可望及早结束。而孙权决心抗曹，则意味着南方奋起抗击北方，将形成一支足以同曹操抗衡的力量。这推迟了统一时间，然而对于未来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开发，也将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节　赤壁之战（下）

一、孙刘联军赤壁乌林之战

建安十三年（208年）冬季，孙、刘联军开始同曹操征吴军展

① 吴军3万，刘备军1万，刘琦军1万。

开交战。第一阶段，打退曹操进攻。联军在赤壁、乌林、华容等地，陆续进行三次战斗。首先发生了赤壁遭遇战。十二月，周瑜、程普鉴于敌众己寡，处于下流不利态势，如果听凭曹军沿江进入吴境，则由于顺水行军迅速，必很快深入吴境，导致人心动摇，决心先机制敌、实行攻势防御。于是率兵3万溯江而上，会合刘备、刘琦军，按计划进驻夏口。此时曹军未至，联军企图乘其远来疲敝，早日同其交战，其部署是：以关羽水军留守夏口基地，监视襄阳方向，阻止襄阳之敌沿沔水进入长江，以刘备军沿江北岸西上①，以吴军沿江西上，共同负责江陵方向，担任击退曹军进攻的任务。吴军同曹军先头部队遭遇于赤壁（长江南岸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曹军初次一交锋，即败退。曹操引军退到江北岸。由于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是水、陆交通要道，陆路有华容道同江陵相通，曹军水陆大军决定驻屯此地，转入防御。周瑜军也驻在对面南岸的赤壁段，曹、吴两军隔江对峙。

联军接着发起乌林火攻战。战前，曹操为了使北方兵士克服风浪颠簸，下令把舰船头尾连接在一起。东吴行武锋校尉黄盖分析双方的态势，认为敌众我寡，难以持久，必须速决。曹军舰船头尾互相连接，不利于疏散，出现了火攻的战机，可用火攻烧毁曹军大量舰船，迫使其退兵。此计获得周瑜同意。周瑜企图先以黄盖进行水上奇袭，火烧曹船，震撼曹军，然后乘其混乱之际，与刘备军合力在乌林同曹军举行决战。为了给火攻船队创造接近曹军的战机，黄盖先期致书曹操诈降，声称此次交战，众寡不敌，是

---

①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吴书》“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据此推测，刘备军主要进行陆战，并且部署在北岸。又，赤壁之战第一阶段中，不见关羽作战的记述，此处羽亦不提自己的功劳。当是由于留屯夏口，防御沔水方向曹军的缘故。关羽曾率水军沿沔水南下，地形熟悉，且足以独挡一面，所以后方守卫留下了他。后来襄阳曹军未下，羽也无功可称。

海内共同看到的。东方将吏，不分愚智，都知道不可进行抵抗。唯有周瑜、鲁肃，浅陋不能理解。今天归顺，是我真实的意向。交战那天，我是前部，一定临机变化。我效力就在近期，云云。诈降书所说，符合战前东吴大多数文武主降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曹操争取东吴归降的意图，博得了曹操的信任。曹操对黄盖信使说，如果不是诈降，那么黄盖会受到超过前后所有爵赏的重赏。

交战那天，黄盖调动蒙冲斗舰 10 艘，装满柴草，灌注鱼油，用红幕布遮盖住，船上插着旌旗、龙幡，又调集部分走舸，拴在大船后面。当时东南风刮得很急，10 艘蒙冲斗舰驶在最前方，行到江心，一齐扯满舰帆。黄盖举火把为号，通知诸校，令兵士齐声大叫：投降来啦！曹军人员都出营观望。黄盖在离北军 2 里多路时，令各船同时点火，船上人员撤至走舸。火烈风猛，来船如箭，扑向北船，浓烟涨满天空，烧毁北军船只，火焰窜向岸上营寨。周瑜见火起，率领轻装的精锐部队，在黄盖船队后面，擂鼓大进，刘备军也从北岸向乌林前进。孙、刘联军在乌林与曹军展开主力决战。曹军在遭到奇袭后，营寨大乱，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军中又流行着疫病，战斗力被削弱，人马烧死溺死无数，曹军出现大溃败的局面。

联军进行了华容追击战。为了不使败退的曹军调整部署，并扩大战果，联军立即实施了追击。曹军分水、陆两路向江陵撤退。曹操率领主力从陆路走华容道退却。该道起点 60 里的乌林路段和终点 160 里的江陵路段，地势高爽易行。中段 80 里，为经华容县①东境的云梦泽沼泽区，通行条件恶劣。曹军在此路段上，有时遇到沼泽区水汽形成的大雾，迷失道路；有时则道路泥泞不通；天又刮着大风。曹操令所有瘦弱兵士背草填路，填路兵士往往被潮涌般冲过来的撤退人马践踏，陷进污泥。大军在作出很大牺牲情况下，通过了这一困难路段。曹军没有被烧的船只为另一路，沿

---

① 今湖北潜江西南 40 公里龙湾区马场湖村。见张桂修《赤壁古战场与华容道》，《地理知识》1986 年第 5 期。

江逆流而上，到达巴丘（今湖南岳阳南附近）时，流行病更加严重，被迫在湖中小洲(后称曹公洲)把这些劫余船只自行烧毁了①。曹军撤退中发生粮荒，兵士挨饿，加上流行病，死亡大半。② 曹操到达江陵后，鉴于部队损失严重，已无力再组织进攻，决定结束灭吴作战，固守江汉平原，令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自己率部退回北方。

二、孙刘联军围攻江陵之战

第二阶段，把曹操驱逐出长江。江陵是赤壁之战曹军后方水、陆基地。曹军败退后，仍然占据江陵，控制着长江上流要地，掌握着再度沿江进攻孙、刘的基地。联军决心攻占江陵，剥夺其发动第二次“赤壁之战”的条件。十二月，联军经过长途追击，到达江陵，展开江陵攻坚战。其部署是，以周瑜、程普率吴军主力屯兵于长江南岸，与北岸的江陵城内曹军相对峙，以甘宁直取江陵上流要地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郊)，以开通江路，控制长江中游的制江权，对江陵进行水上封锁。甘宁率兵前往，一去就占领夷陵城，进入城中坚守。甘宁率手下兵士数百名，加上新加强的，兵力仅满千人。曹仁派五六千人包围甘宁，设置高楼，箭如雨下，甘宁兵士都很害怕。甘宁在连续几天的受攻中谈笑自如，派人把敌情报告周瑜。周瑜留承烈都尉凌统主持攻江陵的军务，分一半兵力，与程普、吕蒙亲赴夷陵解围，大破曹军，缴获战马 300 匹而回。吴军大捷后，士气高涨，向江陵发起了新的进攻。

---

① 关于烧船的记载有：《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三国志集解》卷一《武纪》建安十三年“巴丘”卢弼注引《括地志》：“巴丘湖中有曹公洲，即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舡处，在巴陵县南四十里。”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与此同时，刘备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自己率兵占领了荆州南方四郡。然后回军给周瑜助战。鉴于曹仁城中粮多，利于持久，刘备、周瑜决定，在周瑜军攻城部队攻城的同时，共同分兵进攻江陵侧后，使其成为一座孤城，促使曹仁弃城退却。其部署是：以张飞率1000兵归周瑜指挥，以周瑜分出2000吴兵加强刘备军，沿夏水向江陵侧后迂回，刘备占领了襄樊和江陵之间汉水以西的临沮（今湖北远安西北）、旌阳（今湖北枝江北）数县，同时令关羽沿沔水北上，占领汉水以东各县，断“绝北道”①，阻止襄樊曹军向江陵增援。关羽军切断江陵通向襄樊的北道后，襄樊和江夏曹军为了打破对江陵的包围，各派援军向关羽军发起一系列的攻击。乐进从襄阳南下，文聘从江夏北上，双方在寻口（今湖北安陆西南）夹击关羽获胜。乐进又进击关羽、苏非获胜，在临沮、旌阳攻击刘备的县长。② 文聘在汉津攻击关羽辎重，在荆城（今湖北钟祥西南43公里汉水西岸）焚烧关羽船只③。江陵之战形成孙、刘以主力来攻、曹操以一部来守的局面。双方相持了一年，曹仁屡战不利，伤亡很大，孤立突出。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曹操下令放弃江陵，令乐进、汝南太守李通等南下接应曹仁撤出。李通率军攻击关羽，下马拔鹿角入关羽围中，且战且前，勇冠众将，救出了弃城而出的曹仁。周瑜占领了南郡治所江陵。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在联军对江陵发起进攻的同时，孙权开辟第二战场，亲自率兵围攻合肥，以张昭进攻九江郡的当涂（今安徽怀远东南），企图乘机占领淮南要地。张昭不克退兵。孙权围攻合肥，也久攻不下。十四年三月，曹操令将军张喜率千名骑兵解围。张喜兵久而不到。别驾蒋济秘密向扬州刺史建议，假称得到张喜来信，说步骑兵4万人抵达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北），要求派主簿前往迎接。于是令三人扮作张喜使者各持1/3书信，企图入城报告张喜

---

① 《三国志》卷十八《李通传》。

② 《三国志》卷十八《乐进传》。

③ 《三国志》卷十八《文聘传》。

到来，并令一人入城，两人被俘。孙权根据缴获的2/3书信，破译了内容，信以为真，立即烧围退走。八月，曹操发布命令，存恤从军吏士的家属。向各地下令说，死者家无产业不能养活自己的，县官不得停发口粮，县里的官吏要进行抚恤慰问，以符合我的心意。

三、孙刘胜利和曹操失败的原因

赤壁之战从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十二月，历时1年。在此战中，曹征吴军“死者大半”①，损失了全部战船千艘以上，丧失了荆州大部以及在长江上唯一的水军基地江陵，在荆州、合肥两线陷入全面紧张。孙、刘方面则大获全胜。孙权不仅挽救了东吴，而且夺取到荆州最具战略意义的南郡、江夏郡，战后以周瑜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金口镇），控制了长江中游，刘备在走投无路之后，也获得了荆州江南四郡。

赤壁之战，是汉末群雄混战和三国形成两个阶段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争中的第二次大战，是南、北方主要军事政治集团之间争夺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决战。三方都把主力投入这次战争，其结局关系到孙、刘集团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走向统一，还是长期的分立。在这次战争中，孙、刘联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进一步鼓舞了南方同北方强大的曹操抗衡的决心和信心。赤壁之战，标志着中国结束群雄混战，进入三国形成阶段。经过此战，曹操丧失了统一全国的机遇，动摇了统一南方的信心，再也无力南下，孙、刘集团得到空前的发展机遇，历史开始沿着三国形成的方向发展。赤壁之战，为三国形成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后来孙权称帝，大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笏要赞颂功德，未及发言，孙权道，照张公之计，今已乞食了。张昭大为惭愧，伏地流汗。张昭有大臣节，孙权敬重他，但不用为相，就是认为张昭在三分关键时刻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错误地批驳了周瑜、鲁肃。

赤壁之战是曹、孙、刘之间在长江进行的水、陆联合作战，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孙、刘联军以1∶4的劣势兵力，战胜了拥有绝对优势的曹操，开创了在长江上以水、陆联合作战击退北方军的先例。东吴在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在战争指导上的成功之处主要是：

1、敢以数万兵力战胜号称数十万之敌。此战取胜，最困难也是关键的一环，是在曹操气势汹汹的情况下，敢于定下抗曹决心。周瑜等人，凭着横行天下、不畏强暴的气概，在数雄皆灭，曹操挟新胜之威，以"顺"讨"逆"，以号称数十万敌数万，东吴一片主降，似乎取胜无望的形势下，冷静分析战争形势，揭示出曹操表面强大下掩盖着的弱点，及战胜曹操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弱军战胜强军的科学依据。

2、联合昔日敌对的荆州，共同抗曹。曹操进攻荆州后，东吴敏锐地看到，大敌当前，抗曹的共同利益，超过了昔日与荆州敌对的利益，迅速改变策略，向荆州展开吊唁外交。孙、刘两家以大局为重，在群雄逐个被曹操各个击破时，坚定地走联合之路，为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再次被曹操各个击破的命运，"一时之大计无有出于此者"①。

3、以火攻奇袭曹军水军。水军是曹军此战的关键兵种，也是最薄弱的兵种；因为曹操北方水军不习水战，是疲病之卒，荆州投降的水军未经整训，心怀两端，其水军又犯了舰船首尾连接、不便疏散的战术错误。孙、刘联军以火攻为突破口奇袭曹军水军，既抓住了关键，又是打敌薄弱环节，从而在较短时间内，一举击退曹操的征吴军。

曹操逼降荆州后，形势极好，如果兢兢业业，筹划良策，是有可能逐个战胜孙、刘的，无需72年以后，"王浚楼船下益州"时，再由司马氏来完成全国的统一。但是曹操竟然折戟沉沙于大功垂

---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献帝》二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成之际，全是由于胜利后骄傲，引发一系列处置失当所致。在战争指导上，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1、由于形势判断失误，导致策略失当。曹操取得逼降荆州的胜利后，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孙、刘，误认为刘备投奔东吴，孙权必杀刘备取悦自己，因此没有实行先争取孙权，彻底追歼刘备，然后再攻孙权的策略，导致同时进攻孙、刘两家，促成对方的联合，自己反而陷入孤立。赤壁败后，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说明他觉悟到，此战如果采取郭嘉在攻袁尚、袁谭时提出的"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①的策略原则，将不致失败。

2、准备不足，急躁轻进。曹操九月到新野，在轻敌思想指导下，十月即下东吴，部队疲于奔命，在两个战役之间没有休整的时间。由此周瑜、诸葛亮指出的那些弱点，诸如水土不服、马无草料，部队疲劳，新降之兵尚怀狐疑之心，无进取之意，有思归之心，荆州人心未服等等，都产生了，构成极大的隐患。平时还都掩盖着，一遇火攻那样的突变，人心恋旧，没有凝聚力，平时想象不到的所有混乱，顷刻间一齐都发作出来，不可收拾。

3、部署欠妥，戒备不严。曹操使用大军于一个方向，尔后又密集于乌林，重犯了袁绍官渡之战部署上一线平推的错误，致使一遭火攻，全线溃败。当黄盖来投降时，本来应该按照受降如受敌的要求，严加戒备，以防意外，但是在麻痹骄傲思想下，轻信诈降，疏于戒备，以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第四节　刘备据有荆州

一、赤壁之战中收降南四郡

赤壁之战前一年，刘备集团提出了据有荆州的目标，当时对

---

① 《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

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似乎还很渺茫。但是在赤壁之战前后，刘备抓住了机遇，经过三个阶段的努力，很快如愿以偿。第一阶段，是以刘表为觊觎对象的准备阶段。刘备通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后，确立以夺取荆州为其战略第一大目标。但困难之一，是实力不足，羁旅托国、客主势殊、兵力仅有数千①。为了增强实力，刘备企图大力扩军。诸葛亮认为，扩军之难在于荆州不是人口少，而是官府掌握的户籍少。平时征调，负担都落在编户身上，将引起人心不满。他主张由刘备向刘镇南（镇南将军刘表）建议，令州域内凡有未著籍的游户，都必须到官府如实自报著籍，然后通过吸收这些人来扩充兵力。刘备按照此计实行，兵力增加到大约上万或数万②，“故众遂强”③。实力增强后，另一个困难突出了：师出无名，如何夺取刘表荆州，道路不明确更不具体。

第二阶段，是以曹操为对手，占领江南阶段。当刘表病死、刘琮投降、刘备号召不愿降曹的人退到江陵抗曹时，他以荆州抗曹派领袖的地位，从曹操手中夺回荆州，名正而言顺。为了解决实力不足的问题，他同东吴建立了联合战线，不但防御了曹操的进攻，还与周瑜军举行反攻，追至荆州，共同攻取江陵。在围困江陵的作战中，吴军是主力，江陵攻克后，必归东吴，刘备得不到；留给刘备的机会，只有以切断江陵粮食来源为由攻取江南四郡。刘备迅速抓住这一机会。在东吴默认下，率兵巡行江南。江南曾望风归降曹操。刘备率兵到来后，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都投降刘备。庐江割据者雷绪被夏侯渊战败后，也率部曲数万归顺刘备。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诸葛亮向刘备指出：“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

② 刘备扩军的第二年，在长坂战败后，仍有“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以此推论，赤壁战前刘备兵力至少过万，或者为数万。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调赋税，充实军粮；以赵云为桂阳太守。至此，刘备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到荆州半壁河山。

二、战后向东吴借南郡

第三阶段，是以东吴为谈判对手、借南郡阶段。战后荆州三分。其北部南阳郡，及南郡北部，以今湖北兴山、京山一线为界，被曹操占据，以襄阳为治所。中部归东吴占领，其南郡治所在江陵，以周瑜领太守，江夏郡治所在沙羡（今湖北武昌金口镇），以程普领太守。其南部四郡归刘备占据。建安十四年，刘备上表以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不久刘琦去世，众僚属推举刘备继任，孙权也上表以刘备领荆州牧。并且由于刘备参加围攻江陵，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①，即把南郡江南岸油江口（今湖北公安西北5公里），作为共同抗曹的酬劳划归刘备②。刘备以其为州治，改名为公安。

刘备鉴于江陵所在的南郡控扼长江，是实现隆中战略夺取益州和北上宛、洛时必经的出发点，战略意义极为重要，企图据而有之。他看到，战后东吴仍然企图同他结盟，是有求于自己的。从当时的地理形势看，东吴几乎承担了全部抗曹压力。东吴周瑜、程普和领彭泽（治所在今江西湖口东）太守吕范、领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县令吕蒙，共同防御长江中下游，处在抗曹第一线，而刘备位置在江南，处在第二线。东吴等于义务地为刘备防御曹军。这一态势对于东吴既不划算又深感吃力，加上荆州人士怀着敌意。刘备认为，如果同东吴协商，由自己守卫南郡；那么他既可以得到盼望已久的南郡，东吴也减轻了当面曹军的压力，这对双方都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② “南岸地”所指，理解不一。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认为指“荆江之南岸，则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地也”，这不妥当。卢弼注《三国志集解》谓：“指油江口立营之地。非谓江南四郡也”，比前说近实。

是有利的。

刘备决意亲赴东吴谈判分得南郡。诸葛亮认为此行危险，加以劝谏，刘备相信孙权所防在北，当赖其为援，坚持成行。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到京（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以周瑜分给的南郡地方太少，土地不足以容纳部众为由，要求让出整个南郡，以便他真正地都督荆州。① 对此，东吴内部意见不一。周瑜、吕范劝孙权扣留刘备，唯有鲁肃力劝答应刘备。鲁肃指出，曹操威力确实很大，东吴开始治理荆州，恩信尚未普及，应当把南郡借给刘备，让他来安抚荆州。多给曹操树敌，我们自己树立党羽，这是上策。鲁肃此计，是企图先同刘备联盟，认为如果曹操可灭，则天下事未可量也；如果曹操不可灭，则孙、刘唇齿已固，外难不侵，将三分鼎足，南面称帝。孙权也认为曹操的威胁仍然很严重，决心扶植刘备屏蔽东吴。这时周瑜去世，所遗南郡太守由程普代领。不久，东吴把南郡让给刘备寄寓，自己在荆州只保留江夏、汉昌（从长沙郡中分立出来）两郡。于是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鲁肃为汉昌太守，驻屯陆口（又名蒲圻口，陆水入长江处，今湖北嘉鱼西南）。

刘备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不断努力，终于基本上据有荆州。

三、据有荆州的意义和隐患

刘备把州治迁到江陵。由于州治在南郡，因此借南郡通称为

---

① 按，《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刘备）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数郡”之说不确。刘备确实向东吴借了荆州，但是仅指江陵为中心的南郡而言。至于南四郡，是刘备自己以武力所收复，非借而得。但是后来东吴认为，不仅是南郡，连南四郡也是它借给刘备的。其理由如卢弼所揭示的：刘备“赤壁战胜，不为无功，故孙权听其自取荆州数郡，不加阻力，无异假借。遂各持一说，亦即为刘、孙后日构衅之因。”（《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二《先主传》建安十三年卢弼注）

借荆州。刘备借到南郡后，加上南四郡，在荆州原七郡中得到五郡，基本据有荆州，再次成为雄据一州的割据势力。刘备三顾茅庐后仅用两年多时间，基本据有荆州，证明隆中战略是正确可行的。刘备据有荆州后，西可取道巫县、秭归以进取益州，北可向襄阳，以通宛、洛，为实现隆中战略第二阶段任务创造了初步条件。借南郡标志着孙、刘共同防御长江，大大增强了南方的防御能力。曹操听说孙权把土地资助刘备，骇然震惊。他最担忧的孙、刘两雄相互支援、使其难争天下的事情发生了。他当时正在写字，惊得失手把笔落在了地上。

刘备据有荆州，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及时、果断地抓住曹操南下突发事件造成的机遇，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各种手段而取得的。具体说来是：1、广泛联系、团结荆州朝野各派，大力争取荆州人心，危难时充当荆州利益的维护者，因此在刘琮投降后，从刘琮处，从退却途中，从曹操处，来投奔的刘表吏士和军民络绎不绝，形成刘备夺取荆州的力量源泉。2、制定正确的对曹和对吴方针。刘备在刘琮降曹时不顾势单力薄坚决抗曹，不仅赢得荆州不愿降曹人士的拥戴和东吴的联合，也排除了夺取荆州的师出无名的障碍。对东吴，采取组成联军共同打退曹军进攻、及战后愿从抗曹第二线站到一线的方针，既充当屈居东吴之下的求助者，又给予东吴以抗曹的实际帮助，从而使东吴默认其夺取南四郡和出借南郡，由此据有荆州。3、在上述斗争中，有准备，有步骤，有耐心，坚持以持久取胜。正如刘备事后总结经验所说的："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①

刘备借到南郡，与孙权构成寄寓者与寄主的关系②。这种关系只有双方力量悬殊时，才是牢固的。当刘备兵败长坂时，兵力不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江表传》周瑜病重时给孙权笺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是当时人对孙、刘关系的认识。

当一校，东吴对他当然不会有疑忌之心，战后刘备势力发展起来，同东吴的关系便开始潜伏隐患，周瑜已有“养虎”的忧虑。借南郡后，刘备与东吴同为割据一州的势力，力量对比差距已不大。刘备如果再有新发展，打破目前的力量对比，寄寓者与寄主的关系必将产生危机，而危机的爆发点极有可能就是借南郡问题。但是刘备的发展是难免的，因此从长远看，借南郡播下了日后相争的种子。而在日后这种相争中，刘备由于南郡面临对曹和对吴两个方向，必将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

第七章　曹孙刘抢占中间地带

第一节　战后曹孙刘的企图

一、赤壁战后中国的形势

赤壁战后，曹、孙、刘成为国内三大主要势力。曹操继续保持着最强大的地位，占据原东汉13州中冀、青、幽、并、兖、豫、徐、司8个州，拥有最多的人口和兵力，控制着东汉中央政府，然而实力地位遭到削弱。曹操战略机动部队在赤壁之战中损失严重，同南方比较，水军处于异常悬殊的劣势，舰船数量极少，长江的制江权完全丧失，以现有兵力和兵种结构，难以消灭孙、刘。赤壁之战的失败，引起朝野和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战情绪，大批官兵在战争或瘟疫中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隐蔽的反曹势力抓住曹操战败的不利处境，进行种种图谋，曹操年老，也必须为身后问题预作部署，许多人怀疑曹操有篡夺帝位的“不逊”之志；残破的中原经济迫切需要恢复。曹操必须用相当的精力解决内政，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削弱了。

孙、刘实力比战前提高了。东吴方面度过外敌入侵的危机，并占领荆州江夏郡。孙权改变了“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① 的形象，令人刮目相看。水军显示了强大威力。经济上继续保持了“境内富饶，人不思乱”② 的自给自足的良好形势。外交上通过赤壁之战

① 《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中共同战斗、出借南郡和联姻，同刘备维持了联盟。刘备方面，在荆州剧变中历尽艰辛，赢得当地人心，重新成为割据一州的势力，而且经验日益丰富，政治日益成熟，锻炼出一个文武双全的有战斗力的领导集团。不仅同东吴保持合作，还同益州刘璋建立联合，已经有资格列名国内三大势力之一。

战后，在三大势力之外，还存在着越来越难以自保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是指韩遂、马超、张鲁、刘璋、士燮等割据势力。他们进行独立的或者半独立的割据，割据的时间较长，拥有的领地、人口较多，但是过去游离于国内主要兼并战争之外，未经受严峻的考验，进行战争的能力较弱。在群雄逐渐被消灭后，由于偏安于一隅而获得保全的日子不长了，日益面临被兼并的危险。

二、三方抢占中间地带的企图

战后，曹操与孙、刘之间的矛盾，继续是国内各派势力间的主要矛盾，但是赤壁之战证明，这时实际上谁也没有力量消灭对方。在此情况下，各方主要的任务是在战后积极发展自己，积蓄力量，以便为最终战胜对方作准备，因此敌对双方之间虽然继续进行正面冲突，但是重点转向对于中间地带的争夺。这些中间地带，实力弱于曹、孙、刘，曹、孙、刘有能力攻占它们。对于曹、孙、刘来说，谁抢占中间地带较多，谁就在今后的战略态势中处于较有实力的地位。因此战后南北方之间的较量，一度主要表现为攻占曹、孙、刘占领区之外的中间地带。

在上述形势下，曹操制定了一个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确定暂时不再以消灭孙、刘统一南方为目标，重点转变为积极攻占中间地带，蚕食东吴边郡，增强国力，改善战略态势，积蓄统一全国的力量，以便为最终消灭孙、刘作好准备。这时，曹操的战线形成了西、中、东三线。西线在关中，面对关西、汉中和巴蜀。中

线在南阳，面对荆州。东线在合肥和广陵，面对东吴。根据这一方针，为三线制定了不同的具体方针。在西线，以攻占中间地带为当务之急，对关西众将、汉中张鲁等实行武力统一。在中线，鉴于面对的荆州虽为刘备据有，但又是东吴安全所系，进攻荆州势必引起东吴的激烈反应，促进孙、刘进一步联合，是不利的，因此中线采取防御，审慎地守卫襄阳、樊城而不进攻，通过实行"缓之而后争心生"① 的策略，减轻荆州方面的军事压力，以积极分化并削弱孙、刘。在东线，积极抢夺东吴淮南的入江口。曹操新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是以主力战略机动部队轮番在东、西两线机动作战，通过夺取中间地带和同东吴争夺边郡，壮大自己，削弱孙、刘，分化孙、刘。由于积蓄消灭孙、刘的力量和分化孙、刘，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因此新方针的实质，是持久战。

曹操不再南下消灭孙、刘，为孙、刘迎来扩张的空前机遇，他们决心一方面保持联盟，防御曹操，一方面攻占南方的中间地带，迅速壮大自己的实力。东吴处在北有曹操、东有大海、西有刘备的地理位置上，向北、东、西发展都受到了阻碍，可供它向外扩张的余地比较小。在这一不利的条件下，东吴确立了在北方淮南防御曹操、在其他方向进行扩张的方针，企图先后夺取西方刘璋的益州，北方曹仁的襄阳，与南方士燮的交州。刘备处在北有襄阳曹仁、东有东吴、西有刘璋益州和张鲁汉中的地理位置上，虽然向北、向东发展受到阻碍，但是他的西方是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在那里大有发展余地，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他的方针，是在三方抢占中间地带的形势下，积极行动，按照隆中战略的计划夺取益州，并防止曹、孙对益州的觊觎。

三方根据上述企图，从建安十五年到十九年的 5 年时间里，先后进行了孙权占领交州，曹操统一关西、占领汉中，刘备夺取益州等作战。

---

① 《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

第二节　孙权据有士燮交州

一、向西发展受挫

赤壁战后，在曹操不再南下的形势下，东吴企图向西发展，全据长江。但西方同刘备相邻，向西发展时必须正确解决继续联刘、还是兼并刘备的问题。周瑜主张兼并或者遏制刘备。他鉴于刘备先后投靠陶谦、曹操、刘表，每次又谋夺寄主基业，把他视作食母恶鸟枭中之雄，担心他羽翼丰满后再谋夺东吴基业。他认为，曹操战败不久，其忧患在内部，利用此机会，可兼并或者遏制刘备。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向孙权上疏，建议对刘备先发制人，说刘备以枭雄的姿态，拥有关羽、张飞等熊虎将领，一定不是长期屈居人下、受人支配的人。我认为大计应该是把刘备迁移安置到吴郡，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多送美女、珍玩，娱乐他，分开关、张二人，各自放置一方，让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带领他们攻战，大事是可以定下来的。现在割让土地资助刘备功业，聚刘、关、张三人在我边境，恐怕使其如蛟龙得到云和雨，便终究不是水池中物。吕范也主张扣留刘备。但是孙权认为，曹操在北方，东吴正该广泛延揽英雄，又顾虑刘备难以很快地制服，没有采纳周瑜意见。

于是东吴西方只剩下益州可供兼并。这时益州外有张鲁蚕食，处境不利。周瑜赴京，建议孙权西取益州，进图北方。指出目前曹操新败，未能同将军交兵，我请求同奋威将军孙瑜共同西取益州，兼并张鲁，然后留下孙瑜固守益州，同凉州马超结援，我本人再同将军夺取襄阳，进迫曹操。如此，北方是可图的。孙权批准这个计划。周瑜回江陵作准备，途中染了重病，上疏孙权说，方今曹操在北方，边境不得安宁；刘备寄寓我处，好似养虎，天下事情，不知道结果如何，推荐鲁肃代领其兵，本人死于巴丘（今湖南岳阳南附近），时年36岁。不久，东吴把南郡借给刘备。东

吴与益州之间隔着刘备，要想夺益，必须向刘备借道，得到他的支持。孙权要求刘备同他联合行动。指出刘璋不武，不能守住益州；假使曹操占领益州，那么荆州就危险了。今天打算先取益州，次取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那即使有十个曹操，也不怕了。

刘备原企图自己独自夺取益州，对于东吴的企图采取消极抵制。其主簿殷观指出，如果充当东吴夺取益州的先驱，进不能攻克益州，退必被东吴所败，大事就完了。现在只可同意东吴夺取益州，而申说自己新占领各郡，不可出兵。东吴一定不敢越过我领地独家攻取益州。这样，既答应东吴，又不参与，可以在吴、益两方面都得到好处。于是刘备口头赞成东吴，行动上以防曹为名，作出阻止攻取益州的部署：令关羽屯驻江陵，张飞屯驻秭归，诸葛亮据守南郡。孙权令孙瑜率水军驻夏口（今湖北汉口），准备攻取益州，由于孙瑜无法通过刘备境，孙权不得已，将其召回。由于最雄心勃勃也最有能力执行夺益计划的唯一人选周瑜去世，在刘备阻碍的形势下，东吴向西发展的努力付诸东流。

二、向南据有交州

东吴在西方受挫后，转为向南方交州发展。交州是东汉 13 刺史部之一，位置最南，辖境相当今天广东、海南岛，及广西大部和越南承天以北诸省，北接荆、扬、益州，南临今南海、北部湾，出产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玳瑁、犀角、象牙、香蕉、椰子、龙眼和马，辖有交趾（治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北）等七郡。其中交趾太守、广信（今广西梧州）人士燮，精通政理，20 多年边界无事，乱世中保全一郡，在交州最有势力。起初，交州刺史朱符虐待百姓，百姓反抗把他杀了，州郡陷入混乱。士燮表奏其三个兄弟分别代理合浦、九真、南海诸太守。从此，士燮兄弟名列郡守，称雄全州。士燮偏处万里之外，百蛮震服。威势尊崇无人超出其上，出入礼仪护卫极盛，连南越王尉佗也不能相比。朱符死

后，朝廷派张津继任交州刺史，张津被其部将所杀。荆州牧刘表乘机擅以赖恭继张津任刺史，以吴巨接替死去的苍梧太守。朝廷为了同刘表抗衡，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统率七郡，兼任交趾太守不变。后来，吴巨率兵驱逐赖恭，刘表这两支力量火并，刘表势力受挫。士燮实际上控制了交州。

建安十五年，在刘表已死、曹操退回北方的有利形势下，孙权将其势力伸展到交州，派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任后，士燮带领兄弟们接受他的节制调度，吴巨则表面归顺，怀有异心。步骘以东吴实力为后盾，诱杀吴巨，威声大振，从此岭南开始服从孙权。到了建安末年，孙权给士燮加官为左将军，士燮也派儿子到建业作人质。东吴地跨扬、交二州，势力直达南海。

第三节　曹操统一韩马等割据的关西

一、曹操潼关渭南之战

关西是潼关（今陕西潼关北）以西关中和陇右地区，是曹操进攻江东、益州时的后方。长期以来，凉州势力韩遂、马超集团和董卓集团的残余众将盘踞着关西，名义上承认东汉政府，实际上实行半割据，对曹操统一南方起着牵制作用。建安十六年（211年），司隶校尉钟繇鉴于关西众将不可相信，请求以3000兵力入关，以进讨汉中张鲁为名，向众将索取质任。曹操令荀彧征询留镇关中的卫觊的意见。卫觊不同意，认为西方众将都是低贱的竖夫在屈辱中兴起，没有雄踞天下的志向，只是贪求目前安乐而已。现在朝廷厚加爵号，他们就得到了所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大的变故，不必担心发生变乱。统一关西，最好只列为今后之计。如果进兵关中，应该进讨张鲁。张鲁在深山，道路不通，众将必然怀疑我的真实意图。一旦相互惊动，众将地险兵强，恐怕很伤脑筋了。曹操起初同意卫觊，但以钟繇自典其任，终于听从了钟繇。丞

相仓曹属高柔也进谏，以为现在突然派遣大军进讨张鲁，西方的韩、马会认为是来攻打他们，将煽动叛乱。应先安辑三辅①，三辅如果平定，汉中可传檄而定。曹操不听。

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以驻在洛阳的司隶校尉钟繇进攻汉中张鲁，征西护军夏侯渊取道河东（辖今山西西南黄河以东地区）、关中，为钟繇军后继，企图胁取质任，进一步控制关西众将。关西众将果然被卫觊料中，怀疑曹军是借机来袭击自己。为了自卫，韩遂、马超、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群起反叛曹操，军队共达10万。

曹操错误地逼反关西众将后，只有一战。鉴于关西众将数量多，势力弱，驻地分散而险要，逐个进攻拖长时间，曹操决心把他们诱至一处，聚而歼之。他令徐晃从并州南下，驻在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宝鼎），安抚关中西北要地河东，令曹仁督众将进逼潼关，指示曹仁说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交战。曹仁在潼关前拥兵不战，诱关西军集结。关西众将果然从各自分散的驻地纷纷前来，集结于潼关，企图阻遏曹军于关外。延至七月，曹操从邺城率兵来到潼关前。这时关西众将每一部来到潼关，曹操便面有喜色。众将战后问其原故，曹操指出，关中道远路长，如果众将各自据守险阻，要征讨他们，没有一二年是不能平定的。现在都来防守潼关，集中在一起，人数虽然众多，不相统属，军队没有统帅，一举可以消灭，成功比较容易，我所以高兴。

双方对峙的潼关古为桃林塞，设置于东汉末年。该关南依华山，北临黄河大弯会合渭水的倒“丁”字形交汇处。地势高峻，易守难攻。曹军如果强攻潼关，将费时损兵。曹操企图声东击西，在关前倒“丁”字形处进行迂回，经过两渡黄河、一渡渭水，绕过潼关，进入关中，置该关于无用之地。曹操担心不易渡过黄河，召问徐晃。徐晃以为，您集结重兵在此，而敌人不再另守关北70里外的黄河渡口蒲坂津（今山西永济西蒲州），可知其无谋。现在拨

---

① 汉武帝把京畿之地划为三个行政区，合称三辅，辖今陕西中部地区。

我精兵渡蒲坂津，为我大军打前站，以截击敌占区内地，敌人是可以擒获的。曹操深表同意，于是部署如下：令徐晃、朱灵率精兵先期偷渡到河西，掩护大军渡河，令关前部队准备攻关。曹军众将不知其意图，误以为要在潼关进行攻坚，都说关西兵习练长矛，非精选前锋不可。曹操指出，战在我，不在敌。敌人虽然习练长矛，将使其不得刺，诸位但看好了。

八月，在曹操急攻潼关的掩护下，徐晃、朱灵率步、骑兵4000，夜间从蒲坂津偷渡。由于关西军主力被吸引于潼关，渡口无备，徐、朱顺利渡过，占领河西岸。修筑堑栅尚未完成，关西将梁兴率步骑兵5000夜袭，徐晃将其击溃。闰八月，曹军主力冒险在潼关城傍关西军当面北渡黄河。曹操令部队先渡，自己同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马超见状，率步、骑兵万余人出关攻击曹操，箭如雨下，曹操端坐胡床不动，许褚急扶曹操上船，船工中流箭身死，许褚左手举马鞍，为操挡箭，右手撑船。校尉丁斐放出牛马饵敌，马超军争相猎捕牛马，队伍混乱，曹操才得以渡过，这天几乎死在潼关。曹军主力渡至黄河北岸以后，沿黄河的大转弯北上蒲坂津，在徐晃等的接应下，再次西渡黄河。过河后，沿河把车辆联结在一起，筑成甬道掉头南下，重新抵达渭水北岸。通过这一迂回，绕至潼关之后。马超等率潼关守军急趋渭口（渭水入黄河口），堵击曹军。曹操一面令多布疑兵以分散关西军，一面秘密用船把架桥兵送入渭水，在渭水上突击架设浮桥，连夜分兵过桥，占领渭水南岸，并在沙地上聚沙浇水筑城。所浇的水，天寒结冰，至天明与沙一起冻成坚垒。

马超等关西军失去依托潼关险要的优势，归路又被截断，夜袭渭南曹营，被伏兵击败。于是集结主力于渭南，企图一面阻止曹军后继兵力陆续进入渭南，一面以割让河西（今陕西黄河以西，约为陕北及宁夏南部地区）的条件求和。曹操已操胜券，不允求和。九月，全军渡过渭水。马超等多次挑战，曹操示弱不应。马超等坚持请求割地，送任子，曹操采纳贾诩进行离间的策略，假意答应，乘机分化关西军。韩遂请求见面，曹操与韩遂父亲同年

举孝廉，与韩遂是年龄相当的同辈，在战场上交马谈了多时，不涉及军事，只谈京城故旧，拍手欢笑。谈后马超等问，曹公谈了些什么？韩遂说，没有谈什么，马超等人怀疑。过了几天，曹操又给韩遂来信，上面有多处涂改，好像是韩遂心虚篡改的，马超等更加起疑。曹操利用关西军不能团结一心的时机，约期会战，先以轻兵挑战，久后出动虎豹骑夹击，大破关西军，斩成宜、李堪等，韩遂、马超等逃到凉州陇右，杨秋逃奔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曹操占领关中。

战后，曹军众将有的问，当初，关西军防御潼关，渭北道路防御空虚，我军不从河东郡出击这空虚的渭北左冯翊，进入关中，反而去敌大军所在的潼关前屯兵，在潼关拖延好多天才北渡黄河，这是为什么呢？曹操指出，关西军防守潼关，如果我进军河东，他们一定率兵守河西各渡口，则西河无法渡过，进入不了渭北，所以我以大军指向潼关。关西军全军防御南边，西河的防御空虚，所以二将得以独取西河，然后我率军北渡，关西军不能同我争夺西河，是因为西河已有二将的军队了。用兵车相连，树立栅栏，筑成甬道南下，既是作不可胜的准备，也是示弱。渡过渭水构筑坚垒，敌人到来不出击，是以此骄敌，所以他们不筑营垒，只是割地求和。我顺着答应下来，顺从他们的意愿，使安心不作防备，乘机使我的兵士养精蓄锐，一旦进攻，就造成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①（用兵的变化，本来就不只一种方法。）

十月，曹操从长安越过陇山，北征关西割据者杨秋，围安定郡，杨秋降，恢复其爵位，令留安定安抚其民。十二月，后方河间郡（治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10公里）田银、苏伯起义，于是以夏侯渊督朱灵、路招等驻军长安，留守关中，自己率军返回邺城。

曹操潼关、渭南之战，从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开始，九月结束，历时半年有余。此战，消灭、招降和削弱了关西割据势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力，结束关中长期分裂、动乱局面，为下一步平定陇右、汉中创造了条件。此战是关塞进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曹军虽然久经战阵，但是此战目标关中是四塞之地，易守难攻；割据者众多、分散，如果据险自守，可以使战事久拖不决；但曹操只用半年，就削平群雄，速决取胜。所以取胜，就作战指导而言，主要是：1、按照“战在我”思想，为了掌握战场主动权，不断调动关西军。调动他们从分散状态集结到一起，以便于聚歼；调动他们重兵守潼关，而对西河不作积极设防；调动他们离开要地潼关，到有利于曹军的渭南作战；调动他们骄傲、麻痹和自相猜疑。关西军在曹操调动下，犯了一系列错误，把主动权送给曹操。2、调动关西军的方法，是以假象误敌。征西大军以屯兵潼关前，吸引分散的割据军集结；以佯攻潼关，引开关西军注意力，造成敌西河防御空虚；以作甬道、初到渭南不出击等示弱方法骄敌；等等。这些，在曹操战后讲评中，都作了详细说明。

二、夏侯渊平定陇右之战

统一关西的第二期作战，是以夏侯渊为主进行的统一陇右之战。陇右是陇山（今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的高原和山地地区，属凉州东部，东与关中为邻，是关中通向凉州中、西部的必经通道，境内羌、汉杂居，地势居高临下，瞰制关中，战略位置很重要。陇右被从关中战败逃来的马超、韩遂所盘踞，其西部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则被枹罕羌王宋建所割据。

韩遂、马超败后退入陇右。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马超在张鲁大将杨昂增援下，以万余人进攻曹操凉州治所冀城（今甘肃甘谷东）。刺史韦端坚守到八月，不见救兵，不顾参凉州军事杨阜等人反对，开城投降。夏侯渊奉命西救冀城，未到，城已失陷。马超杀刺史韦端，留用杨阜等当地豪强；但是当地豪强密谋反对马超。九月，杨阜和另一天水人姜叙占据卤城（今甘肃天水、伏羌之间），冀城人赵昂、汉阳人尹奉占据祁山，联合进兵攻冀城。

马超出城作战时，南安人赵衢等作内应，关闭城门，杀马超全家，保冀城。马超在陇右无立足之地，南投张鲁。十九年（214 年）春，在张鲁支持下，出兵围困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夺取冀城周围各县。为了消灭陇右割据势力，夏侯渊发动了统一陇右之战。

此战第一阶段为冀城争夺战。夏侯渊在长安得报马超进兵陇右，认为请示曹操需要往返 4000 余里，不适用于救急，决心不经请示即驰援，其部署是以张郃率步、骑兵 5000 为前军，走陈仓狭道（即散关道），自己督粮跟进。张郃率军到渭水上，马超率氐、羌数千迎战。未战，退走，张郃进军收缴马超军器械。至夏侯渊来到时，冀城附近各县都已归降。

第二阶段为长离之战。夏侯渊企图袭击在陇右显亲（今甘肃秦安西北）割据的韩遂，并在韩闻讯退走后收缴其军粮，追至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约 45 公里），距韩军 20 余里。众将企图攻击之，有的则主张进攻兴国（今甘肃秦安北）氐人。夏侯渊认为，韩遂兵精，兴国城坚，进攻不能速决，不如进击陇右长离（今葫芦河流域地区）诸羌。诸羌子弟多在韩遂军中服役，一定回来救其家乡。韩遂不顾诸羌，则势孤；救长离，则可在野战中将其俘虏。于是留下督将守辎重，以步、骑轻兵到长离，攻烧诸羌。诸羌在韩遂军的，纷纷离军回救所在种落。韩遂来救长离，同夏侯渊军对阵。众将见韩遂兵多，要求结营作堑，然后野战。夏侯渊认为，曹军转战千里，作营堑后再战将疲劳已极，不利久战，敌人虽然兵多，是容易对付的。擂鼓开战，大破韩遂军，缴获其旌麾。乘胜围兴国，兴国氐王千万逃奔马超处，余部投降。以上作战当年春天结束。

第三阶段为灭宋建的陇西之战。枹罕羌王宋建，借凉州战乱，自号河首平汉王。长离之战当年十月，曹操命夏侯渊征讨宋建。夏侯渊率领众将围困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 20 公里），奋战一个多月，将其攻克，杀宋建。又派张郃等平定河关（今青海同仁西北 20 公里），渡黄河进入小湟中（今青海大通一带地区），河西羌族诸部全部投降。至此，韩遂、马超不成气候，陇右基本平定。曹

操下令褒奖说，宋建叛乱为逆30余年，夏侯渊一举消灭了他，虎步关右，所向无前。应了孔子的话："我和你不如他！"

第四节　曹孙争夺淮南

一、双方争夺淮南的企图

赤壁战后，曹、孙展开边境地区的争夺。曹、孙之间没有中间地带，因此双方一开始便争夺边境地区。对曹操来说，边境上的江陵、广陵（今江苏扬州）都不是争夺的最佳方向。江陵方向是孙、刘结合部，这个方向只能智取，如果武力争夺，则同对孙、刘实施"缓之而后争心生"① 的策略相抵触。广陵方向的问题，主要是地形不利，道路远，自淮入江的中渎水较浅，不便行船。比较起来，理想的还是淮南方向。淮南是指巢湖所在的江淮间地区。官渡之战以来，曹、吴分占淮南。淮南巢湖（含巢湖）以北，包括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今属安徽）等主要地区属曹；巢湖以南，临江百里的狭长地带属吴。曹军沿着黄河、涡水进入淮水，可以到达淮南，再沿着淮南的肥水，经寿春、芍陂、合肥、施水、巢湖、濡须水，通过吴境，可以直抵长江。在淮南境内的水道上，只有合肥附近的肥、施二水互不连通，但是二水发源地离得较近。淮南由于有这样一条水道连通曹、孙双方，成了曹、孙争夺的战略枢纽。曹操决心以淮南为主要方向，合肥为前线基地，夺取入江口和制江权，通过军事压力，摧毁东吴的抗曹意志，迫使其屈服。

针对曹操的企图，孙权决心以淮南为主要防御方向，固守境内濡须水道，在有利时机出击江北皖城和合肥，破坏曹操濒江部署，以确保江东的安全和蚕食曹占区。曹、孙争夺的重点，从赤

---

①《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

壁之战的江陵转向了淮南。潼关渭南战后，双方从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到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先后进行了3次争夺淮南的作战。

二、曹操两攻濡须企图夺取制江权

第一次，曹操一攻濡须之战。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率步、骑兵号称40万，东征孙权。次年正月，从合肥进军濡须口，攻破东吴江北营，俘获都督公孙阳。曹军进入长江，分兵乘油船①偷渡，登上江心小洲，建立江心基地。孙权向刘备呼救，并率7万吴军抵御，分水军围攻江心洲。洲中曹军被俘3000余人，淹死数千，退回濡须。孙权屡次挑战，曹军坚守不出。孙权乘轻船进入濡须口观察曹军，驶行五六里。曹操令弓弩乱发，吴船一侧附著射来的箭，侧倾要翻。孙权令回船使另一侧受箭。两侧均匀受箭后，恢复平衡，边迂回行驶还边奏乐鼓吹。曹操见其舟船器械军伍整齐肃穆，喟然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刘表儿子像猪狗罢了。双方相持一个多月，孙权致笺曹操道，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纸写道："足下不死，孤不得安。"②曹操认为形势将向不利方向发展，对众将说，孙权不欺骗我。下令退军，四月回到邺城。

第二次，吕蒙攻皖城之战。曹操从一攻濡须作战中认识到，淮南濒江地区不易突破，争夺将是长期的，争夺对象不仅有土地，也有人口，担心淮南曹占区民众被孙权掠走，下令把他们迁到内地。蒋济劝阻说，现在民众没有二心，可是人情怀恋乡土，不乐意迁徙。曹操不听，结果江、淮间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诸郡10余万户民众彼此影响，惊恐不安，都逃到江东。淮南曹占区空虚，合肥以南，只剩下皖城（今安徽潜山）。后来曹操见了蒋济，大笑

① 胡三省：《资治通鉴》黄初四年二月条注，油船"盖以牛皮为之，外施油以扞水。"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吴历》。

道，本来只是想让百姓躲避东吴，不料把他们驱逐光了。

于是曹军在争夺淮南时，只能以人烟稀少的当地为依托，后勤保障极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从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移屯到距江边仅数十里的皖城，大规模开发稻田，以增加前线军粮。对此举，东吴深感忧虑。吕蒙对孙权说，皖城土地肥美，一旦收获，曹军兵力必然扩充，应该及早除掉它。建安十九年五月，孙权亲率吴军经皖水上岸，企图夺取皖城。众将建议堆土山添攻城器具。吕蒙指出，这要很多天才能办成，那时对方的皖城也修缮好了，救兵必到，就不可再进攻了；而且我军利用雨水暴涨沿水前来，停留时间过长，水必流光，回路艰难。我看此城，并不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齐攻，不用一个时辰可以攻克，及水未退回军，这是全胜之道。并举荐甘宁为升城督。甘宁持练攀城，身先士卒；吕蒙率精锐为后继跟进，亲手执桴鼓，兵士都踊跃地自动登城。拂晓进攻，上午攻破皖城，俘虏朱光及男女人口数万。这时是闰五月。曹将张辽率救兵到来时，城已攻下，只好退兵。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太守，在江北组织防御，俘虏的人马都分给他一份。东吴此战，拔除了曹军濒江的屯田据点，大大削弱了曹军在淮南发动进攻的能力。在战斗中，吕蒙利用水路进军，速进，速决，充分发挥其剽悍的战斗作风，在东吴不甚擅长的陆战中取得了胜利。

第三次，曹操二攻濡须之战。同年七月，曹操以少子曹植留守邺城，率众军到合肥，进攻东吴。参军傅干反对用兵，向曹操指出过去天下大乱，你用武力，十平其九，现在与过去不同了，吴、蜀难以通过武力迫其屈服。如果继续用兵，则孙、刘凭借险阻，深藏不出，大军难以发挥作用，有损威信。主张“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停止军事行动，通过文治，以德服人，“全威养德，以道制胜”①。曹操不听。十月，无功而返。

上述 3 次作战，目标是对土地、以及围绕加强还是破坏曹军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淮南基地、保护还是破坏曹军淮南的人口和粮食生产的争夺，核心是争夺制江权。在争夺制江权时，曹操基本处于攻势，孙权处于防御；在争夺人口和粮食以破坏曹军对制江权的争夺时，则是孙权基本处于攻势，曹操基本处于防御。曹操由于缺少水军，以及在迁移淮南人口问题上犯了错误，造成濒江地区人口空尽，夺取长江口的企图未能如愿；但是如果采取参军傅干"按甲寝兵，息军养士"的方针，完全放弃对东吴的压力，似乎为时嫌早，所以曹操没有采纳。

第五节　刘备夺取刘璋益州

一、夺取益州的决策

刘备据有荆州后，最大目标莫过于夺取益州了，而在赤壁战后，益州的形势也朝着有利于刘备的方向发展。益州牧刘璋在南北之争中，不再倒向曹操。刘璋在曹操南下荆州时，曾陆续派阴溥、张肃、张松前往曹操处致意。曹操热情接待阴、张，都给了官做；后来已定荆州，不再关心和提拔后去的别驾张松。张松怨恨，回益州后主张同曹操断绝来往，结交刘备。恰好形势逆转，曹操赤壁战败，刘备割据荆州，刘璋便同意了，派军议校尉法正前往同刘备建立联盟，企图依赖刘备自保。这时，益州以别驾张松、法正为代表的巴蜀集团部分成员不满意刘璋懦弱无能，企图拥戴有作为的领袖，并选中刘备。法正是关中扶风人，投靠刘璋后很不得志，同蜀郡人张松关系密切，出使刘备归来后，向张松盛赞刘备雄才大略，俩人密谋合力推举刘备为益州之主，苦于没有机会。

建安十六年（211年），张松、法正的机会到来了。曹操派钟繇征讨汉中张鲁，引起刘璋唇亡齿寒的恐惧。张松乘机建议迎请刘备进入益州。他说，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如果他利用张鲁

的资业攻取蜀地，谁能抵挡得了呢？刘备，是您的宗室，曹操的深仇，善于用兵；如果请他进攻张鲁，张鲁必破。张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然到来，也是无所作为的。现在州中众将庞羲、李异等都依仗功劳骄豪，企图依附外人。您如果得不到刘备帮助，则敌人攻其外，民众攻其内，是必败之道。刘璋同意，派法正、孟达率4000名兵士，邀请刘备进入益州。巴蜀集团许多人反对引入刘备集团。主簿、巴西人黄权劝谏刘璋说，左将军有勇猛善战的名声，今天请他来，拿部曲对待，满足不了他；拿宾客礼节接待，一国不容二君。如果宾客安如泰山，主人就危如累卵。益州只可关闭边境，等待天下太平。刘璋为了排除黄权阻挠，调他外任广汉县长。从事、广汉人王累，倒悬在成都城门上进行劝谏，刘璋一概不加理睬。

奉命出使的法正向刘备传达了刘璋的邀请，私下献策乘此机会夺取益州。他说，以明将军的英才，利用刘牧懦弱，及益州主要官员张松在内响应，然后依托益州富庶、天府险阻，成就大业，易如反掌。这个建议得到刘备军师中郎将庞统的支持，庞统认为，从三分天下出发，应该把割据重点从饱受战乱破坏的荆州，转移到条件优越的益州。他说，荆州荒残破败，人才已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鼎足三分的计谋，难以得志。现在益州国富民强，人口百万，土地肥沃，财货珍宝无需求于境外，可权借它成就大业。庞统是襄阳名士，被庞德公评价为“凤雏”，得到鲁肃、诸葛亮的推荐，在刘备处受到的亲信倚重，仅次于诸葛亮。

刘备原来的企图，是经长期努力，利用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①的愿望伺机进行渗透，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巴蜀集团，然后再夺取益州；担心采用法正这个欺诈的策略损害政治形象，妨碍争取益州大姓的努力。他说，现在人们认为同我水火不相容的是曹操。曹操用急，我用宽；曹操用暴，我用仁；曹操用谲诈，我用忠厚；每事都同曹操相反，大事才可以成功。今天由于小事失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信于天下，是我所不取的。庞统指出，在权变时代，天下不是一种方法能够平定的。兼弱攻昧，是五霸事业，用非正当手段夺取，用正当手段防守，用义来回报刘璋，事成之后，拿大的地方封他，在“信”方面有什么亏负的呢？今天不取益州，终归别人得益罢了。在法正、庞统说服下，刘备在蒙受欺诈名声和得益州之间，选择了益州。

刘备进行战争准备，收集益州军事情报。以前见张松，后来见法正，都用厚重恩意接待，殷勤尽欢，趁机了解蜀中地形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各要害道路里数远近。张松等一一作了回答，又画地图，标示山川处所。刘备战前全部掌握益州虚实。

建安十六年（211年）十月，刘备决心以荆州为根据地，借受邀请开进益州伺机夺取之，其部署是：以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留守荆州重地，以赵云代理留营司马，掌管荆州留营军事；亲自率领步兵数万，以庞统随行，沿长江三峡西上。

刘备沿江进入益州后，所到之处向他供应各项物品。刘备像回到家里一样，前后所得赠品以巨亿计算。路经巴郡时，该郡太守严颜抚心叹道，“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①。刘备从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区嘉陵江北岸）沿涪水北上到达了涪县（今四川绵阳），南距成都360里。这时，刘璋率领步骑兵3万多人，车辆支起帐幔，光彩鲜明，像太阳一样耀眼，北上来同刘备会晤。张松、庞统、法正等为了使刘备“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②，策划会晤中劫持刘璋，逼其让出益州。刘备认为刚进入别人境内，还没有树立起恩德信任，不宜匆忙下手。于是在主客会晤中，刘备将士轮流到刘璋处会见欢饮100多天。刘璋为保障刘备北上攻击张鲁，赠送米20万斛，战骑千匹，车千乘，以及缯絮锦帛，授权刘备指挥益州北部白水关（今四川广原东北）驻军。会晤后刘备集结各路军队3万多人和大批的车辆、盔甲、兵器、装备物资北上，在

---

① 《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注引常璩《华阳国志》。

② 《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

白水关以南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驻军，按兵不动，广树恩德，收揽人心，进行夺取益州的准备。

二、南下进军和雒城之战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刘备在葭萌驻军满一年，如果继续按兵不动，将陷入被动。这时双方基本情况是：刘璋拥有数万兵力，粮食储备较多①，占有优势；但是大部分兵力用于防守，战略机动部队不多，丧失了部分巴蜀集团人士的信心。刘备方面，可用兵力不满1万，粮食和运输都较困难；但是刘备在海内有较高威望，赢得巴蜀集团部分人士倾心支持，进行了较充分的战争准备，较好地荫蔽了意图，有荆州作为依托。从以上情况出发，庞统献上三计供刘备抉择：上计是秘密选择精兵，昼夜兼程，径直袭取成都。刘璋既不勇武，又一向无准备，大军突然到达，一举便可平定。中计是鉴于杨怀、高沛是刘璋名将，各拥强兵，据守关头，听说屡次有笺谏刘璋，建议发送将军回荆州。将军未到关头前，同二将通信，说荆州有紧急情况，企图回兵援救，并令部队整理行装，表面作出回军样子，这两人既佩服将军英名，又高兴将军离去，估计必乘轻骑来送行，将军就此将其劫持，进夺其军队，然后向成都进兵。下计是退回白帝，连通荆州，徐徐回军再图益州。如果沉吟不离去，将导致大难，不可久拖不决。

刘备从消除侧后威胁着眼，同意中计，派使者对刘璋说，曹操进攻东吴，东吴忧愁危急。孙氏同我本是唇齿，况且乐进同关羽在青泥（水名，在今湖北襄樊西北一带）相持。现在不去救关羽，乐进一定获胜，尔后将侵犯益州，那时的忧患要超过张鲁威胁，张鲁是自守之敌，不值得忧虑。要求刘璋增拨1万兵力及财物粮草。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刘备进围成都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

刘璋同意给 4000 兵，其余按半数拨给。刘备借此激怒部队，指责刘璋“积帑藏之财而吝于赏功”①。张松不知刘备用计，给刘备和法正写信说，现在大事临近成功，为什么丢下益州退兵呢？此事被其兄发现，害怕受牵连，向刘璋揭发。刘璋将张松处斩。刘备、刘璋之间开始产生怨恨和裂痕。刘璋下令禁止关戍众将把文书送给刘备。刘备大怒，以不通报文书的罪名，召见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杀二人，然后向刘璋发起进攻，其部署是：以黄忠、卓膺率兵南下，向成都方向进攻，夺取涪县（今四川绵阳）、绵竹、雒县（今四川广汉），自己北上白水关，把白水军将士妻子儿女扣为人质，兼并该军，解除后顾之忧，然后率白水军南下，与黄忠会师，进据涪县。

刘璋针对刘备孤军深入，兵不满万，进行依靠掠夺庄稼为生的无后方作战等弱点，企图以多击少，通过旷日持久，拖垮刘备军，其部署是：在成都前方构筑三道防线，以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防御涪城，李严等防御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刘璝、张任与刘璋儿子刘循率 1 万兵防御雒县。十八年（213 年）五月，从事郑度建议坚壁清野，说不如把刘备侧后巴西郡和梓潼县的百姓全部驱赶到涪水以西安置，把仓库粮食、田里庄稼，通通烧光，然后高垒深沟，镇静地进行防御。刘备军前来求战时，坚守不应战。时间一长，刘备军没有物资供应，不过百天，就会撤退。然后反击，一定可以把刘备俘虏。刘备听说此事，十分担心。法正认为不必，刘璋一定不会采纳。刘璋果然罢免郑度，自称只听说通过抵抗敌人来安定人民，没有听说通过骚扰人民，来躲避敌人的。在刘备攻势下，涪城众将陆续战败，退保绵竹；绵竹守将李严、费观又投降，刘备军越战越强。为了在广大的地区内筹集粮草，在攻击主要城市的同时，分兵平定各县。

刘璝、张任、刘循等决心死守成都前方最后一道防线雒城。六月，刘备围困雒城，长期不能攻下，庞统中流箭身亡。刘备调荆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魏书》。

州诸葛亮率兵入蜀增援。诸葛亮留关羽镇守荆州，自己率张飞、赵云及数万兵，溯江西上。大军进入益州以后，攻克巴东（治鱼复，在今四川奉节东）、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市区嘉陵江北岸），生俘巴郡太守严颜。张飞喝斥严颜说，大军到来，为什么不投降还敢抵抗？严颜斥责说，你等无状，侵夺我益州，我益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张飞大怒，令左右把严颜牵去砍头。严颜面色不变说，要砍头就砍头，发什么怒！张飞很钦佩他，把他放了，引作宾客。诸葛亮军抵江州兵分三路，以平定益州东部中部各郡县，解决筹粮来源，然后会师攻成都，其部署是：令赵云为南路，从外水（今岷江）南下平定江阳郡（治江阳，今四川泸州）、犍为郡（治武阳，今四川彭山）；令张飞为北路，北上平定巴西郡（治阆中，今属四川）、德阳县（今四川遂宁东南）；自己居中路。三路大军在益州东部和中部地区配合刘备作战。

刘备围困雒城十个月以后，形势越来越有利，令法正向刘璋劝降。法正在信中指出，刘璋左右的人不衡量双方强弱的态势，以为刘备孤军深入，没有粮食储备，企图以多击少，旷日持久。但是刘备军从白水关打到雒城这里，所进攻的地方都攻了下来。雒城虽然有上万兵力，也都是败阵之卒、破军之将。如果要争一日之雌雄，则您兵将的力量，实在很不相当。如果企图长期相持，计算谁的军粮先用尽，那么这里围城部队的营守已经坚固，谷米已经筹集，而您的土地日益减少，百姓日渐困穷，与您为敌的力量逐渐增多，您的供应紧缺。照愚意计算，认为您一定先告竭，将不再能够持久。仅仅这样相持，都支撑不住，何况现在张益德数万部队，平定了巴东，进入犍为郡界，正在分兵平定资中、德阳，三道并进，您又拿什么来防御呢？原来为您出谋划策的人，一定认为刘备军孤远无粮，运输供应跟不上，兵少没有后续力量，现在荆州道路打通，军力数十倍，加上孙车骑将军（孙权）又派遣他的弟弟和李异、甘宁等作为诸葛亮军的后续兵力。如果要较量客主之间的态势、依靠领土取胜的话，那么刘备方面全部据有巴东、广汉、犍为三郡，益州土地过半数已经平定，巴西一郡又不再为

您所有。计算益州所仰仗的，只有蜀郡。蜀郡也遭到了破坏。您三分土地丧失了二分，吏民疲劳穷困，想叛乱的十户占了八户。如果敌人离得较远，百姓则不能忍受转运军粮的劳役；如果敌人逼得较近，百姓则一个早上就会换一个主人。广汉诸县，就是明显的例子（李严投降）。此外，鱼复（今四川奉节东北）和关头（此指白水关）实为益州安危祸福的大门，现在两座大门洞开，坚城都被攻陷，众军一齐战败，兵将损耗殆尽，而敌人数道并进，攻入腹心地区，您坐守成都、雒县，存亡的大势，昭然可见。这是大概的形势，其余隐蔽的方面，在信中就难以说清了。您左右明智用谋之士，难道看不到这个结局吗？如果事穷势迫，他们将各自寻生，以求保全门户，不会都为您死难的，而尊门将蒙受这一大祸。左将军从举事以来，依依恋旧，愚以为可以考虑改变策略，以保全您的一家。刘璋见信不答。十九年四月，雒城顽强抵抗近一年，终被攻陷。

三、和平占领成都

刘备得胜之师，会合诸葛亮、张飞、赵云援军，新到马超军，合围成都。马超进攻陇右失败后，认为张鲁不足以共谋大事，秘密写信要求投奔刘备。刘备大喜道，我得到益州了。马超率领刘备暗中加强的部队，直抵成都城下，屯驻在城北。城中听说马超英名，惊讶援助刘备，见他兵多，十分震惊和恐怖。刘备围困成都数十天，以许诺攻破后允许抢劫府库，激励士气。在城内，蜀郡太守许靖密谋翻越城墙投降被发觉。鉴于灭亡在即，刘璋没有杀他。刘备闻讯，派从事中郎简雍进城劝降。当时城中尚有精兵3万，谷帛支持一年，吏民表示愿意死战。刘璋深感困守孤城无望，与简雍共乘一辆舆车，开城出降。刘备和平占领成都。

刘备占领益州巴、蜀和南中，以成都为治所，以蜀地为政治、经济中心，吸收刘璋集团愿意合作的成员。董和、黄权、李严，本是刘璋所委任的，吴懿、费观等同刘璋有婚亲关系，彭羕是刘璋所排斥的，刘巴是刘璋一向忌恨的，刘备都处以显要位置，发挥其才能。在

刘备集团中，关、张、糜、简等早年跟随刘备的，构成北方故旧集团；诸葛等中期参加的，构成荆襄集团；此次巴蜀集团和西北方面马超参加进来以后，进一步扩大了刘备集团的基础。刘备在此基础上，组织政权，自己兼任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充任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优待刘璋，迁到南郡公安，归还他全部财物，及振威将军印绶。

刘备于建安十六年（211 年）十月受邀请进入益州，经过一年准备，发起夺取益州之战。此战，从十七年十二月南下进军开始，到十九年（214 年）四月和平占领成都基本结束，历时 2 年零 5 个月，刘备占领了刘璋益州，基本完成隆中战略跨有荆、益计划，战后实力已略大于东吴。益州是四塞之国，易守难攻。此战在历史上首次经三峡夺取益州，是以劣势兵力客军深入，进行无后方作战。作战成功，客观上是刘璋同益州部分豪强关系紧张，以张松、法正及后来投降的李严等为代表的益州官僚，在刘璋和刘备之间选择了刘备。主观指导上则是由于：1、战争发起前，荫蔽战争意图。2、在雒城攻坚战的同时和诸葛亮增援军到达时，夺取广大地区，以解决无后方作战所需的粮源。因此攻雒城后期，在占有土地、粮食方面，都超过刘璋。通过沿途招降收编和调入荆州军，解决了兵少矛盾，完成由劣势向优势的转化。3、军事打击辅以政治争取。战前同刘璋建立联合，使得刘璋敢于信任刘备迎请入益。入益后，争取民心、军心和刘璋官吏之心。作战中，第一阶段争取到刘璋重要将领、官员出降。第二、第三阶段，以法正、简雍劝降，给出路的政策，向刘璋攻心，减低抵抗。

第六节　曹操占领张鲁汉中

一、攻克汉中

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位于益州北部，北横秦岭

邻关中，南亘巴山连三巴，是巴山、秦岭之间的带状盆地，有汉水从东西横贯流过，地形险恶，易守难攻，为进入益州的咽喉。在汉中割据的，是从农民起义发展起来的张鲁政权。它名义接受朝廷封号，实际保持独立。刘备占领益州以后，汉中成为曹、刘中间地带。曹操决心抢在刘备之前攻取汉中，其部署是：率兵10万①，从关中出发，取道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散关（在今宝鸡西南大散岭上）、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银杏镇）、武都氐②、阳平关，进攻汉中。

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在二攻濡须以后，率军西征。西征路经的武都、阴平郡氐人不欢迎曹军过境，在曹军到来前把道路阻塞住；曹军到来以后，氐王窦茂率万人据险不服。五月，曹操攻击、屠杀窦茂部。西征路途附近的凉州西平、金城郡割据势力麴演、蒋石等为了自保，斩杀韩遂，送来首级，表示愿意归顺。

七月，曹军进抵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白马河入汉水处）。该关位于汉中西境，在秦岭、大巴两大山脉汇合处，西以浕水为带，南临汉水，城侧二水交汇③，是从关中进入汉中的门户，易守难攻，军事价值极高。这时，张鲁愿意归降，其弟张卫坚持将曹军拒于汉中之外，其部署是：横山筑阳平城十余里，以数万人拒守该城。事前凉州从事和武都氐降人都说张鲁容易进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距较远，不足以固守，曹操信以为真。及至亲临踏看，并不像听到的那样，叹道，靠别人估量，很少如人意。曹军仰攻阳平城山上众屯。山峻难登，按期攻不下，伤亡较多，军粮将用尽。曹操决心动摇，自称这是个妖气怪异的地方罢了，哪能有什么作为，决心在军粮所剩无几时，拔出军队，翻越山岭回军。他率军先退

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杨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

② 地名，在今甘肃西和西南一带。此地氐人居多，所以名武都氐。武都氐又是部族名，是氐族中的一支。

③ 参见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十七《沔水上》。

兵，令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到山上，传达撤军命令，组织实施，令主簿刘晔等统率殿后众军，逐次分批撤出。

当夜后军尚未退出战斗，迷误中闯入张卫别营。张卫军知道曹军将退兵后，守备松懈，骤见曹军到来，大惊，又有野麋鹿数千，夜间突入冲坏张卫营，张卫军纷纷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刘晔等位于山上部队后面，把亲自掌握的敌人散走的意外情况报告夏侯惇。夏侯惇不信，亲来察看，才报告曹操。刘晔认为当前新情况下，张鲁可以攻克，不应退兵，加上粮食不继，即使退兵，部队也不能全部保全，驰马报告曹操。曹操立即变更部署，令部队连夜据险袭击，多用弩兵，箭射敌营。曹军在进攻中斩敌将杨任，继攻张卫，张卫不敌，乘夜暗逃走，曹军占领阳平关，汉中门户洞开。张鲁再次愿行跪拜礼投降。功曹阎圃以为，今天处境逼迫，前往投降，功劳必轻；不如依靠杜濩、朴胡抵抗一阵，然后投降，功劳必多。于是溃奔南山，进入巴中。左右想把汉中珍宝仓库烧掉。张鲁认为，本来想归顺天子，愿望未实现，今天出走，是避其锐气，并无恶意。珍宝府库，是天子所有，封好仓库，才撤离。曹操进入南郑（汉中治所，今陕西汉中市），对张鲁封库很赞赏。当时是八月。

二、同刘备争夺三巴

曹操攻克汉中后，同刘备接壤。这时刘备占领蜀地为中心的益州仅一年零两个月，又远赴荆州，同东吴争夺长沙等三郡。在此有利形势下，丞相主簿司马懿、刘晔建议南下攻取蜀地。司马懿指出，刘备用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尚未归附他，就远争江陵（见下节），这个机会不可失去。现在攻克汉中，蜀中震动，进兵该地，蜀中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背时机，也不能丧失时机。刘晔指出，现在攻下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去守卫的信心，推此而前，蜀地可传布檄文而平定。刘备，是人杰，有度量，但迟缓，得到蜀地的日子浅，蜀人尚未依附他。现在攻破汉中，蜀人

震恐，其势自倒。利用其自倒之势而压迫之，没有攻不克的。如果稍缓一下，诸葛亮明于治国为辅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当战将，蜀地人民安定以后，据守险要，就不可侵犯了。今日不取，必将成为后忧。曹操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① 不从。不从的原因，可能是曹操考虑到汉中尚未巩固，张鲁未降，刘备尽管得蜀不久，但已经能够用其豪杰，凭险拒守，岂肯像张鲁那样束手就擒？如果刘备联合张鲁，凭借险要，持久抵抗，曹军悬军深入，有可能长期陷在西线拔不出来，造成东线有失。过了七天，据蜀地投降人称，蜀中一天数十次惊恐，守将虽然斩乱者也不能安定下来。曹操延问刘晔，现今还可以进击吗？刘晔答，现在已经小定，不可以进击了。蜀中一日数十惊的七天后，竟然小定，显然是不可能的。无非是刘晔发觉数十惊的情报有假，刘备方面守蜀有方，未可轻易进犯，以小定为借口，放弃其攻蜀建议罢了。

曹操鉴于张鲁本有善意，企图招降张鲁，并乘势夺取三巴。三巴指益州东部巴郡、巴东、巴西三郡，辖境相当今四川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的大部分地区。三巴既是刘备占领区，也是张鲁及七姓夷王固有的势力范围。曹操派人去巴西慰问张鲁并劝降。九月，巴地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及任约率领巴地夷人和賨民归附曹操。曹操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十一月，张鲁也率余部出降。曹操拜为镇南将军，用客礼相待，封张鲁五个儿子及阎圃等为列侯。

刘备起初忽略在益州方向同曹操的斗争，获悉曹操进攻汉中后，才急忙同东吴讲和，从荆州返回蜀地。这时张鲁逃到了巴中，偏将军、巴西阆中人黄权向刘备指出，如果汉中失陷，则三巴不能振作，等于割掉蜀的股臂。刘备决心联合张鲁共同抗曹，保卫巴蜀，令黄权为护军，率众将迎张鲁。但张鲁已经北降曹操，曹操还任命朴胡等为三巴太守。刘备令黄权进击夷帅，黄权大破朴

①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宣帝纪》。

胡等。曹操认识到，三巴与蜀中地理联系紧密，即使占据三巴也难以固守，应该重点争夺三巴的人口，令张郃率领众军巡行三巴，把百姓迁往汉中。张郃进军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45公里），刘备令巴西太守张飞迎战。双方相持50余天。张飞率精兵万余，从他道截击张郃。山道狭窄，前后不能相救，张飞大破张郃。张郃弃马登山，与麾下10余人从小道逃脱，率军退回南郑，刘备也回到成都。曹操在三巴失利后，部署回军：令关中护军赵俨从关中调1200名兵士，加强汉中防御，令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监护张郃、徐晃等镇守汉中，以丞相府长史杜袭督汉中诸军事，自己率主力于十二月回军。杜袭后来把汉中8万户百姓迁到洛阳和邺城。次年二月，曹操抵邺城。

曹操此次作战，粮食消耗大，运输道路远而艰，沿途多是山路，即使从中途武都起算，也必须"山行千里"① 才能到达。运夫在远途中消耗粮食增多，还加大了粮食供应量。曹操以关中、河东为粮食供应基地，为此战前以能员郑浑为京兆尹（治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郑浑鉴于百姓大多是不久才定居的，制定了移居之法，鼓励勤劳务农，严明禁令，从此百姓安心务农。及至大军进入汉中，郑浑运输军粮功劳最高。河东太守杜畿也是能员，派出5000人运送军粮。由于河东治理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运粮者无一人逃亡。此外，曹操尽可能就地筹粮，令雍州刺史张既从散关进入，进攻叛变的氐人，收割氐麦供应军食。通过上述努力，仅满足大军几个月的粮食需求。

曹操统一汉中之战，从建安二十年三月率军出发，次年二月回到邺城，历时近1年。此战逼降张鲁和巴中七姓夷帅，统一了汉中，打开进入益州的第一道门户，直接威胁刘备。此战是山地要塞攻坚战，也是远离后方作战。其取胜原因中最具特色的，是在情况突然变化时，果断、及时地改变决心。由于此战无论从两线作战的处境，还是从粮食保障的困难来说，都不宜持久；因此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阳平关久攻不下以后，即准备退军，这是摆脱被动的正确决策。在退军决心已下、正在实施时，从偶然事件中，发现张卫军出现极为麻痹、有机可乘的新情况，连夜改变决心，变更部署，发起新的进攻，顺利地攻克了阳平关，可以说是善于捕捉战机，当机立断。曹丕曾回忆道："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张鲁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夫挥戟，千人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网罟，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① 其次，是通过任用能员，大力发展生产、保障运输，并坚持因粮于敌，较好地解决了远离后方作战的粮食保障。

张卫以劣势兵力，依托汉中和阳平关险要，对无后方的曹军打持久战，方针正确，是可以守住汉中的。他失败在治军无方，稍有胜利，就麻痹松懈，导致功亏一篑，从他的角度说来，也十分令人惋惜。

① 《太平御览》卷三五三《兵部·戟》引《魏文帝书》。

第八章　孙刘妥协各向曹操争夺边郡

第一节　孙刘争夺荆州达成妥协

一、孙权向刘备索要荆州

曹操、孙权、刘备以5年时间把中间地带瓜分完毕后，从建安二十年（215年）起，彼此进入直接交战。三家实力更为壮大，暂时谁也吃不了谁，因此仅企图夺取对方边郡，削弱对方，壮大自己。三家在直接交战中各有企图。刘备企图夺取曹操益州汉中、房陵、上庸、西城和荆州南阳等各边郡，实现完全跨有荆、益，以扫除未来北上宛、洛和西出秦川的障碍。孙权企图收回荆州。曹操鉴于邺城距刘备路远而艰难、距东吴路近而易行，企图在西线防御刘备，在东线同东吴争夺淮南入江口。在三家上述企图下，发生了孙、刘荆州三郡之争，刘、曹汉中和房陵、上庸、西城之争，曹、孙淮南之争，关羽曹操襄樊之争等一系列作战。

在边郡争夺中，最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孙、刘围绕荆州归属的争执。这一争执，动摇着孙、刘联盟，严重影响中国战略格局的走向。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同孙权构成的寄寓者与寄主的关系，已经名不符实。刘备在对抗曹操、屏障着东吴的同时，也由于地跨两州，雄踞上流，对东吴构成威胁，使东吴深感不安。

东吴决心消除隐患，发展自己，以寄主身份收回荆州。考虑到曹、孙缘江之争正酣，还需要刘备的联盟，方式上力求通过外交途径，使用和平手段；如果无效，再诉诸武力。于是派中司马诸葛瑾出使刘备，索还荆州各郡。东吴提出，它借给刘备的，不仅

是南郡，也包括南四郡，因为那是刘备在其默许下夺到的。东吴这一立场非常坚定，形势发展到刘备非交出荆州各郡，否则孙、刘间永无宁日的地步。刘备新得益州，意气正盛，认为跨有荆、益是他的素志，荆州是未来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不能归还东吴，企图用拖延的办法，将归还问题不了了之。他对东吴使者诸葛瑾说，我正在图谋凉州。等到凉州平定，就把借来的荆州都归还。刘备在不觉中流露出骄傲情绪，对于拖延不还造成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

二、孙刘争夺和平分荆州

孙权认为，这是借了不还，还想拿空话拖延时间，决心强行索还。在确定强索目标时，他可能考虑到不能无视关羽在南郡屏蔽曹军的作用，同时，南郡是关羽精兵所在，如果强索南郡，势将促成孙、刘大战，不易如愿。因此，虽然借出南郡，但是决定此次只索还长沙、零陵、桂阳南三郡，把南郡、武陵二郡暂时留给刘备。建安二十年（215 年），孙权自行署置南三郡长吏。但是关羽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

孙权大怒，决心使用武力，派吕蒙率兵 2 万，攻取南三郡。南三郡兵力单薄。吕蒙移书长沙、桂阳，两郡望风归顺，只有零陵太守郝普不降。这时刘备决心反蚕食，率兵 5 万，亲自从蜀地到公安，指挥保卫南三郡，令关羽进入长沙郡北部之益阳（今属湖南）。孙权部署应战：令鲁肃率 1 万兵屯驻益阳，阻止关羽军深入，飞书召吕蒙，令停止进攻零陵，紧急回军支援鲁肃，自己进驻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水入江处），节度众军。吕蒙得到军书后，认为零陵孤立无援，消息闭塞，有可能立即将其诱降。他扣住军书秘而不宣，派零陵守将郝普的朋友前往郡城内，以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所围、无暇顾及荆州，郝普城破身死无益等假情况，进行劝降。郝普信以为真，出降。吕蒙出示孙权军书，郝普才知道刘备近在公安、关羽近在益阳，惭愧至极，恨不得钻进地里。吕蒙拍手大笑，当天率军北上，奔赴益阳。

鲁肃在益阳，要求会晤关羽，解决分歧。众将担心意外，商议不可前往。鲁肃认为刘备、关羽理亏，在谈判中不敢伤害自己。指出今天的事，最好讲道理说通。刘备对不起我们，是非未决，关羽怎敢贪欲触犯天命。鲁肃邀请关羽相见，双方各把兵马部署在百步之上，只允许众将军带着单刀赴会。鲁肃责备不归还南三郡。关羽说，乌林之役，左将军（刘备）亲自在行伍间，合力破敌，怎能徒劳，没有一块土地，足下此来想收回土地吗！鲁肃说，不然。当初我在长坂同刘豫州见面，刘豫州部队剩下不到一校，无计可施，志短势弱，企图远窜。我主上可怜他无立足之地，不吝惜土地人民，使他有所庇荫，帮他度过困难。可是刘豫州为一己之私，不讲道德，不顾盟好，今天已经得到益州，又企图吞并荆州。这样的事，连凡夫俗子都不忍心去做，何况是领袖人物呢？关羽无辞以答。

这时，刘备听说曹操攻克汉中，张鲁逃到巴西，害怕益州跟着丢失，向孙权求和。孙权也认为双方和比战好，令诸葛瑾回报。双方订立盟好，商定重新划分荆州版图，大体以湘水为界，以东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属东吴，以西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属刘备。当时是建安二十年。孙、刘互谅互让，明智地避免了一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东吴夺回长沙、桂阳二郡，与刘备中分荆州，既未影响对曹作战，也保持了孙、刘联盟，收获较大。刘备失去二郡，但由于保持联盟，能及时回援益州，避免陷入两面作战，得大于失，也是有利的。湘水和约没有彻底解决荆州争端，造成东吴索荆的两个安全方面的原因，刘备强大并据有长江中游，一个也没有解决，和约是解决过程的一个阶段，不是结束。

第二节　孙权向曹操争夺淮南

一、孙权进攻合肥

孙权同刘备妥协后，回到淮南战场。建安二十年（215年）八

月，率兵10万企图夺取重镇合肥。曹军守将张辽、乐进、李典，及护军薛悌，互不统属，仅有7000余人，处于极端劣势。曹操征汉中前，为守住合肥，留下密封教令，交薛保存，函边写道："贼至乃发"。鉴于张、李勇锐，乐持重，薛是文吏，教令指示："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① 众将拆函见字后，满腹疑虑。张辽领悟到教令精神，解释说，曹公远征在外，等救兵到，敌人必已破城，所以命令乘其尚未完成集结，予以痛击，以挫败其锐气，安定众心，然后可以守城。又怒道，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位如果还怀疑，我独自出战。李典同张辽不和，慨然以公事为重，表示说这是国家大事，只看您的计策如何罢，我岂能以私憾忘公义！我一起出战。

拂晓，张辽披甲执戟，自任先锋，率募来的800名敢死兵士，攻陷初到的吴军之阵，杀数十人，斩二大将，大呼自己名字，冲到孙权麾下。孙权大惊，左右不知所措，退至高丘上，以长戟守护。张辽喝叱孙权下来战斗，孙权不敢动。张辽兵少，被层层围困后，率麾下数十人突围，未突围的兵士号叫呼唤，张辽返回，救出所有被围将士。孙权人马披靡，无人抵挡，战到中午，士气被夺。经此战斗，魏军军心安定下来，增强守城信心，众将都佩服张辽。

孙权围攻十多天不下，令众军退兵。前部已退，孙权还留在逍遥津（肥水渡口，今安徽合肥东北隅）北，张辽率步、骑兵突然来到，企图割歼孙权。甘宁、吕蒙力战拒敌，凌统率亲近扶孙权冲出包围，再回兵交战，左右全部战死，自己带伤。孙权乘骏马上逍遥津桥，桥南已撤，丈余无桥板。亲近监谷利在马后挥鞭，孙权持鞍缓控，才越过此桥，幸免于难。

此战，张辽等创造了以绝对劣势兵力成功守城的范例。战后张辽威震江东，提他名字可止小儿啼哭。② 此战证明，东吴在淮南

---

① 《三国志》卷十七《张辽传》。

② 《太平御览》卷二七九《兵部·威名》引《魏志》张辽"由是震威江东。儿啼不肯止，其父母以辽恐之。"

水战能以劣势兵力防御曹军进攻，上岸攻城则非其所长，连绝对优势兵力都受挫，因此震慑了东吴。此战曹军取胜关键，是利用吴军立足未稳，以必死之心击其不意，胜而后守。又利用退兵时的麻痹和混乱，重创敌人。虽然守将不和，但曹操发挥勇敢者和谨慎者各自的优长，事变一来，事前的调度同实际发生的情况一一合榫，可称调度有方。

二、曹操三攻濡须大军常驻淮南

为了打击孙权气焰，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十月，曹操率领号称步骑 40 万大军东征，次年正月，进驻巢湖东侧的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这是曹操第三次进攻濡须。孙权率兵 7 万拒守，以吕蒙为督，令甘宁据守濡须坞。吕蒙在坞上设置万张强弩，在曹军前锋屯营时出击，取胜。曹军反击，攻破濡须坞。孙权以偏将董袭督五楼船扼守濡须口。五楼船夜间遭遇暴风被撼倒，将士跳到小舸逃生，唯有董袭不肯跳下，与楼船共亡。曹军虽然临江饮马，但是大江横绝，无力渡过。孙权密令甘宁夜斫曹军前营。甘宁选手下健儿百余名，径直越垒入营，斩首数十级，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甘宁已返回本营，奏乐，欢呼万岁。孙权喜道，足以惊骇老子否？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甘宁字），足以相敌。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三月，曹操回军，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驻居巢，距江边仅有百里之遥。

从建安十七年十月起，到二十二年，曹操三下濡须，由于缺少强大水军，始终不能过江，但是临江显示了武力。最后，放弃远道而来、无功而返的模式，改以大军部署于淮南江边，施加长期压力。东吴凭借水战优势，成功地防御了曹军对濡须水道的三次进攻，证明其水军强大无比，特别是在濡须水建坞，以阻止、迟滞曹军前进，是一个创造；在陆战方面则不能越合肥一步，暴露出步、骑兵战斗力较弱。东吴长期吸引曹军于合肥方向，自己主要精力陷进去，便宜了刘备。刘备轻易地获得大发展的渔人之利。

第三节 刘备向曹操争夺汉中

一、封锁汉中攻击阳平关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当刘备在益州立足已稳时，法正建议夺取汉中以利于今后对曹操的攻守。他指出，曹操一举降服张鲁，平定汉中，不乘此时进取巴、蜀，而留下夏侯渊、张郃驻守汉中，自己仓促北返，这不是他的智慧认识不到巴蜀可取，也不是力量不足，一定是内忧逼迫的缘故。如今估计夏侯渊、张郃的才略，比不上我方将帅。我方前往征讨，必定可以攻克。攻克以后，广开农田，储备粮食，观察征兆，窥伺时机，上可以消灭曹敌，尊崇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州①、凉州，广拓边境领土；下可以固守要害，实行持久的打算。刘备同意，决心利用汉中曹将才略不足的有利条件，以封锁汉中，阻止曹操来援，从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白马河入汉水处）攻取汉中，以便今后对曹操进可攻、退可守。

作战第一阶段，刘备封锁汉中，攻击阳平关。十月，刘备以诸葛亮留守成都，总理后方事务，支援前线；自己进兵汉中，攻击阳平关；以张飞、马超、吴兰屯兵于敌境武都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15公里），封锁进入汉中的沮道，掩护蜀军主力侧后。曹军汉中主将夏侯渊决心依托阳平关，确保汉中，其部署是：以自己镇守阳平关，张郃出屯关外之广石（今陕西勉县西），构成掎角防御。魏王曹操派遣曹洪攻击下辨张飞，以打破刘备对汉中的封锁，并以曹休为骑都尉，参曹洪军事。给曹休的命令说，你虽然是参军，其实是主帅。曹洪听说此令，即把指挥权交给曹休。

蜀军展开封锁汉中的作战。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三月，张

① 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分凉州置。辖境相当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及青海黄河以南的一部。

飞屯兵固山（今甘肃成县西北），声称将切断曹洪军后路。曹洪军众将疑而不决。曹休指出，蜀军如果是断道，本应以伏兵秘密行军，现今先张声势，说明没有断道能力。应乘其兵力未及集中，促击吴兰。吴兰战败，张飞自走。曹洪同意，攻破吴兰，张飞、马超退走，阴平氐强端斩吴兰。四月，刘备以陈式等10余营封锁马鸣阁道（今四川广元北）。徐晃击破陈式，蜀军跳谷逃生，伤亡很多。曹操颁令褒奖说，这个阁道，是汉中的险要咽喉。刘备企图断绝内外，以取汉中。将军一举破坏敌人计划，是高明中的高明。

刘备进至阳平关，在关前同夏侯渊、张郃、徐晃对峙，并派出万余精兵分作10部，在夜间猛攻驻守广石的张郃，企图拔除关外这一据点。张郃率亲兵奋力搏战，刘备不能攻克，紧急下达文书，要求后方增兵。后方蜀郡从事杨洪向诸葛亮指出，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关键。当今的事情，男子当战斗，女子当运输，发兵还有什么疑问的呢？诸葛亮即征兵增援刘备。刘备得到增援后，在汉中形成刘强曹弱的态势。七月，曹操鉴于汉中战事相持了半年，唯恐有失，决心亲自击退刘备的进攻。九月，率军到达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军从阳平关前南渡汉水，在关东南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安营。该山两峰对峙，比高约200米，出山后即进入汉中盆地，对汉中防御极为重要。夏侯渊率众将也在此处安营。两军展开争夺。刘备军连夜攻入走马谷曹军营围以外15里，焚烧其鹿角。夏侯渊命张郃守东围，分兵一半支援不利的张郃。他守南围，率400名精兵巡行，发现南围鹿角正在被焚烧，下令救火，修补鹿角。刘备在山上发现，命黄忠出战。黄忠金鼓震天，率部从谷中冲出，迂回到侧后，向夏侯渊军发起突然攻击。曹军急退，紧急间夏侯渊来不及退，被斩。黄忠“一日之中，手刃百数”①。曹军大败，张郃率残兵退守阳平关。起初，夏侯渊虽

---

①《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黄忠传》卢注杭世骏引陶宏景《古今刀剑录》。

然屡次战胜，曹操还是经常告诫他说："为将当有怯弱时"①，不可只凭勇敢。将领应当以勇敢为根本，辅之以智略计谋；只知道凭勇敢，不过是一名匹夫的对手罢了。定军山战后又说，夏侯渊本来不是能用兵的，军中称呼他为"白地将军"。作为督帅亲自参加战斗尚且不可，何况去补鹿角呢？②

夏侯渊死后，三军无主，惊慌失色。督汉中军事杜袭、荡寇将军张郃、夏侯渊军司马郭淮收集散兵，联合主持诸军事，推举张郃为军主。郭淮向各军下令说，张郃将军是国家名将，刘备畏惧的人物。今天事情紧急，非张将军不能安定全军。张郃出营，统兵察阵，众将接受指挥，军心才安定下来。第二天，刘备企图从定军山北出，渡过汉水进攻汉中。曹军众将商议认为，目前众寡不敌，有利于刘备乘胜，企图依托汉水列阵防御。郭淮认为，这是示弱，不足以挫败敌人。不如远离汉水列阵，诱敌渡水，待其半渡而后击之，如此刘备是可以击败的。远离汉水列阵后，刘备果然起疑不渡。郭淮坚守不退兵。曹军把善后处置报告曹操，曹操称善，授予张郃节，再次任命郭淮为司马。

二、据险不战逼退曹军

第二阶段，刘备据险固守，逼退曹军。曹操上次进入汉中时走的散关、沮道已遭封锁，这次改走褒斜道③。该道沿途多为悬空架设的木制栈道，险要而易遭刘备伏击，曹操派先头部队扼守道中险要，然后率大军进临汉中。

曹操到后，汉中形势逆转为曹强刘弱，但曹操两线作战，粮运

---

① 《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兵部·鹿角》引《魏武军策令》。

③ 秦岭南北间谷道。起自褒中县之褒口，经石门、三交城、二十四孔阁、赤崖、溯褒水河谷而上，出斜谷口至郿县，全程470里。见《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陕西省交通志编写委员会著，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

困难，不可能长期留在汉中，刘备决心以坚壁不战迫使曹军退出汉中。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曹公虽来，是无所作为的，我必然占有汉中了。于是集结部队凭险固守，始终不与交锋，并不断破坏曹军粮食储备，增加其困难。一次，曹操把米运送到北山(秦岭南麓)下，征西将军黄忠率兵前往夺米，过期不归，翊军将军赵云率数十骑出营察看，恰遇曹操大规模出兵。赵云仓促间同其遭遇，指挥骑兵边突击曹阵，边退却。曹兵被冲散以后，又恢复了阵形，追到赵云营下。赵云进营后，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兵怀疑内藏伏兵，退去；赵云军擂鼓震天，用戎弩在后面射曹兵。曹兵惊怕，自相践踏，很多人落入汉水中溺死。次晨，刘备前来视察战场，称赞道，子龙(赵云字)一身是胆。曹操相持一个月，兵士逃亡日益增多。认识到短期内无法把刘备驱出汉中，不愿意长期陷在此处，决定放弃汉中。五月，领出全部曹军，回到长安。刘备夺到汉中。

刘备夺取汉中之战，从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二十四年五月结束，历时1年零8个月。此战，刘备在自身实力壮大的形势下，放弃不与曹操争锋的方针，开始争夺曹操的边郡，并获得了胜利。刘备夺到汉中，意味着控制了进入益州的咽喉，对于益州防御的稳定意义重大，也为未来北伐魏国提供了前进基地，与汉中不在手中时，劳逸态势大不相同。夺取汉中成功，在作战指导上主要是由于：1、依据在益州初步站稳脚跟和曹操内有忧患、两线作战、留守汉中的将帅才略不足的有利条件，适时定下夺取汉中的决心。2、制定符合战争形势的作战方针。前期主要用“断”和“诱”，即切断阳平关以西进入汉中的沮道和马鸣阁道，封锁夏侯渊军于汉中，通过占据要害定军山，诱使夏侯渊军离关，寻机将其击败之。后期在曹强刘弱的形势下，及时转变为“避”和“逼”，即坚壁不战，将劳师远袭的曹操拖疲拖垮，破坏曹军的粮食储备，增加他留在汉中的困难，把他逼出汉中。

刘备得到的汉中，仅为原汉中主要地区。原汉中东部的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15公里)、房陵(今湖北房县)等县，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占领汉中后，陆续从汉中分出，另立

为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归属曹占荆州。三郡在神农架地区，相当今陕西、湖北的交界处，与四川的东北部相邻。此处山岭多，交通不便，是汉中翼侧，长江三峡的北部屏障，战略位置很重要。刘备为了进一步连接其荆、益两个战略方向，决心夺取这三郡。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令宜都（治夷道，今湖北枝城）太守孟达从秭归（今属湖北）北攻房陵，杀其太守蒯琪。令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从汉中沿汉水东下，会合并统率孟达军，会攻上庸。在蜀军猛烈攻势下，上庸太守申耽率郡投降，送妻子和宗族到成都作人质。刘备任命他为征北将军，继续领上庸太守，任命他弟弟申仪为西城太守。至此，原汉中地区都归了刘备，刘备完全占有益州。

第四节　关羽向曹操争夺襄樊

一、北攻襄樊的企图和部署

关羽镇守荆州后，日益强盛。在刘备夺取汉中期间，他面对的曹军南线阵势不稳。距南线不远的许都发生未遂政变，因为拥汉派不满曹操。从建安十八年五月到二十二年四月，曹操接连自任魏公、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离称天子只有半步之遥。许都京兆人金祎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和吉本儿子吉邈、吉穆等人密谋阻止汉祚将要转移的这一趋势，企图利用曹操驻在邺城之机，杀典兵留守许都的丞相长史王必，挟天子攻魏，在南方援引关羽为援。建安二十三年（218 年）正月，吉邈率杂人及家僮等1000 多人夜间发动政变，射中王必肩膀，天亮后，吉邈众人崩溃。王必协同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反击，斩吉邈等人，株连杀害许多衣冠大族。接着南阳又发生兵变。十月，宛县（今河南南阳）守将侯音，利用南阳吏民对繁重徭役的严重不满起事，捉住南阳太守，协同吏民据守宛城，攻打附近各县，占领山区，兵力发展到数千人，与关羽联合。曹仁奉令北上围攻宛城 3 个月。二

十四年（219年）正月，陷城，斩侯音。南线方向除了接连动乱外，兵力也较薄弱，仅有守樊城（今属湖北襄樊）的曹仁数千兵力①和荆、豫各州郡的若干地方兵②，曹仁军对关羽的战备也比较松懈。

曹军南线动乱时，刘备正在夺取汉中，无力两线出击，因此关羽暂时无动作。汉中之战结束后，曹方动乱也结束了，但刘备仍企图趁势在荆州方向采取攻势。七月，刘备向献帝上表攻击曹操有篡位窃国阴谋，并自称汉中王。以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拔魏延为领汉中太守，镇守汉中。在政治、军事上部署完毕后，刘备决心令关羽以其兵力北上攻取襄樊，以便为将来北上宛、洛准备条件③。关羽进攻的部署是，以南郡太守、将军糜芳留守江陵，将军傅士仁留守公安，负责后勤供应和防备东吴，自己以荆州军主力水、步兵北攻襄樊。

二、围城打援俘虏于禁七军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进兵北上。曹仁鉴于襄樊失陷，许都将暴露在关羽兵锋之下，决心率现有数千兵力坚守樊城待援，以确保许都。当时曹操从汉中回军，位于长安，闻讯立即部署部队增援，令汝南太守满宠等率郡兵就近奔赴樊城协助守

---

① 曹仁所部兵力，见《三国志》卷九《曹仁传》："仁人马数千守城"。

② 按，满宠、温恢谈话，反映曹军南线兵力部署的情况，即在许都以南，仅有樊城曹仁的"悬军"。满宠谓曹仁曰："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扬州刺史温恢谓兖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曹仁为征南将军）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曹仁字）县军，无有远备。"（《三国志》卷十五《温恢传》）

③ 按，关羽此次出兵，是为日后北伐进行准备，本身不是北伐；其目标仅为夺取襄樊，而不在许都、邺城和洛阳。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北伐需要两路出兵。由于不是北伐，关羽北攻襄樊时，刘备并未出兵秦川。

城，令随行的于禁率庞德等七军增援，徐晃军为于禁预备队，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并随徐晃南行。于禁七军到达樊城附近后，屯兵樊城以北，与城内曹仁相互呼应；徐晃屯兵于禁后方的宛城待机。

曹军增兵后，关羽企图在围城的同时，集中兵力打援，尔后再攻陷樊城。他得悉东吴陆口守将吕蒙被孙权露檄召回建业养病，信以为真，见到新任陆口守将陆逊来信态度谦卑，也大为安心。在深感兵力不足后，放心地抽调江陵部分守备兵力，增兵前线。关羽在打援中，攻击于禁七军，与援军庞德激战。庞德原为马超部将，随马超投奔张鲁，又随张鲁投降曹操。他有从兄庞柔在刘备处，因此樊城曹将对他颇起疑心。庞德却常说，我蒙受国恩，论义应当以死效力。我想亲自攻击关羽。今年我不杀关羽，关羽必当杀我。庞德同关羽交马，射中关羽前额。他常骑白马，关羽军称他白马将军，都怕他。八月，下大霖雨，山洪暴发，于禁同众将登上高处避水。关羽利用水军优势，乘大船发起攻击。于禁等束手无策，被迫投降。关羽以大船包围登堤避水的庞德，双方对射。庞德披甲持弓，箭不虚发，从拂晓战到过午，箭用完，短兵相接。庞德说，今天是我死日，气势愈壮，水势愈盛，部下全部投降。庞德同麾下将领一人，伍伯二人，弯弓搭箭，搭乘小船，企图退入曹仁军营；但水大船翻，失落弓箭，被俘。庞德立而不跪，关羽说，你兄在汉中，我要用你为将，不早早投降是为何？庞德大骂，被杀。曹操闻讯流泪道，我了解于禁 30 年，想不到临危处难比不上庞德！后来庞德儿子庞会随军灭蜀，在蜀杀尽关氏全家。关羽舟兵把俘虏的于禁等 3 万步、骑兵送回江陵。

关羽扫清外围后，乘船逼临城下急攻，建立数重围。城是土墙，受淹处往往崩坏，城不没水才数板①。城内与城外联系断绝，粮食即将用完，救兵不到。关羽又派将领围困襄阳守将吕常。曹方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曹仁部队混乱，恐惧。有

---

① 城高二尺为一板。

人建议弃城以保存有生力量，说今天的危难，不是凭现有力量可以度过的，可趁关羽尚未合围，乘轻船连夜撤走，虽然丢了樊城，还可以保全部队。汝南太守满宠坚决反对弃城，指出山水来得飞快，希望它退得也快。听说关羽另派一位将领到了郏城（今河南郏县，东距许都不到200里）一带。从许都以南，百姓惶惶不安，关羽所以不敢进军，是怕我军夹击他的后路。现在退却，黄河以南就不再归朝廷所有了，应该固守待援。曹仁同意，显示必死之心，将士深受感动。满宠也把白马沉入水中，同军人盟誓。这时又发生魏讽等事件，形势对曹方越发不利。魏讽是魏相国西曹掾，企图聚众袭夺邺城，密谋泄露被杀。魏讽一向有名望，从卿相以下，都倾心同他交往。事发后牵连被杀的数十人。十月，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百姓孙狼等起兵，杀该县主簿，依附南方关羽。关羽授予官印，增拨部队，令扰乱曹操后方。从许都以南，往往遥遥响应关羽。关羽威震华夏。

三、偃城四冢失利撤围回救江陵

十月，曹操在于禁等七军陷没后到达洛阳，令徐晃军从宛城南下增援樊城。徐晃所部多是新兵，难以争锋，进至樊城西北8里阳陵坡，不再向前。曹操令将军徐商、吕建等前往加强徐晃，传令徐晃等待兵马集结后再行攻击。关羽调出阻援部队，部署于樊城西北3里偃城，以阻歼徐晃。徐晃逼近偃城，在道路上筑长堑，佯示企图切断阻援部队后路。阻援部队信以为真，烧毁屯营撤走。徐晃占领偃城，同关羽攻城部队营垒相连，逐步进至距离关羽包围圈3丈地方。徐晃军反攻还未展开，曹操前后又令殷署、朱盖等共12营归徐晃节制。当救兵未到达时，徐晃所部兵力不足以解围，但众将怕承担樊城失陷责任，大声喝斥责备徐晃，催他发兵救曹仁。赵俨对众将说，关羽军的围很坚固，雨水还很凶。我步兵太少，而曹仁同我隔绝，无法共同协力。匆忙地发起解围作战，会使我们城内外都蒙受损失。不如以我前军逼近敌围，派间谍通

知曹仁城外有救兵，以激励将士。算起来北路援军不出10天将到达，城内还守得住。然后城里城外一齐出动，一定可以打败敌人。如果有延误解救的罪名，我为众军承当。众将高兴，挖地道接近樊城，用箭把飞书射给曹仁，多次同城内沟通消息，同时把孙权书信射进关羽屯营中。关羽得悉孙权阴谋后，贪恋战功，自恃江陵、公安防守坚固，不是吴军旦夕可拔，又鉴于樊城有必破之势，回军则前功尽弃，犹豫不能退兵。

为了加强解围兵力，曹操密召东线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合肥守将张辽等，促令迅速率兵增援，并企图亲自南下，解救曹仁。众僚属也都说，如果不赶快出发，今天就败了。只有尚书桓阶问道，大王认为曹仁等足以料事势吗？曹操说，能。问，大王担心他们不肯卖力吗？曹操答，不。问，那么为什么还要亲自前去呢？答，我担心敌人兵多，徐晃等形势不利罢了。桓阶说，现在曹仁等处在重重包围中而死守无二心，是因为大王遥遥作为后盾。处在万死之地，一定有拼死争夺之心。内有拼死争夺之心，外有强大的救兵。大王按六军不动，以表示有余力，何必担心失败而要亲自前往呢？曹操欣赏他的意见，进至许都以西之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南距樊城约300里，不再前进，驻军待机，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

曹军援兵徐商、吕建部和殷署、朱盖12营到徐晃处会齐以后，徐晃、关羽两军兵力对比顿时改观，徐晃决心发起反攻。反攻时，佯称攻击樊城以北围头屯，实际猛攻樊城附近四冢屯。四冢屯将失陷，关羽率步骑兵5000人出战，同徐晃相遇。两人在曹营时很友爱，现在阵前见了面，远远地交谈，只谈论家常，不涉及军事。不久，徐晃下马，向部队宣布军令，得关云长的头，赏金千金。关羽惊慌，对徐晃说，大兄，这是什么话呀！徐晃说，这是国家公事。徐晃迎战关羽，关羽退走。徐晃追击，冲入关羽围中。关羽围堑多达十重，徐晃突入重围，攻破四冢屯，关羽军有的投入沔水中溺死。围里的傅方、胡修也都死了。关羽在围被突破、吕蒙偷袭了江陵、自己腹背受敌的极端不利形势下，决心回军保卫后

方，下令撤围退兵，结束了北攻襄樊之战。

战后，曹操高度评价徐晃四冢之战的勇气，颁令嘉奖说，敌人的围堑、鹿角多达十重，将军作战获得全胜，终于攻陷敌人所设的围，斩杀敌人很多首级。我用兵30多年，加上我听说的古代善于用兵的将领，没有长驱直入敌人重围的。而且樊城、襄阳被围困，超过了莒县和即墨，将军的功劳，超过了孙武和穰苴。徐晃整顿部队以后，凯旋摩陂。曹操去七里外迎接，摆酒设宴，向徐晃祝酒说，保全樊城、襄阳，是将军的功劳。当时众军齐集，曹操巡视众营。兵士都离开本阵观看，而徐晃军营整齐，将士站立在阵中不动。曹操叹道，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遗风！

关羽北攻襄樊之战，从二十四年七月开始，到十月结束，历时3个多月。此战是曹、刘争夺曹属荆州之战，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说明：关羽北攻襄樊，能给予曹操以重大打击。关羽尚未攻下樊城，已俘虏于禁七军3万多人，使曹操深感献帝距敌军太近，有迁都之议。关羽威震华夏，使刘备势力的扩张达到了顶点，自己事业进入一生的顶峰。此战说明，曹操内部的拥汉派和其他反曹势力能够响应刘备方面的军事行动，当刘备夺取汉中、关羽北攻襄樊时，曹方便发生了许都之变、侯音起事、魏讽袭邺之图谋、孙狼起事。这些突发事件，既打击了曹操，又配合了刘备方面的行动。但他们的力量较小，在得不到支援情况下，暴露后将被镇压，不能有第二次响应。此战说明，关羽孤军北攻襄樊时，曹操没有受到东西线的牵制，可以源源不断地支援襄樊，在此情况下，关羽得不到刘备支援便不能取胜。此战还说明，关羽在敏感的荆州的对曹胜利，将造成东吴不安，促使孙、曹合流。

此战是水、步兵协同，攻城和野战相结合。关羽所以在前期取胜，就作战指导上说，主要是利用了曹操在荆州的被动形势发起进攻，作战上以围城和打援并举，以打援为先，利用山洪暴发给曹军造成的困难，发挥其水战所长。但是，此后在打徐晃之援时，情势突变，偃城、四冢之战，接连失利，处处落入被动，由

于记载简略，打徐晃之援失利详情不得而知①。此后关羽无心再战，匆忙回兵，未达到作战目的，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关羽失利原因，客观上是曹军援军集结以后，大大改变了兵力对比，关羽兵力捉襟见肘。主观上则是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首先是刘备方面战略指导有错误。只从曹、刘斗争片面的需要和时机考虑夺取襄樊，不知荆州的每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都涉及到曹、孙、刘三方。北攻襄樊，从曹、刘斗争来看，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但是从曹、孙、刘三角关系来看，则是不明智的。因为关羽越是胜利，对曹、孙的威胁越大，越是促成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刘备。从关羽来说，他对于后方江陵被攻、陷入腹背受敌这一突发态势，严重缺乏思想准备，作战指导上乱了方寸，一再失误：1、被东吴韬晦之计的假象所迷惑，轻易地从后方江陵调兵增援前线，削弱了防御东吴的兵力，使后方陷入易受攻击的不利处境。2、当得悉孙权偷袭江陵的企图及勾结曹操的密谋以后，错误地以为后方防御坚固，又贪恋战场的利益，不肯知难而退。如果及时改变决心，变更部署，坚决、迅速地退兵，后方或者可保。3、四冢之战中，对徐晃主攻方向判断不准确，增援时战斗意志不强，以致被徐晃长驱直入重围。

① 此事《三国志》记载简略，不得其详；所以何焯说："徐晃之解樊围，一时奇功，而惟存一令，亦安得谓之备详也。"见〔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三国志·魏志》。

第九章　孙刘联盟破裂双方争夺荆州

第一节　东吴偷袭江陵之战

一、东吴转变方针决策夺取荆州

孙权在合肥战败后，深知短期内不但不能取得对曹战争胜利，而且将承受曹方巨大的军事压力。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天，他令都尉徐详出使曹操，请求归降，缓和了同曹操的紧张关系，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上游刘备。因为刘备强大构成的威胁并没有随着湘水和约而消除，特别是荆州主将关羽咄咄逼人的态度更令人难以忍耐。孙权在反思中认为，鲁肃劝他出借荆州，导致刘备坐大，是鲁肃一短。这时，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向他密陈夺取荆州的西进计策。吕蒙说，如果令征虏将军孙皎守南郡，潘璋屯白帝，蒋钦率机动部队1万人，沿长江上下活动，驶赴敌人出现的地方，我为您前据襄阳。这样，有什么忧虑曹操，依赖关羽的呢？况且关羽君臣，夸耀他们的欺诈和力量，到什么地方，都反复无常，不能把他们当作腹心看待。如今关羽不便向东发展，是因为至尊您圣明，我们这班人还在。现在不乘我们强壮时候谋取荆州，一旦我们死去，想再使用力量，还能办到吗？孙权采纳，又问攻取曹操徐州如何，吕蒙答复道，如今曹操无暇顾及江东，徐州守卫部队，听说不值一提，我们去，自然可以攻克。然而地势陆地相连，是骁骑驰骋的地方，您今天夺到徐州，曹操后日必来争夺。即使用七八万人守卫，也还有忧虑。不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使形势更加发展。孙权在如此比较了夺取徐州和荆州的利弊后，认为这话尤其得当。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以鲁肃去世为契机，孙权逐渐改变方针，不再扶植刘备，而且要以武力夺取其荆州。他以吕蒙继任鲁肃遗留的陆口守将一职，统领鲁肃的1万部队。至此，东吴形势一变，主张削弱刘备的一派得势。吕蒙进行夺取荆州的准备。他同关羽分守两国土地，边境相连，表面上比鲁肃加倍培植同关羽的深情厚谊，缔结友好。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八月，关羽水淹于禁七军。东吴对这一大捷并没有感到多少兴奋，反而更加忌妒和担心关羽；加上曹操令兖州刺史裴潜、豫州刺史吕贡各率州兵，紧急增援樊城，客观上减轻了东吴当面的压力，东吴更深切地感受到，主要危险当前已由北方转向西方关羽。同时鉴于关羽侧后江陵暴露，兵力分散，出现难得的有利时机，于是策划夺取荆州。吕蒙向孙权献策说，关羽讨伐樊城，可是较多地留下守备兵力，一定是担心我袭击他后方。我常有病，希望以治病为名，分出部分兵力回建业。关羽听到消息，一定撤出守备兵力，全部调往襄阳。我大军航行长江，昼夜驰往上流，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以攻下，关羽可以擒获。

孙权采纳建议，展开以麻痹关羽为主要内容的偷袭江陵的战前准备，他公开撤换声威素著的吕蒙。由吕蒙声称病重，自己下达不加封的檄书，把他召回建业，除去关羽忌惮的人。吕蒙回建业“看病”途中，发现镇守芜湖的定威校尉陆逊也主张夺取荆州，足可充当继任。因为陆逊对他说，关羽自恃骁勇之气，欺压别人，刚有大功，就骄傲安逸，只顾北进，不对我保持戒心。听说你生病，更加无备。现在出其不意，一定能够俘虏和制服他。你东下见到至尊，应该好好地策划。吕蒙欣赏陆逊眼力，假意表示关羽一向勇猛，不容易打他的主意。到达建业后，向孙权指出陆逊思虑深远，才干堪当重任，定能大用，又没有名气，关羽不会顾忌他，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了。建议用陆逊后，让他表面韬晦，暗中窥测时机。孙权即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替吕蒙。陆逊到陆口上任后，展开卑而骄之的攻势，写信称颂关羽的功劳美德，态度非常谦恭，有托付自己的意思，关羽不再戒备，抽调江陵部

分守备兵力到襄樊前线。陆逊把情况报告孙权，提出擒获关羽的作战要点。

孙权拟任命征虏将军孙皎和吕蒙为左、右大督。吕蒙提出，如果您认为孙皎胜任，应该用孙皎；认为吕蒙胜任，应该用吕蒙。从前周瑜与程普为左右督，率兵进攻江陵，虽然事情决定于周瑜，但是程普自以为长期带兵，而且都是督，便不和睦，几乎败坏国事。这是目前用将的戒鉴。孙权省悟说，任命你为大督，孙皎为后继。孙权作了这一部署后，内心仍然畏惧关羽，企图联合曹操共同夹击关羽，对外还可以把曹操解围作为自己的功劳，他向曹操上书，乞求允许他讨伐关羽来为曹操效力。这样，孙权在曹、孙、刘三角关系中，由联刘抗曹发展到联曹攻刘，向昔日的盟友背后开刀。

在东吴对刘备方针暗中发生剧变的前后，刘备方面毫无觉察，既不能阻止变化于前，又不能防范变化于后。尤其是关羽，不能认真执行团结东吴的方针。孙权曾为儿子向关羽求婚，关羽不答应婚事，还大骂并折辱求婚的使者，引起孙权发怒。关羽俘虏于禁等数万人马后，粮食缺乏，擅自提取东吴湘关（东吴在荆州湘水上的边关）之米。关羽的态度加速了东吴方针的剧变，导致孙权最后下了偷袭江陵的决心。

二、曹操挑唆孙刘争斗坐待两敝

东吴对刘备方针的剧变，得到曹操的鼓励和支持。早在徐详请降时，曹操即加以响应，立誓与孙权重新结为姻亲。关羽大捷后，曹操与僚属曾商议迁都躲避关羽兵锋。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分析孙、刘矛盾后指出，于禁等被水淹没，不是作战失误造成的，对于国家大计，没有造成损害。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孙权一定不愿意。可以派人劝说孙权袭击关羽后方，答应割让江南封孙权，则樊城之围自然解除。曹操同意采取这一挑唆孙、刘相斗方针。这时孙权向曹操传话说，我将派兵西上，偷袭关羽后方江陵、公安两座重城，关羽失掉这两城，一定

会退兵，樊城之围不用救自然解除。此事请代为保密，不要泄露，使关羽有所防备。

曹操只企图使孙、刘彼此削弱，不愿意看到一方通过兼并另一方而形成新的强大势力。他口头上答应孙权偷袭关羽的一切要求，行动上则保存关羽，使其同孙权残杀。曹操集团内多数人不懂保存关羽，都说应该代东吴保密。只有谋士董昭献上卞庄刺虎的策略，指出军事上崇尚权变，以求符合实际。可以答应孙权代为保密，暗中泄露消息，关羽听到孙权西上，如果回兵，樊城之围则迅速解除，我军便获其利，使孙、刘两贼像两匹马那样由我控制着相对踢咬，我坐待其敝。如果消息不泄露，让孙权得志，不是上策。另外，围中将士不知道有救，计算粮谷度日，很恐怖，如果因此萌生别的想法，造成的灾难不小，泄露消息对我较为有利。况且关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卫坚固，一定不肯速退。于是曹操敕令徐晃把孙权书信射进樊城及关羽屯营中，诱使关羽解围，回军同吴军厮杀。

三、吕蒙偷袭江陵

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十月，西征大督吕蒙从建业秘密到达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部署作战，令右护军蒋钦率水军从夏口北上汉水迎战关羽水军，自己率精兵隐蔽在大船里，由橹手扮成布衣百姓，穿上商人衣服摇橹，沿长江昼夜兼行西上。大军到陆口会合陆逊后，过巴丘，进入关羽境内，沿途把关羽设置在江边屯候里的哨兵捆绑起来。关羽的烽火来不及点燃，侦察兵来不及侦察，就成了俘虏。由于吴军严密封锁西上消息，因此关羽毫无所闻。

关羽后方江陵、公安守将麋芳、傅士仁为了报复关羽的轻视，在向前线供给军资时不肯尽力相救，关羽扬言将惩处他们，二人害怕。吕蒙进攻公安时，令原骑都尉虞翻给傅士仁写信劝降，傅士仁开城出降。虞翻对吕蒙说，我们攻江陵是谲兵（使用欺骗之计的军队），应该带士仁同行。吕蒙进到江陵，出示傅士仁，守将

糜芳见此，开城出降。吕蒙高兴得在沙滩上奏乐。虞翻说，现在真心投降的是糜将军，城里人怎可全信，何不紧急进城，控制城门锁匙呢？吕蒙马上入城。当时城中不愿意投降的人筹划伏击进城吴军，全赖虞翻提出及时入城，阴谋才来不及实施。关羽军将士家属由于集中居住在江陵，这时都成了俘虏。

为了消除一向存在于荆州人士中的同东吴对立的情绪，吕蒙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他进城后，慰问关羽军将士家属，严禁军中骚扰民间和强求强取。麾下士是吕蒙同郡人，拿百姓家一只斗笠，遮盖官铠。官铠是公物，吕蒙还是认为触犯了军令，不能因为乡里人而废弃法令，流泪斩了他。于是军中震惊，道不拾遗。吕蒙早晚派亲近慰问老年人，询问缺什么，生病的给医药，饥寒的赏衣服和粮食。

关羽在四冢之战失利后，撤了樊城之围，仍以舟船封锁沔水，使襄阳继续隔绝不通。他在得知江陵失陷、自己腹背受敌后，下令退兵回救江陵。曹仁众将主张乘机追击，俘虏关羽。议郎、参曹仁军事赵俨认为，在孙、刘相斗中关羽存则孙、刘两疲，关羽亡则孙、刘将交兵不解，极力主张把关羽这股祸水引向东吴而反对追击，指出孙权利用关羽同我交兵的困难，企图掩袭关羽后方。但是想着关羽回救，害怕我利用他们双方用兵的疲惫，所以用恭顺言辞请求为我效力，利用矛盾，凭借变化，以窥测形势是否对他有利罢了。现在关羽军已成孤军退走，更应该保存它做为孙权之害。如果深入追击这支败兵，孙权就会从担心关羽改变为对我制造麻烦，魏王必以此为深忧。于是曹仁停止出击准备。魏王曹操果然担心众将追击关羽，向曹仁下达紧急敕令，其内容同赵俨的主张一样。

关羽回军南郡途中，多次同吕蒙互通消息，吕蒙总是厚待来使，让使者周游城中，到关羽将士家中慰问。有的将士家中还写亲笔信交使者带回，表示使者传话可信。将士们私下探问使者，比较参验，都知道家门平安无恙，受到的待遇超过平时，从此丧失了斗志。

关羽部队陆续自行溃散，关羽孤立困穷，退至当阳，西保麦

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孙权派人诱降，关羽伪降，在城上树立幡旗和假人以后撤走，军队星散，关羽随身只有10余名骑兵。孙权令朱然、潘璋堵截关羽退路。十二月，潘璋司马马忠在临沮（今湖北远安西北）俘虏关羽、关平父子①，把他们斩首。孙权平定荆州。二十五年正月，孙权令将关羽首级送到洛阳。

孙权已经来到江陵坐镇指挥。这时，关羽镇守的荆州中，江陵所在的南郡已下，还有武陵、建平（治巫县，今湖北巫山北，辖今湖北巫峡、西陵峡、恩施一带）、宜都（治夷道，今湖北枝城，辖今湖北宜昌、长阳、五峰等地）三郡未服。特别是南阳旧姓、武陵部从事樊伷还在诱导众夷，企图使武陵郡继续归顺刘备。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陆逊为领宜都太守，令荆州降官潘浚率5000人征讨武陵郡，令陆逊攻击宜都和建平郡。潘浚杀樊伷，讨平该郡。陆逊发动强大攻势，十一月，刘备宜都太守樊友丢下该郡逃走，各城长吏及蛮夷君长都向陆逊投降。陆逊请求用金、银、铜印，授给归降的人，又沿三峡攻击蜀军，击败蜀将詹晏等人，击破、收降拥兵的秭归大姓，前后斩杀、俘虏、招降共数万人，攻占建平、宜都二郡。于是东吴基本占有关羽所领荆州。孙权任命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驻屯西方重镇夷陵，以防备益州刘备军。

东吴在偷袭江陵前，严格进行保密。偏将军全琮上疏陈述可以攻取关羽，孙权不答。事后在庆功宴上向全琮说，你早提了建议，我虽然不答复，今天的胜利，也是你的功劳。

四、江陵之战的意义和胜败原因

吕蒙偷袭江陵之战于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开始，十二月结束，历

---

① 关于关羽被擒杀的地点，《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卷五十七《吕蒙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均记为章乡（今湖北当阳东北）或漳乡；但《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卷五十五《潘璋传》则记为在临沮（今湖北远安西北）。按，章乡属于临沮县。

时2个多月。此战是三国形成阶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争，东吴在这次战争中，歼灭估计数万关羽军①，斩杀名将关羽，夺到南郡、零陵、武陵、建平、宜都五郡，迫使刘备退出荆州，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并使三角格局由战前孙、刘联合抗曹，转变为孙、曹联合刘孤立。战后东吴地跨荆、扬、交三州，孙、刘力量对比由战前刘略强于孙，改变为孙强刘弱。此战，曹操不费一兵而坐收渔人之利，既解了樊城之围，又借助孙、刘自相削弱而增强了实力地位，成为孙、刘内斗中的最大受益者。孙、刘两方则由于彼此削弱，再也不可能战胜曹操了。

此战是偷袭作战，东吴所以取得成功，在战争指导上主要是：1、抓住有利时机进兵。当关羽北攻襄樊时，出现了对东吴有利的时机。这时关羽后方江陵兵少，成为暴露的软腹部。东吴乘机出击其软腹部，用力少而易成功。2、麻痹关羽，荫蔽意图。此战顺利进行，关键在于欺骗关羽和保守秘密，只要作到这两点，把关羽蒙在鼓里，偷袭的目的就达到了。为此，战前以换将、卑而骄之等韬晦之计麻痹关羽，作战中以白衣伪装和瘫痪敌人通信系统，完成秘密行军，在关羽毫无觉察下迅速接近公安和江陵，达成出其不意。3、瓦解敌军。利用关羽同后方守将矛盾，不战而得二城；通过厚待关羽军家属，轻易瓦解了关羽军；又大力争取荆州人心，取得刘备荆州官员的投降。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夺取荆州的阻力。4、灵活地在化友为敌的同时，化敌为友。背着刘备、关羽，秘密联合曹操，以解除偷袭关羽作战时的后顾之忧，在三角中处于不孤立的有利地位。

关羽江陵之战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刘备、关羽对于自身崛起后形势的新变化缺乏认识，对于孙、曹淮南之争暂停之后和北攻襄樊胜利后联盟内部蕴藏的危险性和曹、孙政策的调整，缺乏高度警惕。没有看到关羽北攻襄樊越是胜利，对吴关系越是危

---

① 其中仅东吴领宜都太守陆逊，在其境内前后斩、俘虏、招降，即达数万人。

险，因而对事变缺乏思想和组织准备。这就是所谓的大意失荆州。其次，关羽作为与东吴相邻的荆州主将，本应贯彻联吴方针，却盛气凌人，把东吴往敌人方面推。联吴破裂，完全归罪关羽是不公平的；但是他无疑负有重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关羽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达到一生事业顶峰之际，其毁灭也随之而来。如果刘备、关羽对孙权保持应有的警惕采取必要的让步，在此基础上联合对曹发动进攻，局面也许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此战也暴露了关羽在军队建设上存在很大的弱点。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①，与部下、后方留守将领关系紧张，平时轻视麋、傅二将，战时扬言惩罚二将，促使矛盾更加尖锐，致使二将在关键时刻叛变。关羽回军江陵时，治军无方，任凭部队受到吕蒙政治攻势的攻击而自动瓦解。廖立关于“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② 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二节　夷陵之战（上）

（参见附图 4）

一、刘备决策东征和蜀吴作战方针

江陵战后，魏、蜀相继称帝。首先，曹操方面利用孙、刘矛盾激化的有利时机最终解决了代汉问题。代汉问题，曹操经过从赤壁之战败后以来的准备，具备了条件，只是由于遭到集团内一些中原大族抵制，他深感棘手而不敢轻举妄动。建安二十四年（119 年）十二月，孙权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劝他当皇帝，自己称臣。曹操说，这孩子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如果天命在我，我

---

① 《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廖立传》。

当周文王吧。确定把代汉留给儿孙完成。次年正月，曹操回到洛阳后去世，卒年 66 岁，曹丕以长子即位魏王，任丞相。魏王曹丕批准吏部尚书陈群提出的九品官人法。大族实际上获得作官特权，转而拥护他。六月，曹丕南巡示威。七月，孙权派使者奉献，认可其权威。同月，刘备上庸太守孟达率部曲 4000 多家投降。孟达由于没有接受关羽令其增援北攻襄樊作战的号令，遭到刘备怨恨，又受到刘备养子刘封欺凌，所以叛蜀。曹丕派兵会同孟达夺得刘备荆州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任命孟达领太守。十月，曹丕在内外都有建树的形势下，逼汉献帝“禅让”，自行称帝，改元黄初，建立魏国，史称魏文帝。其都城迁至洛阳，改长安、谯县、许昌、邺城、洛阳为五都。接着，刘备在传闻献帝被害以后，也于黄初二年（221 年）四月以继承汉统名义，在成都武担以南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建立汉国，史称蜀汉、蜀。于是中国形成两帝共一吴的局面。

江陵战后，蜀国由于丧失了荆州，使得它在《隆中对》规定的两路出兵、钳形攻魏的方针落空。刘备不甘心失败，同时过低估计东吴克服荆州人心不附困难（赤壁之战前后即如此）的能力，过高估计自己在荆州的号召力。为了恢复两路出兵的荆州基地，并为关羽报仇，五月，刘备置主要敌人魏国于不顾，决策同东吴作战。群臣对此多持异议，认为不应该攻吴，而应该出兵关中。赵云劝谏说，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先灭魏，吴国自然臣服。应当利用众人之心，早日谋取关中，据有黄河、渭水上流，讨伐凶逆，不应该把魏国放在一边，先同东吴交战。兵势一交，不能很快解开。赵云等实际上主张在新形势下放弃两路出兵，仅依托益州，一路攻魏。刘备态度坚决，不听劝谏。隐士秦宓陈说天时不利，被下狱幽闭，言路堵塞。诸葛亮在争论中处于两难地位。这一争论，暴露了《隆中对》第二阶段两路攻魏同联吴之间存在深

刻矛盾。诸葛亮不赞成攻吴①，但是无法说服刘备，而且身居相位，要注意同刘备保持一致，其兄诸葛瑾在东吴，来信劝和，诸葛亮如果也大力反对攻吴，将处于嫌疑之地，因此没有充当反对者的主要发言人。

刘备积极进行东征的准备。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孤立，他试探同曹方缓和关系，开通了通向曹方的道路②，派军谋掾韩冉带信吊唁曹操，并送锦布。韩冉途中可能风闻曹丕将要代汉，称疾不前，由上庸方面把刘备的信代送到洛阳。曹丕称帝以后，给刘备回信，刘备不能接受他篡汉，同魏国的和解失败。

刘备进行东征的部署，令张飞率万人由阆中（今属四川）会师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区嘉陵江北岸），但是张飞虐待兵士，暴戾无恩，被帐下将张达等杀害。张达持其首级，顺流投奔东吴。张飞死后，刘备深感缺乏有经验的战将，在其余宿将中，马超生病，于当年病死，黄忠在两年前亡故，魏延镇守汉中离不开，仅剩的赵云、黄权又由于反对或不积极支持东征，无法指挥对吴作战。刘备不得不亲自挂帅，擢用冯习等一批勇敢、忠心，但能力较弱者为督将。

面对刘备可能的进攻，孙权决心进行防御以确保荆州，并据此进行准备和部署。在准备中，孙权大力争取荆州人心，重用归降的刘备荆州将吏，把称疾不来的武陵人、留典荆州事潘浚，用床抬来，向他表示，楚王曾两次启用荆国俘虏为军帅、令尹，自己也有此度量。任潘为治中，拜为辅军中郎将，授给他兵，凡荆

---

① 诸葛亮不赞成攻吴的根据是：他在夷陵之战失败后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等于明白表示不赞成攻吴。刘备死后，他决心积极而坚定的联吴，但很久才发现了有人即邓芝也持同样的主张，便令其衔命使吴。在孙权称帝时，他又力排众人断绝同东吴的盟好之议。这两件事，说明在战后蜀国反吴情绪一度相当高涨。在这一气氛中，诸葛亮是少数坚定的联吴人士。由此上推夷陵战前，他也不可能力主攻吴。

② 《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注引《魏略》王朗与许靖书："故遣降者送吴所献致名马、貂、罽，得因无嫌。道初开通，展叙旧情，以达声问。"

州诸军事都向他咨询。潘浚等荆州人士终于甘心为孙权效力。只有五溪蛮叛乱不服，孙权令潘浚督众军将其讨平。通过推行纳降政策，荆州人心开始归附，奠定了防御的政治基础。孙权防御的部署是：1、把毗邻蜀国的巫、秭归二县从宜都郡划出来，另设固陵郡，以潘璋为该郡太守，以加强边防。2、以领宜都太守陆逊为镇西将军，率李异水军，刘阿步兵，负责整个西方边境的防御。3、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孙权从公安迁鄂（今湖北鄂州），以其为都城，改名武昌，兼顾荆、扬两地。

战争爆发时，双方出动兵力是蜀优吴劣。刘备东征军估计接近10万①，处在上流和进攻的有利位置；但是作战指导能力较弱。东吴投入5万兵力，处于下流作战的不利态势；但是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中，存在许多优于蜀国之处。它的国力比蜀国强，新取荆州，士气高涨，荆州人心逐渐归附。

二、蜀军攻占三峡陆逊战略退却

蜀、吴之间以长江三峡为唯一的交通要道。长江从蜀国白帝（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山上）以东，切穿巫山山脉，经过荆州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构成的数百里大峡谷三峡，至夷陵以北南津关出峡。三峡江面最窄处约100米，两岸连山夹峙，群峰高出江面100米到2000米。三峡以北为大巴山脉、神农架林区，是鄂西山地最高峻部分。再北是原上庸、房陵郡。一年多以前，刘备曾令孟达从西陵峡之秭归（今属湖北）北上，夺取该地。孟达叛变后，该地已属魏国新城郡地，因此刘备如果出三峡，其侧后将受到魏国的威胁。

---

① 《三国志》记载蜀军东征兵力为：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权将陆议（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卷四十七《吴主传》“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综合上述材料判断，约近10万。

战争第一阶段，蜀军攻占三峡，吴军战略退却。黄初二年(221年)七月，刘备令将军吴班、冯习沿三峡进兵，攻破吴将李异所守巫县（今四川巫山北）和陆逊所守秭归，在秭归临江依山筑城。

东吴得报，举国惊骇，尤其担心魏军乘虚袭击其东部腹心地区。孙权紧急向蜀国求和，其南郡太守诸葛瑾也致笺劝刘备息兵不战。诸葛瑾在笺中对刘备说，陛下认为关羽之亲，比先帝（传说献帝遇害，所以称先帝）怎样？荆州大小，比海内怎样？都应仇疾，谁排在先后？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决策时易如反掌。孙权紧急部署防御作战:破格提拔在江陵之战中有突出表现的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令其假节，统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5万人防御刘备，命平戎将军步骘率交州义士万人北上益阳，征讨响应刘备的五溪蛮。

刘备不答应东吴求和，对于诸葛瑾劝和也盛怒不听，坚持东征。这时，蜀军如果以有备而来和兵力优势，水、步联合，立即顺流而下，进行速决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蜀军在秭归延宕了五个月，迟迟逗留不进，企图等待荆州响应；这期间，只有武陵郡五溪蛮① 使者前来请求出兵，此外别无反响。次年正月，刘备才到秭归，增兵至近10万，统军东下。其部署是：以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留守成都，以部分兵力部署于三峡江北防备魏国，保护其后路；以将军冯习为大督，统率主力大军，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为别督。正月，令将军吴班、陈式率水军出峡口。

陆逊深知蜀军锐气正盛，同时三峡陆路崎岖、水路惊险，其地形对东吴的防御和后勤供应十分不利，决心实行退却，把三峡让给刘备。从黄初二年七月到次年正月，七个月时间内，陆逊接连退却五六百里，使刘备进入三峡后，陷入“虽有锐师百万，启

---

① 位于今地湖南沅水上的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的土著蛮夷族。

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①的不利态势。陆逊退至今鄂西北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即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郊）地区后，认为这一带是"国之关限"②，如果不确保而丢掉它，不仅是丢掉宜都一郡，整个荆州都将面临危险，因此停止退却。他令部将宋谦在夷陵道攻破蜀军5座营寨，斩杀其屯将，然后由退却转入防御。

蜀将吴班、陈式顺利进至夷陵。在此地受阻后，夹江两岸驻兵。刘备将率大军在吴班、陈式后跟进，治中从事黄权对此深为担忧，劝谏说，水军顺流，进易退难。我请求担任先驱，试探吴军，陛下应该留在后方镇守。刘备不从，调黄权为镇北将军，令其节制江北各军防魏。二月，刘备率领众将沿山截岭进军。蜀军行军纵队被三峡拉得很长，从巫峡、建平营围相连，直达夷陵界。三月，刘备到达夷陵以南之猇亭（今湖北枝城以北15公里长江北岸古老背）③、夷道（今湖北枝城）一线，分据险要，依山扎营，前后建立50多营，夹江连络，东西合围，主营设在猇亭江南，前锋张南直抵夷道。

陆逊针对蜀军的部署，令孙权族弟安东将军孙桓阻击蜀军前锋于夷道，同时针对蜀军50多营兵力轻重，相应部署部队进行对峙。

---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

②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③ 猇亭的位置，有两种说法：1、宋人郭允蹈《蜀鉴》卷二"猇亭在今峡州夷陵县，踪迹夷灭，已不可考"，《蜀鉴》卷二及《读史方舆记要·彝陵州·石鼻山》又引《彝陵志》"彝陵要害，南有石鼻、马鞍、猇亭"，清《一统志》"猇亭在（宜都）县北三十里，大江北岸，一名兴善坊，今名虎脑背市。"《湖北通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都采用此说。按，上述夷陵南和宜都北，所指为一处。2、《读史方舆记要·宜都县·猇亭》说："在（宜都）县西，其地险隘，古戍守处也。"今取前说。

三、陆逊坚壁不战疲惫蜀军

第二阶段，从黄初三年（222年）三月开始，陆逊坚壁不战，双方转入以阵地战为主的相持阶段。蜀军出兵以来，节节推进，占据上流，居高临下，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士气旺盛；但是驻在山林地，兵力无法展开，部队疲劳，后方运输线不但延长，而且侧后处于魏国威胁之下，优势地位开始削弱。吴军让出三峡后，后勤运输大为改善，在平地扎营有利于养精蓄锐。陆逊企图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和条件，坚壁不战，疲惫敌师，促使敌我优劣的转化，为反攻创造条件，并在相持期间静观蜀军变化。

面对陆逊坚壁不战，刘备企图采取山地设伏战法，诱吴军出动，消灭敌于运动中，令水军将领吴班弃船上岸，率数千人在平地建立军营，向吴军挑战。

吴军开战后节节退却，处于被动态势，士气沮丧，众将急于求胜，针对吴班挑战，企图打蜀军立足未稳，都要求出击。陆逊以为刘备必定有诈，要求且观察一下，坚持按兵不动。刘备知道诱敌之计行不通，率8000伏兵从山谷中撤出。陆逊乘机向部队解释不战的方针说，我不听从诸位出击，是估计刘备必有巧计的缘故。刘备全军东下，锐气正盛，而且凭高守险，很难予以突然袭击。即使攻下几营，也难以全部攻克。如果有不利，损害我军大势，决非小事。目前暂且只是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此静观变化。如果这里是平原旷野，还可以说有发生大战、受挫折和交错奔驰的忧虑；现在刘备军沿山行动，态势展不开，自然会在山林木石之间疲惫不堪。我们从容不迫地打击他的弱点罢。众将认为他是畏敌，各自怀着愤恨。

陆逊以39岁年轻后起之秀任大督，标志着东吴以江东大族人物取代昔日淮泗集团周瑜的位置，因而内部矛盾较多。陆逊所部众将，有的是孙策旧将，有的是公室贵戚，很多是南渡的北人。由于在作战方针上同陆逊认识不一致，他们摆老资格，不听约束。陆

逊资望不够，深感棘手。陆逊为了维护其指挥权威，以孙权的任命和军令强压众将服从。他按剑说，刘备是天下知名人物，连曹操都怕他。现在侵入我境，是个强敌。诸位深受国恩，应当和睦相处，共同翦除敌人，上报国家。如果互不服从，就违背刚才说的道理。我虽然是一介书生，可是从主上那里领受任务，主上所以委屈诸位听我指挥，是认为我有点长处可以称道，能够忍辱负重的缘故。诸位各人负责各人的职事，岂能再加以推辞！军令有法，决不可以触犯。陆逊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宽容忍让，当时并没有把问题报告孙权，维护了众将之间的团结，事后得到孙权的赞赏。

为了保障坚壁不战方针的执行，取得孙权的支持，陆逊向孙权上疏指出，夷陵为必守之地，争夷陵必须成功。刘备违背常规，不守老巢，胆敢自行送死，我虽然不才，凭仗您的威望，以顺讨逆，战败他不会用很长时间了。回顾刘备前后用兵，败多胜少，照此推论，不值得担忧。我起初担心刘备水陆并进，现在反而舍船就步，处处结营。我观察他部署，一定没有别的变动。希望您高枕无忧，不必挂念。于是孙权对陆逊坚壁不战方针给予了支持。

第三节　夷陵之战（下）

（参见附图 4）

一、蜀军兵疲意沮陆逊转入反攻

第三阶段，陆逊在蜀军兵疲意沮时，转入反攻。蜀军从正月进兵夷陵以来，一直被阻于山林，到闰六月已达半年，时值盛夏，天气酷热，蜀军疲劳，沮丧，智穷力竭，不再采取新的行动。陆逊认为时机成熟，决策进行反攻。众将则以为攻击时机过迟，不承认退却和相持的必要，都说攻击刘备应该在当初，现在让他深入五六百里，相持七八个月，刘备军要害处都已固守，反击一定

不利。陆逊再次说明相持的必要和反攻时机的成熟。他说，刘备是滑头贼，经历的事情多，他军队开始集结时，考虑精细，用心专一，不可以进攻他。现在屯兵已久，没有占到我便宜，兵疲意沮，计策再也生不出来。夹击这个敌人，正在此时。

反攻开始前，陆逊试攻蜀军一座营寨，不利。众将认为，白拿士兵送死罢了。陆逊通过试攻摸清虚实，说我明白了破敌方法。于是部署反攻，下令兵士各拿一把茅草，火攻蜀寨，一俟火势形成，全军反攻。令朱然率 5000 人攻击蜀军前锋，得手后，与韩当合兵，同自己配合迂回攻击蜀军侧后涿乡（今湖北宜昌西），令水军逆流攻击蜀军水军，自己进至猇亭，指挥决战。吴军发起反攻。在反攻中，朱然攻破蜀军前锋，与陆逊、韩当合兵截断刘备退路，刘备败退。吴军斩蜀将张南、冯习、胡王沙摩柯等首级，攻破 40 多座营寨，蜀将杜路、刘宁等无路可走，被迫投降。刘备收集残兵北上马鞍山①，围绕自己指挥所，缘山部署兵力。陆逊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战死几万人。刘备利用夜暗突围逃走，又惭愧，又愤恨，说，我竟然被陆逊挫败，受辱，岂不是天意吗！

刘备留傅彤断后，指挥沿三峡水路退兵。陆逊令孙桓及李异、刘阿追击。蜀军途中顽强抵抗。傅彤所部差不多都战死了，傅痛骂吴将道，吴狗，哪有汉家将军投降的！他不屈战死。从事祭酒程畿在追船临近时不肯弃船逃生，说我没有学过见敌人就跑，搏战而死。在退军途中，刘备退至秭归，收集散兵，令毁掉船舫，全

---

① 马鞍山在夷陵西北的长江南岸。其方位有多说。《蜀鉴》卷二引《夷陵志》说在夷陵县南："夷陵要害，南有石鼻、马鞍、猇亭"，《读史方舆记要》卷七八《彝陵州·石鼻山》："马鞍山亦在州西北三十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湖北通志》引《嘉庆志》说在湖北宜昌西北 60 里，《湖北通志》引《府志》说在宜昌北 80 里。按，马鞍山当在夷陵西北。如在县西北 30 里，则该山位于江南；如在县西北 60 里、80 里，则该山在江北。当时刘备在江南（《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刘备"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长江已被陆逊隔断，刘备退守的马鞍山，揆诸情理，应在江南。

军改从步道撤退。刘备早在进兵时，沿途设置了驿站，从夷陵直达白帝。退却至秭归时，石门滩的驿人自担大军丢弃的铙铠[①]，在隘道焚烧断路，意外地帮助刘备迟滞追兵。李异、刘阿追击至秭归对岸南山[②]，孙桓杀上夔道[③]，据要冲阻击，刘备弃马，翻山越岭，才幸免于难[④]。刘备又恨又怒，叹道，我从前到京城，孙桓是个小孩子，现在竟把我逼到这一步。这时，赵云率兵到达白帝，马忠率 5000 人也来接应，刘备方才脱险，用锦挽车进入白帝，改白帝为永安。

起初，孙桓被刘备军前锋围困于夷道城，向陆逊求救，陆逊说，还不行。众将指出，孙桓是主公同族，被围处于困境，为何不救？陆逊说，孙桓得到部队拥护，城坚粮足，没有值得担忧的地方。等我计谋施展，想不救孙桓，孙桓之围也自然解除。等到陆逊方略大施，刘备果然奔溃。孙桓后来见到陆逊说，以前确实怨你不来救我，到了今天，才知道是调度有方啊！

刘备退却到白帝以后，吴将徐盛、潘璋、宋谦争相向孙权上表，都说一定能够俘虏刘备，请求批准进入蜀境追击。孙权征询陆逊意见。陆逊及朱然、骆统以为，魏文帝大规模集结部队，假托帮助我讨伐刘备，实际怀有奸诈用心，谨决策马上撤回部队。孙权同意，令追击的李异等部退兵，结束了夷陵之战。

黄权在江北，返回蜀国的道路断绝，走投无路。八月，率部投降魏国。他说我受到刘主恩遇，降吴不可，回蜀无路，所以归命于魏。魏文帝拜黄权为镇南将军，加侍中，封列侯。蜀国有司

---

① 铙是军用乐器，像铃，有柄无舌，可用铙柄敲响，发布停止击鼓的信号。铠是铠甲。

② 南山所在不详。清谢钟英说："南山当在奉节东北。"今人任昭坤以为"当指秭归对岸的山"（《夷陵之战的几个问题》，刊于《江汉论坛》1985 年 3 期）。后说近是。

③ 在石门滩处，见《水经注校》卷三十四《江水二》。

④ 按，此即《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说的"先主失利于秭归"和《后出师表》说的"秭归蹉跌"。

要求逮捕黄权妻子，刘备不准，说是我对不起黄权，黄权没有对不起我，一如当初地对待黄权家属。刘备东征中，曾令侍中马良以金锦、官爵招纳五溪蛮，蛮夷渠帅都接受了蜀国的官印和封号，行动都符合蜀国的意图，相邻各郡也都呼吸相通，牵制东吴步骘1万兵力。马良在刘备败退以后遇害，武溪蛮起事也被平定。零陵、桂阳等郡还处处抵抗，步骘来回征讨，当年都平定了。

二、魏国坐待两敝东吴忍辱联魏

魏国十分关切吴、蜀间的形势。在七月夷陵之战爆发的前夕，魏文帝下诏询问群臣，刘备会不会为关羽报仇。众人认为蜀国是小国，名将只有关羽。关羽战死，国内又愁又怕，没有理由再出兵。只有丞相主簿刘晔说，蜀国虽然地狭势弱，但是刘备想以威武自强，势必用兵显示行有余力。而且关羽与刘备，名义是君臣，恩情如父子；关羽死了，刘备不能兴兵报仇，在关系始终的情分上就会不够。

吴、蜀交兵后，魏国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但要保持这一地位，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当孙权同蜀国和议失败于八月派使者向魏国卑词称臣并归还于禁时，朝臣不明吴、蜀关系内情，都来祝贺魏文帝。只有刘晔说，孙权无故求降，必定内有紧急之事。孙权袭杀关羽，刘备一定大兴问罪之师。孙权外有强敌，人心不安，又怕我利用他困难出兵，才割地求降，一来阻止我出兵，二来拿我的支持壮胆，为他部队鼓气，让刘备起疑。魏国讨论对吴、蜀交兵的对策时出现三种主张。第一种，以刘晔为代表，主张联蜀攻吴。认为当前天下三分，魏国十有其八，吴、蜀两国各保一州。对吴、蜀来说，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才是小国之利；现在自相攻伐，是天亡它们。主张利用吴、蜀犯错误的时机，大举出兵，魏国渡江袭击东吴心腹地区，蜀国袭击其外围地区，不出一个月，东吴将灭亡。吴亡则蜀孤，蜀也必败。因为蜀国如果割占半个东吴，也不能久存，何况它只得到东吴外围地区，我得到

东吴的心腹地区呢？第二种，以魏文帝为代表，主张联吴攻蜀。认为东吴称臣求降，却讨伐人家，会使天下想归顺的人产生疑心。不如且接受吴降，而偷袭蜀国后方。刘晔反对，认为联蜀攻吴更为有利，因为蜀远吴近；东吴听到我伐吴，即使想回军防御我，也由于受到蜀军的牵制而作不到；刘备已愤怒，必然同我争割吴地，一定不会抑怒改计救吴。魏文帝不听，接受东吴归降，并诏令群臣论议：要不要兴师与吴共同取蜀？第三种，以司空王朗为代表，在应诏论议时主张军事上不介入。认为天子大军，应该像华山、泰山，安坐以示天威。只有孙权亲自同蜀贼相持，旷日持久，势均力敌，兵不速决，需我兴兵助成其势时，才可以慎选老成持重的大将，抓住寇贼要害，审察合适时机，选择有利地势，一举成功。现在不应兴师，因为孙权伐蜀之兵还没有出动，我军更不应先动；况且雨水正盛，也不是兴师动众的时候。王朗实际上婉转地主张不应兴兵。魏文帝联吴伐蜀的主张得不到有力支持，听从王朗安坐以示天威之议，继续采用挑动吴、蜀交斗、坐待两敝的方针，谋求渔人之利。

东吴向魏国称臣后，同魏国建立了联合；但它是强与弱的不平等联合，是以采用东吴蒙受屈辱的形式为代价而实现的。孙权为此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八月十九日，魏文帝派太常邢贞去东吴封拜孙权为吴王。邢贞到来以后，孙权屈尊降贵，接受封号。东吴中郎将徐盛等深感耻辱，泪流满面。孙权针对群臣关于不应接受封拜的议论说，从前刘邦也接受过项羽的封拜，这不过是形势需要罢了，于我何损？事后又说，往年同蜀军在夷陵作战的时候，听说北方魏军进行备战，扬言帮助我，我心里知道是借此要挟。如果不接受封拜，是拂了他们的面子，促使其阴谋速发，他们就会同西方蜀军一齐来到，为了避免两面受敌，我才忍耐接受。孙权接受吴王封号以后，魏文帝派使者索要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牛角等珍宝，东吴群臣认为，这是超过贡献规定之外的非分索取。但孙权一一照付，说我们西北正有战事，江东百姓，依靠我们为命。他要的东西，对我来说，不过是瓦块石头，我何必

吝惜。又说，战国的惠施说过，有人想打他爱子的头，而石头可以代替爱子的头。爱子的头是贵重的，石头是轻贱的，以轻代重，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孙权忍辱的同时，在外交辞锋上，向魏国明确地传达决不屈服的意志。魏文帝问东吴使者赵咨，东吴可以征服吗？赵答，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又问，东吴害怕魏国吗？赵答，带甲百万，江、汉为池，有什么害怕的呢！孙权不仅向魏国表示不屈服意志，在行动上还坚决维护其独立。魏文帝封孙权子孙登，孙权以其年幼，辞让不接受，一面又立孙登为太子，并重新派遣沈珩出使魏国表示谢意。魏文帝问，东吴是否怀疑魏国会进攻东吴？沈珩答，不怀疑。问，为什么这样说？答，因为相信并依赖过去的盟约，言归于好，所以不怀疑。如果魏国背盟，自有预备。魏文帝令于禁护军浩周出使，劝孙权任子，即把太子送到洛阳充当人质。孙权如果拒绝魏国这一要求，将遭到魏、蜀夹击，答应则将受制于魏国，丧失独立。在这一两难的抉择面前，孙权坚持不任子；但是为了赢得夷陵之战所需要的时间，极力用拖的策略，保持同魏国联合。他假意答应，百般拖延。浩周再次出使时对孙权说，陛下不相信您能派太子入侍，我以全家百口担保。孙权泪流湿衣，指天发誓，声称一定送子。等浩周返回后，又找种种借口不送。魏国扣留东吴使者。孙权写信托浩周上达魏文帝，推说过去未送，只不过由于太子年幼，现在以十二月为期，将命宗室孙长绪护送，重臣张昭为傅，还希望在魏国宗室中代为择媳云云，竟使魏文帝信以为真。黄初三年（222 年）初，蜀军在秭归经过长时间等待以后，由刘备亲率大军向夷陵进兵。孙权企图把魏国拖下水，诱其同蜀国作战，二月二十三日，上书魏文帝，报告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求魏国出兵将其消灭。魏文帝坚持挑动吴、蜀相斗而自己不出兵的方针，回报说，东汉初，割据凉州和蜀地的隗嚣和公孙述失败，都发端于汉光武帝大将冯异、岑彭关键一战的胜利。希望孙权以冯、岑为榜样，“勉蹈奇功，

以称吾意”①。孙权未能把魏国拖入对蜀作战，但是他通过联合魏国，赢得了夷陵之战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又用拖延方法，没有送太子，保持了独立地位。

三、吴胜蜀败的原因

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从黄初二年七月开始，次年闰六月结束，历时一年。此战，是群雄混战和三国形成阶段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战，通过此战，吴军歼灭蜀军数万②，造成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使自己确保新得的荆州，并进一步改变了吴、蜀力量的对比。蜀国则元气大伤，国力衰落，进一步成为三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最后，由于东吴荆州安全有了保障，无力也无意进攻蜀国，蜀国也无力争夺荆州。从而解决了蜀、吴围绕荆州的战略冲突，结束了东西方的军事较量。从此，三国稳定了各自的疆域，正式进入鼎立阶段。

夷陵之战是东吴依托平原对山岳丛林地敌人进行的阵地防御战，也是以步兵为主的水、陆联合作战。东吴之所以凭劣势兵力取得胜利，就战争指导而言，主要是：1、陆逊在兵少势弱、下流作战的被动态势下，为了保存兵力，待机破敌，以七八百里战略大退却，诱使刘备陷入以山岳丛林地带为阵地的困境，迫使其兵力展不开，在新占几百里峡谷山地的后勤防卫中，由于分兵防魏而分散兵力。2、通过四五个月的坚壁不战，使刘备一筹莫展，把

---

①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

② 关于蜀军被歼人数，《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卷五十八《陆逊传》说：刘备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其提法与《傅子》不同，是可信的。陈寿在280年灭吴以后，即《傅子》作者傅玄278年死后不久，开始著《三国志》，已不采用“八万”的说法，而用“万数”。

蜀军的锐气消磨殆尽，自己则摆脱初期的被动，稳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创造反攻的条件。3、选择蜀军兵疲意沮时作为反攻时机。在反攻时，总结试攻失利的教训，找到有效战法，以火攻破坏敌人的战斗意志，乘敌混乱，展开突然的全面反攻，一举获胜。4、孙权大胆破格提拔富有智略但资历尚浅的陆逊任统帅，为赢得胜利提供重要保证。5、灵活处置三角关系，保障吴军集中兵力对付蜀军，无后顾之忧。孙权以轻换重，不惜屈身忍辱，换取同魏国的联合。陆逊大胜后不深入蜀境追击，都是从战略的而不是战役的领域衡量利害采取的有远见措施。陆逊让蜀军得到喘息，是明智之举。因为不久魏国发动三道伐吴之战时，吴国重新需要蜀国的帮助；在军事上，则如何焯所指出的："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①

刘备在战争指导中犯有严重错误，主要是：1、置主要敌人魏国于不顾，而同东吴开战，把东吴逼向魏国一方，转移了兴复汉室的目标，使自己陷入既攻吴、又防魏的应付两个方向的孤立处境。应该承认荆州被夺的既成事实，利用孙权求和，同它恢复联盟，迫使它充当同魏国作战的外援。2、在作战方针上，没有利用蜀军势盛之时和上流之势，水、陆并进，迫其速战速决。在夷陵被阻后，"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② 刘备计不出此，反而被阻于山林木石之间，使战争初期创造的优势和主动，在岁月流逝中丧失，陷于疲劳和被动。3、刘备身边有经验的谋臣武将短缺。这部分地是由于攻吴决策错误，无法启用持反对态度的赵云等将领指挥大军。

吴、蜀再度交兵，使魏国获得极为有利的难遇的形势。魏文

---

①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八《三国志·吴志·陆逊传》。

②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读〈三国志集解〉批语》，第161页。

帝如果采取刘晔建议的方针，乘机进攻东吴濡须和江陵，在魏、蜀的夹击下，将使孙权、陆逊首尾奔命，陷于极大的被动中。魏文帝关于攻吴会失去天下想归顺人的心的顾虑，在三分的形势下，实际上空无所指，是多余的。以前曹操采取挑动吴、蜀相斗、坐待其敝的方针，是在汉中和襄樊同时失利时的适宜方针。魏文帝处在比当时有利得多的地位上，继续采取这一方针，失去了更有利的选择，是很大的失算。魏文帝虽然取得杰出的文学成就，战略上却不过是一名蹩脚的角色而已。

第十章　三国鼎立的格局和均势

（参见附图 5）

第一节　两弱抗一强的战略格局

一、两弱抗一强格局的形成

在三国鼎立阶段开始时候，即在夷陵之战结束、魏国三道伐吴的一段时间内，吴国联合魏国进攻蜀国的旧格局打破了，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魏、蜀、吴三国之间处于短暂的互不结盟状态。他们彼此既进行戒备，又进行试探。其中，吴国与魏、蜀两国维持着又交往又斗争的关系。吴国对于蜀国，以刘备称帝不符合天下之议，不答复刘备来信，拒绝恢复外交关系。后来遭到魏国三道进攻后，开始接近蜀国。孙权声称，过去把刘备方面称作蜀，是汉帝尚存的缘故，现在汉帝被废，自然可以称刘备为汉中王了①。于是派太中大夫郑泉出使蜀国，承认刘备汉国的名号，请求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刘备去世时，又派冯熙赴蜀国吊丧。吴国对于魏国，一方面抵制其欺凌，一方面极力维持外交往来，并特意支持蜀国南中叛乱势力雍闿，还委任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让他驻在交、益边境上对蜀国形成压力，以这一反蜀姿态缓和同魏国的关系。

魏国企图诱降吴、蜀两国并挑动两国相斗。它通过联吴控制吴国的企图遭到挫折后，发兵三道伐吴也未能奏效，于是其策略

① 此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但是这时刘备已经称帝，不应再称汉中王，因此这一记载的细节有误。

改为诱降吴、蜀，挑动二者相斗，以削弱双方。魏文帝对东吴使者冯熙指出，吴王如果想恢复旧好，就应当“厉兵江关，县旆巴蜀”①，怂恿吴国再次进攻蜀国。又收买冯熙，遭到冯的拒绝后，把他折磨至死。对于蜀国，则利用其主少国疑之机展开诱降，其司徒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信致诸葛亮，陈说天命人事，企图使蜀国举国称藩。

三国间的不结盟状态对于强国魏国有利，而不利于吴、蜀。吴、蜀在魏国压力下，只能各自单独抗魏，彼此非但无法支援，而且还要相互戒备。

吴、蜀两国、特别是蜀国为了摆脱这一不利处境，向重新结盟作出了很大努力。蜀国在夷陵战后认识到摆脱孤立的意义，作为最弱的一方采取了主动，刘备给孙权去信，“已深引咎”②。刘备表示靠近吴国的愿望后，吴、蜀两国各自逐步克服了恢复联盟的障碍。蜀国克服了反吴情绪的障碍。在夷陵战后滋生和高涨的反吴情绪下，诸葛亮一时竟找不到出使吴国的人选，很久才发现邓芝在联吴问题上同他志同道合。黄初三年十月，他派遣邓芝出使东吴，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吴国克服了担心蜀国国力不足的障碍。孙权原本担心蜀国国小势弱，被魏国兼并，对于恢复同蜀国的联盟是否有利把握不准，犹豫不决，因此避而不见蜀国的使者。于是邓芝声称，自己前来，不仅是为了蜀国，也是为了吴国，争取到面见孙权。在谈判中，邓芝历数蜀、吴在土地、统帅、地势方面拥有的优势。他说，蜀、吴拥有四州之地，大王乃当今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俊杰。蜀国有重关险固，东吴有三江险阻，两长相加，共为唇齿。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邓芝指出，东吴如果继续联魏，一定会造成丧失独立、或者彻底孤立的严重后果。他说，大王如果向魏国臣服，魏国上则盼望大王入朝，下则要求太子去当人质。要是不肯从命，就讨伐叛臣，蜀国也顺

---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吴书》。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流而下，见机进兵，江南土地就不再归大王所有。孙权沉默很久，赞同邓芝的见解，同意恢复联盟，为此双方各自作出了重大让步：蜀国默认东吴夺取荆州的既成事实；东吴放弃联魏立场转变为抗魏。吴、蜀恢复联盟，是三国鼎立期间的重大事件，三国之间从此形成了固定的格局，由短暂的不结盟状态，过渡到了稳定的两弱抗一强的状态。

二、两弱抗一强格局的保持

三国鼎立期间，由于吴、蜀联盟十分巩固，两弱抗一强的格局维持了 40 年，一直延续到蜀国灭亡。而联盟所以巩固，根本原因是在此期间魏国国力增强，对吴、蜀两国造成持久的压力，以及吴、蜀之间的主要矛盾荆州归属问题已获解决。以上说明，联盟具备了巩固的基本条件，但是联盟巩固能够落到实处，还是由于两国领导人孙权、诸葛亮不断排除干扰，对于处在强国威胁下的共同战略利益认识清醒，态度坚决，在遇到联盟内部的困难时，吸取过去从联合到破裂的教训，处事比较成熟，因此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使联盟经受住考验。

在蜀国，通过克服反吴情绪巩固了联盟。这种情绪是与东吴作战期间形成的，一有机会就露头。太和三年（229 年）四月，吴国向蜀国通报孙权称帝，要求蜀国承认，并表示愿意并尊吴、蜀二帝。蜀国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在法统上作出让步，因为从名分和体制即法统上说，蜀国以汉统合法继承者立国，不能接受刘姓以外的人称帝。蜀国的议者不愿在法统上让步，一致以为继续同东吴结交无益，名分和体制不顺，主张申明正义，断绝联盟友好，实际上企图回到刘备、关羽与东吴为敌的老路。当此正统地位和战略利益两者发生冲突之际，诸葛亮力排众议，坚持从战略利益出发处理蜀、吴关系，指出孙权早就有僭逆称帝的野心，朝

廷所以不过分重视他的衅情，是为了求得“掎角之援”①。现在如果公然加以拒绝，吴国仇视我必将极深，我就要转移兵力东伐，同它角力，那必须在兼并其土地以后，才谈得上进兵中原。吴国贤才还很多，将相和睦，蜀国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平定它。结果顿兵相持，坐而待老，使北贼得计，这决非上策。从前孝文皇帝以谦卑的辞令同匈奴议和，先帝宽宏大量地同东吴结盟，都是顺应时宜，采取变通措施，从宏观考虑，从长远利益出发，决非匹夫的泄忿行为。他进而分析了坚持联吴的巨大战略利益，指出现在议者都认为孙权以鼎足为有利，不能同我协力，志向、愿望已获满足，没有上岸伐魏的企图。这些看法都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呢？孙权的智慧和实力都不如魏国，所以限江自保；孙权不能越江，就像魏军不能渡过汉水，并非力量有余，以不攻取为有利。如果我大军讨伐魏国，孙权上策会割取魏国土地，以作长远打算，下策会掠夺民众，拓广领地，向国内显示武力，不是端坐不动的人。即使孙权按兵不动而同我友好和睦，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魏军河南部队不敢全部调到西线，这里面的利益也够大的了。孙权僭逆称帝的罪名，不宜公开。于是诸葛亮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庆贺孙权正号称帝。陈震到达武昌，孙权同他升坛盟誓。两国的盟文给予诸葛亮以殊荣，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双方约定“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②。双方实际上是订立了军事条约，还商定灭魏以后平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四州归属吴国，并、凉、冀、兖四州归属蜀国，司州土地，以函谷关为界平分。

在吴国，通过消除来自边防将领对蜀国意图的某些误解巩固了联盟。魏正始五年（244年），吴国西陵、江陵守将步骘、朱然对蜀国调整对魏部署产生猜疑，认为这些是蜀国准备进攻吴国的迹象。他们向孙权上疏说，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对方企图背盟，征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兆是：同魏国打交道，多作舟船，修筑城郭，司马懿南下进攻吴国时，蒋琬不乘虚出兵牵制魏军，反而从汉中退驻成都附近。事情明白无疑，应当预防不测事件。孙权从三角斗争大势看问题，头脑清醒，估计不至于此，说我对蜀国不薄，无负于他们。司马懿前些时候进攻舒县，十天左右就退兵了，蜀国在万里之外，怎么知道我们危急而出兵呢？过去魏军企图进攻汉中，此间开始戒备，也没有出兵，正好听说魏军退兵停止了出兵，蜀国难道又可以因此而怀疑我们吗？况且人家治国，舟船城郭怎么可以不加修缮维护呢？今此间治军，难道是企图防御蜀国吗？人言苦不可信，我以破家的代价，为诸位作担保。最后证实，蜀国并没有进攻吴国的意图，情况同孙权估计的一样，两国的联盟经受住了考验。

吴、蜀两国在长期共同抗魏的斗争中，逐渐养成彼此依赖的习惯，使得联盟深入人心。在吴国国难当头时，有的吴将甚至认定，宁亡于蜀，不亡于魏。吴国乐乡（今湖北松滋东）督朱绩，看到由于孙綝执政、可能出现国内大乱、魏国乘虚而入的严重危险，秘密修书给蜀国，希望做好兼并吴国的准备。蜀国立即准备，令右将军阎宇在边境白帝增兵5000，由于吴国新主孙休杀掉孙綝才作罢。由于吴、蜀联盟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两弱抗一强的战略格局在三国鼎立阶段长期保持了下来。

三、两弱抗一强格局的意义

两弱抗一强的战略格局，促成南北方之间暂时形成战略均势，保证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延续下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吴、蜀在这个格局中，有力地改善了处境，蜀国摆脱四年孤立，吴国摆脱大国控制，它们的实力地位或者上升或者得到巩固。吴、蜀还利用这个格局牵制和分散了魏军兵力，他们彼此则无相顾之忧，造成吴、蜀两国各自全力对魏，魏国则无法全力对吴、蜀任何一方的有利态势。魏国在这个格局中，失去臣服的东吴，再度陷入孤立，其大国的优势地位遭到重大打击。

这个格局，还深刻地影响着鼎立期间的战争进程。吴、蜀由于结盟，一度取得战略优势，先后对魏国发动了两个波次的攻势。第一个波次，从太和二年（228年）到青龙二年（234年），以诸葛亮北伐为主，孙权出兵配合，双方多次发动攻魏战争。第二个波次，从嘉平五年（253年）到景元三年（262年），双方利用魏国内部司马氏和政敌之间忙于进行内战的机会，以吴国诸葛恪大举进攻魏国淮南，随后又联合魏将诸葛诞等在寿春抗击魏军，蜀国姜维在西线北伐进行配合。在这两大波次的攻势中，魏国被迫处于防御地位。

吴、蜀联盟也有局限。它对于南北实力的平衡，发挥了作用，但只是次要作用。当南方自身衰落时，联盟无力回天。其次，吴、蜀的配合主要体现在战略格局上，作战配合常常不尽如人意。孙权在唯一直接配合诸葛亮北伐的那次作战中，听说魏明帝率领大军亲征，便退兵了。姜维西攻狄道，也未能挽救诸葛恪在新城的失败。魏灭蜀时，吴国老将丁奉出兵寿春（今安徽寿县）以牵制魏军，听说蜀国灭亡，也撤军了。吴、蜀作战上不能有力配合，主要是战场相距万里，战略意图有时不能或不便及时通报，缓急很难呼应，双方首先都必须考虑本国利益，然后才能顾及盟国，魏国又制造双方的猜疑等等。

第二节　南北方战略均势及其打破

一、南北方战略均势

在三国鼎立的初期，北方魏国同南方吴、蜀之间所形成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实力大体相等。魏国在人口、州数、地域、发展潜力等最基本方面，占有重大优势。黄初二年（221年）魏国的人口，

根据今人赵文林、谢淑君推算，为103万户，682.4万人，① 约占三国总人口60%。魏国据有8州，其州数占原东汉13部州的2/3。魏国所在的地域，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魏国存在两大弱点。第一，曹丕、曹睿时期战争负担沉重。曹丕兴师动众，急于统一，劳役倍增。曹睿防御西方诸葛亮和东方吴军进攻，也消耗了很大的国力，“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②。第二，经济稍有复苏及诸葛亮死后，曹睿就腐化，沉湎于享乐，大兴宫室，“百役繁兴，作者万数”③，“农业有废，百姓嚣然”④。由于这两个弱点，北方扭转残破局面的进程推迟了，它的优势一时发挥不出来。

南方吴、蜀在人口、州数、地域、发展潜力等最基本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人口方面，黄初二年吴国为47.8万户，315.5万人，约占三国总人口28%。蜀国为20万户，132万人，约占三国总人口12%，吴、蜀合计占总人口40%。州数方面，吴国据3州，蜀国据1州，其州数共占原东汉13部州的1/3。吴、蜀虽然在上述基本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但是在鼎立初期，它们在国力上具有三个大的强项。第一个强项，是吴国有长江之险，有最强大的水军，蜀国有重关之固，有善于山地战的步兵。第二个强项，是吴、蜀两国通过结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抗北方的合力。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强项，是吴、蜀两国的经济有较好的增长。由于战乱较少，较为安定，以及北方人口大量流入，先进生产技术传入，两国大力提倡，南方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当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北方经济严重破坏后未能很好恢复的同时，南方经济发展得如此突出，两相对照，分外鲜明。因此，在三国鼎立阶段的初期，在

---

①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8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引吴、蜀户口数的出处与此处同。

② 《三国志》卷二十五《杨阜传》。

③ 《三国志》卷二十五《高堂隆传》。

④ 《三国志》卷二十三《和洽传》。

魏国两大弱点和吴、蜀三个强项的作用下，南北双方出现了战略均势。

二、南北方战略均势的打破

在三国鼎立阶段，特别是在魏明帝以后，战争尽管仍然不断，但比起群雄混战和三国形成阶段来说，是相对减少了，社会相对地安定了。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下，三国的国力都得到增长，其中尤其以魏国的国力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最大。魏国辅政大臣司马氏采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军事政策，坚持守势战略，减轻战争负担，停止大修宫室，遣散工役，节约开支，在两淮大兴军屯，积极任用贤能，大胆提拔胜过自己的人才，注意给人民以好处等等，因此魏国经济复苏较快，重新取得往日中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军力。到魏国后期，人口和兵力占有很大优势。灭蜀前，其户口为144·5万户①，占三国总户数的63%，兵力估计至少在60万以上②，占三国总兵力60%。

这期间，南方国力也有增长，它们的经济属于正常增长，无法同北方恢复性增长相比。吴、蜀两国的人口、兵力都不如魏国。蜀亡时，户口仅28万户，占三国总户数的12.2%，“带甲将士十万二千”③。吴国灭亡时，户口52.3万户，占三国总户数22.4%，兵23万，舟船5000余艘④。吴、蜀两国兵力按各自灭亡时的总和33.2万计，仅相当魏军兵力66%。同时，吴、蜀后期政治、军事

---

① 见《中国人口史》，87页。

② 寿春之战中，魏国内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41万，其中，司马昭投入26万，诸葛诞投入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10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加上洛阳、其他州郡和西线兵力，估计应为60万左右。

③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④ 《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注引《晋阳秋》。

上问题较多，制约了国力的增强。吴国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暴虐害民，史不绝书。蜀国宦官黄皓弄权，国事日非，姜维接连北伐，穷兵黩武，加速消耗了国力。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吴、蜀两国在长期的竞争中，未能将与北方的均势地位保持住。

总的看，北方由于恢复较快，综合国力逐渐对南方占了优势。到了灭蜀前夕，南北方两大集团的战略均势，实际上被打破了。

第十一章 蜀国战略和战争

第一节 政治经济概况

一、政治清明阶级矛盾缓和

诸葛亮是蜀汉第一代领导成员，第二代主要领导人，具有军政经验、治理能力和献身精神。他主政后，总揽内外，对蜀国进行殚精竭虑的治理：

1、笼络益州土著豪强大族，缓和主客矛盾。诸葛亮吸取刘璋未能调和同益州豪强大族的矛盾导致失败的教训，对土著豪强大族开放政权，大力擢用益州人士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担任要职。据统计，除刘备父子外，蜀国统治集团有职有籍可考者189人。其中关张等北方故旧人士22人，占11.64%；诸葛亮等荆襄人士66人，占34.6%；李严、黄忠等巴蜀集团人士92人，占48.1%；马超、姜维等甘陇人士9人，占4.7%。① 从统计看出，近半数职位给巴蜀人士。巴蜀大族得到进身之途，都乐意拥护诸葛亮，同刘备集团其他三方面人士共同支撑蜀国政权。

2、坚持以外来人士掌握领导权。诸葛亮深知巴蜀人士更关心减轻战争负担，在困难时刻，一些人有投降魏国的倾向。为了克服这一倾向、确保蜀国不沦为魏国的地方政权，他防止巴蜀人士掌握最高领导权。李严代表益州大族利益，虽受遗诏辅政，诸葛

① 雷近芳：《试论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亮只令他在外地任职，不使参与中枢决策。后来又只在荆州、凉州等外来人士中，挑选蒋琬、费袆、姜维为接班人。

3、厉行法治，限制土著豪强大族横行。由于刘璋懦弱畏惧，对土著豪强大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助长了益州豪强的骄横专权和公家衰弱。诸葛亮针对这一积弊，以法治国。对为非作歹的，严厉重罚；对愿意为国效劳的，给予仕进之路。在执法中，出以公心，做到"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①，时人评价为"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②。通过推行法治，在依靠的同时，限制了益州豪强，使政治趋向清明。

4、以身作则，推行德化。诸葛亮通过自身的勤政廉政，进行身教。他事无巨细，亲自裁决。随军在外，除了凭官府依例供给的个人吃穿以外，没有别的开支，不营私产。曾向后主表示，身后不让家有余财，死后果如其言。他开诚心，布公道，作风公正。又虚心纳谏，设立参署，集中众人意见，广泛采纳利国的建言，提倡僚属"勤攻吾之阙"③。打了败仗，进行检讨，布告天下。在诸葛亮无言的示范下，蜀国官吏相对较为廉洁，费袆"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④。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⑤。

蜀国在诸葛亮治理下，政治清明，阶级矛盾缓和，赢得人民的好感。农民起义次数，在三国最少，仅为魏、吴的1/8。

二、晚期宦官弄权并穷兵黩武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执政18年间，遵循诸葛亮成规，维

---

①②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④ 《三国志》卷四十四《费袆传》注引《袆别传》。

⑤ 《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

护了蜀国安全和国内团结。蒋琬、费祎死后，蜀国政治开始走上昏乱。陈祗以侍中掌握大权。诸葛亮培养的大将军姜维，位在陈祗之上，常年拥兵在外，很少参与朝政，实际权力不如陈祗。后主宠爱宦官黄皓。黄皓机灵乖巧，勾结陈祗，开始干预政事。陈祗死后，黄皓进一步操弄权柄。后主以董厥、诸葛瞻共平尚书事。俩人不能矫正黄皓。黄皓企图利用姜维出兵多年不能建功之机，废掉姜维，令右大将军阎宇掌握一国之兵。姜维面启后主，要求杀奸巧专恣的黄皓。后主令黄皓前来谢罪，加以包庇。姜维后悔失言，率兵远去沓中屯田种麦以避祸，从此不敢回成都。蜀国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费祎死后，姜维穷兵黩武，自认为有能力攻取魏国陇西地区，一再发动攻魏战争，使国内深受频繁用兵之苦。

宦官弄权和穷兵黩武，造成蜀国政治昏暗，经济衰退，百姓困苦，国家跌入危险边缘。吴国五官中郎将薛珝在蜀亡前出使归来后说，蜀国君主昏暗，不知道过错，臣下只求无罪容身。到其朝庭，听不到正直言论；经过田野，百姓面带菜色。我听说燕雀在堂前筑巢，母子相互嬉乐，自以为十分安全，突然栋梁断裂，房屋着火，而燕雀怡然自乐，不知覆巢之祸就在眼前，这大概是蜀国当前的处境罢。第二年，即诸葛亮死后29年，蜀国在魏军进攻下灭亡了。

三、经济保持发展战争负担沉重

蜀国经济在战事频繁下，保持了一定的发展①。它的农业有很大的发展。诸葛亮为了度过“民贫国虚”② 难关并支持战争，实行先农后战的政策。在汉中黄沙、谷口、沔阳、赤崖，武都兰坑，阴平沓中，及魏境渭水之滨，展开军屯，生产军粮。他还很重视水

① 本书关于三国经济问题的叙述，参考了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锦》引《诸葛亮集》。

利灌溉工程。鉴于李冰都安堰（今都江堰）促成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的良好效益，诸葛亮把此堰看作“农本，国之所资”，北伐时，“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①。在农业上，诸葛亮实行的是一种先“存恤”、后役使的政策。这种政策保证自耕农获得再生产的条件。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上层没有大肆进行土地兼并，社会也没有因此出现严重问题。在上述一系列“务农殖谷”②措施的推动下，农业出现了晋人袁准称赞的“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③和左思描绘的“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④的兴旺景象。从陈寿“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等叙述看，诸葛亮时百姓生活大体上过得去。诸葛亮死后，百姓在道路上自发野祭，说明怀念他的政策。

蜀国手工业、商业也获得发展。重要手工业有盐铁业。盐铁业的发展一是蜀中盐井较多，二是使用了新能源天燃气。蜀郡临邛县使用井火即天燃气煮盐，提高了出盐率，“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⑤有关的官员也比较得力。首任司盐校尉王连，主持盐业专卖，获利很多，有助于国用。越巂太守张嶷，也把出盐铁的定笮、台登、卑水三县盐铁业收归国有。司金中郎将张裔，则主持农具和兵器的制造。另一项重要手工业，是丝织业，主要是植桑养蚕织锦。织出的蜀锦独步三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⑥。蜀锦价格昂贵，可以换回大量黄金，是军事经济的支柱。诸葛亮鉴于“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⑦，大力提倡织锦。蜀国种桑养蚕很普遍，连诸葛亮也在“成都有桑八

---

① 《水经注校》卷三十三《江水》一。

②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④ 〔梁〕萧统编《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上。

⑤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临邛县》。

⑥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锦》引《丹阳记》。

⑦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锦》引《诸葛亮集》。

百株"[1]。当时，官府作坊，私人"伎巧之家"[2] 和农民家庭织锦副业一齐发展，"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3]。谯周《益州志》叙述濯锦的习俗是："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4]，所以时人称成都为锦里，濯锦之江为锦江。蜀国的商业繁荣，内贸发达。左思《三都赋》描绘成都市面，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5]，其遣词造句超过对魏都市面的赞美。境外贸易也有较多的开展。用蜀锦、蜀马等物，同吴、魏展开交换，又通过益州郡、永昌郡，从水路与盘越国（今孟加拉国）、天竺（今印度）、掸国（滇、缅边境上的古国）、大秦（罗马帝国）进行贸易往来。

蜀国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国小人少，养兵十余万，诸葛亮常年攻魏，"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6]，国家和自耕农战争负担沉重。姜维连年北伐，对经济造成比诸葛亮北伐更大的压力，以致田野间的农民面有菜色。

第二节　威武自强战略

一、威武自强战略的形成

在三国鼎立期间，蜀国形成了威武自强的战略。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对魏国采取战略进攻。从太和二年（228 年）春到青龙二年（234 年）八月，五次亲自率军北伐魏国，直到病死前线。北伐取得一定成绩，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他赍志而殁后，大将军、大司马蒋琬动摇于攻势战略和守势战略之间。蒋琬在魏景初二年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②③⑤ 《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上。
④ 《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上注引。
⑥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238年)率诸军进驻汉中，企图乘魏伐辽东之机，联合吴国攻魏，但未能实现。正始二年(241年)，又企图改由沿汉水袭击荆州西部之魏兴、上庸等郡。但朝中认为此方向退路艰难，蒋琬便放弃这一企图，承认今魏国地跨九州，根蒂滋生蔓延，铲除不易，加之吴国连连不能按约定如期发兵，因此经同费祎、姜维计议，确定作战目标再退一步，改为攻占凉州。但是蒋琬连这一计划也未付诸行动，于正始七年(246年)去世，执政12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虽欲攻，实为守。蒋琬死后，费祎在继为执政的7年内，明确奉行防御战略。当时魏国曹爽、司马懿两派激烈争权，姜维企图乘此良机出兵北伐，费祎经常裁制，给他的兵力不超过万人，告诫他不要因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如果不如志，悔之无及。蒋琬、费祎自认为作战指导能力不足以担负北伐重任，所以实际上取的是守势。正如费祎对姜维说的，我们不如丞相远多了，丞相尚且不能定中夏，何况我们呢！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至于那种功业，可等待能者。

费祎死后，姜维执掌军事大权，恢复了中断的攻势战略。这时魏国更加强大，蜀国国力不强，政治日坏，姜维对蜀国政治的影响能力也有限。他不顾上述总的形势，自恃其才能武力，认为熟悉魏国西部风俗，陇山以西的凉州可以为我所有，利用魏国内乱和有事淮南、在西线暂时无力集结重兵之机，招诱羌、胡为羽翼，连年频繁出兵攻魏。直到蜀亡的前一年，姜维还在对外用兵。

诸葛亮、姜维都实行攻势战略，蒋琬、费祎实际实行守势战略，以便休养生息，为等待能者恢复战略进攻作准备。总的看，蜀国以弱者立足攻势，基本上采取威武自强的战略。作为小国，采取攻势战略是因为：1、有利于立国及巩固对内的统治。蜀国在三国中实力最弱，以1州之地对抗8州之地的魏国，实力过于悬殊，加上刘备集团在益州是外来统治者，从政治上看，久后益州豪强大族有可能要求把蜀国降为地方政权。为了防止这一危险，唯有通过北伐鲜明地突出自己汉统继承者的身份，以占据实力虽然弱小但政治上强大的地位。2、攻魏是改变敌强己弱的唯一希望。蜀

国鉴于局促一隅，长期下去，敌强己弱将成定局，时间不利于自己，因此企图发扬刘备集团屡败屡战、以弱胜强的传统，乘着曹丕、曹睿才能不及诸葛亮，搅乱局面，乱中取胜，夺取全国的统治权。3、蜀国虽小，但有攻魏的一定物质基础：有巩固的益州根据地，地理上既有重关之险，经济上又有力量支持战争。同刘备寄寓荆州时相比，条件大为改善。4、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对于魏国形成优势。蜀国恢复联吴后，造成两弱抗一强的战略格局，大体与魏形成均势。魏国不能全力对蜀，蜀国可以全力对魏，而且有了吴国的牵制，只需对付魏国一部。

二、对战争各阶段的战略指导

蜀国攻魏战争经历三个阶段，各阶段战略指导如下：

1、诸葛亮阶段。任务是北伐魏国，兴复汉室。其战略指导是：全面进行战争准备。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积极争取与国，平定南中，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治戎讲武，以积蓄和调动全国国力，取得国外支援。黄初四年（223年）诸葛亮通过作《正议》，向众官解释攻魏战争的意义和必胜原因，进行思想动员。在全面准备的基础上，太和元年（227年）他率众军开赴汉中，带领蜀国从和平转入战争状态，并陆续制订出作战目标、原则和建军方针。根据不贪速功、力求“十全必克而无虞”① 的思想，其作战目标是：当前为夺取陇右，尔后为逐步夺取长安、洛阳。其作战原则是：战略上实行持久，战役战斗上争取速决，以汉中、武都、阴平为前进基地，实行多次进入魏境的进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和粮尽就退兵回国，最后在敌境屯田，以便支持久驻敌境，待机破敌，谨慎用兵以避免大败，认真组织伏击，保证退兵安全。其建军方针是：结合作战暴露的问题进行治军，着重从质量上而不

① 《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是从数量上提高战斗力。

2、蒋琬、费祎阶段。任务是巩固国防，等待时机。其战略指导是：慎重待机，反对急躁攻魏。蒋琬时不但根据敌我间形势和北伐的教训，确定把攻魏作战的目标再后退一步，修改为攻占凉州，而且强调等待有利时机行动，时机不到，宁肯暂不行动。费祎则明确采取战略防御，制止姜维轻举妄动，主张等待能者出现才能攻魏。部署也由准备进攻的前沿部署，修改为用于防御的两线纵深部署。蒋琬时以王平督不足3万兵力守汉中，自己率大军退驻汉中与成都间的涪县（今四川绵阳）。费祎时一度于正始九年（248年）出屯汉中；但嘉平三年（251年）年底，又退守涪县以南的汉寿（今四川剑阁东北），恢复了两线部署。汉中兵力依据实兵诸围的原则，部署于北面秦岭要地。如敌来犯，一面御敌于秦岭，一面以涪县等地的主力迅速北上增援，断敌退路，击退入侵之敌。

3、姜维阶段。任务是夺取魏国陇山以西地区。其战略指导是：在每次攻魏时，出陇西麹山（今甘肃武山西南）、凉州西平（治西都，今青海西宁）、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洮水以西、段谷（今甘肃天水市东南段溪水形成的山谷）、长城（今陕西周至县西南25公里）、洮阳（今甘肃临潭）、侯和（今甘肃卓尼东北15公里）等地，攻魏的作战目标主要在诸葛亮的目标以西距魏国统治中心更远的地区，但有利时机不排除攻击诸葛亮的目标以东的关中地区，追求攻击目标多样化以出敌不意。进攻时机上利用魏国内战形势，力量上取得羌、胡和当地魏官支持，并积极同吴国攻魏行动呼应。

三、威武自强战略的基本内容

轮番实行攻势和守势。蜀国战略从夷陵战后，到诸葛亮去世的13年间，采取攻势；蒋、费执政的19年间，采取守势；姜维主持军事至蜀亡的10年间，重新恢复攻势。总的来看，攻势阶段

23年，比守势阶段时间略长，对三国全局的影响也更大。攻势是蜀国战略的基本方面，守势是为攻势作准备的，二者交替采用，互相补充。

战略目标不出兴复汉室、蚕食雍凉、守险不战三者。这三个目标，是法正建议刘备夺取汉中时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夺取汉中后，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战略目标，“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①。蜀国在其三个阶段中，根据国力和作战指导能力进行选择。诸葛亮选择上计，企图通过北伐，最终北定中原，兴复汉室。姜维选择中计，企图夺取陇山以西，蚕食雍、凉。蒋琬、费祎选择下计，企图保国治民，敬守社稷。

在汉中防御上，先后采取三种方针。第一种，以主力部署于国防前沿汉中，在魏军进攻汉中时，诱敌深入汉中平原而歼之。这是诸葛亮采取的成功的方针。第二种，以主力部署在距汉中千里之外的内地涪县、汉寿，以次要兵力部署于汉中。在汉中实兵诸围，即兵力部署于汉中前沿秦岭的筑城要点，御敌于秦岭山区，以涪县主力迅速增援。在兴势防御战中，这一方针有惊无险，也获得了成功。第三种，以主力部署在距汉中、内地千里之外的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以次要兵力部署于汉中，在汉中又放弃实兵诸围，企图诱敌深入汉中盆地而歼之。甘露三年（258年），即蜀亡前5年，姜维认为实兵诸围只能防御，不能获得歼敌有生力量的大利，令在魏军进攻汉中时，弃秦岭不守，集中兵力、粮食退守汉、乐二城，诱魏军进入平原。魏军攻关不成，野外无粮，千里运粮，必感疲劳。伺其退兵，守关和机动部队并进反攻，即可歼敌。这一方针，是弃险不守、启敌寇心、开门揖盗的方针，直接导致蜀亡。

三国鼎立期间魏、吴两国均取守势，唯有蜀国取攻势战略。最弱的国家，反而最具有进攻性。这体现了刘备培养起来的独特作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风，永不服输，处境越是不利，越是敢于在逆境中迎接挑战。同时，使敌人认为蜀国攻魏都有如此大的决心，则保卫国家的决心应该更大，如果发动灭蜀战争，付出的代价太高，是不值得的。上兵伐谋，企图挫败魏国攻蜀的企图于无形。客观上是一种小国威慑强国的战略。

第三节　诸葛亮南征

一、南中的战略地位和反蜀叛乱

南中，古称西南夷，辖境相当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由于位于巴、蜀以南而得名。南中是疫疠之乡，环境闭塞。为了打通该地，秦代开凿五尺道（道宽仅为5尺，相当今天3尺左右）；汉武帝时，继续修道，通南中牂牁江，数年后，道即不通。南中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蜀国时杂居着叟、青羌、僚、濮等夷越少数民族和汉族。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有些地区是奴隶社会，有些仍停留在无常处、无君长的原始社会。南中有较强的地方势力：一是少数民族首领，早先称为君长，两汉受封或称为王侯，后又称为渠帅、夷帅、耆帅、叟帅；二是夷化的汉族豪强大姓。他们两汉时从内地迁来，拥有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夷族招纳部曲，接受夷族语言、文化和宗教，部分夷化，世袭相承。到汉末三国时，这些人的势力比土著渠帅更强大。蜀国在南中设庲降都督，总摄南中，其治所距蜀2000余里①。南中作为蜀国一个特殊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其地少数民族善战，是重要的兵源，战略物资丰富，盛产筰马、僰僮、髦牛；巂唐、不韦等地，出产金银宝货。过去前往那里当官的，有人其富延及子孙10代。汉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大破南中益州郡造反县民，获畜产10余万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三《李恢传》注引裴松之语。

头，富比中国。其次，它是通往南亚、中亚的陆上要道。东沿牂牁江可通南越（今广东一带），西经永昌郡可通身毒（古印度）和大夏国（中亚古国，位于今阿富汗北部），是外贸要地。因此，南中是蜀国的大后方，是北伐不可缺少的物资和兵员供应地。

秦汉以来，南中人民由于不能忍受官府压榨，经常奋起反抗。大姓和渠帅乘机利用人民不满情绪，进行叛乱和分裂活动，对中央政府时服时反。每当赋敛烦苛，或者王朝衰落、更替之际，南中往往起而反叛王朝，王朝无法对其照搬内地的统治方式。东汉灵帝时，南中反叛，朝廷以精兵进剿，不能取胜，朝议曾企图比照朱崖成例予以放弃，因启用李颙而讨破南中，李死后南中再次反叛。刘备定蜀后，领有越嶲、牂牁、益州、永昌等南中四郡，委任安远将军邓方为庲降都督。邓方轻财果毅，夷、汉敬服，很有威信。邓死，南中人李恢继任。

刘备死后，南中出现不稳。牂牁（治且兰，今贵州黄平西南40公里）太守朱褒①、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东）汉族大姓雍闿等愈发骄横狡诈。据说益州从事常房②巡视牂牁时，获悉朱褒有不轨之心，逮捕审讯并杀了他的主簿。朱褒大怒，攻杀常房，诬告他谋反。丞相诸葛亮试图招抚，杀常诸子，把常的四弟调职，安抚朱褒。又令都护李严晓喻雍闿，雍闿傲慢地答称，现在天下有三个政权，远人惶惑，不知该归顺何方。建兴元年（223年），雍闿等起兵。该郡夷人不愿反蜀，雍闿派郡人、汉族大姓孟获造谣诓骗夷人，迫使夷人听命。夏天，朱褒和越嶲（治邛都，今四川西昌）夷王高定等起兵响应，造成内外相连的声势。这时南中永昌郡太守开缺，而雍闿投降吴国，把益州太守张裔拘执，送往该国，被孙权遥授为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永昌郡道路不

---

① 朱褒的职务，《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作牂牁太守，卷四十三《马忠传》作牂牁郡丞。《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作“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领太守”，《华阳国志》近是。

②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作常颀。

通，与蜀地隔绝，郡功曹吕凯等率吏民封锁郡境，抵制雍闿到任，坚决不同意反蜀。雍闿、高定率军从东北进攻该郡，不能攻陷。

二、南征的准备和部署

诸葛亮以遭逢国丧，不便加兵南中，于建兴二年（224年）春，关闭通往南中的灵关，以一年多时间，进行南征准备：1、平稳接管刘备权力。通过以丞相领益州牧，辟用、擢用蒋琬、李邵、马勋、宗预、秦宓、五梁、杜微、费祎、董允、郭攸之等大批名士，牢固掌握军政大权。2、"务农殖谷"①，与民休息，积极创造南征物质基础。3、同吴国恢复联盟，使叛乱势力陷于孤立。

经过上述准备，度过了刘备去世的危机，发展了农业生产，孤立了反蜀势力。诸葛亮认为，北伐前必须首先南征，以安定后方，即所谓"思惟北征，宜先入南"②。为此，必须贯彻"南抚夷越"③的既定方针，在南征中既解除北伐后顾之忧，又为北伐筹集军资及兵员，成为可靠的后方基地。现在时机成熟，应当举行南征。他采纳参军马谡建议的攻心为上的作战方针。马谡在送别诸葛亮南征时曾说，南中依恃其地势险远，不服久矣，即使今天征服它，明天还会叛变。现在正准备倾国北伐对付强贼，南中窥探到国势内虚，其叛变也会加速。如果杀尽所有的叛乱者，根除后患，那既不是仁者之情，又不可能仓促办成。"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④。

这时战争双方的情况是：南征军强大，有统一指挥和丰富作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中所载《后出师表》。该表出自吴国大鸿胪张俨《默记》，《诸葛亮集》不收，虽然是伪托之作，却是当时人的手笔。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隆中对》语。

④ 《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谡传》注引《襄阳记》。

战经验，占据优势；但由于反蜀地域广大、分散，地形、气候复杂，交通闭塞，因此机动困难，联络不便，平叛费时。三郡反蜀分子在当地累代经营，根深蒂固，占有地利，其势力不易轻易根除；但兵力弱小，不相统属，靠欺骗和宗教裹胁众人，有利于南征军各个击破和以攻心进行瓦解。

诸葛亮深知众将威望、才能不如自己，不顾属下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的劝谏，亲自南征。其部署是：三路进军，亲率主力西路军，从成都出发，沿江下到僰道，沿马湖江（今金沙江）经安上（今四川屏山西）上溯，袭击越嶲郡；令门下督马忠率偏师为东路军，从僰道进趋牂牁；令庲降都督李恢率偏师为中路军，自驻地平夷（今贵州毕节）向雍闿老巢益州郡推进。

三、南征的经过和胜利原因

建兴三年（225年）三月，蜀军南征。西路诸葛亮大军进入南中后，取道越嶲，进驻高定"窟穴"①邛都以西300里的卑水（今四川美姑河畔，美姑、昭觉二县间）待机，企图调动高定、雍闿停止进攻永昌郡，回援越嶲，以支援永昌郡被围军民，及聚歼高定部队。这时，反蜀军发生内讧。雍闿被高定部曲所杀，余部归入孟获。诸葛亮利用对方内乱的有利时机，发动进攻，攻陷邛都城，俘获高定妻子儿女，企图利用高定走投无路的困境，对其招降。不料高定纠集2000残部，杀人盟誓，决心死战。诸葛亮惊讶"邈蛮心异"②。攻心不成，不得已再战，斩高定，平越嶲。

东路军马忠进入南中后，取道牂牁，击破反叛的太守朱褒，朱褒率军西逃。

中路军李恢以南中长官身份，率部向益州郡巡行，在昆明③遭

①② 《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地部·穴篇》。

③ 在平夷至滇池路上，今云南境内，但不是今昆明。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注，巴蜀出版社1984年7月版。

到各县纠合的反蜀势力的围困，同诸葛亮大军失去联络。他欺骗反蜀势力说，官军粮尽，企图退军，我是本地人，打算留下同你们合伙干。对方信以为真，戒备松弛。李恢挥军出击，大破反蜀军，追奔逐北，南到盘江①，东接牂牁，联合东路军马忠，追击并歼灭了西逃的朱褒军②，同诸葛亮主力军声势相连。

至此，南征军平息了越嶲、牂牁两郡叛乱，只剩下益州郡孟获孤军，还在凭借险要，负隅顽抗。鉴于孟获为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所敬服，诸葛亮决心以乘胜之师，展开攻心战，促使孟获归顺。五月，军渡泸水（今雅砻江下游和金沙江会合雅砻江以后一段），蹈涉不毛之地，进入益州郡，招募勇士，擒获孟获于盘中（盘江地带），请他观看蜀军营阵。孟获不服，放回再战。蜀军三路声势相连，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孟获深感不是对手，也知道诸葛亮不愿以南中人为敌，纵而不去，声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③ 当年秋天，蜀军三路会师滇池，全部平定了叛乱。

战后，诸葛亮为了实现节约人力、物力，在南中基本不留兵、不运粮，并使南中"纲纪粗定，夷、汉粗安"④，达到民族基本团结、法纪基本建立的目的，进行了独特的战后处理：1、缩小行政区，把南中四郡划为七郡，以南征将领李恢、马忠、吕凯等任太守。2、把南中大姓头面人物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孟获，调往蜀中做官。3、承认当地渠帅的权力，在县以下录用渠帅就地任职，除了原有的当地驻军外，南征军不在南中留防。他说，如果留外人，就该留兵，留兵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上夷人新近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必酿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人不断有废杀之罪，疑心自己罪重，如果留外人，终不能彼此信任，三不易也；现在我不留兵，不运粮，只求纲纪粗定，夷、汉粗安。4、

---

① 今南盘江云南开远以下一段（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注）。

② 《水经注校》卷三十七叶榆河注："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盘江者也。"

③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劝令大姓富豪用金帛收买刚狠不服的少数民族“恶夷”做部曲，通过大姓对他们实施控制。凡收买多的大姓，允许世代袭官。夷人也贪恋货物，逐渐服属，形成了夷、汉部曲。同时，令南中出人出物支援北伐。征发南中劲卒青羌加入蜀军，建立五部，并把其万余家迁移到蜀地。此后，五部青羌所当无前，号称飞军。征收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给军国使用。“军资所出，国以富饶。”① 十二月，诸葛亮凯旋成都，结束南征。

诸葛亮南征，从建兴三年春天开始，当年秋天结束，年底凯旋，历时半年有余，取得平定南中、恢复民族团结、恢复秩序、支援北伐的重大成功。南征是国内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是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的结合。南征所以取得重大胜利，就作战指导而言，主要是：1、准备充分，目的正确。在刘备去世的不利时机，诸葛亮不急于平叛，经过准备，使政权稳定、民安食足以后，才开始南征。同时，正确处理了南征和北伐的关系，使上一仗南征为下一仗北伐服务，从而使南征有了正确的目的。2、以攻心为重要的作战方针。为了使南征作到不仅是军事征服，也是人心的征服，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作战方针，政治、军事并重。对叛乱势力，凡不服者坚决打击之；能争取者，极力争取之。在实施过程中，以屡胜之师压境，向遭受严重挫折丧失战胜可能的反蜀势力展开攻心，以七纵七擒，收到“南人不复反矣”的预期效果。3、根据敌弱而分散的特点，在兵力部署上三路并进，声势相连，在越嶲、牂牁两郡各个击破以后，三路会师，以钳击叛乱势力最后的老巢益州郡结束作战。除了上述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以外，战后优待当地大姓、渠帅，给予他们政治、经济特权，实行县以下的民族自治。这些措施，使军事胜利获得极大的巩固。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第四节 诸葛亮北伐（上）

（参见附图6）

一、北伐的准备和战略方针

诸葛亮南征后，北伐魏国提上日程。北伐魏国是刘备集团一贯的方针。刘备以夺取天下为最终目的。到了寄寓荆州后，这一目的具体化为实行北伐。为了给北伐作准备，刘备集团积极实现《隆中对》规划的跨有荆、益的计划。此后刘备偏离了北伐的目标，同吴国作战，临终觉悟到伐吴之非，决心把主要作战方向再度转为魏国，并托孤于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①，殷切地把北伐重任托付诸葛亮。诸葛亮鉴于魏国经济必将逐渐恢复，时间拖长对蜀国不利，而及早北伐可发挥自己治国治军优势，何况身死之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认为唯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蚕食并最终打败魏国，也可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为此决心展开北伐，并且“用兵不戢，屡耀其武”②，坚持到底。

刘备死后，诸葛亮加紧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全面进行北伐准备。他在外交上，派使者联吴；韬光养晦，对魏国劝降书不作答复，以低姿态麻痹敌国。政治上，高度集中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③，励精图治，笼络土著地主，缓和主客矛盾，革除刘璋法令不行的弊政，以身做则，虚心纳谏，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战争。经济上，关闭通往南中和魏国的关口。在一年多内，不作南征的部署，在数年内，不作攻魏的部署，坚决与民休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多产粮食，增加储备，保护水利工程，发展煮盐、织锦等手工业，扩大财政来源。军事上，伺机平定南

---

①②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中叛乱，治戎讲武，训练部队。

太和元年（227年）三月，正当魏国文帝去世、新君继位和由于东吴攻魏牵制了魏军时，诸葛亮向后主上《出师表》辞行，提出“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①，率军北驻汉中，进入临战准备。行前，以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守成都，管理政务，以前将军李严移住江州（今重庆老城区），主持后方军事，护军陈到驻防东境永安（今四川奉节），秘密招诱魏国领新城郡（合房陵、上庸二郡而置，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太守孟达叛魏，以钳制魏军南线司马懿军。但孟达动作迟缓，太和二年（228年）正月，遭到魏国都督荆、豫诸军事司马懿突然围攻，被围16天，城陷被斩。

这时魏、蜀双方的形势，是魏强蜀弱。魏国军事力量占有很大优势。其战争潜力较大。黄初二年（221年），人口为682·4万人，约占三国总人口的60%，面积为整个北中国。此外，魏国政权度过草创阶段，由于其统治集团中荀彧那样一批拥汉派消失了，大族都拥护魏国，侯音那样的起事也减少了，政权进一步获得巩固。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但是魏国也存在一些弱点，主要是经济恢复还只是初步的。魏明帝时，尚书卫觊上疏称：“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经济“凋弊”，有待“复振”②。

蜀国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在江陵、夷陵之败中损失了荆州军全部、益州军一部，兵力遭受重大削弱。战争潜力也不如魏国，人口为132万人，约占三国总人口的12%，面积只有益州一州。蜀国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也存在着有利条件。同刘备寄寓荆州时相比，有了一定的实力。通过再度联吴，吴、蜀联盟对魏国构成战略均势。在现有两弱抗一强的战略格局中，魏国不能全力对蜀，蜀国可以全力对魏，有可能在局部地区造成某种优势。经济未遭到破坏，还有较大发展，政权不仅获得巩固，而且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一《卫觊传》。

由于诸葛亮善于治国，其治理在三国中最有条理。刘备集团有以弱胜强的一贯传统。蜀国并无重大危险。诸葛亮称刘备死后，蜀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①，是有意如此说。实际上自从魏文帝去世后，魏国实行守势战略的意见占了上风，魏国不仅没有力量也不打算发动大规模的灭蜀战争。

北伐开始前，魏国西线设雍、凉都督，以镇西将军曹真充任，指挥关中、陇右和凉州部队。又设关中都督，以安西将军夏侯楙持节充任，驻在长安，指挥关中部队。另由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共同防守长安。由于刘备死后，蜀国数年间寂然无声，西线魏军战备比较松懈，早在黄初三年曹真即回到了京都。

蜀、魏边界的地形对于北伐十分不利。边界东段以秦岭为界。秦岭是蜀军进入关中的巨大障碍，它海拔 2000 米以上，东西绵延 800 里，为黄河、长江主要分水岭。岭南为汉中，岭北为关中。关中是四塞之国，传统农业区，其要地长安，是蜀国夺取洛阳的必经之地。边界西段是蜀国汉中、梓潼同魏国武都、阴平的边界。根据上述地形，从汉中出发北伐魏国，可行道路有四条。两条在东段：1、出秦岭子午道，进入关中，直抵长安以南，其谷长 660 里。2、经秦岭褒斜道，出斜谷，进入关中西部，直抵郿县以南，其谷长 470 里。此道是秦岭主要通道，道路险峻多石，曹操视为“五百里石穴”②。两条在西段：1、出阳平关，经故道、散关，进入陇东。2、出阳平关，入魏境，在山高谷深、锋锐坡陡的陇南山地行军，从武都郡沮县（今陕西略阳以东）沿西汉水漕运，经 500 里③，到达陇右之祁山（今六盘山南段，在今甘肃礼县东北）。上述地形及道路状况表明，北伐进兵时，必须通过数百里人烟稀少的山道。其中只有祁山道可部分通漕，其余都要穿越数百里险峻的秦岭山道，因此北伐的后勤保障极为艰巨。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② 《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③ 《水经注校》卷二十《漾水》：“诸葛亮表言，祁山县去沮五百里”。

诸葛亮进驻汉中后，同众僚属谋议北伐应攻取何处。督前部、领丞相司马魏延建议出奇兵，先取长安。他建议，听说夏侯楙以主婿守长安，胆怯无谋。自己愿领精兵5000，背粮人5000，从褒中（今陕西褒城）出发，沿秦岭南麓，出子午谷向北，不到10天，可到长安。夏侯楙听说我突然来到，必定乘船沿渭水逃走。长安城中，唯有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共同防守。横门邸阁（粮仓）和逃散人民丢弃的粮谷，足以满足军食。等到魏国东方援军集结，还需要20多天，丞相从斜谷进军，一定可以到达长安会师。如此，则一举咸阳（秦都，今陕西咸阳东北10公里）以西可以平定。魏延直捣长安的这一计划，十分诱人；但必须具备所有下列前提方能如愿：即魏延军10天到达长安，夏侯楙弃城逃走，其粮食来不及坚壁清野，夏侯楙弃城后魏国援军20多天才能完成集结，诸葛亮大军从褒斜道定可如期会合。但是，由于魏军不必顾虑蜀国从宛、洛方向钳制，可以集结较多兵力对付西线，因而上述前提很难样样具备，很可能有一二个环节发生意外。事实上，两年多以后，魏军曹真走子午谷道，出发一个多月，谷道才走了一半，而不是10天。六年后，诸葛亮大军走褒斜道，两个月才出谷，而不是一个月。按照魏延的估计，可以说都出了意外，将满盘皆输。显然魏延之计建立在侥幸的基础上，是有极大风险的赌博，其风险是国力不足的蜀国承受不起的；因此诸葛亮认为魏延之计“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①。

于是诸葛亮按照积极进取、谨慎求实、逐步推进的原则和蜀国的实力，确立了北伐各阶段的战略目标，这就是：1、当前以夺取陇右为目标。所以确定首攻陇右，是因为进军时可避开秦岭天险，并有西汉水可供漕运，因此这条进军路线走的是“坦道”，有利于蜀军“平取”。同时，陇右魏军兵力比北伐蜀军少，有利于以众击寡；陇右是产麦区，夺取后可在敌境建立一块因粮于敌的根据地，并且可瞰制关中，顺流而下，进攻长安。对于这一企图，魏

---

①《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国也认识到了。后来司马昭曾经很清楚地揭示，诸葛亮常有“兼（陇右）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1] 的志向。2、中期以夺取长安及关中为目标。关中同陇右相邻，居天下的上游，是进攻洛阳的理想出发地。3、远期东出潼关，以攻占洛阳、“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2] 为目标。

二、第一次北伐

魏太和二年（228年）春，诸葛亮首次率军进攻魏国。根据其夺取陇右的决心，以声东击西之计，令镇军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率偏师为疑兵，前据汉中之箕谷（秦岭山谷名，今陕西褒城西北），扬言由斜谷（秦岭通道，北口在陕西眉县西南）进攻郿县（今陕西眉县东），以吸引和钳制关中魏军；自己率主力出汉中西北，进攻陇右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然后以祁山为根据夺取整个陇右。祁山位于陇南山地之天水郡，有居民万户，丘墟殷富，是此次北伐途中的战略要点。

魏国的对策是，当诸葛亮率蜀军主力进驻汉中时，魏明帝及议者都主张大规模征兵，先发制人，进攻汉中。散骑常侍孙资认为，如果进攻汉中，道路既险阻，计所需精兵、运兵、镇守南方之兵共十五六万人，必须更有所征发。这将引起“天下骚动，费力广大”[3]，后果十分可虑。建议仅用现有兵力，令各大将据守要点和险隘。通过数年的防御，达到疲惫吴、蜀和兴旺国力的目的。魏明帝同意，放弃进攻企图，采取防御方针。不久，魏国突然听说诸葛亮出军，戎阵整齐，号令明肃，朝野恐慌。陇右天水（治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安（治豲道，今甘肃陇西东南）郡及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响应诸葛亮，关中大震，朝臣

---

① 《三国志》卷二十二《陈泰传》。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③ 《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不知计从何出。魏明帝企图利用诸葛亮深入之机，在内线作战将其击败。声称，诸葛亮过去依托秦岭固守，现在前来进攻，对我来说，正符合兵书所说的调动敌人的方法；而且诸葛亮贪图三郡，知进而不知退，现在利用这一时机，肯定可把他击败。立即部署如下：令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关西），驻在郿县，迎战赵云；令南屯荆州之左将军张郃率领步骑兵5万为前锋，归曹真节制，前往陇右迎战诸葛亮。二月十七日，明帝亲往长安督战。张郃率部迅速沿关陇通道西进，走汧（今陕西陇县）陇古道，企图上陇山，从街亭要地进入陇右，挫败蜀军夺占陇右的企图。

诸葛亮大军迅速攻占祁山、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50公里），形成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这时，只要切断关陇通道，把目前优势保持一个月，即可全部占领陇右；因此，断陇成了夺取陇右的关键，其要点则在于守住由关入陇的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诸葛亮围绕断陇这一要点部署兵力：以参军马谡率领众军为前锋，扼守街亭，阻止张郃进入陇右，以少数部队招纳羌、胡，继续攻取陇右，自己坐镇西县指挥全军。在蜀军兵威下，天水、南安太守弃郡东下出逃，陇西（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南）、广魏郡不服。诸葛亮派蜀军前往进攻，陇西太守游楚据城抵抗，对来攻的蜀帅说："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①

马谡奉命占领街亭后，违背诸葛亮节度，仅令高详驻守旧城，护卫水源，主力不据险守城，反而舍水上山，驻在街亭南山上，举措烦扰，并拒绝先锋王平一再的规谏。张郃军一到，直逼山下，切断马谡汲道，造成蜀军主力断水，然后展开进击，大破马谡，蜀军星散，兵将各顾自己，不相统率。魏将郭淮同时攻破高详军营。唯有王平率领千人，鸣鼓对峙。张郃怀疑有伏兵，不敢进逼。王平徐徐收集蜀军散兵，率将士撤回。魏援军占领街亭，进入了陇右，战局逆转。诸葛亮失去了在陇右以强胜弱的战机，进无所据，

① 《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注引《魏略》。

令西县人民千余家随军迁徙，退回汉中。三郡陆续被魏军平定。蜀军佯攻部队赵云、邓芝疏于戒备，在箕谷与曹真对垒时以优势兵力失利。① 退却时，赵云亲自断后，烧毁褒斜道赤崖以北的阁道，迫使魏军停止追击，军资一无所弃，兵将也不相失。蜀军在占有陇右3郡后，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结束了第一次北伐。

这次北伐所以失败，是在关键作战中用将不当。众僚属都认为应该用有作战经验的宿将魏延、吴壹为先锋；诸葛亮师心自用，提拔一向赏识的马谡，违背刘备临终“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② 的叮嘱，招致失败。其次，诸葛亮来能亲临街亭前线，临机处置，以减少和避免失误。再次，是蜀军素质不高。诸葛亮事后总结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③。针对此战暴露的问题，战后诸葛亮进行了整顿。1、严肃军纪、承担责任。考微劳，甄壮烈，重用王平，加拜其为参军，进位讨寇将军，杀街亭之败的责任者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并引咎自责，自贬三等，自降为右将军，仍行丞相事，把自己的失误布告天下。吸取街亭失败时自己不在军中的教训，以后大军每次作战，诸葛亮必亲临前线。2、从提高军队质量出发进行改革。减兵省将，校变通之道，要求僚属“勤攻吾之阙”④。3、励兵讲武，提高蜀军战术技术和遵纪水平。通过上述整顿，蜀军面目一新，“戎士简练，民忘其败”⑤。

三、第二三次北伐和魏军反攻

第二次北伐。当年冬十二月，诸葛亮获悉魏军曹休攻吴兵败、张郃东下，关中虚弱，急率军数万，走故道，出散关（今陕西宝

---

① 许多论文和著作都说赵云等失利是由于弱不胜敌，但诸葛亮曾说过，“大军在祁山和箕谷，皆多于贼”，可见赵云等不是因为兵少而失利的。

② 《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谡传》。

③④⑤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鸡西南大散岭上），围攻陈仓（今宝鸡市东）。陈仓在关中西端，邻近陇东。魏大将军曹真料到诸葛亮后来必出兵陈仓，预先部署将军郝昭守城。郝昭增筑了陈仓城。诸葛亮兵临城下，令郝昭乡人劝降，遭到郝昭两次拒绝后，下令用云梯、冲车强行攻城。郝昭率千余人守城，等待援军。在守城时，用火箭烧毁蜀军云梯，用绳子系连石磨压折冲车。蜀军伐木，制造攻具百尺井阑，在井阑上射箭攻城，用土丸填平城堑，企图攀城，郝昭在城内加筑重墙进行抗击。蜀军挖地道企图突入城里，郝昭在城中掘横沟堵截。双方昼夜攻战 20 多天。曹真派将军费耀增援。魏明帝也以驿马急调张郃，并亲自到河南城，置酒送行，令率京都南北军 3 万余人增援。张郃深知诸葛亮仓促深入，必缺粮谷，对魏明帝说，估计自己未到，诸葛亮已经退兵了，屈指计算，蜀军的粮食支持不了 10 天。张郃晨夜前进，军未到，诸葛亮粮尽，已经退兵。退兵时，魏将王双率骑兵追击，遭到伏击被杀。这次北伐，仓促出兵，粮食不足，以绝对优势兵力攻敌于有准备的坚城，无功而还，教训是北伐应有充分准备，不应以攻坚为主。

第三次北伐。魏国边境上的武都（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治今阴平，甘肃文县西北）两郡距魏国腹心地区较远，武都是蜀军进攻陇右的必经之地，阴平是入蜀阴平小路的起点。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撤出汉中时，为预防武都不保，把该郡氐人 5 万余落，迁到扶风、天水一带。太和三年（229 年）春，诸葛亮鉴于两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派陈式（一作"戒"）进攻这两郡。魏国雍州（治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刺史郭淮率军企图反击陈式，诸葛亮率军迎战，进抵武都北境之建威（今甘肃西和北 3 公里）。郭淮自料不敌，退军。蜀军获得攻占两郡的胜利，诸葛亮也恢复了丞相职务。这次仅取两郡，作战目标更加有限。同年十二月，诸葛亮部署汉中防御：把丞相府营向后移至汉中南山（今陕南米仓山西）下的平原上，在其前方南郑以西之沔阳（今陕西勉县东）筑汉城，以东之城固（今陕西城固东）筑乐城，构成犄角防御体系。

在防御蜀军三次进攻后，魏军企图举行反攻。太和四年（230

年）七月，大司马曹真对明帝说，汉人屡次进犯，请允许由斜谷进入汉中，同众将数道并进，可以大胜。明帝下诏，令曹真沿斜谷进军，司马懿沿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进军，与曹真会师汉中，众将或由子午谷、或由建威进入。司空陈群以粮少、道险、兵少为由，力阻出兵，指出，太祖从前到阳平进攻张鲁，多收豆麦，增加军粮，张鲁还没有攻下，粮食就匮乏了。现在粮食既缺乏，斜谷道又险阻，难以进退，在道中运输必遭劫持，多留兵守要地，则减少前线战士。明帝被说服。曹真上表要求改从子午道进军，陈群又陈述不便，并提出军事开支建议。明帝诏令把陈群意见发交曹真研究，曹真却以其为据下令进军。

太和四年(230年)秋，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谷、曹真由斜谷，数道并进，会攻汉中。诸葛亮集中兵力于曹真、司马懿预定会合地成固、赤坂(今陕西洋县以东龙亭山)待机，令李严率兵2万增援汉中，原江州防务交其子李丰，并负责其父后方供应。这时大雨30多天，栈道断绝，魏军战士凿路前进，粮运艰难，出兵一个多月，谷道才走了一半。魏臣纷纷建议应知难而退。九月，下诏班师。此次魏军反攻过于急躁，粮食、道路、兵力准备都不足，内部意见分歧，诸葛亮又未遭到重大损失，反攻条件不成熟，因此中途夭折。

诸葛亮部署防御时，令魏延、吴壹两进凉州羌中（今甘肃临夏自治州等地），以外线出击，牵制魏军反攻。魏延等在羌中联结诸戎，在陇西郡阳谿（今甘肃渭源东北）大破魏国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获胜后返回汉中。

第五节　诸葛亮北伐（下）

（参见附图7）

一、第四次北伐

太和五年（231年）二月，诸葛亮再出祁山，以新发明的木牛

运粮，企图以祁山为据点，夺取陇右。诸葛亮以大军围困祁山守将贾嗣、魏平，以王平别守南围。魏军在祁山筑城固守。这时曹真有病，明帝调镇守荆州的大将军司马懿主持西方军事，统率张郃、费曜、戴陵、郭淮西拒诸葛亮。司马懿决心集中兵力，坚壁不战，迫使蜀军粮尽退兵，其部署是：令费曜、戴陵留精兵4000守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其余全部西救祁山。张郃建议，分兵驻守雍（今陕西凤翔南）、郿，以掩护大军侧后。司马懿不听，说如果估计前军能够独当蜀军，你的意见是对的；如果不能，分为三处，易被各个击破。于是全军前进。面对魏援军的到来，诸葛亮企图尽快寻歼司马懿，再夺取陇右。其部署是：留一部分兵力围攻祁山，自率主力到上邽迎战。郭淮、费曜夹击诸葛亮。诸葛亮大破郭、费军，乘势大割上邽小麦，充实军粮，同司马懿军在上邽以东相遇。司马懿利用蜀军运输困难、利在速战的弱点，据险不战。诸葛亮求战不得，引军退回祁山，企图调动魏军，在运动中寻求战机。司马懿跟踪蜀军，来到卤城（今甘肃天水、伏羌之间）。张郃认为，诸葛亮已成孤军，粮食又少，很快就要退却了，建议分奇兵袭扰蜀军后方。说不宜只前进，而不敢逼近蜀军，坐失民望。司马懿不听，坚持尾随跟踪诸葛亮军，找到后又登山掘营，不肯交战。魏将多次请战都不准，指责司马懿"畏蜀如虎"①，质问他将怎样对付天下人的耻笑。司马懿无奈，五月初十，被迫发起攻势，其部署是：以张郃攻击祁山蜀军之南围，自己率军从中路攻击诸葛亮军。诸葛亮指挥魏延、高翔、吴班分头迎击，大破魏军，获甲首3000级，司马懿回军保营。

六月，诸葛亮粮尽退军。司马懿令张郃追击。张郃说，兵法上讲，归军勿追。司马懿不听，张郃不得已，进兵。蜀军在木门（谷名。一作青封，今天水西南50公里）登山布设伏兵，弓弩乱发，射死张郃。诸葛亮此次出兵，以李严署丞相府事，令其在汉中主持粮食运输。诸葛亮深以粮食运输保障为忧，同李严函商，提出上计是李严

---

①《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从汉中出兵，断魏军粮道；中计是保障汉中粮运，使诸葛亮与敌持久；下计是诸葛亮退回祁山以南的武都待机。询问对策。时值盛夏，雨水很大。李严顾虑从沮县到祁山的漕运不能保障，令马忠等前往说明他的意见，呼叫诸葛亮回军。回军后，李严佯惊，问为何退兵，又上表后主说诸葛亮是伪退。诸葛亮怒，废李严为平民。①

这次北伐，进军路线与第一次相同，蜀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连获胜利，是由于诸葛亮初步掌握北伐战争规律，不再以攻坚为主，而以野战为主，在运动中歼敌。蜀军经过改革和训练，素质有极大提高。但因粮尽退兵，及发生李严事件，显示出后勤保障成为影响北伐成功的重大障碍，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加以克服。

二、第五次北伐

诸葛亮接受以往的教训，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三年之内，与民休息。在汉中黄沙（今陕西勉县以东）平原，休整军队，倡导农耕，农闲教兵讲武，并制成流马木牛。为了缩短战时运输，青龙元年（233年）冬，令各军把粮食运至临近魏境的斜谷口，在该处修建邸阁（粮仓）储存。第四次北伐以后，魏国也认真分析今后战争形势。大将军军师杜袭、督军薛悌预料第二年麦熟时，诸葛亮将再次进兵。鉴于陇右无谷，主张利用冬闲预先运粮。司马懿则认为，诸葛亮两出祁山，一攻陈仓，都遭受挫折而退兵。纵使再次出兵，将不再攻城，当求野战，出兵地点必在陇东，不在陇右。诸葛亮每以粮少为根，回去必定积谷，预料没有三熟不能行动。根据这一判断，魏国展开备战，从冀州向上邽迁来农民，大力发展陇右农业；在关中开凿成国渠，修建临晋陂水库，灌溉农田数千顷；并“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②，发展关、陇农业、冶

① 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七《刘后主志》及注十。

② 《晋书》卷一《宣帝纪》。

铁业，增产粮食，打造兵器，增强抗击诸葛亮进攻的物质基础。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经过三年准备后，集中在汉中的10万大军① 北伐，用流马运粮。四月，沿褒斜道出斜谷进入陇东，在郿县渭水南原筑垒。行前约会吴国同时大举攻魏，以分散魏军兵力。司马懿率众军拒诸葛亮。魏明帝深以诸葛亮进兵为忧，令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2万，受司马懿节度。诏令司马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② 魏将要求在渭北待机，司马懿认为渭南为百姓积聚所在，是必争之地，率军渡过渭水，背水筑垒，在渭南同蜀军对峙。对众将说，诸葛亮如果是勇敢者，应当出武功（今陕西武功西25公里），东进，威胁我长安，那的确可忧；如果西上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20公里的斜谷口西侧），诸位就没事了。诸葛亮鉴于此次必与魏军久持，需要在魏境站稳脚跟，并坚持以野战为主的方针，在未大量歼敌以前，不应过早对长安攻坚，因此驻军于五丈原，企图占据渭水两岸，切断关、陇要道，创造有利态势，尔后寻歼司马懿军。

诸葛亮率军渡过渭水，企图进攻北原（今陕西宝鸡县东20公里渭水北岸处），以迅速切断关、陇通道。雍州刺史郭淮料到蜀军必登北原，以便把兵力连接到北山，主张抢先守北原，得到司马懿赞同。于是郭淮屯兵于北原，堑垒尚未筑成，蜀兵大至，郭淮将其击退。几天后，诸葛亮大军西行。众将以为要攻击魏军西围，唯有郭淮指出，这是企图示形于西，把魏军重兵引向西方，以便进攻渭北之阳遂。魏军迅即以胡遵、郭淮守阳遂。当夜，蜀军果然来攻阳遂。魏军已有准备，蜀军不能前进，断陇企图失败，作战进入相持阶段。在相持中，诸葛亮鉴于北伐每由于运粮不继，使作战意图不能实现，决心在敌境分兵屯田，作长期驻屯打算。蜀

---

① 《资治通鉴》卷七十二《魏纪》四魏明帝青龙二年二月。

②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按，魏明帝给司马懿这一诏令，《资治通鉴》系于六月，《三国志》卷三《明帝纪》系于四月，应以《明帝纪》为准。

军屯田兵错杂在渭水边上的居民中间，百姓安居，屯田兵不与民争私利。

五月，孙权率号称10万之军，三道攻魏，以响应诸葛亮。魏国陷入东西方两线作战。鉴于蜀远吴近，吴军易于击退，魏明帝决定东攻西守。七月，亲自东征，吴军退兵。群臣以司马懿正同诸葛亮相持，兵势不解，主张明帝前往长安督战。明帝说，孙权退走，诸葛亮胆破。大将军可以制诸葛亮，我无忧了。司马懿坚决执行魏廷以逸待劳的方针，坚壁不战。蜀、魏两军相持100多天。双方营围相连，诸葛亮屡次派使者送挑战书，百般诱司马懿出战，又向司马懿赠送妇女服饰，笑他胆小非丈夫，羞辱并激怒他。司马懿佯怒，上表请战，明帝不准，派卫尉辛毗持节任军师制止出战。诸葛亮说，司马懿本不想战，坚持请战，是向部队做的姿态，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如果能胜我，何必又千里请战呢？

在相持中，诸葛亮早起晚睡，罚20杖以上亲自审阅，事务烦剧，每天吃饭才几升，病势加重。司马懿见到蜀国使者，不问军事，只问诸葛亮生活起居和工作多寡，说诸葛亮身体垮了，还能长久吗？八月，诸葛亮在军中逝世，享年54岁。蜀军按照遗令秘不发丧，整军而出，退兵回国。司马懿闻讯追击，蜀军反旗击鼓，佯装反击，司马懿收军，不敢进逼，蜀军结阵而回，进入斜谷以后发丧。百姓嘲笑司马懿说："死诸葛走生仲达"①。

蜀军丧失统帅以后发生内讧。前军师魏延每次北伐，都希望率兵万人负责一个作战方向，得不到批准，常认为诸葛亮胆怯，叹恨自己才能得不到发挥。诸葛亮死后，魏延企图接替他统帅蜀军继续作战，反对退兵。魏延平时同长史杨仪势同水火，这次杨仪让他断后，两人发生冲突。魏延率部抢先南行，烧绝阁道，阻挡杨仪。杨仪方面何平叱魏延先登说，诸葛公死，身骨未寒，你们怎么胆敢如此！魏延士兵知道理亏，都走散了。杨仪挥军击杀魏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延，蜀军安全地回到汉中，结束了长达五次的北伐。

三、北伐的胜败得失及原因

诸葛亮北伐，从太和二年春开始，到青龙二年八月结束，前后进行五次，历时六年半。北伐是诸葛亮为了兴复汉室，以小而弱的国家拼其全力主动进攻大而强的国家的一系列作战，是三国鼎立期间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是一场有失有得的战争。蜀军在此战中，夺取了有战略意义的武都、阴平两郡，以小国之兵，五次咄咄进逼大国，显示了小国弱民威武自强的决心，显示了其国虽小而不可侮，其兵虽寡而不可欺，使其敌国不敢轻易进犯它，使自己的国家获得一定的安全。同时蜀国通过准备和支援战争，调动国内各方面力量，促进了国家治理，使其政治趋向清明。北伐以弱军对强军作战，取得如此成绩，难能可贵，博得各方面称赞。吴国大鸿胪张俨称赞诸葛亮"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司马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甚至说"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雍、凉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①

北伐是高原野战，以及山地、城市攻坚战，是在总兵力劣于魏军、战场兵力前3次优于魏军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取得一定战果，主要是由于：1、打有准备之仗。战前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准备。每次北伐前，针对薄弱环节，又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准备。2、在战略进攻的方向上，选择了魏国力量薄弱的陇右和陇东，因而在第一、二、三次北伐中，造成局部优势。既减少风险，又便于威胁长安。3、掌握战场主动权，边打边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提高。善于从失利中发现问题，总结教训，后三次越打越好。特别是进出秦岭的行动组织得好，使魏军往往无隙可乘，又善于进行山地战，尤其善于山地设伏歼敌，行军作战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获得敌国人的称赞。魏人袁准称“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亮率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①。司马懿巡行蜀军遗留的营垒，称赞诸葛亮为“天下奇才也”②。4、千方百计地解决粮食保障的问题。主要措施是：注意与民休息，扶植自耕农，合理战争负担，“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③。注意用兵不扰民，以利于持久，“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④在汉中大力兴办屯田。“蜀在汉中兴办的屯田，就其效果看未必即逊于魏之淮南屯田，更肯定超过了魏在雍、凉二州举办的屯田。”⑤ 加强并改善粮食运输。出祁山时，利用水道进行漕运；发明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减轻运输强度；战前把粮食前送，缩短战时运输距离；动员大批人力参加运输，组织诸葛亮之子诸葛乔和诸将子弟带头在秦岭谷道中参加运输；最后，在魏境就地屯田，以减轻转输。

但是北伐使用蜀军主力，连陇右都未能夺取。就其未达到目的看，是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蜀国力量过于弱小。它的人口、土地、兵力大大劣于魏国。加之连年动众，造成“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⑥，背上沉重包袱。魏、蜀边境的地理环境不利于进攻，以及由于“守战之力，力役参倍”⑦，进攻者必须动员更多的兵力和徭役，这两点使得蜀国北伐是以小国弱势之客军攻强敌于易守之地，更加剧了原有的劣势。其次，是三国鼎

---

①③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⑤ 马植杰：《三国史》第十六章，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278 页。

⑥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⑦ 《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立阶段的战争形势和规律，与在此以前的三国形成阶段和群雄混战阶段的战争形势和规律不同。从形势上说，这时发生了不利于北伐的变化。隆中战略提出兴复汉室的任务，建立在曹操政权草创和人心思汉基础上。经过21年，魏国度过草创阶段，满足了北方人民结束战乱和大族享有特权的愿望。到曹睿时，也是“已历三世，贤能为之用”的“不可图”① 的大国了。这时，魏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再是拥汉派与拥曹派的矛盾，而是高堂隆所指出的“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②的新矛盾，兴复汉室成了过时的号召，同时，诸葛亮期待的“天下有变”也没有发生，加之北伐的对手，或值人杰，攻魏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础。从战争规律上说，这时只能力取，难于乘势，“可为文王，难为汉祖”③，诸葛亮所能做到的，只有最大限度发挥主观努力而已。这对于弱者是十分不利的。再次，在战略步骤上，诸葛亮企图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持久努力，逐步实现其最终目的，但这一战略完全建立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当他劳累早逝以后，北伐便只能中途夭折，而不能达到其目的。北伐所以失败，除了上述根本原因以外，还由于作战指导有失误：诸葛亮把守街亭的关键任务，交给缺乏实战经验的马谡，使得本来大有希望取得的陇右未能取得，功亏一篑。第二次北伐，仓促出兵，错误地进行攻坚战，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北伐期间频繁出兵，打成消耗战，劳师疲民，对于小国尤其不利。

魏国取得防御作战胜利，主要是由于：1、在暂时不具备灭蜀实力的条件下，实行防御，避免由于大规模动员引起“天下骚动”④，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便于利用边境有利地势和防御地位，消耗蜀国，积蓄力量。2、在吴、蜀并举，合肥、襄阳、陇东同时告急的情况下，东攻西守，以主力重点攻击进攻合肥的孙权，迫

① 《隆中对》论东吴语。

② 《三国志》卷二十五《高堂隆传》。

③ 《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

④ 《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使东吴退兵，使较顽强的诸葛亮一路陷于孤立。3、坚守祁山、陈仓等要点，针对蜀军侨军远战、粮运艰难的弱点，坚壁不战，以逸待劳，把蜀军拖至粮尽退军。魏国在作战指导中也有失误，初期对蜀国发动攻魏战争估计不足，造成西线战备薄弱。曹真在时机还不成熟时，急于反攻，导致失败。

第六节　兴势防御战和姜维北伐

一、兴势防御战

正始四年（243年）以来，魏国出现了要求进攻蜀国汉中的形势。魏明帝死后，曹爽与司马懿辅政。曹爽以宗室和明帝宠爱缘故执掌朝政，但未立大功。而这一年蜀国姜维、费祎先后率军从汉中退驻涪县，仅以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统汉中，兵力不足3万。在这一形势下，魏国尚书邓飏等劝曹爽进攻汉中，以树立威望，曹爽采纳，太傅司马懿制止无效。正始五年（244年）三月，曹爽西至长安，大规模征兵六七万人①，并以关中及氐羌民夷为运夫，决心以优势兵力，乘虚攻陷汉中。他与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玄一起，从骆谷② 进入，向汉中前进。骆谷是从关中穿越秦岭进入汉中的谷道之一，全长约420里，道中有兴势（今陕西洋县

---

① 曹爽伐蜀兵力说法不一。《三国志》卷九《曹爽传》“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卷四十三《王平传》则称“七年春，魏大将军爽率步骑十余万向汉川”。《资治通鉴》用《王平传》说，称“爽西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人，与玄自骆口入汉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魏纪六》邵陵厉公正始五年三月）。《三国志》作于曹爽失势、司马氏当政之时。曹爽兵力如果更多，足以证明其无能，有利于司马氏，不会不加采用。两个数字不一致，或者是蜀国方面夸大了。

② 秦岭河谷名。起自今陕西城固西北，终至今陕西周至南，全长约420里。

北）等险要。兴势“山形如盆，外甚险，中有大谷”①，以东有黄金戍，是张鲁所筑，其地南接汉中平原，北接古道，也十分险要。兴势一带地形不利于攻而有利于守。

曹爽军前锋进入骆谷后，汉中蜀将大惊。在敌众己寡的危急形势下，有的将领提议退入平原，固守待援，说现有兵力不足以拒敌，只可退守汉、乐二城，遇到敌人，令其进入。这期间，我驻涪县援军有足够时间援救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白马河入汉水处）。汉中主将王平认为汉中距涪县将近千里，敌人如果乘我援军不到即攻克阳平关，就酿成大祸，决心固守秦岭险要，其部署是：令护军刘敏、参军杜祺先据守兴势，自己为其后拒（预备队）。如果魏军分兵向黄金戍，则自己率千人居高临下，瞰制魏军。等到此时，涪县援军将至。在众将中，只有护军刘敏赞同其决心部署，认为汉中人民男女布满田野，庄稼还在田里，如果听任魏军进入平原，则大事去矣。于是率所部据守兴势，多树旗帜，弥漫100多里。闰三月，后主令大将军费祎率众军增援汉中。光禄大夫来敏辞别费祎时，要求下围棋。这时羽檄交至，人马披上铠甲，车子整备完毕。费祎镇静自若地对局，毫无厌倦。来敏说，刚才聊以观察试探你，你是合适的人，一定能够破敌。

四月，由于汉中蜀军固守秦岭，魏军受阻于秦岭之兴势，未能出谷道，关中及氐羌的运输不能保障粮食供应，牛马骡驴大量死在运输途中，运夫号泣于道路上，涪县及费祎援军则相继到来。参军杨伟给曹爽陈说形势，认为应该紧急退兵，不然，必将战败。邓飏、李胜与杨伟在曹爽前发生争论。杨伟说，邓飏、李胜将败坏国家事，应该斩首。曹爽不悦。太傅司马懿写信给夏侯玄说，《春秋》认为责任大的人，其德也重。过去武皇帝（曹操）第二次进入汉中，几乎大败，是你所知道的。现在兴势最为险要，已被蜀军先期占据。我军如果进不得交战，退却又遭敌堵击，全军覆灭是肯定的。那时你将如何承担责任呢？夏侯玄害怕，说给曹爽。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兴势山》。

五月，曹爽引军退回国内。费祎乘机进兵，依托曹爽退兵路上的沈岭、衙岭、分水岭① 堵击曹爽。曹爽争夺山险苦战，仅能通过，但是征调来用作运输的牛马，几乎死光丢光，引起羌胡怨恨、叹息，关右地区消耗一空。

兴势防御战从正始五年三月开始，经闰三月，五月结束，历时近 4 个月。此战，蜀军以劣势兵力，阻止魏大军于秦岭，在援军增援下，将入侵之敌击退，取得保卫汉中的胜利，使魏国不敢轻易攻蜀。此战，是山地作战，取胜关键在于：1、王平在敌众己寡形势下，下定前沿防御、阻敌于秦岭的决心，坚决阻止其进入汉中，以防止出现魏军攻陷阳平关、直下蜀地的危险。在阻击魏军时，充分利用秦岭险要，以劣势兵力固守待援，既保护了平原庄稼，又使魏军欲战不得，疲劳不堪，为援军驰援，赢得时间。2、费祎援军到达后，在敌退却时，在其前方据险堵击，重点歼灭其后勤运队，缴获其物资，达到积极防御的目的。魏军在此战中途退兵，蒙受重大损失。失败原因主要是：魏国两派政治势力在攻蜀问题上态度不一致，行动上掣肘，曹爽军事才能不足，准备不够，轻举妄动，进军路线单一，使得蜀军能够集中兵力据险阻击，魏军后勤不力，严重影响了作战。事实证明，魏国攻蜀时机尚不成熟。

二、姜维北伐

蜀国兴势防御战后 5 年，魏国出现辅政大臣司马懿发动政变夺权、国家内乱不断的局面。司马氏同拥曹派展开激烈政争，迭次使用其主力于淮南，镇压政敌的武装反抗，内乱双方动用兵力最多时达 50 万。同时在淮南，吴国诸葛恪大规模进攻合肥，吴军

① 胡三省注："自骆谷出扶风，隔以中南山，其间有三岭：一曰沈岭，近芒水；一曰衙岭；一曰分水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魏纪六》邵陵厉公正始五年五月）

出兵增援魏国的反对派、坚守寿春的诸葛诞。这些行动，进一步吸引魏军重兵于东线。魏国被迫在西线对蜀军暂取守势。但是从基本方面看，形势依然是魏强蜀弱，对蜀国并不有利。魏国经过三四十年恢复，经济、军事实力增强较快。蜀、吴的问题实质上比魏国更严重。蜀国费祎死后，失去柱石大臣，宦官黄皓开始弄权，国事日坏。姜维是外乡人托身蜀国，长期带兵在外，对朝政缺乏足够的影响能力，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动员蜀国全国上下的力量。吴国也处在孙权晚年、诸葛恪辅政及孙峻、孙綝专权的动荡期间。

在魏国多事之秋，姜维企图举行北伐。姜维字伯约，天水郡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在本郡参军事。28 岁时，遭太守怀疑，被迫投降北伐之诸葛亮，颇得诸葛亮欣赏。认为他在军事上机敏，深刻理解用兵意图，心存汉室，才兼于人，是凉州上等之士，着意进行培养。到正始八年（347 年）姜维 47 岁时，已迁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姜维一心效法诸葛亮，决心联合各羌、胡为羽翼，以运动战为主，辅以必要的阵地战，夺取陇山以西地区（陇右和凉州），达到歼灭魏军、掠夺人口、蚕食魏国边境、转化强弱的目的。

姜维北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三次，受主张持重的费祎节制，给其兵不过万：

1、援羌、胡之战

魏正始八年（347 年），陇右诸羌蜂起反魏，攻围城邑，南招蜀兵。姜维率兵万人增援，同魏国领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遭遇，众寡不敌，退兵。这时，凉州胡治无戴、白虎文在郭淮攻击下，失去根据地，要求归蜀。姜维西进至凉州金城①，迎接治无戴、白虎文部人口，把他们安排居住在蜀国。

2、麴山之战

嘉平元年（249 年）秋，姜维深入陇西（治襄武，今甘肃陇西

① 谢钟英说，在狄道之西，羌中西倾山之东。

南）要地麴山（今甘肃武山西南）构筑两城，派牙门将据城进逼陇右。魏国雍州刺史陈泰围城，断蜀守军运道和水源。城内分粮聚雪，拖延岁月。姜维来救，因都督雍、凉诸军事郭淮威胁其退路而退兵。麴城孤立无援，投降魏国。

3、复出西平

嘉平二年（250 年），出兵西平（治西都，今青海西宁），无功而还。

第二阶段为费祎死后，姜维有了更大自由，常率数万人行动。

4、南安之战

嘉平五年（253 年）四月，率领万人围南安狄道（今甘肃临洮），粮尽退兵。

5、陇西之战

正元二年（255 年）六月，魏陇西郡狄道县长李简归降。姜维东围陇西郡治襄武（今甘肃陇西南），斩魏将徐质，乘胜攻占许多地方。冬，率该郡狄道等 3 地人民回蜀定居。

6、狄道之战

正元二年（255 年）八月，姜维在洮水以西，大败不等援军来到即出动的雍州刺史王经，杀敌万余，再围狄道。魏都督雍、凉诸军事陈泰火速来救，其大军突然到达。蜀军震动，在城内粮食不足 10 天、即将陷落时被迫退出战斗。

7、段谷之战

魏军洮西之败后，粮仓空虚，百姓流离，陇右几乎危亡。甘露元年（256 年）八月，姜维已迁为大将军，在上述有利形势下，进攻天水郡，同都督陇右诸军事邓艾在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段溪水形成的山谷）发生战斗。蜀将胡济失期未至，姜维军将领 10 余名、士卒上千战死，其余星散流离。败后，国内怨言四起。姜维自求贬降为后将军，代行大将军职权。

8、出击骆谷

甘露二年（257 年），诸葛诞起兵淮南，关中部分兵力东下。姜维率数万出骆谷，攻击秦川，在长城（今陕西周至县西南 25 公

里）与司马望、邓艾对垒，相持到第二年。姜维获悉诸葛诞失败，退兵，战后重拜大将军。

9、侯和之战

景元三年（262年），姜维又率军攻击洮阳（今甘肃临潭西南），在其东侯和（今甘肃卓尼东北15公里）被邓艾击败。姜维撤退到蜀国西北边陲之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洛大镇附近一带）驻防。

姜维北伐，从正始八年（247年）开始，景元三年（262年）结束，前后九次，历时16年。第六次取得杀敌万人的大胜，第一、五次取得小胜，实战中锻炼了部队。上述战果的取得，是由于基本坚持运动战，取得羌、胡和归降魏官的支援。但总的看，姜维北伐是不成功的。历次战绩，大胜1，小胜2，大败1，小败2，无功3，同魏国扯平，又略占上风。作战地域距长安较远，不能引起诸葛亮北伐那样的震动；即使取胜，也由于兵力不足，无力守土，占领狄道等地以后，都主动放弃了。以蜀国有限的国力来衡量，这样的战绩，是不划算的，是弱国同强国拼消耗，造成"百姓凋瘁"① 的后果。所以有这一失误，是由于战略决策错误。姜维仅以魏国内争的困难为根据，就决策北伐；看不到魏国国力日益强盛的主要方面，也看不到蜀国日益衰弱、国政日坏的方面，而且就作战指导而言，姜维也并不比魏将高明；因此北伐决策是不妥的。

① 《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

第十二章　吴国战略和战争

第一节　政治经济概况

一、东南地区经济迅速繁荣

吴国所在的东南地区，秦汉时还处在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状态。东汉末年，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力涌入，东南地区经济迅速繁荣，出现了“野沃”、“民练”、“财丰”、“器利”① 的“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② 的景象。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增加开垦的田亩，推广先进技术，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提高亩产量，充分发挥土地广阔、自然条件好的优越潜力。位于钱塘江三角洲永兴县的自耕农，每亩新垦田产稻可舂得米三斛③，亩产量超过北方平均亩产量④。从黄初七年（226年）开始，按照为巩固江防服务、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原则，在寻阳、皖城、广陵等江北地带，溧阳、湖熟、江乘、毗陵、阳都、巴水流域等长江南岸有水利地带，以及丹阳、豫章、鄱阳郡等腹地山越集中地带，进行军屯和民屯。江边出现大批屯田兵，他们“春惟知农，秋惟收

---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下篇。

② 左思《吴都赋》，《文选》卷五上。

③ 《三国志》卷六十《钟离牧传》。

④ 建安年间北方平均亩产量，见仲长统《损益篇》：“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列传》）。仲长统（180～220），建安年间人，所提供数据为建安北方年均亩产量。

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①，担负着平时屯田、战时作战的双重任务，有力地提高了军粮的自给率，减轻了粮食运输的压力。

在手工业方面，“煮海为盐”②，设立司盐校尉、司盐都尉主持发展制盐业。冶铁业主要基地有梅根冶③、建业冶城④ 和武昌⑤。丝织业开始兴起，主要生产富人穿的丝绸、普通人穿的葛麻。诏书、表奏经常“农桑”并提，说明丝织业迅速占有重要地位。造船业由于水军建设和河海交通的需要，在三国中最为发达。商业有较大发展。长江上商船往来频繁。商业利润丰厚，后期连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⑥，在长江上贩运经商。沿岸出现武昌（今湖北鄂城）、建业等新兴都会，“交贸相竞”、“财丰巨万”⑦。为了加强商业秩序，设置司市中郎将进行管理。还利用海岸线长、多良港的有利条件，同海外高句丽发展贸易。这一贸易遭到魏国阻挠破坏后，吴国转向同东南亚的扶南（古国名，故地相当今柬埔寨）、林邑（古国名，故地相当今越南中南部）、堂明（古国名，故地在今泰国境内），进行贸易往来。

二、以江东大族为立国基础

孙氏鉴于自己是吴郡次等大族，宗族力量不强，因此采取争取豪强大族广泛支持的政策。在东吴的初期，孙策、孙权依靠张

---

① 《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 《太平御览》卷四一五《人事部·孝女》引《纪闻》。

④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安皇帝》注引《地志》：“其城本吴冶铸之地，因名焉。”

⑤ 《水经注校》卷三十五《江水》三：“大江右岸有厌里口安乐浦。从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诸屯相接”。尚方作部是主持冶铁和铸造的机构。

⑥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休传》。

⑦ 左思：《吴都赋》，《文选》卷五。

昭、周瑜、鲁肃等南渡淮泗大族人士，开创了江东基业。随着周瑜、鲁肃等人去世，及后嗣乏人，孙权又依靠本地的江东大族。孙氏政权同江东大族关系是曲折的。初期双方对立，后来关系虽有改善，并不融洽。夷陵战后，孙权决心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给予江东大族重大利益，与之结成联盟，共同建立和统治吴国。他放弃对他们既使用又控制的政策，改变为大胆使用，任命吴郡大族陆逊为上流主将；黄初六年（225 年），任命吴郡大族顾雍为丞相，把文武最高职位都交给江东大族，形成内靠宗室，外靠顾、陆、朱、张的体制，完成了江东政权本土化的进程。在江东大族支持下，孙权终于在太和三年（229 年）称帝，正式建立吴国，改元黄龙，迁都建业，史称吴大帝。

江东大族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全面扩张势力。他们大批进入政府，仅陆氏一族，前后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他们集地方军、政、经大权于一身。在地方，他们往往既是将领，又是守令、田官。加上孙权经常把屯田客和屯田赐给将领，复除被赐屯田客向国家缴纳租税和服徭役的义务，将领有的向世袭地主转化，有的扩张原有大族势力，迅速暴富。有些大族甚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①，其经济实力之强大，为魏、蜀大族望尘莫及。大族大都拥有部曲，享有世袭领兵权。如朱桓部曲万人，死后其子朱异领其兵；陆逊部曲 5000 人，死后其子陆抗领其兵。大族在国家战略问题上享有发言权。其私人兵力之强大，连魏国都不敢轻视。江东大族成为吴国立国的社会基础。

三、内部矛盾重重后期丧失人心

随着外敌威胁减轻，吴国统治集团逐渐滋长淫逸之气，内部

---

①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篇》。

矛盾突出，到孙权晚年趋向激化。由于江东大族势力的发展，孙权深感皇权受威胁，企图在江东大族同淮泗集团之间搞平衡，遏制江东大族膨胀。他设立校事，以位卑权重的吕壹等人充当监督和纠察臣民的耳目。吕壹迎合孙权心意，以江东大族为排挤、陷害的主要对象，遭到众大臣群起反对。景初二年（238 年），因吕壹纠举朱据贪污失实，孙权不得不杀他以谢众大臣。正始三年（242 年），孙权立子孙和为太子，又宠孙和弟孙霸，造成二子争位，大臣分派。孙权害怕身后大乱，废太子孙和，令孙霸自杀，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这时，陆逊维护太子孙和，功高震主，家族姻亲显赫，加上孙权亏待孙策子孙，而陆逊是孙策女婿，有可能在孙权身后不利于孙权。孙权畏惧他，更担心嗣主驾驭不了他，于是先除陆逊羽翼，接着一再派宫中使者责备陆逊。陆逊愤怒痛恨，任丞相不到两年，就在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的矛盾斗争中被逼死。孙权刚愎自用，多疑猜忌，杀起人来毫不迟疑，愈到晚年愈凶。嘉平四年（252 年），71 岁的孙权去世，临终指定南渡地主诸葛恪辅政。诸葛恪革除弊政，威望颇高；但对吴国内部复杂的矛盾估计不足，违背众意，匆忙北伐。侍中、宗室孙峻在诸葛恪作战惨败后诱杀了他，专制朝政，但三年后暴疾而死，临终把后事托付给堂弟孙綝。孙綝废 16 岁的吴主孙亮，迎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孙休不甘心受挟制，联络亲信，在朝会中杀孙綝。孙休在位 6 年，死前蜀国灭亡，开始魏、吴对峙的局面。众大臣本着国家危难、宜立长君的精神，迎立 24 岁的孙皓为帝。

孙皓在位 17 年，暴政横行。他滥施酷刑，稍不如意，剥面皮，凿眼睛，残暴杀人；穷奢极欲，后宫激增至万人；昵近奸人，大臣大将，无所亲信，群臣恐惧，各不自保；百姓处境，更加艰难，"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①，连孙皓也不得不承认，"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涂炭"②。江边的屯田兵也不能专

① 《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江表传》载皓将败与舅何植书。

心屯田、作战，承担过去从不承担的众役，缴纳的地租越来越重，衣不全粗衣，食不保朝夕，“父子相弃，叛者成行”①，大批地逃亡。又由于屯田和屯田兵民被一批批赐给功臣，转入私家手中，国家“农桑并废”②、“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③。百姓忍无可忍，不断起义。以人口计算，吴国农民起义，在三国中次数最多。在晋灭吴战争中，兵将消极不战，致使晋兵攻吴，有破竹之势。孙皓承认，吴军最后“不守者，非粮不济，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耶？孤之罪也。”“天匪亡吴，孤所招也。”④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吴亡于晋。

第二节　限江自保战略

一、限江自保战略的形成

鼎立期间，江东大族从发展地主经济出发，一般都渴望有安定的环境，减轻战争人力、物力负担。对他们来说，只要吴国保住江东，称雄东南，于愿足矣，不愿意同魏国争夺中国统治权。其代表人物陆逊，反对实行进攻战略，在魏文帝死后，建议宽赋息调，压缩军队规模。孙权不能不更多地听取这些主流派的意见；同时由于步骑兵建设落后，也无力对魏国展开战略进攻，因此，吴国逐渐形成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积极防御战略，即诸葛亮所谓的“限江自保”⑤。企图在新形势下继续采用孙策“保江东，观成败”遗言的方针。吴国在整个鼎立时期，都坚持了这一战略。

在采取何种战略问题上，吴国曾有过讨论和争论。主攻派在形势有利时，提出实行攻势战略。太和二年（228年）八月，奋武

---

①③《三国志》卷六十五《贺邵传》。

②《三国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江表传》载皓将败与舅何植书。

⑤《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将军朱桓提出，乘曹休战败之机，长驱深入魏境，进取寿春，割占淮南，以制约许昌、洛阳，说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不可错过。孙权问陆逊，陆逊以为不可，计不施行。太和六年（232 年），孙权企图渡海远征辽东，陆逊弟、选曹尚书陆瑁一再谏阻，认为在中原混乱、九州战事交错的时候，要巩固根本，爱惜兵力，珍惜费用，不应轻举妄动。正始二年（241 年）春，零陵太守殷礼鉴于魏明帝已死，认为虎争之际而魏国幼童在位，是天丧曹氏。主张吴、蜀并举，孙权亲征，倾国出兵，三道攻魏，以定华夏。认为如果不全军出动，像以前那样只使用部分兵力进攻魏国，则兵力不足，容易屡屡退兵，造成百姓疲劳、威信损失、力量枯竭的恶果。孙权由于陆逊反对，不能采用这一建议。后来，陆抗连小规模出击也不赞成，主张实行富国强兵，力农蓄谷，放弃穷兵黩武。他说，不能听任众将求名，一味邀利。否则敌人不会因此而削弱，而我已大病。从历史上看，即使胜了，也会亡国，何况今天出师所获，不补所失呢！在战略问题的讨论中，限江自保的主张一直占据着上风。直到孙权死后，淮泗集团的诸葛恪当政，才改变为战略进攻，众大臣对这一改变无力加以阻止。诸葛恪的战略进攻方针，只推行极短的时间，由于兵败被杀而结束。到了孙皓时候，华覈批判诸葛恪等，指责孙权死后，强臣专政，数兴军旅，造成了军资匮乏、仓廪不实、赏赐无着的严重后果。

二、对战争各阶段的战略指导

从黄初三年（222 年）鼎立开始，到蜀亡的 42 年间，吴国战争经历五个阶段。各阶段战略指导如下：

1、防御魏文帝三次进攻阶段。黄初三年到六年（225 年）的 4 年间，由于魏文帝三次亲自攻吴，孙权由对蜀防御向对魏防御转变。重点是依托长江天险，固守北岸坚城，以城战和水战结合进行防御，以打破魏国的进攻。

2、第一次攻势阶段。从黄初七年（226 年）魏文帝死后，到

青龙二年（234年），共9年。当诸葛亮五次北伐时，吴国也频年出兵，攻击魏国淮南边境。诸葛亮死后，吴国减弱了攻势，转向海外辽东、夷洲、亶洲等地求发展。在魏明帝去世后，于正始二年发起四道攻魏。在这个阶段，以诈降诱敌深入濒江北岸地带，然后在江北内线歼敌，或者依托水路，在外线短促出击，展开攻城作战；同时，遵守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原则，避免同魏军决战。

3、第二次守势阶段。从青龙三年（235年）到嘉平四年（252年），共18年。这个阶段，孙权二子争位，臣下分派，陆逊等旧将已死，新将威信尚未建立。其战略指导，是通过凿句容中道，作邸阁，作堂邑涂塘，加强国防工程的建设，一般不作主动出击，或者只是制造将要出兵的舆论，虚张声势而实际不出兵，或者出兵而不作交战。

4、第二次攻魏阶段。从嘉平五年（253年）到甘露三年（258年），共6年。前期，太傅诸葛恪当政，认为当时正值敌兵衰弱、吴国劲兵之地尚未空虚之时，以倾国10万主力围攻寿春，兵败回国被杀。甘露二年（257年），魏国发生司马氏与淮南守将诸葛诞之间的战争，吴国出动重兵支援诸葛诞，再次战败。其战略指导是，利用有利形势，先后出动10万和8万主力，进行大规模作战；作战目标不再是夺取合肥，而是直指淮南核心城市寿春；攻寿春时，以大部队围攻，守寿春时以一部入城加强守军兵力，以一部在城外机动作战。

5、第三次守势阶段。从甘露四年（259年）到景元四年（263年），共5年。这时，魏国忙于准备灭蜀，没有攻吴。吴国权臣孙綝废吴主孙亮，立孙休，孙休又杀孙綝，进入政治上不安定时期，其战略指导，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曾经以诈降诱敌深入，但未成功。

在以上5个阶段内，吴国轮番采取守势和攻势。3次守势历时27年，体现了战略的防御性；2次攻势历时15年，一度为战略进攻，主要还是属于战略守势基础上的战役攻势，体现其限江自保的积极性。

三、限江自保战略的基本内容

限江自保战略的基本内容，是发挥吴国独有的江防和水军优势，并依靠同蜀国的联盟，将魏军阻止于长江之外。具体说来是：

1、依托长江，实行重点守备。根据在鼎立阶段魏国是其主要敌人这一情况，吴国主要防线设在长江。认为长江是天险，是其拥有的优势，但是不能单纯依赖它，如果不认真组织长江防御，魏军只要一叶小舟就可以航行过来了。吴国积极在长江设防，把长江建设成防御擅长骑战不习水战的魏军的一道天然屏障。在设防时，由于其控制的从西陵到江都的长江水道长达5700里，对敌正面极为宽广，而兵力有限，因此采取重点防御。认为长江疆界虽远，险要必争之地，不过几处，就像人有8尺身躯，处处受患，防护风寒侵袭，也不过几处。它的江防，是在沿江这几处“防护风寒侵袭”的要点上，实行重点防御。在要中之要的西陵、江陵、武昌、濡须、石头等处，则修筑永备筑城工事，增强防御的稳定。

2、以西陵（吴改夷陵为西陵）为藩篱，防御国土锁钥。吴国认为，守江东应当首先守中游荆州；守荆州应当首先守上流之西陵、建平（吴置郡，辖今川鄂交界处一带）。晋泰始十年（274年），大司马陆抗临终上表说，这两处是国家的藩篱，既处在益州下流，又在两个边境方向受敌。如果晋国船队顺流而下，星奔电闪般突然到达，它们无法依靠别处部队解救。它们是社稷安危的关键，倘若有难，应当倾国力争。吴将吾彦也主张增加建平守兵，认为建平不被攻下，魏军终究不敢渡江。为此，吴国在西陵一带，驻守重兵。

3、开门延敌，守在江北。吴国认为，守卫长江防线，先要守好江北，以江北百里内的地带为其防御第一线，以造成江防的有利态势。孙权在一次武昌江防会议上，主持讨论了下述问题：他建都建业、离开武昌以后，长江水道溯流2000里，如果武昌等地一旦有警，来不及增援怎么办？他不同意仅仅在夏口沔水上建立

栅栏，或者设立多道拦江的铁锁，认为那都是消极的。他赞同张梁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认为如果派将领沿江进入沔水，同魏军争利，可以造成有利态势，魏军就不敢前来侵犯。同时可在武昌驻守精兵万人，以有智谋的人作主将，使部队常备不懈，一旦有情况，马上驰援战场。说像这样打开门来延请敌人，敌人反而不敢侵犯。

4、以攻势作战，达到自保。孙权反对徒守江东，说现有的兵是够用了，但是还要扩军，因为自守可陋。在战略防御时，经常利用魏国皇帝去世、兵员减少，或者蜀国发起攻势等有利时机，在战役战斗上发起攻势。或者以诈降诱敌深入，在内线歼敌；或者依托水路进兵，向魏国边境地区实行短促的外线出击，争取局部主动。

5、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中的薄弱环节。针对兵员不足并缺乏战马这两大薄弱环节，在建军中重点增兵增马。孙权坚持平时多征调兵员，以保证临时使用，并为此广辟兵源：一是积极掠夺山越人民当兵；二是派甲士到海外寻找夷洲、亶洲，掠夺人口，补充兵员，并通过多渠道，包括团结辽东公孙渊，广开马源，增加战马。

第三节　争夺淮南之战

一、孙权对淮南的新攻势

在三国鼎立阶段，吴国同魏国争战的主要方向同三国形成阶段一样，仍然在淮南。孙权一度曾经企图转移到荆州方向。黄初七年（226 年）八月，他乘魏文帝去世，发起掩其不备的三道攻魏，亲率主力 5 万，以诸葛瑾进攻襄阳，以别将进攻寻阳，自己围攻江汉重镇石阳（今湖北应城东南 40 公里）。但石阳 20 多天不能攻下，司马懿、曹真分别击退其他两路吴军，荆州方向作战以失利

告终。两年后，在蜀国诸葛亮开始北伐魏国的有利形势下，孙权鉴于荆州方向首攻不利，从太和二年（228年）五月开始，其频频发起的攻势便转移到淮南。

（一）石亭之战

太和二年五月，孙权令吴鄱阳（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太守周鲂向魏扬州牧曹休诈降，请求曹真接应，企图诱其深入而歼之。曹休信以为真，率10万步骑兵直指淮南吴境皖城（今安徽潜山）；魏明帝又令司马懿向江陵，贾逵向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30公里处的濡须山上），与曹休三道并进。八月，孙权坐镇皖城，令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3万人迎战曹休。

曹休察觉到受周鲂欺骗后，依仗人多，企图同吴军交战。陆逊以一部兵力迂回无强口（今安徽庐江西南），切断夹石（今安徽桐城北），断曹休军归路，自己指挥中部，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并进，冲击曹休伏兵。曹休退至石亭（今安徽桐城西南40公里）宿营。军中夜惊，士卒混乱，被吴军包围，曹休力战突围。吴军追击至夹石，斩杀和俘虏万余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万辆和几乎全部军资器械。魏东路贾逵进军中获悉曹休已败，在进不能战、退不能回的危境中，命令不等后续部队，急行军抢在吴军之前，出其不意赶到夹石，多设旗鼓，惊走断险的吴军，以兵员、军粮补充曹休军，曹休军再次振作。当曹休进兵皖城时，魏尚书蒋济、豫州刺史满宠上疏魏明帝说，曹休军背巢湖，傍长江，后路在吴军威胁之下，易进难退。明帝还未答复，曹休已败。如果不是贾逵轻军兼道及时增援，曹休军可能全部被歼。吴军以诈降诱魏军深入吴境，争取到内线作战，断其退路，前后夹攻，取得大胜。

（二）吴攻合肥之战

合肥位于自淮入江的水道上，上下系带芍陂和巢湖，是吴魏争夺淮南的重要焦点。太和四年（230年）十二月，孙权扬言进攻合肥，魏征东将军满宠上表召集兖、豫诸军准备应战，众军都已集结，孙权随即退兵。诏书命兖、豫诸军罢兵。满宠认为现今吴国大举撤军，不是本意。这一定是企图伪退以罢我兵，而回军乘

虚，掩我不备，上表不罢兵。10多天后，孙权果然又来，到合肥城，不克而退兵。

（三）吴军诱王凌之战

太和五年（231年）十月，孙权令中郎将孙布诈降，引诱魏扬州刺史王凌深入接应，并伏兵于吴境阜陵（今安徽全椒东南）待机。征东将军满宠判断孙布必诈，不给王凌增援兵马，王凌只好派督将率步骑700名前往接应。在夜暗中，果然遭到孙布袭击，死伤过半退走。此战，吴军再次使用诈降诱敌的战法，引起曹方严重怀疑，仅获小胜，未取得预期战绩。

（四）吴攻合肥新城之战

鉴于吴军年年有攻合肥的企图，青龙元年（233年），满宠上疏认为，合肥城南临巢湖、长江，北距寿春较远（200余里），吴军围攻合肥，能够依托水路形成有利态势，官兵增援时，必须击破吴国大军，然后才能解围。吴军前往较容易，而官兵前往解围很难。建议转移城内之兵，在城西30里，有奇险之处可以依托，重建新城以固守，这是把吴军诱至平地而断其归路，有利于我用计。护军蒋济审议时，认为这既向天下示弱，而且望见吴军烟火而毁城，是敌未进攻先被攻陷。一到这个地步，吴军的进攻就没有界限，我一定会退到淮北防守。因此魏明帝不批准。满宠再次上表指出，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这是形和实不一定相符合。孙子又说，善动敌者形之。现今吴军未到就移城向内地退却，是所谓形而诱之，引诱吴军远离水路，我视情况有利而行动。尚书赵咨以为满宠计策善长，诏命便给予批准。这年，孙权亲自出兵，企图围攻新城，以新城距水路较远，等待20多天不敢下船。满宠向众将指出，孙权占领我所弃旧城，一定在他部队中说自大的话，现今大举前来，希冀捞取权宜性的战功，虽然不敢攻新城，一定会上岸耀兵，以显示有余力。于是秘密令步骑兵6000，潜伏在隐蔽处待机。孙权果然上岸耀兵，满宠伏兵突然发起袭击，杀死吴军数百，有的赴水溺死。

（五）孙权三道攻魏之战

青龙二年（234年）五月，孙权为配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大举攻魏，其部署是：以陆逊、诸葛瑾率万余人为西路，由江夏、沔口（即夏口）攻襄阳；以将军孙韶、张承率万余人为东路，攻广陵之淮阴（今江苏淮阴东南）①；亲率号称10万的主力为中路，进围合肥新城，以便吸引魏国援军，围点打援。六月，豫州刺史满宠企图率众军增援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识破孙权企图说，吴军全军大举，不是图小利，是企图以新城为质，调动我大军前往增援罢了。可听任攻城，挫其锐气，不应同其争锋。城不可拔，吴军必然疲劳懈怠；然后击之，可以大克。这时，东方吏士都在轮流休假，满宠要求得到中军增援，召回休假将士，等待兵力集结后出击。又提议让出合肥，将吴军继续诱至寿春而歼之。魏明帝不同意让出新城，命城中坚守待援，并令先头增援部队到达后，疏散队形，增设旗鼓，佯示断吴军归路，以震慑吴军。七月，明帝亲率水军乘船东征，孙权不愿决战，与右路军孙韶退兵。

这时吴左路军孤立突出，主将陆逊亲信带表文呈送孙权，返回途中被魏侦察兵截获，军情暴露。诸葛瑾很恐慌，写信给陆逊建议迅速退兵。陆逊未答复，同平常一样，催人种豆，同众将下棋、游戏。对来见他的诸葛瑾说，魏军知道主上已退，得以集中兵力对我，已守各处要害。兵将思想恐慌动摇，应当镇定自己以安定部队，施展所设计的多变战术，然后出兵撤退。于是秘密同诸葛瑾商定计谋，令诸葛瑾指挥战船待机，自己率兵马全付武装佯向襄阳进攻。魏军一向畏惧陆逊名望，立即收兵进城。诸葛瑾便引船出，陆逊从容整军，张扬声势，步行上船，当着魏军的面，安然撤退，魏军不敢进逼。

（六）孙权晚年几次攻魏之战

魏正始二年（241年）四月，吴军利用魏国幼主曹芳继位的有

① 按，《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记为淮阳。淮阳今属河南，距广陵甚远，当是淮阴之误。《资治通鉴》记作淮阴，从《资治通鉴》。

利时机，向淮南芍陂、六安（今安徽六安北10公里）和荆州樊城、柤中（今湖北宜城西）方向发起四路攻击。吴军在淮南战败，在荆州围困樊城一个多月，听说司马懿率兵来救，六月，连夜退兵。

正始四年（243年）正月，吴诸葛恪袭击六安，掠夺人民后退兵。正始八年（247年）十二月，孙权大规模征兵，集中于建业（今南京），扬言将进攻淮南。魏将王基判断说，陆逊等已死，孙权年老，朝中缺乏谋主。孙权亲自出征，担心国内斗争突然爆发，命将出征则旧将已死，新将威信尚未建立。这次不过是想修补旁支党羽，回去保护自己。后来孙权终于没有出兵。

吴国对淮南的新攻势，从太和二年五月开始，正始四年正月结束，历时14年半。其中前六年间，几乎每年出击。在争夺中，双方互有胜负。吴国未能争到淮南，但是向魏国表示了小国自强自立的决心，有利于达到以攻为守、限江自保的目的。在争夺中，吴军作战指导具有如下特点：避免主力决战，一旦魏国中军前来增援，就撤退。扬己水战之长，避己陆战之短。争取将魏军诱至吴境有利地形，断其后路，在内线作战中予以歼灭；到外线作战时，则利用水道进兵和退兵，上岸陆战时一般谋求突然袭击之利。几次攻合肥，是近水要地攻坚。自从新城建成以后，失去近水进攻优势，虽用大军，不能得志。

二、诸葛恪进攻淮南之战

嘉平四年（252年）四月，孙权去世。身后宗室、强族山头林立，矛盾重重。淮泗集团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受孙权指定，以太傅辅政。他就任之初，废除弊政，使大族和人民都获得利益，威望很高；但注意力很快转向对外战争。他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当时世兵数量魏衰吴盛的有利时机，谋取大利。十月，他到东兴，征集人力，进入魏境，重修孙权时修筑后来废弃的东兴堤（今安徽含山西南30公里，与巢湖相接），左右依山势，各筑一城，每城留千人，令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

魏国深以吴军进入境内为耻辱，十一月，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兵7万攻东兴堤。在魏军三路进攻面前，诸葛恪决心集中兵力击破其东兴一路，亲自率兵4万，早晚兼行，救东兴，令丁奉、吕据等为前部，从西山上。丁奉为了争抢有利地势，率麾下3000人急进，张帆2天即到东关（在东兴堤所在的濡须山上），见魏军前部兵少，令兵士轻装爬堤，攀援而上。魏军大笑，不严加防备。吴兵上堤，呐喊砍杀，攻破魏军前屯，吕据等军随后来到，魏军惊散，争渡浮桥，桥坏，落水死者数万。吴军缴获牛、马、骡、驴各上千，资粮器械堆积如山。

诸葛恪便有轻敌情绪，认为曹操时候的兵员，由于年老等原因损耗完了，后生兵家子弟没有长大，正是敌兵衰弱不强的时候；司马懿之子初掌大权，来不及发挥智谋人士作用。当今伐魏，正是魏国倒霉的日子。如果丧失今日良机，十几年以后，魏国军队增多一倍，我国劲兵之地，都已空虚。如果不早用现有部队就老了，再过十几年，我现役兵员将减少一半。现在以让百姓得到休息为由，反对进攻魏国，是不考虑大危险。诸葛恪根据上述判断，企图大举攻魏。各大臣认为屡出疲劳，一致谏阻，说如果攻不下城，野掠无获，必将被动，建议“按兵养锐，观衅而动”①。诸葛恪急于效法其叔诸葛亮北伐，刚愎自用，一概不听。嘉平五年（253年）三月，他大规模征发州郡20万军队，百姓骚动，开始失去人心。四月，诸葛恪在淮南显示军威。五月，围新城，企图打援。魏国诏命司马孚督众军20万迎战。当时姜维响应诸葛恪，出兵攻魏。魏国东西有事，二方都急，众将沮丧，司马昭深以为忧。中书令虞松说，诸葛恪投入其全部精锐，本来足以逞暴，而坐守新城，不过企图同我一战。如果攻城不下，求战不得，师老兵疲，势必退兵，众将迟疑不进，对你是有利的。司马昭采纳他的方针，令毌丘俭等援军暂且按兵不动，等待吴军疲劳。

新城连月不下，诸葛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落。扬州牙门将

---

①《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张特守城，兵才 3000，生病和战死的一半。张特一面对吴军佯称为了使家中不连坐，愿缓几天再投降，一面连夜毁屋取材，补城缺口，筑成两重。吴军上当，大怒，城仍然攻不下。天气暑热难耐，士兵疲劳，饮水不洁，腹泄，脚肿，病的占多半，死伤涂地。各营报告生病的与日增多，诸葛恪以为是说假话，报告人几乎被杀，从此没有人敢说真话。诸葛恪内心认识到失策，愤怒形于色。将军朱异意见同他抵触，立即被剥夺兵权，赶回建业。都尉蔡林屡次献用兵之计，不被采用，策马投奔魏国。魏国众将侦察到吴军疲劳，令援兵前进。七月，诸葛恪退兵回吴。此次败后，众庶失望，怨声载道，诸葛恪竟无察觉。侍中孙峻把他诱入宫中杀了，吴国才停止对淮南的攻势。

此战，从嘉平五年四月开始，七月结束，历时 4 个月。吴军损伤严重，退兵时士兵伤的病的，一路都是，有的倒毙在坑沟里，有的被俘虏，活的哀，死的痛，大大小小呼天号地。吴国遭到重大损失。此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诸葛恪过高估计魏国不利的一面，过低估计自己方面人民的疲劳，在内政未安、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违背众意，强辞夺理，作出错误的决策。吴军攻合肥，多次都攻不下，此次又攻合肥，企图打援。当援军拥兵不来时，未能知难而退，结果陷入被动。暑天作战，部队患流行病，是失败的直接原因。诸葛恪作风蛮横，不了解真情，更加速了失败。

第十三章　魏国战略和战争

第一节　政治经济概况

一、从政治经济上优待大族

黄初元年（220 年）魏国建立后，历文帝曹丕、明帝曹睿、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 5 帝，享国 45 年。

曹操在世时，其集团内很多世家大族官僚对其抑制豪强政策不满，看不起曹操的宦官家庭出身，宁愿留在汉王朝内，不愿支持这位“赘阉遗丑”① 作皇帝。这种拥汉倾向，在挟天子策略的环境下更容易滋长，严重阻碍曹操代汉的企图，客观上还成了诸葛亮等敌方势力的借助力量。曹操死后，从曹丕开始，各魏帝改善同豪强大族的关系，推行优待大族的方针。政治上，曹丕批准九品官人法，规定在各州郡设置中正，评论本地人物的品次，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在评议人物品次时，本应以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是中正几乎被世家大族把持，实际评论时家世无形中成了唯一标准，因此这个法实际上帮助魏国统治集团重要成员取得了世代作官的合法特权。魏文帝还颁令禁止后妃、宦官、外戚干预政事，并把该令藏之石室，传之后世。这是政治上又一项有利于世家大族的政策，标志着东汉以来官僚及所代表的世家大族对于宦官、外戚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由于推行该令，终魏之世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经济上，大约在魏国后期，给予公卿以下以经济特权：“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

---

①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所载绍檄州郡文。

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① 贵势之门从此获得数目不一的给客，也就是把国家的编户民合法地收入私门，使他们不再向国家服役纳税，变为受自己支配的田客。

曹魏统治者通过优待大族，完成代汉并巩固了政权。大族陆续获得政治、经济特权后，原来对代汉持犹豫、观望甚至反对态度的，都拥戴曹丕登上皇帝宝座，支持魏廷，拥汉派也就消失了。魏国在同吴、蜀斗争中，特别是在同打着拥汉旗号的蜀国的斗争中，逐渐摆脱政治被动地位。优待大族的措施，还逐步改变了大族的性质。大族由于享有政治特权，为家族谋取到即使在东汉也不曾谋取到的政治、经济利益，实力迅速膨胀，在魏晋之际终于发展成一个新的特殊阶层——士族。

二、士族崛起司马氏赢得政权

士族的特点，是享有政治特权。它的成员，既有来自老的两汉以来世家大族，又有来自在魏国生长起来的新贵，而以新贵数量最多，构成士族的主体。士族既支持魏国政权，又扩张自己的利益。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临终时立8岁幼子曹芳，令宗室曹爽和大臣司马懿辅政。曹爽专权，排挤司马懿。于是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士族势力，围绕对政权的控制，同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司马懿诈称有疾，不问政事，却在暗中策划，于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发动政变，除掉曹爽集团，控制朝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立曹髦为帝。景元元年（260年），司马昭又杀曹髦，立曹奂为帝。在司马氏攫取朝廷大权时，淮南拥曹的反对派将领不断以其边防大军起兵抵制。司马氏与政敌展开殊死的军事斗争，历时十余年，才最后战胜曹氏集团。泰始元年（265年），司马昭子

① 《晋书》卷九十三《外戚·王恂传》。

司马炎强迫魏帝曹奂禅让，建立晋朝。

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的斗争，是士族扩张政治权力的斗争，是统治集团内部派别之争。司马懿家世二千石，是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世家大族。而曹操出自"赘阉遗丑"，曹操妻卞氏出自以歌舞为业的低贱的倡家，曹丕妻郭后出自家奴，曹睿妻毛后出自车工。两者相比，门第贵贱，相去甚远。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富有从政经验，老谋深算，在屈诸葛亮之兵和统一辽东斗争中，建立起威信，成为三国后期的佼佼者，所亲信的高柔、刘放、孙资、傅嘏等人，是曹魏元老，富有军政斗争经验，代表士族事功派。曹爽是曹真之子，没有建立大功，仅凭宗室及与明帝关系亲密，骤得大位，代表士族中失去民心的腐朽浮华派。

两派斗争延缓了魏廷的腐朽。魏廷在明帝后期开始奢侈腐化。首先是明帝役使百姓，大兴宫室，夺取民间美色，造成农时延误、国库空虚。此后掌权者曹爽也追求享乐，饮食、车马、服饰拟于天子，皇家的珍玩充斥其家。曹爽"以骄奢失民"，其亲信何晏等是浮华少年之徒，所以曹爽派虽然势倾四海，声震天下，一朝被杀，百姓安堵，不以为哀。而其对手司马氏集团为了争取民心，则废除明帝以来役使人民大修宫室等弊政，同贿赂求官等腐朽现象进行一定的斗争，注意提拔邓艾、石苞等低贱而有能力的人才。"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①。因此吴国屯骑校尉张悌说，"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②魏国后期也才没有像蜀、吴那样迅速走上腐败道路。同时，在两派斗争中，魏国内乱迭兴，司马氏忙于"营立家门"③，树立势力，在

① 《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③ 《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

相当长时间内也无暇同吴、蜀进行军事较量。

三、经济复苏郡县不再残破

大约赤壁之战后，虽然屯田使北方经济避免了崩溃，但由于自耕农经济没有大的起色，情况仍然是“天下郡县皆残破”①。魏国承丧乱之后，积极扶持自耕农，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并继续屯田，使情况得到好转。魏文帝时，更多的自耕农回到土地上，战乱中失去土地的地主，也加入自耕农队伍，自耕农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因此“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②。当时一些郡守为了丰财、安民，从当地情况出发，帮助自耕农解决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为民众兴利。在地势低下的沛郡，太守郑浑带头排除水涝，开辟稻田，使百姓仰赖其利；在缺少木材的魏郡，他又部署民众栽植榆树为篱笆，在篱笆内种植果树，若干年后榆树长成藩篱，藩篱内果实累累，进入郡界，村落整齐划一，民众财用宽裕；在百姓没有车牛的京兆，太守颜斐令民“以闲月取车材”，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京兆从此丰沃，又减轻为地方官吏服务的徭役，做到“吏不烦民，民不求吏”③；在不懂耕种技术的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耧犁、灌溉和下种技术，耕种省力过半，增收谷物五成，西方开始丰裕。一些地区的郡守鉴于灌溉“有鱼稻经久之利”，是“丰民之本”④，主持兴修水利灌溉工程。豫州刺史贾逵造新陂、小弋阳陂，通运渠 200 余里，号称“贾侯渠”⑤。沛郡太守郑浑开郑陂，“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⑥。河北也造戾陵遏，开车箱渠，灌溉农田。这些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产量。此外，由于

---

① 《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 年版。

③ 《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注引《魏略》。

④⑥ 《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

⑤ 《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

建安以来的屯田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开辟新的屯田区，屯田已经遍及司、豫、冀、并、荆等地，其规模不仅超过了吴、蜀，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魏明帝时，经济继续复苏。在西方，凉州刺史徐邈为了解决雨水少、缺谷物，在武威、酒泉一带修建盐池，用盐交换胡人谷物，又广开水田，招募贫民租种，作到家家丰收富足，国家粮库盈满，支出本州军费之外还有节余。在关西，太和四年发生饥荒后，司马懿从冀州迁移农夫5000人，到上邽屯田，青龙元年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0.3万余顷①。但是上述成就，仍然不能使“海内虚耗，事役众多”②、“百姓积弊”③的状况有根本的改观。明帝以后，正始四年（243年），邓艾建议在两淮大规模军屯，认为现在三方边境已经安定，战事出在淮南。每次大军出征，运输兵过半，消耗巨亿。可裁撤许昌左右诸屯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2万人，淮南屯3万人，以十分之二轮休，常有4万人，边屯田边守卫。雨水充沛时收获3倍于许下。计除去众多费用，每年交纳500万斛作为军资。六七年间，可以在淮水一带积蓄3000万斛，这是10万军队5年的食用。用这个实力去攻吴国，无往不克。这一建议得到当政的司马懿的支持。从这年开始，魏国在两淮展开屯田。“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④。

手工业和商业也有相当的恢复。冶铁业由于生产农具和兵器等战略物资，颇受重视，并进行了技术革新。过去用马排作冶铁动力，冶炼一炉铁需百匹马力。韩暨任监冶谒者后，改用水排，获利是以前的3倍。据《水经注》，白超垒侧，有冶官所在的坞，

①④《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

③《晋书》卷一《宣帝纪》。

“魏晋之日，引谷水为水冶以经国用”①。司马懿抵御诸葛亮期间，在秦川就地“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②。盐业则实行官卖政策。家庭纺织业以生产麻葛织物为主，比较普及，连一些官吏妻子都勤于纺织。原织绫机费时费力，马钧把机上60根经线和60个踏板，一律简化为12个，减轻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率。商业较前活跃。曹丕继位为魏王后，把关隘津渡税率降为十分之一。同周边涉貊、焉耆、西域加强了贸易往来，三国间的贸易，也没有间断。驻军还开办军市，为军人和县民提供交易场所。为了方便交换，黄初二年恢复五铢钱，引起粮价大涨。半年后废钱，以谷帛易物，到明帝时重新使用钱币，实际上是钱物并行。这说明，文、明二帝时，经济还处在恢复期，商业不如吴国繁荣。

第二节　先文后武守势战略

一、魏文帝攻势战略的失败

曹丕称帝后，急于完成未了的统一大业，而不愿把它遗留给子孙。他对南方采取攻势战略，企图消灭蜀国，由于刘晔等大臣不支持而作罢；在孙权拒绝任子后，他又企图征服东吴，有识大臣都劝他休养生息。太尉贾诩深知三分形势已成，魏文帝才干非其父可比，主张“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指出：“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

① 《水经注校》卷十六《谷水》。

② 《晋书》卷一《宣帝纪》。按，《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说，司马懿在此期间“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两处显然指一事，而互相矛盾。查除了《晋书·食货志》，不见京兆、天水、南安三郡有盐池。从《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张既令陇西、天水、南安人中任将吏者休假回家，“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的记载看，天水、南安等郡水利资源丰富，有利于作水排，因此《宣帝纪》作监冶说法，比较可信。

议（陆逊本名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当今宜先文后武”①。司空王朗主张敕令征吴众将慎守所在地区，对外耀威，内则扩大屯田，形成“势不可动，计不可测”② 的态势。行军师辛毗认为，时间有利于魏国，不必急在一时。“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③，不如效法范蠡休养人民，管仲寄军于政，赵充国屯田，孔子招怀远方；等到十年以后再战。即使不能及身除敌，也可以像周文王那样，把纣留给武王去解决。

魏文帝不顾三公反对，从黄初三年（222 年）九月到六年（225 年），三次大规模进攻吴国，历时 3 年半，都无功而返，攻吴战略随着魏文帝去世而结束。进攻战略未能征服东吴，相反的，把东吴逼到蜀国一边。它所以失败，主要是：1、错过了时机。如果行之夷陵之战中，与刘备同时进攻吴国，是有望成功的；但是放过了这一良机。2、过此只能单独行动，难以征服东吴。魏文帝承认经济尚未恢复。在黄初四年三月三道伐吴还军途中，诏告三公④，表示要休养国力。说穷兵黩武，古人早有训戒。何况连年水旱，战士人民人数损耗，而兴师动众和劳役比从前倍增。屋漏在上面，知漏在下层。迷途知返，离正道就不远；有过能改，可称为无过。目前应当休息，置刘备、孙权于不顾。3、魏军数量较前没有增加。过去曹操“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⑤同时，缺乏水军，进入不了长江，打不破东吴江防。4、作战指导能力相对较差。群臣中没有孙权、刘备对手。

---

① 《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② 《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

③⑤ 《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

④ 《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注引《魏书》，此注附在黄初四年三月魏文帝还军之后。卢弼认为此诏颁发在黄初三年十一月、即三道伐吴出师时，是不对的。

二、先文后武守势战略的形成

从黄初七年（226年）到景元元年（261年）策划灭蜀以前，群臣探讨增强国力与消灭吴、蜀的关系，认为增强国力是基础。从历史上看，“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故能遂成大功。”① 三国竞争，最根本的是增强国力竞争，发展农业生产是消灭吴、蜀的最基本准备。华歆指出，“使中国（北方）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吴、蜀灭亡，“可坐而待也”②。明帝时，大司农司马芝认为，“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③ 明帝末年，蒋济认为农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甚弊”④。王朗也要求除去妨农的弊政，像文景之治时那样“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专心致志，“一以勤耕农为务”⑤。

在提倡增强国力的同时，他们主张节约支出，反对魏明帝奢侈之风。青龙三年，陈群、蒋济、王基、卫臻、高堂隆、卫觊众大臣和张茂等轮番上疏，强烈劝谏，指出经济困难，财政支拙，军费过低，要求魏明帝务必节约，放弃兴建宫室等不急之务，把财物用于军队建设和战争需要。否则，魏国劳力，是吴、蜀求之不得的，这是安危的关键。

在复苏经济思想指导下，形成先文后武的守势战略。“先文后武”是贾诩劝谏魏文帝时提出的，其内容是先求文治，后求武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偃武修文，休养人民，恢复生产，增长国力，招怀远方，对吴、蜀予以忍耐，仅采取守势战略；等到国力增强，具备了条件时，再议统一。

---

①⑤《三国志》卷十三《王朗传》。

②《三国志》卷十三《华歆传》。

③《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④《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

群臣根据这一共识，阻止大规模进攻吴、蜀。太和元年（227年）三月，明帝得知诸葛亮进驻汉中，企图先发制人，乘机兴军征讨蜀国。孙资反对，认为曹操对吴、蜀“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胜而战，知难而退。”① 目前同样应该采取这一防御方针。如果进军汉中，道路险峻，计算所需要的精兵以及运输和镇守南方荆、徐、扬、豫四州防御“水贼”（东吴），共用十五六万兵，必须再次有所征兵。这样，天下骚动，费力太大，是应当深加忧虑的。进攻和防御所需兵力为3∶1。只以现有兵力，分别令大将据守各险要，其威力足以震慑强敌，镇静边境，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魏国一天天强盛，吴、蜀必定自行疲敝。显然，孙资力主目前采取防御方针的理由是：吴、蜀一时难以消灭，目前经济尚未很好复苏，时间有利于魏国一方。明帝基本接受了孙资的意见。此后曹真、曹爽伐蜀，都受到王肃等朝臣阻挠。王肃回顾曹操父子出征孙权、到了江边不渡江的历史经验，要求明帝顺天知时，通于权变，令已出兵的曹真中途退兵。华歆要求明帝以征伐为次要事情。明帝在曹真伐蜀遇到极大困难的形势下，不得不接受这些意见，辩称原来同意伐蜀，不过是试探蜀国虚实，岂敢自夸，说一定能够灭蜀。当吴国出现嫡庶之争和孙权去世时，司马师和三征企图攻吴，尚书傅嘏认为不能保证全胜。吴国建立政权将近60年，君臣共患难，如果他们坚守水、陆要点，那么魏国的攻势，是难以告捷的。魏军的当务之急，唯有进军边境屯田，比较最为妥善可靠。

嘉平以来，经济逐渐复苏，但司马氏忙于丰满羽翼，打赢同政敌的内战，对外更需采取守势。姜维问降蜀魏官夏侯霸：“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② 魏国内战结束以后，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王基认为，国内需要继续休养生息。景元二年（261年）三月，反对在吴将邓由等愿意

① 《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注引《资别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

归降时，举行动摇江东的作战，认为当务之急“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司马昭回信表示“敬依来指”①。总的来看，在魏文帝死后恢复对南防御的方针，经历各种考验，没有发生大的动摇。

三、对战争各阶段的战略指导

魏国与吴、蜀的战争经历三个阶段。当吴、蜀采取攻势时，战略指导的主要问题是在两线作战中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当吴、蜀停止攻势时，主要问题是加强军队自给能力。各阶段战略指导如下：

1、防御吴、蜀第一波次攻势阶段。鉴于西线诸葛亮进攻的规模、企图和威胁超过东线吴军，确定以西线为主要方向。起初，企图待蜀军深入魏境后消灭之，或以汉中为目标举行反攻。未成功后，针对蜀军运输线长、粮食困难、利在速战、指挥比较高明的特点，采取西守方针。先后从南线抽调张郃、司马懿加强西线，加固蜀军必攻之地陈仓城防，加强关中和陇右粮食生产和储备，并实行以下的作战原则：坚壁不战以挫其锋，以持久战消耗蜀军，迫其粮尽退兵，在退兵时进行追击，终于挫败蜀军北伐。为保障西线顺利防御，东线以攻势挫败吴军对诸葛亮的配合。对于其较大规模的进攻，固守要点疲敌，然后出动大军反击，迫其知难而退。

2、吴、蜀攻势停顿阶段，共18年。这时经济仍然困难，千里无烟，遗民困苦，军师在外数十万，其战略指导是增强军队自给能力：一是增强前线就地保障能力。屯田重心从许下向两淮地区转移，屯田人数增加到10万，在关中兴修水利，陇右建立军屯。二是降低军费。明帝时压缩军费，“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将吏俸禄，“方之于昔，五分居一”②。三是鉴于孙权染指，加快步伐，发兵统一辽东。四是曹爽为了建立威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基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五《高堂隆传》。

望发动攻蜀，被蜀御于兴势，战败退兵。

3、淮南内战与防御吴、蜀第二波次攻势阶段。由于淮南内战和吴国进攻发生在东线，确定以东线为主要方向，出动重兵，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守城、攻城、打援作战。出动兵力规模之大，在三国是空前的。在守城时，固守城池，令援兵缓进，造成吴军攻城、打援两头落空、师老兵疲的被动局面，尔后举行反击。当吴、蜀并举、两线皆急时，集中西线兵力，击退较弱的姜维一线，以保障集中精力于东线。在内战和对外战争交织的攻城中，以军事打击和争取人心并举。利用对方将士父母妻子大都在内州的有利条件，促其出现关羽那样的土崩之势。以欺骗行动分化守城将领，以优待降兵降将，动摇敌方军心。

四、守势战略的基本内容

1、有重点地进行两线作战。针对吴、蜀东西并举、魏军两线皆急的态势，下决心在两线作战，同时区分两线的主次以确定攻守方针。在吴、蜀攻势的第一波次时，以西线为主要战线，东线为次要战线，实行东攻西守；在吴、蜀攻势的第二波次时，以东线为主要战线，西线为次要战线，仍然实行东攻西守。2、兵力三线配置。一线承担防御当面吴、蜀之敌任务。部署兵力时实行要点设防，要点守备，即魏明帝所谓“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①。二线承担支援一线任务。东在兖、豫，西在长安，南在宛县、新野，部署二线部队。南线，司马懿时在宛县；正始四年，王昶上奏，屯兵宛县，距襄阳300余里，有紧急情况不能相赴，把屯兵的治所前移到新野②。三线为战略总预备队，部署在洛阳。3、扩大并利用敌

---

①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②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

之弱点作战。根据进攻之敌粮食困难、孤军深入等弱点，以逸待劳、坚壁不战，迫敌粮尽退兵。根据被围之敌寄希望于外援、内部不团结等弱点，以打援、促其发生内讧和攻心，使其无法坚守。4、建立强大的中军体制，对不服从的拥曹派将领使用武力解决，使兵权逐渐归于司马氏。

第三节　魏文帝攻吴之战

一、三路伐吴之战

夷陵之战结束后，孙权在魏国压力下态度渐趋强硬，婉辞拒绝魏国重臣辛毗、桓阶前来盟誓和征任子。魏文帝诱降不成，决心进行武力压服。黄初三年（222年）九月，以10万以上兵力①，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发起三路攻吴作战，其部署是：以曹休、张辽、臧霸为东路，进攻洞口（又名洞浦、洞浦口，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岸边）；曹仁、蒋济等为中路，进攻濡须（水名，从魏边境巢湖流入吴境长江）；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为西路，围攻江陵（今属湖北）。孙权相应部署如下：东路以吕范等督5军率舟军抵御曹休，中路以濡须督朱桓抵御曹仁，西路以朱然守江陵，以诸葛瑾、潘璋、杨粲为其救兵，另以陆逊驻军夷陵防备蜀国。但同时，孙权鉴于境内扬、越“蛮夷”大多没有平定，仍然企图争取魏国罢战。他卑词上书，乞求改悔。魏文帝答复道，你太子孙登早上到，我傍晚就撤兵。至此，谈判破裂，孙权失去退路，改元黄武，决心临江拒守。双方由外交斗争升级为沿江激战。

东路洞口之战　十一月，魏文帝到达宛县（今河南南阳）督

---

① 三路兵力是：西路夏侯尚围江陵，分前部3万进占江陵中州，则江陵一路为数万，东路曹真率5州20军，也应数万，加上中路曹仁军，总计起码在10万以上。

战。曹休统率5州20余军，在江边洞口上表，说愿意虎步江南。魏文帝担心有失，急派驿马制止。这时，夜间骤起暴风，南岸吴军吕范等船漂到北岸，船翻人溺，在曹军攻击下，部队奔散，溺死数千，损失半数①，余军退回江南。魏文帝令紧急渡江。这时，东吴贺齐军路远后到，未遭暴风损失，偏军独获保全，守住南岸，魏军遭遇贺齐等反抗后停止渡江。两军夹江驻屯，展开袭击反袭击斗争。曹休派臧霸率领500只轻船、万名敢死军，渡江袭击对岸徐陵②（今江苏镇江西），攻城烧车，杀掠数千人，不敢深入，退回江北。魏军轻船多次袭击对岸。吴将全琮率部甲胄不离身，兵器不离手，出击驶入江中的数千魏军，斩魏将尹卢，杀死和俘虏数百。

西路围困江陵之战 曹真以优势兵力围攻江陵，东吴援军潘璋、杨粲等不能解围。城中多患浮肿，堪战者仅5000人，将士失色，守将朱然胆量和操守有余，神色安然，守城之余，伺机出击，攻破魏军两座屯营。魏军围困半年不克。江陵令姚泰防守北门，见兵力悬殊、粮食将尽，密谋充当内应。朱然察觉，杀姚泰。双方又争夺江陵中洲。中洲是长江、沱水围成的江心洲，位于城西14里，控扼长江，支撑江陵，其东西35里，南北15里，可屯驻大部队；但孤悬江上，易攻难守。孙权令将军孙盛督万人进驻洲上，建立围坞。黄初四年正月，魏将张郃乘舳舻驱逐孙盛，占领中洲。于是江陵内外隔绝，连鼠雀都不通。吴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督诸葛瑾与夏侯尚隔江相对，夺回中洲，分水军在江中游猎。夏侯尚夜间多出油船，从下流偷渡，袭击诸葛瑾，夹江烧其战船，水陆齐攻，再次进驻中洲，并分出步骑兵3万人架设浮桥，方便大陆与中洲往来。侍中董昭认为，夏侯尚军太深入，从浮桥过江太危险，只有一座浮桥路太狭窄，犯了兵家之忌。一旦江水暴涨，水

---

① 魏文帝还军诏说此战“斩首四万，获船万艘”，显然是夸大之词，这里的数字依据《三国志·吴书》。

② 徐陵原是亭名，控扼长江渡口，吴设置督将守卫。

军又不足，如果吴军攻桥，拿什么来防御？魏文帝命夏侯尚紧急撤出。这时，吴将潘璋率部到上流50里割芦苇几百万束，制作大筏，企图等待春水增生时，顺流放火，烧毁浮桥，并从上下流两头并进，合击中洲魏军；但大筏制成时，中洲魏军接到命令已经撤出。10天后，江水暴涨。魏文帝赞许董昭说，你论述这件事，何其明白！纵然让张良、陈平来处理，又何以复加呢。这时西路魏军疫病流行，江南江北，遍地传染，兵士死亡增多，被迫撤兵。朱然防御江陵成功，从此名震魏国。

中路濡须之战　大司马曹仁率步、骑兵数万向濡须，企图以兵袭取濡须中洲，对外佯称偷袭羡溪（水名，从巢湖东注长江）。东吴濡须督朱桓分兵救羡溪，救兵派出后，仓促间获悉曹仁进至濡须70里，急追还救兵。救兵未回，曹仁突然来到。朱桓兵在者5000人，众将恐惧。朱桓开导说，凡两军交战，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位想必听说曹仁用兵打仗同朱桓哪个更行。兵法“客倍而主人半”，是说客主军同在平原，没有城池可守，又是指兵士勇怯相等而言的。曹仁既不是智勇之辈，其兵士又很胆怯，徒步千里跋涉，人困马乏；我同众军共同据守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以主制客，是百战百胜之势。纵使曹丕亲来，尚且不值得担忧，更何况曹仁之流呢！

于是偃旗息鼓，外表示弱，以诱曹仁。曹仁果然令儿子曹泰以主力攻击濡须城，分派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袭取濡须中洲，企图扣留洲上朱桓部曲的妻子儿女，使濡须城不战自溃。曹仁自率万人作为预备队，驻濡须城北80里外的橐皋（今安徽巢县西北柘皋）待机。散骑常侍蒋济劝阻说，吴军据长江西岸，把战船摆在上流，我军进洲中，钻进牢狱里，这是条危险死亡的路。这时，朱桓令将军严圭攻取油船，别将反击常雕等，自己迎击曹泰，于是斩常雕，俘王双，迫使曹泰烧营败退，临阵杀死淹死千余魏兵。曹仁不听蒋济警告而失败，当年就死了。黄初四年三月，魏军全线撤军，无功而还。

此战从黄初三年九月开始，四年三月结束，历时半年。其中，

东路在吴军遭遇暴风袭击下，魏军一度大胜，但属于侥幸，西路、中路则吴军指挥裕如，以弱军对强军作战而占上风。吴国夷陵之战后士气旺盛，依靠水战和临江坚城作战，达到防御的目的。魏军在夷陵之战的有利时机时不进攻东吴，到东吴无后顾之忧才去进攻，时机选择不当。魏军在最顺利的东路，也没有大规模渡江的能力和意志，压服东吴的企图完全落空。

二、两次广陵观兵

经过一年多休整，黄初五年（224年）七月，魏文帝决心再次伐吴，进攻方向从三道并进改为一道，走上次伐吴时侥幸取胜的东路，企图集中兵力突破长江。八月，魏文帝整编并加强水军，率大军沿蔡水、颍水、淮水[1]，进驻寿春。九月，到达淮水下游广陵（治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的泗口（泗水入淮口），沿中渎水[2]抵达长江边。

这时吴国东路兵力正在镇压山越，江边防守空虚。采用徐盛建议，进行战略伪装，在南岸一夜间建起疑城，从石头到江乘（今南京东北25公里）联绵几百里，又调集大批舟舰在江上游猎。魏文帝临江遥望，见江水猛涨，一再叹息说："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3] 说吴国有人才，未可图也。乘坐龙舟进入长江，忽然遭遇暴风，龙舟漂荡，隔在南岸，几乎覆没。魏文帝在江边拥兵待机多时。孙权认为未构成严重威胁，甚至没到对岸督战。十月，魏文帝退军回许昌，劳师动众，只在长江边上炫耀一番军威

---

① 胡三省通鉴注："魏收《地形志》'陈留扶沟县有蔡河。'《水经》'蔡河自陈留浚仪东南流而入于颍。颍水出颍川阳城县少室山，东南流至新阳，与蔡河合，又东南至慎县东南，入于淮。'"见《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文帝黄初五年七月。

② 中渎水是从淮水下游经射阳湖、精湖，南流进入长江下游的水道。

③ 《三国志》卷五十五《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

而已。

经过4个月休整后，黄初六年（225年）二月，魏文帝企图进驻江边待机，修筑宫室，把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和主力长期部署在广陵前线，筑城屯田，待机出击，以拖疲拖垮吴军。其部署是：诏命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监督众军；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镇许昌。他嘱咐司马懿说，我深为挂念后方，所以委任你负责。曹参虽有战功，可是萧何更为重要。三月，魏文帝率舟师东征，五月，到谯县，八月，从谯县由涡水入淮。中途处理利城（治利城，今苏北赣榆西30公里）兵变事宜，直到十月，才经中渎水抵达江边广陵故城。

魏文帝在江边举行阅兵仪式，戎卒10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企图。对岸孙权严加固守。由于天气寒冷，中渎水道结冰，魏军舟船无法进入长江，魏文帝望着波涛汹涌的江面，叹息无法渡江道："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① 当月下令退兵。退兵时，夜间遭到吴国京城（今江苏镇江）守将孙韶派过江的500名敢死士的伏击，侍从的副车羽盖被截获。事前魏国尚书蒋济曾作《三洲论》，论述淮路艰难，含蓄地劝阻出兵，魏文帝不听。回军时间又比上次晚了一个月，中渎水道水枯浅露，战船数千艘搁浅。蒋济用凿地、遏水等措施，使战船完璧归赵，与先行的魏文帝同时到达谯县。

魏文帝率领称雄北方的强大军队伐吴，继赤壁之战后，14年来首次大规模逼近和进入长江作战，前后共达三次，都被擅长水战、依托长江进行顽强抵抗的弱军所阻遏，第一次交了手，第二、三次连交手都不敢轻试。三次进攻，无功而还。魏文帝每次都选择广陵方向。经过实践，终于放弃这一方向，也放弃了主力在江边多年待机的不切实际的设想。因为第一，这条水道可通行时间过短，不利于军事行动。三次作战中，最早一次是九月到达江边，由于中渎水道只有雨季才通航，如果不就地过冬，十月初就得回军，否则可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吴录》。

能既进入不了长江，又由于水枯丧失退路。第二，军粮无法解决。江边徐、泗、江、淮地区(今苏北)，无人烟各有数百里，不能就地补给。中渎水道一带，东近射阳湖，北临淮水，水大时便于吴军进攻，也无法就地屯田；冬春水枯期间，又无法调运军粮。

黄初七年（226年）五月，魏文帝病重去世，享年40岁。自从赤壁败北以来，曹操对吴、蜀已不采取战略攻势，魏文帝急于结束这一局面。从黄初三年到六年，无岁不征，都不如愿，证明曹操晚年实行的战略并未过时，北方暂时无力战胜南方。

第四节　统一辽东之战

一、战 前 形 势

东汉末年，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太守公孙度在中原群雄混战时，割据当地，后来虽然臣服于曹魏，但是依仗地势偏远，仍然自行世袭相承，保持独立。魏明帝继位后，开始酝酿统一辽东。太和二年（228年），辽东发生夺位之变，公孙度之子公孙渊夺了叔父公孙康的位。魏侍中刘晔认为，公孙氏从汉末开始割据，去辽东水路经过大海，陆路被山岭阻隔，所以这些胡夷遥远难制，世代掌权越来越久。今天如果不加诛讨，日后必然生患。如果等到怀有二心，以兵相阻，然后诛讨，事情就比较难办。不如利用公孙渊新立，有党有仇之际，先行出其不意，以大军进临辽东，然后开设赏赐和招募，辽东可以不必劳师而平定。魏明帝鉴于吴、蜀方向战事正紧，没有向辽东发兵。4年后，即太和六年（232年）九月，发现公孙渊暗中怀有二心，一再联络吴国，明帝令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众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道，进兵辽东。散骑常侍蒋济反对出兵，认为凡不是企图吞并我的地方，不是叛变的臣子，不应该轻易讨伐他们。讨伐而不能加以制服，等于驱使其为叛贼。所以说，虎狼当路，不问狐狸。先除大害，小

害自除。现在海边之地，世代归顺，每年上计及举孝廉，不失职也不缺贡物。议者企图先发制人，使其一举便克，但是得到那里的人民谈不上增加国家人口，得到那里的财富也谈不上更加富裕。如果不如意，这就是结怨并且失了信。明帝不听，大军无功而返。

公孙渊害怕魏国再度兴兵，青龙元年（233年）二月，派校尉宿舒奉表向吴国称臣，结为外援。吴主孙权大喜，企图结好辽东，威胁魏国翼侧，并向辽东求马，派张弥等率兵万人，持金宝珍货、九锡备物，渡海授封公孙渊为燕王。六月，公孙渊发现吴国太远，难以依靠，又贪图其带来的货物，斩张弥等，首级送往魏国，吞没其兵资宝物。十二月，魏国拜公孙渊为大司马。

景初元年（237年）七月，魏明帝鉴于蜀、吴停止攻魏，吴国多次渡海联络高句丽，企图袭击辽东，决心加快统一辽东的步伐，以毌丘俭有才干谋略，令他为幽州刺史，率幽州诸军及鲜卑、乌桓军屯于辽南，同时朝廷以玺书征调公孙渊来洛阳。公孙渊发兵抵抗，两军战于辽隧（今辽宁鞍山西太子河边）。大雨十多天不止，毌丘俭作战不利，明帝诏令退兵。公孙渊自立为燕王，设置百官。

二、统一辽东的决策

景初二年（238年）正月，明帝令司马懿率兵4万，讨伐辽东。谋议之臣以为，4万兵多，劳役和军费难以保障。司马懿认为，4000里作战，虽说是企图以奇兵取胜，也需要依靠实力，不应该嫌多用了劳役和军费。向明帝指出，公孙渊可能采取以下三种对策：放弃城池，预先退走，以保存实力，这是上策；依托辽东全境，抵抗我大军，这是中策；坐守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不过是当俘虏罢了，这是下策。只有明智的人，能够认清敌我形势，事先放弃土地，这既不是公孙渊所能办到的，他又认为我孤军远征，不能持久，必定先拒我于辽水，尔后固守襄平。问所需时间，司马懿答，去百天，攻百天，回百天，60天休息，一年时间足够了。

公孙渊闻讯后，再次向吴国称臣，请求吴国北伐，解救辽东。吴

人企图杀辽东使者为张弥等报仇。羊衜指出，这是发匹夫之怒，放弃霸王之计。不如厚待辽东，发奇兵秘密前往。如果魏军不克，我军远征，这是结恩远夷，义气遍及万里；如果战事久拖不决，辽东首尾分割，则我攻其傍郡，掠夺人口而回，足以报昔日之仇。孙权称善，大规模调集兵力，对来使说，请等待随后消息，我当满足要求，与你们同休戚，共存亡。又提醒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深为你们担忧。针对吴国战备姿态，明帝询问，孙权会救辽东吗？蒋济认为，他知道我准备充分，不可得利，深入则力所不及，浅入则劳而无获。即使子弟处于危境，孙权还按兵不动，何况对异域之人，及由于以前的耻辱呢。所以要对外宣扬支援的声势，无非是为欺蒙辽使，迷惑我方。倘若我方不克，希冀辽东奉事自己罢了。然而攻辽东的登陆地点沓渚（今辽宁旅顺），距公孙渊襄平很远，如果大军相持久拖不决，则孙权规图浅攻时，有可能以轻兵掩袭，当前还不可预测。

三、统一辽东之战的经过

六月，司马懿大军从陆路经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到达辽东。公孙渊令大将军卑衍等率步、骑数万，据辽水阻击。卑衍在辽隧构筑 20 余里围堑，企图诱魏军攻此防线，以挫其锐气。司马懿识破其计，企图避开辽隧防线，攻击其空虚的襄平。其部署是：以一部兵力，多树旗帜，佯攻围堑东南，吸引卑衍军全部精锐；自己亲率主力偷渡辽水，进至围堑北部，弃而不攻，直扑襄平。众将不明白为何弃围堑不攻。司马懿说，敌军坚营高垒，企图疲劳我军，攻击它，正中其计。古人说，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是由于我攻其所必救。敌人大军在这里，则其巢穴空虚。我直指襄平，敌军内心必恐惧，带着恐惧同我交战，我一定能攻破敌军。这时，卑衍等恐襄平无人防守，连夜撤回襄平。司马懿众军进至襄平西南之首山。公孙渊令卑衍等迎击，殊死作战。司马懿大破卑衍军，进至襄平城下，构筑围堑。

公孙渊企图固守襄平。七月，正值霖雨，辽水暴涨，魏军粮

船乘大水从辽口（今辽宁营口）直抵襄平城下。大雨一个多月不停，平地水深数尺，全军恐慌，都盼望移防。司马懿下令，敢有谈论移防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立即斩首，军中情绪才安定下来。司马懿禁止诸将追求小利，下令听任守军出城放牧、打柴、摘采。司马陈珪问，从前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停，所以半月之内，克坚城，斩孟达。现在远道而来，为何更安缓呢？司马懿指出，孟达兵少粮食支持一年，我将士四倍于孟达，粮食不足一个月，以一月对付一年，怎可不速决？以四击一，即使有一半成功可能，还应该进攻，所以不计死伤，与粮食竞争。现在敌众我寡，敌饥我饱，雨水这样大，无法合拢。从京师出发后，不忧敌攻，只怕敌跑。现在敌粮将尽，围落未合拢。如果我掠夺其牛马，抢夺其柴草，不是有意驱赶他们逃跑吗？兵者诡道，善于因事而变化。敌军依靠人多雨大，虽然饥饿被围，不肯束手就擒，当显示无能使敌安心。取小利以惊扰敌军，是错误的。

雨停后，魏军合围，起土山，挖地道，昼夜不停地强攻，箭石如雨而下，城中粮尽，人吃人。辽将杨祚等投降。八月，公孙渊窘迫焦急，先后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出城谈判，提出先解围退兵，尔后君臣面缚投降。司马懿令斩来使，以檄文射入城中，告公孙渊说，楚、郑是平等列国，郑伯投降时尚且以脱去上衣的认罪礼节，迎候楚庄王进皇门。我是天子的上公，王建等人企图让我解围后退，难道符合礼节吗？这两人年老传错话，替你斩了。如果意有未已，可以改派年轻有明决的人。公孙渊再派侍中卫演，并送上任子。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其余二事，只有降与死罢了。不肯面缚投降，是决心走死路，不必送任子。二十三日，魏军攻入襄平，公孙渊与儿子公孙修率数百骑突围，魏军急击，在梁水上斩公孙渊父子。司马懿进城，残酷地杀其公卿以下及兵民 7000 余人，把尸体筑成京观（高台），炫耀胜利。

此战，从景初二年二月司马懿大军自洛阳出发，到八月攻克襄平，历时 7 个月，如果计算回军和休整，则历时 1 年零 1 个月，

同战前的估计相吻合。战后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统一于魏，结束了公孙氏在辽东48年的割据，消灭了北方最后一个割据势力，粉碎了吴国从侧后威胁魏国的企图。此战以孤军远征，是在辽众魏寡情况下进行的城市攻坚战。所以获得胜利，就魏廷决策来说，作战时机选择得较为适宜。这时，诸葛亮已死，蜀、吴停止了攻魏行动。再者，前两次攻辽东，仅使用幽州等地方兵力，此次兵力则以外军为主，不仅兵力加强，将领也使用了最强的。就司马懿的作战指导而言，取胜的原因是：1、知彼知己，成竹在胸。司马懿估计了公孙渊可能采取的对策和作战所需要的时间，都与结果相符合。2、根据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原则，破坏了卑衍吸引司马懿军于辽隧、以老魏师的企图，而调动辽军主力困守襄平。3、在大雨不停、围堑不能合拢的困难时刻，佯示无能，将公孙渊军抑留于襄平城中而不决策逃跑，为雨停后攻城创造了条件。4、通过水运、海运，对粮食给予了充分保障。

第五节　司马氏消灭淮南政敌之战

一、司马懿夺取中外军兵权的努力

魏明帝死后，辅政大臣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各自培植党羽亲信。双方争权的重点之一，是争夺中外军的控制权。曹爽虽为首辅，在军事方面却无建树。为了攫取军权，他屡改制度，毁中垒、中坚营，以其弟曹羲任中领军，曹训任武卫将军，使兄弟并典禁兵。司马懿以明帝旧制禁止改制，无效，退而韬晦称疾，同其子中护军司马师、司马昭阴谋策划政变。

在此微妙而危机的时刻，大司农桓范经常提醒曹爽兄弟，认为总万机，典禁兵，兄弟不宜同时出城，如果有人关闭城门，谁又能保你们重新进城？曹爽骄傲麻痹，不以为意。正始十年（249

年）正月，与兄弟护魏帝曹芳出洛阳城，进谒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乘城中空虚发动政变，其部署为：部勒司马师统率的部分中军兵马，先据武库，分发兵器，以太后令，关闭城门，以司徒高柔代行大将军，据曹爽大将军营，王观代行中领军，据曹羲中领军营，自己亲率大军出屯洛水浮桥待机；以太后令，令城外魏帝曹芳解除曹爽兄弟兵权。拥曹力量企图顽抗。大司农桓范闯出洛阳城，力劝曹爽拥天子赴许昌，据其武库，调集四方兵，以其随身所带的大司农印信，调集军粮。但曹爽丧失抵抗意志，接受司马懿的利诱投降。不久，连同其首要亲信党羽，都被灭族。司马懿夺到洛阳中军兵权。

司马懿父子出身高级士族，利用魏帝年幼，推倒原来不是士族的曹氏后，企图进一步夺取外军，但遭到拥曹势力、特别是国家重兵所在的淮南外军都督的抵制。这时，都督扬州诸军事为王凌，在任 10 年，其外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舅甥同时带兵，专制淮南重任。他们不满强臣控制少主，企图拥立年长的曹操之子曹彪于许昌。尚未发难，令狐愚死，经人告发，司马懿获悉其密谋，企图解除王凌兵权。鉴于淮南是对吴前线，司马懿力争使用和平方式。他借用吕蒙偷袭荆州的故智，自率中军，乘船沿流，以 9 天秘密到达百尺（堰名，今河南沈丘北 5 公里），下书赦王凌，大军随即掩其不意而至。王凌孤立无援，乘船出迎，面缚请罪，被送往洛阳，途中饮药自杀。司马懿到寿春彻查，凡有牵连者诛灭三族，以酷刑向天下敢于反抗者立威，并夺得淮南外军兵权。

司马懿夺取中军和剥夺王凌兵权，为政归司马氏奠定了基础。所以成功，是政变前掌握了部分中军作为政变力量，以韬晦之计麻痹曹爽，以太后令关闭城门，合法地掌握城内全部中军；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人心向背。正如王凌之弟王广说的，“曹爽以骄奢失民”，“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①

---

①《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二、司马师乐嘉之战

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继续清除政敌，杀中书令李丰、后父张缉，胁迫太后废少帝曹芳，另立 14 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这时，都督扬州毌丘俭同拥曹派夏侯玄、李丰友善，扬州刺史文钦骁果粗猛，又与曹爽同邑。毌丘俭厚结文钦。正元二年（255年）正月，两人矫太后诏，在寿春起兵，移檄州郡讨伐司马师，要求斥退司马师，以其弟司马昭等代替。毌丘俭、文钦留老弱守寿春，率兵五六万渡淮，企图等待各地响应，攻取许昌、洛阳，否则也可保住寿春。大军前出至许昌东南项县（今河南沈丘）。以毌丘俭驻守，文钦在外机动。派人联络镇南将军诸葛诞、兖州刺史邓艾共同行动，但使者都被斩首。

这时，司马师兵力占优势，淮南军为劣势，但战争发生在司马师废帝后，邻近吴国边境处，情况复杂。司马师向河南尹王肃问计。王肃劝他急往拒敌，指出从前关羽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来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关羽部队瓦解。现在淮南将士父母妻子在我管辖的内州，只要急往捍卫，使淮南军不得前进，对方一定会发生关羽土崩之势。司马师割眼瘤不久，伤势重，王肃、傅嘏、钟会都劝他亲征。傅嘏指出，如果众将作战不如意，大势一失，你的大事就败了。司马师听到这话蹶然而起，决心亲征，其部署是：以弟司马昭兼中领军，留镇洛阳；令胡遵青徐各军，兖州邓艾军和豫州诸葛诞军会师于陈县（今河南淮阳）、许昌一线；以荆州刺史王基为前监军，统率许昌军。

司马师对于应持久还是速决，犹豫不定。光禄卿郑袤等主张持久，认为毌丘俭好谋而不通达事情，文钦勇敢而无算计，江淮军精锐而不稳固，应该用周亚夫深沟高垒的计策，挫敌锐气。王基则主张速决和先发制人，认为淮南造反，不是吏民思乱，是毌丘俭等威胁诱骗造成的。如果我大军一临，必然土崩瓦解。司马师赞同王基，以其为前军。但议者都以为对方剽悍，难与争锋。司

马师又令停军。王基认为，毌丘俭等完全可以全军深入，久不前进，是其欺诈作伪的情形暴露，军心怀疑。我军不张大形势以负民望，而停军高垒，是示弱，不是用兵之势。如果对方掠夺人口补充自己，我州郡兵家在淮南的，更有离散之心；吴国再介入我内战，则淮南将不再为国家所有，谯、沛、汝、颍等豫州之地也危险不安全，这是极大失策。又说，目前外有强敌，内有叛臣，不及时解决，事态发展不可预测；建议大军迅速前进，占据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顿有大粮仓，足够大军40天的军粮。保坚城，用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是平叛的要点。王基一再请进，才允许他进据濦水。王基认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凡属对方占领有利，我方占领也有利的地形，叫作争地，南顿是争地，必须力争，擅自进据南顿。毌丘俭也企图抢占南顿，发兵前进10余里，因王基先到，退兵保项县。

闰正月初一，司马师进驻濦桥（今河南商水西）。众将要求进攻项县。司马师认为，诸位得其一，不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毌丘俭、文钦自以为起事后远近必响应，不料淮北不从，其将史招、李续前后来降。内困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符合其意，小作持久，欺诈之情自会暴露，这是不战而克的方法。于是作出新的部署：令诸葛诞率豫州军从叛军后方安风（今安徽霍丘西南）向寿春，胡遵率青徐军出谯（今安徽亳县）、宋（今河南商丘一带）之间，分别进入毌丘俭军退路两侧，自率主力进至汝阳（今河南周口市西南10公里）同淮南军对峙。毌丘俭等进不能战，退怕寿春受攻，无计可施。淮南将士家在北方，军心沮丧，投降的接连不断，只有淮南新归附的农民为其所用。

在此有利形势下，司马师举行反攻，令兖州刺史邓艾率万余人，进至两军之间的乐嘉（今河南周口市东南），示弱诱敌，自己从汝阳率主力秘密靠拢邓艾军。毌丘俭懵懂不知此情，令文钦攻击邓艾军。文钦到达后，突然发现司马师主力，惊愕不知所为。其子文鸯18岁，勇冠三军，自称魏军尚未安定，击之可破，分所部为两队，乘夜夹攻，呐喊冲入魏营。魏军惊扰，司马师大惊，有

病眼球突了出来，怕部队知道后引起恐慌，以被蒙头，疼得咬破被子，而左右不知。文钦援军失期未到，天亮后，文鸯势孤退兵。司马师认为文鸯一鼓作气，再而衰，失去接应，其势已屈，令骑兵追击。文钦将要退兵，文鸯认为，不先摧敌士气，我不得退。率10多名骁骑，摧锋陷阵，所向披靡，然后退去。魏将司马班率骁骑8000，张开两翼追击。文鸯匹马杀入，反复六七次，杀敌数百，追骑不敢逼近，文钦才得退保项县。这天，毌丘俭获悉文钦失利退却，恐惧，连夜退兵，部队溃散。闰正月初九，吴国以丞相孙峻率将军吕据、留赞乘机攻魏，企图袭击寿春，进至东兴（即东兴堤，今安徽含山西南30公里），获悉文钦等败讯。十九日，进至橐皋（今安徽巢县西柘皋）。文钦孤军无援，不能自立，企图回寿春，寿春已溃败，便到孙峻处，归降吴国。淮南军数万口也投奔吴国。这时，毌丘俭逃至慎县（今安徽颍上以北），左右及兵士逐渐脱离而去。毌丘俭藏在水边草中，闰正月二十一日，被射杀。孙峻也引兵退回国内。淮南反司马师起兵失败。七天后，司马师病死于许昌。文钦降吴后，以郭淮同曹爽父亲曹真有旧，又拥重兵于西线，写信动员他降蜀，企图借郭淮及吴、蜀力量同时发兵，清除司马氏党，但郭淮已于上月三十日故去。这时，夏侯渊儿子、征蜀大将军夏侯霸，由于受曹爽事件牵连，已投降了蜀国。

此战从正元二年正月开始，闰正月二十一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有余。它使司马师取得讨平淮南政敌的胜利，阻止了吴军从魏国内乱中取利。所以迅速胜利，是由于司马氏占有兵力优势，政策较得人心，淮南兵士反司马氏的积极性不高；司马师以生命最后时刻抱病亲征，全力搏击，在内争形势微妙时刻，控制并稳定了局势。就作战指导而言，则主要是以大军压迫敌正面，通过坚壁不战，挫敌锐气，并以多支部队威胁其退路，使其陷于不利态势，促其内部动摇，发生土崩之势。毌丘俭等起兵，开始时盲动冒进，拥兵项县后又懦弱无为，逗留不进，不深入作战，失利即退，实为失策。政治上虽然注意缩小打击面，肯定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对司马师也只让他交出官职，不废除其侯爵，但响

应者甚少。主要是平时未作广泛的争取工作，军事上未取得战果，政治策略无从发挥威力。

三、司马昭寿春之战

当毌丘俭起兵时，镇南将军诸葛诞斩其求援的来使，布告天下，并第一个攻入寿春。城中10万人害怕被杀，破城门而出，流窜山泽，或散走吴国。诸葛诞由于久在淮南任职，再度任为都督扬州。他击退来攻的吴军，令将军蒋班追击，蒋班斩吴将留赞。诸葛诞以功转为征东大将军，由于他同曹氏集团夏侯玄、邓飏等是至亲，夏侯玄等被杀，王凌、毌丘俭等接连被灭族，他也恐惧不安。为了自保，竭尽库金赈济施舍，厚结军心，并厚养亲附人士及扬州轻侠数千人作死士。甘露元年（256年）冬，吴军企图进攻徐堨，朝廷计算诸葛诞所督兵马足以抵御，诸葛诞却请求增派10万军队守寿春，又请求在临淮一带筑城以防吴军，实际企图保有淮南。继司马师执政的司马昭对诸葛诞微有察觉。甘露二年（257年）五月，本着早解决祸小，晚解决祸大的原则，召诸葛诞回京师任司空，企图解除其兵权。

诸葛诞惶恐不安，怀疑此事是同城扬州刺史乐綝离间所致，杀乐綝。召集淮南、淮北屯田官兵10余万人，及扬州新归附能当兵的四五万人，调集1年军粮，企图据寿春起兵，闭城自守，等待时机变化；又派长史吴纲带小儿子诸葛靓到吴国称臣求救，愿以众将子弟作人质。吴人大喜，令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率兵3万，同文钦一起秘密增援寿春。

司马昭认为，此次内乱，必然吸取毌丘俭轻率疾进失败的教训，外联吴军，“变大而迟”，自己企图“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①。六月，决心攻陷寿春，令青、徐、荆、豫及关中部分游军

① 《晋书》卷二《文帝纪》。

会师淮北，为防止后方有人挟两宫为变，自己挟持魏帝及太后同行，以车驾及中军驻屯项城，自己前出丘头（今河南沈丘东南25公里），共集结中外众军26万。以王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与将军陈骞等合围400里外的寿春。

此战第一阶段，合围寿春。王基初到寿春城外时，未合围，文钦、全怿等率吴兵从城东北利用山险突入城中。王基四面合围，里外设两层包围，将其壍壕和垒壁修得十分陡峭。司马昭令收缩兵力坚守壁垒。王基及议者建议立即攻城。司马昭认为，城坚固，守军众多，攻城必会力竭。如果有外敌，攻城部队将里外受敌，是危险之道。现在诸葛诞、文钦、全怿等三叛相聚在孤城里，有可能同时被戮，应当用“全策”留住他们。所以我军只应坚守三面，以吸引吴军，如果吴军从陆上来，军粮必少，我用游兵轻骑切断其运输线，可以不战而击破之。这时，吴将朱异率3万兵进屯寿春西南之安丰（今河南固始东南25公里），为文钦外势。司马昭鉴于此，令王基转移兵力，仅据守寿春北山。王基认为，解除合围将使守军获得自由，动摇自己军心，拒不执行，上疏申说现在同敌对峙，应当不动如山。众军已经深沟高垒，人心安定，不可再动，这是带兵要点。司马昭同意，战后对王基说，我亲临现场，才知你正确，佩服你坚持正确意见的勇气。文钦等屡次出城攻围，都不利而回。

第二阶段，围城打援。司马昭鉴于寿春城坚粮足，短时间难以攻下，吴军必来增援，决定对寿春围而不攻，而以打援为重点。认为如将来援吴军战败，守军文钦等一定被俘。据此下令围城众军按甲围守，暂不进攻；令监青州诸军事石苞，率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等，挑选精锐兵士组成机动部队，负责打援。州泰在寿春西南之阳渊（今安徽霍丘东）击败朱异，在追击中杀伤2000人。七月，吴国大将军孙綝大规模征兵，出屯魏境镬里（今安徽巢县北10公里），北距寿春约300余里，以朱异为前部督，令率丁奉、黎斐等5万介士解寿春之围。朱异把辎重留在途中都陆（今安徽合肥西北）后，进至寿春城南黎浆。魏将石苞、州泰战败

朱异。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5000袭击都陆，烧光朱异军资粮草。朱异率残部吃葛叶，退兵靠拢孙綝。孙綝命令朱异继续死战，朱异以兵士缺食，不执行命令。九月，孙綝怒斩朱异，率兵返回建业。孙綝不能救出诸葛诞，又自戮名将，从此吴国无人不埋怨他。司马昭打援获得成功。

第三阶段，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并施，攻陷寿春。司马昭估计，寿春与吴军方面下一步可能采取三种对策。他说，朱异不能攻入寿春，不是他的罪。吴国人杀他，可能是向寿春守军谢罪，促其坚守，使其继续盼望援兵。如果不是这样，对方可能突围，决一旦之命运。再一种可能，是以为我大军不能持久，以节食减人来应付，现在我应防其逃逸寿春。决心通过多方诱使对方犯错误，将敌抑留于城中，以利最后全歼。他收买对方间谍，放回城中，造谣说吴国救兵将到，魏军缺粮，病弱者已撤回淮北就粮，其势不能持久，用假情况误导诸葛诞。诸葛诞轻信谣言，放宽用粮标准，不久开始缺粮，外救不到，将军蒋班、焦彝等心腹谋主建议放弃固守待援方针，进行突围，认为孙綝名为回去发兵，实为坐观成败。现在军心还可用，集中兵力决一死战，攻其一面，有可能突围出去一部。文钦反对此议，说城内吴军父兄子弟都在江东，即使孙綝不想来，主上及我们亲戚也不答应。说再坚守一年，魏国内变将起。两人固劝，文钦怒，诸葛诞企图杀蒋班等，两人害怕，并且知诸葛诞必败，十一月，越城降魏。这时全怿侄子全辉等与家内争讼，携其母亲率部曲数十家渡江投奔魏国。司马昭让全辉亲信进城，向全怿谎称国内由于全怿等不能攻取寿春，要杀众将全家，所以出逃降魏。全怿等恐惧，十二月，率数千人开门降魏，城中震惊，不知如何是好。

甘露三年正月，文钦认为，蒋班、焦彝等认为我不能突围，全端、全怿等又投降，这是敌人不加防备的时候，可以出战了。诸葛诞、唐咨都以为然，于是全军携带大批攻具出城，昼夜攻击魏军南围五六天，企图突围而出。围上魏军居高临下，使用发石车、火箭，烧破攻具，箭石雨下，寿春军死伤遍地，血流满堑，被迫

回城。城内粮食枯竭，出降的数万人。文钦企图全部放出北方人，以节约粮食，只与吴兵坚守。诸葛诞不听，发生争执和怨恨。文钦本来同诸葛诞有矛盾，事急愈加猜疑。文钦来议事，诸葛诞于是杀文钦。文钦儿子文鸯、文虎率兵在小城中，率兵紧急前往，企图为父报仇，部队不为所用，二人孤身越城，归顺大将军司马昭。军吏要求杀二人。司马昭下令，文钦罪不容诛，其子自然应杀，但二人由于穷困归顺，而且城未拔，杀二人是坚定守军之心。于是赦二人罪，令率数百骑巡城喊话：文钦的儿子都不杀，别人何必害怕！城内且喜且忧，一天比一天饥困，诸葛诞等智慧和实力都越发穷匮。

司马昭亲临围上，见城上弓手引而不发，认为时机成熟，指挥四面攻击，呐喊登城。二月，城陷。诸葛诞窘急，单骑率麾下从小城门突击出城，大将军司马胡奋率兵迎击，斩诸葛诞，传首，夷灭三族。诸葛诞麾下数百人拱手列队，每斩一人，劝降，不降，一直杀完，都说，为诸葛公死，不恨。诸葛诞得人心如此。吴将唐咨、王祚等投降，吴降兵上万，兵器堆积如山。

战后，谋议者以淮南再次叛逆，吴兵家室在江南，认为不可放回，应全部坑杀。司马昭认为，古代用兵，全国为上，诛杀首恶而已。吴兵即使逃亡回国，正可显示我国宽弘。一无所杀，分别送往洛阳附近河南、河内、河东三郡安置。吴国降将唐咨，原为魏人，在利城兵变中叛逃入吴，这次拜为安远将军，其他吴国投降的裨将，都授予位号，吴兵悦服，江东感动。淮南将吏士民各被诸葛诞所胁掠的，只诛杀首恶，其余不问，听凭文鸯兄弟收葬父丧，并给牛车。史家称司马昭在此战中，“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①。

寿春之战从甘露二年五月开始，次年二月结束，历时 9 个月，是司马氏消灭淮南政敌最后一战，也是三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此战司马昭军 26 万，诸葛诞军十四五万，吴军 8 万，动用

① 《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注引晋人习凿齿语。

兵力总计近 50 万，创三国纪录。在这次作战中，司马昭取得俘敌 10 万、其中吴兵上万的战果，最终解决了淮南地区和曹氏集团的军事反抗，完全控制了魏国军事。这一胜利，为司马氏代魏奠定了基础，也为出兵灭蜀创造了条件。此战是在吴军增援情况下进行的大城市攻坚战，司马昭所以取得这一胜利，在作战指导上主要是：1、在西线姜维攻魏时，采取防御方针，把主要兵力调至东线，造成对诸葛诞和吴军的兵力优势。2、在围城不下以后，重点打吴国援兵，打援兵时，又重在断其粮道，迫使吴军不敢再来增援。3、在第三阶段攻城时，用欺诈误导诸葛诞，促使守军一再犯错误，出降不断，及时利用降将展开攻心，瓦解守军斗志，在此基础上发起总攻，由于瓜熟蒂落，一举攻克。魏国在吴国边境发生内战，为吴国攻魏提供绝好机会。吴国与诸葛诞建立联盟，先后投入 8 万多兵力增援诸葛诞作战，但自从朱异被诛后，竟无所作为，暴露出抗魏的实力和谋略都已力不从心。

第六节　魏灭蜀之战（上）

（参见附图 8）

一、魏灭蜀战前形势

蜀国灭亡前夕，由于南北方均势打破，形势对魏国极为有利，而对蜀国十分不利。魏国拥曹势力彻底失败，内战结束，司马氏在夺权斗争中收揽人心，不敢过分为非，并经过寿春战后五年的恢复休整，其国力军力一天天强盛。吴国同反司马氏力量诸葛诞并肩作战，竟连遭失败，证明无力攻魏，魏国东线压力从此减轻，有可能在西线集结重兵，根本改变对蜀方向的力量对比。蜀国政治、经济、军事三者都存在严重问题，处于建国以来最虚弱时期。兵力劣势更加明显，带甲将士 10.2 万人，人口 28 万户，仅相当魏国 1/5。经济上承受着姜维长期北伐的沉重负担，民生凋敝。虽

然制定了正确的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但是未能像魏文帝那样，建立严禁宦官干政的制度。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四贤相去世后，上有后主昏庸，下有宦官黄皓专权，臣下只求无罪容身，举国昏昏，政治日非。

在此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蜀廷对于逐渐逼近的战争危险，缺乏清醒认识和警惕。大将军姜维虽然预感到寿春之战后魏国有可能进攻汉中，却制定了错误的诱敌深入方针。甘露三年（258年），即寿春战后当年，姜维鉴于其8次北伐歼敌不多，为了诱魏军深入汉中而歼之，改变汉中防御部署。过去，刘备留魏延镇守汉中，都将兵力充实于诸外围，以抵御外敌。魏军如果来进攻，使其不得进入汉中平原。到兴势防御战，王平抵御曹爽，都秉承此制。姜维建议，以为错守前沿诸围，虽然符合周易“重门”御敌的原则①，然而仅可防御敌人，不能获得歼敌大利。不如听到敌人到来时，诸围都收兵聚谷，退守汉、乐二城，使敌进入平原②，我重视阳安关口（即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镇守以抵御魏军。有事之日，令游军（机动部队）并进，以等待敌之虚疲。魏军攻关不克，田野无散落谷物，千里运粮，自然疲劳。退兵之日，然后各城同时出动，与游军合力反击。这是歼敌的方法。根据上述方针，姜维令督汉中胡济退驻汉寿（今四川剑阁东北），汉中仅以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另在汉中以西之西安、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北3公里）、武卫（今甘肃成县、徽县一带）、石门、武城（今甘肃武山县西南）、建昌、临远（西安、石门、建昌、临远均在今甘、陕交界地区，即甘肃武都、成县，陕西凤县、勉县

---

① 即认为，秦岭、汉中阳平关为汉中两重门户，御敌于此重门之外，是符合周易“重门”之义的。“重门”一语，出《周易·系辞》：“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孔颖达正义曰：“豫者，取其豫有防备。”《十三经注疏·周易》卷八《系辞》下，中华书局1980年9月影印本，上册。

② 按，《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此句为“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于义不通。《资治通鉴》改作“退就汉、乐二城，听敌入平”，胡三省曰：“谓纵敌使入平地”，今从《资治通鉴》。

一带）等处，建立围守，阻击魏军由武都、阴平进入，而诱其进入汉中。景元三年（262年）秋，姜维侯和败后，畏惧黄皓，率主力去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避祸，东距汉中千里之遥。汉中难以迅速得到姜维主力支援，更加空虚。在西线兵力转变为魏强蜀弱的形势下，姜维不守汉中秦岭门户，自弃险要，等于开门揖盗。

二、司马昭灭蜀决策和作战方针

寿春战后，大将军司马昭进一步控制朝政，同天子矛盾加剧。景元元年（260年）五月，魏帝高贵乡公曹髦见威权日见丧失，政非己出，不胜忿怒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①，企图召集百僚废司马昭。这一密谋泄露后，他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数百人，进攻相府，亲自用剑战斗。相府兵将不敢迎战天子，在中护军贾充纵恿下，舍人成济刺死曹髦，刃穿透背后。司马昭令迎曹操之孙15岁的曹奂即皇帝位，是为元帝。司马昭企图篡魏，但是论功只有寿春之战取胜一事，又有弑帝恶名，难孚众望，因此加紧战争准备，企图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不世之功。景元三年（262年）夏，他决心先灭蜀，后灭吴，向众臣指出，平定寿春以来，休整了六年，以训练军队，修理甲兵，对付吴、蜀。大略计算如果伐吴，需要制造战船，疏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是10万人一百几十天的工役，而南方水土低下潮湿，北军前往必患流行病。今日应当先取蜀国，三年之后，借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取吴，这是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计蜀国战士9万，驻守成都及防守其他郡不下4万，其余部队不过5万。可把姜维绊在沓中，使其不能东援，我大军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取汉中。蜀军如果据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分离割裂。我集中大军以屠城，分散锐卒以掠野，使其剑阁来不及守险，关城不能自保。以刘禅的昏暗，

---

①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边城失陷于外，士女震动于内，其灭亡是可以预言的。对于这一计划，征西将军、都督陇右邓艾以蜀国没有出现可伐的破绽，多次陈述异议。司马昭深以为忧，令其主簿师纂任邓艾司马进行开导，邓艾才接受其决心。只有司隶校尉钟会认为蜀国可以攻取，同司马昭一起预先筹度地形，考察、论证事态和局势。

景元三年冬，司马昭以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敕令东方青、徐、兖、豫、扬诸州造船，唐咨造浮海大船，伪装伐吴，迷惑蜀国。景元四年(263年)五月，征调四方兵力18万，下诏大举伐蜀，其部署是：以征西将军邓艾率3万余人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今甘肃迭部东南30公里)、沓中进军，绊住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3万余人，从祁山向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北)、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白龙江边)进军，切断姜维向汉中之退路；钟会率10余万人分别从骆谷、斜谷(均为秦岭的南北通道)二路向汉中进军；以廷尉卫瓘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行镇西军司。

当景元四年钟会在关中治兵时，姜维察觉其有进犯的企图，上表后主，建议增派左车骑将军张翼加强阳安关口①，右车骑将军廖化加强阴平桥头，以确保对汉中之封闭及姜维回援汉中退路之安全。黄皓相信鬼巫的话，以为敌人终归不会来攻，启禀后主扣住此事，因此群臣无人获知这一危急情况。

三、钟会攻陷汉中姜维摆脱钳制

此战第一阶段，魏军攻陷汉中和阳安关口。八月，魏军从洛阳出发，大赏战士，陈兵誓师。将军邓敦认为蜀国不可伐，被斩首示众。蜀朝庭得知魏军将到，令右车骑将军廖化前往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赶赴阳安关口增援

① 又称关城、关。《钟会传》“使护军胡烈攻破关城。”《王平传》“贼若得关，便为深祸。”诸名皆系一地。

诸围；令汉中诸围不得交战，退守汉（今陕西勉县西南）、乐（今陕西城固东）二城，企图诱魏军深入，待机歼灭其有生力量。

此时战局形成东西两线。东线汉中，魏军10余万，蜀军不超过3万，兵力悬殊。钟会二路并进，魏兴(治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太守刘钦进兵子午谷南口，攻击汉中侧背，保障钟会军南下。众军数道平行，在无抵抗下进入汉中平原。① 姜维主力和后方援军都未到达。蜀军仅有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兵各5000人，以及阳安关口的守军。九月，钟会令以护军荀恺万人围汉城，前将军李辅万人围乐城，荀、李不能攻克。钟会攻乐城，也不克。于是钟会率主力西进，令护军胡烈为前锋，攻取阳安关口。关口守将为傅佥，临危受命，由蒋舒协助。蒋舒原为武兴(今陕西略阳)督，无所建树，被替换而怨恨，这时要求出击。傅佥说，受命守城，保全就是功劳。违令出战，如果丧师负国，死而无益。蒋舒说，你靠保城立功，我靠出战立功，各按自己意见办吧。率军佯称出战，出城后投降胡烈。胡烈乘势袭击阳安关口，傅佥格斗而死。钟会长驱前进，缴获蜀军大量库存粮食。于是蜀国险要，秦岭弃之不守，阳安关口出了叛将失守，都未发挥阻击作用。魏军虽然未克汉、乐两座孤城，但是打开汉中入蜀门户，蜀军将魏军封闭于汉中而歼灭的企图落空。

西线阴平郡，魏军6万余人，姜维5万。魏军邓艾企图抑留姜维于沓中，以确保钟会主力攻入汉中，其部署是：以天水太守王颀从沓中以东，陇西太守牵弘从沓中以北，金城太守杨欣从沓中以西甘松，三面攻击钳制姜维军，自率大军继牵弘之后。这时，廖化到达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得悉魏将诸葛绪将向建威（今甘肃西河县北3公里），有切断姜维退路的危险，即留在原地等待

---

① 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元帝景元四年正月，诏“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趣汉中”，实际魏军并未走子午谷(见《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虽然提到“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但是魏兴郡在子午谷南口以东处。刘钦并未穿行子午谷，而是从其南口以东，向南口方向前进。

接应姜维。姜维获悉钟会众军进入汉中，恐怕阳安关口有失，立即向汉中机动。杨欣等跟踪追击，在强川口（据胡三省注，在西倾山东南）激战。姜维败退，听说诸葛绪军堵塞道路，驻屯在桥头，便经孔函谷（今甘肃舟曲东南20公里的白龙江中游岸边）在邓艾尾随下到达阴平会合廖化，折向蜀国北道，企图以攻击诸葛绪侧后调动他回援，诸葛绪果然后退30里。姜维进入北道30余里后，迅速回军，从诸葛绪让出的桥头通过。诸葛绪急进拦截姜维，差一天的路程未赶上。① 姜维在前堵后追不利态势下，摆脱邓艾、诸葛绪大军钳制，使蜀军主力完成有战略意义的机动。

第七节　魏灭蜀之战（下）

（参见附图8）

一、钟会受阻剑阁邓艾偷渡阴平

第二阶段，魏奇兵偷渡阴平，进入成都平原。姜维通过桥头

---

① 按，《资治通鉴》记蜀国两路援军进军及与姜维会合情况，有不准确之处。第一，把北至阴平的廖化，误记为张翼、董厥。据《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元帝景元四年八月："汉人闻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将兵诣沓中为姜维继援，张翼、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翼、厥北至阴平，闻诸葛绪将向建威，留住月余待之。"后句所述是不对的。张翼、董厥的任务，是"诣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应由成都北上，经汉寿，向东北之阳安关口前进，而不应经汉寿向西北之阴平前进。阴平距沓中近，北至阴平的，应是廖化，此点有《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维、化亦舍阴平而退"可证。据此可知，姜维在阴平会合的是廖化，而不含张翼、董厥。其次，即使张翼、董厥八月间到了阴平，"留住月余待之"以后，九月间应该仍在阴平才是，但九月条却说，姜维在远离阴平、退向白水以后，"遇廖化、张翼、董厥等，合兵守剑阁以拒会"，岂非自相矛盾？据《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实际情况是"翼、厥甫至汉寿，维、化亦舍阴平而退，适与翼、厥合"。第二，把姜维先到阴平、后过桥头的次序颠倒了。《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元帝景元四年九月：姜维"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按，桥头在阴平关城之间，过桥头后还至阴平，需二过桥头。这是不可能的。

以后，获悉阳安关口陷落，决定放弃原定保卫汉中的企图，改为退向剑阁，以确保蜀中。在退却中同张翼、董厥援军相遇合军。钟会突破汉中防御后，沿金牛道前进，企图攻入成都平原。他所走的金牛道起自汉中沔县西南，经七盘岭、朝天驿到剑阁，是入蜀咽喉大道。历史上自秦以来，由汉中入蜀，都走该道。蜀中有难，该道数百里间必为战场。其主要险要剑阁所在的大、小剑山，连山绝险，延亘如城，其小剑山凿石架设阁道，绵延30里，飞阁通衢，一夫守险，万夫趑趄。诸葛亮治蜀时，根据守蜀必须守金牛道、守金牛道必须守剑阁的原则，在此设防。以前邓芝出使时对孙权说，蜀有重关之险，其第二险就指剑阁。钟会进至剑阁后，受到先期到达的姜维蜀军主力阻击，无法前进。由于诸葛绪阻击姜维失利，姜维成功回援，在剑阁守险，钟会失去乘胜直捣成都之势，灭蜀计划被打乱。钟会军事受挫，加强政治攻势，移檄蜀国将士吏民，呼吁巴蜀贤知，见机而作，归顺魏国，不要玉石俱碎，悔之无及。同时致书姜维，希望双方效法春秋吴国季札与郑国子产，两人一见如旧相识。姜维见书不答，列营守险，其营垒所在之山，峭壁千丈，下临绝涧。姜维这时已由被动化为主动。

姜维在取得主动过程中，忽视次要方向阴平。阴平有樵猎小径可入蜀。姜维退兵经此路北口时，鉴于此路山高岭峻，荒芜人烟，大军难以通行，没有留兵防守。邓艾尾追姜维到阴平后，简选精锐，企图沿此路出绵竹（今四川德阳北黄许镇），直指成都（今属四川），邀诸葛绪同行。诸葛绪以接受节度阻击姜维、向西前进不是诏命赋予任务为由拒绝，脱离邓艾，会师钟会，共向剑阁前进。诸葛绪到后，钟会企图独揽大权，密告诸葛绪畏缩懦弱，不肯前进。魏廷令囚车送回，所部归钟会统辖。钟会合兵十几万，在剑阁相持一个多月，攻击不能克，粮道险远，被迫无奈，商议还师。邓艾以为蜀军今已受挫，应利用形势发展胜利。向司马昭建议，从阴平沿小路，经汉德阳亭（今四川江油东北雁门坝），进军涪县（今四川绵阳）。由剑阁以西100里出去，南距成都300余里，以奇兵冲击蜀国腹心地区。认为剑阁守军一定从剑阁回军涪

县阻击这支奇兵，则钟会军即可两车并行，进入坦道。如果剑阁军不回救，则防御涪县之兵必寡。《军志》有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现在偷袭敌之空虚，肯定可以破敌蜀国的防御。

冬十月，建议被批准，邓艾率万人在前，偷渡阴平道，行进在岷山中，翻越摩天岭，寻觅樵猎小径。途经马阁山，道路跌滑不通。邓艾军包裹马脚，挂牢车子，抢修阁道，方才通过。钟会令将军田章等从剑阁以西，走小路到江由① 加强邓艾军。如邓成功，分享其功劳。田章还未到江由，先在百里外战败埋伏在山间的3校蜀军。邓艾令田章为先登，长驱前进。十一月，先登到达江由，守将马邈投降。江由为涪县北方屏障，两岸悬崖峭壁，万山环绕，地势险要。刘备在此设关尉戍守。后主时改为地方武装戍守，称为义守②。江由以下，山高水险，道路傍江背山，峻峭险狭，北来者右靠崖壁，只能以左肩担物，无法换肩，号称左儋道。邓艾军经左儋道，一路山高水深，通过无人烟区700余里，途中粮食运输多次受阻，几乎断粮。邓艾以70高龄，用毛毡裹住身体，推转而下，率领大军攀树贴崖，鱼贯前进，艰苦卓绝，通过阴平小路。

二、邓艾逼近成都迫使蜀国投降

至此，战局进入灭亡蜀国的第三阶段。后主得悉邓艾通过阴平小道后，令诸葛亮之子、卫将军诸葛瞻率众军阻击。诸葛瞻进至涪县，盘桓不进。黄权之子、尚书郎黄崇，深知邓艾轻兵深入，利在速战，战不能胜，必陷困境，劝诸葛瞻抢占山区，依托险要，阻止邓艾军进入平原，再三劝说，至于流泪。诸葛瞻犹豫，邓艾军长驱直进，击败前锋，诸葛瞻退驻绵竹。邓艾致书诸葛瞻说，如

---

① 镇戍名，今四川平武东南120里涪江边老衙南3里的南坝。

② 《华阳国志》卷二“平武县，有关尉。自景谷有步道，径由江由左儋出涪，邓艾伐蜀道也。刘主时，置义守，号关尉。”

果投降，表荐你回祖籍作琅邪王。诸葛瞻怒斩诱降使者，列阵等待。邓艾令儿子邓忠攻击右翼，司马师纂攻击左翼。二人战斗不利，退回，称不可攻击。邓艾怒道，存亡之际，在此一举，有什么不可以攻击的？喝斥并将斩二人。邓忠、师纂驰马回军再战，大破蜀军，斩诸葛瞻、尚书张遵、尚书郎黄崇，占领绵竹。诸葛瞻时年 37 岁。其长子诸葛尚叹道，父子蒙恩，不早斩黄皓，以致败国灭民，为何还活着呢？驱马赴魏军战死，蜀军都离散。

蜀国估计魏军不会很快到达成都，未作守城调度，后方也没有得力将帅，及至邓艾进入平原，百姓惊慌，跑散在山野中，无法禁止。后主令群臣会商，计无所出，有的认为同吴国本为与国，可投奔吴国，有的认为南中 7 郡险阻陡峭，易于凭借险要防守，可以奔往南中。益州土著集团领袖、光禄大夫谯周极力主降，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寄寓他国作天子的；如果进入吴国，当然应该臣服人家，再说大能吞小，魏国能兼并吴国，吴国不能兼并魏国，是很清楚的。同样为小国称臣，怎如为大国称臣。两次受辱之耻，怎如一次受辱。如果奔向南中，应当早作规划，然后可行。现在大敌已经临近，祸败将到，众小人之心，无一可以担保，恐怕出发之日，将变生不测，又如何能够到达南中呢？又分析魏国受降的必然性，认为方今东吴未宾服，魏国其势不得不受蜀降，受降后不得不以礼相待。有人仍建议退却到南中，后主犹豫不定。谯周上疏反对去南中，认为南中过去不出租税、力役，南征以后才出，南人以此为愁苦，他们是些祸害国家的人。北兵前来，不只取蜀而已，如果我投奔南方，北兵必及时追击。即使我到了南方，供应大增，耗费南中夷人必多，必加速其反叛。蜀地人民不肯弃父母，千里跟随南行，其逃亡、叛变也是必然的。愿陛下早作打算，可获得爵土，如果到南方再降，其祸必深。尧、舜以其子不好，将帝位授予别人，微子以殷王之弟，臣归武王，难道愿意这样作吗？是不得已啊！十一月，后主接受谯周之策，率太子、诸王及群臣，载着棺材，捆绑着自己，出城投降，送上士民簿，计户 28 万，口 94 万，甲士 10. 2 万，吏 4 万人。后主之子北地王刘谌要求父子

君臣背城一战，为国家死难，认为以此见先帝方可，不被采纳。投降这天，刘谌去刘备庙大哭后自杀，左右无不痛哭流涕。

姜维等从诸葛瞻战败后，不再收到正式通报，只听到传闻：有说后主企图固守成都，有说企图东入吴国，有说企图南入建宁（南中7郡之一，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姜维等率领步骑四五万人，撤离剑阁，南下巴西（治所阆中今属四川），沿广汉郪（今四川中江东南40公里之郪江上游南岸）道以摆脱腹背受敌的处境，并察明情况，以伺机回援成都。军队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钟会在姜维等撤离剑阁后进军涪县，并令胡烈等追击姜维。不久姜维等接到后主敕令，令投降魏军。姜维令兵士全部放下兵器，与廖化、张翼、董厥从东道向钟会投降。将士都发怒，拔刀砍击石头。各郡县、围守都接到投降的敕命。蜀国从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入成都，历49年，至此灭亡。

当魏军攻蜀时，南中领建宁太守霍弋要求带兵北上，保卫成都。后主以部署已定，没有批准。成都失守后，霍弋在查明后主已降后才降魏。蜀国前此在魏军攻蜀的十月间，向吴国告急。吴军为策应蜀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起三路攻魏，以大将军丁奉督众军向寿春前进，将军留平到南郡同施绩商议进兵方向，将军丁封、孙异向沔中前进。蜀国投降后，吴主令三路退兵，并起兵西上，谎称救蜀，企图打通蜀国永安（今四川奉节城东），抢占蜀国土地。蜀将罗宪拥兵2000守永安，说，本朝倾覆，吴国是唇齿之国，不救助我灾难，而谋取私利，背盟违约。况且汉国已亡，吴国怎能长久，难道能作吴国的降虏吗！动员将士，坚守永安，阻止吴军不得通过。

司马昭鉴于征蜀将领远在西土，战胜后很容易拥猛将锐卒，割据一方；因此对钟会、邓艾等怀有警惕，仅任命二人为每个方向的主将，而不设全战主将，并以卫瓘进行监军，全战指挥由自己遥制。战前有人提醒说，钟会可能有野心。司马昭成竹在胸，笑道，我能不知道吗？只是预先胆怯，智勇便发挥不出来。唯有钟会不胆怯，蜀必可灭。灭蜀后，将士思归，不会听钟会作乱的。

魏军灭蜀后，钟会、邓艾、卫瓘之间发生内讧。钟、卫密告邓有反状，司马昭令槛车征邓。钟独揽大军，威震西土，自以为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联合姜维，密谋叛魏独立，尔后率魏、蜀兵出斜谷，经长安，攻取洛阳，以定天下。姜维企图先促成魏军内乱，然后乘机恢复蜀国，同钟会结交，劝杀尽北来众将。但是消息泄露，魏将士争杀钟会，姜维也被杀。邓艾将士乘机追回邓，卫瓘怕邓报复，派兵杀邓。这时吴国以蜀地百城无主，企图乘虚兼并益州，令步协率兵西上，继令陆抗率兵3万增援，围困永安，以打开入蜀通道，而降魏蜀将罗宪固守，吴兵不得过。罗宪被攻半年，魏国救兵不到。后来，司马昭令荆州刺史胡烈救罗宪，吴兵才退。灭蜀的次年，司马昭加九锡，第三年即魏咸熙二年（265年）八月病死。长子司马炎继立为晋王，十二月，废魏元帝，建国号晋，是为晋武帝。魏国在2年内，也继蜀而灭亡了。蜀亡后16年，晋武帝发动灭吴之战，吴亡。晋、吴之军事将在下卷叙述。

三、乘虚蹈隙作战方针的胜利

魏灭蜀之战从景元四年八月开始，十一月结束。4个月内，魏军创造战争史上邓艾偷渡阴平小路的佳话，连克汉中、涪县、绵竹，直逼成都，最后取得不战屈敌、灭亡蜀国的重大胜利。此战是三国后期意义最重大的战争。它结束了三国鼎立格局。魏国从此据有长江上游，取得对吴国的顺流之势，使其陷于孤立，为进一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同时说明魏国长期休养生息，大力恢复经济，坚持守势战略，才取得灭蜀实力。此战是在优势于蜀军兵力一倍的条件下进行的要塞、阵地和城市进攻战，以及运动战。所以取胜，就作战指导而言，主要是制定和贯彻了乘虚蹈隙的方针：

1、抓住蜀国虚弱时机，定下灭蜀决心。此时魏国国力日盛，司马昭反对派军事上彻底失败，吴军经过寿春之战的较量，不可

能有大动作，东线可保无事。寿春之战后魏国经过五年的休整和准备，灭蜀时机成熟，司马昭不顾群臣反对，也不顾攻蜀将帅邓艾的犹疑、钟会的野心，毅然不失时机地定下战略进攻的决心。并在战前成功地进行战略伪装，荫蔽意图，麻痹了蜀国。

2、以次要的6万兵力钳制蜀军主力姜维于沓中，主力钟会大军乘虚进入汉中平原，并置汉、乐二城不克于不顾，径直西下，在蜀军增援部队未到、阳安关口空虚之际，一举将其攻克，打开入蜀大门，使得全局皆活。

3、诸葛绪阻击失败，姜维回援，魏军主力进至剑阁受阻，粮运险远，无力持久相持，有可能前功尽弃。在此危急情况下，邓艾敢于以偏师出奇兵，冒着艰难困苦、九死一生风险，跋涉于无人烟小路，直捣蜀国首都，拊蜀军主力后背，再次以乘虚蹈隙，使魏军绝处逢生，使战争出现根本转机。

蜀国所以灭亡，主要是由于内政腐败，人民疲敝不堪，国力虚耗，益州土著集团主降。然而战争开始时，有经过战争锻炼的部队，有重险之固和固定的防御方向，民心未叛，士气可用，保住国家是可能的，一度几乎迫使魏军退兵，最终结局却未能如意。军事上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其作战指导上的错误是：

1、麻痹侥幸。对魏军大规模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看不到寿春战后，魏国已有可能在西线集结重兵，识不破魏国的战略伪装，没有作好防御以灭蜀为目的的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姜维报告关中魏军有进犯的意图后，不仅刘禅、黄皓不相信此事，不发兵增援汉中，连姜维本人也忽视了局势的严重程度，继续屯兵沓中，使蜀国汉中防御继续空虚。直到战争中，在阴平道和成都的防御上，还继续麻痹侥幸，终于铸成亡国大错。

2、由于形势判断错误，没有在寿春战后及时转变为战略防御。灭蜀前一年，姜维仍在发动第9次北伐，简直是玩火。姜维制定的诱敌深入汉中的方针，不适合防御魏军大举进攻。蜀军以弱军对强军作战，绝对应当利用秦岭天险和涪县以北山区有利地形，疲劳沮丧魏军，赢得时间，姜维、诸葛瞻却虑不及此。可以说蜀国

灭亡，一半是方针错误奉送人家的。

3、对于主要方向金牛道和剑阁的防御，是重视的、成功的。对于次要方向阴平小路的防御，过去诸葛亮也是有眼光的，以身边参军廖化任阴平郡广武（今四川平武东北）督，防御该路北口。如果遵循诸葛亮成规，邓艾偷渡阴平小路，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姜维平时既未在广武设督，从阴平退守剑阁时，又未留兵防守阴平小路北口，当魏、蜀军在剑阁相持时，也未大力加强江由守备，严重忽视对次要方向阴平小路的关照，导致全局由主动彻底转为被动。

4、后方不作应战准备，不聚兵屯粮，还阻止南中将领北上支援，以致邓艾偏师出现后，惊慌失措。蜀国本可背城一战，国库有米 40 万斛，金银各 2000 斤，锦绮彩绢各 20 万匹，剑阁主力完整无损，魏军各统帅间潜伏着争权的矛盾，邓艾兵不过 1 万，孤军深入，兵少力疲，粮食难以为继。如果后主在成都坚持一段时间，以等待邓艾粮尽和自己援军到来，则邓艾必有覆军危险。即或不守成都，也可南撤至江州，重新组织抵抗，江州等地有兵有粮有回旋余地，事情尚有可为，军事无必败之理。满朝乃至为邓艾突然出现所吓倒，举国不战而降。昔日刘备创业时那种败而不屈的顽强意志，已丧失殆尽，诸葛亮说的，“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① 的精神，也荡然无存，创业者和守业者两者的精神相比，相去何啻十万八千里。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第十四章　变革中的军制（上）

第一节　最高统帅体制

汉魏之际，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发生极大变动，原有的军制不再完全适用。因此魏国侍中尚书傅嘏指出："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认为在制度方面"以古施今"是很难行得通的，因此曹魏"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改制，"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①。军制剧烈变革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整套同秦汉大一统时期不同的新军制。

新军制中，首要的是军事领导体制，即兵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中央及地方军事领导指挥机构职官的设置和划分。新的军事领导体制，是最高统帅、辖区都督、州郡官分级领兵制。在这一分为三级的领兵制中，重要的是前两级，即最高统帅体制和都督体制，特别是第一级最高统帅体制。

一、最高统帅掌兵制

秦汉以来，兵权都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自从汉末献帝兵权旁落后，随着兵权的实际归属，便产生了相应的最高统帅掌兵制度，出现了傀儡皇帝下的相府掌兵制，都督中外诸军事等新制。新制的核心，是兵权实际上同皇权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随着权力的实际转移而不断转移。在曹魏，其最高统帅的新体制，经历了三

---

① 《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

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汉末的相府掌兵制。曹操一方面通过架空献帝，使他成为毫无兵权的政治傀儡，一方面先后以行车骑将军、丞相名义，执掌兵权，担任东汉政府实际上的最高统帅。与此制相适应的，是刘备、孙策等群雄，在“奉汉”的旗号下，以将军开府的名义，“合法”地掌握各自的最高兵权。

第二阶段，是皇帝掌兵制。曹丕代汉以后，其丞相府摇身变为朝廷，相府掌兵之制转化为皇帝掌兵之制。为了保证兵权不旁落，曹丕废相国，设置最高武官太尉、大司马、大将军，以太尉主管全国日常军务，以后两者掌征伐。因此魏国前期，兵权在魏文帝、魏明帝手中。

曹魏第二代领导人作了皇帝，一般不带兵，但战争状态下军务异常繁重，必须对全国军队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为了适应这一战时体制的需要，皇帝指派了代理人。魏文帝在废相国的第三年（黄初三年），首创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名号，把它授予上军大将军曹真，并假其节钺。曹真以这一职位，受皇帝委托，指挥京城内外驻军和外地各都督征镇兵即中军和外军。这是魏文帝委派代理人的制度。实行这一制度以后，魏文帝继续掌握着军队调动权、军事决策权，仍然控制着兵权。但是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权势极重，如果再录尚书事，有权过问全部政事，即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所以此号不肯轻易授人。魏明帝临终，嗣子 8 岁，情况特殊，第二次把都督中外诸军事授予曹真之子曹爽，并令其录尚书事，曹爽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帅。

第三阶段，是恢复相府掌兵制。魏国后期，权臣司马氏企图问津魏鼎，攫取兵权，再次对最高统帅改制。第一步，都督中外诸军事由不常设改为常设，并由司马师、昭世袭。第二步，司马昭效曹操故技，设置相国，由自己出任，以相国名义，独揽兵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次年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嗣相国，就在这一年内，顺顺当当完成了转移魏祚、建立晋王朝的大事。

吴国类似魏国。兵权在皇帝手中；丞相仅为行政长官，最高

武官并设左右大司马、大将军或上大将军。孙权死后，皇帝不带兵，增设督中外诸军事、领中外诸军事职位，由获得此名号的人指挥中央军队。中后期，权臣孙峻以宗室出任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数职，总揽军政大权，皇帝形同傀儡。

蜀国建立以后，皇帝掌兵之制仅存在两年，因刘备去世而中止。随即进入相权掌兵。诸葛亮以丞相代行君权，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蜀国兵权虽然一度从皇权处分离，但由于诸葛亮忠心辅佐后主刘禅，兵权并未从刘姓手中丢失。诸葛亮死后，蜀国不再设丞相，军事上置大司马、大将军。继任者蒋琬、费祎、姜维以大将军兼录尚书事，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与相府掌兵颇为相似。

二、中央军事领导指挥机构

最高统帅通过中央军事领导指挥机构执掌兵权。汉制，丞相、三公、大将军，有权开府治事，自选僚属。将军出征时，一般常置幕府，作为参谋部。汉末，群雄任将军或丞相时，即通过其将军府、丞相府执掌最高兵权。其府署实际是领率机关，职官设置上比一般幕府有所创新。曹操以司空行车骑将军执掌最高兵权时，其府内军事职官的设置和职掌是：领军、护军各一人，参与军事机密和决策，代表统帅监护诸军；军师祭酒、军师各一人，主管军机；司马一人，主管军务；参军二人，参与谋议；东曹掾一人，主管武官选用。曹操以丞相执掌兵权时，其丞相府军事职官的设置和职掌是：中领军、中护军各一人，主要军事助手，监护中军；军师祭酒，员额不定，中军师和前、后、左、右军师各一人，军师若干，分管各方面的军机；行军长史一人，战时主管诸曹事务；左右司马各一人，分管军务；参军祭酒一人，参军若干人，参与军事谋议。东曹掾一人，主管武官选用；兵曹掾一人，主管日常军务；记室若干，主管文书，等等。咸熙元年（264年）即司马昭篡魏前一年，其相府军事职官比曹操时增设下列诸曹：参战十一人；贼曹掾一人，主盗贼事；骑兵掾二人，属一人，据《唐六

典》为掌戎杖器械；戎曹掾一人；马曹掾一人，等等。

在皇帝掌兵时，魏国中央军事领导指挥机构由三部分组成：1、尚书、中书二省，协助皇帝决策。二省本为执行中央政务的总机构。尚书省设立于东汉，其长官为录尚书事、尚书令。魏国以“公卿权重者为之”①。中书省最早为曹操创设的秘书令丞，主管尚书奏事等机要文书。魏文帝以其官署设在宫禁内，改为中书省，掌机密，长官为中书令，又置监，凡给州郡及边郡下密诏，由中书省承办而不经过尚书省，尚书省职权逐渐削弱。魏明帝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中书权重，引起反对。尚书蒋济上疏指责“大臣太重”，“左右太亲”，有害国家，反对形成“专吏之名”②。2、五兵尚书曹，处理日常军务。该曹分设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以五曹尚书郎领事，是常设行政机构。该曹为尚书省五曹之一，其长官五兵尚书与其他四曹尚书、尚书省长官尚书令、二仆射，合称八座尚书，任同汉代六卿。该曹的设立是一个创举，常为后世所沿用。3、最高武官为太尉、大司马、大将军，执掌武事。魏制，大司马常驻屯合肥（曹仁），或皖（曹休），以防备吴国；大将军常驻屯长安（曹真），以防备蜀国。蜀国刘备以诸葛亮丞相府为中央军事领导指挥机构。刘备、诸葛亮死后，中央军事领导指挥机构由以下三部分组成：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尚书令；大司马；大将军。吴国由以下三部分组成：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左右大司马；大将军或上军大将军。

魏、蜀方面的最高统帅为了正确地在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中决策，都在中央军事领导指挥机构内，建立参赞军机的制度。曹操建安元年在幕府中设军师，建安三年设军师祭酒③，以“参掌戎

---

①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② 《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

③ 首席军师，后世避司马师讳，改称军祭酒、军谋祭酒。

律”①，即掌管军法，并令参与谋议，以荀攸、郭嘉等智谋之士首任该职。建安十八年（213年），设参丞相军事，以侍中、光禄大夫荀彧持节充任。曹操向这些军师、参军咨询军事，同他们一起计事决疑。② 刘备在赤壁战后，创设军师中郎将，以诸葛亮、庞统先后任该职。建安十五年（210年），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曹操的军师祭酒是丞相幕僚，只议军谋。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在议军谋之外，兼掌兵柄。诸葛亮在丞相府中，也设置军师祭酒，以来敏、尹默、射援③ 任职。孙权咨询的主要对象，是统兵的诸大将。在军事咨询制度上，不设军师等职。

本节所述为最高统帅体制。该体制特点是最高统帅同皇权可离可合，在最高权力转移到权臣手中而皇位不变的情况下，满足了战时体制对军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但相权掌兵威胁皇权，造成政局不稳，曹操和司马氏凭此转移国鼎。蜀、吴相权掌兵时，由于诸葛亮的品质和孙峻及时被废，国鼎才没有移走。

第二节 都督制

一、都督制的创立

都督制，是划分辖区、指定主将统一领导辖区军事的制度，是三国军事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督制始创于三国。创立的背景是：曹操的军队大量来源于群雄和豪强，是其部曲的联合。这些部曲，内部依附性极强，难以进行改编，彼此间又互不统属。曹占区扩大以后，曹操不可能处处亲临各地，去统一指挥各支部队。

①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及当涂得志，克平诸夏，初有军师祭酒，参掌戎律。”

② 陈琳、阮禹、路粹等文士也曾任军谋祭酒，但是他们职司记室，主管奏议和来往文书之事，与参赞军机不同。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三辅决录注》。

各地在军事上发生了统一指挥同分散状态之间的矛盾。分散状态使作战指挥变得分外复杂。以建安二十年（215 年）合肥保卫战为例，该战虽然获得大胜，但也暴露出严重的不足。守卫合肥的张辽、乐进、李典之间，没有指定统一指挥的主帅①，事前不得不由曹操制定作战方针，以统一三将行动。而在执行这一方针时，三将又需要协调关系。这种复杂的指挥程序，制约着作战效率。为了提高效率，当几支部队参加同一次战争、驻守同一个地区的时候，有必要指定一人任主将，统领众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立了都督制。都督原是某种军事职务的称谓。这个词起源于汉末，一出现便被大量使用。称为都督的，既有偏裨将校，也有持节都督。都督制的都督，作为辖区主将，都是持节都督，即不仅授予都督称号，还授予持节称号。持节是奉天子之命出使，并持有符节凭证。持节都督分为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的等次，对都督区内各部队有统一指挥权、军事执法权。其军事执法权，据晋制为"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② 上述晋制，直接继承魏制而来，也可以视为魏制。自从曹魏实行上述都督制后，蜀、吴根据各自的情况，也实行了该制。

曹魏都督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曹操时是萌芽阶段。《宋书・百官志》"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③ 说明东汉必要时开始派出督军御史到地方上，督数郡或者数州诸军事，直接将兵，或者征、募郡兵，率地方官作战。曹操仿照督军督领众军之意，于建安十六年（211 年）潼关渭南之战中，令曹仁"督诸将拒潼关"。苏伯、田银

---

① 从"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三国志》卷十八《李典传》）之语看，三人之间没有统一的领导，而是协商办事。

②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③ 《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

反叛时，以曹仁“都督七军讨银等”①。曹仁受任的都督，同东汉督军一样，既有统一指挥之权，又是临时差遣，称号在作战完毕即予取消。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征孙权回师时，“使（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②。夏侯惇受任的都督，执行长期驻守任务，不再是临时差遣，但还没有固定的都督区。延康元年（220年）《魏公卿上尊号奏》中，曹休具衔为“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臣休”③，衔中都督和督军并存。在这个阶段中，都督同督军并存，尚未定型，也未划分都督区。2、曹丕代汉以后，是建立阶段。这时边境线基本固定下来，划分都督区条件成熟。曹丕称帝前后，陆续把沿边诸州划分为四个都督区，分别以曹真都督雍、凉，曹休都督扬州，夏侯尚都督南方荆州，吴质都督幽、并，正式形成都督制：指定了拥有重兵的都督，划分了相对固定、与战区基本合一的都督区。3、甘露二年（257年）平定诸葛诞以后，进入改制阶段。这时执政的司马氏畏惧都督对抗中央，有几个都督区都划得比战区小。

关于都督区的划分，魏国的情况是：

东线，黄初三年（222年），设置扬州都督区，先后以曹休、满宠、王凌、诸葛诞、毌丘俭、王基、石苞任职。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举兵反抗司马氏时，以都督豫州王基兼督扬州。这种以一人兼督扬、豫，不是常制，不久王基就专督扬州了。而甘露二年，又分淮北都督区，以陈骞、卢钦、司马骏任职。设置青、徐都督区，该区都督有时合置，有时分置。合置时，以牵招、夏侯楙、桓范、胡质、胡遵任职；分置时，以臧霸、田豫都督青州，钟毓、卫瓘都督徐州。

南线，黄初元年（220年），设置荆州都督区。明帝太和元年，以荆、豫合置都督区。嘉平三年（251年）分置，其中都督豫州，

---

① 《三国志》卷九《曹仁传》。

② 《三国志》卷九《夏侯惇传》。

③ 〔宋〕洪适：《隶释》卷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又称都督江南。荆、豫合置时，以司马懿、王昶任职；分置时，以夏侯尚都督荆州，诸葛诞、王基、州泰、陈骞、司马骏都督豫州。甘露四年（259年），荆州一分为二，一个荆州都督镇襄阳，以州泰、钟毓、王沈任职，王沈时，又称都督江北，另一个荆州都督镇新野，以王基、陈骞任职。

西线，设雍、凉都督区，以曹真、司马懿、夏侯玄、郭淮、陈泰、司马望任职。黄初元年，同时设关中都督区（关中地属雍州），以夏侯楙任职，太和二年（228年）撤消。甘露元年（256年）另置都督陇右（陇右地属雍州）一人，以后分置陇右、关中都督区。以邓艾、李允、卫瓘都督陇右。

北线，设都督河北，兼辖冀、幽、并三州军事，以吴质、吕昭、程喜等8人任职。

蜀国都督区，大体以郡划分。西线，设汉中都督，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置，首任为魏延。建兴五年丞相诸葛亮进驻汉中，以魏延改任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北线，遥设关中都督，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置，首任为吴懿。南线，设庲降都督区，总摄南中诸郡军事，章武元年首任为邓方，治南昌县（今云南镇雄），继任李恢移治平夷县（今贵州毕节），马忠移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庲降又设副职副贰都督。东线，设永安（巴东郡治所，即白帝城）都督，又称巴东都督。永安是蜀国东部边境重镇，位于三峡西口，面对魏国新城郡和吴国荆州，章武元年首任为李严。在西、北、南、东线之外，后方二线设江州（巴郡治所）都督，江州在蜀国东南江水和西汉水（今嘉陵江）交汇处，水陆四达，是后方重镇，章武末首任为费观；建兴年间，继任者为李严、李丰、李福、邓芝等，在此主持北伐的后方事务。

吴国的都督区，根据敌情和特殊地形，以州、郡和郡内要点划分，形成极密或极疏的布局。其北线和西线，在沿江众多要点上，设置了密集的都督区，为国家重兵所在。这些都督区自西向

东计有：信陵督、西陵督①、夷道督、乐乡督、水军督②、江陵督、公安督，巴丘督、蒲圻督、夏口督、沔中督③、武昌督④、半州（今江西九江上游江中）督、柴桑督、吉阳（地无考）督、虎林（今安徽贵池西）督、濡须督、芜湖督、牛渚（今安徽当涂北）督、扶州（今安徽马鞍山以北江中之洲）督⑤、都下（即建业）督⑥、徐陵（亭名，在今镇江）督、京下（今镇江）督。建衡二年（270年）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为信陵等诸督之督。其南线，设交州督，广州督。东线，孙权西征荆州关羽时，临时设吴郡都督，以吴奋任职，镇抚东方。

二、防范都督的制度

都督制是在外地众军中集中兵权的体制。它适应了战时需要，但也培植将帅拥有重兵，因而潜伏危险。为了限制都督制上述的

---

① 永安二年陆抗都督西陵时，辖区自关羽濑至白帝。

② 水军驻地在中夏水，其都督驻在乐乡北。水军督或称中夏督，夏水督。卢弼以为："盖中夏为水军驻屯之所，故又称水军督也"。（《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陆抗传》卢弼注）中夏水是长江江陵以下的一个分支，东流经华容县南，注入沔水。《水经注校》卷三十五《江水三》："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濬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晋书》卷一《武帝纪》："（王）濬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

③ 辖区为夏口以上的沔水。

④ 陆逊死后，分为武昌左部督、武昌右部督。吕岱任武昌右部督时，辖区自武昌上至蒲圻。

⑤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六《吕范传》卢注引谢钟英曰："扶州当系江宁西南江中之洲，未能确指其地。"江宁在今安徽马鞍山以北，扶州当在江宁与今马鞍山之间的江中。

⑥ 吴建兴元年（252年），太傅诸葛恪攻击魏国新城前设都下督，以留守建业的滕胤充任。

消极作用，避免重蹈汉末各地拥兵自重的覆辙，魏国对都督建立了防范制度，主要是限制其权限，监察其行为，索要其人质。①

（一）限制其权限的制度

1、都督没有发兵权。都督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上表朝廷请求批准。没有诏命，不得擅自发兵。魏国新城太守孟达，在叛魏的密谋暴露以后，认为其上司荆、豫都督司马懿要来平叛，必须取得发兵权。由于司马懿驻地距天子所在的洛阳800里，距孟达所在的新城1200里，他完成上表天子批准的手续，一来一去2800里，估计需一个月，那时新城已获巩固，不足为忧。不料司马懿径直发兵，8日兵到城下，打了孟达一个措手不及。孟达失策在以都督无发兵权的常制来筹算，未料到司马懿竟敢于便宜从事。司马懿打破常规，是由于幼主在位、军情紧急，有胆量做常人不敢做的事情。这个特例从反面说明，都督不得任意发兵。

2、都督对所部将领没有任免权。任免权在朝廷，任免事务由护军办理。“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②“（夏侯玄）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③这说明，各级将领直到牙门校尉、百人督，都由朝廷任命，由中护军承办任免事务。都督无法通过用人树立私人势力。

3、都督不掌握财权、物权。军队的屯田、仓储及供给，朝廷另置系统，都督无法专断，无法积聚割据所需的物资储备。诸葛诞久在淮南，蓄谋反叛非只一日，起事时也仅能聚足一年的粮食。

4、都督一般没有辖区行政权。曹魏都督、刺史分置，辖区的军权与行政权分离。都督的权力不能过分膨胀，朝廷也因此拥有制约都督的一个重要手段。个别时候，都督也兼任刺史，曹休继

---

① 参见姚念慈、邱居里《西晋都督制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 《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注引《魏略》。

③ 《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注引《世语》。

任夏侯惇都督诸军事后，黄初二年（221年）兼领扬州刺史，四年改拜扬州牧。州泰在甘露三年（258年）都督江南诸军事（即都督豫州）后，兼领豫州刺史，但第二年即改督荆州，不兼刺史。太和四年（230年），都督河北吕昭兼领冀州刺史，就遭到散骑黄门侍郎杜恕的上疏反对。

（二）监察其行为的制度

监察都督行为的制度，主要是向都督派出监察官员。一是以刺史与都督分置，同城而治，刺史含有监督都督的意味。都督有非常的举动，不得不考虑刺史的牵制。二是继承战国以来对带兵将领派出监军的传统，向都督派出军师、监军等监察官员，确保都督忠于最高统帅和执行统帅的意图。军师在汉末原为公府属官，或统帅参谋，执行主官的意图，谈不上监督主官。现在的军师不由都督自辟，而由朝廷派出，对皇帝负责，有权监督都督对诏命的执行，节制都督的行动。"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① "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于毗"②。魏末，避司马师讳，军师改名为军司。职责是"所以节量诸宜，亦监军之职也。"③魏国发动灭蜀战争时，派遣都督陇右诸军事邓艾、都督关中诸军事钟会分兵进取，不设总的统帅，特命散骑常侍、廷尉卫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④ 钟会称卫瓘是"监司"⑤，也说明军司是朝廷监督统帅的特使。卫瓘在此次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监督作用。他同钟会一起秘密奏报邓艾专擅的情况。⑥有诏槛车征邓艾，他出面向邓艾军宣布司马昭的亲笔命令，称诏收捕了邓艾。卫瓘所作所为，证明那时的监督制度是：凡

---

① 《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注引《魏略》。

③ 〔唐〕杜佑：《通典》卷二一九《职官十一·监军》。

④⑤⑥ 《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

遇重大问题，都督必须与军司共同处理或奏报朝廷；军司有权执行其职责范围内的朝廷命令。

（三）索要都督人质的制度

索要都督人质的制度，是对都督实行质任制，即要求其在京师留下质任。西曹掾邵悌反对伐蜀以钟会出征，理由是钟会“单身无重任”①，即拥兵远征，只把养为儿子的兄子留为人质，兄子不是亲生的，不是重要人质。任子作为人质，平时留在“保官”内，一旦所担保的人物投降或叛变，将受到严惩。钟会所养的兄子钟毅，在钟会作乱后伏法。邓艾在洛阳的所有儿子，在邓艾被诬谋反后，统统被诛。蜀国质任情况不详。吴国也实行了质任制。《搜神记》说：“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所以吴国戏口守将晋宗叛逃魏国以后，企图袭击安乐，夺回他在那里的“保质”。吴国还为屯戍诸将的任子，设立了“任子馆”②。对都督的防范，以质任制最为残酷。到了三国后期，各国政权度过草创阶段，上下间的信任比之过去大大加强，推行质任制的必要性降低了。孙权认识到杀叛将的家属不利，赤乌七年（246年）下诏：“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③ 这说明，质任制推行的合理性已比汉末减少，终于在晋成帝时废除了。

在战时环境下产生的辖区持节都督，是军事领导体制中一个重要层次，代表着一级指挥实体。它有效地领导了所在辖区的外军部队，领导了辖区国防和作战。但是在先后三位扬州都督王凌、毌丘俭、诸葛诞武装反抗司马氏集团以后，它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的弊端，也暴露无遗。为了防止它在内政上的消极作用，朝廷用种种制度对它进行限制、监察和威慑，甚至不惜缩小辖区的划分，牺牲对外作战的利益。

---

① 《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

② 《建康实录》引《吴书》。

③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第三节　中军、外军和州郡兵

三国时期军事斗争重点，从东汉期间的边防斗争，转移到中国国内战争。为了适应重点转移，三国对东汉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的军队体制进行了如下改造：1、重建了中央军。中央军重建后数量扩充，任务增加，并区分为中军和外军；2、原地方军大都转化为群雄军队，并在兼并战争中被三国收编为中央军，已不存在，因此重建了州郡兵；3、取消东汉边防军，其保障边防安全的职能，由中央军或地方军兼顾。通过上述改造，三国军队建立起中军、外军和州郡兵的新的体制。新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武装力量采取常备军这一单一的形式；中央军划分为中军和外军；中央军、地方军都经过重建；强兵归中央直接指挥，地方军不再构成对中央的威胁。

一、中　军

中军是中央军的一部分，是中央直辖的担任警卫皇帝或最高统帅、卫戍首都的和战略机动的兵团，编有宿卫军和宿卫以外的部队等多支精锐部队。其中宿卫军，是警卫皇帝或最高统帅和卫戍京城的部队。曹魏有如下几支宿卫军：1、武卫营。魏文帝时，许褚“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①。2、中坚营。建安年间，曹休、张辽、许褚为中坚将军。3、中垒营。设有中垒将军。4、骁骑营、游击营。“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并汉杂号将军也，魏置为中军。”② 5、中领、中护营。除上述五支禁兵外，曹魏还保留了东汉北军的五校尉营的旧制，但是削减其兵力，魏明帝时“今五营

① 《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

②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①，缺额不补，官职性质也改变了，仅为一种象征。中军还有宿卫以外的部队。这种部队，驻在城外拱卫京师，不负责宿卫皇帝，是在司马氏当权期间改制时形成的。改制以后，强兵聚集京师，城内容纳不下，一部分驻屯在城外，形成宿卫以外的中军。由于其数量很多，魏咸熙二年（264年）十一月，首次设置四名护军，以统帅城外诸军②。

中军具有双重职能。第一项职能，是负责宿卫皇帝或最高统帅、并卫戍首都。在建安年间，主要是负责警卫曹操。为了使皇帝或最高统帅不被宿卫军所控制，设立多支宿卫部队，使其相为表里，彼此牵制，共同完成宿卫任务。曹操时，宿卫军有虎士、亲兵，其主将许褚、典韦，轮番充当曹操贴身护卫。曹爽当政时，用其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又把中垒、中坚营并入曹羲营内，破坏了禁兵彼此牵制的原则。司马懿据此抨击曹爽“破坏诸营，尽据禁兵”，“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互，纵恣日甚”，“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③。为了防微杜渐，宿卫官作为内臣不能私交外官。曹仁在殿外邀请许褚到厢房中坐谈，许褚推辞不去，对人说，他虽然是亲戚重臣，却是外藩。我备位内臣，当众谈话就行了，进屋私谈什么呢？

中军第二项职能，是充当国家战略机动部队。曹魏中军经常征伐四方，不像两汉南北军很少出征。曹操时候，中军上述两个职能结合很紧密。宿卫军在作战环境中，既宿卫，又充当战略兵团参与作战。如典韦的亲兵在征战中，经常绕曹操大帐进行宿卫，每逢战斗，又常先登陷阵。甚至宿卫行动本身，就是作战的组成部分。潼关之战中，在马超万余人箭如雨下的攻击下，许褚扶曹操上船，左手举马鞍为曹操挡箭。这天如果没有许褚及虎士护卫，

---

① 《三国志》卷十四《孙资传》注引《资别传》。

② 《晋书》卷一《武帝纪》。

③ 《三国志》卷九《曹爽传》。

曹操几乎丧命。许褚既完成了宿卫曹操的任务，也等于完成了保障曹操为大军断后的作战任务。曹操时的宿卫军，不长驻都城。魏国建立以后，皇帝一般不出征，中军在执行战略机动任务的同时，就必须在京城留足宿卫兵力了。

中军的主要领兵官，是中领军、中护军。魏国建立以后，他们由丞相幕僚转化为天子最亲近的武官，统领宿卫军中的部分营兵，是宿卫军中最重要的统帅，并掌管武官的选用。领护军中资历深的，称为领军将军和护军将军。曹休任领军将军时，“主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①，所领宿卫军最多。到了魏国末年，中领军曾领全部宿卫军。中领军、中护军职掌相同，但是护军将军隶属于领军将军。任领、护二职的大都是重臣。正始以前，主要是曹氏亲党，正始以后，转移到司马氏集团手中，表明司马氏夺到了宿卫军的兵权。

中军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建安年间，是初建阶段。曹操建立了虎豹骑、虎士和亲兵等步骑队伍，为其宿卫。在献帝迁到许县以后，按东汉旧制，恢复了警卫献帝的五校尉营（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曹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执”②，迫使献帝就范。建安四年（199年），曹操作为领兵主帅，在其府内设置幕僚领军和护军，使其内参机密，外出代表自己监护诸军。统一冀、青、幽、并期间，随着领地日益扩大，军队事实上分为跟随曹操征战的和驻屯在各占领地的两部分。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后，曹操以跟随征战的宿卫军为中军，改领军为中领军，护军为中护军。2、魏国建立后，是完善阶段。在曹操宿卫军的基础上，扩充宿卫军，其建制已如上述。3、司马氏掌权后，是改制阶段。此前魏国主力部署在外军，中军精而少，因此高平陵政变时，被阻于城外的曹爽，除了数千屯田兵以外，城外竟无军可调。司马师当政以后，为了保

---

①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②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卫政变后上台的司马氏集团，改革魏武帝文帝明帝“三祖典制”①，把强兵聚集到京师，进行直接控制。这一改制，引起外军毌丘俭、文钦的指责，说司马师“多选精兵，以自营卫”，“多载器杖，充聚本营”②。这时中军数量庞大。司马师征讨毌丘俭、文钦，“统中军步骑十余万”③，这10万是中军，又以其弟司马昭兼中领军，统帅宿卫军，是留下另一部分中军，则中军总数大大超过10万。

蜀国在刘备时，中军区分不明显。黄忠为后将军，统帅中央机动兵团，带有中军性质。刘备死后，诸葛亮明确区分中外军。中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央机动部队，先后任该部队统帅的有中护军赵云，行中护军费祎，中监军姜维，中都护李严等。他们官职前带“中”字，监军、都护的官秩，更比护军高。另一部分是留在成都的宿卫兵，有左右羽林部④和虎步营、虎骑营，每营约五六千人⑤，分别由羽林部督、羽林监⑥、虎步监、虎骑监⑦统领。中军内，也保留了徒有虚名的五校尉。

吴国中军主要是宿卫兵，由武卫、羽林、绕帐、帐下等兵组成，领兵官是武卫将军、武卫大将军、羽林督、绕帐督、帐下督，多由孙氏宗室子弟担任，如孙越为武卫大将军，孙咨为羽林督，孙邻为绕帐督，陆逊当了孙策女婿后，任帐下右部督。宿卫兵中，也保留了东汉旧制五校尉。

总之，三国的中军脱胎于秦、汉的宿卫兵、南北军，但是名称、官职都变了。中军经常在紧急情况下，征伐四方敌国，或者居重驭轻，讨伐国内不服从的势力，在巩固国防、巩固政权斗争

---

①③《晋书》卷二《景帝纪》。

②《三国志》卷二十八《毌丘俭传》注引俭、钦等表。

④〔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上：“李恢传有羽林右部督，则有左可知。”见《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

⑤《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亮又曰姜伯约“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

⑥⑦《三国职官表》上“虎骑监一人，蜀所置，掌宿卫士。此官盖与虎步监同。”

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外 军

外军是中央直接领导指挥的守备沿边各辖区的部队，是军队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军的派出部队，相对驻屯京师的中军来说，称为外军。外军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中央军在部署兵力时，为了应付多个战略方向，必须把大部兵力部署在外地。魏明帝时，“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度支尚书司马孚从不丧失军机出发，建议“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① 这二万步骑兵，是驻在关中的外军，担任防御诸葛亮的战备值班。这样的任务，是中军难以胜任的。曹魏外军的规模，超过了中军。

三国把外军部署地域，归结为四个方向，给各方向主要领兵官设置相应的东、南、西、北四征、四镇（以上第二品）、四安、四平（以上第三品）等将军官号。官号标志将领镇戍的作战方向及个人资望，仅凭将军官号，不能领兵；领兵须有都督职务。通常，四征、四镇兼有都督官职，是领兵的。

在领导关系上，外军不同于东汉边郡、属国部队。不由边郡和朝廷分级领导，而直接归属朝廷，其将领具有中央官员身份。外军虽然驻在地方，并不是地方兵，必要时即转移驻地，这同地方兵只在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曹操在夺取冀、青、幽、并期间，领地日益扩大，有必要在各地、特别是沿边各地派出部队守备。这些派驻外地的部队，与跟随曹操征战的中军开始有了任务和驻地的区别，由此产生了外军。蜀、吴两国都设置了外军。外军的出现，对加强战备、巩固边防，起着重要的作用。

---

① 《晋书》卷三十七《司马孚传》。

三、州郡兵

州郡兵是州郡统辖的防御敌军、保卫地方、维持治安的地方军，是中、外军的必要补充。东汉末年，州、郡、县、乡到处有兵，并大都陆续转化为各地群雄的武装。曹操在统一北方的征战中，把这些兵收编为中央军，大致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前后，曹占区州郡不再领兵，仅在许多州郡境内驻有外军，但是外军不利于履行州郡兵职责。州郡，特别是沿边州郡不领兵，不利于维护地方安全和秩序。建安十三年，丞相主簿司马朗总结前代军制教训，认为汉末造成黄巾三十六方同时并起的天下土崩之势，根源在于秦废除五等爵制，郡国又无打猎习战的战备制度，建议州郡建立地方兵，对外防备“四夷”，对内威慑“不轨”①。不久，曹操采纳这一建议。到魏明帝时，在将近20个郡内设立了地方兵，除了内地司、冀、兖、豫四州以外，边境八州，即邻吴国的青、徐、荆、扬，邻鲜卑的幽、并，邻蜀国的雍、凉，都设置了州郡兵。此外，内地裴潜、王凌以兖州刺史、贾逵以豫州刺史都曾领兵治军。只是由于国库不足等原因，州郡才不能增设更多的地方兵。由于中央军拥有绝对优势，州郡虽然领兵，不足以构成对中央的威胁，不会重蹈汉末地方拥兵、尾大不掉的覆辙。

蜀国的地方兵是郡兵。犍为郡（治所在今四川彭山）郡兵多达5000以上。建安二十三年，郪（今四川射洪以西）民马秦、高胜起义，聚集队伍数万人，进入犍为郡。太守李严并未征兵，只率现有郡士就平息了。除了该郡以外，其他郡的郡兵不多，所以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事尽管规模不大，一般也都由中央军去平息。

吴国大约在未驻中央军的各郡，都设立了地方兵。吴国农民起义37起，超过魏国和蜀国。为了镇压起义，其郡兵多者一郡四

① 《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五千，一般一二千，少者如赤壁战后黄盖任太守的武陵郡，也有500人。地方兵来源于中央授予，或者地方招募和强征。如吕岱出补余姚长，招募精健，得到千余人。

州郡兵由地方官统领。魏国刺史、州牧、郡太守既领民事，加将军名号后又是州郡兵的领兵官。不兼军职的刺史称作"单车刺史"，地位较轻。每郡设都尉一至二人，是专职军事长官，协助太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边郡设长史，是武职，兼领郡丞（太守的副职）之职。蜀国郡兵由郡太守统领。吴国州郡兵由州郡长官统领。吴国有些郡，军事上划分为准郡级的两部，由各部都尉领兵，如会稽郡设西部都尉，治长山（今浙江金华），南部都尉治建平（今福建建瓯）。

第四节　兵种和军队编制

一、兵种的基本情况

三国时期的兵种，同东汉一样，区分为步、骑、水兵，及少量车兵；不同处是水军空前强大，骑兵主要在内地作战，出现重装甲铁骑，步兵中弩兵的地位突出。

步兵又称步军、徒众。《三国志》卷十二《鲍勋传》注引《魏书》："收徒众二万，骑七百"。其中"骑七百"，是指700匹战马和700名骑士，"徒众二万"同"骑七百"并举，说明"徒众"就是步兵。步兵是人数最多的基本兵种，区分为着铠甲兜鍪的甲卒、甲士，即重装甲步兵，和不披甲的轻装步兵。步兵适应多种气候和地形，行进时一般为徒步，有时也乘船①，装备有矛、戟、刀、弓矢、弩、盾、甲胄，有时也使用手戟、剑和长刀。根据作战的

①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钟会灭蜀后，企图回军攻取魏国洛阳，使"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

不同任务，有了指挥、战斗、战斗保障和后勤等专业兵的初步分工。在指挥方面，有掌幡旗、传将令的幡兵①；在战斗方面，有专司作战的战士②；在战斗保障方面，有类似今天运动保障队的治道者③；在后勤方面，有司军屯的田兵，司军事运输的运兵④。步兵在城战中是主要兵种，也参与野战，由于弩的改良进步，弩兵成了对付骑兵的重要力量。步兵经常同骑兵协同作战，也同水军协同，进行水陆联合作战。

骑兵具有较强的机动和突击能力，配备有马鞍，尚无马蹬，使用矛戟和弓矢。与秦汉骑兵主要在漠南漠北等边地作战不同的是，作战地域主要转移到内地北方。同时，披着铁制铠的"铁骑"、"铠马"，作为重装甲骑兵，也在汉末成建制地出现了。曹操用铁骑5000列的十重阵，"精光耀日"⑤，正是战马披铁铠反光的景象。公孙瓒要求儿子率铁骑5000来易京解围；魏将王昶攻江陵时，缴获了吴国的"铠马"⑥；连敦煌功曹张恭都能调出铁骑200，可见重装甲骑兵在北方较为普遍，在南方的吴国也出现了。

水军又称舟师、船军，战士称舟兵、船兵。舰船配备有固定船位的锤舟石"碇"，即今天锚的前身，以绠、绠继即缆绳系住，沉入水中以固定舰船。船上编有柂工⑦，船工⑧，他们可能是舵手、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时魏军始陈，幡兵适交"。

② 《太平御览》卷五六七《乐部·鼓吹乐》引《魏武帝令》曰："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敌众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

③ 《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钟会"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艾以为"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

⑤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

⑥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

⑦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黄武五年注引《江表传》："谷利令柂工取樊口"。

⑧ 《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溯船，仅乃得渡。"

帆手、水手等专业兵士。作战人员主要装备弓弩、戈矛和甲胄。黄祖以蒙冲挟守沔口时，用弩交射，可见舟兵以弩为远战武器。洞口之战中，吴军有些战船覆没，“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①，可见舟兵近战使用戈矛。董袭与凌统突击黄祖蒙冲的敢死兵士，每人身着两副铠，诸葛亮曾说关羽水军有“精甲万人”②，可见水军兵士经常着铠。水军的一大特点，是与步兵之间区分不严格。水军部队经常根据作战需要，或者投入水战，或者投入陆战，如吕蒙部曲在吕蒙领广德（今属安徽）长时，由于广德不临水，是进行步战；在同黄祖作战时，被用于水战③；西取长沙、零、桂三郡时，回到陆上作战；白衣渡江，偷袭江陵时，再次上了船。水军这一既可陆战、又可水战的特点，显示它的专业性还不强。这是其武器装备简单、战争舞台局限在内陆江河状况造成的，是水兵从步兵分离初期的反映，是有利于节约兵力的。总的看，水军数量空前，已发展为在江淮、江汉间进行作战的关键兵种，有时也出海远征，在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兵种。

车兵没有完全淘汰。不仅魏国立秋日检阅时“大朝车骑”④，证明有车兵存在，而且作战部队出征，也有运车随行。官渡之战中，袁绍有运车万辆。张绣行军时，随行中有装载粮食和甲胄的辎车。曹彰征代郡乌桓途中，与“叛胡”数千骑兵遭遇时，“回车结圜阵”⑤，证明随行队伍中也有辎车。这些运车或辎车的车夫，可能是征调来的民夫，也可能是军中的车兵。曹彰的车夫，随军远征，应是车兵，但《任城王传》说曹彰遭遇敌军时，“唯有步卒千人，

---

① 《三国志》卷五十七《吾粲传》。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证明舟兵也着甲胄。

③ 《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就首”。

④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⑤ 《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传》。

骑数百匹”①，不把随军行动的车兵计入战斗兵力。可见三国时期的车兵，专司运输。由于车兵不再是战斗兵种，数量又极少，所以一般总是忽略不计的。

二、各国的兵种

魏国的基本兵种是步兵，数量最多，发展最早。步兵中，含有数量众多的屯田兵、运兵。诸葛诞起兵时，其主力是淮南淮北屯田口10余万官兵，可见两淮屯田兵的众多。据邓艾称，魏军在淮南出征吴国时，运兵超过一半，可见运兵之多。

魏国最重要的兵种是骑兵，其数量、质量都超过了吴、蜀。骑兵在曹操兼并河南的作战中，还很弱小；在曹操统一河北和北征乌桓后，得到大发展。这是由于河北、辽东是产马区②，曹操从那里获得大量战马；还由于作战中收编了北方群雄的数万骑兵③，吸收了很多乌桓等少数民族的骑兵。由此，曹操的骑兵数量最多，并拥有三郡乌桓那样的“天下名骑”，及曹纯虎豹骑那样的“天下骁锐”。曹魏还获得北方少数民族的贡马、献马。例如建安十年（205年），燕、代献名马；征乌桓时，护乌桓校尉阎柔及鲜卑献名马；文帝时鲜卑步度根献马；明帝时鲜卑轲比能等人来幽州贡名马。贡献所得，都是优良马匹。这也是曹魏保持骑兵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

魏国还发展了后起的水军。曹操企图在统一南方斗争中建立

---

① 《三国志》卷十九《曹彰传》。

② 河北地区产马，见《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幽冀旧坏，铠马所出”。《三国志》卷六十二《胡综传》载吴胡综假托魏都督河北振威将军吴质名义所作的伪降文说，“及臣所在，既自多马”。辽东产马，燕、代产马，见《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典论》“燕、代献名马”。辽东、燕、代，地属幽州。

③ 徐州牧陶谦部下捕曹嵩，出动骑兵数千。公孙瓒在界桥之战中，出动骑兵一万数千。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投入骑兵上万。

水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正月疏浚玄武池，训练舟师。九月，由于收编刘表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①，在当年短时间内拥有了一支可观的水军，使东吴众臣望而生畏。但是曹操来不及消化这支狐疑的水军，就把它投入赤壁之战，结果一触即溃。众多舰船一被黄盖烧于乌林，剩下的担心保不住，再被自己烧于巴丘。到了年底，这支庞大的水军化为乌有。赤壁战后，曹魏重建水军，曹操十四年春三月率军到谯县，制作轻舟，训练水军。魏文帝黄初五年八月演习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六年，率领舟师东征。司马懿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时，在荆州治水军。王昶受任都督荆、豫诸军事时，“习水军于二州”②。由于曹魏不能控制长江，没有大江大湖，水军无大规模的栖身之地，因此重建的水军，只停留在轻舟和较小规模的水平上，不能同吴国匹敌。

蜀国的主要兵种是步兵。来源于刘备初期的招募，徐州牧陶谦的赠予，陶谦死后转属的徐州兵，刘表旧部不愿降曹的荆州军，刘琦病死后转属的刘琦军，收编益州的蜀兵和建国后征来的兵。步兵的精锐是善于山地战的弩兵③。丞相诸葛亮为了抵御魏军骑兵，十分注重弩兵建设。巴地涪陵郡山多险，水多滩，人多戆勇，擅长弩射，诸葛亮调发该郡劲卒3000人充当连弩士，令全家移居伐魏前进基地汉中④。延熙十三年（250年），车骑将军邓芝平定该郡大姓徐巨叛乱，把参与叛乱的豪强徐、蔺、谢、范5000家迁移到蜀地，充当猎射官⑤。仅这两次从该郡强征的弩兵就达到3000人和5000家，则蜀军全部的弩兵至少在一万以上。同时，诸葛亮亲自领导弩的革新。在诸葛亮精心培育下，弩兵具备了较强的战

---

①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

③ 鼂错援引兵法说：“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短刀、剑等短柄格斗兵器）百不当一”（〔汉〕班固《汉书》卷四十九《鼂错传》）。

④⑤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涪陵郡》。

斗力，在木门之战中，乘高布伏，射杀魏国名将张郃。

蜀国的辅助兵种是水军。始建于刘备守樊城时，由关羽统率，活动于沔水之上。曹操逼降荆州时，关羽率这支水军乘船数百艘沿沔水退却，进入长江。刘备步骑兵败于长坂，水军独得保全。到关羽北攻襄樊时，"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①，水军战果颇为辉煌。关羽被杀，这支水军落入东吴。蜀国在益州也有水军，并在夷陵之战中充当前锋。蒋琬当政后，曾企图乘沔水东下攻魏，因此多作舟船，进一步发展水军。蜀国位居吴国上流，吴国对其发展水军特别敏感。吴将步骘、朱然等各上疏说："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②。只是由于孙权通达事理，才没有引起更大的误会。实际上，蜀国守卫国土和北伐主要都不靠水军，它的水军远逊于吴国。

蜀国另一个辅助兵种是骑兵。刘备依附幽州公孙瓒时，其军队中编有"幽州乌丸杂胡骑"③。领徐州后，其骑兵至少超过万人；但经过同吕布、袁术作战，所剩无几。长坂之战中，刘备使张飞率 20 骑拒后，仅同诸葛亮、赵云等数十骑逃逸，两者相加，败后骑兵不过百。蜀国建立后，在据有出产马匹的益州的条件下，建立了一定数量的骑兵。诸葛亮在连衡阵《军令》中，规定了骑兵的动作："令骑不得与相离，护侧骑与相远"④，甘露元年（256 年）春，姜维迁为大将军，"整勒戎马"⑤，宿卫军中也有虎骑营。

吴国最重要的兵种是水军。吴国以长江为主要防线，长江水深江宽，水大不冻，为大规模水军提供了驰骋和栖身的场所。吴国在其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建立起一支规模空前的水军。前期于建安四年（199 年），孙策缴获黄祖儿子黄射的船千艘，又缴获黄

---

①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④ 《北堂书钞》卷一一七《武功部·阵》。

⑤ 《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

祖船“六千余艘”①，创建水军。中期，由于在赤壁、江陵、夷陵之战中收编从曹操、关羽、刘备方面俘获的水军和战船，以及自造了众多舰船，其水军进一步强大。这时拥有大型战船，即董袭所督的五楼船，其上层建筑达五层，修建了永备筑城，还在长江诸要点部署水军。后期，重点提高海上远航作战能力。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将士万人航海求取夷洲和亶洲。亶洲未能到达，到达夷洲。这是中国大陆人到达台湾的最早纪录。嘉禾二年(233年)，又派张弥、许晏、将军贺达等人率兵万人沿海路北上辽东。赤乌五年(242年)，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兵3万征讨今海南岛之珠崖、儋耳。以上行动，每次人数达万人、3万人，实际上是组成了庞大的舰队出海，说明具有良好的航海技术和近海作战能力。水军的战法，主要是实施弩攻、火攻和登陆作战，即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②。登陆作战大都以水路为依托，掩敌不意，实行打了就跑的战术，离岸不能深入过远。

吴国的重要兵种是步兵。步兵在前期是主力兵种。孙策转斗江东，无不依靠步兵。偷袭刘勋时，一次作战出动步兵2万。孙权统事以来，在大力发展水军的同时，继续发展步兵，以其配合水军守卫边境，在内地镇压山越。

吴国最薄弱又极力企图发展的兵种是骑兵。吴国发展骑兵极其困难，主要是缺乏战马的来源。“大皇帝（孙权）以中国多骑，欲得骑而当之”③，艰苦地开辟了四个马源：一是蜀国。邓芝来东吴谈判复盟时，送来战马200匹。后来孙权要求蜀国使者回去告

---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张勃《吴录》载策表，称建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进攻江夏太守黄祖的作战中，俘获“船六千余艘”。按，此次及上次缴获黄祖的船共7000余艘。以一郡而拥有船只如此之多，令人生疑，所谓“六千余艘”出自孙策向献帝所上之表，鉴于“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三国志》卷十一《国渊传》），很可能是夸张之辞。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注引《吴录》。

③ 《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弩》辑《会稽典录》引“钟离牧谓朱育曰”。

丞相，为诸葛恪送来好马。诸葛恪谢恩说，蜀国是“陛下之外厩”①。一直到蜀亡前夕，吴主孙休还派薛珝到蜀国求马。二是魏国。孙权袭杀关羽帮魏解围以后，派王惇去魏国买马。后又同意用珠玑、翡翠、玳瑁与魏文帝交换战马，说：“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②把战马看得比珍宝更重要。此外，还在作战中缴获曹魏的战马。如周瑜用柴断夷陵道，从曹军处缴获战马300匹。三是辽东。孙权所以不顾举朝大臣反对，派使者渡海赐辽东公孙渊九锡备物，一个重要原因，是企图通过宠待他，向辽东曲意求马。四是交州。吕壹任交州合浦太守时，贡马数百匹。上述四条渠道，前三条仰赖于人，所得有限，后一条渠道交州，虽然在东吴境内，却不是主要产马区，所得同样有限，因此吴国无法彻底解决马源，骑兵也始终是个弱项。

从上述情况看，三国的兵种结构各具特色。魏国以步骑为主，拥有最强大的骑兵，终能驰骋中原，统一北方；但是面临浩瀚的大江，战骑千群，无所用之，盖因水军弱小。蜀国以步兵为主，拥有较强的弩兵，便于北伐中进行山地作战；但是骑兵不如魏军，因而北伐中不敢长驱直进。吴国水军强大，迫使魏人临江而叹；但是缺少骑兵，只能限江自保，不敢深入北土作战。魏、蜀、吴兵种结构的特点，是造成三国鼎立的重要军事原因。

三、军队编制

军队编制情况，在曹操《步战令》中，有初步反映。《步战令》说：“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③这说明在编制序列中，各级长官自下而上依次是伍长、

①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③ 《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引曹操《步战令》。

什长、都伯、部曲将。伍、什和都伯所领三级，是基层。最底层编制是伍，辖五人，设伍长一人；二伍为什，辖十人，设什长一人。什以上是都伯所领第三级，两汉称之为队，三国大约也称之为队。根据二、五递进惯例至什应以五递进，队辖五什，为50人，都伯即为队长①。于禁投奔曹操授职都伯，是当了队长，以50人起家。从队往上，进入中层编制序列。队的上一级是屯，因为两汉队上编为屯，三国有屯将②，可知三国队上是屯，队以二递进，所以屯辖二队，为100人。百人将③、百人督④，均辖百人，应是屯将的别称。屯的上一级是曲。因为两汉屯上编为曲，三国有曲长⑤，可知屯上是曲。屯以五递进，所以每曲五屯，为500人。曲的上一级是部，因为三国同秦、汉一样，部曲连称，可知曲上为部。曲以二递进，所以每部二曲，为1000人。刘备攻广石，“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⑥，每部正是千余人，千人督（见前）为部的长官，又称牙将。由此可知《步战令》中的部曲将，系中级军官总称，指屯将、曲长、千人督。综上所述，平时编制序列，是部、曲、屯、队、什、伍六级。

战时，以平时编制为基础，根据敌情、任务和兵力，临时编组为规模较大的作战部队，由具有官号的中、高级武官统率。从于禁的晋升可知，这些官号序列为都尉、校尉、裨将军、偏将军、将军。一般来说，都尉可编组一曲或数曲，领兵500或500人以上。典韦为都尉，“将亲兵数百人”⑦。张辽为骑都尉，领兵千余人。

---

① 清人梁章钜说：“都伯即队长”。见《三国志集解》卷十七《于禁传》卢弼注引。

②⑤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载《后出师表》：“然丧赵云……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

③ 《三国志》卷九《曹纯传》注引《魏书》：“或从百人将补之”。

④ 《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注引《魏略》：“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⑥ 《三国志》卷十七《张郃传》。

⑦ 《三国志》卷十八《典韦传》。

乐进为军假司马、陷阵都尉，领兵千余人，则各编有二曲。校尉一般编有一部，所领兵同于千人督①。于禁在校尉任上从征张绣，军败，"禁独勒所将数百人，且战且引，虽有死伤不相离"②，可见于禁作为校尉，这时有残兵数百人，相当千人督。校尉有时编有二部。官渡之战中，曹操"遣步卒二千人，使禁将"③，则校尉于禁编有二部。将军编有的兵力视情而定，都过千，称为一军。一军是编组的最大建制单位。以上是步兵的编制，骑兵和水军编制不详，大约同步兵相去不远。

---

① 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千人督校尉。洪注曰：诸传但称校尉者即是"。

②③《三国志》卷十七《于禁传》。

第十五章　变革中的军制（下）

第一节　多种集兵方式

三国时期的兵役制度，在汉末为多种集兵方式并存，在三国鼎立期间发展为以世兵制为主。汉末，是兵役制度走向变革的过渡时期。这时传统的征兵制由于基础遭到破坏，只能充当集兵的辅助方式。群雄兵源主要来自募兵，同时广开门路，通过征兵、收降和以少数民族为兵等多种方式集兵。这个期间兵役制度的特点，是集兵方式和兵源都呈现多样化。

一、募兵

募兵是汉末群雄主要的集兵方式。汉末，由于出现了大批战乱造成的背井离乡的流民和失去土地的游民，为募兵创造了条件。这些急于寻找出路的过剩人口，同急需大量兵员的群雄一拍即合。而且自从董卓实行废立以后，群雄找到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募兵的借口，募兵便一发而不可止。连不参与中原混战的益州牧刘焉，都从南阳、三辅数万流民中招募组建东州兵。曹操、刘备等不掌握地盘和户籍、没有资格征兵的群雄，在开始割据时，更只有募兵这一方式可用。

募兵是汉末建立私家武装的重要手段，分为私募和公募。私人出资募来的兵，是募主所雇佣，依附雇主，成为其私部曲，兵归将有，是理所当然的。公家募来的兵，为国家所有，有时却落入招募将领私人掌握，成为官部曲。董卓之乱前，张杨、张辽、乐进奉大将军何进派遣，回本州募兵，各得千余人。兵募得而何进失败身死，所募

之兵长期跟随这三个招募者，转化为他们的官部曲。张杨之兵，衣粮都由其筹集解决，进一步转化为他割据一方的私部曲。

募兵是一方出资一方出人的自愿交易，但人民有时不愿应募，于是经常强募。袁谭在青州募兵时，放兵搜捕，犹如猎取鸟兽。三国建立以后，游民和流民减少了，一般人民更不愿意应募。嘉禾六年（237年），吴将周祗在鄱阳招募，激起民变被杀。吴国骆统认为，募兵在民间助长邪恶，败坏风俗，促使民众产生叛心，应该紧急取消。孙权同他反复争辩，终于同意他的意见。

二、征兵

征兵制开始实行于西汉，以国家拥有广大的自耕农和掌握众多的户籍为基础。东汉没有明令废除征兵制，但是也长期没有实行。到了汉末，豪强地主庇护大量依附人口逃役，自耕农和国家户籍的数量迅速减少，战乱中版籍不修，因此征兵制更加衰落，一般人民已不知征兵为何物。北方豪强势力最强大，征兵制首先在那里衰落了。建安年间，曹操强制恢复征兵制，遭到豪强地主顽强抵抗。豪强地主、济南郡主簿刘节，拥有千余家宾客，族中人从来不服兵役，县吏担心征不到兵出现空额，也从不敢派他家服役。菅长司马芝依法摊派他家服兵役，他把应征的宾客王同等人藏起来。司马芝驰檄济南，向太守列举刘节罪状，太守令刘节代替王同服役，成为轰动的新闻，青州称司马芝“以郡主簿为兵”①。对征兵的抵制，甚至来自曹操的亲信。军中豪右曹洪的宾客，在县界不肯依法服兵役。长社县令杨沛，先挝折逃役宾客的脚，然后杀掉他。司马芝、杨沛这样的强项令终究是少数，征兵制推行得异常艰难。曹操去世后，魏国基本不征兵了。

吴、蜀豪强势力略弱，征兵阻力相对较小。吴国在江陵和夷陵

① 《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之战期间大量征兵。百姓不愿应征，征兵弊病丛生。吴将骆统上疏揭露说，吴国前后被征当兵的人，活着时候困苦，没有温暖，死后埋在外面，骸骨不能返乡，所以更加留恋本土，害怕远出，远出等于死亡。每有征兵，贫弱老实在家的、行动有牵累的人先征去当兵。人们稍有财产，便行贿，不惜倾家荡产。行动轻捷的人则逃入险阻，投靠“群恶”，结为一党。孙休诏书也提到，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有的在郡县当吏，有的被征兵，还要缴纳限米。吏家如此，自耕农当更恶劣。征兵给吴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蜀国也实行了征兵制。刘备争夺汉中时，紧急要求后方发兵（征兵）。诸葛亮令杨洪领蜀郡太守征兵，是实行征兵的明证。根据战争需要，征兵率很高。巴西郡户在1．2万上下①。夷陵战后，太守阎芝向各县征兵5000补充损失。两户出一丁，比例相当高。到了北伐期间，又需要征更多的兵。诸葛亮虽然政治清明，仍然不能避免“西土苦其役调”② 问题。吴、蜀的征兵制不是严格的征兵制，因为征来的兵不能及时复员。大势所趋，征兵制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也趋于衰落。

三、收 降

收降是打了胜仗的群雄的扩军方式。他们以宽大的政策，吸引降兵自愿归附。孙策攻下扬州刺史刘繇所在的曲阿后，宣布刘繇等故乡部曲来投降的，一无所问；乐从军的，一身从军，免除全家赋役；不乐从军的，不强迫。结果十天之内，降兵四面云集，收降现兵2万，超过其原有兵力。魏国泰山太守吕虔到职后，开恩布信，推行宽大政策，藏窜山中的袁绍残部和人民，走出山中，安土乐业。吕虔简选其中的强壮者补为战士，泰山于是有了精兵，名冠诸侯。对降兵的宽大政策，不仅体现在收降时，还体现在收

---

① 《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降以后。曹操收编青州黄巾后，一直给予较大照顾，不打乱其原有建制，使青州兵产生了信赖，跟随曹操征战二十多年。如果降兵对于收降者不予信赖，收降成果就不能巩固。曹操收编刘表降兵七八万后，由于未作好安抚就率领他们同孙、刘联军作战，降兵尚自怀着狐疑，一遇火攻，即作鸟兽散。

四、以少数民族当兵

汉末以来，内地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关中戎狄居半数，并州匈奴五部户口上万，幽州并州杂有乌桓，吴、蜀境内有夷、越。这些少数民族，成了社会上重要的兵源。割据者通过征、募，积极在他们中集兵。

在北方，曹操、袁绍、公孙瓒等人，都征调匈奴、鲜卑等族人民当兵。袁绍统一河北时，收取乌桓精锐骑兵。曹操征服乌桓后，率领乌桓侯王、大人、种众跟随他征战，从此三郡乌桓成为天下名骑。梁习领并州刺史时，征发边境胡狄充当义从①、"勇力"，胡狄不应征，就用武力征讨。经过曹魏多方的搜罗，魏军中有"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和"武都氐羌"等各族兵士②。

在南方，军队中少数民族兵也很多。益州有叟兵③，荆州有夷兵④，蜀国有从涪陵郡（治今四川彭水）蛮人中征来的连弩士。吴国不仅从交州少数民族中集兵，如刺史陆胤在压平九真郡（治胥

---

①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建安十一年正月条"义从"，胡三省注，言其以义从军也。

② 〔魏〕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见〔南朝梁〕萧统《文选》卷四十四。

③ 《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

④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

浦，今越南清化）夷人和苍梧建陵（今广西荔浦西南25公里）“贼”的作战中，集少数民族兵8000余人，孙休使者邓句，敕交趾太守征发锁送诸夷人当兵，而且大规模地从山越族人中集兵。山越是古越族的后裔，包括进入深山逃避赋役的汉人，不在吴国的编户之内。他们分布在今安徽歙、黟、休宁，浙西淳安、遂安，江西德兴，上饶、永兴，福建崇安、建阳等县的深山中。这些地区有的周围数千里，山谷万重，而且山出铜铁，人民能够自铸甲兵，好武习战，登山越险，如鱼得水，如猿在木。从建安五年到吴嘉禾六年（200～237年），前后38年间，孙权一再进攻山越，大规模地俘获其人口，对他们采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政策①，有强丁的户令其服兵役，缺强丁的户补充为民户。吴嘉禾三年（234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时，以分兵扼守郡内险要之地封锁山越，不同其交锋。等待其庄稼成熟以后，纵兵抢收，制造其饥饿，迫使其出山求活，然后把其中的精壮者4万人选为兵士。

以少数民族当兵，缓解了汉族人口锐减同兵员需求激增之间的矛盾，为各国补充了紧缺的兵员。吴国以山越人为兵，得到精兵十几万，约占其总兵力23万的60%以上，是达到足额的决定性措施。②其次是利用少数民族兵独有的特长，提高军队的质量。曹操的“天下名骑”，诸葛亮的连弩士，是善战的特种兵，都是由游牧族、山民所组成。吴兵吸收山越族兵以后，剽悍善战，成为劲

①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② 《三国志·吴书》记载获取山越为兵的数目如下：陆逊破丹杨费栈，“得精卒数万人”，攻鄱阳吴遽等“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攻建安、汉兴、南平郡洪明等“料出兵万人”，平豫章东部彭材等“众万余人”，“拣其精健为兵”，攻鄱阳尤突“料得精兵八千人”；凌统“东占且讨之（山中人）”，“得精兵万余人”；全琮讨山越，“因开召募，得精兵万余人”，在东安郡山民暴动时，“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张承在长沙西部“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诸葛恪为丹阳守时，预计“三年可得甲士四万”，至时“人数皆如本规”；顾承在吴郡西部“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等等。以上是有数字记载的，加上没有数字记载的和零星小批的，总数应当更多。

卒，以至华覈认为北方“欲以十卒当东一人”①。此说未免夸张，但补充山越兵后，吴兵更加善战是肯定的。

第二节　世兵制

一、世兵制的形成

建安后期，社会渐趋安定，过剩人口减少，大量招募、招降已不可能，征兵制不能普遍恢复，现有兵士如果复员，会制造出一批新的无土地农民，影响社会稳定。在征兵、募兵都行不通的形势下，一种新的兵役制度——世兵制应运而生，不约而同地在魏、蜀、吴得到推行。

世兵制采取当兵世袭形式。这种形式萌芽于西汉。西汉时，汉武帝取从军死难者子孙养在羽林，教五兵，号称“羽林孤儿”②；虎贲诸郎，羽林左右骑，也都是父死子继，固定为汉制。羽林孤儿等虽然世袭，但属于募兵，从法律上说，可以世袭当兵，也可以不世袭当兵，也没有在民籍之外另立户籍。这一汉制，没有发展为世兵制，只是它世袭当兵的形式，被世兵制继承下来。

世兵制的诞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演变的第一步，是从两汉的征兵制，过渡到汉末的多种集兵方式。这时募来征来的兵，服现役期限不再是征兵制规定的两年，而变为长期的以至终身的；当兵从尽义务，变成谋生的职业；服兵役由人人有义务，变为一部分人的职业。建安后期，是演变的第二步。这时，兵士家属集中到一起居住，既留作人质以防兵士叛变，又便于管理；兵与民的户籍也由此分开，出现了兵户；当兵由及身而止，逐渐变为世袭。兵户和世袭兵大量出现，成为时代的潮流，新的世兵制

---

① 《三国志》卷六十五《华覈传》。

②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也就形成了。

三国鼎立期间，世兵制发展成为魏、吴主要兵役制度。证据是：吴建兴二年（253年）太傅诸葛恪指出，魏国曹操时候的兵员，到今天恰好消耗完了，后生者尚未完全长大，正是魏军衰弱兵少尚未强盛之时。又说，吴国唯有这些现有兵员可以定大事，而现有子弟数量不足言。以上诸葛恪计算魏、吴的后备兵员时，只着眼于兵户的后生子弟，不及其他，说明根据那时魏、吴兵役制度，不允许撇开尚未长大的兵户子弟，另行征召丁壮当兵。这证实魏、吴兵役制度已演变为世兵制。晋灭吴后，扬威将军朱照日上报"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①。兵户数目可观有力地证实世兵制成为吴国主要兵役制度。蜀国只在部曲和少数民族兵中实行世兵制。刘备入蜀的军队多是北方兵，入蜀后同其家庭一起转为世兵较为自然。少数民族兵多为诸葛亮南征中收降的，也转为世兵了。

在东吴，同世兵制配套，还实行了世袭领兵制。规定将领享有领兵权，并且代代相传，将领死后，子弟接替统领父兄故兵。由长子、长孙世袭；无子，由弟继承；子弟幼弱，或有罪，经吴主指定，由别人暂为代领，一经子弟长大或有罪赦免，经吴主批准，即归还故兵。世袭所领之兵，来自私家部曲，或吴主授兵、给兵。将领对所领的兵，有世袭领兵权，没有所有权，因此当无子弟、或子弟有罪得不到赦免时，国家即将其世袭领兵权收回。世袭领兵制使兵将结合空前紧密，并促进部队战斗力提高。在三国中，只有吴国实行此制。这同孙氏政权地位比较软弱有关。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如曹操；对于士人号召力，又不如刘备；孙氏家族是江东次等大族，地位不高。为了在这一不利形势下争取众将支持，实行了此制。此外，还有地域方面的原因。汉末淮南、江东一带，私兵化倾向严重。孙策向淮南袁术索取父亲故兵，袁术虽然不情愿，也不得不勉强归还千余人。这说明在淮南一带的公

---

① 《后汉书志》卷十九《郡国》一注引《帝王世纪》。

论，是儿子有权继承父亲故兵，反映当地部曲私有化突出。这正是孙氏推行世袭领兵制的社会基础。

二、世兵制主要内容

三国世兵制，史家又称为士家制，主要内容是：

1、兵士终身当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世代代为国家尽当兵义务。国家主要兵源，是兵士子弟，即“士息”。兵士不得解除世代当兵的义务，除非在作战中有突出表现，经过特殊手续批准，做为奖赏方可。例如魏嘉平二年（250年），合肥新城被围，兵士刘整、郑像出围传递消息，被俘不屈，向城中大呼救兵已到，以安定守城人心。经魏帝齐王芳下诏批准：“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① 一般兵士解除当兵义务，根本不可能。

2、兵与民分离。兵士之家即士家，另立专项管理的户籍，称为士籍，或兵户、军户。全国户籍形成三类：一类普通民户，一类屯田户，一类军户。民户和屯田户，不再服兵役，兵役完全由士籍承担。入了士籍，不允许改为民籍。

3、兵士的家属，集中居住，集中管理，实际是作为人质。

4、为了保证兵士人口的再生产，士家在内部婚配，不与平民通婚。士息没有征召入伍前，从事屯田，称为田兵。士家屯田，是军屯的一种。田兵具有兵家和屯田客双重身份，受双重剥削和压迫。

在曹魏，士家制最典型，并同质任制、错役制相结合。由于曹占区大多被袁绍等群雄盘踞已久，曹军又是众将家兵、部曲的联合，因而曹操部队容易发生兵士逃亡、举部叛变的问题。为了进行防范，收取指挥如意的功效，曹操以控制将士家属相要挟。建

---

①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

安九年（204年），曹操攻陷邺城后，大局已定。为表示无二心，臧霸、孙观送来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李典送来部曲宗族1．3万余口，田畴送来家属、宗人300余家，领并州刺史梁习送来曹军中原豪酋私家部曲家属数万口。曹操开始大规模地实行质任制，令上述兵士家属集中居住在他所在的邺城，进行严密控制。魏文帝定都洛阳后，不顾洛阳蝗灾引起的粮荒，坚持要把10万户士家从邺城迁到洛阳。在群臣的反对下，仍然迁了一半。曹魏为了进一步控制兵士，还实行了错役制，“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①，使服役的兵士长期远离亲人和故土。

吴、蜀兵士家属也集中居住，但一般随军，并不实行错役制。关羽镇守荆州时，兵士家属集中居住在江陵。吴将朱桓督濡须，兵士家属集中居住在濡须中洲。由于家属随军，朱桓才有条件认识上万口部曲的妻和子。

与世兵制配套的还有番休制，又称分休制。兵士终身当兵，家属不随军，有必要给假团聚，以保证兵士人口再生产及有时间务农。国家规定兵士以十分之八的比例承担作战、战备或屯田任务，十分之二的比例返家，轮番休整。如邓艾规划在淮南屯田时，建议“令淮北屯两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② 蜀军家属虽然随军，但不能随军北伐。诸葛亮大军出祁山作战期间，也实行番休制。北伐军按制度应有十分之二轮换返家番休，以其余8万留在前线。当时正同魏军交战，急需兵力，参佐以魏军强盛，都主张暂停番休一个月，以加强声势，诸葛亮坚持按制度立即番休，催令该番休的立即返家。番休兵士深受感动，愿留下一战，不去的也人思死战，相互说：“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③。说明坚持此制，大受兵士的欢迎。

世兵制是三国的一大创造，是在天下残破、户口锐减、征募

---

① 《晋书》卷四十六《刘颂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

都难以大规模实行的困难条件下诞生的新制度。这一制度适应了三国的历史条件，有利于保障国家获得固定兵源，提高兵员质量。兵员质量是严重问题。此前，东汉罢郡国兵以来，临时有事征来的兵，来不及训练就用于作战，所以每战常败，王师不振。同这种情况相比，士家当兵是世袭职业兵，作战经验丰富，作战技能提高，重新恢复了较强的战斗力。世兵制吸收游民和流民，使之举户依附国家，从死亡线上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通过终身当兵和家属屯田解决生计，对他们是有利的。世兵制通过以众将部曲的家属为人质，加强了对众将的控制，抑制了军中豪强拥兵割据的倾向，保证了军队的集中统一，对于结束群雄割据、形成三国鼎立和全国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世兵制虽然有上述种种优点，也有不少弊端，它使军队中人身依附关系，由量变发展到质变；一代兵士衰老后，子弟未长大，国家兵源有时会出现断层；当士家缺少后嗣时，国家又将出现缺少后备兵员的危机；士家身份后来逐渐降低，挫伤了兵士当兵作战的积极性。

第三节　军法和赏赐

一、军　法

三国时期针对兵将战败、叛变、逃亡和敌人投降，制定相应军法。以魏国为例，有如下的军法：

败军法。建安八年（203年）邺城之战失利后，曹操颁布命令，惩治将领战败和失利罪。命令说：《司马法》规定，将军临阵退却处死刑。所以赵括母亲事前请求不因赵括战败而连坐。这证明，古代将领战败于外，其家属受株连于内。自从我遣将出征以来，只赏战功，而不罚罪，这不符合国典。现命令，诸将出征中，战败者抵罪，失利者免去官爵。

士亡法。旧法规定，士兵逃亡，将被缉拿，军队出征中，本

人逃脱，“考竟”（在狱中拷问至死）妻子。当时天下草创，士兵逃亡较多，特别注重士亡法。曹操《步战令》规定：临阵“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① 即家中人一天内不把作为逃兵的亲人抓起来报告，统统要被杀掉。

将叛法。魏法规定，城被攻，守将投降，亲属连坐。陈仓被围，守将郝昭不投降，对诸葛亮派来劝降的乡人说：“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门户重”（家族中人口众多），受株连广，你不必再劝说了。② 魏法又规定，被攻超过一百天，救兵不到，“虽降，家不坐也”③。将领没有叛变，却因部下叛变失地，将领也要追究责任。南安、天水两郡太守没有降蜀，却坐两郡“应亮破灭”，“各获重刑”④。

杀降法。曹操有令：“围而后降者不赦”⑤。陈宫被俘，曹操劝降，陈宫不降，说：“请出就戮，以明军法。”⑥ 叛将昌豨被困后，前往魏将于禁处投降，于禁含泪斩了他。诸将本以为，既然投降了，大可送到曹操那里听候处置。于禁说，诸位不知道曹公的命令吗！奉法行令，是事奉上面的节操，昌豨虽然是我的旧交，于禁难道可以失节吗？

此外，关于战阵、行军、宿营、通信，也都在战术、技术上作了严格规定，以军令形式颁布执行，将在战术一章中介绍。

制定军法时，体现了下述原则：

以法治军的原则。曹操等人认为，治理乱世，礼治不能奏效，拨乱世反之正，以刑法为先。诸葛亮针对益州刘璋威刑不肃，也主张为治之要，在于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三国都企图通过制

---

① 《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引曹操《步战令》。

②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

③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魏略》。

④ 《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注引《魏略》。

⑤ 《三国志》卷十七《于禁传》。

⑥ 《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典略》。

定和完善军法，加强对将领和兵士行为的控制，以求提高战斗力。孙权说，设置法令，是为了“遏恶防邪，儆戒于未然”，通过“威小人”，达到“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的目的①。东吴的军法，有时严到非常残酷的地步。一个兵丁健儿，只因为盗了一百钱，就要绑赴市中行刑②。

人不违禁的原则。三国一般倾向乱世用重典。在实施中，以人不违禁为依归，不是越重越好。鉴于士亡法不能制止兵士逃亡，曹操企图加重处罚。有军中鼓吹手宋金在合肥前线逃亡，主事者奏请把宋金母亲、妻及两个弟弟杀掉。高柔对曹操说，我私下听说逃亡兵士中，经常有后悔的。我以为应该宽恕他们的妻子，一可促使敌军不信任亡士，二可诱发亡士返回的念头。用士亡法已经绝了他悔改的愿望，再加重处罚，恐怕今后军中兵士，见一人逃亡，诛杀将连及自己，也将相随逃亡，想杀也杀不着了。这样的重刑，不是用来制止逃亡，反而加速了逃亡。曹操同意，不杀宋金家属，救活了很多人。

有罚有恕的原则。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立法的宽严。大体说来，当割据者初起，胜负不分，自身弱小，人心去留未定的时候，一般偏于宽恕。到大局初见眉目后，则偏重于严格。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前，对将领作战只赏功，不罚罪；官渡战后，说以前的作法不是国典，宣布了败军令。建国以后，乱世大体结束，逐渐废止一些重刑。如魏国侍中高堂隆，就当时法律过于深重上疏，说用刑是末，尊崇礼乐是本。刑法所以未能废弃，是因为不本大道。不应该忽视礼乐而偏重刑法。吴国陆逊对太子宾客谢景欣赏魏臣刘廙先刑后礼的理论，也大加呵责，认为刑法严峻，造成下面犯法的人多。天下尚未安定，应当稍施恩惠，安定下情。除非犯有不能容忍的过失，否则都应给予效力的机会。不要严刑酷法，也不要有罚无恕。吴国督将亡叛，历来杀掉妻和子，但仍不能制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② 《三国志》卷五十二《顾雍传》注引《吴书》。

止逃亡。黄武七年（228年），翟丹又叛逃魏国。孙权害怕诸将跟着畏罪逃亡，下令减轻重刑，规定诸将有三次重罪，然后议罪。①赤乌七年（244年），又下诏废止将叛法，说，将叛杀其妻和子，这样做，使得妻子离开丈夫，儿子抛弃父亲，太伤义教。从今以后不再连坐杀妻和子了。②

执法时有很大难度。因为军中的豪强较多，各有部曲，部曲内部又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宗族、婚姻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三国的统治者执法决心较大，在执法时表现出如下的特点：

比较严明。蜀将马谡，街亭战败，论法应斩。但人们认为，他是"智计之士"③，天下未定，杀之可惜，同时与诸葛亮的私交也很好，但是诸葛亮决心斩马谡来维护军纪。吕蒙征荆州，麾下士拿走民间一个斗笠，覆盖官铠。官铠虽然是公物，吕蒙还是认为违犯了军令，不可以由于是同乡而不依法办事，流着泪把他斩了。结果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比较公正。诸葛亮对于触犯和怠慢法令的人，一定惩罚；对于坦白的人，罪行严重，也一定释放；对于用假话掩盖的，罪行较轻，也一定杀戮。为了做到公正，在北伐前线，亲自过问军中的执法，罚杖20以上的，亲自披览，累得饭都吃不下。他惩办李严、廖立，废他们为平民，李、廖没有怨言，在他身上寄托着希望。听说他去世，廖立流泪叹道，我永远只能穿夷狄之服，没有出头之日了，李严则发病而死。李严经常希冀诸葛亮让他改正错误，回去作官，估计以后的人不能做到，因此心情激荡悲愤。诸葛亮刑法严厉，却没有怨恨的人，都因为执法无私，用心公平，劝诫分明。

带头律己。曹操的坐骑，行军中腾跃跑进麦田里，违犯了不得损害麦田的命令。曹操召来主簿议罪，主簿回答说，春秋之义，刑罪不能加于尊者。曹操说，我制定法律，自己带头违犯，拿什么统率部下？然而我是军帅，不可以杀自己，那就惩罚我吧。于

①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谡传》注引习凿齿《襄阳记》。

是拿剑割了头发扔在地上，当时割发是一种严厉的刑罚。街亭失利，直接原因是马谡违背节制，诸葛亮引咎自责，认为自己用人不当，上疏请自贬三等，由丞相降为右将军，并把失误布告天下。蜀后主延熙十九年（256年），姜维北伐，在段谷大败，请求自贬，削职为后将军。

培养按法律办事的观念。曹仁少年时放荡不检，作将领后严格奉行法令，把律令科条放在左右照章行事。曹操儿子鄢陵侯曹彰北征乌桓行前，哥哥曹丕写信告诫他说，做为将领遵守法律，不应当像征南将军（曹仁）那样吗！

二、赏赐

三国时期把赏赐看作与法治并行的"军之大事"①，以赏赐表彰战功，激励奋勇作战，团结众将，解决将领和部队的实际困难。

赏赐对象，主要是从战争需要出发，赏功能，赏斗士。有些人提出，军吏虽有功能，但论德行，不足以任郡国官职。曹操把这种论调讥为"以管窥虎"。他主张"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赞成管仲说的，"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认为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受禄赏，不能立功兴国，所以"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②

在赏赐对象上，曹操重赏谋功，往往超过赏野战之功。他指出古人就是以帷幄指纵的谋功为首功，以攻拔之捷的野战之功为下功。其次是重赏主动归降。由于荆州降将蒯越、张鲁功曹阎圃等在劝说刘琮、张鲁投降或不称王时，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曹操封蒯越等15人为侯，封阎圃为列侯。史家习凿齿高度评价这一做法说，阎圃劝张鲁不要称王，而曹操追封他，将来的人谁不想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汉魏春秋》。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庚申令。

归顺？这种做法，是塞其本源，末流自止。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去重视冲锋陷阵的“焦烂之功”，丰厚的赏赐仅仅给予“死战之士”，那么风俗就会倾向去争战，就会干戈不止。习凿齿认为，曹操对阎圃这一封赏，可以称得上是知赏罚之本①。

三国的赏赐，有爵赏和经常性的赏赐两种。爵赏是基本的赏赐制度，起源于先秦，衰落于汉末。为此，曹操重建了军功爵赏系列。这个系列中，最高的是封爵。建安十二年（207 年）曹操发布丁酉令，自称起兵 19 年来，所征必克，乃贤士大夫之力，自己不可专享其劳。他擅行天子封爵大权，大封功臣 20 余人为列侯。建安十三年（208 年）九月，论荆州迎降之功，封侯者 15 人。此后，曹魏的主要将领陆续被封为列侯，食邑百户、千户至万户不等。其中食邑积至 2000 户以上的，有邓艾、钟会、满宠、王基、王昶、毌丘俭、诸葛诞、张郃、臧霸、郭淮、张辽、徐晃、夏侯惇、张绣等人，建立平蜀功者食邑最多，钟会增邑至万户，邓艾增邑至 2 万户。这些封侯者，向食邑的封户征收租税，充作个人收入，并可世袭。还有一种爵赏是赐爵。建安二十年（215 年）十月曹操设置从名号侯到五大夫各级爵位，建立了赐爵系列。其中，名号侯级别较高，爵第 18 级；以下依次为关中侯，爵第 17 级，都是金印紫绶；关外侯，爵第 16 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爵第 15 级，铜印环纽墨绶；以上 4 级同封爵不同，都无邑，不食租，是虚封，主要是给予政治地位。加上旧封较高的第 19 级关内侯、第 20 级列侯（实封），赏军功的爵位共 6 级之多。赐爵者不享有封国和食邑，权利比封爵差得很多，但是有罪可减。

经常性的赏赐，是爵赏的一种补充。通常的作法是：当元帅出征，大将出屯、振旅、建立大功时，往往赏予荣誉。如魏文帝派张辽还屯合肥时，给张辽母亲舆车及兵马，敕令送到屯上，当她到达时，导从出迎，所督将吏，都要罗拜道旁，观者以此为荣耀。作战胜利后，则赏赐实物，以解决部队所需。诸葛恪东兴之

---

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习凿齿曰”。

战取胜后，吴主孙亮赏赐金100斤，马200匹，缯布各万匹。当将领家内饥乏时，赏赐实物，使其家庭小康或富裕。吕岱在交州，后方妻子饥乏。孙权责备群臣不能反映情况，于是赏赐其家钱、米、布、绢，每年有定数。魏国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吴国右护军蒋钦等，也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受到赏赐。当将领患病时，则赏以上好的医疗和药品，给以荣耀。

在赏赐时，曹操等人坚持赏必信的原则。一是肯定部属功劳，不掠下面之美。曹操多次上表赞扬荀彧、荀攸、郭嘉等人的谋功，指出自己能够战胜敌人，建立功业，都是靠的他们的谋略，甚至把他们扭转危局的谋略，一件一件地指出来，说自己不及。二是曹操等坚持重赏。攻城拔邑，得到美丽之物，全部拿来赏赐有战功的人，自己的生活则比较节俭。三是坚持该赏的赏，不该赏的坚决不赏。史称曹操对该赏的，不吝惜千金；没有功劳还想受赏的，分毫不给。诸葛亮在赏赐中，也坚持无善不显，无微不赏。

第四节　教育训练

一、军事教育

由于承平日久，汉末割据者初起时，一般都缺乏军旅之才，临锋战斗，不知所措。为了学习战争规律，提高将帅战略战术素养，向子弟传授军事斗争知识和技能，三国都很注重军事教育。孙权说过，担任要职的人应当学习，以便得到启发和受益。由于比较重视，军事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制度。

军事教育的对象，是将帅或可能成为将帅的人和储君。首先，割据者作为统帅，自觉进行学习。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①。说长大而能勤奋学习者，只有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我和袁遗（山阳太守，关东州郡起兵者之一）。孙权自称统事以来，阅看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裨益。其次，要求将帅学习。孙权向悟性好的吕蒙及蒋钦指出，你们现在都当权管事，应当学习以提高自己。曹操在将领中普及军事学术。王沈《魏书》说，曹操"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① 再次，引导将领子弟和储君学习。吴将凌统死后，孙权把他两个八九岁儿子凌烈、凌封养在宫中，"十日一令乘马"②。储君以接受军事教育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军事教育的对象，仅限于少数人。建安年间，法律禁止将领以外的人藏兵书。即使曾任县令的吉茂，家藏兵书，仍然违法。在乱世争雄的年代，兵法的传播受到严格的控制。

军事教育以兵法、军事历史和军事技艺为内容。曹操要求他的将领理论上熟悉《孙子》和《孟德新书》，实践上学习他所进行的战争。曹植谈到其父曹操在战争经验方面对他的培养时说，"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③ 曹植曾有望当储君，曹操把他带在身边，随时指点兵法运用之妙。所以曹植说："故兵者不可豫言，临难而制变者也。"④孙权指示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史是《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当时通行的东汉史）。刘备要刘禅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商君书》。诸葛亮为刘禅抄写《申》、《韩》、《管子》、《六韬》。要求受教育者读兵法和军事历史时，领悟大的知识，不是为了治经当博士，不效法诸生寻章摘句。魏文帝曹丕自述幼年受到军事教育的内容是："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能射矣。""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余又学击剑，阅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三国志》卷五十五《凌统传》。

③④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传》。

师多矣”①。

学习技艺的场所，一般在豪强庄园里和军队中。据《四民月令》记载，豪强庄园中，季节性地开展军事技能训练。二月，练习射技；八月，修缮弓弩，练习射技；九月，修缮兵器，进行战斗和射技训练。该书反映东汉晚期情况，到汉末战乱中，情况仍然如此。

军事教育的施教者，大都是父祖辈或者老师。贾逵幼年，祖父贾习向他口授兵法数万言。曹丕、曹植受到父亲曹操的亲自指导，曹丕学剑则从名师。曹将学《孙子》有难通之处，曹操为他们作注。学习方法是教授和自学。

军事教育使受教者基本懂得军事，或者提高了对战略领悟的水平。如吕蒙在孙权开导下笃志好学，所读的书，有时超过旧儒。富于武略，有了文韬，连鲁肃也惊叹他变了样，说我认为大弟只有武略罢了，不料到了今天，学识渊博，不再是“吴下阿蒙”了。吕蒙自豪地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②孙权叹息道，学问随着年龄增大而增长，像吕蒙、蒋钦那样，是比不上的。曹魏的将领对《孙子兵法》十分熟悉，张口就能说出，灵活地用在实战中。

二、讲武和治兵

东汉罢郡国兵后，临时征来的兵来不及训练就上战场，所以王师不振，每战常败。到了汉末，兵士很快熟悉了金革，这同加强军事训练是分不开的。三国着眼于训练精兵，都建立了训练制度。但由于记载简略，仅知如下情况：

蜀国实行讲武。讲武是传统的讲习武事的制度。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

①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典论》。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郑玄注“为仲冬将大阅，简习之。”① 讲武实际上是军事训练制度。诸葛亮在北伐前，“治戎讲武”②，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厉兵讲武”③，第四次北伐后，又“教兵讲武”④。针对蜀军素质不高，企图加强讲武，提高其技术、战术水平，实际上每次北伐后，可能都抓紧休整期间进行训练。内容不只《礼记》所说的练体力和技艺，还重在用八阵图教练兵士，强化战术合成训练。

东吴建立检阅制度。在“简日”⑤，检阅部队军容和训练，有时还根据检阅情况，决定部队的整编。孙权统事后，检查众小将哪些是兵少财薄的，准备予以合并。据此，吕蒙暗中进行赊购，给兵士做绛衣和绑腿。到了“简日”，他的队伍阵容鲜明醒目，兵士操演纯熟。孙权大悦，给他增拨了兵。

魏国建立治兵制度。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有司向魏王曹操奏称：秦以前有四季农闲讲武制度。汉代继承秦制，三季不讲，只十月间都试车马，在长水南门，会集五营士练习八阵进退，称为乘之。现在金革未息，兵士人民对此素来熟习。从今以后，可以无须四季讲武，只在立秋选择吉日，大规模地朝见车兵和骑兵，称为治兵，以便上符合礼制，下继承汉制。得到曹操批准。所谓十月都试，是汉代定期检阅军事训练成果的制度。这年冬十一月，曹操治兵，亲自手执金鼓，指挥受阅部队，对八阵进退，多兵种的战术合成训练进行检阅考核。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秋七月，又治兵，检阅考核部队训练情况，然后西征刘备。此后新君继位，大都举行治兵，显示新君统兵的事实和对军事训练的重视。延康元年（220年）十月，曹丕继位为魏王后，在东郊治兵，然后南征。

---

① 《礼记正义》卷十七《月令》孟冬之月条。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980年9月版。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④ 《三国志》卷三十二《后主传》。

⑤ 《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

黄初七年（226 年）五月，魏明帝即位后，也在东郊治兵。

第五节　军粮保障

一、军粮保障的内容及机构

军粮是三国后勤保障中最大宗的项目。在汉末，经常仅仅由于军粮不能保障而导致军队败退、解散或者灭亡。三国鼎立后，军粮保障问题仍然较为严重，诸葛亮有两次北伐退兵是由于粮尽，因此军粮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兵势强弱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普遍持有诸葛亮“粮谷军之要最”① 那样的认识。

军粮保障的内容，主要是供应军队所需“粮谷”。粮谷不足时，也要提供代用品。有时供应战马肉。曹军北征乌桓从柳城回军时，“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② 有时供应桑椹、蚌蛤一类的食物。“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之在江、淮，取给蒲蠃。”③ 蒲蠃是蚌蛤之属。初平年间，新郑县长杨沛向百姓征收干椹，加大其储存，“如此积得千余斛，藏在小仓”，恰逢曹操西迎天子，所将千余人皆无粮。经过新郑时，杨沛谒见，“乃皆进干椹。太祖甚喜。”④ 灾荒年景，或者提供糟糠。豪强李通“与士分糠，皆争为用”⑤。连上述代用品也没有时，只有以人肉为食。曹操、刘备军队都吃过人肉。“初，太祖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⑥。刘备军队“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

---

①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诸葛亮语。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④ 《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列传》。

⑤ 《三国志》卷十八《李通传》。

⑥ 《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世语》。

食。"①东郡太守臧洪被袁绍围于东武阳时，内厨米剩粮三斗，仅为一个人两天口粮。万般无奈，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将士。"②

军粮供应由政府和军队共同负责。魏国政府在五曹尚书中设度支尚书，主持军粮保障。"文帝立度支尚书，军粮计较一由之，以司马孚为之。"③军队在出征时设官职以保障军粮。这些官职的名称和职掌带有各国的特点。魏国有督军粮御史，第七品，督军粮执法，第六品。曹丕即王位，以杜袭先后任上述两职。嵇康父亲嵇昭为督军粮治书侍御史④。据《晋书·职官志》，魏时又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⑤，可知督军粮治书侍御史的职责，是掌军粮方面的律令。蜀国诸葛亮出征时，军粮保障由丞相长史主持。任该职的杨仪在军中"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⑥吴国孙坚时也由长史负责，曾令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回豫州"督促军粮"⑦。孙权为吴王后，在汉制外，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⑧，以侍中、偏将军徐详任该职。徐详死后，将用诸葛恪。其叔诸葛亮以此职文书繁猥，而诸葛恪性格粗疏，唯恐其有失而不安，致书陆逊转请孙权改任。孙权即转使诸葛恪领兵。

二、军粮的筹措储备和供应

（一）筹措制度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英雄记》。
② 《三国志》卷七《臧洪传》。
③ 《太平御览》卷二一七《职官部·度支尚书》引朱凤《晋书》。
④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嵇氏谱》。
⑤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⑥ 《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
⑦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
⑧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

军粮以自筹为主。群雄中凡不进行自筹，而以抢掠为生者，一般都落得“瓦解流离，无敌自破”① 的下场。魏、蜀、吴主要通过以下三条渠道自筹军粮：第一，作为编户齐民的自耕农。这部分人数量最多，对于军粮筹措贡献极大。例如曹操西征关中时，“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②，即从该郡自耕农中筹措的军粮，除了满足作战需要以外，战事结束后，还剩余 10 万军队 12 天的用量。官渡之战时，许都所在的颍川郡“丁壮荷戈，老弱负粮”③，对关键时刻的军粮筹措给予重要支援。这是黄初二年魏文帝下令免除该郡一年田租以示酬谢的重要原因。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魏国陇右无谷，雍州刺史郭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④。第二，民屯。兴办最早的民屯许下屯田的直接原因，便是为了筹措军粮。民屯土地面积和民屯农民的数量不及自耕农多，但其交纳田租的比例远远超过自耕农。第三，军屯。从邓艾建议可知，军屯是军队的生产自给，所产粮食供应军队自身。从上述渠道筹措的军粮数量庞大，来源稳定，比较有计划性，具有很大优越性。

当着从上述渠道筹粮有困难、或者敌粮便于夺取时，则实行取之于敌。魏国雍州刺史张既据武威后，企图进攻卢水胡，声称“今军无见粮，当因敌为资”⑤。取之于敌的方式，有收取敌境之麦。曹操攻陷黎阳、追至邺城后，军粮很紧张，于是“收其麦”⑥，即收割袁尚邺城郊野中的熟麦以为军粮。魏国曾设想在攻吴战争中，渡江后粮食将主要取之于江南。黄初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上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⑦。邓艾在姜维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

③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载文帝诏。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

⑤ 《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

⑥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⑦ 《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

狄道之战败退后，力排姜维不会再次出兵的众议，其论据之一是认为姜维有粮可因，“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悬饵（诱饵）”①。祁山盛产麦，可资利用，成为诸葛亮两出祁山的重要原因。取之于敌的方式，还有缴获敌粮，如曹操在长坂大获刘备辎重。又如钟会使护军胡烈等攻破关城，得蜀国“库藏积谷”②。取之于敌的方式，既剥夺敌人之粮，又省去远输之劳，有极大优越性，缺点是敌人经常实行坚壁清野，因粮所得有限，来源不稳定，无计划，不可靠。取之于敌的军队，常被讥为“非深根之寇”③，往往不能久战。

（二）储备制度

为保障军粮供应，国家和军队必须进行粮食储备。曹魏储备情况，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好。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初领兖州后，治中从事毛玠即指出：“公家无经岁之储”④，到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侍中高堂隆指出：“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⑤。直到司马懿政变前后，情况才开始逐步好转。正始六年（245年），胡质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⑥。此后，军储日益增加，为灭蜀吴奠定了物质基础。

军粮主要储存在邸阁，即物资仓库中。邸阁在布局时，既应减少取用时的运输之劳，又应有利于安全。一般部署在纵深的战略要地，或在边防要地，如魏文帝时，雍州刺史张既请求“筑障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⑦。有时也部署在靠近前线之地，如诸葛亮为减轻北伐中在褒斜谷道上的转输之劳，于太和六年（232年），提前“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⑧。斜谷临近

---

①②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③ 《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④ 《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

⑤ 《三国志》卷二十五《高堂隆传》。

⑥ 《三国志》卷二十七《胡质传》。

⑦ 《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

⑧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魏境，在选点上是相当大胆、相当靠前的。三国时期邸阁的分布情况是：魏国司马昭时有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大邸阁，蜀国有郫县邸阁，刘繇在牛渚营建有邸阁，东吴在夷陵附近雄父建有邸阁。雄父邸阁储米30余万斛①，足供万人半年用粮。南顿邸阁储米，“计足军人四十日粮”②。

（三）供应制度

三国时期，每个兵士日粮食标准供应量，无明确记载，参照有关数据推测，可能为七八升③。邓艾建议在两淮屯田时说：“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④，则兵士每人每年供应60斛，每月5斛，每天1斗6.44升。这个数字太多，它可能是以未去皮的稻谷和粟计算的。比照日本野开三郎氏考订的汉代与宋代稻谷与稻米的比例，大致为二比一，则兵士每人天供应的稻米和粟米应为8升，同时邓艾所列举的数字，还可能包括了其它有关开支在内，因此有可能比8升略少。兵士日供应七八升，这个数字可以从食少者中得到印证。裴注记载地方对孤老的救济，每日5升。如隐者焦先因关中乱，窜于河渚间，大阳县“给廪，日五升”。扈累徙诣洛阳，“县官以其孤老，给廪日五升”。寒贫还长安，“郡县以其鳏穷，给廪日五升，食不足，颇行乞”⑤。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食少事烦，每天所食“三四升”⑥，吃得过少，司马懿闻知后道：“亮将死矣。”两相对比，军中口粮标准为食少者1.8倍和2倍。

---

①②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基传》。

③ 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宋书札记·南北朝时口粮数》，中华书局1985年版。吕思勉《秦汉史》第十五章第一节《秦汉人訾产蠡测》和《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九章第一节《物价工资资产》所记日食之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⑤ 《三国志》卷十一《管宁传》注引《魏略》。

⑥ 《晋书》卷一《宣帝纪》。

第十六章 军事技术

第一节 格斗和远射兵器

一、格斗兵器

三国处在冷兵器的铁兵器发展期①。其格斗兵器以矛、戟、刀为主。矛是直刺和扎挑的长柄格斗武器，后部有骹，以安装竹、木、藤等长柄。矛用于步战和骑战。使用长柄矛的名将，如张飞在长坂拒后时，瞋目横矛。丁奉同魏军追兵战于高亭时，“跨马持矛”②。在作战中，矛可用于直刺。公孙瓒用来刺胡，吕布用来刺郭汜，阎行用来刺马超。矛的长柄较长。阎行矛折，拿折矛挝马超脖子，几乎杀死马超。典韦率领的数十名应募陷阵者，手持长矛撩战。最长的矛是涉（东夷国名。辖境在今朝鲜临津江以东至海）制作的，“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能步战”③。长柄矛是制式兵器，大量装备部队。刘表支援黄祖，一次派出5000长矛兵。长柄矛是关西兵擅长的兵器，连关西妇女也载戟挟矛。还有特制矛，公孙瓒率数十骑外出时，遭遇十倍敌人，交战时，“乃自持矛，两头施刃”④，是矛柄两端各安矛头，使其有两个矛头。

戟是一种把戈的勾、啄和矛的直刺功能结合于一身的武器。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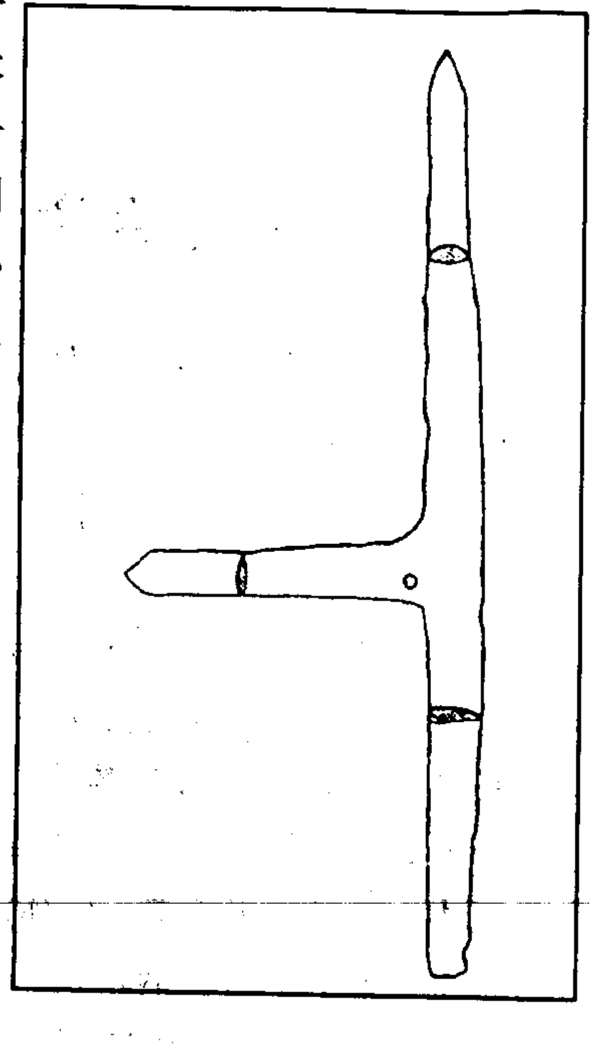
① 参见杨泓《中国古代兵器研究的历史回顾》，载《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三国志》卷五十五《丁奉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

④ 《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

头横出小支，整个形状如“卜”字（见图一）①。吕布为刘备解袁术大将纪灵之围时，在营门树戟一只，双方约定，如射中小支，则袁、刘解斗。举弓射戟，正中小支。戟的小支原是横枝，整个戟呈“卜”字形。到了本期，横支逐渐弯曲上翘，减弱了勾的功能，增强了刺和叉的功能。典韦阵亡前，“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② 说明小支上翘后，叉法威力大增。戟是制式兵器，大量装备部队。官渡战前，袁绍檄州郡文称自己的部队“长戟百万”③，此说虽有夸张，但也说明其装备之多。袁绍还有大戟士700余人为左右随从。



图一

铁戟　长48厘米，宽23厘米。1983年山东诸城出土。

戟分长短，长戟又称大戟，典韦同张绣作战时，用长戟左右击敌。魏繁钦《征天山赋》“左骈雄戟”④，是说左骑用戟。短戟又称手戟。手戟是单手握持的短柄戟。曹操年轻时，私入中常侍张让室内，被发觉，舞手戟自卫。供双手所持的两戟，称双戟。曹丕称：“余少晓持复（手持两件兵

---

① 见《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9月版，164页，图7—6。

② 《三国志》卷十八《典韦传》。

③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④ 《艺文类聚》卷五十九《武部·战伐》引繁钦《征天山赋》，又《太平御览》卷三五三《兵部·戟》“骈”作“骑”。

器），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①。典韦喜好手持大双戟。军中谣谚：“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②，说明典韦手戟每只重 40 斤，折合今 8.9 公斤。

手戟也可投掷。董卓拔手戟掷吕布。典韦手持 10 余只戟，敌至 5 步，大呼站起投掷，无不应手而倒。孙策席间向严舆投掷手戟，严舆当场死亡。虎伤坐骑，孙权投掷双戟，虎受伤而逃。在长坂，有人报告赵云降曹，刘备不信，将手戟掷向报告人，表示对错报军情的气愤。手戟随身携带，不用时插在项背上，因此孙策同太史慈交战时，“揽得慈项上手戟”③。

刀是用于劈砍的单面侧刃兵器，由刀身和刀柄构成。出土的三国刀是环首刀，直体长身，薄刃厚脊，短柄，柄首加有扁圆状的环（见图二）④。质地有铁刀，有刃部经过淬火的刀。东汉章帝、安帝时有 50 炼 30 炼的剑和刀。到三国时，出现百炼刀，即百辟宝刀。曹操下令作百辟刀 5 枚，3 年造成，分给五子防身。防身刀称佩刀。鲁肃关羽益阳会谈，“诸将军单刀俱会”⑤，即允许将领带佩刀赴会。有的短刀，可藏匿在衣中。越骑校尉伍孚伺机谋刺董卓时，朝服里挟有佩刀。短刀之外，还有长刀，典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⑥。

后世传说骑将关羽使用长刀——青龙偃月刀，没有事实根据。《三国志》及裴注都不见骑将使用长刀的记录。陶弘景《刀剑录》称“关羽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武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及羽败，惜刀投于水。”⑦ 这里说的刀是短刀。《三国志·关羽传》记杀颜良说，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

---

①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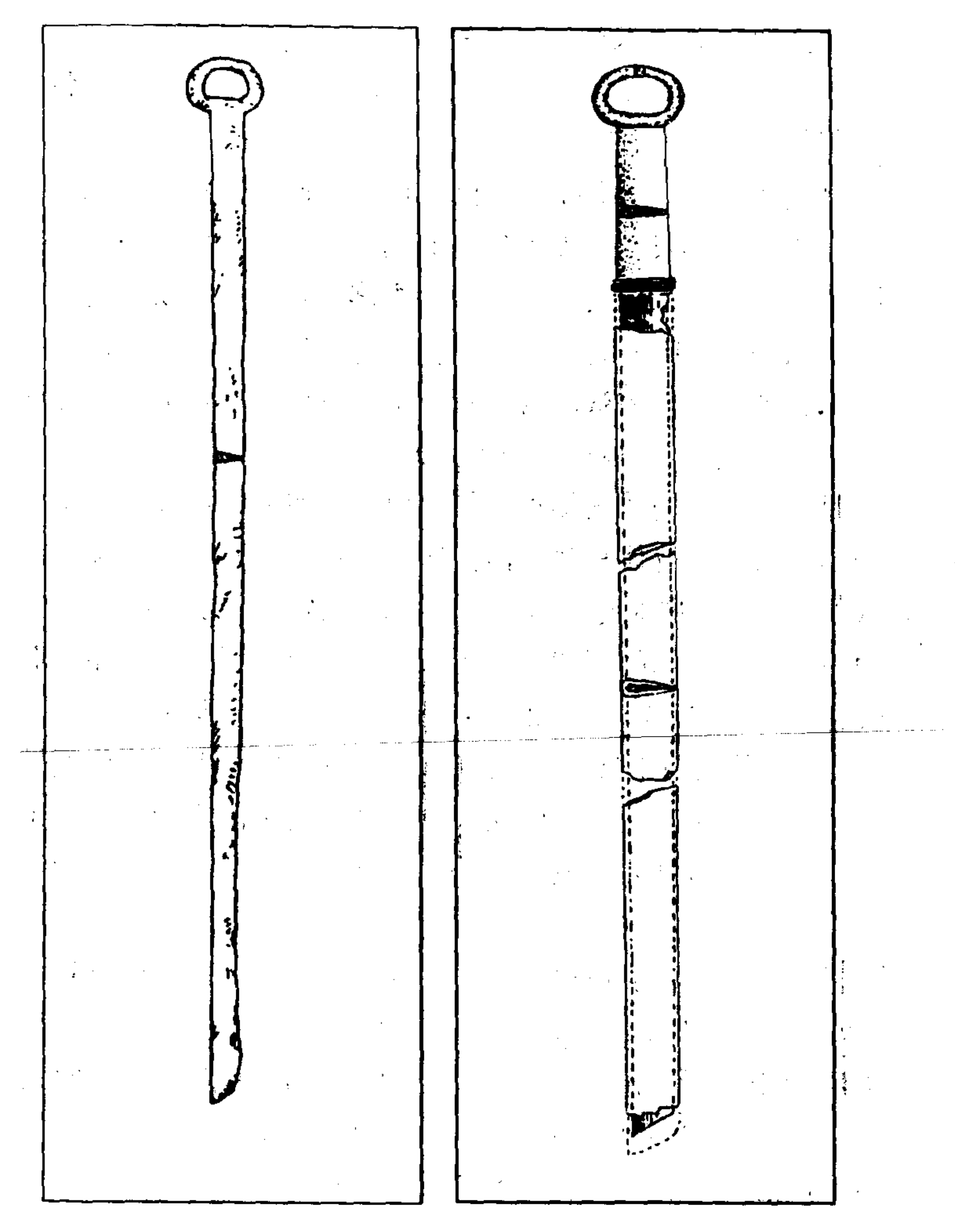
②⑥ 《三国志》卷十八《典韦传》。

③ 《三国志》卷四十九《太史慈传》。

④ 见《中国古代兵器图集》166 页，图 7—11a，图 7—12。

⑤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⑦ 《太平御览》卷三四六《兵部·刀》引陶宏景《刀剑录》。



图二

铁环首刀　长1.21米，宽3.5厘米。1981年四川忠县出土。

铁环首刀　长74厘米，装漆鞘。江西南昌出土。

也并没有说使用长刀。根据“刺”字，大约不是用矛，就是用戟，同时随身可能佩有短刀，以便对所刺杀的敌将，能够“斩其首”。

造刀技术日趋精良，造刀业规模增大。一次造刀动辄上千。蒲

元为刘备造刀5000口①，在斜谷为诸葛亮造刀3000口②。孙权一次赏赐甘宁刀百口。由于生产量大，铁环首刀基本取代长剑，成为军中最主要的格斗短武器。

剑是两汉短柄格斗武器。西汉以来，铜剑减少，钢铁剑增多，功能向随身防护转化。魏文帝佩杨修所赠宝剑。魏高贵乡公、齐王芳也都佩剑。

斧退出战斗，用于护卫。曹操宴请来降的张绣及其将领时，典韦手持径尺大斧站立身后，随曹操所到之处，举斧注目对方。张绣及将领无人敢于仰视。

二、远射兵器

远射兵器以弓弩为主。弓是弹射武器。东北少数民族的弓最优良。肃慎的弓长3尺5寸，涉、貊进贡良弓，挹娄弓长4尺，力如弩。汉末弓矢普及，连妇女也都弦弓负矢。风气逐渐传入中原，促成曹丕等一批人，自小酷爱弓马。

弩是装有张弦机械、延时发射的弓，命中率和射程都超过弓。关键部件弩机，多有出土，例如：南京石门坎出土的魏正始二年（241年）弩机③，四川郫县出土的蜀国景耀四年弩机（缺悬刀）④，吴大澂所藏蜀国建兴八年（230年）弩机，上虞罗氏旧藏章武弩机等⑤。

优质弩的弩材是精选的。魏陈琳《武军赋》称："弩则幽都筋

---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六《兵部·刀》引陶宏景《刀剑录》。

② 〔唐〕欧阳洵等《艺文类聚》卷六十引《蒲元传》。

③ 尹焕章：《南京石门坎发现魏正始二年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2期。

④ 沈仲常：《蜀汉铜弩机》，《文物》1976年第4期。

⑤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95页。

角，恒山檿干，通肌僵骨，直矢轻弦，当锋摧決，贯遐洞坚”①，说明北方良弩选用幽州筋角、恒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檿桑。吴国朱异赋弩说：“南岳之干，钟山之铜”②，说明南方良弩选用荆州衡山木材、建业钟山之铜。

蜀国把监造者和工匠姓名铭刻在弩机上表示责任。景耀弩机郭上铭文是：“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纯业，吏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中作部是中央武器制造工场。人名是监造官吏和工匠。1石为120蜀斤，1蜀斤为今0.2228公斤。十石机是不靠臂力开张的具有267.3公斤强度的劲弩。三斤十二两是其重量。有的弩，装有连射机械，称连弩，积弩③。诸葛亮改进连弩，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次十矢齐发，称为元戎。魏国马钧认为，元戎“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④吴国则有神锋弩，射程达3里，可贯穿三四匹马。⑤

三国时创造两种用弩战术：一是以众多连弩齐发，形成箭雨。如江陵之战中，吴军凿通七条道路进攻魏军，魏将王昶“使积弩同时俱发”⑥。二是以弩、弓、石块并用，综合抛、射功能，形成矢石交加。用弓弩，以居高临下最有利。木门伏击战中，“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⑦，飞矢射死张郃。

矢，或称箭，是一种以弓弩发射的具有锋刃的远射武器。挹娄的矢用楛木制杆，长1尺8寸，以青石做镞，矢上浸毒，人中必死。⑧魏国也制毒矢，关羽左臂中流矢，医生确认矢镞有毒，已

---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八《兵部·弩》，《北堂书钞》卷一二五《武功部·弩》文字小异。

② 《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附朱异传》注引《文士传》。

③ 《淮南子·兵略训》“积弩陪后”注：“积弩，连弩也”。

④ 《三国志》卷二十九《杜夔传》注引《傅玄序》。

⑤ 《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弩》引《会稽典录》上。

⑥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

⑦ 《三国志》卷十七《张郃传》注引《魏略》。

⑧ 《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

入于骨。矢有时又与火结合，在靠近箭簇部位绑缚浸满油脂的麻布等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射出纵火，制成远射火攻武器的火箭。魏军常以它守城。诸葛亮进攻魏军陈仓时，守将郝昭“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燃，梯上人皆烧死”①。寿春之战中，司马昭“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②。后世靠火药燃气反作用力推进的火箭，也借用这一名称，但抛射动力和攻击效果已大有改进。

发石车是运用杠杆原理抛掷石弹的战车。官渡之战中，曹军造发石车，用飞石击破袁军楼橹。发石时，声响如雷，袁军称其为霹雳车。司马懿围攻襄平时，也用发石车发石攻城，使城中公孙渊处境窘急。运用杠杆原理抛掷石弹的方法，古代称为“飞石”、“旝”。抛石机始见于春秋末期《范蠡兵法》③ 和《左传》桓公五年（前 707 年）。三国失传。曹操恢复古法，把该机安装在战车上，首创车载抛石机，与古法定装式机相比，具有可机动性和较强的击、砸摧毁力，是重型远程抛射兵器的一大进步。

第二节　防护装具和马具

一、铠　甲

三国时所用防护装具，有铠甲、兜鍪、马铠和盾。铠甲是披挂在将士身上的防护装具，皮制叫甲，铁制叫铠，先秦用甲，战国后期出现铠。制作时，先制成若干小的皮革片和铠片，穿上孔，再用绳子等编联而成。三国时，以铠为主，甲也盛行。制铠生产能力较强，扬州诸葛诞一次制作上千人的铠④。铠分大小两种。小

①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

② 《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

③ 《汉书》卷七十《甘延寿传》注引张晏曰。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注引《魏末传》。

铠紧身所穿，越骑校尉伍孚行刺董卓时，外穿朝服，内着小铠。大铠为将士行阵所穿，曹操说，官渡之战时“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①。铠甲是重装甲步兵的装备，也是骑兵的装备。

铠用以护身。曹彰北征代郡乌丸时，铠中数箭，意气益厉，铠保护他没有受重伤。濮阳之战中，典韦让应募陷阵的数十人穿两重铠，代替盾防身，以便腾出双手持长矛作战。铠甲缺点是太沉重。为了减轻负担，部队经常不被甲，铠甲放在辎重车上，载着随军行动。曹操征乌桓开进途中，多数人轻装行军，铠甲远在后面辎重车上。一旦同乌桓骑兵突然遭遇，来不及被甲。张绣以车少不便载甲为由，使曹操批准其全军被甲，尔后闯入曹营掩袭了曹操。②

二、新型铠

三国出现了若干新型铠。曹植在《先帝赐臣铠表》中，列举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和马铠五种新铠③。黑光铠或许同西汉的玄甲有关。玄甲是铁铠，有黑光，大量装备于曹军。曹丕有诗：“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④。卤城之战，诸葛亮获魏军玄铠5000领⑤。明光铠，由于该铠胸前、背后两面各有金属圆护，在阳光反射下，发出明光而得名。两当铠，类似衣服中的两裆衫，一片当胸，一片当背，总共两当，在肩上用带子把前后两个当片扣联，腰间用腹带系扎而成。环锁甲状“如连锁，射不可入”⑥，流行于西域，魏时传入中原。上述名铠，都是质量上乘的稀有铠。

蜀国也研制了新型铠。南朝宋明帝御仗中有诸葛亮筒袖铠，其

---

① 《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兵部·甲》引《魏武军策令》。

② 《三国志》卷八《张绣传》注引《吴书》。

③ 《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兵部·甲》引《曹植表》。

④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

⑤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⑥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铠帽（又称铁帽）二十五石弩不能射入①。出土的西晋以来的筒袖铠、胸铠和背铠相互联缀，肩部披有不长的筒袖。这种铠大约在诸葛亮时已在蜀军中流行，所以有这个名称。

盾是手持的防护装具。官渡之战中，袁绍军居高射曹营，矢如雨下，曹军蒙盾而行。盾表面蒙有皮革，所以公孙瓒军在力战无粮时，煮吃弩盾蒙皮。②

三、马 具

马具是便于骑士骑乘的器具。马具的完善，是骑兵发展的重要条件。魏国的马具，有战国秦汉以来的马羁（马络头）、衔辔，有汉以来的马鞍。曹军在潼关渡黄河时，马超军进行攻击，箭如雨下，曹将许褚举马鞍遮蔽曹操。魏国太子舍人张茂向魏明帝上书说，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上述材料说明当时马鞍已经普及，但还没有马镫出现。③

第三节 军用车

一、运 车

军用车有运车、战车、司南车、记里鼓车。运车数量最多，主要运输粮食、营帐、铠甲等军用物资。袁绍为了运输粮谷，一次

---

① 《宋书》卷七十六《王玄谟传》，《南史》卷十六《王玄谟传》，《宋书》卷四十六《殷孝祖传》，《南史》卷二十九《殷孝祖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三五七《兵部·盾》引《英雄记》。

③ 今天所知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的一组陶俑上见到的镫的雏形。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西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动用运车数千乘，被曹将徐晃、史涣全部烧毁后，又用辎重“万余乘，在故市、乌巢”① 遂行运输任务，可见其数量之多。运车车队经常随军行动，极为艰苦。曹丕在黎阳作诗描写道：“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车，涉此艰阻，……辚辚大车，载低载昂，嗷嗷仆夫，载仆载僵，蒙途冒雨，霑衣濡裳。”②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运车跋涉险路，车行忽高忽低，车夫饥肠辘辘，有的向前栽倒，有的向后倒下，细雨把衣裳都打湿了的艰辛场景。

二、木牛流马

为了适应褒斜道等山地运输需要，节省人力畜力，诸葛亮改革运车，制成木牛和流马。建兴九年（231 年）二月，他“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十年，在黄沙（今陕西沔县东 20 公里）“作木牛流马毕”；十二年，“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③。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所作，也有的说是诸葛亮西曹掾蒲元所作：“亮欲北伐，患粮难致。元牒与亮曰：‘元辄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④或说作者还有庞力等人：“按亮集督军庞力、杜睿、满元、胡忠等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⑤。很可能是以诸葛亮为主，发挥集体智慧制作成功的。

木牛流马的形制构造，在《诸葛亮集》“作木牛流马法”⑥ 中，有详细记载。说木牛，“一脚四足”，“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独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② 《艺文类聚》卷五十九《武部·战伐》。

③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④ 《北堂书钞》卷六十八《设官部·掾》引《蒲元别传》。

⑤ 《通典》卷十《食货·漕运》。

⑥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

而人不大劳”。说流马有“前脚孔”，“后脚孔”，“前轴孔”，“后轴孔”，“前杠孔”，“后杠孔”，“后杠与等版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前后四脚”，“形制如象”，等等。木牛流马的实物没有流传下来。后世有人按文献记载复制，都未能如愿，很可能是“作木牛流马法”文字有错讹，因此至今疑不能明。① 木牛流马适应了艰难的蜀道，缓解了蜀国人力物力的紧张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诸葛亮北伐的粮食运输。

战车，有冲车，发石车等。

三、司南车

又称指南车。利用磁针在地磁作用下保持在磁子午线平面内的性能制成，行军中随时指示方位。青龙三年（235年），魏明帝命博士马钧作司南车。起初，马钧同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高、秦二人认为古代没有指南车，文献记载不实。马钧坚持古已有之，认为空头争论不会有结果，不如进行试验，立可见效。两人报告明帝，明帝下诏命

---

① 木牛流马为何物？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小车”条认为，诸葛亮所造的“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但《四库全书总目》以为，高承“不知《三国志》注引亮文集，载所作木牛流马之法甚详，与今之独轮车制度绝不相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事物纪原》，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转者为牛足”，足字应作脚字）。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倾倒。‘人行六尺，牛行四步’，就是人走一步，轮转四次。”“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食粮，比木牛多载，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原来车用两轮，诸葛亮改为一轮和四轮，确是新的创意，用慢而稳的车来节省运军粮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种谨慎的性格。”

马钧制作，于是制出了指南车。

第四节　军事筑城和攻城器械

一、城

城是中国古代都邑周围构筑的有门的防御性墙垣，是永备筑城的基本形式，是战略要地防御的重要依托。筑城有都邑式和线式两种。三国时期，主要斗争发生在内地，而不在游牧民族入侵的边境，因此以都邑筑城、而不是线式筑城为主。所筑之城也很有限，多数是在国力略有增强的情况下，在新的边防重镇、重要治所、后方重镇等战略要地兴建的。三国时的筑城，有三种情况：第一，建立新城，如孙权镇丹徒所筑的京城（今江苏镇江），诸葛亮在汉中所筑的汉（今陕西勉县东南）、乐（今陕西成固东）二城。第二，保留旧城，加筑新城。诸葛亮北伐时，李严移驻江州（今重庆市区嘉陵江北岸），在秦张仪所筑江州旧城的外面，加筑大城，周长16里（约今7公里）。① 魏国曹真令其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守将郝昭加筑新城，形成上城（旧城）、下城（新城）并存的格局。第三，拆除旧城，在附近另选新址建城，如魏国东线重镇合肥，其旧城南临巢湖、长江较近，利于吴军沿水道进兵攻击；北距寿春较远，不利于魏军从寿春出援。青龙二年（234年）魏国将旧城拆毁，在旧城以西30里奇险之处另建新城。

筑城有如下特点：1、新建和另建的城，规模一般不大。公孙瓒在蓟城（今北京市区西南部）东南另筑一对抗刘虞的城，史称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按，李严所筑大城在今重庆市区，其南线约为今朝天门至南纪门沿江一线，北线约当今大梁子、人民公园、较场口一线，正当重庆半岛的山脊线。见庄燕和、鲜述秀《重庆城的由来和发展》，《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其为“小城”。孙权筑京口城，方圆630步①，合今仅1.5里。刘备征吴时，在秭归筑城，“依山即坂”，“南临大江”，方圆2里，高1.5丈②。2、必要时加筑重墙，以增强防御能力。在诸葛亮大军围攻魏陈仓城时，城内紧急增筑重墙，以增强防御的稳定性③。3、城外加筑城堡，同大城构成犄角配置。曹操在邺城以西以北易受攻击的方向，构筑了两座讲武城④，与大城相互支援。4、在城内加筑称为“京”、“台”⑤的高大土台，以控制制高点，增加安全度。易京城以京多而命名，每京高达五六丈，公孙瓒所住的中京高达10丈。曹操在官渡城中也构筑高台，后人称为中牟台或曹公台⑥。又在邺城的西北隅“因城为之基”，构筑三座高台。三台列峙，高耸如山，同易京相仿佛，而规模更雄大。铜雀台居中，高10丈，有屋百余间；金雀台在南，高8丈，有屋109间；冰井台居北，高8丈，有屋140间⑦。至今仍残存有土台遗迹，其高度金虎台为8～9米，铜雀台为3米。⑧

在筑城技术方面，城墙多用土夯筑，孙权时重筑的石头城（今江苏南京西北清凉山），借用石头山山势，称作石头城，实际上城墙用土夯成。《丹阳记》说，“石头城吴时悉土坞”⑨。直到东晋义熙年间，才加砖垒石。三国时期的筑城一是土墙很坚固。易

---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镇江府·丹徒县·京城》：“后汉建安十三年，孙权徙镇于此，筑京城，周三百六十步，于南面、西面各开一门，因京岘山为名，号曰京镇。”

② 《水经注校》卷三十四《江水二》。

③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太和二年注引《魏略》。

④ 《读史方舆记要》卷四十九《彰德府·临漳县·讲武城》：“讲武城在故邺城北漳水上，磁州南二十里亦有讲武城，皆曹操所筑也。”

⑤ 〔汉〕《尔雅》：“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

⑥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开封府·中牟县·官渡城》。

⑦ 《水经注校》卷十《浊漳水》。

⑧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邺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⑨ 《三国志集解》卷四十七《吴主传》建安十七年卢弼注引。

京城在后赵建武四年（338 年），被石虎以 2 万人拆毁。但到北魏郦道元时，“其楼基尚存，犹高一匹余”①。二是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如石头城借用一段天生石壁，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

上述新建、增建、另建的城，防御能力较强，如果守城坚决得法，即使使用冲车、云梯、土山、地道等多种攻城手段，也往往对其无可奈何。陈仓城经过修缮以后，魏军以千余守兵，防御诸葛亮数万兵力以云梯、冲车、百尺井阑、地道等各种手段的进攻，坚守 20 多天，迫使其退兵。合肥新城由于新址后退一步，使来攻的吴军不得不远离水道作战，丧失其近水攻城作战的优势。张鲁所部依靠线式筑城及山险防御，迫使曹操决策退军。

二、坞

坞是一种规模比城小的永备筑城②，形制同壁、垒、固类似，常与壁连称，构筑简便，容易普及。西汉中后期始见于记载③。兴起初期，主要构筑于边境，屯驻边兵，是国家的守备设施。西汉末年，开始出现在内地民间。黄巾起义期间，内地坞壁骤然兴盛。地方豪强以筑坞拥兵保境，抵抗义军。著名的有许褚壁等④。及至群雄混战以来，筑坞风气不衰，出现郿坞、袁术固等，甚至蔓延至大城市。李傕在长安城分治地界内，筑北坞、南坞，把献帝劫持到南坞，接着强

---

① 《水经注校》卷十一《易水》。

②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注引服虔《通俗文》“营居曰坞，一曰庳城”，《字林》“坞，小障也，一曰小角”，《说文解字》“隖，小障也，一曰庳城也。段注，庳犹卑也。”

③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6.8“五凤二年辛巳朔，乙酉，甲渠万岁隧长成敢言之，乃七月戊寅夜临坞，坠伤要，有瘳。即日视事，敢言之。”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

行转移到北坞①。汉献帝出奔长安，路过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时，沿途坞壁丛立，“其垒壁群竖，竞求拜职”②，以致官印刻不过来，草草用锥画代刻。袁、曹相争时，袁绍本郡门生、宾客散布在曹操后方汝南各县，据有数十座坞壁拥兵抗拒，极大地牵制了曹操。连诸葛亮逝世的地点，也在郭氏坞③。坞壁之盛，可见一斑。

内地修建坞壁之风，直到曹操统一北方以后，才逐渐歇息；但是在西部地区并没有停止。“（邓）艾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晋朝泰始（265～274年）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④。吴、蜀两地，筑坞较少。蜀国益州南部，偶有筑坞。越巂（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太守张嶷“以郡郛宇颓坏，更筑小坞”⑤。

坞的防御体系颇有特点：1、许多坞依险构筑，如袁术固筑在少室山西，“四周绝涧，迢递百仞”⑥，“一夫守隘，万夫莫当”⑦。2、大坞的规模某些方面与城类似。坞与城有区别，无严格界限。小城有时也可以称坞，如《丹阳记》称石头城为“土坞”。大坞如董卓的郿坞，周长1里100步⑧，同长安城等高，达到3丈5尺⑨，存粮30年，号称万岁坞。董卓自称：“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⑩，可见它实际是座小城。3、有些坞筑在围堑中，形成围堑中有坞。最典型的是易京。易京，人称易京城⑪。所谓城，

---

①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注引服虔《通俗文》。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⑤ 《三国志》卷四十三《张嶷传》。

⑥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府·偃师县·袁术固》。

⑦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引宋武《北征记》。

⑧⑩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及万岁坞注。

⑨ 长安城高度见《三辅黄图》（该书成书不晚于南北朝，撰者不详）。

⑪ 《水经注校》卷十一《易水》：公孙瓒“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

实际上是十重围堑①，堑里是坞群。群坞形制为众多的井式高楼。《水经注·易水》称“其楼基（即京）尚存，犹高一匹余，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即瓒所堡也”②，高楼就是坞堡。公孙瓒众将家家各作高楼，楼以千计。公孙瓒所住的中京楼加铸铁门，存谷300万斛。自称：兵法百楼不攻，今天我楼橹千重，吃尽此谷，足可知天下之事。公孙瓒采用围堑中构筑群坞的方式，证明所部是一群豪强的联合，需要顾及各自的利益，所以除了构筑统一的围堑而外，还要构筑各家的坞堡。4、坞传入东吴后，带有地方色彩，同水战结合起来，依水筑坞。黄初四年（223年）吴将孙盛率万人守备百里洲（今江陵以西江心中），在洲的四周临江筑坞，作为抗击从水路进攻之敌的依托。濡须坞则背山临水修筑，作为掩护东吴军从陆地撤入战船的依托。

三国时期的坞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黄巾起义期间获得大发展，是中小豪强赖以防御、分割黄巾军的依托，也是他们在军阀混战中对抗大军阀的蚕食和掳掠的重要凭借。如原河间太守、旧族冠冕陈延，凭借家乡上党的堡壁，坚守60多天，终于保全了堡壁，阻止了军阀张杨对其宗族妇女、资货的掠夺。坞还是水陆联合作战中的重要筑城工事。坞中最具战略价值的，莫过于濡须坞。它由于建筑在水陆战略要地上，多次起到阻止曹军沿濡须水进入长江的作用。

三、楼橹、井阑、土山、地道

攻城设施有楼橹、井阑。楼橹顶端设望楼，以瞭望瞰制敌城。在攻城时，同土山配合使用。楼橹上的兵士侦察和报告城中动静，土山上的射手根据其指示发射箭矢。官渡之战中，袁绍作高橹，起

① 《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

②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十一《易水》。

土山，射曹营中。司马懿围攻襄平之战中，起土山，修橹。《三国志·甘宁传》记载，曹仁令五六千人围困吴将甘宁于夷陵城时，“设高楼，雨射城中”①，高楼即高橹。为保持上下平衡，不失重，楼橹上的人数不可过多，不可能“雨射”。“雨射”应该是出自土山，只是《甘宁传》行文求简，没有提到曹仁“起土山”罢了。

井阑，是用木材制造成井栏形状以控制制高点的攻城设施②，作用类似土山。在没有条件或来不及堆筑土山时，紧急制造井阑以代替土山。诸葛亮进攻魏国陈仓城时，“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③，其井阑高达百尺。

土山、地道是用于紧急攻城的军事工程。起土山，目的在据有制高点，发射箭矢，居高临下压制敌军。挖地道，是从地下穿越敌城墙、营围，配合地面部队攻入敌城围内部。在攻城作战中，经常实施起土山、挖地道的工程。诸葛恪在围新城之战中，曾起土山；夏侯尚在围江陵之战、诸葛亮在围陈仓之战中，曾挖地道；袁绍在官渡之战、曹操在攻邺之战、司马懿在攻公孙渊襄平之战中，则同时实施了两种工程。土山、地道在守城中，也偶尔使用，主要是同攻城敌军争夺制高点，阻止敌军由地道攻入城中。如官渡之战中曹操针对袁绍起土山，挖地道，“亦于内作之，以相应”④。诸葛亮攻陈仓城时，挖地道，企图入城，魏将郝昭在城内“穿地横截之”⑤。

四、攻城器械

攻城器械常用冲车、云梯等。云梯和冲车，是古已有之的攻城器械，诸葛亮曾用以攻击陈仓城。吴国有攻城车。张昭侄子张

---

① 《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魏明帝太和二年十二月条“亮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胡三省注“以木交构若井阑状。”

③⑤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

④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奋20岁，"造作攻城大攻车"①。魏将臧霸率轻船袭击徐陵时，"烧攻城车"②。

以上攻城器械，当时称为攻具。攻具又大又笨重，有时是预制，有时是攻城时候临时制作。如曹操攻濮阳吕布时，"令军中促为攻具"③。魏将郝昭临终前承认，他为了制造攻战具，屡次挖掘坟墓，盗取优质木材。为此慨叹将领不可当，还叮嘱儿子不要为自己厚葬④，以免这位盗墓者身后也被盗墓。

第五节　障碍物、军用道路和伪装

一、垒栅、鹿角和堑

军队驻地的周边，通常都要设置野战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一般为非永备筑城，包括地面上的垒、栅、鹿角和地面下的堑等。垒是军营外起防护作用的简易墙壁。由于坞四周有墙，有时也称垒；但是垒通常是指军队驻屯时，在营地周围临时构筑的简易墙，是非永备筑城。渭南之战中，曹军渡渭以后，"地又多沙，不可筑垒"⑤，以后泼水浇沙，天寒结冰，筑成临时用的简易沙墙。遇到特殊地形，筑垒较为困难。司马懿在襄平城外筑垒，由于城北、城东有水面，筑的垒无法合拢，于是把战车相连，放置在水中，再在车上镇放积石，塞以鹿角，筑成水上障碍物，同陆地上的垒相连，终于使其合拢。

栅，是栅栏障碍物。在山地等特殊地形，如在荆、益交界的

---

① 《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三国志集解》卢弼注引官本考证曰："下攻字疑衍"。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④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

⑤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群山中，无处取土构筑围堑，常就地砍伐山间林木，制作木栅代替围堑。孟达所在的上庸城三面阻水，在城外树立木栅自固。攻城的敌军如司马懿，必须先渡水破栅，才能直抵城下。夷陵之战中，刘备在山间驻军，宿营时唯有砍伐山木，以树栅进行自卫。树栅简便易行，缺点是易遭火攻。刘备军在夷陵一带师老兵疲后，木栅这一弱点被陆逊所利用，终于招致覆败。

鹿角，是用伐倒的树木制成的呈鹿角状的障碍物。司马懿谈到其制作方法时说，“又当将斧三百枚，破树木，作鹿角”①。它通常设置在围堑的前沿，以迟滞敌人的进攻。刘备、周瑜把曹仁围困在江陵时，命关羽封锁江陵以北的道路。曹操汝南太守李通南下增援时，遇关羽军，“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②，证明关羽军鹿角设在围的前沿③。吴将甘宁率健儿百余名，夜间“径诣曹公营下，使拔鹿角，逾垒入营”④，也证明鹿角设在营垒的前沿。排除鹿角的方法，一是拔，二是烧。当企图迅速通过鹿角障碍地时，用拔，如李通下马拔鹿角入围；当企图在相持中破坏敌障碍物时，用烧，如刘备以夜暗为掩护，烧坏汉中曹军本营 15 里外的鹿角。曹军主将夏侯渊率兵巡视，及时补上所烧鹿角，但是遭蜀军掩袭身亡。

堑，是壕沟式障碍。一般情况下，凿堑以后，用挖出的土方同时筑围，所以营堑、堑垒、围堑多连称。为了加大堑的障碍，有时还引附近的河流灌注其中。堑往往颇具规模。曹操攻邺城时，所

---

①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兵部·鹿角》引《晋宣帝教》。

② 《三国志》卷十八《李通传》。

③ 关于这次战斗中关羽军鹿角设置的位置，《太平御览》卷三三七《兵部·鹿角》引《王沈魏书》曰：“李通拜汝南太守。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与诸将击之，通亲下马入围拔鹿角，勇冠诸将军。”按，同一件事，陈寿《三国志》说“拔鹿角入围”，王沈说“入围拔鹿角”，初看记载相反，其实陈王都认为鹿角设置在围的前沿。不过陈寿把鹿角计算在围外，而王沈计算在围内，所以表述有异。

④ 《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注引《江表传》。

凿的堑周长达40里，广深2丈。魏军在距襄平城百步凿重堑时，对于近水不能凿堑的沙地，则不凿堑，只是在沙地上筑障，同堑相连。沙地筑障的方法，是用大木椽穿在车轮中，然后把车轮竖置安放，筑成与堑配合的围障①。

垒、栅、堑、鹿角等诸围的应用广泛。军队宿营，特别是接敌宿营时，必须就地筑围，以防敌人侦察、渗透和偷袭。曹将夏侯渊在阳平关防御刘备进攻时，其军筑有东围、南围。军队驻止以后，如果不及时构筑围堑，将处于无依托的易受攻击的不利地位，可能危及军心。董卓部将胡轸率步、骑兵5000去进攻孙坚，到达孙坚所在的阳人城下，夜幕降临，部队来不及构筑堑垒就宿营了。由于失掉了安全感，流传出孙坚军已经出城，正在前来进攻的谣言，军众惊扰不安，终于不战自溃。凿堑、筑障是围城时长期困敌的重要手段。曹操在急攻邺城不下以后，凿堑围城，断绝城内外联系，切断守城部队的粮道，造成其粮食恐慌；三个月以后，城中饿死过半。襄平被司马懿凿堑长期围困后，城中粮尽，人相食。凿堑又是守城时防止敌人沿地道偷袭城中的有力措施。官渡之战中，曹操在营内凿长堑，使袁军的地道进攻不能奏效。为了防御敌人攻城而不是打破其围城时，守城一方也可以在城外筑堑，以增加防御纵深。

二、军用道路

军用道路有急造军路、甬道、栈道和水道。急造军路，是军队为应急通行而修筑的简易道路。曹操取道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北征乌桓时，该卢龙道路从刘秀建武年间以来，陷坏断绝，近二百年。曹军在当地豪强田畴的向导下，探寻旧径，掘山填谷，急造军路500余里，循此路急进，达成战略突然性。曹军在山地

---

①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兵部·鹿角》引司马彪《战略》。

短时间完成的这项巨大工程，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战略上都堪称辉煌成就。

甬道，是为防止敌人抄掠辎重，而在路两旁设有墙垣等障碍和掩蔽的道路。甬道最早筑于秦始皇甘泉宫，以保证皇帝行踪的秘密和安全。秦末章邯、刘邦开始把它用于战争。渭南之战中，曹操西渡黄河以后，沿河构筑甬道，保障河东郡粮草沿甬道安全南下。由于野战中来不及构筑甬道的垣墙，便用连结的车辆和木栅，代替土墙，在仓促条件下筑成临时甬道，也是一个创造。

栈道，或称阁道，是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设的有梁有柱的木质悬空通道，主要分布在蜀道中，以褒斜道上的栈道最为险峻和典型。褒斜道是穿行在秦岭褒谷、斜谷中的谷道。该道有多处需从峭岩陡壁上穿过。为此，在这些崖高水深、车辆无法通行的地段，修筑了栈道。修筑的方法，是在高出通常水位 3～5 米的岩壁上，凿出众多方孔，在孔中安插、架设方形阁梁的一端，另一端立柱承托。诸葛亮同其兄诸葛瑾谈到赤崖以北的阁道时说："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①。立柱除了立在水中以外，也有的以斜柱立在岩壁间，即在同一面岩壁上，在方形岩孔的水平线下，再凿方形或圆形的岩孔，立柱支撑。梁柱相互间用榫卯扣合，梁上铺木板，可以悬空通行一辆车。②

褒斜道是连接益州和关中的主要通道，在东汉末年，时塞时通。初平年间，刘焉把张鲁派到汉中，令其毁坏褒斜栈道，断绝益州同外界的联系，以便于割据。曹操第一次争夺汉中时，鉴于褒斜道不通，走陈仓故道。夺到汉中后，修理了栈道。第二次来同刘备争夺汉中时，才走褒斜道。北伐中，赵云等从褒斜道退兵，"烧毁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③，以阻止魏军追击。蜀建兴六年，诸葛亮对毁坏部分作了修复，但是"今水大而急，不得安

---

①③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十七《沔水》上。

② 参看《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陕西省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

柱"，"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赵云字）与邓伯苗（邓芝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①。太和四年，曹真攻蜀时，发动全部战士在褒斜道"凿路而前"②，边修复该道边进军。诸葛亮去世后，魏延率先沿该道退兵南归，"所过烧绝阁道"③，杨仪等紧追不舍，迅速"槎山（凿山）通道"④，进行修路。钟会灭蜀时，从褒斜等道前进，命牙门将许仪在前修道。褒斜栈道的通塞，成为军事斗争的重要内容；大军每次通过该道时，多数伴有繁重的修理栈道任务。

水道，指为军事目的人工开通的内河运输道路。水道的开通有两种情况：一是凿渠通运。曹操征乌桓前，为了解决军粮北运，开凿平虏、泉州两渠，连通漳水、呼沱河、泒水（在河北，上游为大沙河，下游为大清河）、潞河（今北京通县以下白河），使军粮可从邺城水运到无终（今天津蓟县）。二是遏水通运。曹操攻邺之战前，在淇水入黄河口投进大枋木筑堰，逼淇水改道，流入白沟以通粮道。在解决船只搁浅时，也使用遏水法。曹丕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北）临江观兵回军的路上，舟师航经精湖（今江苏高邮以北）时，由于中渎水的水位降低，数千只战船滞留在数百里的水路上，无法前进。曹丕打算烧掉一半。魏尚书蒋济在水道上开凿四五道地沟，把船只推挽集中在一起，预制大批土豚（土猪，即填土草袋），遏湖蓄水，一时开遏，船只都乘水势大涨，从中渎水进入淮水，驶了回来。

三、伪装

三国时期所见伪装有疑城、象人。疑城是本无城池而伪装成的城池。东吴在曹丕首次临江观兵时，在长江对岸构筑疑城，进

①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十七《沔水》上。

② 《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

③④ 《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行虚声恫吓。其方法是在江边埋设木桩，围上苇席类草编藩篱，上面设假敌楼，江上浮以船只。从石头城到江乘（今江苏南京东北25公里），连绵相接，弥漫绵延，一夜之内，突然出现。起初，东吴众将认为此举无用，只是在建议人徐盛的坚持下才把它建成。建成以后，曹丕隔江遥望，不辨真伪，心中害怕，下令大军撤退，东吴获得理想的效果，众将方才信服。象人是模拟兵士人像以达到欺骗目的的伪装。关羽败走麦城时，孙权派人进行诱降，关羽伪降，在城上树立幡旗和象人，伪装继续留在麦城，欺骗吴军，实际率部逃出了该城。

第六节　舰船和水上设障破障

一、舰　船

舰船是水上军用船只。根据作战中所处的地位，分为主力和非主力舰船；根据任务可分为战船，冲撞船，运船；根据体积可分为大船、小船；根据航行处所，可分为内河舰船和海船。

主力舰船，是活跃在长江江面上的蒙冲、斗舰等战船。“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①。吴国蒙冲、斗舰的规模更超过刘表。吴将贺齐的“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②。三国时期蒙冲、斗舰的具体情况不详，但是同唐杜佑《通典》所记，应较为接近。据《通典》，蒙冲是冲撞船，船体狭长，航速较快，常乘人之不及规避，冲撞敌船。船背蒙盖生牛皮，两厢凿棹孔，前后左右设弩窗、矛穴，使敌人无法逼近，矢石不能毁坏。③ 斗舰是战斗之船，船上设女墙，高3尺，墙下开设棹孔；又修建船棚，同女墙齐高，

①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② 《三国志》卷六十《贺齐传》。

③ 据《通典》卷一六〇《水平及水战具·蒙冲》。

棚内高5尺，棚上又修建女墙，上面不建顶棚。前后左右树立牙旗、幡帜、金鼓。①

楼船是大型指挥舰船。上建三重楼，最大者建五重楼，列有女墙，树立幡帜，开设弩窗、矛穴，形状像城垒。由于上层建筑太高，稳定性能较差，遇暴风极容易翻船。如孙权“使（董）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②。又如孙权在武昌新装大船，在钓台圻试航时，风大盛，亲近监谷利从安全出发，违反孙权命令，拔刀令柂工转航。孙权所乘显然是楼船，谷利令转航，是因为“船楼装高，邂逅颠危”③，所以敢于以死相争。

走舸是快速冲击型战船，往返如飞，能乘人所不及。黄盖火烧曹营时，“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④。走舸上设有女墙，列有金鼓旗帜。划船的棹夫多，战士少，战士都精锐有勇力。

江上轻型运兵船，有油船，“以牛皮为之，外施油以扞水”⑤。油船可能是魏国的发明，为魏国大量使用。曹操、曹仁、夏侯尚等曾指挥部队乘油船偷渡长江上的濡须中洲和江陵中洲。以上楼船、斗舰属大船，蒙冲、走舸、油船属小船。小船也有一定的规模，当时称吴国出使句骊的谢宏所乘的“船小”，但该船仍然能“载马八十匹而还”⑥。

舰船中可出海者为海船。孙权派将军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又派将军、校尉等由海路前往辽东，都是乘海船前往。司马昭“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⑦，则三国鼎立后期魏国也有了海船。

舰船有缆绳，称为緶绁。黄武元年，吴军“以舟师拒魏将曹

---

① 据《通典》卷一六〇《水平及水战具·斗舰》。

② 《三国志》卷五十五《董袭传》。

③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④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⑤ 《资治通鉴》卷七十魏文帝黄初四年二月条胡三省注。

⑥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吴书》。

⑦ 《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

休于洞口。值天大风，诸船绠绁断绝，漂没著岸，为魏军所获”①。绠绁是把船只固定在码头上的缆绳，绠绁一断，狂风把吴船从南岸吹到北岸，造成吴军失利。舰船有舵，称为柂。还有利用风力的帆。赤壁之战中黄盖“因以十艇最著前，中江举帆”②。各方舰船可以识别。赤壁战前，刘备在樊口，每天派侦察人员“逻吏”在江边观察等候孙权水军前来会合。逻吏望见周瑜舰船，骑马报告刘备，刘备问，根据什么判断，知道来的不是北方青、徐曹军？回答说：“以船知之”，可见当时魏、吴的船只是可识别的，何方船只，一望而知。至于其识别标志是船形不同，还是另有其它标志，则不得而知。吴将贺齐性喜奢靡绮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③，即对于他乘坐的船给予加工雕刻，红漆彩饰，张设青盖红帷。这样的船，当然远望易于识别。

二、火船、火筏

火船、火筏是水战中用以纵火用的小型战船。赤壁之战中，黄盖“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④，这是火船。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时，作浮桥，连接江北岸与百里洲。吴将潘璋到上流 50 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⑤。当这个大筏顺流而下，将要漂向浮桥所在的水面时，自身的芦苇立即被点燃。大筏将带着火势冲向浮桥，把它焚毁。由于大筏是一个庞然大物，因此又叫做水城。

---

① 《三国志》卷五十七《吾粲传》。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 《三国志》卷六十《贺齐传》。

④ 《三国志》卷五十四《黄盖传》注引《江表传》。

⑤ 《三国志》卷五十五《潘璋传》。此事《吴录》记载为，“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吴录》）。

三、水上设障破障

设障器材有铁锁、铁锥等。在晋灭吴之战中，吴人在丹阳（今湖北秭归西南）以下三峡“险碛要害之处”，用铁锁横截江面，又用“长丈余”① 的铁锥秘密插置江中，以迟滞晋军战船。横截江面的铁索至少需百米以上，跨江架设，难度很大。水中铁锥早有，《水经注》说，“按郭颁《世语》及干宝《晋记》，并言中牟县故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或言在中阳城池台，未知焉是。”② 水中置铁锥不是新发明，但是放置在激湍的江水中，并把它固定住，技术上是一大进步。

晋将羊祜俘获吴军间谍，具知吴军水中设障情状，其水上破障技术是：1、以筏吸锥。鉴于铁锥可戳漏战船，便以不怕戳的大筏先行。筏遇见并吸附铁锥，铁锥随筏而去。大筏有数十只，每只方圆各百余步，数量多，覆盖面积大，可把江中铁锥基本破尽。2、猛火烧断铁锁。制作火炬，长 10 余丈，大数十围，灌上麻油，置船前，遇铁锁，燃火炬，须臾，烧处铁锁熔化为铁汁，铁锁断绝，水路畅通。

---

①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② 《水经注校》卷二十二《渠水》。

第十七章 战 术

第一节 行军和移营

一、行 军

三国军队由于运动战较多，经常需要转移兵力，实施机动，进行行军。尤其是曹魏，作战地域辽阔，其战略机动部队经常在东、西两线轮番作战，进行频繁调动，行军成为家常便饭。在大量的实践中，创造出曹操长途袭击乌桓、长途追击刘备、司马懿奔袭新城孟达、邓艾通过阴平小路等著名行军。从其实践看，三国时期的行军有如下特点：

有比较详尽的分类。由于对行军的认识加深，能从多种角度对行军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是：按地形，分为“平涂之行军”① 和“山行”(山地行军)②；按方式，分为徒步行军和骑兵行军；按负载，分为“轻行”和“重行”，轻行即卷甲而行，卷起的甲胄放在辎重车上；按速度，分为常行军和“急疾”行军(或倍道“兼行”)③。

善于对行军进行比较精确的计算。对于各种情况下行军速度掌握得比较准确，制定计划时有可靠的数据。常行军速度，同汉代一样，每天“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④。司马懿征辽东，单

---

① 《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③ 《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注引《魏书》“渊为将，赴急疾”。《晋书》卷一《宣帝纪》“帝曰：‘……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

④ 《汉书》卷七十《陈汤传》。

程4000余里，事前按照轻行和重行的平均数每天40里这个数据进行了计算，预计行军时间为“往百日，还百日”①。事后证明，这个计算符合实际，比较精确。

高速行军增多。军情紧急时为提高速度，较多地采用急疾行军。急疾行军达到较高的速度。例如日行军速度，夏侯渊达到160里，司马懿达到150里。夏侯渊以急疾行军闻名，经常凭此出敌不意。军中编为谣谚道：“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② 司马懿在奔袭孟达时，所在的宛（今河南南阳）距孟达新城（治所在今湖北房县）1200里，以急疾行军，“八日到其城下”③，速度接近夏侯渊。夏侯渊和司马懿创造的急疾行军速度，是以骑兵行军方式创造出来的。步行不能达到这一速度。做为个别人，是可以达到的。吴国的虞翻，对孙策自称“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讨以来，吏民无及翻者，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④ 步行速度甚至超过了夏侯渊和司马懿骑兵行军的速度；做为军队，如此高的速度，只有骑兵才可达到。

组织实施比较严密。三国对行军进行严密的组织。以曹魏为例，其行军的组织与实施情况是：

1、认真组织侦察，察明行军沿途情况。曹操征汉中刘备时，走南山（今秦岭）褒斜道，鉴于该道是数百里的谷道，情况复杂，险峻难行，行前派贾逵到该道北口斜谷“观形势”⑤，就近观察、判断沿途敌我双方的有关情况。

2、礼请向导带路。曹操北征乌桓时，中途改变行军路线出卢龙。这条新选择的路线，是200年前修建的道路，当时陷坏断绝，仅有微径可通，外来人无法辨认。曹操聘请当地人田畴率其部曲，做为行军向导。

---

①③《晋书》卷一《宣帝纪》。

②《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

④《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

⑤《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

3、建立运动保障，在前面"治道""通路"。曹操从散关经武都进入汉中，先派张郃率步卒5000在前面"通路"①。"通路"的任务，既包括扫清小股敌人，也包括为大军修通进军道路。钟会取蜀，取道斜谷、骆谷进入汉中，命令牙门将许仪在前面"治道"②。许仪所部，类似今天的运动保障队。曹真征蜀，在子午谷中行军，遇上霖雨不止，山路峻滑，部队逼迫不能展开。走了一个月，只通过该谷一半路程。由于"深入险阻，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③。治道工程比平时艰巨百倍，因此动员了全部战斗之士参加，被王肃指责为冒了"行军者之大忌"④。

4、设立行军警戒，保障行军安全。曹操第二次进入汉中时，"军遮要以临汉中"⑤，即派出先头部队，守卫褒斜道上要害处，以防止刘备军的伏击，保障曹操大军的行军安全。

二、移营

军队从旧的宿营地，经过行军转移到新的宿营地，称为移营。诸葛亮在《兵要》⑥中，对移营规定了如下要求。

移营前，作好充分准备。首先派遣身边亲信及向导在前方侦察，确实弄清情况；他们各令下级侦察军官候吏提前出发，确定宿营地点；按照五军的编制，在新营地建立四表（旗帜等高大的标志物），然后移营。

移营中，作好侦察和情况通报。其作法是，派出负责侦察的

---

①《三国志》卷十七《张郃传》。

②《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

③④《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

⑤《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按，"遮要"之意，胡三省通鉴注曰："斜谷道险，操恐为备所邀截，先以军截要害之处，乃进临汉中。"又，《三国志》卷十一《田畴传》"虏亦遮守蹊要"，即此"遮要"之意。

⑥《太平御览》卷三三一《斥候》引《诸葛亮兵要》。

候骑，在大军前面行进，侦察并随时报告前方地形、地貌、道路、灾情等影响行军的情况。候骑手持五色旗，见沟坑举黄旗示意，见路口举白旗示意，见水涧举黑旗示意，见树林沼泽举青旗示意，见野火举赤旗示意。大军见此五种预报，则回应以相应的五种鼓声，表示看见了，以后并需多次呼应。在行军途中，建立这种旗鼓通信，让前后互相间看得见，听得着。

在特殊地形移营，应加强侦察和警戒。当渡水翻山，穿越深林时，派出精骁的骑兵，搜索数里之内；没有发现声响，四周也无人迹，再令人攀上高山和树梢，瞭望远处，向四方派出精兵，守住要害处。

移营中按序列行军。在队伍前后方各指定兵力，担任掩护和开路。行军次序，以辎重老小在先，其次步兵，最后骑兵。最紧要的，在保持整齐、肃静，防止把敌人引来，人马保持无声，部队不失行列。在险要地形和狭窄路径上，也应按照部曲的编制，鱼鳞般有序前进。有时需要以后部为前部，以左翼为右翼。行则鱼贯而行；止则像群雁般保持行列。

到达预定宿营地后，按五阵组织宿营。游骑和精锐部队在四个方向上散开部署；各部队依据赋予本队的方向下营，一人占据一步面积，依据人数多寡，确定营区范围。都按子、丑、寅、卯等十二辰（古代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辰表示时间，此处表示方位。）的方位立表，竖起大旌，长 2 丈 8 尺，辨清子、午、卯、酉地的方位，不要发生偏斜。竖旗时，以朱雀旃竖在午地，白虎旃竖在酉地，玄武旃竖在子地，青龙旃竖在卯地，招福旃竖在中央。樵采、放牧、饮水，只允许在四方旗标志的营区范围内，不允许越过表外。

第二节 侦察和通信

一、侦 察

侦察人员在三国时期称为候、候者、斥候、侦候。当汉末战

争初起时，有的割据者不懂得，也不会以人员潜入远方，获取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因此作战经常受挫。如初平中，青州刺史焦和的部队，人数众多，兵器装备良好，却不设置“耳目侦逻”①，作战时情况不明，人心惶惶，谣言无端而至，望见敌人就跑。

后来三国的将领，作战经验丰富了，很重视侦察，把远远派出斥候，作为“不可胜”的重要措施，如徐晃“将军常远斥候，先为不可胜，然后战”②。边将也把向远方派出斥候，做为巩固边防的重要措施。吴国孙韶任边将数十年，“常以警疆埸远斥候为务，先知动静而为之备，故鲜有负败”③。魏国南北边界上的侦察，也都很严密。雁门郡在北方边界，饱受“寇钞不断”④的骚扰，太守牵招免除乌桓500多家的租调，让他们自备鞍马，充当“侦候”远出。每次“虏”敌来犯，都及早掌握情况，率兵迎击，敌来即被击破。豫州南近东吴，州刺史贾逵公开设置“斥候”，修缮甲兵，做好战备，使得吴人不敢侵犯。

通过侦察，有时可截获到敌方重大情报，不战即可改变战局。嘉禾五年（236年），孙权北征，命陆逊、诸葛瑾进攻襄阳，陆逊派遣亲信韩扁，带着表文向孙权汇报。魏军侦察小队在沔中捕获到返回途中的韩扁，全部掌握了孙权已退兵及陆逊、诸葛瑾军的“阔狭”⑤。在此情况下，陆逊、诸葛瑾不得不迅速退兵。

对于敌方侦察，应设法破坏。特别是偷袭敌人时，破坏敌之侦察是成功的重要保障。吴将吕蒙从水路偷袭关羽后方江陵时，到达关羽设置的江边“屯候”，全部把他们俘虏，使得关羽留守军“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得举”⑥，在抗曹前方的关羽无法知晓江陵危

---

① 《三国志》卷七《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② 《三国志》卷十七《徐晃传》。

③ 《三国志》卷五十一《孙韶传》。

④ 《三国志》卷二十六《牵招传》。

⑤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⑥ 《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注引《吴书》。

急，从而保障了吴军偷袭成功。

二、通 信

三国时期，有较完备的通信体系。当需要在战场范围内传递军令军情时，使用战阵通信，用金、鼓、角和旌旗，借助军人的听觉和视觉，传递指挥信息。

金鼓是战阵通信的主要工具，成为交战象征，两军没有交战，称为“未尝接风尘交旗鼓”①。金鼓以发音传达军令。金鼓音的含义，靠约定。曹操的《步战令》规定，严鼓一通，步骑兵全部穿上战衣；再通，骑兵上马，步兵结屯；三通，按次序出营，随幡所指；急鼓音，整阵。《骑战令》规定，三鼓音，从两头进战；三金音，回兵。《船战令》规定，擂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都就船；三通，大小战船依次序出发。通常，由金鼓手根据主将命令击金鼓发令，偶尔主将也亲自击金鼓，以鼓励士气，及时准确地发令。孙策在征讨黄祖的作战中，“手击急鼓，以齐战势”②。陈登从匡琦城出击孙策派遣军时，“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③

角或单用，或者同鼓合用。袁绍在围攻易京公孙瓒的作战中，“鼓角鸣于地中”。被攻者听了地道中发出的这种号角和鼓音，往往毛骨悚然，感到敌人“似若神鬼”④。

旌旗是将帅标志。人们见旌幡可以知将。刘备在官渡战前夺占徐州后，候骑报告说，曹操亲自带兵前来征讨。刘备不信，率数十骑外出哨探，远远望见旌麾，知道曹操真的来到，因为他认得曹操的旌麾。旌旗又用于指示主将发令行动的方向。曹操在《步战令》

① 《三国志》卷七《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注引《吴录》。

③ 《三国志》卷七《吕布传附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④ 《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典略》。

中，诸葛亮在《军令》中，都要求部队根据旗幡指示的方向行动，“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①。为了使旗鼓起到传达指挥意图的通信作用，要求部队临阵集中注意力。例如诸葛亮要求：“凡战，临阵皆无喧哗，明听鼓音，谨视幡麾”②。

当需要在战场范围外传递军令军情时，则通过邮驿和烽燧，进行远途接力通信。邮驿是由亭传、驿道、驿马等组成的长途通信系统。在其长途通信线上，建有一批专门为传递文书的驿使供应食宿和车马的驿站，即亭传。其设在驿道上的，叫传舍；不设在驿道上的，叫邮传。刘备在益州时，由于蜀道难行，特别注重邮驿建设，以及时掌握远方军情，指挥远方作战或后勤供应。他“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到白水关，建设传舍400多区③，构成了通向北部地区的远途邮驿线。在夷陵之战中，为了同国内通信，自夷陵直达白帝，沿途设置驿站。这一战时邮驿系统，沟通了前后方联系；在众军溃散时，唯有其驿人担着遗弃的铙铠，在隘口焚烧，阻止追兵，掩护刘备脱险。

在邮驿系统中，还备有一批专门用于传递邮件的驿马。黄初三年曹休征吴时，上表称愿意虎步江南，魏文帝以驿马传递紧急诏命，制止其渡江。凡是军情紧急，都在文书上插鸟羽，称为羽檄。凡羽檄，必须火急传递。

邮驿通信，传递情况详细，保密性能良好，速度也较快；但是建设和维护费用高，特急军情的传递速度，仍然不适应要求。此时则选用烽火通信。烽火是警报报知通信，利用烟火，追风逐电，传递敌人入侵警报等简单的军事信息，速度极快。吴国以此方式，在沿江设置烽燧，组织起高速的沿江长途通信。庾阐的《扬都赋》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

---

① 《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引曹操《步战令》，《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兵部·法令》引魏武《军令》、卷三四一《兵部·麾》引诸葛亮《军令》。

② 《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兵部·麾》引诸葛亮《军令》。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典略》。

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① 合暮是傍晚，三鼓在半夜子时，即 23 时至次日 1 时，南沙是吴县司盐都尉署所在地（今江苏常熟西北）。只上半夜，西部重镇西陵的警报，使用江边烽火通信，就传递到一千数百里外的吴郡。

烽火通信在北方也有广泛应用。东汉末年青、幽、冀三州战火不断，当时人说这是“烽火相望，羽檄相逮”②，刺史张既为防备羌胡，也在其凉州境内设置烽堠。

烽火有时也用于战场通信。被分割的两支可望而不可及的部队，如被困守城和救援部队间，如果以烽火进行联络，可使彼此心领神会，而且简便易行。袁尚回援邺城时，在城外 17 里“举火以示城中，城中亦举火相应”③，双方在隔绝状态下传递了目视可见的信息。公孙瓒去信，要求在外地的儿子为援救被围的易京而发起攻击时，在城北燃烽火告知，届时自己将从城里向外突击。烽火通信信息简单，但仍存在着保密和窃密的斗争。袁绍截获公孙瓒的信，如期举火。公孙瓒不知通信落入敌手，误以为援兵来到，出军求战，遭到袁绍伏兵攻击，大败而回。

第三节　战阵

一、战阵基本情况

战阵是为了提高效率，把兵力列成适应敌情、己情、地形用于交战的战斗队形。由于阵中兵力部署有序，协同密切，队列队形严格，变化复杂，因此其整体作战效能获得极大增强。据《三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庾阐《扬都赋》。

② 《三国志》卷八《公孙渊传》注引《魏书》。

③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国志》及裴注记载，三国时期战阵用于：

1、野战。界桥之战中，公孙瓒以步骑兵4万余人列为方阵，与袁绍步骑兵数万结阵相对，进行野战。① 吴天纪四年（280年），吴国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阳太守沈莹率部3万渡江，围降西晋成阳都尉张乔7000部队。尔后与西晋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浚相遇，两军列阵交战。②

2、劣势步兵防御优势骑兵。鄢陵侯曹彰北征中，在涿郡遭到胡人数千骑兵伏击。当时兵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骑兵数百匹。将士扰乱，不知如何应战。曹彰相田豫根据地形，以军车结成圜阵，阵内弓弩持满，疑兵部署于车隙，进行固守。在车阵防御下，胡人优势骑兵无法前进，被迫散去。③

3、显示军威。曹操同关西军野战中，为分化韩遂、马超，在阵前同韩遂叙旧，又以铁骑5000，列成十重阵，精光耀日，关西军益发震惊、恐惧。④

4、运粮队伍的后勤防卫。任峻主管曹军粮食运输时，敌人屡次抄绝粮道。为了进行有效防卫，任峻把辎重车千乘编组为一部，每部以十路纵队结成方阵前进，并在其外列成复阵，对辎重车队进行护卫。由于复阵护卫严密，敌人不敢再接近辎重车了。⑤

5、受阅。曹操在其所封王国魏国建立立秋日讲武制度，在该日检阅受阅部队演习八阵进退。⑥

用阵难度较大。阵战时，要求将领具有列阵、用阵能力，兵士经过严格阵战训练。像蛰居深山的丹阳山越，虽然剽悍，由于不具备列阵的知识和素养，野战只能是“战则蜂至，败则鸟窜”⑦。

---

① 参见《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② 参见《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

③ 参见《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传》，卷十九《任城威王传》。

④⑥ 参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⑤ 参见《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

⑦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汉末和三国形成期间，战阵在战事较多的内地相当普及，连边郡一些百姓也不生疏，如雁门太守牵招，“教民战陈（阵）”①。三国鼎立以后，随着战事减少，新将士对战阵生疏起来。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时，只剩下“宿将旧卒，犹习战陈”② 了。

二、阵内兵种、兵力和部署

阵内兵种，一般以步、骑兵为主。公孙瓒方阵步兵3万，两翼突骑1万，阵中白马义从数千③，骑兵共一万数千，步骑比例为2∶1。田豫圜阵步兵千人，骑兵数百，步骑比例大体同于公孙瓒方阵。有时以单兵种如以骑兵列阵。王沈《魏书》说，在潼关渭南之战中，曹操“又列十重阵”。这话可以理解为曹操列成步兵阵以后，又列骑兵十重阵。十重阵固然纯由骑兵组成，但从总体上看，该阵骑兵仍然同步兵配合作战。

许多阵配置了弩兵。袁绍界桥之战中的战阵，至少配置了上千强弩兵。田豫圜阵也配置有弩兵，是杀伤敌骑兵的重要兵种。

一些阵还有车兵。其军车在战阵中用作障碍物。田豫用车辆构成阵外环形障碍，防御胡人骑兵。诸葛亮的《军令》要求在防御骑兵时，用车蒙在阵外④。这些说明，在野战中车兵是防御敌骑兵冲击、增强防御稳定的重要兵种。

战阵所用兵力不等。较大规模的阵，如公孙瓒方阵，用兵4万数千；袁绍之阵，用兵数万；张悌之阵，用兵3．7万。中等规模的如曹操十重阵，用兵5000。较小规模的如田豫圜阵，用兵一千

① 《三国志》卷二十六《牵招传》。

② 《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传》。

③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公孙瓒“因虏所忌，简其白马数千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

④ 《北堂书钞》卷一一七《武功部·阵》引“诸葛亮教”云：“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

数百。

在战阵内，上述兵力往往区分为先登、中坚、殿后和翼。先登部署在对敌正面，即阵首，承担冲阵反冲阵的任务。袁绍把800名步兵部署为先登，同时部署千张强弩在它的两侧后。张悌也把其丹杨锐卒刀盾5000兵，部署为先登。中坚部署在阵中，如公孙瓒把亲随兵白马义从两校，部署为方阵的中坚。殿兵部署在阵后，承担掩护退却的任务。公孙瓒在其方阵后部，部署殿后之兵。当他在界桥之战中战败，袁绍大将麹义追至界桥时，“瓒殿兵还战桥上”①，掩护了大军的撤退。翼又称侧或头，部署在阵的翼侧，承担翼侧进攻或掩护的任务。公孙瓒把突骑5000，部署为方阵的左、右翼。诸葛亮把骑兵一部部署为连衡阵的“护侧骑”。曹操《步战令》：“临战，陈骑皆当在军两头”②，即把“阵骑”部署在两翼。

曹操将其战阵中的骑兵专项区分为陷骑、游骑和阵骑。陷骑部署在阵前，赋予陷阵即冲阵的任务；游骑部署在阵后③，赋予掩护退却的任务；阵骑部署在两翼，赋予进攻和掩护的任务。骑兵于是形成前、中、后三分的部署。后人把这种部署方法称为“三覆之义”④。

三、基本阵法

阵战虽然一度相当流行，但是由于兵家保密、口口相传等原因，关于阵法的记载十分稀少，且多语焉不详。然而辑《三国志》和裴注及唐宋类书等可信史料后，其阵法尚可约略窥见一二：

1、列阵法。曹操《步战令》规定，列阵前，部队准备。听到

---

①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② 《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引曹操《步战令》。

③ 《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引曹操《步战令》“前陷，陈骑次之，游骑在后。”

④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严鼓(打警备的急鼓点)一通,步、骑兵全部穿上战衣;听到第二通,骑兵上马,步兵结屯;听到第三通,按次序出营,随幡指示方向前进。不出营的部队结屯,屯驻幡后,听到急鼓音时,开始整阵。斥候先视察地形广狭,确定阵地四角方位,在各方位立表,即立起旌旗等高大明显标志物,以标志各部队阵位。各部队听到列阵号令,进入表所标明位置,排成有疏有密的队形,阵就列成了。

诸葛亮规定,连衡阵骑兵不得离阵;护侧骑兵同本阵保持稍远距离①。

2、交战法。在交战前,双方先列阵相对。界桥之战中,公孙瓒和袁绍列阵相对。板桥之战中,晋吴双方也"成阵相对"②。然后由进攻一方以位于阵首的先登部队发起冲阵,攻击敌人阵首,力求在敌阵打开突破口。在板桥之战中,吴军以3万兵力列阵,用其中的5000精锐青巾军刀盾手冲阵,"以驰淮南军"③。在界桥之战中,公孙瓒欺袁绍方面麴义兵少,放出骑兵进行冲阵。冲阵是阵战的初战,成功与否,给予以后的战斗以重大的影响。

冲阵如果得手,先登后面的主力部队将乘胜攻击,扩大战果;冲阵如果失利,全阵将遭到对方反击。张悌的先登冲阵,"三冲不动"④,部队疲劳,退军时"引乱",晋军"因其乱而乘之,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晋军又"出其后"⑤,吴军大败。

公孙瓒以骑兵组成的先登冲阵时,对方麴义军躲伏在盾下不动,待冲阵骑兵逼近数十步时,"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⑥。麴义近战反击得手后,袁绍大军乘势跟进,从反冲阵发展为追击战,临阵斩甲首千余级,公孙瓒军溃逃。此时,双方再也不能保持严整的阵形,出现了混战的局面。公孙瓒军"步骑奔走"⑦,既不成阵形,也不再回营,四散而逃。袁军大部队前出追击,袁绍本人及护卫他的百余名大戟士,孤立地落

---

① 《北堂书钞》卷一一七《武功部·阵》引诸葛亮《军令》。

②③④⑤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

⑥⑦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在后面，同公孙瓒奔散的 2000 步、骑兵发生遭遇，落入包围，几乎被难。

3、骑兵运用法。曹操《步战令》规定，步、骑兵作战时，如果发现地势有利，可以临阵派出骑兵单独发起进攻。骑兵离阵以后，听从本阵金鼓旌麾的指挥。听到三通鼓音时，从两翼前出作战。听到三通金音时，退回本阵。

4、车兵运用法。在遭遇到敌人骑兵突然袭击时，令车兵把车蒙在阵外，设成障碍物，掩护部队转入仓促防御，增强防御的稳定性。田豫在其圜阵中，诸葛亮在其《贼骑来教》指示的列阵法中，都是这么运用车兵的。

5、战船运用法。曹操《船战令》规定，战船列阵出战。听到擂鼓第一通，吏士着装待命。听到第二通，棹（摇船的用具）手什伍上船，整理并手持棹；战士各持兵器上船，到达战位；幢幡旗鼓，各随将领上船。听到第三通，大小战船依次出发。航行中左船不得至右，右船不得至左，前后次序不得调换。

6、临阵纪律及执行。曹操制定的临阵纪律及执行如下①：

——执行金鼓旌旗命令。阵内指挥命令由金鼓旌旗向全阵发布，全阵必须坚决执行之。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

——保持阵形整齐。为了发挥阵的整体作战能力，临阵阵形必须整齐：没有将军麾令，在阵间妄自前、后、左、右行动的，斩；吏士向阵中骑马、驰马的，斩；追击敌人时，不得独自在前或在后，犯令的，罚金四两；士卒将要进入战斗时，不得妄取牛马衣物，犯令的，斩；前出交战，士卒各随其号令，不随号令的，有功不赏；后列兵突出到前列，前列兵落入后列的，有功不赏。

——奋勇杀敌。伍中有不前进的，伍长杀掉他；伍长有不前进的，什长杀掉他；什长有不前进的，都伯杀掉他。一部受敌，各部不前出援救的，斩。士卒临阵逃回的，斩。逃回家满一天，家

① 《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引曹操《步战令》。

人不逮捕，不报告，全家同罪。临战时，兵器弓弩不得离阵；如果离阵，伍长、什长不检举揭发的，与犯人同罪。

阵中特设监督人员，监督金鼓旌旗命令的执行，监督阵形的整齐，监督将士奋勇杀敌。列阵时，兵曹在现场，随时向主将举报不按列阵命令行动的人员。

阵内督战部曲将监战。战时拔鞘出刃，在队伍后面，督察并杀掉违令不前进者。临阵，各部曲都督统率吏士，各在战时监督自己的部曲，督住阵后，监察一切违令者和畏懦者。

第四节　八阵图

一、诸葛亮革新八阵

诸葛亮主政以后，蜀军作战的对象、地形和作战方式改变了，作战对象由对东吴的水、步兵，改变为对魏国的步、骑兵；作战地形由荆州的江河及水网地，改变为陇右山地高原地；作战方式由水战、水陆联合作战，改变为在山地高原地进行陆战。为了适应上述改变，蜀军战术必须上台阶，擅长以步敌骑。于是诸葛亮企图从当时流行的八阵入手，进行战术革新。

八阵是诸葛亮以前已有的阵法。孙子有八阵，其阵图著录在《汉书·艺文志》中①。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孙子八阵有“苹车之阵”②，是利用“对敌自蔽隐之车”③，构成的防御阵式。孙子百余年以后，《孙膑兵法》也有《八阵》篇。到了东汉，作战和训练中普遍使用八阵。车骑将军窦宪“勒以八阵”④，大破匈奴北单于。汉制，五营士每年十月进行都试，主要受阅内容也是“八阵

---

① 所谓“吴孙子兵法”“图九卷”，此图即是孙子阵图。

②③ 《周礼注疏》卷二十七《春官宗伯·车仆》注。

④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附窦宪传》。

进退"①，"兵、官皆肆孙、吴兵法六十四阵"②。这种八阵或六十四阵，称为"乘之"③。到了东汉末年战乱年代，乘之更为流行，成为"士民素习"④的项目，也是诸葛亮所熟悉的战阵。

诸葛亮从蜀军步兵比例高、弩兵战斗力强的实际出发，企图使原有的八阵更加有效地防御魏军的优势骑兵，发挥蜀军步兵、尤其是弩兵的特长，更加适合山地高原地作战的地形。他协调蜀军的步、弩、骑、车等兵种和矛、戟、刀、斧、弓、弩、彭排等兵器，以其擅长的巧妙思维"推演兵法，作八阵图"⑤。他的八阵图，是植根于古八阵基础上创新的阵图。所谓阵图，是压缩显示阵法的图形，例如把阵法画在帛上、纸上或者用砂石等物堆砌在地上，制成形象直观的实物，就成了阵图。诸葛亮八阵图，蕴含了其革新后的八阵法的信息。

诸葛亮对八阵图很满意，自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⑥ 当时人评价也极高。诸葛亮对手司马懿，巡视其退兵后的营垒、处所时叹道："天下奇才也"⑦。晋太傅掾李兴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⑧。李兴距诸葛亮不久，证明当时人公认诸葛亮八阵图带有孙子、吴起所不曾有的创新内容。

诸葛亮没有留下记录其阵法的文字，其八阵法在唐代失传了⑨。但是据说诸葛亮曾经垒石作八阵图，留下三处八阵图的实物遗迹⑩：第一处，在鱼腹江边沙石滩上。北魏郦道元记载该地，"江水又东迳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垒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

①③④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中》。

⑤⑦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⑥⑩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三十三《江水一》。

⑧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

⑨ 参见作者《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① 刘宋盛宏之也说：它的“行八聚，聚间相去二丈”②。第二处，在汉中定军山以东的高平旧垒。《水经注》说，沔阳故城，南对定军山。“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钟士季征蜀，枉驾设祠营东，即八阵图也，遗基略在，崩褫难识”③。第三处，在新都弥牟镇（今属成都）。这三处遗迹中，以第一处保存最好，直到宋代还约略可见。鱼腹江边这八八六十四堆垒石遗迹，包含着八阵法信息。现参照兵学家对它所含信息的破译，结合残存的诸葛亮阵法言论进行考证，试对八阵图可能的遗制略述一二。

二、阵式编成及编成的原则

（一）阵式编成

八阵是集团方阵。从阵式编成上看，每个八阵都具有八个方向。每一个方向，都编有一个中阵。全阵八个方向，编有八个中阵，分别赋予天、地、风、云和龙、虎、鸟、蛇的代号。分别地看，是八个中阵，合起来看，八个中阵组成一个大阵，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④。八阵由此得名。八阵的中央，是大将及直属的余奇之兵，即“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⑤。根据“阵数有九”⑥的说法，八阵中央也可视为一个中阵，因此宋代有时又把八阵称作九军阵。

每个中阵，平时编组为六小阵，中央编组为十六小阵，整个大方阵共六十四小阵，正符合鱼腹遗迹八八六十四堆垒石之数。大方阵之后，可能还有游骑二十四小阵，则共编为八十八小阵。有的兵学家推测，游骑的编组，是将二小阵编组为一组，将三组编

---

① 〔南宋〕王应麟：《玉海》引晋人薛士龙及《成都图经》。

② 〔清〕张澍：《诸葛亮集》卷四引盛宏之《荆州记》。

③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十七《沔水上》。

④⑤⑥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为一冲，共四冲十二组。为了防御时迟滞敌之进攻，在八阵的外围还设置了冲车和鹿角等障碍物。

（二）编成的原则

在编成时，阵内兵力的部署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包容和对称。八阵的大、中、小阵之间，在编成中具有包含容纳的关系。大阵由中阵编成，中阵由小阵编组。从全阵看，“阵间容阵，队间容队”①，“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②。在编成的阵式结构上，则保持两两平衡，形成“隅落钩连，曲折相对”③（阵的角落互相牵连呼应，一曲一折，彼此相对）的状态。诸葛亮《军令》所提到的左右阵和甲乙校④，是阵式对称的体现。

第二个原则，是中外和离合。八阵在兵力配置上，区分为中外，即区分为中央和外围。其主要兵力配置在外围；以少而精的兵力配置在中央，形成厚外薄中、外重中轻、外实中虚的兵力部署。“八阵之法，虚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阵法，皆虚其中焉”⑤。在配置阵地时，讲究离合。阵地上，往往有丘阜、沟堑、林木等地形障碍；因此讲究离，对其兵力进行必要的分散配置，以避开障碍，又讲究合，在分散配置以后，能在统一指挥下迅速合成作战。

第三个原则，是奇正。编成时，把部队区分为正兵，即常规作战部队，和奇兵，即非常规作战部队。在区分奇正时，是把八个中阵区分为“四为正，四为奇”⑥。在部署奇正时，“各以一正而

---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②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④ 《太平御览》卷三五七《兵部·彭排》引诸葛亮《军令》“帐下及右阵各持彭排”，说明阵内含有左、右阵。《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记司马炎曾派陈勰学习“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这显然是去学习诸葛亮战术中创新和精华部分八阵图。由此可见，八阵图中有甲乙校。左右阵和甲乙校，都是对称的两部分。

⑤ 《八阵图序》，见《武编》前集卷三，《武备志》卷五十二《阵》五。

⑥ 《握奇经》经文。《中国兵书集成》据明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影印。

间于一奇”①。在八个中阵之外，还区分出“余奇”之兵②，即中央大将直接掌握的直属机动部队。此外，从其它方面着眼，也可以区分奇正，如以六十四阵为正，二十四阵为奇；以营为正，阵为奇，等等。

三、基本阵法

（一）列阵之法

诸葛亮八阵由宿营时的五阵变化而来。诸葛亮宿营采用五阵的部署。五阵相传是根据古代丘井之法制定的。丘井之法是一块井田划出四条交叉的道路，八家共处其中，形状像“井”字，开方是九。列阵时，按此格局，把“井”字的四隅做为无兵的闲地，只在前、后、左、右、中五处部署实兵，形成八阵的起点五阵，即“数起于五”。作战时，把五阵中央大部兵力调到四块闲地上，做到“虚其中”，使“中心”仅存“零者”。调出的四支奇兵，机动到四块闲地上，与前、后、左、右四处原有的实兵一起，形成“环其四面，诸部连绕”③的方阵队形，于是“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④，即“终于八”⑤，这样由五阵列成了八阵。五阵就是五阵；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八阵的简化形式，八阵是五阵的完成形式。

（二）队列之法

阵内士卒在队列中既面对着面，攻击共同的敌人；又背靠着

---

① 俞大猷：《赵本学阵法发微四章》，见《续武经总要》卷八，《武备志》卷六十四。

② 《握奇经》经文。《中国兵书集成》据明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影印。

③⑤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

④ 〔北宋〕李昭玘：《八阵论》，见〔明〕诸葛羲、诸葛倬《诸葛孔明全集》卷二十。

背，彼此保护侧后不受攻击，做到“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①。

（三）机动之法

八阵在回军转阵时，由于阵式对称，只要将前部改为后部，后部改为前部，即可实现掉头，十分灵活。但由于阵形庞大复杂，为了保持整齐，前进时不允许速奔，后退时不允许猛跑，机动速度受到较大限制。这就是八阵口诀说的，“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②。

（四）阵战实施之法

八阵具有全方位作战的功能，有四正可充当四头（翼侧），有四奇、四冲可充当八尾（增援部队），任何方向受到攻击，该方向不必作出根本变更，即可完成主要作战方向的部署，形成阵首、翼侧和殿后的兵力配置。一处受到攻击，相邻左右中阵可自动作为两翼，前来钳击来犯之敌。这就是“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③。

（五）兵种运用之法

阵内最活跃、机动性最强的是骑兵，“首尾相救，变用不穷，皆出于冲骑”。其运用方法是：赋予其侧击、佯动、伏击、断敌粮道、阻击、夜袭、尾击和行军、宿营、布阵时的警戒等广泛任务。平时横列成两排，寄托大方阵之后，“行则居前，止则居后，战则进退无常位”④。

阵内的弩兵，在其它兵力的配合保护下，弥补了短于自卫的弱点，发挥了长于远射的优势。运用弩兵的方法，是强调协同。诸

---

① 〔唐〕杜牧：《孙子·势篇》注。

②③ 出自八阵口诀。八阵口诀是指杜牧《孙子·势篇》注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关于八阵基本阵法的一段引文。这段引文，诸家所记文字小异，大意相同，又都是四言，可能是古来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八阵法的口诀。

④ 〔明〕赵本学：《诸葛亮阵法正宗十八势》，见《续武经总要》卷七，《武备志》卷六十四。

葛亮《军令》规定，当来犯的敌人在鹿角前受阻时，阵内弩兵立姿发射，矛戟兵蹲姿前进作战，互相协同，矛戟兵不得站立和停止，否则影响射界，妨碍用弩。①

车兵通过用车设置障碍，迟滞和割裂敌军的冲击和机动，对阵内步、骑兵提供掩蔽和保护，增强防御的稳定性。其运用是：在山地遭遇战中，如果魏军骑兵左、右翼前来夹击，蜀军步兵从行进间转入仓促防御，又不便于登上山岭时，则用车蒙在阵外，防御其冲击；在地形狭窄，难于展开时，则把蒙在阵外的车排成锯齿形状，以防御其冲击。②

（六）阵形阵势变化之法

为适应不同的地形和敌情，八阵须视情将阵形调整为方、圆、曲、直、锐等形状，又需根据作战不同阶段的需要，调整其阵中兵力配置，组成不同的阵势。例如，行军时组成发行结阵的阵势，备战时组成敛兵待敌的阵势，防御时组成先锋应敌的阵势、追击时组成战胜追逐、收阵整兵的阵势，阻击时组成据险阻敌的阵势，等等。③

总之，诸葛亮针对魏军的骑兵优势，以最先进的速射武器元戎为支撑，综合发挥步、弩、骑、车协同作战的威力，编成八阵。他的八阵，是五阵的变体，是四正四奇八阵合成的集团方阵，阵形可离，可合，可变。编成上是包容和对称的，具有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的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

①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兵部·鹿角》引诸葛亮《军令》。

② 《北堂书钞》卷一一七《武功部·阵》引诸葛亮《贼骑来教》。

③ 〔明〕赵本学：《诸葛亮阵法正宗十八势》，见《续武经总要》卷七，《武备志》卷六十四。

第十八章　魏国军事思想

第一节　曹操军事思想（上）

一、曹操军事思想的来源

曹操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他统一战争的实践。曹操在这一实践中，探讨了如何从没有兵、没有地盘起步，如何在群雄包围的内线作战中杀出重围，如何战胜强敌袁绍成长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如何为消灭联合起来的南方势力进行战争准备。核心问题，是在汉末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实现以弱胜强，尔后以强胜弱。由于他所处的北方，混战比任何地方都激烈，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比任何地方都严重，曹操又连克群雄，所以其军事实践也比任何群雄都复杂、生动和成功，为其军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曹操又是一位好学深思之士，御军 30 多年，手不离书，白天研讲武策，晚上思考经传，又喜好同众僚属讨论问题，内论御敌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人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经常整夜不停地探讨。沿着这条实践、探讨、再实践、再探讨的道路，最终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这一军事思想，是他个人才力的产物，也是他周围谋士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曹操取得胜利的思想。

其次，曹操军事思想来源于申、商思想的影响。这同汉末思想发展趋势有密切关系。汉末以来，在两汉占统治地位的经学由于不能适应干戈不息的社会需要，走向衰落。思想界经受了离经叛道的洗礼，兴起了对弃农经商、奢侈、厚葬等弊端的社会批判思潮，认为时代已临末世，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刑德并用，以法治

为本。接着，曹操带头兴起一股喜好法术的思潮，他的兵学以受法家影响为主，受儒家影响比较少，所以陈寿说曹操是“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①。曹操根据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大胆地求助于战国申不害、商鞅。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主张用术，倡导君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②；商鞅则主张通过战争统一天下，奖励耕战，赏罚严明，以法治军。曹操鉴于申不害学说有术而无法，容易使法令前后不一，授人以隙，商鞅学说有法而无术，虽然造成国富兵强，但是君主无术以知奸，两者各有一偏，因此兼用法与术，通过二者互补以纠各自之偏，创造性地把它们应用到汉末军事斗争中。由于头脑中儒家思想较少，他用兵时主张大力使用权谋，作战指导思想以用诈设奇作为特色。

再次，就兵学自身而言，曹操军事思想还来源于孙子等兵家。曹操读了很多兵书战策，最推崇《孙子兵法》。孙子重诡道，曹操用兵也以诡诈见长。鉴于世人对《孙子兵法》未能深入训释，他为其作注，撰《孙子略解》，撮取诸家兵书精华，著《兵书接要》，又把自己所得，著为《孟德新书》十余万言。除《孙子略解》外，现在均已亡佚。

二、用干戚以济世的战争观

汉末，军事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对待战争的态度，成了割据者的首要问题。割据者中，有一类人一味黩武，如董卓、李傕、郭汜等，企图以武力解决一切，虽然得逞于片刻，但是弄得天怒人怨，都迅速灭亡；另一类人幻想以文取胜，如刘虞、刘焉父子、刘表等人，由于受儒家忌言兵的影响，所谓“军旅之事，未之学也”③，企图拥兵自保，中立避战，一味恃文，也先后灭亡。这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陈寿“评曰”。

② 《韩非子·定法第四十三》。

③ 《论语·卫灵公》。

两类截然相反的人，都不能正确对待战争。

曹操既反对一味恃武，也反对一味恃文。他肯定战争，称颂战争是济世所需，引证儒家经典说，《易经》称上古有“弧矢之利”（弓箭之利，是在天下建立权威），《论语》曰“足兵”（应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尚书·洪范》八政曰“师”（古代八种政事之一为建立和使用军队），《易经》“师贞丈人吉”（当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时，就吉利），《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天帝告诫周文王不可贪求别人土地，但是当密国人来侵犯时，文王则赫然大怒，整军而出，以制止其侵犯），以上述经典证明儒家并不一概反战。曹操又征引史实，说明黄帝、成汤、周武王“咸用干戚以济世”①，援引《司马法》“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认为不如此，有可能像只文不武的徐偃王那样，迅速失败，结论是：“恃文者亡”②。曹操坚持武力统一中国。丞相掾属刘廙谏止他对刘备用兵。曹操说，你应当了解我，想让我安坐不动，只推行周文王的文德，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

曹操又主张限制战争。说圣人用兵，“戢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③。建安七年，他经过家乡谯县，见到人民死的死亡的亡，走了一整天，见不到一个熟人：“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④。惨酷的见闻，促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老子反战思想。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⑤。曹操认识到，一味好战，将重蹈夫差的前车之鉴，结论是：“恃武者灭”⑥。

曹操对战争肯定和限制的界限，在于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凡是具有“义”的战争，他是肯定的。他说参加讨董战争，是“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⑦，说“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⑧。

---

①②③⑥ 曹操：《孙子略解序》。

④ 曹操：《蒿里行》，见《宋书》卷二十一《乐》三。

⑤ 《老子》三十一章，见《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⑦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七年。

⑧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他所谓的“义”，就是声讨董卓之罪，削平群雄，统一国家。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把战争同政治结合起来，使之尽可能拥有更多的“义”，通过挟天子令诸侯，披上“奉辞伐罪”①、“奉国威灵，仗钺征伐”② 的神圣光环，使他从事的战争具有讨伐叛逆、维护汉室正统的名义。正如他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③。

三、文武并用的战争指导思想

曹操主张文武并用，调动多种致胜因素，争取战争胜利。他看重政治致胜的作用，已如上述，又看重经济致胜的作用，讲求足瞻军国，认为安定国家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并天下，汉武依靠屯田平定西域，这些是先代的良好范式。在汉末经济崩溃之时，应大力屯田。此后又充分肯定屯田的历史作用，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屯田是“不朽”④ 的事业。他企图依靠盐铁之利，满足军国之用，把盐铁的利权从郡县重新收归中央。认为主持盐铁的司金中郎将是比军师还重要的“建功”的职务，要选用得力的人充任。

他看重外交致胜的作用，主张以外交分化众多的敌人。在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时期，主张把群雄分开来，每次作战只打击一股势力，形成争取友军、孤立打击对象的思想。凡属日后可能是敌人，而当前可以团结的力量，他都团结。刘备来投靠时，程昱劝他杀刘备，他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⑤ 在打袁术时，明知吕布“狼子野心”⑥，仍然以诏书拜他为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建安十三年引《江表传》。

②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公己亥令。

④ 《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⑤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元年。

⑥ 《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曹操语。

左将军，手书厚加慰劳，以便破坏袁、吕合纵，集中兵力对付袁术。直到袁术败走后，才擒杀吕布。他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进入以强敌弱的外线作战。但这时他却骄傲了，一度以“霸王之兵”自居，认为“霸王者，不结成天下诸侯之交权者也，绝天下之交，夺天下之权，以威德伸己之私”①，因此在赤壁之战中，傲对益州使者张松，也没有争取孙权，反而同时打击孙、刘，结果遭到赤壁惨败。他迅速从中吸取教训，重新回到分化瓦解敌人的思想上来。此后，他以“缓之而后争心生”② 的思想，离间孙、刘，怂恿双方火并，以坐收渔利。

在肯定军事致胜的作用时，曹操不仅重视兵力、兵器的作用，也十分重视谋略的作用。在割据初期，曹操与袁绍、袁术等群雄相比，兵微将寡，在作战中唯有发扬其智力优势，因而形成了重谋略的思想。他强大起来以后，仍然保持了这一特色。他认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庙胜、谋胜，谋功高于野战功绩。他说《左传》等经典以庙胜为贵，历史上萧何的受封，先于攻城野战的曹参，珍重计谋是古今所崇尚的。古人把运筹帷幄的谋划摆在首位，攻城夺地的胜仗摆在其次。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官渡之战中接受荀彧的劝告，在最困难的时候坚营固守、决不后撤是正确的，当时如果退兵，则敌人怀利，士气百倍，自己军队胆怯丧气，必败无疑，是荀彧之谋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而海内对此还不理解，所以他反复阐说庙谋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潼关渭南之战中，他对围观的秦、胡兵说，我曹操也是个人，并非有四目两口，只是多智罢了。他的结论是“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③，“平定天下，谋功为高”④。

---

① 曹操：《孙子略解·九地篇》。

② 《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郭嘉语。

③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④ 《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

第二节　曹操军事思想（下）

一、诡诈善变的战略战术思想

曹操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同多种类型敌人作战，形成以善变和诡诈为特点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从敌情出发，不拘一格，“兵无常势，盈缩随敌”①，根据实际情况“应机而变化”②，不死守固定模式，认为“兵之变化，固非一道”③，能把致胜因素变化到极致，就是胜利，“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④。如何变化，事先不能定死，只能“料敌在心，察机在目”⑤，通过认真思考，判断敌情，观察各种迹象，临机处置。

曹操主张按照情况活用作战原则。孙子提出，用兵的原则是十则围之。他发挥说，这是指双方的将领智勇相等，兵力利锐相同说的；如果主弱客强，不必用十倍，我用一倍兵力围下邳生擒吕布，就是明证。他把作战原则看作有条件的，可修正的，条件变化以后，就要灵活处置。孙子反对百里而争利，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曹操在注中也说：“百里而争利，非也”⑥；但是在荆州追击刘备时候，他置这个原则于不顾，亲率精骑5000急追，一日一夜行300余里，并且获得胜利。这是因为情况不同，孙子生活在车战时代，他生活在步战骑战时代，刘备兵多而不精，处在败退之中，他是胜利之精骑，士气高涨，所以敢

---

①④《孙子略解·虚实篇》。

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傅子》。

③《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⑤《孙子略解·计篇》。

⑥《孙子略解·军争篇》。

于超脱原则。因此他主张“权因事制”①，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如何变化，不必死守原则，承认军事原则的相对性，反对其绝对性。

他主张“见胜而战，知难而退”②。他发现进攻邺城不克是由于此举促使袁谭、袁尚合力守城，便通过退兵诱使二袁转向自相争斗。当袁谭、袁尚中计果然发生了内斗时，他主张“当乘其乱”③，回军各个击破之。赤壁战后，他“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④，对南方由战略进攻，转变为知难而退的积极防御。

在兵力部署上，他重视使用善于变化的奇兵取胜。在历史上，他较早地对奇正作出解释，指出“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⑤，即正兵是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部队，奇兵是担任侧击或迂回等机动作战任务以击敌之不意的部队。孙子说：“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曹操进一步指出，无论孙子说的何种情况，在部署兵力时，都应区分奇正：“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与敌人众等，善者犹当设伏奇以胜之”⑥。

曹操强调诡道用兵，并以此著称，认为在作战指导中，“形露必败”⑦，主张“以诡诈为道”⑧，尽可能地制造假象，荫蔽自己的意图，不使暴露，以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让敌人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战法进行打击，陷敌于被动。他在白马之战中，主张声东击西，佯渡黄河，分散袁军兵力；延津之战中，主张通过饵敌，使敌骑阵形混乱；北征乌桓时，主张用而示之不用，制造退兵不打的假象，然后大军秘密出卢龙塞，达成对

---

① 《孙子略解·计篇》。

②④ 《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注引《资别传》孙资语。

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⑤ 《孙子略解·势篇》。

⑥ 《孙子略解·谋攻篇》。

⑦ 《孙子略解·虚实篇》。

⑧ 《孙子略解·计篇》。

乌桓的战略奇袭；渭南之战中，主张骄敌示弱，渡渭后不立营，不应战，麻痹了关西军，都创造了诡道用兵取胜的成功范例。

曹操所以强调诡诈善变，目的是为了夺取主动权，实现其“战在我”的名言。他征关西时，针对内部关于关西兵强、习长矛的议论，提出“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① 他在那次作战中，企图渡过西河，却故意屯兵于潼关前，将关西兵吸引至潼关集结，造成敌西河守备空虚，然后出敌不意地渡过西河，出现在潼关之后，将潼关之关西兵置于无用之地。通过这一诡诈用兵，夺取到作战主动权，实现了“战在我”的要求。他所以变化常规战法，目的也在于此。他认为攻城夺地，有时候就要突破常规，像孙子说的那样，“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他曾置徐州陶谦侵占他的华、费二城于不顾，而径直出兵徐州，说这是因为华、费“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②。由于不顿兵坚城，保全了兵力，一举攻陷徐州 14 县。他补充说：“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则不争也”③。初平三年，于毒等攻东武阳，曹操不回兵自救，反而引兵西进，攻于毒本屯。说：“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④ 于毒等果然放弃东武阳还兵。曹操从改变常法中，调动了对方，夺取了主动。

二、持法重才的治军思想

袁绍起兵前，表示如果讨董大事不成功，他将据有河北，南下争夺天下。问曹操打算据有哪一方面，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⑤ 就军事思想来说，曹操的回答包含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六年注引《魏书》。

②③ 《孙子略解·九变篇》。

④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初平三年注引《魏书》。

⑤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两层意思，一是说他的建军思想是力图任用天下人士的才智和勇力，以“道”驾御他们，二是说建军搞好了，就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占据。这就是曹操的建军思想：以用能人的方针，网罗天下有真本领的人士，以行法令、重赏罚的“道”，驾驭这些人士。

（一）用能人

曹操认为，治平和治乱时期的用人标准，应当有所区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① 东汉是治平时期，用人尊崇节义，名实，任用的人虽然学习儒家经典，讲究德行，名气很大，但是治国治军本事往往很平庸。这在群雄争胜之际，是不适应夺取天下的任务的。曹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治乱中度过的，不能不同东汉治平的社会风气作斗争。他大声疾呼用人要重功劳、才能，有时甚至偏激地提出轻德行。他说，如果只有廉士才可以任用，那么齐桓公如何称霸？现在天下能没有吕尚那样身披布衣、怀抱高才、在渭水边垂钓的人吗？又能没有陈平那样盗嫂受金、还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人吗？要明察荐举出身微贱的人，唯才是举，使我能得到并任用他们。他承认“有行”和“进取”常有矛盾，有德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行。既然如此，不妨忽略“有行”，只求“进取”。他说，陈平难道有德行，苏秦难道守信用吗？可是陈平奠定汉业，苏秦扶助弱燕。由此说来，士有缺点，难道可以废置不用吗！有司好好考虑这个道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不会遗漏，官府也没有荒废的事情了。后来，他把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说，吴起是个贪将，杀了妻子获取信任，散发金银谋求官职，母亲死了不回去葬母，可是他在魏国，秦人不敢向东进攻，他在楚国，三晋不敢打南方的主意。现在天下能没有这样的人吗？如散逸在民间的有崇高道德的人，以及勇敢不顾一切，临敌力战的人；或者是文俗之吏，具有高才异质，或者是胜任将军、太守职务的人；或者是蒙受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的，或者是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举荐所知道的，不要有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庚申令。

遗漏。他为了用有能之才，坚持出以公心，“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①。实际上，曹操用人，既主张用有德行的，也主张用德行上有亏缺的。大体说来，在创业阶段，偏重于才，因此“矫情任算，不念旧恶”②，以作到“文武并用，英雄毕力”③，因此戏志才、郭嘉等行为不检，蒙受一般人指责的人，都凭其智谋受到重用；于禁、乐进原居行伍中，张辽、徐晃本在俘虏内，这些低贱的人都被他提拔成长为一代名将。但是后来曹操在为子孙代汉作准备时，不再唯才是举，而很计较其是否拥护他的代汉事业，如果妨碍了他，越是有才越遭嫉恨，甚至被其杀害。

（二）行法令，重赏罚

曹操的御军之道，是以法治军。他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④说孙子“齐之以武”⑤，“武”就是“法”⑥，只有用法，才能使军队整齐划一，使下面同上面保持一致，法的内容包括“部曲幡帜金鼓之制”，“百官之分”，“粮路”，“军费用”⑦。他亲自制定军队管理条令、步骑兵战斗条令、船战条令等军队条令，规定营规，规定军队出营、行三百里、至营、至营讫和行军时的规定；规定船战中擂鼓时吏士、什伍、战士们的战斗动作、战船的队形；规定步战中根据鼓音的遍次和变化，步骑士、斥候、诸部曲、兵曹们的战斗动作，临阵时根据指挥信号向前、后、左、右的要求，各级指挥关系和职责，对伍中不进者的处置权，临战时的禁止行为、乘骑的位置、动作，进战时士与号的关系、前后兵的位置等等。凡违反者，轻则没收、不赏功、鞭杖，重则立斩。

曹操认为，行法令，要坚持“设而不犯，犯而必诛”⑧，立法的目的，是以它的威慑、阻吓作用，让军队成员警醒不犯法，一

---

① 《太平御览》卷四二九《人事部·公平》引《魏武令》。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陈寿评曰。

③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④ 陆机：《吊魏武帝文》。

⑤⑥⑦⑧ 《孙子略解·行军篇》。

旦犯了法，必须坚决执法。立法者和执法者犯法，概莫能外，法令才具有权威性。一次行军时，他下令禁止士卒伤麦，犯者死，他的坐骑却腾跃踏进麦地，他召来主簿议罪。主簿说根据春秋的规矩，罚不加于尊者。他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杀自己），请自刑。"于是拔剑割发扔至地下。① 儿子曹彰受任征讨代郡乌桓，行前曹操告诫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②

曹操行法令时，主张重赏罚。他引《军谶》说，"军无赏，士不往"③，认为褒奖死者是激励生者，厚待以往有功人员是着眼于今后，把赏赐看成军队吸引人、激励人的必要手段。认为和平时期不妨崇尚德行，战乱时期必须强调"有事赏功能"④，方可立功兴国。他仰慕历史上"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⑤ 的名将赵奢、窦婴，坚持向他们学习，赏赐有功劳、有才能的人，特别是赏谋功。他主张把赏赐形成法令制度，该赏的一定赏，不该赏的一定不赏。对有功人员，坚持给予应得之赏。有功人员田畴辞爵，他三番五次动员田畴接受，说否则就是成就一人的高名，而违背王典，造成自己的过失。对于无功人员，主张不给无功之臣升官，不给不参加战斗之士颁赏。他个人愿为赏赐作出牺牲。建安十二年，他追思窦婴散金之义，把所得 3 万户租分出来，同诸将及掾属分享，酬答众人，自己不独占大恩惠。

曹操认为应当赏罚互补、恩威并用，光有一面不行，不可专用恩，也不可独用罚，不然就像宠惯了的孩子，不管喜怒，都会同你瞪着眼互看，一点也不怕你，有害而不可用。赏罚严明以后，能做到即使指挥大部队，也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在具体实施过程

---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② 《三国志》卷十九《曹彰传》。

③ 《孙子略解·作战篇》。

④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八年注引《魏书》。

⑤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二年注引《魏书》。

中，罚罪同赏功不一样，要看时机。他认为，在天下土崩瓦解时，雄豪并起，人怀不满，各有自为之心，这是上下相疑之秋。这时即使以信任对待群臣，他们还害怕，不相信，如果对他们执法，则谁不自危。因此，在自己脚跟没有站稳时，从安定人心、稳定大局出发，他只赏功，不罚罪。官渡之战中，他缴获军中通敌书信，都一火烧之，他说，面对强大的袁绍，我还不能自保，何况大家呢？建安八年，人心归顺，地位巩固，罚罪条件才具备，他终于颁布败军令：《司马法》说：将军死于退却。所以赵括的母亲，请求不因赵括的战败连坐。这件事证明古代的将军，率领军队在外面战败，家属就在国内受罪。自从命将出征以来，只赏功，不罚罪，这样做不符合国典。今后众将出征，战败的抵罪，失利的免去官爵。

不拘一格起用能人，依靠法令，有赏有罚，又有严厉，又给以利益，这是曹操的建军思想核心。

曹操在战争中残忍好杀，下令“围而后降不赦”①，在彭城同陶谦大战时，杀人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征吕布时再屠彭城。官渡之战中，坑杀袁军数万，此后屠城和诛灭三族的还不少。曹操企图在扰攘之际以此示威于天下，实为滥杀无辜，暴虐无道。最后未能统一中国，这未必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节　司马懿军事思想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河南温县）人，出身世家大族，世代任职将军、太守，父亲司马防任京兆尹。司马懿任曹操主簿，先后受魏文帝、明帝托孤重任，后来通过政变专国政，子孙相继专权，终于转移魏祚。司马懿军事上颇有建树：曹

① 《三国志》卷十七《于禁传》，《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

操时从讨张鲁、孙权有功，曹操死后擒孟达于半月，御诸葛于祁山，灭公孙于百日。军事上每参与大谋，总有奇策，雄略内断，兵动若神。其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一、灭贼之要在于积谷思想

司马懿高度重视粮食与战争和作战的关系。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①，主张大力开展屯田，进行积谷，为战胜蜀、吴奠定物质基础。他先后推动曹魏采取三次大的屯田积谷行动。第一次，是在建安后期，当孙、刘矛盾开始表面化时，他向曹操提了一个既养兵、又增粮的建议说，过去太师箕子（纣王之诸父）献谋，以粮食为首谋。现在天下不从事耕种的大约 20 万人，这不是经国的长远打算，尽管战争还没有结束，也应该边耕边守。曹操采纳，于是务农积谷，国用充足。第二次，是在魏明帝时，陇右无谷、难以抵御诸葛亮进攻，司马懿主张抓紧诸葛亮不来进攻的 3 年时间，从冀州迁移农夫到战区屯田。在他的推动下，陇右通过屯田，储备了较多的军粮。第三次，是在正始二年（241 年）魏国企图在邻近吴国的扬、豫一带拓广屯田储积谷物，令尚书郎邓艾前往考察。邓艾建议在两淮以 5 万人屯田，作为灭吴的准备，得到司马懿的大力支持。两淮屯田发展为魏国规模最大的屯田。司马懿把积谷的地方，看作必争之地。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出武功，屯兵渭南。魏国众将企图防御于渭北，但司马懿鉴于百姓积聚在渭南，不听众将意见，渡渭水，在渭南背水屯营，认为积谷所在之处，就是同敌人争夺的要点，不可轻易放弃，不能让积谷落入对方之手。

司马懿经常把军粮多少，作为决定速决还是持久作战的重要根据。在军粮已少敌多时，主张速决，以便在军粮用尽前结束作战。当获悉部将孟达企图叛魏而决策未定时，按制度，司马懿发

① 《晋书》卷一《宣帝纪》。

兵平叛应当上表天子批准；但司马懿驻在宛县，距洛阳 800 里，距孟达 1200 里，请示天子往返需要一个月时间，他机断行事，不经请示，倍道兼行，8 日到孟达城下，16 天后攻入城中，速战速决，平定了孟达的叛变。他说下决心速决，是考虑到孟达兵少、粮食支持一年，自己将士虽然四倍于孟达，但粮食不足一月，认为以一月图一年，不可不速？所以不经请示，不计死伤，同粮食竞赛。

如果粮食已多敌少，他一般主张持久，把敌人拖到兵疲粮尽。诸葛亮北伐时，魏廷认为诸葛亮侨军远入，利在急战，每令司马懿持重，静观蜀军之变。司马懿坚决拥护并执行这一持久方针。他认识到，自己作战上一般不是诸葛亮对手，但可利用诸葛亮粮食困难的弱点，坚壁不战，迫使其粮尽退兵。他甚至可以接受诸葛亮赠给他的巾帼服饰，忍受敌人暗示他不是大丈夫的嘲笑。在围困襄平公孙渊的作战中，鉴于敌众已寡，敌饥已饱，围城工事未合拢，他不怕持久，只怕敌人逃跑，主张利用敌人凭恃兵多雨大、不肯束手就擒的心理，不进攻，佯示无能，以防止敌人决策逃跑，等到雨停围合、城内进一步饥困以后，再挥军攻破襄平。

二、审将料敌计数用兵思想

司马懿的言行，反映出他十分重视审将料敌，主张熟悉敌我双方将帅。认为在自己方面，熟悉将领，才能正确选将用将。他向曹操指出，荆州刺史胡脩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不可让他们驻屯在边境；但曹操未加深察。二人果然在关羽围樊时投降蜀军。司马懿主张，在熟悉双方将帅时，重点在于熟悉敌方将帅，以便掌握其情况，摸清其意图，因此他对主要对手诸葛亮了解较透，指出诸葛亮多谋少决，志大不见机，好兵而缺少权变。又预料诸葛亮第二次攻魏从陈仓退兵后，下次攻魏不会再攻城，将改为野战，出兵必在陇东，不在陇右。诸葛亮每以粮少为恨，回去一定积谷，非三熟不能再有行动。这些判断，都很准确。他向蜀军使者询问诸葛亮生活起居和公事繁简，不问军事，从了解到的情况

中，预言诸葛亮活不长久，也被言中，说明他遇事注意抓住敌方将帅要害问题展开调查。他率兵统一辽东前，认为其对手公孙渊有上、中、下三计可用，不过只有明智的人才能深入权衡敌我形势，采取上计，放弃地方，保存实力，这决非公孙渊所能做到，公孙渊一定会在辽水设防坚守，不过是采用中、下计罢了。结果又被料中，说明对公孙渊知之甚深。

从他的行动看，他为了做到审将料敌，很重视熟谙兵机，依据敌人行动的规律判断敌人的情况和意图。关羽死后，孙权率兵西上，逼近魏国重镇襄樊。魏大臣们认为，襄樊无粮，不可御敌，可令曹仁退屯宛县。司马懿则认为，孙权不久前打败了关羽，正企图同我结好，一定不敢进犯襄樊。魏文帝竟不听，令曹仁焚烧二城，后因孙权果然不进攻，后悔不迭。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退兵后，司马懿等巡行了诸葛亮的遗垒。军师辛毗认为，诸葛亮是否已死，尚未可知。司马懿判断，军家所重视的，是军书密计，兵马粮谷，现在都抛弃了，难道有人丢了五脏可以生的吗？认为诸葛亮必死。魏军追到赤岸（今陕西留坝东北），便得到诸葛亮已死的确切消息。从以上对于同一敌情作出的不同判断中看出，司马懿正是熟谙兵机，善于根据敌人行动的规律作出判断，才摸透了敌方将帅的真实情况和意图。

在审将料敌后制定作战计划时，司马懿重视进行数字计算，以求把计划建立在精确量化的基础上。他都督区内的太守孟达企图叛魏，计算司马懿必来平叛，但事前须向洛阳魏帝请示得到发兵权方可，前后非一个月不能进兵，因此从容部署。司马懿对孟达了解很深，不加请示径直发兵，急行军前来平叛，8 日到其城下，使孟达措手不及。司马懿统一辽东临行前，魏明帝询问此战需用多少时间。司马懿计算后回答，去百天，回百天，攻百天，休息 60 天，一年足够了，果如其言。司马懿平孟达作战用 8 天还是一个月，关系到主动被动，提出统一辽东作战的时间表，表示已全局在胸；因此，司马懿用兵，特别重视数量上的计算，把数学同军事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两弱相斗我承其弊思想

司马懿善于从曹、孙、刘三角斗争中的互动中考虑军事问题，加剧并利用另外两方矛盾，以收取渔人之利。当曹操占领张鲁汉中时，刘备正远去荆州益阳同东吴争兵。司马懿建议曹军南下取蜀，指出刘备靠欺诈和实力取蜀，在蜀人还没有归附时，又去远争江陵，这个机会不可丧失。我军南下，蜀中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也不失时。这一建议包含利用孙、刘矛盾，自己从中取利思想。后来，当关羽北攻襄樊、曹操商议迁都以躲避其兵锋时，司马懿又认为不必迁都，可利用孙、刘矛盾为我服务，使双方相斗，我承其弊。指出孙权、刘备，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是孙权所不愿意看到的，我方可以挑动孙权袭击关羽后方，则樊城之围自然解除。曹操采纳其言，魏、吴联合，促成孙权袭荆州、杀关羽，孙、刘联盟走向破裂，出现了蜀孤吴弱曹操坐收渔利的大好局面。

第十九章　蜀国和吴国军事思想

第一节　诸葛亮军事思想（上）

一、诸葛亮军事思想的来源和军事著作

诸葛亮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刘备集团兴复汉室的战争实践。社会实践包括战争实践本来不被东汉以家尚经学为传统的儒生所重视，但是自从群雄蜂起、酿成末世之祸以后，这些稽古的儒生便被看成是不达时务的俗士。这时，出现了一批关心时局的士人，风气逐渐改变为谈世事喜说纵横，识时务者誉为俊杰。诸葛亮便是在这一风气变化中涌现出来的俊杰，是新派中的佼佼者。他在荆州学派影响下，养成简明求实、重视时务、淡泊宁静、身体力行的学风。在探讨刘备集团如何发展力量、战胜中国最强大势力曹魏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由于刘备集团实践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以弱胜强，因此这个问题便成了诸葛亮军事思想的主题。其次，诸葛亮生于孔子家乡和儒学发达的鲁地，邻近管仲所在的齐地，他的军事思想较多地受到儒家和法家影响。他汲取儒学中以“德”为中心的有用思想，扬弃其君权神授、亲亲等级和谶纬妖妄。①儒学对其军事思想的影响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在战争观上，坚持“王者之兵”和人谋取胜。二是在用兵时使用正兵较多，使用奇兵较少，不大善于运用权谋诈术。法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主张以法治军。主要是吸取法家关于明

---

① 参阅朱大渭《论诸葛亮治蜀》，见《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4 月版。

法、富国强兵、敢于从下层选拔人才等思想，而不大用其权、术、势思想。[①]他的兵学还受到其他学派思想的广泛影响。他当政后写申、韩、管子、六韬，推荐给太子刘禅作必读教材，说明他取法较杂。历来学者也认为诸葛亮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杂采诸家，兼收并蓄。朱熹称“孔明学术亦甚杂”[②]，叶适以为他“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术数，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③]。诸葛亮家乡邻近的齐地，是太公吕尚、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的封地或家乡，是兵学发达之地。这一有利条件便利诸葛亮吸取兵家思想。从军事实践上看，诸葛亮不仅学习了兵权谋，大约也较全面地精研了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记载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由于他的影响较大，“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④]，这造成了诸葛亮军事著作的真伪问题。今考可信者，有《诸葛亮集》中的军事部分。《诸葛亮集》在诸葛亮死后40年开始编辑，是在西晋中书令张华推荐下，由阳平令陈寿奉诏编成。该集24篇，今篇目尚存，文多亡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辑有其军事思想若干条。考《诸葛亮集》篇目中，“南征”“北出”“计算”“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8篇，显然是谈军事；其他“权制”“综核”“杂言”“贵和”“法检”“科令”等篇，对军事也应该有所涉及。诸葛亮军事著作可信者，还有《诸葛亮兵法》。《隋书·经籍志》注称，“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亡”。[⑤] 清人侯康认为：“《通典》一百五十六引诸葛亮‘兵法’，一百五十七引诸葛亮‘兵要’，《御览·

---

① 参阅朱大渭《论诸葛亮治蜀》，见《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③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八《蜀志》下。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〇《子部·兵家类存目·将苑》上。

⑤ 〔唐〕魏徵等《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中华书局校点本1973年版。

兵部》亦屡引诸葛亮‘兵法’‘兵要’，大约即一书而异名耳。《御览》复引诸葛亮‘军令’，当亦出此书。”①

诸葛亮军事著作可疑者计有：《便宜十六策》一卷，《武侯八阵图》一卷，等。《便宜十六策》，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始见著录、《宋史·艺文志》杂家类载《武侯十六计》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附托者所为。按该书第九策《治军》有四句话同《太平御览》卷三一三引诸葛亮《兵法》文字发生重迭，第十四策《斩断》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所引《武侯兵法》400余字大略相同，但两处文字都经过窜改，此卷也许是真伪杂糅。《武侯八阵图》，载于《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按诸葛亮八阵图自中唐即失传，宋神宗君臣反复探讨该阵图真相亦疑不能明，此卷显系伪书。此外，可疑的还有宋志所载的诸葛亮《占风云气图》一卷、《兵书》七卷、《兵书手诀》一卷、《文武奇编》（《便宜十六策》的异名）一卷，基本都是托古之作。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指出：“《通志·艺文略》又载诸葛亮《十六策》、《将苑》、《平朝阴符二十四机》、《六军镜心诀》及后世所传《新书》，皆出依托。”其中《将苑》50篇，在中国兵书中最早把为将之道著为专书。清初姚际恒断其为伪书。《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考此书诸家不著录，至尤袤《遂初堂书目》乃载其名，盖伪书之晚出者，……委巷之谈，均无足与深辨者耳。”②《将苑》一书多名。陶宗仪《说郛》作《新书》，明弘治间改名《心书》。《四库全书总目·心书》条认为：“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盖妄人所伪作”③。陶宗仪把《将苑》称作《新书》后，又另有一内容全异的《新书》出现。康熙四十四年兵部尚书张鹏

---

① 〔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四“诸葛亮兵法五卷”条，此段文字下注曰：“《崇文总目》又作《兵机法》，宋志又作《行兵法》。”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版。

②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存目·将苑》上。

③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存目·心书》上。

翮编辑诸葛亮文集《诸葛忠武志》，除载《心书》50篇外，又载《新书》14篇，张指出该《新书》“多用七书（《武经七书》）中语”①。按张氏所辑的《新书》不仅最为晚出，并大量征引《武经七书》，又杂有后世用语，把列阵称为“布阵”，作伪之迹尤其明显。

二、“王者之兵”和以人谋取胜的战争观

诸葛亮吸取孟子王者之兵的学说，并借鉴历史及当代经验，认为战争的性质和人的努力给予胜败以重大影响，弱者拥有正义和人谋的优势可以战胜强者。首先，正义的“王者之兵”由于有“道”有“德”，是无敌的，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他说，“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从前的项羽，由于不是依靠有“德”而兴起，尽管处于华夏，拥有帝王般的权势，最终还是身死东城，败于垓下，“皆以不义，陵上虐下故也”②，并成为后世永远的戒鉴。相反，从前光武帝刘秀起事，仅凭数千弱卒，却能在昆阳郊野摧垮王莽40多万军队，这是因为拥有道义，讨伐邪恶，胜负就“不在众寡”③。《军诫》说：“万人必死，横行天下”，只要具有必死的坚定信念，一定的实力，“据正道而临有罪”④，弱者最终定能取得胜利。他谴责董卓和曹魏的战争是“造难”和“阶祸”⑤。指出由于“天下之人思慕汉室”⑥，兴复汉室的战争必将获得广泛的支持。他对刘备说，你率兵北定中原时，“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⑦又说自己进行的北伐，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是“龚行天罚，

① 张鹏翮：《诸葛忠武志》卷二。

②⑤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③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

⑥ 《三国志》卷四十二《杜微传》。

⑦ 《三国志》卷三十三《诸葛亮传》隆中对语。

除患宁乱”①，“因天顺民”。这些，实质上都是主张用道义优势弥补实力不足。

其次，他总结当代以弱胜强的经验，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曹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天命），抑亦人谋（人的努力）也。”② 诸葛亮主政后，蜀、魏力量对比悬殊，客观条件十分严峻，留给他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只剩下主观努力，在战争和治军的谋划上，制订并实施卓有远见的谋略。他为此身体力行，全身心投入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企图借鉴曹操的方法战胜曹操。

刘备集团的斗争，处在以弱小力量同强大的曹魏作战的条件下，始终面临着能否生存和能否取胜的问题。诸葛亮的战争观，指出了取胜的依据，为刘备集团以弱胜强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以治为胜的建军思想

诸葛亮在兴复汉室的斗争中，企图建立胜任这一重任的军队。他努力保持军队有较大规模，以 20 至 23 万户人口③，养兵 14 万，以平均不到 2 户养 1 名兵员，蜀军员额接近了极限，但仍然只有魏军数量的 1/4 强。显然，担当北伐大业，胜过魏军，不可能通过继续扩军完成，只能通过走精心治理、以质量取胜的道路完成。诸葛亮以极大精力探索这条道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看清蜀兵的质量也不高，指出：“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要求“省兵减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认为“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④ 从此，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

③ 见《三国经济史》第三章第二节关于蜀国的户口数。221 年为 20 万户，推算 242 年为 23 万户。

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更加注重整顿军队，提高军队素质。诸葛亮所选择的这条建军道路，是《吴子》所说的“以治为胜”① 的道路。其主要内容是：

（一）强调制度建设

蜀军自江陵之败以来，经夷陵、街亭之战，接连战败。蜀国人士在总结战败原因时，不约而同地探讨了“制”与“将”的关系。长水校尉廖立批评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②。已经看到，关羽的失败，是不能正确处理个人的勇敢、意向和“法”的关系。诸葛亮则进一步给予理论的概括，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③。在他看来，一个军队的军令制度和作风纪律养成，比将领才能更加重要，是关乎军队成败一个更深刻的因素。这就把军队制度的健全、作风纪律的养成，提到了原则的高度，指出了军队的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比人治更重要。这是深刻的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也是新鲜的思想，发前人所未发，对以前兵法对将帅作用的强调，是一个修正和发展，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诸葛亮心目中的“有制”，实际上是作战中从主将到驭手，全军至死坚守各自的战斗岗位，听从金鼓指挥，执行各种政治纪律，是军队具有良好的军令制度和优良的作风纪律养成。他积极进行制度建设，制定新的法令，包括许多战斗条令，涉及陆战、船战、阵法、行军、后勤、纪律、祭祀，以建立一整套军令制度。战术方面的军令制度，在战术一章中，已作了介绍。此外，还提出军队“七禁”④，严厉反对下述七种错误倾向：轻视军纪，甲胄兵器不齐备；怠慢军令，接受命令不传达，不听金鼓、旌旗号令；强盗恶习，不供应粮食、武器，抢夺别人战功；欺哄蒙蔽，兵刃不磨锋利，弓弩不装上弦；违背

① 《吴子·治兵第三》：“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中国兵书集成》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② 《三国志》卷四十《廖立传》。

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

④ 《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兵部·法令》引《武侯兵法》。

军令，不跟从旌旗行动，借口救死扶伤擅离战场；胡行乱来，行军混乱，堵塞道路，上下任意妄为；妨碍营规，串营拉乡里关系，耸人听闻，疑惑部队。凡违犯上述七禁者，斩首论处。

（二）强调训章明法

诸葛亮认为，军队建立起一套典章制度后，还要训章明法，即对部队进行典章制度的教诲，在执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申明法令，以便使部队遵守纪律，养成良好的作风。训章明法的中心，是严格执法。他祖父司隶校尉诸葛丰，凡有侦刺揭发，无所回避。诸葛亮继承祖父严格执法的作风，认为从历史上看，汉高帝针对秦政苛民怨，用法改为宽，取得极大成功。现在情况相反，刘璋治蜀，威刑不肃，失之于宽，应该反过来纠之以猛，严格执法。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军事斗争需要。孙子、吴起无敌于天下，是因为用法严明。晋悼公之弟杨干犯军法后，魏绛无法杀杨干，但是坚决杀了给杨干驾车的仆人以明法。当前，四海分裂，伐魏战争才开始，应当强调严，如果废法不究，用什么去战胜敌人呢？

诸葛亮严格执法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对主帅严。街亭败后，按照"春秋责帅"原则，勇于承担领导责任，自贬三等，向天下公布失误。二是对军务大臣严。李严以中都护署丞相府事，运粮不继，为掩盖失职行为，阴谋破坏北伐。尽管李严身受遗诏辅政，诸葛亮还是上表进行弹劾，把他废为平民，认为不可姑息养奸，危害统一大业。三是对亲信严。诸葛亮视参军马谡如子，而且天下未定，急需这样的智谋之士，但马谡在街亭违背他的节度导致重大失败，还是依法把他下狱论罪处死。诸葛亮主张用法不但要严，而且要"明"，只根据事实，绳以法律，不夹杂其他因素，正如他说的："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①

（三）提倡作良将

---

①《北堂书钞》卷三十七《政术部·公正》引《诸葛亮书》。《太平御览》卷三七六《人事部·心》引《诸葛亮书》，《太平御览》卷四二九《人事部·公平》引《诸葛亮书》。

诸葛亮认为，在精心治理、以质量取胜的努力中，将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要提倡将帅作良将，将帅应当努力提高自身修养。作为主帅，自己应当带头作良将。不居功，同部属建立真挚的友情，欢迎部属评论治军得失，倡导“事有不至，至于十反”、“集众思广忠益”①，自己有过失，主动作自我批评。街亭败后，自责“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②，号召部属“勤攻吾之阙”③，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封建制度下所能发挥的民主，促使其治军的各项政策措施臻于完善。他希望所部将领都作良将。认为良将应当“守忠”，方能“志立而扬名”④。良将的行为，要像璧玉那样没有污点，地位显赫不骄傲，受委任不专断，有人扶植不依赖，面临危难不畏惧。良将不爱美玉，珍惜寸阴，由于战机难遇而且容易错过，要以衣不解带、足不沾地、鞋掉了顾不得拾的紧迫感，去进行捕捉。在处理军中事务时，让别人选择该提拔的人，不任用自己想任用的人，在衡量部队战功时，不凭自己臆测说了算。

（四）重视后勤保障

诸葛亮从其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为实现精心治理，以质量取胜，必须十分重视后勤建设。当刘备外出征战时，诸葛亮往往留在后方，支援前线，后来他亲自率军北伐时，又遇上艰巨的后勤保障问题。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重视后勤保障的思想。他主张战前积极发展农业，增加军粮储备。在进行南征、北伐等大的军事行动前，都用几年时间鼓励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北伐前，征丁 1200 人，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劝农黄沙时，整修山河堰。他认为“粮谷军之要最”⑤，性格粗疏的人不宜主管军粮。他认识到

---

① 《三国志》卷七十九《董和传》。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④ 《太平御览》卷二七三《兵部·将帅》引《诸葛亮兵要》。

⑤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

粮食运输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北伐的成败，主张千方百计多渠道地解决这一难题。如动员自己和众将子弟在山谷中运输粮草，靠近前线建设粮仓，在敌境屯田，就地生产粮食，以减轻战时运输的压力，等等。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轻视技术。但是诸葛亮十分重视武器装备，要求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武器装备性能，并保证其质量，以弥补兵力人力的不足。他主张根据蜀军山地战的特点，改进连弩，使连弩成为山地战最具威力的武器；主张创制木牛流马，使它成为山地运输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他认为用质量差的武器对敌，会败坏军事行动。主张生产的钢铠达到5折（锻造次数）、矛达到10折的较高的质量标准，还主张依法拘捕那些不顾兵器质量的主管制造的官吏。他作为将帅，如此重视军事技术，并取得突破性成功，在三国最为突出，在历代也是屈指可数的。

第二节　诸葛亮军事思想（下）

一、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思想

诸葛亮根据上述正义可胜、人谋可胜的战争观，形成了他转弱为强的战争指导思想。诸葛亮认为：

1、刘备集团进行的战争，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争。刘备集团应当从寄寓荆州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过渡到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进行战争，“亲贤臣，远小人”，依靠“志虑忠纯”的“贞良死节之臣”，争取魏国内部拥汉势力和敌境百姓“箪食壶浆”①的支持，去赢得战争。

2、刘备集团只有夺取、建立、经营自己的根据地，才有条件转向直接同曹魏作战。刘备寄寓在荆州时，兵微将寡，而曹操力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量极为强盛。刘备主要任务虽然是消灭曹操，但是现阶段的任务，是避开曹操，壮大实力，转弱为强，向曹操势力达不到的方向夺取根据地。荆、益正是这样的地区。它们对刘备崛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军事地理上，荆州北据汉水，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益州险塞隔绝；经济上，荆州利尽南海，益州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土；历史上，汉高帝利用益州成就统一中国的大业；从可行性上看，荆、益之主刘表、刘璋庸碌、暗弱，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必不能长久守住二州。因此荆、益作为根据地，不仅较为理想，也是刘备夺取时力所能及的。诸葛亮在隆中谈话时预料，天下将由于刘备夺取荆、益实现三分，未来将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争天下的斗争。刘备夺取荆、益根据地后，应该向大力经营方向转变，固守险要，积极整军备战、和抚少数民族、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把军事斗争同团结少数民族、建立和巩固政权结合起来，使根据地成为兴复汉室的战略基地，使自己转弱为强，为直接进攻曹魏的战争奠定较好的物质基础。

3、经过转弱为强，应当适时转向北定中原，对魏国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实现刘备遗愿和自己终生奋斗目标。按照《隆中对》设想，转变基本条件是跨有荆、益，此外，还需要东吴的外援，等待出现曹操集团拥汉势力发动的“天下有变”①的时机。但是事情发展不如预筹理想：荆州被东吴袭占，江陵、夷陵战败，国家元气大损，天下有变并未出现。在此形势下，蜀国仍然据有益州，《隆中对》设想的北伐条件，大体具备，但没有、也许永远不可能全部具备，在将来魏国克服天下残破的局面以后，魏强蜀弱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大，时间不利于蜀国，如果不采取进攻行动，很可能像刘表那样坐而待亡，自己身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在不如原设想的条件下，也应该实行战略转变，并以励精图治、积极备战弥补国力不足。北伐应从魏强蜀弱总形势出发，在局部地区造成蜀强魏弱优势，依靠精锐的蜀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兵，以便在整体上创造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奇迹。北伐中，进要龙昂虎视，囊括四海，退也要威胁敌境，震荡宇内，以"平取"、"十全必克而无虞"①和边打边总结提高为原则，以依次夺取陇右、关中、洛阳为目标，以汉中、武都阴平、陇右逐次定为前进基地，逐步推进，最终还于旧都。

4、军事斗争应当辅以外交斗争。通过形成有利的三角关系，获得"掎角之援"②的重大战略利益：第一，在对魏作战中，通过争取东吴出兵，迫使曹魏两线作战。估计在北伐魏国时，孙权最积极的反应，是出兵占领魏地，分裂魏国；低度的反应，是掠夺魏国人口，拓展边境，向国内显示武力。要积极争取吴国"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③。第二，即使孙权不出兵配合，东吴也分散了魏国兵势，使魏军"河南之众不得尽西"④。第三，削减蜀、吴边境驻军，使"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⑤。即使在第二、三两种情况下，联吴带来的战略利益也够大的了。因此，必须千方百计保持这一联盟。

保持联盟的困难，是处理同东吴矛盾。联盟内部存在矛盾，东吴有可能利用刘备到京，扣留、加害他；对此应保持警惕，并避免矛盾激化。不能因为有矛盾就放弃联盟。在对吴关系上，蜀国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以东吴为友，共同抗曹，或者以东吴为敌。走后一条路，只有兼并东吴，才谈得上进兵中原，而短期内东吴是不能平定的。结果顿兵相持，坐而待老，使魏国得计，这决不是上策。既然如此，必须控制同东吴的矛盾，给予其优厚条件，必要时作出重大让步。在联盟破裂后，以承认东吴袭占荆州的既成事实，换取联盟的恢复。宁愿暂时损害蜀国的汉统地位，也要对孙权称帝给予承认，以维护并巩固这一联盟。这是对蜀国最有利的计策，是大局和长远利益的所在，应当顺应形势变化，通权达

---

① 《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②④⑤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 《诸葛亮集·与孙权书》，中华书局1960年8月版。

变，不能像匹夫那样仅仅为了泄愤。

诸葛亮转弱为强的战争指导思想，首先演了一出喜剧，指引刘备集团迅速崛起西南，三分天下。其所以成功，是由于坚持避实击虚、以退为进的原则，坚持在向曹操发起战略进攻前，先要有一个避开曹操、壮大自己的阶段，从根本上缓解了刘备目标和实力间悬殊的矛盾，也是由于抓住了曹、刘间还有大片中间地带可占领这一机遇。他的北定中原思想，接着遭到悲壮失败，演了一出悲剧。这是因为，刘备集团对于东吴对荆州势在必得，对于孙、刘这一战略利益冲突的尖锐性，估计不足，未能防止孙、刘交兵和交兵时遭到重大损失，北伐虽然连年动众，终因强弱悬殊，未能有成。同时魏国建立后，拥汉势力消失，北伐只能力取，无法借势，诸葛亮所能作的，只有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已，这是在隆中时始料不及的。

二、谨慎用兵和攻心为上的战略战术思想

诸葛亮战略战术思想视情况不同，具有不同特色。在敌强己弱条件下，如北伐魏国时，其特色是用兵十分谨慎。首先，他不肯冒险。他以兴复汉室为总目标，采取攻势战略，这些是很大胆的；但在具体战略战术上，他深知现有 14 万蜀军是全部希望所寄，在攻击数倍于己的大国时，不得不稳扎稳打，尽可能减少风险。所以魏延出奇兵直取长安的计划尽管诱人，他也宁愿“安从坦道，十全必克”①。事实上，由于街亭之败，连“十全必克”也没有兑现，足见不肯冒险是出自对敌我对比和能做到事情的清醒认识。

其次，行动多疑求稳。第一次北伐时，由于是他首次进攻魏国，在处理陇右三郡响应蜀军时，反应慎重。当时人袁准评论道，诸葛亮鉴于“蜀兵轻锐，良将少”，“未知中国强弱”，所以初次出

① 《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兵时行动缓慢，屯营重重迭迭。虽然诸葛亮勇而能斗，但还是心怀疑虑而试着进兵，在三郡响应时，“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①，足见他之谨慎。

再次，通过夺取主动权，减少损失。在作战指导上，他精心挑选魏军无备或东下的良机出兵，通过转换每次的攻击方向，夺取战场主动权。战场有利就打，战场失利或粮尽就退兵回国，不陷入被动。在进攻中以阵地战和野战相结合。其阵地战的任务是夺取陈仓等要点，或保卫渭滨等屯田重地；其野战的任务，是打破魏军固守不战，诱其来攻，以便消灭魏军于运动中。他交替使用这两种作战形式。在进攻陈仓城受挫后，就转变为以野战为主。他精心组织每一次的退却，在山地伏击追兵，以保障退兵安全。

诸葛亮谨慎用兵思想，保证北伐即使失利，也没有出现关羽在江陵和刘备在夷陵那样的覆灭性的失败。但是缺点与优点是同在的，由于谨慎，用兵不够大胆，出奇制胜更少，虽无大败，也无大胜，以致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在这个意义上，陈寿评他“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②，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己强敌弱条件下，如南征时，其战略战术思想特色是主张攻心为上。南征中，他采纳马谡建议，发布教令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③。从南征实践看，诸葛亮攻心为上思想包含如下认识：

首先，攻心比攻城更重要。把精神上瓦解敌人摆在首位，是诸葛亮战略上的需要。因为南中一些大族、渠帅恃其地险路远不服，今天蜀国平定叛乱，明天他们又反，蜀国正准备倾国北伐，他们知道国势内虚，再次反叛将更快。为了保障南征后全力投入北伐，和在当地不留兵，不留粮，使南中成为北伐的可靠后方，诸葛亮对于南中，不仅需要军事征服，更需要使其大姓、渠帅政治上心服；因此在南征中，攻心不能不是最高的作战原则。诸葛亮

①②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③ 《玉海》卷一四二。

主张采用攻心，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中国最早的一些兵书，就有攻心的论述。如《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①，《孙子·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膑："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回其心，所谓攻其心也"②。诸葛亮心战为上思想，是上述"夺心"、"攻心"思想的直接继承。

其次，心战和兵战相互配合，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双管齐下，以兵战为心战创造条件。诸葛亮在南征前试图招抚叛乱势力，但仅凭善意争取无效。南征中，俘获高定妻子儿女后，企图利用高定走投无路的困境，对其招降；不料高定纠集残部，决心死战。诸葛亮惊讶"邈蛮心异"③，攻心又不成。直到以得胜之师有能力消灭孟获叛军时，攻心才获得成功。

再次，明确传达己方善意，才能收到"服其心"的目的。诸葛亮在完全可以消灭孟获时，出人意料地对其七纵，向叛乱势力显示他的绝对优势，和愿与合作的真诚愿望，从而取得孟获"南人不复反矣"④的允诺。诸葛亮把攻心提到战略高度，实践中运用攻心作战获得重大成果，验证了攻心理论的正确和威力。这使得他的攻心思想脍炙人口，影响超过前人。

诸葛亮军事思想的实质，是以弱胜强。其战争观、建军思想、战争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思想，无不围绕着这一要求而展开。诸葛亮军事思想，基本上成为刘备集团军事上的指导思想，并在三分天下和治军上取得巨大成功，对后世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又由于它在北伐上连遭挫折，也引起后人深入探讨的兴趣。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其影响都比较深远。

---

① 《左传》宣公十二年。

② 《通典》卷一六一《兵十四·先攻其心》。

③ 《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地部·穴篇》引《诸葛亮表》。

④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第三节　孙权军事思想

孙权（182～252），字仲谋，19岁统事，72岁去世，在三国之主中，执政最久。在53年的执政生涯中，戎马一生，形成称霸东南的军事思想。这些思想，散见于存世的少量诏、令、状、报、笺、书、答、告之中。

一、用众力众智思想

孙权属于江东次等大族，家族社会地位不够强大。为了巩固其孙氏政权，着意争取大族支持。在其统事初期，主要争取南渡淮、泗大族人士的支持，在淮、泗集团后嗣衰落后，主要争取本地江东大族的支持，同时，对淮、泗集团同江东大族集团在政权中的力量，适当加以平衡。孙权在这一争取支持的努力中，形成了讲求御将之道的军事思想。赤乌元年（238年），校事吕壹纠举大臣失实被杀后，孙权对众大将引咎自责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①。这段表白，体现了孙权用众智众力的思想，认为虽然人无完人，但只要集中众人的智慧和力量，是可以做到完美无缺、无敌天下的。这一思想的实质，是重申向众大将分配权益，以吸引、使用大族的众智众力，在弱国的基础上，建立一支足以同北方强敌抗衡、保卫孙氏政权和江东大族利益的军队。

怎样才能调动众智众力呢？孙权认为，关键在于爱人多容。爱人，是爱护众大将。尽管自己同众大将之间存在君臣之义，彼此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也要胜过骨肉之亲，作到“同船济水”，“荣福喜戚，相与共之”①。同心腹将领之间，彼此更要达到意气相投，真诚了解。有人向他进谗诸葛瑾，他说自己同诸葛瑾可谓神交，决不是外言所能离间的。史家孙盛评论他厚待众大将说：“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当众指问其创痕），殉陈武之妾（令以陈武之爱妾殉葬），请吕蒙之命（千金募医，治护万方），育凌统之孤（在宫中育养成人），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虽令德无闻，仁泽罔著，而能屈强荆、吴，僭拟年岁者，抑有由也。”② 爱护的另一个方面，是培养他们。动员文化不高、悟性又好、有发展前途的将领，急学历史经验和兵法。他现身说法，自称统事以来，浏览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裨益。他不要求他们治经当博士，但主张通过读书涉猎，以见往事，开益智慧，实际上是主张让有战术战役经验的将领，通过读书学习，总结经验，并对于更高级的战略问题能有较好的领悟。

孙权提倡的多容，是对众大将的缺点、问题，给予更多的宽容，忘短记长，忘过记功。他说鲁肃虽有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所以我忘其短而贵其长。吴将潘璋服饰超过其身份、地位应享有的标准，杀死吏兵中的一些富有者，掠去死者财物，多次不遵守法令。监司举奏揭发他，孙权爱惜潘璋，念其功劳，总是原谅不问。陈寿评曰：“以潘璋之不修，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③

孙权所主张的爱人多容，只限于适用众大将，即主要是对于大族的优容。对军队一般成员，则认为要专威柄，否则其事乖错，主张严刑酷法，断斩示威，果断杀人。认为“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④ 因此东吴的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赤乌元年。

② 《三国志》卷五十五《凌统传》注引孙盛语。

③ 《三国志》卷五十五《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陈寿评曰。

④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黄武五年。

刑罚相当严酷。

二、重视水战和战争资源思想

在魏强吴弱、境北有长江天险的条件下，孙权认为，要成功进行其保卫吴国、称霸东南的战争，必须建立强大的水军、巩固江防，扩充人力物力资源。他从鼎足江东、限江自保的需要出发，积极主张发展水军，以便充分发挥其长江天险优势，作为割据东南的依托；并在强大水军的基础上建立江防海防，指出："孤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① 在江防上，主张夺取守江要点，积极守江，反对消极守江。他认为长江上流荆州是守江要点，企图夺取其西方长江中游之荆州，"首尾相连，一统吴楚"②，全据长江流域。为此，先后批准周瑜取蜀、吕蒙夺取荆州。他认为江北也是守江要点。他从武昌还都建业时，鉴于从建业到武昌，水道溯流 2000 里，担心今后一旦有警，在建业来不及增援。众将建议在夏口立栅，或设置多重铁索，他都认为不是好计。张梁建议，令将领进入沔水，同敌人争利，造成有利态势后，曹方将不敢来犯。同时在武昌部署精兵万人，选用有智略者任将，经常保持高度戒备，一旦有警，应声相赴。像这样打开大门来延请敌人，敌人反而不会来。张梁之计属于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防御。孙权认为此计最好，守卫武昌，应当先守武昌以北的沔水；守卫长江，应当先守江北。

孙权重视增强战争的物质基础。他认识到战争潜力来源于人民，自称"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③。鉴于江东土广民稀，在三国特殊的条件下，人口比土地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他企图扩大所统治的人口数量，积极进攻山越，补充兵员，补

---

①③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吴录》。

②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充编户。不仅在战争中掠取敌境人口，还派万人舰队浮海企图掠取夷洲及亶洲人口。他坚持对吴国人民严其赋调。1996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简牍反映，当地田租高达三成六。黄武五年，陆逊建议“宽赋息调”，减少对人力物力征发，他反驳说：“至于发调（征发兵役）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何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① 为榨取得更多，他禁止在农桑之时以役事扰民。

三、在三角中力避孤立思想

孙权主张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配合，以谋求享有结盟的战略利益。他一贯主张结盟，一贯避免在魏、蜀、吴三角中陷于孤立，企图以灵活的策略，夺取每次关系变动中的主动权，始终占据三角中的有利位置。不论三角关系怎样演变，他都企图寻找盟友。在强敌压境时，他不是吞并弱者以取悦强敌，而是主动联合比他更弱的刘备，结成抗敌联盟。此后每次同三角中的一方作战时，他总是寻求同第三方结盟。如果第三方是原来的敌人，他便灵活地化敌为友。所以如此，是他认为结盟的好处很大。例如他同蜀军在夷陵作战前，便投降了曹操，曹操才撤除了合肥之守，减轻他侧后的军事压力，让他长驱前进，不再怀有后顾之忧。在曹、刘之间，他没有固定不变的敌友，唯以东吴利益为依归。他是三国中唯一未受孤立的一方。

在结盟时，他主张对盟友作大胆而有节的让步，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如果盟友是弱者，他主张广揽英雄，扶弱抗强，包括大胆地把荆州南郡借给弱者刘备，允许他有一定的发展，以利用他分担抗曹任务，屏蔽东吴。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如果刘备势力在其庇护下过分发展、威胁到东吴的安全，他便不再让步，而

---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吴录》。

转向削弱刘备。他在结盟中大胆追求战略利益。如果所联合的盟友是强者，则东吴在这种联合中，实力和政治上都低对方一等，便会处于请降、称藩纳贡、接受封拜的屈辱地位。这时孙权以屈身为略，甘愿忍辱，说从前刘邦也受项羽封拜为汉王，这不过是时事所宜，于我何损！在他的眼睛里，受辱为轻，联合的战略利益为重，以轻代重，何为而不可？但是强国要求其任子时，他坚决予以抵制，以免受制于人，丧失独立。孙权为了大目标能忍辱，同春秋时候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颇为相像，因此陈寿评论说："孙权屈身忍辱，……有勾践之奇"①。

孙权的军事思想是东吴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分裂时期弱者在东南方取得一定成功的指导思想，它指导吴国从小到大、地跨 3 州，鼎足江东。孙权晚年思想倒退，猜疑心特重。在对待辽东公孙渊的战略思想上，也出现盲动错误。

第四节　周瑜军事思想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位于长江北岸）人，东吴淮、泗集团主要成员，前期最重要将领，谋略家，享年 36 岁。在言谈议论和行事中，表现了如下的军事思想：

一、韬勇抗威不畏强敌思想

面对强敌时，周瑜主张充分估计自己有利条件，以建立敢于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在东吴困难的时刻，他从军事、政治、经济、幅员等方面分析自己方面的所长，指出在军事上，占有兵精、将士用命、士风劲勇的优势，政治上占有经历两世考验、领导有雄才和人心不思乱的优势，经济上占有出产铜盐等战略物资、境

①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内富饶的优势，幅员上占有地方数千里、兼有六郡的优势。决不能低估东吴战争所赖以进行的这些条件，应从这里建立信心。

周瑜主张东吴应当在汉末纷争之际，“横行天下”①，积极开拓，发展自己。他提出要效法楚国，使东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他说，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地不满百里，由于继任者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②，发展成为强国，传业900多年。这实际上是主张东吴在割据扬州之后，要进一步夺取荆州、交州，全据长江，使势力达于南海。在东吴的发展中，他主张顶住曹操巨大压力，该说不就说不，该用兵就用兵，该乘胜发展战果就发展战果。当建安七年（202年）曹操要求孙权任子而东吴群臣慑于其兵威、犹移不决时，周瑜坚决反对送人质，认为送了人质，便受制于人。赤壁之战前夕，曹操挟天子而企图灭东吴，在东吴大多数文武官员丧失抵抗意志时，周瑜“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③，坚决主张抗曹，认为东吴本来就应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主张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强敌实行战略决战。打退曹操后，他提出乘曹操兵败，逐步占有南方，进取北方，以便据有华夏，最终统一中国。

周瑜赞成在曹操灭吴时联合刘备共抗曹操。但是在打退曹操进攻后，他对联合的注意力，重点转为警惕盟友坐大、维护己方安全和发展的利益。他企图软禁刘备，分置关、张各在一方，拆散和兼并刘备集团，不使它蛟龙得雨，为害东吴。临终又告诫联合盟友时要警惕养虎遗患。

二、料敌虚实以长击短思想

在战争指导方面，周瑜强调实事求是。在敌军以绝对优势兵

①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②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鲁肃吕蒙传》。

力其势汹汹压境时，主张实事求是地分析战争双方的优劣，对敌兵力采取“以实校之”① 的态度，以掌握敌我全面而真实的情况，洞悉对方的虚夸，明察由于人们患了恐敌病而不承认和看不到的敌用兵大忌，即发现敌被掩盖着的可能导致失败的弱点，在科学的基础上预测战胜敌人的可能。周瑜这一以实料敌的思想，在赤壁之战中对于东吴建立必胜信心，提高勇气和孙权定下抗曹决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战略战术上，周瑜主张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赤壁之战中，提出根据吴军擅长水战、北兵怯于舟楫、不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② 的特点，主张以曹军水军为主要攻击对象，利用其“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③的弱点，发起以江面上的火攻为先导的决战。这一思想为他带来了大胜。

三、勇作国家柱石思想

周瑜主张，将领要勇作国家柱石。为了作柱石，首先要择主。主张时值乱世，要像新莽末年马援回答汉光武帝时说的那样，“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④，认为当今正“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⑤，要选择投靠有为的英雄。择主后要结主，同所选择的英雄深深结交。他十几岁时即远道造访孙策，同孙策、孙权兄弟建立通家之好，此后即深受孙氏兄弟信任。自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⑥。在此基础上，将领应当自觉地作东吴的柱石，“入作心膂，出为爪牙”⑦，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捍卫东吴政权，建功立业。当孙策渡江准备开拓江东而兵少时，他从舅父处率兵前来相助。孙策死后，孙氏政权面临危机时，他带兵入京奔丧，以武力维护孙权

---

①⑥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③⑦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④⑤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周瑜语。

的领导地位。当赤壁之战东吴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力排投降的众议，帮助孙权定下抗曹决心，击退曹军。东吴每到关键时刻，他都企图努力镇定内部，驱逐强敌，化险为夷，发挥关键作用。

周瑜军事思想，是积极大胆的攻势战略思想，是天下分崩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里，天下鼎沸，豪强并争，群雄忽兴忽灭，四海不知所从，快速搏击者获利最多，犹移落后者就被兼并，周瑜识此玄机，力主开拓进取。周瑜军事思想也是南渡大族的产物。他的家族势力在江北，只有东吴北取中原，才有利于他家族的发展。这也是他眼光不仅仅局促江东一隅的重要原因。周瑜军事思想对于东吴立足江东、开拓进取和把曹操势力阻止在北方，起了重大作用。他的武略，在当世即获得公认。刘备曾经叹道，公瑾器量广大，文筹武略，万人之英。孙权认为他胆略兼人，有王佐之资，在称帝时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① 给予他充分肯定。周瑜以弱者而具有“横行天下”的气概，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敢以数万敌百万”② 思想、并获得成功的突出代表。

第五节　陆逊军事思想

陆逊（183～245），本名议，字伯言，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是吴国中期名将，江东大族军事上的代表人物。其言谈和实践中，体现了如下的军事思想：

一、立于不败之地思想

陆逊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保住江东，立足于不败之地。在孙

①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 毛泽东对《南史·韦睿传》的批注。毛泽东在该传记叙南朝梁将韦睿率兵兼程参加钟离之战的文旁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见《毛泽东文史古籍批语集·读〈南史〉批语》）

权统事的东吴创业阶段，他根据“方今英雄棋峙，豺狼窥望”的形势，提出“腹心未除，难以图远”①，要求以武力进攻山越，强迫山越人民当兵，以便既除去东吴心腹之患，又解决兵源问题。实质上是认为在本阶段，先除内患，再谋外利，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在三国形成阶段，东吴有了一定的实力。陆逊认为，应该乘机“图远”，夺取并保卫上流。他认为上流荆州是东吴安全的关键，不能容忍荆州出现强大势力，认为即使该势力是盟友，强大了也是危险的。对于同关羽接境的守将吕蒙远下建康，他十分不放心，指出吕蒙后方当忧，应当利用机会，夺取荆州，以控扼上流，保障安全。东吴按他的意见夺到荆州后，他认为江防的重点仍然在上流荆州，特别是在荆州的上流夷陵。夷陵作为三峡东口要地，是荆州“要害”，“国之关限”②，夷陵一失，整个荆州可忧；在战争中绝对应该守住夷陵。实质上是认为在本阶段，据有并保卫上流，才能保住江东，立于不败之地。

进入三国鼎立阶段后，吴国安全基本有了保障。陆逊认为，应该压缩对外用兵，以减少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当吴将朱桓认为出现万世一时的良机，建议乘机长驱进取，进窥许洛时，他阻止孙权采纳其建议。他强调“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③，劝孙权不要派偏师攻取朱崖（今海南岛），因为“无其兵不足亏众”④。他认为“干戈不息，民有饥寒”，“四海未定，当须民力”⑤。为了保护民力，“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⑥，停收户调，并“增广田亩”⑦，扩大军屯，以增加军粮的来源和储备。实质上是认为在本阶段，减少对外战争，使经济获得发展，才能保住江东，立于不败之地。

二、避实击虚思想

陆逊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是避实击虚。他主张以避敌之实，

---

①②③④⑤⑥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⑦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避开不利的处境。夷陵之战中，他面对令天下畏惧和锐气正盛的刘备，主张实施退却，并退至夷陵一线与刘备相持，坚壁不战。嘉禾五年攻魏时，他在襄阳前线成了孤军和信使被俘、底细被魏军掌握时，立即策划退兵。由于果断地避敌之实，他在不利时保存了兵力，等待了时机。避敌之实，是不利时实施退却，难度较大。他主张区分情况，或明避，或暗避。如果己方斗志较高，像在夷陵之战中那样，可以公然避实，率军大胆退却五六百里，依托夷陵有利阵地坚壁不战。如果己方将士思想动摇，像在襄阳前线时那样，则无论对敌对己，都必须悄悄地避实，例如施设变术，制造出军进攻的假象，然后退兵，以便不露出怯意，使敌人不明其真实意图，不便乘机相逼，避免自己造成必败之势。

当敌人暴露出弱点时，陆逊主张击敌之虚，以求必胜。击虚的要点，是准确判断敌人之虚。他主张不应单纯从部署，尤其要从敌之指挥、精神、体力是否达到疲劳方面，观察确定敌人是否为虚。在夷陵之战反攻时，他同众将争论过蜀军何时为虚。众将认为吴蜀两军相持数月后，刘备要害处都已固守，不再虚了，因此陆逊确定的反攻时机过迟。陆逊则认为只有此时蜀军才为虚，理由是："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① 他还主张诱使敌人犯错误，以造成敌人之虚。偷袭荆州前，他以邻境新任守将身分致书关羽，诡称庆贺胜利，仰慕英名，用卑而骄之的诈术，麻痹关羽，诱使关羽将江陵守兵调往攻魏前线，造成其后方进一步空虚。

他认为，避实击虚的前提是知彼知己，主张把研究、把握敌我双方将领作为了解情况的重点。每战之前，他都对敌方主将作出判断。认为关羽"矜其骁气"，"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②，都中肯而精当。他也重视熟悉部队、熟悉部将。他不肯出兵援救在

①②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夷陵之战中被围的吴将孙桓，认为孙桓“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孙桓字），安东自解”①，也被证明看得很准。这些，都说明他十分重视了解、研究敌我双方将领的特点和思想状况，以作为避实击虚的依据。

三、众克在和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由于吴国军内上层关系错综复杂，他特别看重协调内部关系，认为“众克在和”②，军队胜利在于内部团结，强调保持和睦。东吴前期军事上依靠南渡的淮泗集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陆逊取代吕蒙担当上流重任，黄武元年（222年）任大都督、假节、督率众将迎战刘备，显示江东大族开始取淮泗集团而代之。他本着吴国战争要依靠江东大族，也要团结各方面的精神，处理军内各集团间的矛盾。在夷陵之战中，自己威名未著，骤当大任，淮泗集团的老将、孙氏宗室的贵戚将领等不听指挥。他一方面警告众将遵守纪律，另一方面本着“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③的精神，以大局为重，当时并不向孙权启奏众将的问题，以忍让来保护诸将。他的威信和名望建立以后，仍然主张广泛团结内部。他劝导淮泗集团躁急的后起之秀诸葛恪说，“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④

他认为应以礼治来保持和睦。针对孙权用刑严峻、将吏陷入法网的过多过众，不利于维护军内和睦，建议“施德缓刑”⑤，重能忘过。反对先讲刑，后讲礼，认为礼的出现，早于刑很久。天下尚未统一，需要稍加恩贷，以安定下情；军务政务越来越多，离不开有才干的人；历史上汉高祖也不计较陈平的过失，用他的奇略，终于成就大功。认为“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

---

①②③④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⑤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非怀远之弘规"，希望孙权"忘过记功，以成王业"①。

陆逊是东吴军事思想转折的主要推动者。他推动东吴军事思想从前期开拓创业求发展，向中后期限江自保求安全的方向转变。他的军事思想，基本属于守势战略思想，是魏强吴弱形势的产物。魏国强大，吴国实力不足，因此陆逊主张限江自保。陆逊军事思想也是江东大族利益的产物。鉴于江东大有开发潜力，一般来说，许多江东大族都不愿背上沉重的战争负担，去同魏国争夺无太大希望可夺到的中原，而宁愿保住江东，在当地求得发展。陆逊军事思想在东吴夺取和保卫荆州、巩固国防、保存实力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①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